

华夏知青文集选

第一輯《知青情结》

岁月留痕
(一)



华夏知青网

和众家长们走出大门，身后就爆发出一阵欢呼。这些小毛桃们其实早就巴望着我们离开了。“迪高”音乐迫不及待地震响起来，笑语如浪，可以想象他们从各自包里拿出薯条、炸鸡和那些我们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吃食的情景。青春真好。年轻真好。抬眼望，冬日的天空铅云密布，该不会下雪吧。雪？心猛地一颤，竟然想起我那“没有青春，只有年轻”的时光，想起1976年的那场大雪……

那一年，我十七岁。

……睁开沉沉眼皮，眼前金星乱窜雪花飞舞，纷纷扬扬，极富动感。天旋地转，复闭眼，任雪凉凉地撒在脸上。想起来了，在被雪伪装得没了棱角的岩石边，我踩失了脚……

宣传队的知青和当过兵的队长走远了，他们不会等我。在这高寒的滇东北大山里钻来钻去巡回演出的二十来天中，我几乎天天掉队，队长常训斥我为“资产阶级少爷”，每次我都默不作声，只把目光直勾勾地看定他，直盯得他心头发毛悻悻作罢。有知青说他背后授我“生牛”的称号。

他们习惯了我掉队，不会想到我会滚了坡。

……说不清是哪里疼，头？脖子？腰？或许是脚？脑门流下的血凝成块糊住了左耳。眼睛搜寻我跌落的地方，哦，是个二、三十米高的岩坎，那段雪地一片狼籍，几块呲牙咧嘴的乌青的岩石兀突于白雪之外，狰狞得很……

多事的1976年，年关将近，来了场少见的大雪，森森的白，刺骨的冷。“过年连杨白劳都要回家”。说是瑞雪丰年，宣传队的人却都在咒它不识时务，给最后也是最边远的演出徒添艰难。唯我暗自高兴，因为目的地是我插队落户的彝家小寨——赛瑟罗。在那里我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些爱我呵护我的豪爽善良的彝族乡亲都叫我“学生”，那个视我为亲儿的慈眉善目的老妈叫我“娃娃”，到公社宣传队报到的头天，她要我回去过年。

……凛冽的风搅起蒙蒙雪雾在山坳里回旋，呜呜作响。冷，彻骨！打个寒颤，强撑起身，见赤裸的左踝部肿齐小腿，泛着青紫的光泽。想屈腿将右脚那只湿透又冻硬的破解放鞋穿好，却感觉裤子粘着右大腿后侧的肉，下意识一扯，一阵剧痛钻心，我听见我的牙缝里迸出狼嚎……

许多天前，大腿后侧冒出个核桃大小的恶疮，脓汁血水把裤子凝了一块，一步一磨疼得要命。一日演出结束，遇一“赤脚医生”，遂求治，他抽了我两根“等外烟”后，取一乌黑的烤茶罐，伸舌沿罐口舔一圈唾沫，倒入白酒点燃，趁火势正旺，啪地扣于我的患处，脓血拔出半罐，皮肤灼伤一圈，后来就起泡感染溃烂发烧。

……时近黄昏，天色灰暗。雪没有停下的意思，风搜刮着身上的热量，早起吃下的酸菜汤包谷饭已消化殆尽，全身就只有刚被撕开的大腿恶疮处湿漉漉热烘烘的。直觉告诉我，不能呆着，得爬上去，山的那边峡谷的半腰就是小彝寨……

当知青的都巴望参加宣传队，年轻人聚一起唱跳打闹泡工分，又逃避了地里劳作的苦累，而谁都心照不宣的是借机与公社干部套近乎拉关系，为跳出农村打基础。我是个“戴帽知青”，没指望就不去凑热闹。能进宣传队仅仅是因为我会拉手风琴，而公社就有一台没人会拉的48贝司“长江”牌手风琴。步行巡回演出，背包上再架上一台手风琴，我能走得赢那些带二胡笛子的人吗？不掉队才怪！

……手风琴？对，琴呢？啊，在那边，斜在几米外的坎子下，被雪埋了一半。我忍着疼痛挪过去把它拖出来，艰难地推到一块大石头上，我不愿它在我回来之前被雪水浸湿……

队长训导：乐器道具，手中武器，爱护眼睛，防修反帝。知青背地里说：扯淡放屁！我却很珍惜这琴，不仅因为它寄托着我儿时的梦想，是我无望黑暗中的一线阳光，也因为它的前主人——传说中的那个据说很美丽的老三届女知青。她死于开山造地放炮的石头下，琴上涂过她的脑浆子。作为遗物，从未有人动过这琴，我庆幸能由我来弹奏它。只有在演奏时，我才觉出自己是纯洁自由的。

……再上一步，好滑！已爬上了一半路，对，就是那块石头，抓住，使劲。“哗……”，石头与我一起滚落，我被砸了个满脸花。抹去鼻血喘口气。天要黑了，寂静的山坳只有落雪的窸窣，反衬得心跳如鼓……

要过年了。儿时过年想得最多的是父母给什么礼物。上一年级时过年我得了一本书，就有了读书人的感觉，但看到弟弟得的五颜六色的玻璃似的糖块又馋得慌，于是大方地借书给他看，想换得一颗糖吃。弟弟觉出了我的不轨，将糖收于小铁皮桶抱着，不再放下。守岁时他睡着了，小桶的一面挨上了炉壁，被烫醒后他没哭，张着起泡的小手紧张地看父亲开桶盖，当看到糖块成了糖稀，他哇地大哭。那是虽然困难却又多么温馨的日子啊！妈妈温暖的气息，爸爸拿手的糊辣汤，那有“太阳味”的被褥……，遥远得象个古老的故事，而那腾腾地塘火、辣辣老白干、香香麂子肉、融融的亲情就在岩壁的那边。爬上去！彝族老妈妈在等我回去过年。

……目标是岩边的那棵杨梅树棵。蹬实了，换手，脚木木的没感觉，总也找不到支点。膝盖好象破了，腰肋钝疼，头胀如鼓，喘气吹得面前的雪粒子乱滚……

记不清滑下来几次了，累！全身发软，两手麻酥酥的，一看才知道手掌和小臂下侧磨得得血糊漓拉，不痛，我没了痛感……

队长的“武器”是大鼓，那天他训完话后率先背鼓出发，从后面看，大圆鼓长了头和四肢在蹒跚挪动，“乌龟！”一声喊，队伍哗然大笑人仰马翻，他茫然回顾，待弄清大家发笑的原因后，刻板的脸上生出了些许笑意。其实队长那人不坏，只是严肃得做作，把这“政治任务”弄神圣了，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给他下达这光荣任务的人早十天前就回家团圆去了。说真的，二十几人的吃、住、行、演就已经够呛了，他还成天“不许打架谈恋爱免得以后走不脱”地教导我们，那份执著。若是真没一点佩服，这帮毛栗子般扎手的知青会跟他走到腊月二十八？

……不敢看也不敢想浑身的伤口，别动摇我再攀一次的信心。要转移注意力，总得要想点什么，呵，与弟弟换糖的那本书名是一一对，是《安徒生童话》，现在我的处境象那个卖火柴的……火柴？摸摸破军衣的口袋，哈！我有四根火柴和一个烟屁股。欣喜若狂，忙扒开地上的积雪搂柴草，却意外地找到了背包。柴草精湿无法点燃，我放弃了努力，点着烟，躺下，看一股青烟喷向黝黑的天空……

当知青不易。那一刻，我原谅了我的知青同类投向我的鄙夷和怜悯的眼神，理解了那些阿谀奉承拍马吹牛的蝇营狗苟之事。上次知青慰问团下来，我看得出每个知青都有许多话想说，可一到会

上，说的全是形式大好之类，因为知青慰问团大多是知青家长，何必让他们操心难过？都是好孩子。种“扎根树”时，老父母们手抖了，知青们接过家什作虔诚状，卖力地沿河埂栽下人均一棵的“扎根树”，只一夜，扎根树就成了拔根树顺河东流去。公社领导恼怒异常，要追查，众知青和慰问团都说了声：扯淡，散了去。人哪，内心深处何尝不愿堂堂正正做人？这点扭曲与那个错异的年代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被自己的宽容感动了。

……雪被朔风吹得结了层冰壳，每爬一步都噉哩咯噉响，一步，又一步，那蓬杨梅棵越来越近了。成败就这一回，我清楚地明白，我不可能再上一次了。抓住，抓住了！心中一阵狂喜，不成想那杨梅棵被冻脆了，我被残忍地戏弄了。许久，我抬眼望那段岩坡，被反复碾压的积雪已冻成了光亮的冰道，它无情地断绝了我摆脱困境的希望。

躺在雪地里，脑袋一片空白，身体早已不疼了，反而有种酥酥快感，象父亲的胡子扎脚板心的感觉。闭着眼，不愿睁开，体味着血液越来越慢的流动，它在慢慢凝结……完了？就这样？去你妈的，老子还有背包呢！强撑起身子，拖过背包，冻僵的手解不开背包带，用牙咬……

“噎——”枪声？我停止撕咬，伏在背包上等着。“噎——”，又是一声，是枪响！是彝家赶山打猎的火药枪！直起腰，隐约听得到人声，我想喊却发不出音，舌头嘴唇下颌没了知觉。对，点火！抖索着掏出火柴却不知烧什么。背包！我扑上去撕咬开被套露出棉絮，第一根火柴没拿住，掉到那些湿柴草里，最后一根，小心，捏紧，划！“啪”的一声，断了的火柴头飞了出去，在空中留下一个美丽耀眼的飞行轨迹，在雪地熄灭了。不公平，太不公平！想发泄，但没力气，骂不出声，也不知骂谁。绝望地茫然四顾，目光蓦地聚焦于那块大石头上。琴，手风琴！扯过琴来，咬开扣带，吃力地把脚套进贝司风箱皮带，僵硬的两臂将键盘拢于胸前，低头用下巴压住琴键，蹬——

那个雪夜的琴声，是生命在绝望时倾其所有对自身的张扬，是生与死在临界点上不甘的嘶叫与呐喊，饱含了生命全部的哲理和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老妈妈是怎样撕扯着队长要人，是怎样把村子里的所有成年男性赶到了风雪山野，是怎样流着泪为我敷上气味浓烈的草药。醒了，彝族乡亲和我一起过年，围着地塘火，吃烧洋芋烤肉干，喝包谷酒，唱醺醺酒歌，还有手风琴。

那年，我十七岁。

多少年过去了，那雪夜琴声今天在孩子们忘情的喧哗中响起，竟然仍旧那般真切，在我灵魂深处轰然奏响。返城时我们肮脏褴褛的行囊如洗，可我们人生的行囊里多了几件足够我们终生受用的珍宝。“我不希望历史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重演，却希望他们记住那段不能重演的历史”，从而多一点理智与坚韧，因为货真价实的生活并不完全是阳光和鲜花。此时，我很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我们的十七岁，是绝对缺憾的，而你们的十七岁，是不是也缺少了点什么？

2001年3月13日

<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58> 孙伟文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谨以此文献给一位多愁善感的朋友，她把美好留给大家，却宁愿独自忍受悲伤。

要知道，人生如此。快乐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关爱自己和自己所关爱的朋友。

衷心祝愿她永远快乐，永远享受着友谊的温情。

我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在北大荒兵团，说是兵团，其实除了有32元的工资以及有人管你不上工，和农村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叫农场更合适一点。

我在那里生活的小村子，离中苏边境约一百公里。在靠近边境的湖里边是另外一个“团”，它的前身就是小有名气的劳改农场。当初，北京把判刑的犯人送到这里劳动改造，刑满后多数并不能迁回北京，而是留在那里，被称作“劳改释放犯”。不久前，电视片Discovery中有一集描写法国把犯人流放到圭亚那的情节，与之竟如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到了文革期间，中苏交恶，背靠边界的农场已经不再认为是安全的地方。那些因为有前科的“阶级敌人”们，就被撤到离边境远一点的地方，我在村子里就来了二十多个人。其中没有家眷的就住在宿舍，就在我们隔壁。

开始的时候，队（那时候叫连）里的领导讲了一大通阶级敌人如何如何，规定了一大堆注意事项。不管是因为大家头上都有一柄无形的剑，还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猜忌，知青和劳改们彼此都用疑惑的眼光打量对方，各自退避三舍，仿佛中间有着一堵厚厚的墙。

毕竟人是有情感的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渐渐地相互了解，人为的隔膜悄悄地消失了。约莫半年以后，除了知青的衣服更脏更破，劳改们还整整齐齐地穿着他们常年不变的黑色衣裤和最显眼的白布头巾以外，已经分不出知青和劳改，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再以后，宿舍也划分不出知青宿舍和劳改宿舍，除了队里的领导们，阶级立场早到了爪哇国。

其实，我们村里的这二十多个劳改，多数是因为盗窃被判刑的。有一个人是偷了几十斤粮票，最重的一个据说是偷了五十多块钱。按当时的价值，五十多元是二级工一个多月的工资，也不是小数目。可是以此断送一个人的终生希望，毕竟让人震惊。

知青们无从考察他们真实的背景，因为这在当时是领导们的机密。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为。

我所要讲的故事，并不是为了他们评说是非曲直，历史总会沿着它自己的轨迹运行，我无力改变这一切，也许我们都是如此。

1971年的隆冬，住在我隔壁的一位独眼劳改（请原谅我用这个不很恭敬的称谓，尽管是因为我不愿出卖他的姓名），被派去管理菜窖，据说他的一只眼睛是在湖里的时候，被脱谷机飞出的异物打瞎的。

此事真说不清领导们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要知道，这菜窖是全队一百多个知青和劳改一冬天的食物，别说被阶级敌人投毒下药，就算是菜烂了，我们也只有等着坏血病降临。

所幸这种事并没有发生，独眼着实很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菜，唯恐有所闪失。他们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早就学会了惟命是从，也学会了服从加给他们的命运。而我们也幸运地在冰天雪地的来冬时节，还能吃上没被冻烂的洋白菜、萝卜和土豆。

一个严冬的早晨，我必须早起出车。我的一台没有驾驶室的履带式拖拉机，是除了用于运输的那台朝鲜产28马力轮式拖拉机，是全队唯一不被封存的机械，我要冒着严寒从山上拉回柴，保证全队的取暖。

当我在例行地用炭火加温油底壳的时候，独眼老远从菜窖跑过来借炭火盆。据说是这几天太冷，菜有点要冻了，他要给菜窖加点温。不知是什么匪夷所思的直觉，我特别叮嘱了一句：小心一氧化碳中毒。

我还要从山上拉下无数的木柴，说完之后就匆匆地开着座骑进山去了。不幸的是，无意的话竟成事实！

傍晚时分，我拖着最后一爬犁木柴进到村口的时候，透过震耳欲聋的柴油机轰鸣，仍然隐约听到外号叫烟鬼的食堂“堂长”——一位和我同车到这里的知青，独眼的直接“上司”——异样的呼喊声。透过淡淡的暮色，也看得见他在向我拼命挥手。

于是我停车跑了过去，不到近前，就听见他喊：XXX（独眼）煤气中毒了！

人常说：死人沉。其实人失去知觉时一样的沉。我们两个人冒着被窒息的危险，七手八脚地硬把他从极窄小的菜窖口里拉了出来，真的费尽了全身的力气。

独眼已经昏迷，但是看样子还不算太严重，至少呼吸还是正常的，脉搏也还有力。烟鬼急忙又跑去叫来几个人，先把独眼抬到就近的食堂，然后报告了队里的领导。领导看了后，不以为然地让我们把他抬回宿舍，说是看看再说。

当晚，独眼一直在昏迷中，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天亮时分，我们赶紧去找领导，要求派车送去四十余公里外的团部医院抢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扰了领导的清梦，派车的事被否决了。但我总以为其中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你们还要不要站稳阶级立场！

就这样，一个短暂的北国白昼又熬过去了。这一天，好多的知青都没有上工，大家都默默地守候在独眼的炕头。相反，劳改们却仿佛没有看见眼前的一切，仍然做指派的事去了。

入夜后，独眼的情况越趋不妙，昏迷依旧，呼吸渐趋粗重且不均匀，情急之下，我们又去找领导，经过死磨硬泡之后，领导们终于良心发现，同意派车，此时距事发当时，已经有一天多了。

即得令箭，剩下的事就由我们做主了，一大帮知青烧水的烧水、烤油的烤油，一通乱忙，不到半小时载着独眼的轮式拖拉机就轰隆隆地窜向了沉沉的黑暗中。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格外的寒冷。一位天津的知青老Z开车，烟鬼和我在拖车上看护独眼。尽管老Z小心翼翼，破旧不堪的拖拉机依旧在土路上蹦蹦跳跳，烟鬼只得把独眼的头抱在怀里，我又撑着烟鬼，尽量不让独眼摇晃。

四十公里的冰雪山路，到达团部医院时已经午夜时分。睡眼朦胧的医生瞄了一下独眼的黑棉袄，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吩咐护士用氧气后，径自钻回值班室接着睡觉去了。

我们把他抬到病床上，看着护士插上了氧气，剩下的就只有等着天亮。无论如何，天亮后我们得赶回队里。这辆拖拉机是队里除了马车之外唯一与外界联系的交通工具，能在深夜送一名劳改犯（尽管已经释放）去医院，已属破天荒。假如为了一个阶级敌人耽误全队的事情，我们三个担待不起这个巨大的责任。坐在昏暗的走廊里，我们三个人都默默无语，几近黑暗的灯光下，只有三个如萤火般的烟头在延绵不断地闪亮。此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企盼独眼快点好起来，不然白天就只剩他一个人孤独地呆在这里了。

然而独眼并没有为难我们。大约两个小时后，独眼的喘息愈发粗重，几乎成了吼叫，而且越来越不均匀，脸色也变得腊黄。情况在为不妙，我们赶紧不由分说地把医生从床上抓了起来。尽管医生老大不情愿地看了一下，还是叫来了所有的护士，进行了所谓的抢救，也算是尽了医生人道主义的天责。在那样一个扭曲的时代，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约摸半个多小时后，独眼的吼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微细，最终，那吼声象幻影一样消失在沉重的夜色中。

独眼永远地走了，离开了这个对他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世界，或许是没有留恋的世界。独眼临终的时候，没有挣扎，他似乎不在乎要不要在这个并不容纳他的世界上多停留一会儿。但我看见了，他的真眼和假眼都没有闭上。

在他的身体还没有变得冰冷的时候，我和烟鬼替他盖上了眼睛。蓦地，我突然以为他多象服苦役时的Jean Valjean，在用他同样无光的真眼和假眼直面上苍。不幸的是，他并没机缘遇到Myriel主教，而只遇到了无数个Javert。

一瞬间，我突然知道了什么叫作生与死，其实竟然是那么简单。不经意间，刚才还谈笑风生的人，已经是阴阳两界，逝去的人永远得到了解脱，却给活着的人留下永远永远的失落。

假如有一天，当我病入膏肓的时候，我宁愿选择安乐死或者耗子药（假如安乐死不被公认的话），我不愿给生者带来太多的麻烦。但我也知道，即便我最后的安排能面面俱到，生者仍然会有无穷无尽的遗憾，那么我就应该尽量快乐地坚持到最后一天，这可是对大家都是折磨。

是悖论？可能是的，我说不清楚，好象为了珍爱我的人们，我应该坚持下去！为了少拖累珍爱我的人们，我就应该尽快让他们摆脱无谓的煎熬！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人生啊，莫不是一场梦。为了我所钟爱的人们，就算是梦，也要把这荒诞的人间喜剧演下去。

已经没有必要等着天亮了。替独眼盖上了一块白布单后，我们转身就走。对身后护士让我们把独眼推走的叫喊置若罔闻，Son of bitch，你们TMD早干什么来着！所有的愤怒都发泄给了这些可能无辜的护士们。

我们三个人挤在狭小的驾驶楼里，放任地在墨一样黑夜中走在返回队里的冰雪山路上。我们全都沉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黑暗中，我隐约听到烟鬼的啜泣声，毕竟独眼是他的直接部下。也是五尺男儿了，应该么？不应该么？！

数天后，我们六七个弟兄去安放独眼。北大荒冬天的冻土坚如磐石，是无法安葬的。

据说独眼没有亲属，此时此刻，就算有亲属也绝无可能赶来为他送行。一具简陋的白松棺材，被我们抬上了曾经送他去医院的拖车上。没有鲜花，也没有仪式，只有这几个同住一室的难兄难弟。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把独眼的全部家产：一个小小的手提包和用白布头巾包裹的几件黑布衣服，统统放进了棺材。没有亲属，也就没有遗产，所有的一切都让他自己带走吧。

拖拉机载着独眼和我们到了被称为豁牙子山的坟场。那天格外的冷，烟炮（暴风雪）也格外的狂烈。我们把独眼安放在一块最平坦的空地上，周围是全被白雪覆盖的棺木和坟莹。有人说，应该让独眼头朝南，离他的家北京近一些，于是我们就这样办了。

离开豁牙子山十几里地后，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有人大叫错了，说是应该头朝北，因为这样独眼一站起来，就可以直接向南回家，不用再转身，也不会走错方向……

不管谁说的有理，全体人员没有异议：我们立即掉转车头，去把独眼的棺材转了过来。

后记：

一位萍水相逢的陌路人，尽管至少在当时社会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他的离去毕竟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回忆。
那毕竟是一条生命，也尽管在那扭曲的年代。

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珍惜。人生莫不如此，愿我的朋友们，为了自己也为了所爱和被爱的人，坚强并且快乐地生活吧。

2001-08-1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八月十五是农人们重视的节日，人们也有心情，有能力让这个节过得好和象样些，生产队也是放假过中秋节。

小丽还是忙着打她的猪草喂猪，这天息工还可多打些猪草，没平那么忙，她可悠哉游哉的打。她来到河边，柳枝垂吊在水面上，水的深处小鲢子鱼在里游动，她用手拨动水，小鱼很快就游得没影了，乐得小丽哈哈直笑，鱼儿都能在它的范围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小丽觉得她也象鱼儿一样的自由自在，清闲。她真正理解了，乐在其中。她也没思念亲人，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感，因为她深深的明白，苦与乐，酸与甜的滋味只得自己尝；孤单寂寞只能自己面对。

吃完中午饭后，小丽还是宰着猪草，唱着唱惯的那首“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半晌午时也有过几家人来请她去中秋节，她都婉言谢绝：“不了，谢谢你们，反正晚上大伙都要在院在里赏月，那时一起过是一样的。

小丽想晚上煮点糯米饭，蘸红糖吃一样的过中秋节。正当她在安排自己怎样过中秋节，秦岚他们带着一个老太太来了，什么都没还说开口道：“快拉风箱烧水。”小丽赶快就把锅里舀好水就拉风箱。那边元刚已从账鼓鼓的军色挎包里拿出一只母鸡，拿刀放血，居然还放了点血出来，原来他们在路上又丰收了别人的鸡，奇怪的是那老太太对年青人们的所作所为没露出责备神情，却诡意的笑着说：“你们又丰收舞农民的鸡了。”小丽原以为老太太要责备他们偷人家的鸡。

元刚熟练的打整着鸡，这桌上已堆满了丰收的小菜，买来的糍巴，红糖，秦岚去找干二姐讨黄豆面，不但是讨来黄豆面，还讨来一些咸菜，一小块腊肉，和一小条腊猪油。

原来秦岚他们准备到鑫县城去耍，一走到建兴镇，看见镇上正逢赶集，秦岚就不想去了，确实离县城还要走好几个小时，大起个肚走哪个远，元刚一开始都不是好愿意去，听秦岚一说不去鑫县城了，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二人就在集上慢慢的逛，在镇上的饭馆吃饭时碰见了这位老太太。

一切都搞好了，秦岚这才把那个老太太介绍给小丽：“小丽她叫袁妈，她就是你经常砍柴的九龙公社，路过那个建楼的男知青的妈妈，她专程从重庆赶来要和他儿子一起过中秋节。”

小丽听到这里，她平时上山砍柴，都要经过那个建楼，那建楼是用条石垒成，象电影地雷战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一样。里面住的是一男一女重庆知青，男的象京剧“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女的是一个相貌平常的小个子女知青，建楼一楼一底。安排知青时，房屋紧张，于是就把楼上安排给男知青，楼底就安排女知青。就这样一对异性就

住在一个屋檐下，接下来就是生活的艰辛，他们就有了感情，但是知青们都传说那个男知青很花心。

“那建楼在九龙公社最高的山上。”小丽惊奇地说。

“不怕，我把建兴那坡都爬上来了，我儿子说那坡最难爬。”听袁妈这么一说。小丽更加惊讶。

小丽心想这位袁妈连建兴的那一坡都能爬上来，真是了不起，要知到他们刚来时爬得他们哭。母爱的力量真是伟大的；五十多岁的老人竟然把建兴那陡峭的山路爬了上来，而等会还要爬到九龙拐上面去。小丽用商量的口气对袁妈说：“袁妈明天我再陪你上九龙拐山上去，那是另一个公社了，离我们这还很远。”

“不，我今天一定要到他那里去，是听他们两个说你找得到那个建楼我才来的。”老人家固执的说。听她这么一说，今晚非得陪她上九龙拐了，于是小丽赶紧打几碗米煮饭。小灶的糍巴也热了，正好端起来就煮饭。

把热熟糍粑和袁妈带了的三个月饼吃完后，鸡汤也可以了，抄了几样菜，匆匆的吃了饭。秦岚对小丽说：“你快带袁妈上九龙拐，我给你喂猪。”

没有温暖的月光是柔和多情的，它把那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万长深渊的九龙拐的路照得跟白天一样，山壁亮得象面面铜镜，两个长短不一致的身影在山壁上移动，山岩下的植物也清晰可见。你每走过一个拐，你就会清楚的看到，地貌形成的龙头.龙身.龙尾，当你爬到顶端，你眼里好象看到群龙出游，时而好象龙在腾空飞舞，岩边风哮声又象似九龙在吼叫。

小丽和袁妈走在这月色下的青石板路上，老人家话很多，小丽话也多，一路不愁没话摆的。

“小丽，你多大的数了。”

“我二十岁了。”

“你没在农村要男朋友啥？”

“没有，想都没想这些。”

“那就好了，小丽告诉你要招工了。”

“早听说要招工，知青们都听恼了。”

“刚才你那两个同学在我没有说，这回是真的要招工了，是我的市委工作的一个弟弟讲的。”

小丽听她这么一说有些相信地说：“要招工也不一定招得到我？”

“招得到你，你在农村还喂猪。象你那两同学可能就不得行了，他们娃儿都有了。那女知青有几过月了？几月份生？”

“听他们说有六、七过月了，一月份生。”

“象他们这样更没得希望，小点呢可以去刮了，等倒招工。”

“知青生娃儿的很多，我们公社就有好几个知青的崽崽了。”

“晓得你们这些知青是哪个想的哟？各人在一起就是了，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

“你们大人哪个管得到吗，远天远地的。”

“就是呀，我哪个儿了也要了个女娃儿，他们也住在一起了不知有没得娃儿。”

“可能没得哟，如有娃儿知青们早就会传开了。”

“没得就好，就是有了我也会给他们想办法。”

原来这位老太太是确实知到要招工的消息，是专程来告诉他儿子这消息的。小丽不知到她是怎样爬上建兴的那一坡的，现在又爬九龙拐这一坡险路，可怜天下父母心，母爱莫能助的伟大。她不断的提醒老人：“袁妈，这几块石板有点高，我来拉您！那几块有窄，还有几块陡梯是松动的。”

她们一路摆谈，一路小心的爬完了九龙拐，又走了好长一平路，才到那建楼旁的小路。这老人家也确实累得不行了，她喘着气喊：“袁小萌，萌萌。”

听她这一喊，小丽才知道她儿子的名子，于是她就帮着袁妈喊：“袁小萌，袁小萌，袁小萌。”

她们喊了好多声的人才听见。“唉，是哪个在喊小萌！”是一个女生的声音。小丽连忙说是：“是小萌的妈妈来了！”

听到里面的声音后袁妈忙问：“你是小玲呀！我是小萌妈。”

远处有了点光亮，是玲玲打着向日葵火把来接她们来了。“袁妈你哪个这么晚才到，你真的从重庆来了呀？”

袁妈看见来小玲一个人接她，她急切地问：“萌萌到那去了？哪个你一个人来接我们？”

“小萌到下坝区去耍去了。”回答了袁妈的问话后，那打火把的女知青看了看小丽说：“你是汤小丽。”听她这么一说，小丽也想起了。

“你就是赵玉玲呀？”原来她们都知到对方的名子，只是见面不多。听这么一介绍俩人又觉得亲得不得了。那袁妈却非常失望，她的儿了不在。

“袁妈好生点走路哟，农村路不好走。”玲玲小心的为袁妈打着火把。小丽走在后面，这条路也确实难走，这周围只有这座建楼，建楼是防土匪的，有若干年历史了，离那些院落很远，平日里就只两个知青走这条小路。

小丽一走进那个建楼就感到害怕，建楼的里面宽大，煤油灯下，她觉那张床铺好象在一个角落，挂着纹罩，两面个知青的大柜子平整摆着也只占了房间小小部份，煤油灯没照到的地方片漆黑，楼上长形圆门，圆门下放有个用竹筒做成的简易楼梯几乎是和墙平靠的放在那里，上面堆些包谷杆似的东西。

袁妈又拿出来月饼，麻饼和一些糖，于是三人就在昏暗地堡式的房屋过起了中秋节。袁妈多次提到他儿子：“晓得我们萌萌在那里过中秋节哟。吃得到月饼没有。”她告诉两个知青，听说她要到农来和萌萌过中秋节，这些月饼是他们几家人凑起的糖果票买的：“这个娃儿又不晓得跑到那去了。”

“把月饼给他留到起吗？”

“过了中秋节吃月饼没好大个意思。”

听她这么一说，两个女知青心里明白，老太太没看到她儿子不高兴。

“你在这里耍吗，他已经出去了几天要回来了。”玲玲宽慰袁妈说。

“那小萌出去了就你一个人？”小丽惊奇的说

“啊！”

“那你个人不怕呀？”

“不怕，搞惯了！”

小丽打了一个呵海，传染了玲玲，玲玲又打个呵海，后来袁妈也打了个呵海。把屎尿拉完后，三人就睡觉了。小丽和玉玲睡的那头，正好对着楼上那黑洞的门，小丽上床就死死的盯着那门好久，脑袋瓜子在莫名其妙的恐惧中，好久她才强迫自己闭上眼睛。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忽然那门亮了起来，发出刺人眼睛的光亮，一个人象荡秋千似的荡了下来，小丽被吓醒了过来，一身大汗淋淋，原来是一捆包谷杆掉落了下来；同时小丽也到肚了很疼痛，她轻声的唤醒玲玲，她俩打着火把到猪圈里去屙屎，一阵鞭炮似的响声后，一种吃多了的臭味传来，小丽觉得有些难堪，但人舒服多了，再一躺在床上小丽很快的睡着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一想那昨夜幻影就害怕，没有想就在同一个区，一个高山顶上，还有一个比她更不成为家鬼一样的建楼，而多数时间是一个女知青住在里面，她觉得她的处境比她还要堪怜。那鬼建楼她一辈子都不想再去了！她还是喜欢她所住的那个院子。

发表日期: 2004/4/14 9:28:18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序言

我非常喜欢写字，这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的，因为这种爱好，所以我的逻辑思维训练不是太好，以致于当我要用理性克制激情开始论文写作时，我的论述语言往往孱弱无力。写作会使人有与世隔绝的感受，我可以细致入微的描述一颗钮扣掉在地下的声音与状态，却常常对于现实的变动产生怀疑。这大抵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作家都是向内心发展的类型：卡夫卡、张爱玲、博尔赫斯以及川端康成。

我喜欢富有质感的语言，干净的语言，在阅读的过程中被赋予快乐的权利，在庸常中解脱，虽然此后还要回到庸常的态势中去。

我深深的记得川端康成小说里写到火车夜间经行的黑暗里，人在窗上看见自己影子的描述，那恰好是秋季的夜晚。其语言叙述的精美到位，也许正说明了我们现实的态度，这样的“我”，意识潜流中的“我”就象这深夜中的镜中人，永远隐藏在黑夜的车窗里——我们的现世生活该如何对待与描述正是写作的最大问题。

在笔下的我们大抵是常常发问，常常无法相信自己的表述。

虽然如此，但还是希望写下一些文字，表示自己还是可以发出声响的，因为这世界在黑夜之时寂寞无伦。

我的贴子写的是过去的我未经的故事，也许不是很好，但是在写作中我常想起蒙田的一句话：“强劲的形象产生现实。”

我的想象有助于完成过去的事实，但是所谓记忆也许永远无法重现，历历在目。

但是我还是努力写着，所有的故事因为我而创造出来。很高兴。

(一)

记忆这种东西有时候还是有点意思，就象我的小姑娘。

现在我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屋子里在放披头士的《黄色潜艇》，屋子里分明充满了一种懒洋洋的嬉皮士情调，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每天我都要喝一杯咖啡，墙上挂着凡高的画——我常想凡高到了晚年一定是精神分裂的，他放弃了世俗的快乐，走到阿尔的田野上，选定一个位置朝自己开枪，结束了短暂忧郁的生命。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小姑娘，她说，凡高不喜欢城市因为城市令他神经衰弱，可是我喜欢城市，真的喜欢。

我可爱的小姑娘穿着一身黑坐在沙发里，神清气爽，脸色红润。

喜欢唱歌的小姑娘没有成为歌唱家，反而成了作家，她原来的英文比我现在的水平还烂，但是现在她居然会用英文写小说，还是畅销书。她身材窈窕常穿着唐装或旗袍出现，梳着圆髻。小姑娘有一张孩子气的粉扑子脸，微微斜飞的丹凤眼，丰厚的唇，悬胆鼻，这使她极象西人心目中的东方佳丽，充满了甜蜜的异国情调。

小姑娘的新书叫《火红的农场》，讲述她的知青生活，里面涉及到政治和性这两个畅销的元素，也许不久以后她会上TIME杂志。写作对于小姑娘来说是件时髦的事情，但如果明天香奈尔找她做代言人，她会马上放弃写作，但是目前香奈尔只选用30岁以下的白种美女，姑姑虽然是美女，但是她毕竟老了，这一点很遗憾。

我常充满好奇的问她一些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情形，是否真如她的小说所述离奇曲折，她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回应：“有什么好说的，反正这辈子我是不会再下乡的了。”当然最后她还是应我的一再要求讲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她的叙述下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我得承认小姑娘似乎更适合写作，比起做香奈尔的代言人来说。

小姑娘目前已经不在中国，但是每逢假日她都会回来看我的母亲，她们的道路迥然不同，她们这对姐妹，从外表到个性其实毫无相似之处。我的母亲是个沉默内敛的人，小姑娘说，这和你外公一样。

外公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奇怪的人。

那时据母亲说在W大里，是一色的红瓦青砖平房，道路两旁夹着樱花树，樱花是最奇怪的花——开到盛极的时候就死掉了，樱花的颜色有粉、白两种，非常脆弱的颜色，象人无常之生命，弥散着消极的气息。后来那里拆掉平

房建高楼，居然时常有人跳楼，摔死在落英缤纷的道上，别有一番凄恻的视觉效果。每次行过的人都要看看头上的高楼，揣测不知何时又有人要跳下来。而外公每次走在这条路上都目不斜视一脸漠然。

外公曾经脾气很大，W大里很少有人不被他骂过。有一次学报发表的批评他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文章，他看了以后觉得不通，于是跑到学报编辑部痛陈其害，敲着桌子，用成语呵斥对方，真正是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平仄相和，节奏分明；学报主编惟有面露尴尬洗耳恭听。母亲说起这些事好象是在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后来看到的外公性格是相当内敛的，面无表情，见了人都谦恭的笑；他寡言，常闲坐看窗外，窗外有一棵乌柏树，据说是死了很久，却没人挖掉。他眼神空洞的看着，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屋里必放京剧，那锣鼓声与唱腔在我听来凄厉，有压迫感。

（二）

1968年，文化大革命急剧展开，此后这种运动以各种不同的层次继续发展在1956——1966年间就有120万的青年被送到乡下。当时的报纸写了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从根本上，培养怎样的青年一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承有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的防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山下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场运动缩小着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就这样，我的母亲和小姑姑加上其他一共十五名男女青年就下到了湖北潜江，当时家里人无法送她们，据说是有了错误自顾不暇，在汽车上母亲流泪，而小姑姑不知何时已经入睡，窗外的乡村已经酣睡，现出沉寂。

这一块地方属于江汉平原，是血吸虫肆虐的地方。最初他们被安排在生产队的粮食仓库里，由于年久失修，屋顶经常漏雨，她们只好找来塑料布接雨接雪，在晒棉花的竹架子搭成的床上，盖上晒粮食的竹帘子，上面铺满稻草，经常会有草蛇因为冷钻在里头，地下长满菌类植物。空气里弥散着米的霉味和雨雪沉积的寒湿气息。后来总算盖了一间可以住人的房子，八男五女。

村里的农民对知识青年怀有莫大的好奇心，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多讲话新派穿着时髦的城市青年，常跑来围观，

把观察他们日常起居当作每天必有的娱乐，母亲说即使你在那里烧饭、说话，他们也津津有味的围观：面带笑容，脖子抻的老长，象鸭的颈项，那种乐此不疲的眼光让她现在还记忆犹新，而且那目光是直视，五个只有15—18岁的女孩子觉得那种赤裸裸的眼光就是一种污辱——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在城市里人总是显得格外脆弱敏感，到了乡村所有枝支蔓蔓的小情绪就被修剪的光秃秃了。

按照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他们这群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城市青年要和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改造，因为在这些城市青年的心里对农民是充满鄙视的，而这种鄙视正是思想错误以及未来社会动乱的根源。

他们每天的生活这样开始的：绿色的江汉平原一望无际，一轮红日升起，然后是生产队长拼命敲钟催促上工的声音，这声音一点也不象田园牧歌里的天籁，相反它使得知青们精神衰弱、神经错乱，因为当时的她们又累又饿还要劳动，并且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他们是一群厌恶体力劳动的年轻人，才大志疏而又经常想入非非，看的是资和修的东西：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根斯、普希金……当然还有普及的马克思、恩格斯、鲁迅。这些书使他们的精神走向了与年龄不相吻合的深邃，因为深邃所以对于生命的痛苦体验更深。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与去路，不知道个人的命运和政治的决策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他们起初对于生活抱有的幻想是缘于书本的，从书里获得革命斗争这样的字眼，获得乌托邦的理想。中国革命的模式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书本告诉他们，火热的生活频繁的斗争激昂飞扬的人生在乡村，城市是浮华没落的充满了浪漫主义毒素的气息。

但是农村的生活马上使他们丧失原有的热情，幻想在日复一日的务农生活中很快就消耗殆尽，剩下的是茫然，因为饥饿。茫然的结果是产生两种人，思想家和精神空虚者。事实上，在这批年轻人中，也许有人是具有思想家的潜质，但是没有一个是足够衍生思想的空间就断送了他们的智慧。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年轻人里头，只有小姑姑是无忧无虑的，她当时才十六岁，声音甜美喜欢唱歌，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个学者而是到文工团做一名独唱演员，她长的漂亮，表现欲强烈，不甘于过朴素平庸的生活。她的想象力超越于这个时代之外，带着过分张扬自我的痕迹。

她的歌声使得乏味的知青生活具有一点人性的色彩，当地的农民很喜欢她，教她唱各种小调，有些是含有戏耍成分的“艳段”，由她唱来含有一种澄澈恬美的味道，他们夸奖：“妖妖唱的真好。”我的小姑姑叫李若窈，但母

亲常叫她的小名，按潜江的乡音，做“妖”。

可惜小姑姑的这项特长一直是我的外公深恶痛绝的，外公认为她的身上缺乏一种深刻平稳的东西，他常说小姑姑看起来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我倒觉得小姑姑身上少去了知识分子的矫情闪现着某种世俗的机智。

小姑姑喜欢穿特别的衣服，比如肥大的军装，她总会偷偷系上一条皮带现出腰身，这在一个性别模糊的时代是极凸凹有致的风景；她的辫子垂在肩膀上，用黑色的玻璃丝扎的有点蓬松，而非革命的杀气腾腾的九节鞭；那时她脸上还有几粒雀斑，显得很俏皮，背着着阳光看象提香笔下的圣女；别人目不斜视，她会侧过头斜睨凝啼嘴里一定在偷偷吃什么东西，画梅、奶糖或者其他；小姑姑的身上一定有一些香的味道，香气是一种性温微苦的杏仁或者白芷的味道。当时自然是没有香奈儿与CD的，这种香的味道就把她与芸芸众生区别开来。

但可爱的小姑姑不爱学习，她总是显得慵懒、无所事事、漫不经心，她连红楼梦这种伟大名著都不看，更不用说高尔基、鲁迅那些充满了飞扬人生哲理的作品，她的理由是红楼梦里头好多字看不懂，人物关系太复杂；但知道贾宝玉和林妹妹谈恋爱最终也没能成功，贾宝玉太过多情不象男人，她为断肠焚稿的林妹妹掉过眼泪，但她更爱娇憨的湘云和泼辣的探春，因为后两者是生气勃勃一往无前的，在乱世中不会因为脆弱的神经而夭亡。

革命的高尔基不会引起她的共鸣，他总是企图用故事来叙述革命真理，叙述在反革命无情的镇压与杀戮背后殉道者的热情是无法扑灭的。这样的叙述当然不是引人入胜的，缺乏故事性缺乏情感的张力。英雄的形象多少是变异的，常人大概只有仰望的可能，但是去践履那种生活总是不太恰当。因为英雄总是少数，凡是大多数。

在小姑姑看来革命战争都是男人的事情，她绝对不认为女人应该革命，这和当时许多有着男性倾向雄赳赳气昂昂参加斗争的女革命小将们格格不入。

至于鲁迅，这是我母亲听过的最有意思的评价，原因是小姑姑说一读鲁迅的书她就头痛，有些文白参半，而她最恨文言文。

“你看，爸爸就象鲁迅，他经常骂别人，把人都得罪光了，然后自己孤伶伶的一个人，爸爸花了很大力气写了那些书，小孩子看不懂，大人也不耐烦看，当然，也不见得完全没有用，总会有人看。李伯伯就喜欢看——可是李伯伯也死了。”

(三)

李伯伯是外公的同事，广东人，研究神话与宗教，浓眉凹目，喜饮铁观音；李师母比他小两岁，叫林海若，是个不折不扣的苏杭美女，做得一手好菜，但她专业却是英美文学。外公很喜吃李师母烧的“豆瓣鱼头”，他们常在一起喝绍兴酒，聊得甚晚。

文化革命一开始，李伯伯就受到冲击，尽管他的很多东西想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但是改来改去面目全非，因为马克思断言“宗教是民众鸦片”；而且他的太太又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的，自由化倾向严重。红卫兵小将还发现她另有恶习：爱打扮，爱穿旗袍，还是丝绸料子——这完全是骄奢淫逸的作风，他们开始游斗她，让可怜的李师母穿上旗袍示众，那是件黑底子上浮着碗大白玉兰花的旗袍，花朵犹如污秽的手帕，宽大的衣服套在李师母瘦削的身材上象卜闻。当时是夏天，太阳很晒，李师母晕倒了好几次；而小将们知道李伯伯写得一手瘦金体尤其爱惜手指，于是用力去踩踏他的手指，直至变成紫色。

最后，她和李伯伯将家里唯一一张大床竖起，左右对称的吊死在床梁上，他们的三个儿子瓜分了他们的所有藏书带着它们和我的母亲小姑姑一起下乡——这些书就成了他们漫长知青生涯里的精神食粮，在饥饿的年代里发挥作用。

小姑姑对外公的评价有其荒谬之处，但是如果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来看，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感受：孤独感、寂寞感、绝望与反抗、眷恋与复仇、自我牺牲与悲剧……小姑姑这些朴实语言后面隐含的曲折细微的心理经验的描述，是准确的直觉的。

那个年代：翻译过巴尔扎克的傅雷终于上吊了，老舍徘徊良久也投进未名湖，钱钟书与杨绛则关到牛棚里在精神上接受“洗澡”之苦……

不谙文字的小姑姑却看到了文字的弊害，就象龆足盲目的陈寅恪悲凉的吟咏：“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文字，是要命的东西。

在农村，小姑姑始终还是没有喜欢上劳动，正如她不喜欢艰深的文字一样，她不象母亲，立志做一个有坚定的目标有顽强毅力和实践能力的人，当党和毛主席要求她下乡改造时，她就要决心将自己改造成最完全最彻底的一

个。小姑姑的生活中幻想占的比重大，城市的繁荣已经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她眷恋与她相同的东西，而乡村生活的枯燥、贫困、沉闷激不起她任何的激情。

她有时对着窗外的一成不变的风景发呆，有时就在田埂上唱一段小调，小调讲的是一个女子思念她的心上人，一连等了十二个晚上他都没有来，最后的咏叹反复了七遍：“你为甚还是不来？”是的，为甚不来？不来的也许是爱情，也许是机会，在漫长的等待中，没有革命情怀的小姑姑倍受煎熬，因为年纪还小，她的痛苦就是混沌的，象这歌里萌芽状态的爱情，带有无限伤感和期待，象是潮湿的夜里一点点火星，纵使小，好过一片死黑。这幻想让她偷偷的高兴，觉得生活总归不会落入绝望虚空。

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唱歌的天分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当时读书是不怎么管用了，上大学要队里推荐，推荐的条件是出身好不好，和农民关系好不好，劳动认不认真；其次当然还有特长：打球、下棋、唱歌、跳舞。也在招取考虑范围之列。

有一天城里的兵工厂的后勤部队下乡来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擅长吹拉弹唱的青年都可以去面试，而小姑姑也被叫去试试。对于这个试试，小姑姑是报着希望的，她甚至在夜里和母亲兴奋地描述自己日后美好的生活图景。

但是自那次试试以后就没有下文。小姑姑跑去找队长。

“为什么就没有人通知我再去？”

“人家招满了，招满了就不招了么。村子里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回城？”

小姑姑说：“可是他们的领导说我歌唱的不错。”

队长叹叹气说：“妖妖，说句老实话，你也不要别的指望，他们今天已经走了。”

当时知道招不上了，小姑姑顿时放声大哭了，这种悲痛是有根源的，她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孤儿，她哭的声音把周围的农民都给招来了，大家围着劝她别伤心，但她仍然不依不饶的哭泣。

母亲想了想掏出自己身上的钱和粮票说：“你别哭了，他们肯定是要回武汉去的，就顺着路追，兴许会追上。”当时小姑娘由于绝望加上一直以来的虚弱，路都走不动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她，她就真的顺着道问他们的踪迹，一路跟过去。

当她终于赶上，并且见到这个后勤部队的领导说明来意时，领导很漠然的说已经招满了，况且你的政治条件不符合，当然你的歌是唱的不错，但是我们的是要看你的政治条件的。宣传队落脚的这个热闹的小镇上，这些招募来的宣传队员们将给路经此地的同一系统的部队首长作汇报演出。领导相当的忙，没有时间再解释就走开了。

没有人理睬孤伶伶的小姑娘，她看了一下周围开始忙碌的人们，径直走到水龙头旁边将脸洗干净，她现在看起来真的有些脏，然后又仔细绑好自己蓬乱的小辫子，并且偷偷将人家搁在桌上的粉和胭脂在脸上抹匀，认真的用半截子炭笔勾好眉毛。最后她换上一直带着的鹅黄色上衣，这样的打扮使她透出些生气。

她安静的坐在后台，等待演出开始。她喜欢有灯光有色彩闹哄哄的地方，这种生活显得多有生气啊。小姑娘想，我应该是站在这里的啊。

当天晚上的表演的节目都相当平庸，不少人缺乏应有的舞台经验，加上紧张使演出缺乏娱乐性，歌舞的冗长乏味使得其中一位首长居然睡着了，首长睡着了是件很严重的事情，这说明招的人都不够水准。当宣传队的领导得知这位首长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美国黑人想念毛主席》时，他跑到后台去嚷嚷：“有谁会唱美国黑人想念毛主席？”在角落里有个声音说：“我会。”

(四)

小姑娘就是这样站到台上唱歌的，她的身子还在发育，但是营养不良，显得过分高瘦，纤细的脖子上有一张孩子气的脸，脸上长着一对无遮拦的眼睛，这样一对眼睛长在这种脸型上，机敏的甚至带有审判意味。

她的声音有些喑哑，但是充满情感，这首歌的旋律流传到今天依旧动听：

绿色的棕榈树靠阳光

密西西比河奔向东方

我们美国的黑人啊

时时刻刻盼望。。。红太阳

毛主席呀红太阳

你的光辉照四方

只要想起你的话

浑身是胆有力量

这当然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但是当我记下歌词时，总觉得在逻辑上好像是不太说得通的：黑人兄弟们当然是苦大仇深，但是他们当时也不会将仰望的目光投向东方的毛主席，社会主义的明灯好象也还没有普照到美国去，他们的力量源于一个远在十万八千里的领袖，真要佩服词作者的想象力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

发烧几天的小姑娘首先对毛主席心存敬畏，其次她深刻的体会到自己必须留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心情绝不亚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黑人兄弟，在唱的过程中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16岁的小姑娘是个很容易哭的女孩子，还不懂得用崇高的理想来抑制自己卑俗的个人情绪。

那位终于醒过来的首长问：“这小姑娘是你们哪里招来的，唱的不错么？”

“本来想招，但是政审不过关，没招上。”

“问题也不是很大，办上来吧——你们这次招的人里头总得有几个识谱会唱的吧，以后演出，总不能老是象今天这样。”

小姑娘要感谢首长，他的怜悯使她就此彻底摆脱了农村生活，她一路跟着跑过来的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她将把户口转到城市，享有每月30元的工资，这在城市里已经足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可以在公家的食堂里吃得红光满

面。

她后来和母亲说，她既不喜欢读书又不能安心务农，她喜欢城市，只有在城市才能找到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东西，她所唯一恃有的就是唱歌这项专长，她就靠着这项专长重心跻身于人口密集繁华喧闹的城市。

小姑姑说：“想到一辈子呆在农村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她的血液里并没有和劳动人民水乳交融的因子。她深刻的描述过有一次和母亲跑到小县城里两人买了黄米做的小蛋糕的情景，两人就站在路边一个污秽的油桶旁大嚼起来，身旁的大卡车经过卷起阵阵呛人的烟尘。对于一个少女来说，这种吃相是不雅的，甚至是令人羞愧的——但是，小姑姑重复道，我的16岁一直是在饥饿里度过的，这使我变的彻底绝望而不是忧伤，当我重复这个词的时候，饥饿饥饿饥饿，这就形成了全部的记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选择什么样生活？

据说那些在插队地区呆了4年以上不少男青年因为没有别的途径可以抵御饥饿发泄苦闷，就开始写小说，其中几个居然真的成了名，当然按照机率来说属于万里挑一，而且他们呆的地方相对来说应该划入穷山恶水的偏远地区：海南、云南、内蒙古、北大荒……还好他们在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到农村接受改造，中国才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否则呆在城市又有那么一点文化的年轻人最容易想入非非指手划脚。到了农村的感觉是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行，不过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東西，让他们重新调整自己好高骛远的心态做回普通劳动者，减少青春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弊端。他们的文本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甚至把生活的失败看的极其悲壮，这成了他们日后经常谈论的一个词，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个词而已。

而母亲是一个讲求原则的人，改造就改造，劳动从不偷懒总要比别人干得多，然后她每天的任务是躲在屋子里看一本发黄的英汉小辞典，并且她是认真的看，看一页撕一页，到后面已经烂熟于心，另有英译的毛主席语录作为她的读本，有一次开会她却在下面读这本小册子，生产队长很生气勒令没收，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说：“我在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武装改造自己有错么？”队长很是气馁，因为他尽管反感英文，但是他是绝对不可以反对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反革命。

母亲的知青生涯就是以劳动——学习贯穿的，她一直是个沉默坚定的人倒也不以为苦，在城里工作的小姑姑开始挣钱往乡下寄吃的东西给母亲，当时有一种月饼，里面是桂花馅杂以猪油、冰糖，但是做出来很硬，空口吃容易蹦掉牙齿，须蒸了再吃，母亲收到后写信给小姑姑说蒸了以后的味道相当香甜，但是吃了以后大家都哭了，说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这样美味的食物，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城，小姑姑寄来的衣服都不错，但不少分给相熟的农民。

最后在信的末尾母亲写了一段普希金的话：

我们是年轻的拓荒者，

在这荒原

播下希望

播下热情

播下理想

母亲说，无论怎样，人在寂寞的荒原中总要有坚守的理想，尽管坚守不一定有价值。写这些话的时候，潜江地区不少下乡的知青死于血吸虫病，她们同去的五个知青，两个嫁给了当地农民，一个已经疯了，剩下两个还在做着拓荒者的愿望在寂寞中坚守。但是倘使这些话不写下来，也许人就很容易堕落或者疯掉。

两年的知识青年生活显得漫长，这使本来内向的母亲近乎于缄默，当她收工回来经过村里唯一的一条河时，常常也是目不斜视。据说里头有想不开跳下去的知青尸首，没人敢捞，河其实不深，但不知为什么人还是淹死了。

（五）

这种生活终于结束，母亲被推荐回武汉市的一家小学做教师时候，她回到住所房梁正中悬着一具尸首，这是最终没有回城的另一个知青用绝决的姿态作出的反抗，其时月光如水，地上拖曳出长长的影子，似乎是反讽的一笑，苍凉之至。母亲感到深入骨髓的寒意，这种反抗姿态让人几近疯狂。在回城的头一个晚上，她是伴着这具尸首度过，死亡从来没有如此靠近过她，但是死亡绝对不是作家笔下那么充满诗意，死亡是生的恐怖——这种恐惧使她下意识地决定要终身远离这块悲恸之地。

当她见到小姑姑时，我的母亲，坚强沉默的母亲大哭了一场。

在这个世界上，好在还有一个小姑姑，她对于理想主义的热情是有限的，她只知道行动遵循现实原则，母亲回城的头一晚，首要任务是饱餐一顿。

那天晚上和她跑到武汉的“四季美”餐馆饱餐了一顿汤包，又跑到“老通城”大嚼了“豆皮”，即用鸡蛋与面粉摊成金黄的皮，下面是糯米、瘦肉、酸菜、榨菜的一道菜。最后又在街边吃了一碗“蔡林记”热干面。城市里走动的女孩们的衣裳又换了新的款式，那种时新是潜性的，但总是撑不住，露出矜夸张扬的痕迹。小姑姑给母亲换上一身时新的衣服，这种生疏的美感重新被唤起。

温饱的感觉终于使母亲意识到城市的好处，但多少是茫然的，在城市面前她觉得自己面目模糊。但是乡村生活的贫乏已经将她的美感摧毁的一塌糊涂，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好：“距离产生美。”

当她在城市时，乡村就是那个距离之外的“别处”，因此它现出神秘诱惑；一旦身在乡村，遥远的城市就迸发出种种的理想光辉。

我母亲就这样顺理成章的留在城市，她的道路是历历可数乏善可陈的。在我成年的岁月里，她很少讲述那里的生活。她永远记得尼采的话：有的人是以他们的痛苦为哲学，有的人是以他们的财富为哲学。母亲说，我是前者。

痛苦是不可言述的。

所以，她无法言述。

反而是我的小姑姑，开始了和她个性格格不入的写作。写作反而成了她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母亲最终还是和外公一样在大学教书，我常想她到底会怎样去阐述她所走过的路程，也许那些冗长的铺排、琐细的记忆会引起台下的阵阵讪笑，她的表情难以言喻，所有的声音一点一点敲进人的骨子里，带着冷意。

我唯有想象这些细节，而想象往往毫无力量。

多年以后。

我的母亲和小姑姑回到潜江她们插队的地方，再也看不见碧绿的田野，乡村的图景没有昔日那么清晰透明，一

轮红日照常升起，没有敲钟的声音，安静的沉默的乡村也许本该如此。

母亲说：“真不知道永远呆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的他们，也曾满怀希望的在稻田里吟咏诗句：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

假使你是从乐园来的，

可以对我们说么

华羽的乐园鸟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将这首诗和普希金的那首短诗对照来看，“天上的花园”是指什么，“荒原”又是什么？生产队长曾经就此质疑过他们，难道革命的农村就变成了“荒原”不成？那么“天上的花园”是否就代表腐朽没落情调的小资产阶级生

活。

这种解读，你不可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按照诗的语言的模糊性、多重性生产队长的解读当然符合他的世界观，但是在当时的少年们看来，那也许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理想世界，一种和敏感心灵相呼应的境界，它是美的，但已然消失。

在人追求的东西，除了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和感官的愉快，只有两种东西：美（beauty）和力（power），美代表的是无穷的梦幻和细腻的情感，力代表着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而美的东西，通常是脆弱的，容易在力的覆盖下黯然失色。

这些道理，母亲说，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明白。她问小姑姑，我记得你是一直不喜欢看书的，那后来为什么会写起小说。

小姑姑说，因为我无事可作，况且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要看很多书，写写自己，也不错。从经历来看，我的可读性比你要强。

母亲说，那倒是真的。象她那么中规中矩的人，下乡务农——推荐回城——上大学——教书写书——评职称，三言两语就道尽有什么可看，惟有小姑姑这种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人生才象传奇：小姑姑靠唱歌回了城，后来嫁了一个研究天体物理学的男生去美国，两年后离异，在美国又认识了一个研究汉学的老先生，这位瑞典老先生丧偶后一直独身，是个极其可爱的人，乐趣是喝酒钓鱼，小姑姑和他结婚后，英文水平大进，据说她的小说不少文法错误都是老先生给改的，大约他喜欢李渔袁枚的生活方式，找个略略识字的佳人西窗共读，极富情趣。五年后小姑姑又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是她的经纪人，将文字变成一门好的营生。小姑姑还在源源不断的写，写她的私人生活，她的潜性轶事，她的成长和忧伤……就象在伍尔弗所构建的一个人的房间里，描述她经行的风景。在她的世界里，也许没有过多的先验经验，所以自身反而成了源源不断的书写素材。

小姑姑说，也许我从来不曾象你那样怀有过多的理想，所以我也就没有丧失的痛楚，我所做的一切靠的是直觉，我一直是混沌的，但好象又是清楚的，是的，就是这样——但是我原来以为我们家里，好象最有资格做作家的是你，姐姐。

母亲说，可惜我已经无话可说，对于生活本身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表达欲望。

这是我母亲说的最多愁善感的一句话，它袒露出消极而真实的气息。

但是我也曾记得小姑姑描述母亲的敏感与睿智。她最记得小时候，外公看李后主的词，那时在下雨，他念到：“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母亲曾感叹，真是一字一泣，性情中人。

小姑姑说，她这个人喜欢伤感的東西。李后主是亡国之君，江山和美人都没了，哪里活得到现在？

那么，哪一个时代容得下这样的伤感。伤感大抵是没有用的。没有现世的价值。伤感的人大概都死在那个荒凉的时代。

说道这里。小姑姑朝我点点头，我讲的这些你能懂么？

我笑笑，不懂有什么关系，你说的一切，都过去了。它们真象一个故事。

小姑姑说，你妈妈听见了会不高兴，她是缅怀过去的。

那是因为过去了的东西无法重现，所以缅怀。

那么，小姑姑说，你要答应我，不要当着她的面说这些话，好么。

那个时候，我手里的咖啡终于喝完了。

我的追问缘于好奇，但是我努力写下它们，因为它们常常令我想起大三时候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

在生活中不能生气勃勃的对付生活的那种人，就应该用手挡开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但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里看到的一切。

这句话缘自我最喜欢的卡夫卡的日记。

他也曾说过：一切能摧毁我。

也许，能够纪录下的恰恰是我们被生活逐步摧毁的过程。在过程中我们已经面目全非。

发表日期：2005/4/13 15:52:3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这是我们10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的。23年前，我们10个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

从60年代延至70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边疆，人数达1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迁徙。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尽管不少人坚信中国将走进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但谁也说不出来

会是什么样。我当时是二十五中高三学生，亦是当时首都中学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会报”——《兵团战报》。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两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起来，当时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找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月，我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在筹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

部门青年运动的论述，很快问题出来了：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

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

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党为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那时候为了发展农业（或许还有精简城市人口的需要），新闻机构曾大力宣传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青年学生中的先进人物，邢燕子、侯隽、董家耕、

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

模，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在此其间，曾去狼牙山进行过社会调查的女八中学生郭兆英，多次和我谈起广大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谈起农民养活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大大影响了我的思想。后来她和我一同走向草原，成了我同甘共苦、相

濡以沫的妻子。这样，自然而然地，在我面对“与工农相结合”方式的选择时，上山下乡就成了合乎情理的首选目标了。这个决心的明朗化是在炎热的8月。

报名参加筹办红卫兵大学的几百人，原以为我们提出的教育革命是类似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之类的事情，顶多不过一两年。当在我自己举起的“旗子”上写下“上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10个人。

这10个人是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金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大家坚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条路也要走下去。筹备的第一件事是选地点，理想主义加青春的浪漫，当然惟恐走得不远。哪儿离北京最远？在地图上沿着中国的边界

线找。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名被我们选中了，计划9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就出发。

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太赞成我们去新疆，说是中苏边境上纠纷多，不稳定，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我们同意了，并答应等待市里出面去与内蒙古联系。

10月初，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

我们10人中没有一人的家长同意子女去锡盟草原插队落户，但多数人又不敢公开反对，那样政治压力太大。只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坚决反对，将这个同学关在屋子里，自己坐在门口守着。我到他家去说服，讲多少都没用。这位同学的妹妹很支持哥哥，送饭时夹进一张纸条，鼓励他要坚强，要“冲破阻力”。在妹妹的帮助下，他终于冲破坐在门口的那个“阻力”，躲在家人找不到的地方。最后这位同学没从家里带任何东西，两手空空与我们一起踏上征程。

10月8日那天，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钰、李冬民（我的同班同学、北京市红代会负责人之一）、北京市劳动局的领导与我们话别，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把牧区建设好，还要求我们为在校未分配的中学生带个

好头，打响第一炮。我第一次隐约感到，他们可能把我们去内蒙草原同中学生的毕业分配连到一块去了。

10月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我为自己改名为“曲折”的时候，我确实是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路，曲折的道路，就是从10月9日这一天开始的；曲折的道路，始于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

那一天的清晨，我们10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和亲朋，北京市劳动局组织了欢送队伍，气氛很热闹。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由我领读誓词：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一无限忠于您的红卫兵向您宣誓：

您伟大的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最最光辉的灯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忠实于您，无限忠实于您的思想，忠实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前面有曲

折，也有反复，但是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耀着我们，我们永远高举您的思想的伟大红旗，前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在这样充满时代色彩的誓言的激励下，我们带着光荣的、也是沉甸甸的使命感，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我们去内蒙古插队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也纷纷报道。（后来有些记者跟到了蒙古包，跟到了羊群边，争相采访）我们的行动，在当时对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0月14日的傍晚，我们终于到家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这长达20个字的地名常常使我感到自豪，它的蒙古族情调总提醒着我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我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炸饅子。为我们烧奶茶，煮手

扒肉。蒙古包里挤满了人，欢迎会别开生面：牧民不懂汉语，我们不懂蒙语，我们用刚刚在盟里学的几句蒙语表示了决心。

夜幕降临，我走出蒙古包来到草地上，牧草虽黄却仍散发着芳香，繁星眨着眼好像离我那么近。蒙古族姑娘嘎日布站在身边，我兴致正浓，邀她为我们唱支歌，她欣然答应，唱起了《望北方》，歌声悠扬、嘹亮，在幽静的夜空中回荡，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完全陶醉了。那一

刻，我爱上了白音宝力格我的新家，爱上了新家的牧人们。

当我们10个人走出了自己人生中这转折性的一步时，我们对以后的事并没有多想。我们没有想到此举如同一颗火苗，燃起了熊熊大火，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国大地。

我们在草原落户后的第二个月，即1967年的11月，第二批北京中学生300多人也到了锡盟牧区，分别在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的几个公社、牧场当上了“新牧民”。

1968年的夏天，我被叫回北京，协助市劳动局安置北京中学生。那时“文革”已整整两年了，史无前例的内乱使中学生失去了升学就业的机会，该离开的出不去，该进校的进不来，社会问题十分严重。北京市政府非常焦急，开始动员六六届、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

下乡或到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幕场景使我总不能忘——北京市革委会召集有安置北京学生任务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其间，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站起身来，双手抱拳，作揖请求：“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已表了态，他们再多接

收400名。看看哪个省还能再多安排些？求求在座各位了……”这场景、这番话，不知会让当时正豪情满怀的红卫兵小将们做何感想，我却一下子感到了一阵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而被拍卖的深深的悲哀。

1968年夏末秋初，4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锡盟牧区。在此前后，北京中生成批奔赴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于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后在全国形成了高潮。

当我们非常真诚地踏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时，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为上千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了思路，更没想到在我们的身后，是10年间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而后又离开农村回城，造成举世罕见的人口大迁移，冲撞得中国社会数年间动荡不安。

时间已到了90年代，人们仍忘不了“上山下乡”这场运动。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去描述它。1700万知青“过来人”或许会有1700万种评价和描述。我能说些什么？我在此只想把那个真实的“开始”告诉世人，留给后人。

（作者：原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

----姜昆、石肖岩、李晓华等编：中国知青回忆录一九六九--一九七九p366-p371

发表日期：2005/4/13 15:09:3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晚上十点校部放电影，有两部片子！

这个消息让可可、小玉和阿聪惦记了一天。她们早早地把晚饭打回家，可可还没吃完，小玉和阿聪就先后来了。她们的妹妹和另外几个小孩子，更是连饭都没好好吃，早已在院子里连声嚷嚷着催她们走了。

这里是文化艺术系统所在干校，可可、小玉、阿聪三人从小一起长大，如今分别从插队的地方回来探亲。其他的几个孩子都是她们的弟弟妹妹或是和她们的弟妹一样随父母来干校的小孩，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

她们住的地方离校部有八、九里，沿大堤一直走就能到。那几个孩子喜形于色、大说大笑地边走边闹，是啊，已经有四、五年之久没有任何电影可看，这些小孩子们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此刻她们三人的心情也不亚于这些孩子，但她们自认为已是曾经沧海，于是尽量沉稳地说着话。可心中的激动却像掩不住的光，从她们的脸上透射出来。

记得从前她们宿舍旁边的一个小学校每到周末经常在操场上放电影，也是连放两部。每次放电影都好像一个小小的节日，操场上从始至终流动着活泼欢快的气氛。

记得有一次先放《杜十娘》，再放《五彩路》，可可和阿聪她们一帮小孩一心等着看《五彩路》。她们听说杜十娘把百宝箱扔到河里、她再跳进河里，这电影就完了。可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后，唱一段，走到船头，不跳；又走回去再唱，然后又走到船头，又不跳，还唱……

把她们急得直跳脚，一边不断地小声说着：“唉呀，唉呀！别唱了，别唱了！快跳吧，快跳吧！”

正在她们这么叽叽喳喳的时候，忽听一个老太太带着哭腔说：“死孩子们，说什么呢！去，躲一边去！”

抬头一看，一个老太太不断地抹着眼泪，正看得伤心。吓得她们伸伸舌头，赶紧跑开了。

如今想起这些，真正是前朝旧事了。

到了放电影的空场一看，白色的幕布已经拉开，空场上已有了些人，还有些地方摆着土块、石头等，看来是先到的人放的，她们也赶快四处找些东西垫着坐下。

这次放电影是为了批判，根据上面的指示，只能让原来的机关干部、也就是现在的这些干校学员看，周围的百

姓不能看。可没有什么礼堂，只有这么一个空场，于是就决定晚上十点以后再放映。

十点都过了很久，大喇叭里才有了声音，有人讲了一段话，听不太清，大意就是说应该怎样带着批判的眼光看这两部电影。然后电影开始，是两部外国片子。

全场人默默地看着，没有掌声，没有笑声，也没有这种场合应有的那种情感交流和共鸣，只有影片里的说话声和放映机轻微的转动声。不知什么时候，空场周围的高坡上已悄然站满了老乡，他们有很多还是专程从二、三十里地外赶来的。

同来的几个小孩子没看多久，就靠在可可她们身上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可可一开始还看得很专注，后来，觉得眼皮有些沉，电影里说话的声音有些模糊，她不断使劲睁大眼睛、睁大眼睛，可是突然间，一下子就沉入到睡眠之中去了。

周围走动的人惊醒了她，开始她还以为只放演完一部，问小玉和阿聪是不是中间休息，她们俩也说不清，再问别人，原来两部片子都已放映完。

空场上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她们也走上大堤，天色发白，已近黎明。那几个小孩子睡了一觉，现在又有了精神，又开始闹闹嚷嚷地说着话。可可她们三个都为自己看着电影竟睡着了而后悔不迭，但毕竟又看到了电影，而且是和儿时的伙伴一起在露天的广场，这似乎就足够了。她们的头脑中已经充满了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印象与感受，很快，她们就开始互相争着诉说，同时，还说着些自以为深沉的感悟和人生大道理。

大堤上络绎有人走过，都是各连看完电影回去的。这次电影并没要求干校学员一定要看，所以年纪大些和身体不好的人都没来，来的几乎全是青壮年。他们默默地走过，一声不响，越发显出可可她们这一群人的喧哗。

有人说：少年什么都信，这就有了幻想。中年有信有不信，这就有了理想。老年只有一点点信，此外是大片的怀疑，这才有思想。那么，可可、小玉、阿聪她们三个，此时是处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呢？

发表日期：2005/4/9 20:04:49

<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2> 呼伦河文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候连对岸的人说话也能听见。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龙江省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众位正在洋插队的朋友们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许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

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赢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桨，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分。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中国汽车顺利地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

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一辆苏军最新颖的T-72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但从5月12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概，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警告。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匐前进，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跄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牺牲了。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见打死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也许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来，轻重机枪也停止了扫射。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

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士任宝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匐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匐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杂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

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不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

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过来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

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

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收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被抓，苏军也没有开枪。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

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

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淨。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份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她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

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

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桨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

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四叛逃者和特务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

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书人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栓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栓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

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

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

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

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

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镳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

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收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

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

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

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

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无穷。“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

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分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你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

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

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

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六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

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

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辙，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

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

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已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纓缚叛蛎，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偬”。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已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速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

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睁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惶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

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

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

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帶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

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作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

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

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夥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

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飞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这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天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汀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

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淹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北京现在内外都紧。

原先是所谓外紧内松的，意思就是外国人紧，中国人松。两周前，一个老师的姐姐从国外回来戴了口罩，大家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她去超市，甚至有人从她身边过的时候骂她一声：“事儿逼！”后来就内紧外松了。而到了现在可哪儿哪儿都紧了起来。到处是戴口罩的人。

大前天，五更时分，突然有电话把我惊起。学院的学生会一个女生用哭腔告诉我有一个我们系的学生突然昏迷不醒，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我当即吓醒，然而没什么可选择的，只有硬着头皮前往。临行，夫人就像送我出远门一样，把口罩给我戴上。

北医三院里情况显然更加紧张，所有的医生就像太空人一样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像个粽子。令人佩服的是他们的沉着镇定。

学生作了CT和相关检查，说是瘰症，输液后逐渐醒来，原是一场虚惊。事后，夫人说，对我的行为感到自豪。我说：如果我是警察，哪怕小偷手里有刀我也得追，因为那是职业的要求，没办法的。我只能乞求上帝保佑我。

然而次日，学院却传出一个继续教育学院的成人学生患病住院的消息。该班级立刻停课。后来才知道，他是到医院治疗盲肠炎的时候染上的，此后就再没到学院来上课，所以没有在学院传播开。而且，尽管一度报了病危，但目前已经开始好转，总算是好消息。可是，由于大家并不都了解情况，话就渐渐走了样，说什么的都有。书记问我要不要给老师买中药预防，我当然同意，尽管我并不相信那些草沫草根。

昨日，情况更加紧张。说是有两个到学院进修的学生发了烧，送进医院，一日后又住进了隔离室。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人强调说：“进了隔离室能有什么好事？”据说还要4天才能确诊。于是学院上下又是一派紧张。那些与两个学生有过接触的学生隔离了，很多学生当初为了在学院找个床位打破了头，可是现在却争着离去。两个学生焦急地问管宿舍的人：“我们没地方去怎么办呀？”对方回答：“怎么办？洒点消毒水接着睡呗！”其实，据我所知，现在医院的政策是只要有发烧的人就留下观察。只有这样才能堵住病源。那两个学生并不一定是什么那个“非”病。

学院有很多漂亮的表演系女生，她们本来就比别的学生更加关爱自己的身体。没想到这样的时刻她们也能找到新的时尚：都戴了各色各样的花口罩和玻璃眼镜，戴了很酷的帽子招摇过市，自然吸引了众多男生的目光。

课堂上，学生的人数一下子减少了很多，而老师也不再考勤。所有教室都开门上课了，成了真正的“开门办学”。即便这样，学生也还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口罩戴了起来。如果突然有一个人打了个喷嚏，那情景就会像是发生了人肉炸弹，课堂里必是轰然一声。这也还好，更加过份的是，有我学院一位平日患了过敏性鼻炎的老师（他总爱打喷嚏）到超市去，忍无可忍地打了个喷嚏，结果竟被周围的顾客骂得没敢继续买东西，灰溜溜地回家了！

学院有的办公室开着大门，门口却排上一排椅子，表示让风进不让人进的意思。

书记又来问我了：“咱们系是不是应该也给学生买一些预防性的中药呢？”我说：“学校没有这个开支啊？”可她说：“别的部门已经买了。”于是我连忙说：“咱买咱买！”这一下要指出不少经费。但你想，学生也是人家的儿子，如果是咱儿子，咱会咋样？

说到儿子，更加精彩。我儿子在西安交大，那一日我打电话过去，儿子说正在发烧，已经两日，恶心得不能吃饭，躺下也困难。他们学校医务室竟然只给些感冒药。我一听就急眼了，拨通了班主任家里的电话，很严肃地（现在想想，当时态度应该再好一点儿的）指出他们这样做是不负责的。第二天，得知儿子退烧才放下心来。可是儿子说，听说西安也有了，不过是媒体没说而已。西安目下医院里最可怕的是甲肝，说是患者极多，情况不详。

在学院的国际培训中心，一个漂亮的日本女生在向老师请假。那老师问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女孩颇费踌躇。我看出名堂，说她一定不不太有把握能回来了。她便感激地连连点头。

一个叫拉萨的埃及女生看来是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她坚决不回国，她的姐姐沙蜜只好到中国来看她，把妹妹嘱托给了我，伊妹儿说：“老师好！我是沙蜜，拉萨的姐姐，我好想您！您是很好的人，一次见一个人您就影响他。

我非常感谢您，您支持我的妹妹，老师您是一位作家会描写情绪，所以您可以理解我怎么爱拉萨，我很喜欢帮忙她的人，拉萨一般赞美您，从很长时间我希望给您发伊妹儿，但害怕了麻烦您，真不好意思，老师我想您是拉萨第二个父亲

我到北京的时候我希望见您但我在北京只呆几个小时没有空，我非常对不起，下次我就见您，我给您送一件礼物是埃及的传统艺术品，我希望您喜欢，老师我非常着急中国目前的卫生情况不好，每天我给拉萨打电话，真不好意思麻烦您请您注意拉萨，您在北京我非常放心，老师问您的老婆和您的儿子好，多谢，输家是（应该是“暑假时”）我希望你们都参观埃及，老师请您认真地考虑这问题，注意身体，拜拜。”像她妹妹这样的老外还有一些，一个马来西亚学生依然在要我指导他的剧本。我问他你难道不怕吗？他回答说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政府不让我们回去。

昨日北京天很阴，下课回家的路上，突然听到乌鸦叫，抬头看时，正是在学院最高楼的天线杆上站立着一个黑黑的身影。这本来没什么特别。北京春天会有很多的乌鸦迁徙。可是那一瞬间，我发现周围所有走路的人都惊讶地抬起头来，每个人都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默默地仰视着它……

今天情况好像更加不安，一个朋友来信说：“刘老师：最近非典猖獗，您接触人多，一定要注意。我们院已经出现非典，死了一个80岁的老干部，他家人有3个人得了此病。五一最好别凑热闹。祝好！”

其实，北京已经到处是这样的传闻，什么某某学校发生12例，中关村的那个公司如何关闭，谁谁家的院子里出现了疫情……真假难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人心开始慌乱了。

我对学生说：这是对人类的一次警告。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一次考验。这是对人类素质的一次检验。应该相信政府已经在用最大的努力防治疾病。在这个关键时刻，全国民众和全世界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抛开狭隘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个人利益。应该坚信我们人类能够战胜这次灾难。在灾难过后会更全面地思考地球的未来。向那些英勇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下乡的日子真苦，一转眼二十几年了。那时成天盼回城。

回城了，别人总喜欢和我开玩笑，“二十几岁的大姑娘还不找对象，是不是恋着哪个乡里的小伙子？”我笑着答：“我和张大伯最好！”

现在的小女孩，上街娇媚百态地挽着一个老头，谁也说不准他们是什么关系。可我们那个年代扎着两个小辫的朴实的小姑娘，扶着一个老头上街，不是她爹，就是帮着扶病人来着，什么“忘年之交”，好象这词还没写上词典。

张大伯是一个种西瓜的老头，他种出的西瓜又水又沙又甜。没事，我就喜欢到瓜地去转，听张大伯给我念“瓜谱”。

“瓜要在半沙半土的地里种出来才甜，那瓢是沙的。”

“瓜长大了，要快熟的时候，千万不能浇水，要不然瓜瓢光是水，不甜了。”

瓜地好像是张大伯的家，尤其瓜抽秧和瓜快熟的时候，他几乎白天黑夜都住在地边的瓜棚里。他爱人民公社胜过爱自己的家。他常和我聊天，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也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干革命就得没的命的干，再苦也是甜啊。”

我们下乡的生产队，蚊子多得吓人，而且个头又大。那时队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新塔拉，新塔拉，三个蚊子抬走一个瓜。”那瓜地里的蚊子更可怕，就是老皮老肉的张大伯，也用一块大白纱布成天包着头，只露两个眼睛。我每次去，先把避蚊油擦在手上、脸上，可回来，那眼睛常成了两个肿泡。

张大伯的脸沟沟壑壑的，扒开他眼角的皱纹，可以看见沟壑里的人的原始的肉色。张大伯的手皱皱巴巴的，那茧硬得拿刀可能一下都割不开。工休时，我常去张大伯的家，帮他挑水，给他补那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比他儿子媳

妇还好。当然，瓜熟的时候，张大伯肯定会挑一个最大最甜的瓜给我，让我过过西瓜瘾。

记得一天张大伯得了病，是重感冒，我心里很着急，不知为他做什么，当时只想赶快去买点儿补品，让他早日恢复健康。那时生产队里没小卖部，要到生产队河对面的生产建设兵团团部去买。我急急忙忙从箱子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20元钱，穿过一条大河，走了五六里路，到小卖部买回砂糖、挂面等补品。那次用去了我大约5元钱，而那时的5元钱，可能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0元钱。

张大伯的眼睛患白内障已经很久了，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在乡下时，我曾经有一个内心的承诺，等我回城了，挣到钱，第一个任务就是送张大伯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可等回城了，每月28元钱的工资一拿就是3年，最终还是一个内心的承诺。

终于回城了，再没机会去看张大伯。可在头两年，在瓜熟的时候，他总会托城里拉瓜的车给我带几个很大很大的西瓜；在花生熟的时候，他总会给我带一面袋刚摘下来的还带着泥土香的花生。

是的，想想当知青的日子，我和张大伯最好，那日子虽苦，可人心好纯好纯，我非常怀念那时人之间的朴实友情。

2001年3月14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刻骨铭心，终生难忘！——（1）

1969年2月1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今天是腊月27，再过三天就过大年了。真是光阴似箭，转眼我们来到农村已经第148天。今天，我们就要回家了，回到父母身边，和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们团聚，我们都激动得几天没有睡好觉了。心理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这几天，同学们都在张罗着回家要代的東西。当年，沈阳市内市场上的东西奇缺。本以度过了三年，人间罕见的自然灾害，却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市场可供应商品寥寥无几。商店里摆放的一丁点儿东西，都得凭票供应。那年头就有一点好，每户每月凉水随使用仅收俩毛钱。我们下乡的这个地方，虽然很艰苦，远离大城市，有些偏僻，可土特产却也不少。同学们要采购的东西太多了：有猪牛羊肉，鸡鸭鹅犬，花生，毛克，榛子，松蘑，榛蘑，鸡鸭鹅蛋，旱烟，烤烟，粉条，地瓜干儿等均在采购之列。百十户人家的村子，我们50多名同学几乎是，挨家挨户的收购。大家都打好了注意：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能拿多少拿多少。这里的土特产比较便宜，鸡蛋5分，鸭蛋7分，鹅蛋1角5分，其它东西都是几毛钱一斤。所以一定要多买一些，代回家好好过个春节。由于这几十个人挨家挨户的闹腾，这下村子里可开锅了，鸡都飞上了天，它就像懂事似地，怎么也抓不住了，好像它知道：沈阳青年要把它代回沈阳，杀它吃肉。以买到东西的同学，有口代装的，有筐装的老乡帮拿着，像走马灯似的在村子里来来往往，好不热闹，给本来就已有几分春节气氛的山村，又平添了几分春色。

刻骨铭心，终生难忘！——（2）

当年沈阳的肉类非常之少，在全国有名，号称“陈三两”时代，每人每月三两肉，三两油。我们几个同学就想多买点肉，代回家过年该有多好。当时肉是8毛钱一斤，可毛猪是5毛钱一斤，我们几个较好的同学一合计，干脆买一口大肥猪，杀了分肉保准合算。说干就干，找几位老乡帮忙，联系

好了那家有，直奔而去。捆绑，泡称，抬回，支上大锅点火，开宰，收拾三下五除二弄好了。我们每人分了40斤肉。头蹄下水收拾好了开煮，猪血灌了血肠，那天我们找了好多人，大吃了一顿，真开心！最后一算帐每斤肉还不到7毛钱。我又买了一捆粉20多斤，蘑菇10多斤，烟叶20多斤，还有花生毛克等等，然后我把它们打成了一个大包，一算这个包足有120多斤。那几个比我身体好的同学，他们的包更大，足有140多斤。

69年的2月12日，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青年点像过年了一样。大师傅给我们做了好几个菜，每人照2斤白面做的馒头，因为要回家了，大家节前吃顿团员饭。男青年端起了青边大碗，狂喝130，那一碗就是7两多啊！都喝有两碗多酒，那可是地地道倒的高粱酒，足60度。为什么叫130？因为1元3一斤，叫来叫去就叫130了。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天喝了那么多酒居然没有醉的！

第二天早晨，即69年的2月13日，同学们早早的就起来了，把几天来采购的东西，从存放的地方陆续的搬到了青年点，地上炕上放满了，这是在检阅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都太高兴了！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代回自己的家，代给亲人，代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这里凝聚着我们的汗水，眼泪，甚至鲜血，只有苍天明白！今天正是应验了：越苦，越累，心越甜！！！同学们把采购来的东西，分门别类装好先打成小包，再把它们尽可能规矩平整的摆放在一起，然后用被单，毛毯裹在外面打成大包，以便于背，扛，运输和看管。

此时我仿佛已到了家，在家信中我已得知，老爸已经解放平反，尽管不能昭雪！下乡的前一天为了见老爸，给那个专政队的王八队长，磕了三个响头，才得以和老爸相见，心头的这口恶气早忘到了一边。我最爱吃老妈做的菜了，到家的第一顿饭，第一个菜就是让老妈做个红烧肉。我敢打赌此时其它同学，也一定在想到家时的情景。

这时有人捎信来：知识青年都到生产队去，开资了！队里照顾知青，知道知青要回家，所以先给知青开资。开了资，钱拿在手里，眼泪却在心里流。不知是苦还是甜，不知是难过还是高兴。140多个酸甜苦辣的日日夜夜啊！

大家开资的差距较大，少的10几元20几元，开的最多的那位同学开了230元，那年头有2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为什么差距这样大呢？工资是根据工分来的，工分挣的少工资自然就少了。有的同学一共没干几天活，工分评的再低，工分是8——12分，你评8分人家评12分，同样干一天就顶你

一天半。人家越能干越爱干，越爱干越能干，评分就高，你是越不干越不爱干，越不爱干越不能干，只能评低分。平时花的再多，当时农村是记账分什么，卖什么先记着，年底一起算，平时不注意节俭，日积月累加起来吓你一跳。在这个时候开资少的同学方觉惭愧。我扣除所有的花销剩100正，属中等水平对付了。开完了资大家七手八脚的开始装车，大包小包足装了几马车，直奔西丰县城。乡亲们再见了！到家代向你们的父母问好！互相问候声此起彼伏……

回家以后一切都如愿了，我要说的就是那100元钱，我把它如数的交给了老妈，以略表儿子的孝心，略表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情。可老妈却又拿出了几十元钱添上，给我的老爸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红灯牌的便携式三波段，这在当年是很不错的！

我现在虽然有了先锋牌进口原装，几万元钱的音响，可这台100多元钱的小小的半导体，我依然保存着。3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见它，眼泪就在眼圈里转，当年在农村时艰苦奋斗的场面，不尤然的映现在我眼前，就是这种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辛酸的往事不堪回首

人的一生好像很长远，往前看路漫漫，可回头看却弹指一挥间。现在回想起1968年上山下乡时的艰苦与辛酸，虽然30多年过去了却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尤其是这件事我终生难忘，我和我青年点的俩名同学饿了三天只吃了两把炒苞米粒儿。

1970年是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往日的欢乐和甜蜜的笑语已遥遥无有归期。由于青年点生活的艰苦，同学们都陆续的搬出去了，搬到老乡家寻找自己温暖的天地，诺大个青年点只剩下我们三个同学，说句心里话，我们也想过搬出去要搬也有地方去，可转念一想我们就是不搬，到要看一看我

们在青年点能不能活下去（后来我们开荒种地，上山割树毛子挟杖子，房前屋后种起了各种蔬菜，事实证明：我们不但能活下去，还能活的非常好！）刚过完春节我们就回到了青年点，躺在冰凉的土炕上，头戴狗皮帽子身上穿着棉袄睡觉，棉被还得盖在头上，第二天棉被盖嘴的那一块都结了冰，那年月不知为什么冬天特别冷，几乎天天零下40来度。为了取暖我们上工之余就代上斧头上山打“嘎嗒”，就是几年以上生的柞树根子，用茅材点着火以后再添“嘎嗒”，做完饭再扒出来放到火盆里放到炕上用它取暖，几天下来我们的手上都布满了血泡。但总算可以见到热乎气了，严寒渐渐的退去，转眼到了春天。生产队按月发给我们口粮，皮粮（稻子代壳、高粱代皮）每月每人50斤。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一人做饭另外两个人开荒种地侍弄园子，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忙坏了也累坏了。我们深知春天播下的汗水就是秋天的收获，我们渴望秋天的到来，就是这种希望在激励着我们，日复一日的耕耘着。

农村的4月正是大忙季节，一天中午收工回来，我们发现粮口袋没了！粮食不知让谁偷去了，无米下锅只好去找生产队。可队长说什么也不给，还说：“这个月粮给完了，没粮就饿着！”我们一再说：“不是我们没计划吃没了，是让人偷去了”，凭你怎么说就是不给。实在没办法回到青年点，我们三人越想越来气，不吃饭怎么干活，得！队长不是说了吗：没粮就饿着！饿就饿着！干脆上炕睡觉这一躺就是三天。我们真是躺在炕上什么也没吃。那年头肚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全靠苞米面，高粱米撑着呢，这冷丁就不进食了怎么了得！第一天还能对付，晚上饿了下地喝凉水，第二天下午两眼就有点冒金星了，第三天下午眼圈都黑了，立刻人瘦了一圈，这回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饿是怎么回事。由于我们两天没有出工，事情就在社员中传开了，有些好心的社员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吃的，其中就有炒苞米粒。当时我们虽然很饿可谁也不肯吃东西。我们希望得到的不是别人的施舍，当然情我们领，我们有粮不给我们，让我们饿着，好！左遛活着也遭罪饿就饿死得了，我们太生队长的气了，就是饿死了也要让他们——所谓的贫下中农看看沈阳青年的志气！

后来队长怕把事情闹大，来到青年点劝我们先吃点吧，提前放粮的问题可以研究，装模作样的让会计到仓库看看我们还有多少粮，说就可以发给我们一些，其实我们想得到的也就是这样。队长既然说了可以给粮了，那我们当然就要吃东西了。我们趴在被窝里每人吃了足有两大把炒苞米粒儿，又喝了一大碗水，感觉好多了，过了一会儿，就见有社员把我们的粮食送来了。

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转眼30多年过去了，可这件事在我的脑海深处总也忘不掉。如今我们的生活真正是丰衣足食，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无论吃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当年的炒苞米粒儿好吃，那个

香啊!!!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滋味儿，眼泪直在眼圈里转……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嗨！今天给你们讲一个我遇到过的一个故事。

那是73年的夏初，在山西的一个山沟里，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一个抗战时期日本人没敢下去的一个小村庄。那个村子在沟里，站在黄土坡上是看不到村子的。村子里的人，尤其是老人，一生没有到过县城，不知道什么是铁路、火车，没见过电灯、电话，许许多多的人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他们的口粮也要靠老天恩赐，年成好还能勉强活，天旱只有要饭。一亩地能产一百斤小麦就已经是丰收了，土豆、莜麦是主食，没有水。

那天天气很好，高原的夏天还很凉，我们穿上最好看的当时很时髦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衣、塑料凉鞋，走进了村子，当时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出来看，有的说：看人家简直是仙女下凡，有的说：看！人家手上带着金手表，脚上穿着凉皮鞋，同人家一比我们简直是鬼——。当时的我们还很高兴，很自豪。

晚上我们在一个老人家里过夜，老人78岁了，还要自己下地劳动，四代子孙都有自己的家，担水都要讲价儿孙才给担。睡前我们想洗一洗脚，大娘端来一盆黄汤，我一洗发现粘粘的是蒸锅水，擦脚的布也是蒸布，我们没擦，再怎样说我们也不能用大娘的蒸锅布擦脚呀！洗后我们就问大娘为什么把蒸锅布给我们擦脚？大娘用那真实的，带有母爱的话，让我们掉下泪来。中国的母亲，朴实的农民太完美了。大娘说：孩子呵，大娘一生从来不洗脚，没有洗脚布，大娘看到你们的脚比我的手还干净——，看着大娘烧过牛粪的粗糙的手，那带有眼屎的脸上流着泪，我才想起这里没有水，人吃的水都缺，那有洗脚水？这蒸锅水大娘本来还可以做更重要的事。走前我们给大娘留下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几块钱，这样她可以请孙子担水了。

这虽是一件一生中不值得提起的小事，但我总是不能忘记，三十年一晃过去了，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大娘的小村子不知怎么样了。

不合时宜的理想描画出虚幻的历史，残酷的年代留下一个遥远的故事……

——题记

在百忙之余，接到老朋友的电话，有一种很熨贴的感觉。我将明天与老美的谈判资料往抽屉里一放，信步来到江边。

夜幕中的扬子江不象白天那么张扬，却更使人体会到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潜在力量。我默默地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随即点着了它。

蒙蒙细雨，显得江对岸那片灿烂的灯火似乎和着江涛涌动。

不远的大桥如一道闪烁的光练横跨江上，隐约可闻桥上来往车辆的喇叭声。

反射着灯光的江水一阵阵在岸边喧闹：哗——哗——

我凝望着江城美丽的夜景，将思绪彻底从与美国杜邦公司的艰苦谈判中拉出来，心想这老瞿真够厉害，久不联系，说找，他一下就找到我了。我用力吸了最后一口，将烟头朝江中弹去，闪亮的红点在黑暗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消失了。也该在精神上调剂一下了，我离开沿江的栏杆，按他告诉的地址顺着马路走去。

这是一个静穆的小区，虽然房屋显得有些过时，却是市里老一辈高级干部居住集中的地方。我进入小区后，略略辨别了一下方向，自信地朝一栋红砖楼走去。

未及进门，就听见房内熟悉的谈笑声。找不到门铃，干脆敲门。

门开了，一个热情的声音飘了出来：“哈，洪骏，我就知道是你来了。”老同学们相见，分外亲

热。然而第一道程序还是握手，“一晃十几年没见面了吧。”我说。

“可不是吗，你还是那么好的记性，一个电话就找到地方了。”瞿宝还是老样子，黑而胖，嗓门大大的，一点也不见老。

“我可没想到你会搬到这里来。”瞿宝笑道：“哦，这应该说是托老一辈资本家的福。我的那位岳父大人嘛，市政协副主席，市民建一把手，还可以吧？”瘦而高的余信说：“这也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岳父送楼情’哪。”他是当年班里的才子之一，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历经磨难，现在大概是一文化杂志的主编。大家一阵大笑。

我扫视了一下漂亮的客厅，家具不多而时髦，室内更显得宽敞而大气。我脱去微湿的风衣，拿起茶杯，问道：“怎么样？都好吗？”“嗨，洪总，说话都带官腔了。”瞿宝歪着头道。

我忙拱手：“岂敢，岂敢。瞿总，还请你老多多关照。”瞿宝：“哈哈，哪里，哪里。说正经的，我的贸易公司还靠你高科技的后盾呢。”余信插言：“胖就行了，都别‘肿’来‘肿’去的。生意到办公室去谈，怎么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苹果削起来。

一向精明的江小川笑道：“我们的余总编最不喜欢听这些话了，俗，对吧。”

今天又不是开‘全总’会议，大家超脱出来，只叙友情，不谈生意。”他是当年的物理课代表，现在的个体户。

我注意到墙上巨幅的《乱世佳人》的剧照，黑白的，费雯丽的表情很真挚，令人着迷。片刻，我若有所思地问：“喂，瞿宝，你知道吴丽丽现在在哪儿吗？”瞿宝扬起头想想，道：“她呀，原来是市轻音乐乐团的第一把小提琴，后来出国深造，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你还真记得她。”我脸红地笑笑，说：“她还真到北京去了。”

江小川：“哎，当年她们班上有个姓潘的同学一直追她，结果如何？”

瞿宝笑了一下：“没有。哪那么容易，那小子在大裁军前靠他老头子混了个副团职。现在倒是不

太清楚。对，他的老对头卢海，早已研究生毕业了吧？”这我知道一点，忙答：“可不，卢海在美国早就是博士后了，大概打算明年回来。”瞿宝不无羡慕地说：“好嘛，叫了他多年的‘博士’，倒是名副其实了。”说着，用手捅了捅在他旁边默默吸烟的余信，问：“听说罗运才又升官了，是吗？”余信“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瞿宝不干休，又问：“他到底现在干什么？”余信吐出几个字：“市委副秘书长。”瞿宝：“哟，还真有两下子，混得不错呀。”余信淡淡地说：“各人的造化嘛。”我看了瞿宝一眼：“这有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路，他一直都热衷于‘红道’，何必看不惯。哦，余信，原来曾和你抽到一起的小陈现在怎么样？好多年没见他了，怪想他的。”余信抬起头：“谁？”洪骏：“陈逸兴呀。”余信迟疑地说：“他……”洪骏关切地望着余信：“怎么样？”余信：“在上海疗养。”小川：“职业病？”余信慢慢地说：“不，精神分裂症。”我大吃一惊：“什么？他得了精神病？！”瞿宝、小川也怔住了，呆望着余信。余信点点头。

这怎么可能呢？我站起来，无意识地盯着大家的脸，陷入深深的回忆……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某中学大门口，人来人往，锣鼓喧天。

十来辆大卡车停在路边。

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墙上刷满大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扎根农村，做一代新农民！”、“去湖北口落户，到武当山安家！”等等。

同学们三五成群，整理着行装，气氛热烈的话别。

我身穿褪色的旧军装，走到瞿宝等人身边问：“准备好了吧？”瞿宝一拍被包，答：“没问题，可以再来一次长征。”转过身对其他同学高谈阔论，“既然到了广阔天地，一定好好干他一番事业……”

两个穿工作服的工宣队员抬着一筐大红花，分送同学们。一位五十来岁妇女边给儿子戴花，边抹

眼泪：“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

”一老工人忧郁地望着女儿：“孩子，去了就好好干吧。”一女同学拉着另一女同学啜泣……

说实话，当时我们这一拨人豪情多于伤感，有一种急不可待地盼望走入社会的跃跃欲试感。用现在的话说，居然打红旗，唱战歌，意气风发去“流放”。特傻。

锣鼓声大起，在众多家长和同学的招手呼唤中，卡车起步了。

“等一等！”一个小矮个背着显得过大的背包，追了过来，扒上汽车后墙板。

坐在车后的瞿宝和余信一人一只手，把他拉上车。

在公社简陋的会议室里，同学们等待着分到各生产小队的最后安排。有的还在那里高谈阔论着扎根广阔天地的重大意义，更多的却是望着窗外一幢幢破旧的泥屋，眼睛里充满疑问：就这地方？！

我刚和公社的一个干部谈完知青的分配问题，一回头看见一个身穿大棉衣，头戴大棉帽，双手抱着一个大背包的小个子挤了过来。只见他把背包往墙边一放，舒了一口气，有往周围看了看，发现我在注意他，走过来怯生生地问：“就在这儿等着分配吗？”我点点头，感到有些奇怪，问：“你也是我们学校的？”他脸红了，回答：“是的，我是初一的。”哦，这也难怪，当时下农村的学生号称“老三届”，实际上是初中三届，高中三届，一共六届学生。我是高中六六届的，通称高三的。他自称初一的，自然就是初中六八届的了。但他还是显得小了点。我不禁又问了一句：“你多大了？”他迟疑了一下，，连忙说：“下个月我就满十五，进十六了。”啊，他竟连十五岁都没满，我比他整整大八岁呀。命运果然奇巧，我们年岁相差如此之大，竟作为同一批中学毕业生一起下农村，真是堪笑。可他这么小能行吗？下农村可不是来玩的，我心里想着不由为他担心起来。

旁边的瞿宝看我们在谈话，凑上来对我说：“他，你还不知道？叫陈逸兴，也是我们红卫兵团的。别看人小，懂的东西可不少，看过好多书，还喜欢写诗呢。在学校庆祝‘十一’的专刊上，那首《沁园春》就是他写的。”小陈听到我们在议论他，顿时满脸绯红，走到自己的背包边，掏出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瞿宝笑了笑，小声说：“他爸爸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就这么一根独苗。本不想让他下农村，但现在自身难保，还在牛棚里，实在无能为力。这小家伙坚决要下来，所以就和我们一起来了。”听瞿宝这么一介绍，当时对这小同学就有几分钦佩。且不论他生长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即使是一般人家里，这么大的孩子有不少恐怕还在家里撒娇呢，而他却充满勇气出来独立生活了，真是不简单哪。一场社会大动荡，迫使每个人都受到磨练，不管你是成人，还是孩子。

我不禁又朝他望去，大概感到有些热了，他取下那顶大棉帽。这时才看清他的脸，白皙、有几粒淡淡的雀斑，眼睛大而秀气。整个身子却显得孱弱。瞧他那专心看书的神情，与其说象个小大人，倒不如说更象个沉静的小姑娘——轻轻地咬着下唇，眉头似皱非皱，十分逗人喜爱。

这就是与他的第一次相见相识。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瞿宝拿起桌上的“中华”香烟，每人递上一支。一时间房里烟雾弥漫。

“我记得那时候都叫他‘小拜伦’呢。”瞿宝感慨地说。

我打开窗子，烟雾散开一些。他，怎么会呢？我的思绪仍然萦回在农村……

一条大河，波浪滚滚。大堤伴随长河弯弯曲曲伸向远方。堤外沙地上种着花生，绿草如茵。

我从堤上下来，看见小陈在一棵大杨树下埋头写着什么。我悄悄走过去，突然说：“写什么这样专心？”他吓了一跳，不好意思地将手中的纸折起。

我说：“哦，保密呀。”他急忙说：“不——你看吧，帮我改改。”说着将折好的纸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哈，原来在写诗呀。嗯，〈春的色彩〉：兰的天，/白的云，/黄的土，/绿的叶，/金色的太阳，/火红的花，/流水载着小舟，/和风托着彩蝶。

/雨露滋润着生命之树，/阳光照亮了希望的田野。/啊，是谁？/描画出这动人的一切？/……好！比那什么‘东风万里霞光照，革命形势无限好’之类强多了。

跟谁学的？普西金，莱蒙托夫？还是拜伦？”小陈羞赧地笑了。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对一个城市长大而未成年的孩子。盛夏期间，烈日当空，割稻插秧，挥汗如雨。有的人如罗运才类老是偷奸耍滑，能躲就躲，能赖就赖。而小陈总是咬着牙挺着瘦小的身体坚持到底。在生活上他也和大家一样，从无特殊。现在想起来都难受。那时候，粮食总是不够，‘瓜菜代’是必不可少的救命措施。萝卜既是菜也是主粮，但有时萝卜也得限量。有一次晚饭，每人一碗萝卜粥都保证不了。我们说小陈正长身体，无论如何也要确保他的一碗。

可他说：“你们消耗大，你们比我累。”硬是只吃小半碗，把添给他的倒进了锅里。这在当今真难以想像。

他的绰号“小拜伦”是卢海起的。那是一个插曲。

那时候的夜值得回味。屋外，漆黑一片，偶尔几声狗叫，算是无限浪漫的小夜曲。屋里，简陋的方桌上放着一盏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

瞿宝就着灯光补衣服，突然扎了手，嘟噜一声：“他娘的！”罗运才在打算盘，算了一会儿，烦恼地一拨，说：“累死累活干了一天，一个工才二角五。有什么干头？”小陈专注地看书。

罗运才敲敲桌子，问：“看什么书？”小陈翻开封面：《拜伦诗选》罗运才皱着眉头训道：“你怎么不看毛选，倒喜欢这些封资修的东西？”“谁说封资修？”高个子的卢海背着一个鼓鼓的书包走进门，“我这里还多着呢。”“嘿，‘博士’！”瞿宝跳起与卢海热烈握手。大家亲热地寒暄。

我将书包里的书全倒在桌上，说：“缺的就是精神食粮。”小陈一本本清理着，轻声念着书名：“《战争与和平》、《红与黑》、《高老头》、《红楼梦》、《普西金选集》……”卢海：“罗运才，进门就听到你的豪言壮语，你革命还真彻底呀。”瞿宝嗤之以鼻：“他妈的有毛病！”罗运才认真地说：“要知道这都是禁书。我总觉得你们这样搞，将来弄不好会出事。”我冷

冷地说：“只要没有犹大。”罗运才气结：“你——”卢海掏出一包香烟，分撒给大家说：“好了，别争了。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不可知的东西，不应知的东西，即使是毒草，是封资修。不然，怎么去鉴别，去比较，去歌颂或者去批判呢？”转头看见小陈正瞪着眼听他说话，笑着问：“是吧，小拜伦？”小陈点点头，连忙又摇摇头，笑了。从此，这“小拜伦”的名字就叫上了。

“哎，余信，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讲清楚一点呀。”瞿宝着急的呼声把我从回忆中惊醒。

余信看了看大家，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慢慢地说：我还是从头讲吧…

…

那年，洪骏、瞿宝你们几个抽到造船厂，我、小陈、罗运才等三十多人抽到那个化工厂。小陈和我一起都被分配在锅炉房，干锅炉工。那时我们的思想够单纯的，因为是第一批从农村抽到工厂，大家都为能首批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而感到庆幸和振奋，竟没想到要去挑拣什么工种。先好好干吧，做一个象样的工人。

小陈和过去一样不爱多说话，但干起活来特别卖力。他虽比别人见得瘦弱，却总是抢着去推大煤车。一上班，汗水就没有干过，班里的老师傅们常常夸奖他。评先进总有他的名字，别笑，那时候不就讲究这吗？在休息的时候，就看到他独自沉思默想，有时还拿个小木棍在地上写字，谁一走过去，他就擦掉了。有一次，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带着腼腆的微笑悄悄告诉我，他要在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中寻找诗的灵感，用诗来表现工人们的生活。我笑着对他说：“行呀，小拜伦，这就看你的了。”说着他的脸就红了。当时我们锅炉房的黑板报和宣传专栏在全厂二十多个车间中评第一，主要是小陈的功劳。他要求进步，想加入共青团，要我做他的介绍人，我当然很乐意，尽管政审很严，他真是以一颗赤子之心充满着希望。

没想到过了不久，他的组织问题未解决，倒迎来一个政治运动。记得是午饭时间，突然墙上的大喇叭响了：“全厂职工请注意！（重复三遍）今天下午三点钟，厂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上级重要指示。请各部门各车间做好安排。到时清点人数，任何人不得无故缺席。”饭堂一片寂静。片刻之后，人们才议论纷纷：运动来了，运动来了……

下午三时，各车间工人整队入礼堂。台上悬挂大横幅：打一场清查“5.16”分子的人民战争。

厂党委郑书记在台上面孔严肃，如临大敌。他的讲话很规范：“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厂要全面、彻底地清查‘5.16’分子。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每个人都要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去，勇于揭发、检举……遵照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教导，我们不但要成立运动专案办公室，还要办学习班。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人，不管他是谁，都要严格遵守学习班的纪律，一不准回家、二不准会客、三不准打电话、四不准通风报信、五不准……”小陈在旁边轻轻地拉我的衣角，说：“好严哪。”我不屑地说：“和我们又没关系，怕什么。”台上郑书记宣读参加学习班的名单，我听到了好几个同学的名字，后来竟听到自己的名字，不由全身一震。接下来居然有小陈的名字，他当时目瞪口呆，楞住了。

学习班是怎么回事，你们并不陌生。这种“五不准”学习班其实就是审查“政治犯”的。墙上的标语和监狱、公安局审讯室的标语一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住进学习班以后，专案人员采取的是轮流审讯，个别交待的方法。一见面，专案人员就说：“余信，自己谈谈吧。”我说：“谈什么？”“你的问题呀。”“我有什么问题？”“你在学校干过什么？在农村又干过什么？参加过什么组织？出席过什么会议？写过什么东西？都要详细地交待清楚！”我轻松地说：“这好办，我马上可以说清楚。”

“不，要文字材料。哼，提醒你一下，你们在农村时，曾组织了一次神秘的晚会，告诉你，”专案人员突然声色俱厉地叫道，“这就是一次‘5.16’分子的黑会！你要好好交待！”我惊异地望着他们。“我再提醒你，”专案人员接着说，“这个黑会矛头直指中央，攻击中央首长，会上发泄你们对现实不满，反对文革的反动情绪，还唱黄色歌曲，念黑诗，真是五毒俱全！还有谁参加？你都得写出来。”

“我不清楚这事。”我说。

“不要装糊涂，”他们指指墙上的标语，“党的政策在你面前摆着，你自己决定吧！”我着急地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听谁说的？”“这不用你管，有人主动交待揭发。给你一天的时间，写好交来。去吧。”我心情沉重地出门，后面又叫道：“把陈逸兴叫上来！”刚走回住处，小陈一把

拉住我，急切地问：“怎么回事？”我皱着眉头慢慢地说：“没什么，就是问了一下农村的一次晚会的情况。

我还真不清楚。他们就扣帽子，哼！哦，现在他们叫你上去。”小陈惊恐地问：“那，我怎么说？”我恢复了冷静，安慰他道：“别怕，相信党相信群众，他们不会怎么样的。

啊？”现在想起来，当时这句话是多么无力多么愚蠢哪。

小陈心神不安地去了。

我烦恼地涂抹着“交待材料”，地上扔满了纸团。可三个多小时了，小陈还没有回来，我深深地为他担忧，他毕竟只有十六岁。

我站起身来，准备出去看看。这时，门开了，小陈脸色惨白，两眼发直，木然地走进来。

我焦急地问：“怎么样？小陈？”他象没看见我一样，嘴里念叨着：“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喝点水吧，镇静些，啊？”我忙倒一杯开水给他。

他推开我的手，直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先回去吧，过两天再来。这里有我，不要紧的。

”小陈似乎没听见我的话，神情恍惚地就走了。

第二天，几个专案人员大发雷霆：“真是无法无天，进了五不准学习班，竟敢偷跑回家，他胆子还不小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就到他家去，勒令他回厂！”我气愤地顶道：“他还是个孩子，你们怎么能这样逼迫人？！”专案人员冷笑道：“哼，在这种时候，只有革命和不革命之分，管不了那么多！看在你们是同学的份上，你去把他叫来。不过，你的交待材料明早一定得交来。”我还是拖了一天，第三天晚上去了小陈的家。

当我推开小陈家的门，竟呆住了。他的父亲、头发斑白的老教授坐在椅子上发怔。他的母亲坐在

床边抽泣。家里乱糟糟的。

我心里发紧，忙问：“陈逸兴呢？”小陈的母亲抬头，泪如雨下：“他，他……进了……精神病院。”终于抑制不住，大声呜咽。

老教授颤颤地走到我面前，说：“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他不会做坏事的，他还小呀！”我握住老教授的手，一时语塞：“伯伯……”老教授缓过一口气，慢慢地说：“那天晚上，他突然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就往床上一躺。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他妈妈要他吃饭，给他下面，他还是不理。饭菜都放凉了，我们只有着急地望着他。他从来没有这个样的。半夜里，他猛然从床上跳起来，不停的喘气，似乎想挣脱什么。他在书架上乱翻，拿起一本《毛主席语录》笑起来，然后就大声地念：‘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念到后来，突然对着毛主席像跪下，嘴里不停地说：‘救救我，我不是反革命，不是5.16，没有参加黑会。救救我……’

他完全失常了。”说着掏出手帕擦眼睛，但却呜咽起来，“去农村时，他还不满十五岁呀，知道什么叫黑会……”说不下去了。

当时我的泪水就淌下来了。我只能安慰地说：“伯伯，伯母，别难过，当心您们的身体。我这就去看他。”我赶到精神病院，那地方真是人满为患。室内灯光昏暗，不少病人肆无忌惮地哭、笑、说、唱。一进去人就处在紧张状态。

当我左顾右盼地寻找小陈时，一个年青人走过来，举手敬礼说：“军代表同志，我有一个情况向你报告。”我吓了一跳。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跑过来一边推他一边呵斥：“去，快到那边去！”那青年还在说：“我有情况，有情况嘛。”我赶紧拐进一个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迎面向我走来，她嘻皮笑脸地唱着《海港》里的词曲：“化作鲜血流淌，流淌……”我不寒而栗，又转到另一病房。我看见小陈安静地斜躺在病床上，目光呆滞，好象刚用过药。

我走过去，一把握住他的手：“小陈，不要紧吧？”他木然地盯着我，仿佛不认识，好半天才说：“我不去参加那个会，不去。”

不写诗，不会写。”我悲戚地看着他，心里难受极了。后来，他父亲学校出面，终于把他转到上海去治疗。时好时坏，略有刺激就会复发。好些年都不知消息了。

余信喝了一口茶，又补充了一句：“可恨的是，当时我回厂后，专案办公室的人还说小陈不老实，装疯。后来他们知道果然是患了精神病，才算作罢。”“真惨。”江小川动情地说。

我咬着牙，闷闷地出了一口长气。

余信又说：“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清，那到底是怎么一个黑会。记得那段时间，我正在外修水利，怎么会搞得这样严重的？”瞿宝愤懑地叫道：“说这是黑会，完全是他妈的扯淡，是诬陷！这件事我最清楚，我参加过这个会。为这事，我、卢海、吴丽丽等都挨过整。我把那时的情况告诉你们，就晓得了。”他开始了述说……

那是下乡的第二年。洪骏、余信和小川都到外地修水利去了。就我、罗运才和小陈留守那间破茅屋。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吧？干的牛马活，吃的瓜菜代。这其实还算不了什么，咬咬牙就渡过去了，我们最缺的是精神食粮，对吧？当时尽管报纸和广播的内容是那么贫乏，但这样的东西在我们那儿仍然看不到，听不到。空虚，前所未有的空虚。

幸而，我们临离开学校之前，以“战斗队”的名义把学校图书馆里封存的一部分“封资修黑货”借来“批判”并带到乡下，总算是“聊解无米之炊”，否则那种精神上的饥饿会把人逼疯的。为了互通有无，各队各公社的知青们常常串门来交换书籍，相互了解情况，这就不用说了。回过头来看，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才增加了一点色彩，得到了一些儿在繁重单调的体力劳动之后的乐趣。

那天，我正在修理破簸箕。就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该校下到潜湖公社的吴丽丽和李燕。我惊喜地说：“哟，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吴丽丽摇着短辫说：“怎么，不欢迎呀？”罗运才从屋里蹦出来说：“这是说的哪里话，真是请都请不到的贵客。”吴丽丽和李燕相视而笑。李燕说：“我们特地来看，你们男生吃的是生米，还是熟饭。”“别逗，你们这些大小姐呀，衣服能不能洗干净，还是个问题呢。”我马上回敬。大家一起笑起来。

“说正经的，明天五一节，我们公社的知青准备开一个庆祝晚会。刚刚走了两个知青点，他们都来。你们没问题吧？”吴丽丽说。

我有些犹豫，小陈正在“打摆子”，烧还未退。罗运才一口答应下来：“来，来，我们一定来。”她们又问起你们几个，我说修水利未回，只有表示遗憾了。“来一趟不容易，就在这儿吃饭吧。”我热情地邀请她们。

“不了，我们还有十来里路呢。明天就看你们的好节目吧，再见。”“我送你们几步。”罗运才大献殷勤。三人说笑着远去了。

我进屋看小陈，他却不在。一抬头，只见他趑趄地挑着一担水回来。我一把接过他的扁担，埋怨道：“谁要你跑出来挑水的？打摆子还没好，不要命了！”

”他小声地说：“不能老是要你们照顾呀，我还能干嘛。”我告诉他，如果不发病，明天就去参加一个晚会。他听后，眼睛里闪着光，无比高兴。

“五一”那天，我们照常出工。放工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晚饭，换了件衣服就往潜湖公社赶。这时已七点多了，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走了将近四十分钟，我们远远看见她们的那间住房——在村子的最边上，平地里望去，如同一只巨大的甲虫所伸出的头。那闪烁的灯光，就好象“甲虫”在眨眼睛。

我们只差里把路了，狗吠声显得格外清晰。忽然一阵音乐的旋律从前面亮着灯光的小屋里传出，在黑暗的田野中飘荡、扩散……我觉得有些激动，脚步也愈加快了起来。

“啊，好象是舒伯特的《小夜曲》吧。”罗运才品味道。

小陈仔细地听了听，摇摇头：“不，是舒曼的《梦幻曲》。”正说着，我们已到了门口。几个农村的小孩从门缝里往里瞧，回头看到我们来到，一起喊：“又来客罗。”一窝蜂跑开。

推门进去，看见吴丽丽站在屋中间专心致志地拉小提琴，她如醉如痴的神情告诉我们，她已完全沉浸在“梦幻”之中了。许多同学看到我们进来，都含笑点头示意，为了不打扰小提琴的演奏，才暂时免去了热情的寒暄。一个高一的同学对我笑笑，用目光指了指吴丽丽，小声问我：“认识吗？”我点点头表示认识，文革在校期间，吴丽丽是我们红卫兵团宣传队的台柱，我们当然很熟悉。不用说，这里大部分同学我都认识，只有少数不熟悉，不过在这一次聚会之后，再不会陌生的了。

在柔美的音乐声中，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这间房很大，隐隐有些农药的气味，显然曾经是个仓库。四周摆着六张床，中间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整个房里燃着两个马灯、两盏自制油灯和三支蜡烛，算得上灯火通明了。到会的同学们围着房间坐着或者相互靠挤着，他们都很兴奋，脸红红的侧耳细听，并且不时窃窃私语几句。

琴声随着最后一声挫音嘎然而止，一阵夹着叫好的掌声顿时响起。

“这才叫做美的享受。”、“好久都没听到如此动听的音乐了”……大家议论纷纷。

“好哇，吴丽丽，竟敢演奏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你该当何罪？”我故意打趣。吴丽丽回头一看是我们，笑着说：“哦，是你们来了。怎么，瞿宝，你这话是代表普通的知青呢？还是在替文化革命的旗手发表意见哪？”“什么旗手？”小陈问。

“这还不知道，中央的江青同志嘛。”罗运才倒回答得快。

小陈一板一眼地说：“我知道她是中央文革的，不过不知道她是旗手。我只晓得文化革命的旗手是鲁迅。”“那是三十年代，现在可跨入了七十年代了。”罗运才似乎在解释。

“好了，别谈论人家了。小拜伦，到这儿来。在你们队怎么没见你呀？又害羞了。”吴丽丽向小陈招手。小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走过去。

我站出来对大家说：“各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诗人，号称‘小拜伦’，”说着

回头对小陈，“怎么样，来一首诗朗诵。算我们队的节目。”一阵掌声和叫好。

一女同学说：“是呀，就等你们的节目了，快来吧。”小陈腼腆地往后缩：“不，不。”卢海亲切地对他说：“来就来一首吧，这里都是同学，都是你的大哥哥大姐姐，怕什么呀？”吴丽丽也朝小陈鼓励地点点头。

“那——”小陈抬起头，终于勇敢地表态，“我给大家背诵《欧根·奥涅金》的献辞，好吗？”“好——”一阵掌声。

小陈富于表情地朗诵普西金的名篇：

我不想取悦娇狂的世人，只希望得到朋友的欣赏。但愿，我能写出更好的诗篇，献给你，和你的灵魂一样，也充满了圣洁的思想。

让她有生动、明朗的诗情和你崇高的想象。

可是，去吧，请以偏爱的手接受这些杂乱的篇章。

这些朴素的、高远的诗句，有些儿恢谐，有些儿悒郁，她任随我悠忽的意兴在不寐的深夜里写成。

她是青春虚掷的果实，里面有冷静头脑的记录和一颗苦涩的心灵的倾诉。

大家被他的朗诵所吸引，竟有一会儿才爆发热烈的掌声。

“朗诵得真好，这才是诗人的气质。”吴丽丽赞赏不已。“小拜伦，真有你的。我也是第一次领教哇。”我接着说。小陈满脸通红。

吴丽丽宣布：“现在每人必须唱一首自己喜爱的歌曲，谁也不许耍赖，否则——”“在座同学共讨之，全体知青共逐之。”我接着说

。

吴丽丽手指着我，笑道：“好，瞿宝，就从你开始。”“我？真要命，我这破锣嗓子老唱半音。”面对大家的起哄，我毫无办法，只得从命，来了一个《我们举杯》。后面就热闹了，从《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从《送君》、《洪湖水，浪打浪》，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整个一中外民歌大汇唱。你们别笑，这些歌现在是老掉牙了，当时却是叫黄色歌曲和大毒草，碰不得的。

大家快活地笑着、唱着、谈着。突然罗运才紧张地指着窗户说：“糟了，你们看。”窗口玻璃外挤着几张农村青年好奇的脸。

有的同学紧张起来，不知所措。卢海沉吟了一下，冷静地说：“让他们进来吧。”“这，可都是不能外传的呀。”罗运才不无担忧

。

“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走过去打开了门。几个农村青年几经推让，仍不好意思进屋，只是站或蹲在门口。

卢海对吴丽丽说：“请来一段《梁祝》吧，欣赏一下咱们中国的名曲。”优美的旋律流泻出来。窗外，皓月当空，田野在琴声中愈显得静穆幽远。

我发现小陈打了一个寒战，一摸额头，有点发烧。低声对他说：“回去吧。

”他却执意坚持。李燕发觉，热情地说：“上床休息会儿，咱们这里也有赤脚医生。”说着从药箱里拿出一瓶药递给小陈。

当乐曲再度停下来，屋子里的空气更活跃了。同学们相互问候和介绍，并传递着着穷乡僻壤以外的消息。罗运才开始愤愤不平地发牢骚：“你看，明明是一个好提琴手，却偏偏在这里握锄把这不是埋没人才又是什么？”我笑了一下，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锄把上可以出五谷杂粮，喂饱肚子。小提琴能拉出粮食来吗？”“不，对我们来说，第一是再教育，第二是老老

实实在在地劳动，第三才是勒紧裤带。”没想到说这话的是吴丽丽，她斜靠在床上，带着自嘲的笑容拨弄着琴弦。

大家都没有笑，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一男同学说：“可有的人命运就和我们不同。你看那潘的不是在部队里入党提干了吗？”这话不假，我不由想起学校里那一帮神气得不可一世的军队干部子女。

“世界就是他妈的这样不公平。我们当个民兵都没有资格，那批仗着老子有点权势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做官，这从哪里说起？”罗运才说这话是有体会的。因为他曾去报名当民兵，结果公社人武部的人告诉他，等锻炼两年以后再写申请，这使他想起来就气得不行。

我又笑了，对他说：“这怎么是不公平呢？谁叫你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不是某军区的司令员呢？”罗运才一听这话，顿显恼怒神色，他冷笑了一下反唇相讥：“哼，你也不要说风凉话，你父亲是堂堂的大局长，一被打倒，你不也就这个样吗？告诉你，现在是军队领导一切。”“明天早晨上工的时候，还得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呢。”李燕接了一句。

罗运才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说：“同学们，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们看，我们国家今后会不会组成军政府。”“军政府？这个，不会吧。”李燕迟疑地摇头。

“不会？你看工厂、学校、机关，哪个单位没有军代表，不是军代表说了算？

我说很有可能。”罗运才振振有词。

小陈瞪大眼睛，迷惘地看着我们争论。

“好了，好了，伟大的政治家们，你们关心得太多了。小心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吴丽丽打断了争论。

“博士”卢海严肃地望着大家说：“乱发议论是没用的。但是，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这一代青年

怎么办？这倒是应该关心的问题。我们不能老是在蒙蔽中过日子。想一想吧，同志们。”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我摸出一包廉价香烟，抽出一支点燃，自言自语：“革命、造反、下放……我们还能革命干什么呢？”几个男同学也点起香烟，有的呛得咳嗽起来。

“我就想不通，”罗运才激愤地说，“为什么我们一会儿被捧为什么天兵天将，一会儿却又成了替罪羔羊？！”“好象被人愚弄，如同一只拉线木偶。”吴丽丽接着说。

“对于文化大革命要全面总结，不能光是说好。”“博士”扶了扶眼镜，“不知怎么，我总有一种危险的预感。”“博士”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环视四周，人们似乎在思考什么。

“是啊，说老实话，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头脑是应该复杂一些。”罗运才一边点头，一边皱着眉头说。

“算了吧，复杂？复杂有什么用，我们算什么，不过是无人过问的知青罢了。

”吴丽丽丧气地说。

小陈在床上突然冒出来一句：“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对吗？”“有道理！”“博士”笑起来，“我们虽然微不足道，但我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今天就是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同学们振作起来，中国总有一天会走上正轨的。现在，让我们唱《国际歌》吧。”同学们都站起来。小陈欲起，被我按在床上。

“瞿宝，你的英语好，就用英语唱。我和会俄语的同学用俄语。吴丽丽，你伴奏，起个头吧。”“博士”说。

吴丽丽拿起提琴，以浑圆的女中音起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唱起来了，大家都唱起来了。每个人的脸上表情是那么庄重，情绪是那么激昂，似乎在抒情，又仿佛在宣誓，这是在庆祝自己的节日，唱自己的歌啊。猛然，我心中涌动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一群被遗忘的孩子，尽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忍受着各种难言的艰辛，却仍然滚烫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我问自己，他们是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吗？现在看来，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了。

说心里话，为这个晚会虽然挨了不少整，但一提起它，心里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瞿宝用激动得微微颤抖的手拿起烟盒。

“后来呢？”余信又问。

“后来，小陈身体吃不消，我和他先回去了。听罗运才说潜湖公社的知青还自编自演了话剧《牛虻》的片断。”瞿宝补充道。

我长嘘了一口气。一时，大家竟沉默起来，其实心里都不平静。

江小川突然说：“我有一个问题，是谁向当时的清查‘5.16’专案办公室汇报的呢？”余信“呵呵”冷笑：“还不清楚吗？除了他还有谁？”瞿宝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犹大！”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凝望着。

小雨依然下着，大桥在雾蒙蒙地闪烁，远处偶尔传来轮船的汽笛声。

我想：这些，都过去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走过的这一段路，不会忘记我们的“小拜伦”……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嗨！今天给你们讲一个我遇到过的一个故事。

那是73年的夏初，在山西的一个山沟里，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一个抗战时期日本人没敢下去的一个小村庄。那个村子在沟里，站在黄土坡上是看不到村子的。村子里的人，尤其是老人，一生没有到过县城，不知道什么是铁路、火车，没见过电灯、电话，许许多多的人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他们的口粮也要靠老天恩赐，年成好还能勉强活，天旱只有要饭。一亩地能产一百斤小麦就已经是丰收了，土豆、莜麦是主食，没有水。

那天天气很好，高原的夏天还很凉，我们穿上最好看的当时很时髦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衣、塑料凉鞋，走进了村子，当时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出来看，有的说：看人家简直是仙女下凡，有的说：看！人家手上带着金手表，脚上穿着凉皮鞋，同人家一比我们简直是鬼——。当时的我们还很高兴，很自豪。

晚上我们在一个老人家里过夜，老人78岁了，还要自己下地劳动，四代子孙都有自己的家，担水都要讲价儿孙才给担。睡前我们想洗一洗脚，大娘端来一盆黄汤，我一洗发现粘粘的是蒸锅水，擦脚的布也是蒸布，我们没擦，再怎样说我们也不能用大娘的蒸锅布擦脚呀！洗后我们就问大娘为什么把蒸锅布给我们擦脚？大娘用那真实的，带有母爱的话，让我们掉下泪来。中国的母亲，朴实的农民太完美了。大娘说：孩子呵，大娘一生从来不洗脚，没有洗脚布，大娘看到你们的脚比我的手还干净——，看着大娘烧过牛粪的粗糙的手，那带有眼屎的脸上流着泪，我才想起这里没有水，人吃的水都缺，那有洗脚水？这蒸锅水大娘本来还可以做更重要的事。走前我们给大娘留下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几块钱，这样她可以请孙子担水了。

这虽是一件一生中不值得提起的小事，但我总是不能忘记，三十年一晃过去了，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大娘的小村子不知什么样了。

如今一般叫发誓，那个年代有一个更堂皇的词，叫‘表决心’。

到77年，我们高中毕业前，真正还想扎根农村的同学几乎一个也没有了。可刚刚入党的班主任总想籍让同学表决心扎根农村好捞到点什么政治资本，虽然他本人也来自于农村，上了大学后还抛弃了农村的糟糠之妻，另娶了城里的姑娘，据说当时是隐瞒了已有的婚姻。

那个时候，知青招工，参军，当工农兵学员而返城的处处都可见，而且原则上，下放两年就可以被招工回城，至于招不招到你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等一批乡下干部掌握着招工、招生的大权，所以不少知青和知青家长想方设法讨他们的欢心。请客的，送礼的，办事的，应有尽有。为的什么？不就是早点回城！连我父母也早早为我买好了木工用具，让我跟一个本家的木工老师傅学一手，好下农村后更好的为贫下中农服务。只可惜，我太喜欢游泳，那下放前最后一个暑假，我天天要上东湖，结果这木工也没有学成。

看着班主任不断提醒大家要表扎根农村的决心，不愿说假话的同学真有些为难。我想来想去没有表这个决心，代之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自愿”。心里想的是，说不定哪天祖国需要我回城呢？最后，在班主任的鼓励下，记得全班有16名同学表了扎根农村的决心。到80年，再没有一个同学留下农村，这是后话。

下放农村不久，就听到了全国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上大学不需要‘贫下中农’推荐，人人可以考，真如‘一夜春风来’！这不久，在一次为了腾出场地给知青打排球，知青带队干部和知青一起把门前老知青几年前种下的‘扎根树’全给拔掉了。想起当时的那种兴奋，至今想来都舒心至极。

一九六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睡梦中，被尖锐的“嘟嘟嘟”的哨子吵醒。只听见生产队吴队长一边吹哨，一边喊叫：“全体社员到公社拖拉机站集中，到上海造反！有工分的。”我心底一阵兴奋，赶紧穿衣起床，匆匆喝了几口麦片粥，奔出门外，约了连兴等伙伴，赶往拖拉机站。

天气很冷，屋顶上、地上、稻草柴垛、一片银霜。路上不见行人，偶尔从远处村庄传来几声鸡叫。

林宝妈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询问：“你们做啥去？”“造反！上海造反，记工分的，快去！”“造反？”“与你讲不清，去了再说。”林宝妈满脸迷惑的样子。

时间还早，拖拉机站只有几个值班的，七点以后，陆续来了不少农民。

大家高声地互相招呼，拖拉机站开始热闹起来，几个年轻人围着圈，在场地中央高谈阔论“王洪文现在不得了，工总司厉害！”“听说市委现在被砸烂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那个姓蒯的到上海来了！”

人人都在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唯恐落后，偶尔也冒出一句“看你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昨晚肯定跟你老婆太那个了！”于是开始说下流话，引起阵阵哄笑。

几个老头缩在墙脚边，破旧的棉袄中间束根绳子，这样感觉暖和些。他们大多抽着劳动牌香烟，一声不吭。

姑娘们则对“绞花棒”式样的绒线衫织法感兴趣，相互翻看衣裳，品头论足。

空气中弥散着劣等烟草味，过会儿，有个公社来的头头模样的青年咳嗽了几声，爬到一辆拖拉机车厢上挥挥手，情绪激动地说：“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上海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宝山分部杨行

支部组织大家到上海造反，造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这个反我们造定了，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开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车厢下的男男女女情绪高昂，挥舞着红本子，跟着头头高喊口号，大家忘记了寒冷。头头顿了顿又说：“到上海造反，有吃的，有住的，大家放心好了，现在去领造反队袖章，凡是四类分子一律不准参加造反。”于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抢袖章，有了这“造反队”字样的红袖章，就好象有了一切似的。

我拼命挤进人群，好不容易也抢了一个，往手臂上一套，发现袖章上油漆字迹还未干，一定是昨天晚上匆匆赶出来的。戴上袖章后，我似乎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感觉。

此时，我穿一套旧军大衣，稍长了点，那是在公安局做事的叔叔送给我的，戴一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军帽，上面还缀着红五星，胸口佩着一枚用两包香烟换来的毛主席纪念章，这在当时，算是最时髦的装束了。

我兴奋地爬上第一辆拖拉机，车头里已挤满了人，我只好坐在敞蓬的后车厢，车厢后面绑了几面红旗，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

几辆塞满男女老少造反派的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向市区开去。

进入市区后，我们开始往车后抛传单，传单的内容，时隔三十多年，我还记得些：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集体的人民公社改为国营农场！

坚决要求提高薄荷油的收购价格！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坚决要求兑现饲养母猪的奖励政策！

当初我就觉得这些又想革命，又想实惠的口号似乎不太对头，与我数月前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串联时所了解的革命大方向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地将手中的传单全抛完了。

大家都很开心，车上有个老阿婆兴奋地说：过去在家里一直受老头子的气，这一次可出气了，我也造反了，饭也不烧了！

拖拉机在市中心南京路上向外滩驰去，警察似乎也不管，几个小青年从弄堂里窜出来，油腔滑调的高喊：“大家来看啊，阿乡造反派来了！阿乡轿车来了！”上海人喜欢称拖拉机为“阿乡轿车”。

我们坐在车上得意地仰望着两旁的高楼大厦，无视车后的上海人，昔日那种乡下人三等公民的意识已荡然无存。心里只是想：我们也是造反派，我们今天来了！投身到这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来了！

拖拉机在外滩中山东路停住，头头让我们下车休息，等联系好住宿再说。我们这些与周边人服饰、神态显然不同的造反派坐在马路旁，东张张、西望望，经过的上海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流露出嘲笑的目光。

等了老半天，头头终于出现，他领着一大群穿着土里土气的老乡，进入了那幢昔日的汇丰银行，文革前的市政府，现在的造反派占领的革命大厦，真有点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门口非常拥挤，进进出出的人似乎都是穿黑棉衣说卷舌音普通话的北方佬，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南方来了！

我们几乎所有的人一生中从未进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大厦，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楼梯，长长的走廊如同迷宫，阿秋妈妈一屁股坐在楼梯上说：“喔哟！我头也晕了，走不动了！”，那豪华的拱顶，连见过市面，跑过码头的陈牛皮也呆住了，他望着屋顶，一句话也说不出。那精雕细琢的立柱，似乎过去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见到过。

进入房间，地板上过蜡，油光打滑，庄家宅的阿根一进门就扑通摔一跤，他一边喔哟喔哟叫唤着，一边摸摸地板说：“走这地板最好穿双草鞋。”房间里有暖气，十分惬意，我把棉大衣脱了，

拉过一把椅子，让连兴坐在椅子上，我拖着椅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滑来滑去，大家开心极了。

到了晚上，住在另一层的永珍、阿妹、阿兴过来串门聊天，在乡下，我们也是这样的。

夜深了，海关大楼的钟声，黄浦江上的气笛声，搅得我一夜未睡好。

造反的第二天，头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开着拖拉机，来到华山路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只见头拿着一张什么人签过的批条，与厂里的头说了几句，于是我们直接到车间里，从一排排的铁架子上，将面包往麻袋里倒，装满了一车厢后，坐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我一连吃了三个鸡蛋面包，第一次品尝刚出炉的面包，真香啊！至今，我对那天又松又软的面包怀念不已。

当晚，我自恃在上海住过的老资格，带领一群伙伴去找“大世界”，其实“大世界”已经关门停业，我们在乡下哪能知道？我们顺着南京路往西走，马路两旁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巨幅标语从十几层楼上挂下来，触目惊心，数不清的“造反司令部”、“革命委员会”、“战斗队”的旗帜伸出高楼的窗口，

在寒风中飘扬，黑暗中时不时地从天空飘下红红绿绿的传单，纷纷扬扬，使人想起“战上海”电影中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南京路上突然撒出一大把传单，令人激昂万分。

我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观望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然，脚下似乎踏翻了什么，一个男子粗暴地大吼：眼睛瞎了！你要吃生活是伐！我赶紧往小弄堂逃去，奔了好久，才放下心来。

由于迷了路，当晚，我找了很久才回到外滩住地。进入房间，我把路上捡来的传单和隔壁房间不知什么造反队留下的“宣言”、“严正声明”，还有一大迭“我的检查”，统统拿到窗台上，打开窗户，用力往外一撒，传单随风飘扬，马路上人们抬头仰望，当传单落地时，路人争相抢夺，乱成一团，汽车喇叭声齐鸣，我看着这一形景，真的开心极了。

造反的第三天，算是正式行动，头吩咐我们在外滩排队集中，不要忘了带袖章，每人还发了一面有革命标语的小旗子。

约九点多钟，队伍总算出发了。我们沿着南京路往西走，起先三、五人一排，后来变成了六、七

人，最后队伍塞满了南京路，队伍走走停停，有人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两侧的楼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行至西藏路，整条南京路都是游行的队伍，首尾不能相顾，各种组织的旗帜飘扬，口号声、歌声震天响，气氛十分热烈，场面颇为壮观，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会激动，连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老头、老太也异常兴奋，似乎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队伍走得很慢，当我们走到静安寺，已是下午一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

走到旧市委附近，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也许没听清楚，也许不知道曹、陈究竟是谁，队伍里几个青年大喊：“打倒曹小弟！打倒陈牛皮！”曹小弟、陈牛皮是村里的社员，比较出名，念起来较顺口，于是队伍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走到淮海路，有许多人悄悄溜了，队伍稀稀拉拉，口号声也变得有气无力。

送面包的终于来了，阿发一边举着旗子，一边嘀咕着：“说好发四个面包，怎么才发二个呢？”此刻游行队伍已经涣散，领头的也不知去向，激动的口号已经喊过了，面包也吃完了，不知还让我们干什么？

此时，惠芳阿嫂郁郁地说：“这两天我女儿不知怎样了？我想今天回乡下去，实在放心不下。”说着就扔下旗子溜了。

造反的第四天，我们在窗口架了一个高音喇叭，对着外滩广播“农民宣言书”，但很快被周围红卫兵组织的几十个大喇叭的广播声淹没了。我们则呆在房间里无事可做，在地板上滑来滑去的游戏已觉得无聊，房间里的传单全撒完了，虽然晚上睡觉有暖气，但大部分队员都感冒了，在乡下很少感冒。福根最担心上头来向我们收面包的粮票、钞票，红兴阿哥怎么安慰，他也不信：世界上哪有白吃饭的好事呢？

抽水马桶常常堵塞，清洁管理员也找不到，听说都到北京告状去了。为何告状，谁也说不清。乡下

来的造反队员越来越少，我可不想回乡下，父亲参加什么“支农职工造反派”，也在市区里，经常来看我，哥哥此时正在步行串联到北京的路途中，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了。再说，我们的革命行动还没有什么结果呢。

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星期，接到上面通知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什么“最新指示”。反正，我们得全部回家。

回乡下的路上，拖拉机开出市区，郊外寒风刺骨，我坐在拖拉机车厢一角，紧缩着脖子，数十天热哄哄的感觉，一下子全消失了，我数了数旧书包中十来个又冷又硬的面包，心想，这便是我进城造反的全部收获了。

坐在旁边的阿秋妈妈，望着远处的田野，自言自语地说：“唉，家里的棉花还没摘完呢？”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早春二月，淫雨绵绵，江南草长，又到了伤心断魂的清明时节。每年这个时候，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分外思念老学长。

老学长高我两届，六七届高中生，德行才识，俱为当时母校六届同学中佼佼翘楚，更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时至今日，三十多年前他身着学生装、提着作书包的帆布旅行袋迎着朝阳走上学校前木桥的勃勃英姿，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然而，斯人已去，不复再睹，屈指算来，老学长离开这个世界，离别他的娇妻爱子和我们这些苦难与共的老同学，已有一十三个年头了。

文革前，就认识了老学长。其实，当时“校园谁人不识君”，在校的同学几乎人人认识他，因为老学长品学兼优，又是校学生会的体育部长，打得一手好篮球，更因为老学长有个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他的志向是北大、清华，而大家也确信这是必然的事。

六八年秋天，我们离开了学校，各自东西插队落户当了知青。每当逢年过节，回到家里，彼此要好的同学总要聚在一起，回忆学生时代的趣事，谈论在农村的生活和苦闷，交流各自觅得的书籍和阅读体会，神聊海侃当时的政局和知青的未来。当时不少同学处境艰难，难免情绪激奋吐言不雅。老学长纵然心头也有酸楚，却从不怨天尤人，总是诙谐地劝慰大家“面包会有的……”。虽然和我们

一样身处窘境，但老学长始终不坠青云之志，他心里想的，并非全是个人的遭遇。我保存着69年秋天他写的一封信，谈的是他在听到有关珍宝岛事件消息后的一些感受，字里行间袒露着他的拳拳爱国心、赤子情，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往事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我们又一起围在收音机旁，紧张地等待着最后的人事变化，老学长更是忧心忡忡，担心总理易人。直到听到了公报，周总理仍是总理，大家才松了口气。老学长最崇敬的就是周总理，在他常年穿着的三贴袋学生装上，多年来总佩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不管是许多人为示“忠心”纷纷佩上五六枚像章的时候还是到了后来几乎见不到有人佩像章纪念章的时候，他左胸前的“为人民服务”始终烁烁闪光。

那时候，看到农村的状况与想象的大相径庭，艰苦的劳作茫茫的前途以及一些个人的问题，我一度思想非常苦闷，尤其是在第一批知青被招工以后。那时有机会我常去看望老学长。每次见到他，总看到他在读书，对我的问

题，他也很困惑，但总是像兄长般开导我，劝我有时间多读些书籍。其实他也有相同的甚至更多的苦闷。特别是在被张铁生的白卷搅去了梦寐以求的进大学的机会后，他居然

有时也抽起了烟。每次分别，他总会深邃地微笑着，在我肩头重重地拍上三下.....。

再后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农村和本地的学校请去当了代课老师，他也去了母校。由于功底扎实，那些科班出生的正宗老师也很敬重他，更得到了小弟弟小妹妹们的好评。到了七九年，我已经回到家里进了工厂，他仍在代课。这时，老三届中学生年纪最小的26，最大的32，回了城的不是已结婚便是准备成家。我问他准备如何，是否留校转正？他笑笑说反正孤家寡人，还得乘末班车考大学。好些同学都劝他考虑考虑，都31岁了，大学毕业就是35，我们这些人又都没积蓄，还是现实点吧。结果他坚定不移地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进了当时的南京林产工学院。上学后他和我保持着联系，还帮我在学校买了些外面买不到的书籍，那时候他是如鱼得水，踌躇满志，虽然只是所普通高校，距他少年时的理想甚远，但他深知来之不易，相当刻苦。四年后，就职于苏州园林局。然后经人介绍，与供职部队医院的夫人成婚，有了孩子后迁职省城。不料到新单位后不久，竟在上班时因意外事故不幸殉职。消息传来，我们都呆了，实在难以相信老学长竟会在风华正茂时离我们而去，他的生命风帆，才刚张开啊！数十往日同学和与他相好的母校老师，自动聚集在他家中，真切隆重地悼念这位值得敬重的同学、兄弟、朋友，想到我们这代人的苦难，想到老学长壮志未酬，大家都难禁滚滚的热泪。

许多年来，一直怀念着可敬可亲的老学长。我觉得，老学长留给我的印象，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风貌：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纯朴正直。我也觉得，怀念老学长，就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年华，怀念青少年时代真挚洁净的友情.....。许多年来，老学长的好学、坚韧、达观，鼓励我迈过了生活道路上的许多坎坷，如今虽然再不能听到老学长的劝慰开导了，但我知道，当遭遇新的考验时，如若老学长在生，一定又会意味深长地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上三下的.....。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平生有过许多快活的日子。……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泰戈尔

当时，我是当着“狗崽子”下的乡，那时候我爸爸刚死了七天。我虽然觉得没脸见人，可还是给他戴着黑箍，这是解释不清楚的。到了乡下，上面也叫分“红五类”，“黑五类”，按说我这个“狗崽子”不该参加贫下中农的会，可是纯朴的村干部说：“都是娘生肉长的孩子，分个什么类呢？叫开会都去。”这样，我觉得在乡村里我反而抬起了头，和所有知识青年一样新奇地混入了那个新鲜的地方。

我插队的村子临着海河，这是一条被人工拓宽的河，它同它的许多支流是沿河的农民为了抗旱和排涝，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锹一锹地挖出来的，那时候，每年从秋末一直持续到冬天大地封冻，我们村上人都要派最强壮的小伙子去挖海河，余下的人几乎是合家老小，都到海河支流的工地上当“民夫”。我第一次去“当民夫”的情形留在给我妈妈的一封信里，摘录在这儿：

妈妈，到工地已是四天了。挑河打堤是土工活里最累的，连大小伙子也得累吡了牙，我咬住了牙干。

头一天干过来了，昨天和前天简直是拼过来的，因为肩膀压红了，又出了血，肿得老高，担起每付担子都要一咬牙，一攢眼，这样才能走起来。妈妈，你想，肩疼得连摸都不敢摸摸，腿疼得连炕都上不去了，干活还能担起挑来跑，是拼出去的吧。大伙说我：蹬坡蹬得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真是这样，妈妈，才不只我一大伙！多小的闺女啊，才14岁，也来了，每人都挑着大土篮子，走起来都是低着脑瓜往前拱，咬着牙，瞪着

眼，担到头一撂筐，常常就累得跪在那儿了，却叫着：“压！就当不是咱的肉。”

降霜了，穿棉袄的天呵，男的光着脊梁干，……工期还有72天……

当时我身上总是揣着一封信，上面的话我几乎都要背下来了，每当挑不动又大又沉的土筐时，都要摸一下。

银鸽，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我特别的想你，想得出奇，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所没有体会到的想。以前我也想，但只想

一会儿就过去了，而现在不同了，你的影子仿佛是时刻跟着我。像我这样出名的‘马大哈’，竟然有时想起天冷了，她会不会忘记了加衣服呢？端起饭碗又会想起，她活忙，可能又在吃凉饭吧？要睡觉了，又想她一定还在奔忙，在开会呢还是在给老乡看病呢？这样写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什么时候我变得这样婆婆妈妈的了？她又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儿，自己还不知道？……现在我才明白，如果说我们的感情心照不宣地沉默了数年之久，那么它现在终于爆发了……

看不见歇了才收工，上家走着就看不见道了。我们排成一溜儿，眼好的打头，我这样的就跟着走。

荣奎大哥走着边说：“俺起打学干活就挖河，这都挖了十来年了。”人们于是就嚷嚷开，有的说：“我挖了两年，”“我挖三年，”我不言声，我才挖了几天！

荣奎大哥突然朝后喊：“银鸽赶明儿还来么？”我马上就大着嗓门儿说：“来！不来怎么着。”

人们都笑了。他又问我：“今晌午吃了几个窝头？”

“三个！”

他高兴地说：“行，够能吃，我顶你吃的双份儿还多。”

妞子咯咯地笑起来说：“银鸽你还记得你刚来吗？下洼就带了那么一口饽饽，正好当上大雨，老么大的雨哟，你走不动道儿了，我还拉着你来的？”

“记得。”

收工上家走的是道关，看不见道儿，又搭上人们干一天活累得够呛，走在田垄地里高一脚低一脚的，有的时候累得都迈不开步了，走到家真不容易啊！可是这帮受大累的人们，都是多好的人！从来也不在意辛苦，有的今晚累得都快上不去炕了，转天干活又有他们！“不能歇，歇乏了，惯懒了，”他们说。

看不见道儿，又走不动道儿，可人们还是取闹着，德云走着走着一蹲脚，她喊起来：“妈哟！脚歪得后脚心朝上咧，这天真黑，月儿也不出，也不就待就待咱们。”荣平接茬说：“可呗，咱都成了磨上的瞎驴了！”胖胖的妞子也说：“可走不动了，真想变个蛋滚回家去！”她这么说着还拖着两条和我一样快没了知觉的腿领着我走道儿呢，叫她攥了我一手的

汗。

荣奎大哥朝人们又喊：“爷们儿，明儿还来啊！”人们应答着：“来！是这儿的汉子就恨家不起！”

我回到村里，对着被风一口一口吹动的灯火给我的病人针灸时，一个偏瘫的大爷像狗一样用双肘撑起上半身对我们唱诵到：“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那时候我真的想为他们的愿望做件好事！

机会终于来了。

大半年后我被推选到省里参加知青会，一个北京来的军代表找到我们北京的知识青年座谈，他许愿说：谁能扎根农村就给他所在的村子一台拖拉机。都沉默着。后来我说：“我。”同时还有别人。可是我们尤其是我想不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变了。

很快地，我受乡亲们的托咐，找回北京，到市安办表示扎根的愿望，要拖拉机。他们都说：“小同志，没有这个事啊，我们不管物资的调配。”我一问才知道那个军代表已经调回部队去了，没有什么拖拉机。当时我站在那里就哭了，因为我不知道回去怎么交待。后来的事情就是我为要落实这台拖拉机，顺从地当了地区又当了省里的知青“典型”。为强化我的扎根意识领导叫我放弃初恋，因为他是城里的工人，而我将永远是农

民了。

“就是说：你们不合适。你自己说说应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想想，你是典型啊，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清楚，如果我不再是典型了，上级就不重点关心这儿，拖拉机也就没有了，可是，他是我心里唯一不愿意割舍的。我答应考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整宿地睡过觉了。他找到我痛苦地问：“为什么和我成了，领导就不培养你了？”

“可能他们担心我会离开农村……”我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我当时身上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农活已经把我累得够呛了，再加上这件事，我快受不了了。

不久，收秋种麦正忙，老支书的小儿子病了，是闹虫子，后来肠穿孔了，地段医院让上天津医院去治，老支书说：“在这儿治吧，方便。”是说：他又不至于撂下工作，还能上医院来照看。

他白天干了一整天活儿，没日头那会儿就蹬车25里地，赶到医院看看孩子，有的时候当上了雨，我们那儿是胶泥地，他的自行车还要扛着。他不叫能干活儿的闺女去照看弟弟，而叫刚刚病好，刚能下炕的老伴去，叫他闺女下地，老说活儿忙，不能占个劳力。后来孩子的病地段医院没法治了，到天津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天津知识青年代替家长签的字，他还家里安排人们种麦子。等他赶到天津，刚守了会儿，孩子的黑

眼珠吊上去，他赶紧叫他：“根水，根水！”过了会儿，小根水的黑眼珠又翻下来，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不肯撒开。他掉着眼泪。可是一抹眼，他又走了，去看一个有病住在天津的知识青年去了，说：“他是我的孩子，他也是。”

我看见了小根水死去的那个晚上。

这屋，是他小小的孩子根水一直看着我，问我：“姑姑，杏儿好吃吗？杏儿有多好吃？”当时只有微弱的呼吸了，而我手里是一瓶借钱给他买的桔子水，我简直不知道往哪儿放下它。老支书看见大队干部都来了，就说：“正好，我两天出门，咱家的麦子怎么样了？说一说吧。”在那间屋里就开上会了。人们一提孩子，他说不了两句，就又回到了麦子上去。当他听说晚麦子种了一半，早苗出得挺好，还笑了笑，笑出了声音。

他闺女悄悄地把我叫出去，哭着说：“我弟弟死得多可人疼，我们不愿用席把他卷走。想借点儿大队的木头，给他打个匣子，也解解疼……木头等有了再还。可我爸爸就是不让，说当干部的不能乱动公家的木头。”我们一起哭。根水那天夜里三点多死的，四点就埋了，用的席。

那一夜我们一村的大人几乎都没有睡觉，天刚刚亮就都下地了。我记得我是砍高粱，正对一个迁高粱头的人喊：“干净点儿！”无意地一回头，老支书来了，就站在我的身后，我心里！我说：“您稍歇会儿，行么？”他说：“忙啊！”他累得快站不住了那样，说：“明年是粮食大上的关键一年，今年种麦是关键的关键……”我下定决心和我的男朋友断了，他就是再好我也不要了，要拖拉机！

在北京，我和我的男朋友面谈后，又绕道到天津，找到周叔叔。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跟我很熟，我把连对妈妈也不说的话对他说了，我们的信让他看了，我的男朋友他过去知道一些。

“周叔叔！车开了，他看我，我也好好地看了看他。周叔叔，他为我人变得消瘦，我愿意好好地记住他……行了，不说他了。

“他的头一次工资就给我寄来了十块钱，那时我们连一点这样的感情也没有，他叫我……”

“周叔叔，他的家里很穷，可是他说：我可以永远是一个农民，他绝不会因此抛弃我。他说他跟我说话就是一种享受，……我的想法有的时候他觉得很好笑，但是能纯洁他的灵魂，他没有想从我这里再得到别的，我再也不会遇到这种人了。……我现在简直没主意了，跟他，连累他；不跟，也害。周叔叔，我是一个要脸面的女孩子，现在当着您说出这种事，我是实在太没主意了。

“不，周叔叔，就是领导现在同意了，我也不愿让他跟我苦下去了……”

周叔叔的话：

“无疑地，你们有感情，很深，十年了。但是这种感情不能和父子的感情相比，你不知道，不能。尤其是在人越老的时候。你爸爸活着对我说过：我听见小银鸽夜里睡觉打呼噜，就觉得心里有了安慰……”

“爸爸！”我轻叫了一声，他的句子听不连贯了。

“……那天我上医院去，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给儿子办丧事，流着无言的泪，就想起了你们老支书……他也六十多了，也死的是儿子，他的心情什么样儿？可他为什么还笑，还笑得出呢？”

“他心里没尽想他儿子，尽问麦子，还问过拖拉机，听我们说：都挺好，都怎么怎么好，他满意了呀，就笑。”

“可是，你尽想的是什麼？什麼才能使你满意？你哭為什麼？……”我的心，被他问疼了，但是我决心改变自己。

“周叔叔，”我抬起头说：“在这种事上能够检验灵魂，像透视那样的检验灵魂，是么？”

“对。小彭（我的男朋友）来信请求我说：请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替我们想一想：银鸽已经把什么都给了农村，唯一给自己留下的就是我们的爱情，您不要肯定她身上的‘共产主义萌芽’了！”

可是在那个时期周叔叔这样说：“我要肯定她心里萌生的最美好的东西。”拖拉机的事终于落实了！那是不久地区知青办的负责同志陪着北京市安办的梁主任来看我们，梁主任听过汇报后动情地说：“孩子们是为的什么呢？我们想想办法吧！”他们后来一定想尽了一切办法，使我们村得到了一辆拖车。

我含着感动的泪水回村去，后来为乡亲们唱起了歌。是在一次社员会上，地区知青办的负责同志也许想让我表现得突出一些？他早几天就动员过我唱歌，这时他又大声说：“唱歌吧，银鸽，唱！”大伙也说：“唱个吧！”

我只记得自己站了起来。

歌词大意是：

我们生活在广阔的天地，

毛泽东思想把我们哺育；

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好老师，

烈日风雨冲洗我们身上的浊水污泥。

我们有决心我们有勇气，

彻底改变旧思想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有决心我们有勇气，

彻底改变旧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

记者们来了，他们给我照相，要宣传我。我哭着逃进一片还没有长起来的玉米地里，骂迎面上来拍照的记者：“谁给我照相谁是小王八！”

他们说：“我们是为了完成任务。”

照片后来寄了一张给我妈妈，妈妈在信上伤心地说：“我的小女儿，你的脸上已经没有稚气了，你才刚刚年轻！回来看看妈妈吧。”

后来我当了村干部，上大队值班的第一天我想我要庄庄重重地去。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很不平静地看了一眼老村干部们。老支书就笑了，走过来对等着我分配活儿干的大伙说：“别难为了她，这头一回值班，她由我领着。”我想走上去叫他一声！

他安排好了活儿才走，我就是“带工干部”了。我们给一座忘记了做什么用的小屋上墙，坯供得很快，落了起来，一起的大叔们用赞可的眼光看我，没有夸奖，因为他们也许觉得：没有必要，她是干部了，她应该这样！

树影子拉长那会儿，老支书来了，扛个锹，他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呢，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干哪儿说，他特别好。这时候他来了说：“银鸽，走，我领你去上洼地转转，教教你看地。”

“走！”

走到村边儿他跟我商量，新盖的大队部怎么垒院墙。

“您就看着办呀，”我说。脸一红，怎么还问我？

“我就是要让你说。”他笑。

噢，我就说了。以前我觉得，在他跟前我老是孩子，可是不是，到了这会儿，我们是同志了，同志！

我们俩就上洼地去。道儿上，小树的干枝横着，他老猫腰拾，嘴里说：“这归拢起来都是柴禾，烧火，管保还能省下桔杆多积点儿肥。”我看看他，他那么好，对集体比对他家都好，操心得满脸都是皱纹，像受累的记印儿，我赶紧也跟他一起连搂带抱，不大会儿把散散拉拉的干枝都归拢齐了。

又往前走，到了地，老支书刨出没出土的麦粒儿放在他厚厚的大手里，告我：哪样是芽干了，又哪样叫虫舔了，我很用心，还上手摸，一摸，摸着他又大又硬的手了，那手面，像是铁的，看看我自己的手才几个茧子，而我还跟别人说过自己是“老农民”，这会儿真嫌了躁了。

大道！我们又走上了大道。大道两旁是我来的时候种的树，再长长就搭成棚了，这会儿就下来荫凉了。我禁不住说：“到我也有了白头发的時候，咱们村就好了，对么？”

他没有说不对，他说他正想的：“银鸽，越来越要努力奋斗，可得记住。”

“嗯。”

老支书突然眼睛一亮，“银鸽，我教教你，给子孙槐压枝啊！”

“干嘛要压枝？”

“你看！”他一边铲土一边说，他拉过来那棵子孙槐的一根枝子，用几锹土把它埋上，只露出了枝头的一点叶子，像芽。

“这就算种了。又好种，还准活，长起来又是一大棵。”

“还能怎么种？”我问。

“砍成段，钉镢子；撒子儿，都行，就是不抵这样爱活。”

“怎么办呢？”

“这儿原先有一大堆儿呵，后来的都是它的枝子直接铺拉的。这样，又长得快，还长得好。就这么一堆儿，”他爱不够地指指那堆子孙槐，“就铺成一大片了。”

我忽地想起了这些老农民，领我，教我，用他们的行动带动我，又想到别的。

子孙槐，这能铺片儿的矮矮的灌木，你真的只能当作条子编筐用么？当时落日的光，照得老树苍绿，照得子孙槐嫩青，我望望老支书，又望望大道两侧的子孙槐，我当时怎么想的现在忘了，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好像爱上了乡村的土土火火的日子，乐意去天天干着不起眼的小事：给要远嫁的闺女代笔回信；为劳累了一生，腰腿酸疼的老人针灸；和男青年一起，朴直、认真地安排、规化我们那时和将来的村子……我更爱老支书

他们带着我，在困苦的日子里“努力奋斗”。

生活中事物缠身，像沙一样平凡、琐碎，而我到现在都希望我找到的思想能像沙里的金，在平常的日子里闪光，能够使我认真、正直，在任何时期，任何境遇都有所作为地走过这一生。

我在那儿呆了八年。河床后来干成了大道，因为上游没水。我们就又挖河中的小河，村上人叫它“河中渠”，让大地从深处为我们渗出一些浇庄稼的地下水。那种为实现一个愿望做出的痛苦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一直作为一种最美好的印象刻在了我的记忆里。现在，我曾生活过的村子真的被改变了。

（李银鸽，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河北农村插队，1979年回北京，现在某学院工作。）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四年的陕北农村插队生活，在人生历程中只是极短的一瞬，但那时的事，那时的情，总是让人难忘。

—

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深入发展，如火如荼。我的父母被关进了“牛棚”。我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红色后代”的优越感受到严重冲击。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主动要求去延安插队。

我已无需与任何人商量，径去把那迁入比登天还难的北京户口迁出来。父母工资被冻结，每月我们姐妹几个只能得几十元生活费。要去远征，身无分文。我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经过研究，同意借给我40元钱。我又把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小提琴卖了十几元钱，买了一只带有毛主席语录，专门为上山下乡知青配售的五合板木箱子，一条毛裤，七拼八凑，把行装打点了。

此去是准备“扎根”一辈子的，多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味道。我被获准见父亲一面，仅十分钟。父亲消瘦得厉害。他拿了一包换季的衣服让我带回去。我看到那件父亲最珍贵的、只在出国和外事活动中才穿的织有方格纹的高级白衬衣，已被剪掉两个袖子，变成短袖衬衫。剪下的袖子已变成好几块不规则的补丁歪歪扭扭贴在肩、背处，皱皱巴巴，针脚长长短短，显然出自父亲从未做过针线的笨手。以后才知道，那被补上的破处，来自皮鞭和苦役。我知道爸爸无从送我任何行装，我也无从分担父亲的痛苦与煎熬，作为孝心和纪念，我把爸爸这件衬衫装进行装，珍藏至今。

父亲是个幽默诙谐的人，平时极爱开玩笑，算是个乐天派。就是在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开除党籍、降级处分的1959年，也没让我们感受到他正遭遇很大的不幸，总不忘随时开个玩笑。但这一回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掉泪了。父亲说，由于他的缘故，让我们受罪了，上那么艰苦的地方去……我却自信地对父亲说：“不，不是因为爸爸，是我们自己要走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不像当年爸爸妈妈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吗？”

出发那天，母亲争得了回家为我打点行装的权利，当然是在两名战士的押解监视之下。她给我带回一些用旧棉毛衫做成的月经垫，利用做勤杂工管消毒锅的条件又消毒了。母亲告诉我，她“四清”时在晋北，和陕北差不多，那里没有卫生纸卖。这种自制的月经垫很解决问题。用后洗净用普通锅蒸一蒸消毒以后还可以再用。妈妈是个医生，有严格的无菌观

念。造反派让她睡在厕所里，她把厕所打扫得锃亮。她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在她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被“专政”做勤杂工的时候，病房和厕所的卫生是医院最好的。无论是被“押”上手术台“带罪立功”，还是天天打扫厕所，甚至伸手去掏堵塞的便池，无论是高级无菌的脱脂棉、手术器械，还是因陋就简自制卫生垫，母亲都遵循一个医生严格科学的无菌观念。

将要踏上人生之旅，不免慌慌张张、手忙脚乱、丢三拉四的。见我半天还出不了门，母亲以命令的口气催道：“几点集合？还不快走！不要这么磨磨蹭蹭的！”我连声“再见”也没顾上说，就被母亲哄出来。母亲则在两个战士押解下回到“牛棚”去了。我是在成为自己有了女儿并且经历了行将远涉重洋的告别之后，才体会到这是母亲在掩饰和压抑心中骨肉分离的凄苦悲伤之情。否则，真会绷不住劲儿的。

北京站，锣鼓喧天，标语红旗，人山人海。人人都有亲友相送，我却没有。我的家几乎被拆光了：爸爸妈妈在“牛棚”，姐妹四个，我老大，老二已去内蒙插队，小四年幼寄养到父亲一个朋友家里，只剩14岁的三妹，作为我们家的“代表”，正被母亲单位的造反派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追查“反动标语”，不许出大门。不知三妹怎么骗过了警卫逃出来直奔北京站，在人山人海中找到了我。她是来送别家中最后一位与她相依为命的亲人的。日后去“牛棚”为父母送衣物、被造反派传讯等事只能落在她身上了，她连自己如何生活还不太会呢！

我和几个同学早就约好，上路时决不掉泪。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看着哭成泪人的妹妹，我强把泪水往肚里咽。我掏出身上仅剩的2元钱塞给她——不知能顶几天的生活费用？我心里不住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掉泪，什么都别想……

火车启动了。我不知眼睛哭肿的妹妹是如何离开车站走回去的，又将如何面对造反派们的发落……

二

从北京出发时，知道农村缺医少药，多少带了些常用药。但到了安塞深山沟里，才发现那里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比我们能想象还要差得很远。我们那道沟到公社卫生院要翻二十几里的山路。卫生院的医疗条件之差就不用说了。农民有病也很少去卫生院。若能翻山越岭去的，那病也“抗”得过去；若真是急重症，也爬不动山了，就是抬过去也来不及了。我们那道沟七个自然小村的“赤脚医生”是这道沟文化程度最高（小学毕业）的王老棒。他的药箱子里也就是土霉素、去痛片、甘草片之类的药。沟里还有一位姓贾的老汉，人称“贾巫神”。虽然我们反对封建迷信、破“四旧”为天职，却渐渐默认，贾巫神在这道沟里的地位。一道沟里有不少孩子取名叫贾娃、贾女、贾小的，都是因请贾巫神治过病、保住了命的缘故。

我们来到这里，有时遇上老乡头疼、脑热的，常把自己的药给他们吃。也许因为从来不大用药，体内没“抗药性”，挺平常的药用在乡亲们身上特管事儿，于是就听老乡不断说：“哎，这些北京娃敢个都是些医生哩！”于是纷纷有人上门求医，甚至后沟的人走十几里路也赶来了。

看着那每一双企盼救治的眼神，无论如何不忍心推辞。能凭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当“辞典”、一套针灸针往自己身上先试着扎，尽力为乡亲们解决点问题。当时真恨自己没机会念医科大学，常常眼看着老乡患病自己束手无策。但乡亲们却越发信任得不行，最后干脆让我也担任了大队“赤脚医生”与王老棒共同走乡串户治病。

后来，我利用探亲的机会，到母亲下放的医疗队学习了两个月（那里有不少像我母亲那样的军中尚未落实政策的“反动医学权威”），掌握了点基本的医疗、护理常识。

我在太行山下的医疗队，第一次见习一个小手术。看着小手术刀划开那位老农民的皮肤，心里很不忍，不住地问他疼不疼，人家总说不疼，我却晕了过去。当我醒来听到妈妈在旁边说：“这么点小手术就晕过去，还想当医生！”我知道一个真正的医生，不仅要有最慈悲的心怀，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不信自己的神经真那么脆弱，非要再试试不可。正好第二天一位受了重伤的铁道兵战士被送来抢救。颅骨骨折、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内脏出血。医疗队的领导都来了，“牛鬼蛇神”们也都来了，我也有幸投入了“战斗”，帮着打起了照明灯。血、肉、骨头、刀子、剪子、锯子……红的、白的，叮叮当当，我觉得心慌，觉得恶心，但我在说服自己，坚持，坚持，一定坚持到底！我胜利了。我可以学点本事回去见翘首盼我的乡亲们了！后来我在一道沟里与王老棒、贾巫神齐名，竭尽所能为老乡看病治病。

三

不知负责安置知青的人是出自什么考虑，把女校的学生都和男校的学生搭配分在一个村子。老乡说那是为日后找对象方便。对此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熏陶、视婚姻恋爱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小将们非常反感。我们表示不愿和男生分在一个队；即使分在一个队，也不在一个灶吃饭，各过各的！我们要显示革命女青年的力量自力更生。

先我们几天到达的四位男生，除了年龄最大的老高三的B以知青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我们表示了欢迎，还迎出村替我们扛行李，那三位均以冷冰冰的态度看着我们安顿下来。对我们坚决不与男生起一个灶的要求，他们不提出异议。这样，前圪崂脑畔上冒出两股炊烟，那两眼本已废弃的孤零零的小土窑里，满当当住上了十个北京知识青年。荒凉的岭畔顿时有了生气。

吃水用水要用木桶到山下那时干时淌的小溪里担上来，烧火做饭用的柴禾要到深山里去砍伐后背回，第一年虽吃国家供应粮，但要吆上毛驴到二十多里外的公社粮站驮回来，还要自己滚碾子推磨。老乡看着我们女生强要和后生们一样去背柴背草背庄稼，看着男生为做熟一顿饭趴在灶火前吹呀吹的，到头来吃些糊焦饭或夹生饭，不住地叹道：“唉，这些娃灰着哩（陕北方言：傻），该是后生家背柴担水，女子家烧火做饭嘛！怎不相帮着呢？”

记不得是男生还是女生先开口的，反正很快我们双方就在尊重现实的态度下合成一个灶了。但我们女生仍坚持大家轮流做饭，集体砍柴背柴，以示男女平等。

一次，轮到我做饭。头一天水缸就已见底儿了，所以天不亮我就得担回一挑水，好在出早工的同伴回来前做熟早饭。我那副不争气的肩膀，非得用两只手帮着支撑扁担。正当我咬紧牙关，歪歪扭扭地挑着一担水走到半坡，晃得过度的桶碰上了崖壁，一下失去平衡，连人带桶一块滚下沟底。我庆幸没人看见，顾不得疼，赶快又打满一挑水重新撑到肩上。正蹒跚蹒跚、呼哧带喘地晃呢，一个人已站在我面前，是邵成，鲍明背后曾告诉我们，他是“狗崽子”。据说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军统人员，解放前夕弃他母子逃到台湾了。大概话都让纯工人血统的“红五类”鲍明说完了，邵成从来不和我们女生搭话。但他干活儿最能吃苦。也许有点同命相怜，我发现轮我做饭时他默默帮我劈过柴，但总有“理由”，要么是试试新斧子，要么是觉得窑里太冷，想出出汗。今天他站在我面前，该不会看见了我连人带桶滚下坡的狼狈相吧！他什么也没讲，一把把扁担拿过去担在自己肩上。我正忍着浑身的疼痛和满肚子委屈，他这么一来，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那根拼命和我叫劲的扁担，上了他的肩就呼悠呼悠地驯顺起来。我看着是又羡慕又感激。跟在后边早忘了过去那些嘴硬的话来。问他何故没去出早工，他只说了句：“起晚了！”

父母从“牛棚”解放出来后，寄来50元钱让我回北京治病。走到延安城，碰上几个延长县的北京知青“拍婆子”。我怕一路上被纠缠没完，不得不又返回了村里。谁知第二天，邵成对我说：“治病要紧，好容易请下假来，还是走吧！我和梁玉田跟你一块儿走，甭害怕！”我又惊又喜，但又怀疑：“你们说走就走？哪有路费？队长能准假吗？”“嗨，管那么多呢！走吧！没钱扒车还不行？”啊，扒火车，我从来认为是流氓、小偷、犯罪分子才干的事，但现在，许许多多知青都是这样回北京的。

我感觉到他很大成份实际是为了护送我，真有点“两肋插刀”的味道。我知道他们都没有钱但我也只剩40多元了，三个人的盘缠当然不够。我也一改以往的“正统”，“英雄”起来：“那好，咱们一块儿走，一块儿扒车！”

我们三人步行70里到延安，买汽车票到铜川，壮着胆扒上货车到达咸阳。这时我只剩二十几元了。胆子再小也只能的

扒车了。虽然扒车有一种难耐的罪恶感，但一想到将走向北京，走向惜别的故乡和亲人，又觉格外兴奋。我们试图用站台票混进咸阳站内，却没办法。检票的一看我们就不像送站的。这时邵成对我说：“把你剩的钱给我，我去想办法！”

一会儿他回来了，“乌鲁木齐到北京的70次进站了，你先走，给你票！”

“不，你们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不能走！”

“走一个算一个，不能都在这儿困着！”

“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坐车一块坐，扒车一块儿扒！我不和你们分开！”

“别罗嗦，车马上就开了！要不票作废谁也走不了！”邵成急了。

广播喇叭传来70次要开车的声音。我不得不接过一直由他帮我提着的旅行包，带着一丝依恋与不忍，踉踉跄跄，一步一回头地跑进站里。看着站在剪票口外的邵成和梁玉田，我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不知身无分文的他俩，在这么大的中国土地上，何时才可到家。

我天天去他家打听。一天，终于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他们两人后来还是混进站，扒上了火车，但没过几站就先后被查票的抓住。有生以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喝斥、蹊落、无地自容。但也只有哄下车了事。再扒车、再哄。最后他俩也失散了。我明知他们是为了护送我才受了这么大罪和屈辱，但也只能默默地在心里感激这拔刀相助的真挚友情。

那是又一个冬季。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过春节了。女生只有我和李凤玲，男生只有邵成和梁玉田。我听到邵成唱起了《外国名歌200首》上的歌曲，平时绷得紧紧的神经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上初中时我着迷地喜欢《外国名歌200首》上许多歌曲，还被同学批判为“小资调”。今天这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回荡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觉得那样亲切，那样清晰：“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真觉得如甘醇流进心田。我们晚上去队里开会，总是坐在一块，莫非他是唱给我听？

又是一次煤油灯下的会议。内容冗长，冬夜也长，唠来唠去的马拉松会议没个尾。年轻后生们传着欣赏邵的打火机。当打火机转了一圈经我手传回给他时，触到他那有力的手。我感到他接打火机的手并未马上抽回，而是停留了片刻。似乎有电流通过手臂传遍全身，我觉得那是我渴盼的一种感觉。晚上躺在窑洞的炕上想了很久，最后我说服了自己：“不行，这是不应该的！”

我写了张纸条给他：“让我们保持同志式的友谊。”鬼晓得那时怎么那么“左”！显然伤害了他，他肯定敏感地联想到了自己的“出身”。像呕气似地，我跟他说话，他好像吃了呛药一样毫不客气。

又一个晚上，当到他们窑洞拉话的后生家一个个散去后，我也把棉袄一披准备回自己窑洞去。梁玉田不知什么时候已打上呼噜，邵成蹲在灶火前把柴禾不断往里添着。火舌跳着，炭火映红了他的脸，四周一片黑暗寂静。走到窑门口，我回过头轻声问了一句：“干嘛老气哼哼的！”他停止拨弄灶火，站起身来随我走出窑洞。我停住脚，两人相对站在漆黑的夜幕下，却半晌不见他说话。为打破沉默，我又开口了：“得罪你啦，怪我不好……”“不，不怪你，是我不……”我不想让他说出来认错的话，我确实感悟到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是渴望爱情的，但我想骗自己，我想有志青年不该早恋。我不知怎样向他说明这么复杂的想法，想伸手拦住他，不让他讲下去，却不知怎的竟靠得那样近，一下靠在他那宽阔的胸怀。像火山爆发，像决了堤的河，我无法用一直恪守的准则说服自己、压住感情。我立即感到了一颗激烈跳动的的心脏和一双紧紧拥抱住我的双臂。刹那间，我们彼此理解了、两心相通了，不需要任何语言。超越了男女界限，超越了“出身”、“门户”偏见，超越了“阶级斗争”观念，超越了道教式的戒律。不知过了多久，大约是几秒钟，我“明白”起来：不对，不对，为什么没控制住自己？不能这样！我觉得自己太不坚强试图脱开他，但无效。他的臂膀很有力，还沉浸在激动之中，丝毫没想放开我。我抬起头想跟他说，我们不能陷下去，却迎来了他长时间的热吻……我还是“掉”进去了。

我总是企图把这份感情用“革命的友谊”、“共同的革命理想”来解释，以求心里对自己“早恋”（其实已二十岁了）的忏悔。我老想和他一块学习《毛选》四卷，老劝他写“入党申请书”什么的。他苦笑道：“这些事与我无缘，毫无希望。然而，令人感到踏实和幸福的，是我们在那穷山僻壤，真有相依为命的味道。

我们终没能结合，以后的生活道路也完全不同，但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相遇，但是彼此间的信任和理解，恐怕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张京，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到陕西插队，1985年回北京，现在某新闻单位工作。）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抄录完这则日记后，又重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把它发了，毕竟是曾经岁月的真实记录。

自从进了大学后，除了十年前曾去贫困山区“社教”（实质扶贫）半年外，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在大城市里生活。对于台风、洪水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已逐渐淡化。当年下乡时引以自豪的长统水靴、帆布雨衣早已因长期不用而丢弃……

偶尔才记起：在孩童时代，为躲避那场特大台风，湛江市府大礼堂里挤满了灾民；中学时代，那场特大洪水使得整个县城一半受淹；在农场时，几乎年年都要防台风；那年，一片汪洋之中，我驾驶着拖拉机在水已浸到前轮一半的国防公路上奋勇前行……

如今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一代，绝大多数是不会有我们当年的那种生活体验了。

日记一则：

1972年11月12日

这星期，一切事情都来得很突然。

已是11月份了，但天气预报还有台风。

星期一、二两天我们团部附近这几个队都出动帮助向阳队收割水稻，大家都说，那来的台风？天气挺好嘛。星期二晚上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来了。星期三上午，因下雨，我们预定种菜的计划受阻，学习班大家在家自学。下午连队学习，团部来电话组织抢救组准备压禾，雨越来越大了。同志们压禾回来喝了姜汤，吃了晚饭，有的休息，有的打扑克。台风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风呼呼地刮着，哗哗的雨声全给台风的雷霆般响声盖住，房瓦洒水进来，不久，听得噼哩啪啦的倒树、倒电线杆声，电灯不久也灭了……指导员敲着我们的门，我开了门，一阵风卷进来。指导员说十九连房瓦全给台风掀

了，汽车要到十九连，但因路有倒树阻拦，要我们几个跟车去“开路”。

我们穿好衣服爬上了汽车，时间是九点多，正是台风最大的时候。汽车顶着风开出了大公路，路上断断续续地倒着被风刮倒的木麻黄、有瓜利树。直径40厘米粗的大树都给刮倒了，树根连树头附近的一大片土带了起来，好像新立起来的一面墙壁、一座屏风。因路上净是倒树，我们几乎一路走步前进，大的树中间锯开，把树尾搬掉，小的树动手抬开，汽车随着谨慎地慢慢地爬行着。三铺路的路途，我们却在半夜三点多钟才到达十九连路口。回到团部已是四点多钟了。一点钟以后，雨渐停，只是刮干风，三、四点钟后风也住了。

第二天一早，一个连一个的灾情耳闻目睹：许多人的小伙房被刮倒，橡胶树断了许多，水泥钢筋的电线杆都折断了，许多房子的瓦给掀掉，武装连几米高的烟囱刮断了……二十年的胶树断了这么多，真叫人痛心哪！

（XX、XX这些渔港区受的损害更不可想，听说一只船给刮上岸四里多远）。

以后这几天我们的工作帮助修复线路和打胶柴。

许多连队在台风过后大力开展修复工作，一些连根拔起的胶树已被扶了起来，今晚我宿舍电灯又亮了，烂瓦的房子进行了修补……一场学大寨、困难面前不弯腰，“三不要”的战斗打响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现在的年轻人，只要学习上肯用点功，上高中时成绩在中等以上，都有把握考上大学，取得文凭。如果是本科毕业（工程类），实习一年后就能成为助理工程师，再干上几年，能够承担工作，就可以申报中职了。在我们公司里，二十多岁的工程师多得很。可是，文凭与职称对我们知青一代，真是两座陡峭的大山啊。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就立下了上大学的志愿，而且要上无线电系。记得初三毕业前，我和跟我最要好，也有相同志愿的同学小吴一起跑到高三毕业班的教室外，观看各大学的招生广告，憧憬自己的未来。小吴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北京广播学院。

谁知高一还没上完，“文革”来了，上大学的梦想成了泡影。父母分别下工地和到干校，我和弟弟下乡，一家四口人分了四个地方。我心爱的书籍除了一小箱随身带走外，其余都丢了。小吴则去了姐姐所在的农场。

在农村接受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再教育”后，我被招工进了工厂。后来，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小吴凭着自己的表现和姐夫当农场领导的关系，进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表现不突出，又没有什么关系，工农兵学员自然与我无缘。等到1977年恢

复高考时，我已经28岁了，正处于热恋之中。一怕功课丢生考不上，二怕毕业后不知分配到何处，三怕专业不合适。一时犹豫，错过了这难得的机遇。79和80年两次招收电大电子类学员，正好是我结婚和妻子怀孕，生产的一段时间。加上我被厂里调到仪表室，正负责将窑炉老的气动仪表更换为先进的晶体管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工作，又没有报名。这样，上大学的机会再次与我失之交臂。

有一次，妈妈的一位同事对她说：“你儿子记性好，让他学学英语吧。”妈妈回来和我一说，我却嘟囔道：“我们当工人的学英语干什么，那是杀龙的本事！”没想到，三年后，“杀龙”的机会真的来了。我们厂要从比利时进口一套计算机控制的配料设备，我因为有一定的电子技术基础，被抽调到筹备组。进口设备，自然有培训的机会，但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出国是厂长书记的事。在以后的另几套设备进口时，连上级主管局长、厂财务科长都出国“培训”，却很少有技术人员能去，更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工人了。出国由领导承包，活儿还得我们干。图纸资料一到，大家都惊呆了。仅电气图纸就有二百多张，还得自己设计制作配套的控制柜。我英语水平低（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只好搬来词典，逐字啃图纸。有一次，居然把“集成电路”翻成了“联合循环”。我赶忙报名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函授，边学英语，边学技术，

终于搞通了图纸，并设计制作了控制柜。等外国专家来时，在跟他学技术的同时，和他练习口语。工程投产后，我被任命为车间仪表技术员兼仪表组长。

老外走后不到两个月，问题来了。由于设计的失误，碎玻璃与其他原料一起送入混合机搅拌，使得混合机的桨叶很快磨损。厂里发了电传与外方联系，他们立即发来了新程序。可装到计算机里，根本无法运行。再联系吧，对方不承认是他们的错，认为是我们安装的问题。当时，这种计算机（可编程序控制器）在国内还很少见，同行业我们是第一家，找不到技术资料，也没有老师可请教。我在电柜后坐了三天，总算找到了程序的错误。再发电传，老外低头了，设备很快恢复了运行。

在工作中，我痛感知识的缺乏。于是，我自费上了仪表、计算机、英语的函授班，并都取得了较好成绩，拿了一大堆证书。可是，没有正式文凭，终归是处处碰壁。87年，厂教育科的老李问我：“现在自学考试要报名了，你愿来看看吗？”我仔细研究了招考目录，当年还没有计算机和电类专业，只有英语还有点基础，就决定报考。我到省自考办买来书籍，又参加了夜校辅导班。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我一边上班，一边学习。除了第一次基础英语考试因准备不够和没经验，只得了55分外，其余都一次通过了考试。

就在我只剩“听说”一门课没考，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妻子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我们结婚十年，感情一直很好。我参加自考，多亏了她的全力支持，做家务、带孩子、照顾老人几乎全是她操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考试，我被分到一个位于农村小学的考点，那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考试。她为了我，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来送饭，看着我一口口吃完，又坐车赶去上班。

接着，母亲受不了打击，病倒了（不到半年，她也离开了我们）。那时，孩子还小，岳母也需要照顾，处理交通事故的繁杂过程更是往我心上流血的伤口又撒上了盐。我真是心力交瘁，吃不下，睡不着，体重在几天内就下降了五公斤，一下子象是衰老了十年。

多亏同事和同学们伸出了帮助之手，有的帮我带孩子，有的照顾老人，他们还鼓励我坚持考完试，完成妻子的遗愿。我从悲痛中站起来，白天忙上班，还要抽空去医院陪妈妈，有时送妈妈进治疗室，我就在走廊里读英语。晚上带着孩子读书，睡觉，尽力去抚慰她那小小的心灵。

到了考试的日子，我强打精神，走进了师范大学的考场。那天的考试分两场，上午考听力，下午考会话和朗读。等考完试，我几乎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个多月后，成绩下来了，我得了“良好”，可谁知道，为了这个不起眼的成绩，我付出了多少？

拿到文凭的那个星期天，我来到了郊区的公墓，将证书供奉在妻子的墓前，抚摸着墓碑，泪如泉涌。

后来，在一位好心领导的帮助下，我调到了上级局直属的一家科技公司。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我又报名参加了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微机应用专业的学习，并于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结业证书。虽然这不算正式文凭，但毕竟又圆了我持有电子类专业证书的梦。

科技公司的工作和工厂比起来，要复杂和辛苦得多。我和同事们一道跋山涉水，跑遍了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安装了数十套自控装置，并在邻国老挝的第一家水泥厂里也安装了国产的计算机控制设备。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93年，我以技术员的身份直接申报中级职称。经过一系列的考评过程，获得了局中评委的一致通过，我终于取得了省人事厅颁发的仪表工程师证书，这时，我已44岁了。

如今，我已迈入知天命之年，女儿也快要大学毕业了。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压力越来越大。在工作上，我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在技术上，我仍然不断地学习新知识。不管前面的道路上还有什么困难和挫折，有“下乡”这碗酒“垫底”，我都会从容应付，奋力去拼搏。

。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作为资料保存，将1965-1969年本人的经历，结合当时大环境的变化，自己的观察，作一编年体式的回忆。因是回忆，不确切之处望大家纠正，各地、各人有异之处请各位自作回忆。

1965年，高一下半学期。

年初，学校开展学育才活动，社教运动内容也开始传达到学校，并结合进政治课。校中，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教育气氛日益浓烈，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越举越高。3、4月前，报上已发表《评李秀成之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文章，学校组织学习。

3、4月，报上开展对“三家村”的批判。语文的作文、政治课的教学紧跟，《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在以前为感兴趣者所知，以后渐为学生人人皆知。

5月，近复习迎考时间，课程教学即将结束。对政治关心者已十分注意北京风声。是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

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矩”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文章。

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1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面目》。

16日，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些文章、通知，学校均组织学习。阶级斗争、立场、大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等政治词汇以强大攻势，日益输入学生耳中、脑中。由学校组织，校园内出现与报上内容一致的大字报。

25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

28日，中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教学、迎考为文革所代替。

6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文革中，前一天晚八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常播出第二天重要各报重要内容，那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也是1968年12月21日晚八时播出，第二天，22日见报的。所以我对那个指示的发表日期记作1968.12.21)。

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6月3日改组北京市委及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电讯。同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6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同日刊载。7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6月6日发布的北京市委5月25日和6月3日的决定，改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停刊前线杂志。

各大学教学完全为革命取代，大字报铺天盖地，南京大学“揪出”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贺绿汀。。。。。。各大学间开始互通信息，互相声援。学校搭大字报棚，大字报日益见多。

12日，南京大学揪斗匡亚明。

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

命黑帮》。匡亚明被撤职并定为“反革命分子”。

18日，北大发生乱斗。

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发生混乱。以后的五大学生领袖相继出台，如北师谭厚兰、清华蒯大富等。课彻底不上，文化革命成为主课。人民日报的语言成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通用语言。收听每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成了家家户户日常的大事。

学校装大喇叭，以后工厂、单位、大街也装上了。开始刻钢板，手工印传单。街上常有传单飞，人人争得。跟着报纸、跟着广播，街上出现大标语。以后成为各派表现自己紧跟从而正确、打击别派的手段。大学出现学生组织，中学总要慢一拍，且要和大学中的挂上钩，确实是个小弟弟。但也有例外，显得比大学生还要疯狂，更为极端，更加难以理喻。

学校组织红卫兵，多为班、团干部，且家庭成份为工、农、革命干部的学生。以后这部分人多成为“老保”，很难抬头。

此时学生的组群状况，还是与以前差不多，积极的是少部分，多数跟在后面。以后分成造反的和保皇的，或造反的中间又分几派，另有一派是人数最多的，那就是逍遥派。

7月。

这是一个充满骚动，蕴育风波的一个月。毛泽东像章（约现分币大小，以后才越来越大）、为人民服务牌出现，学生以穿黄军装、挎黄挎包为革命标识。

8月。

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表示支持。

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十六条）。次日见报，学校组织学习。

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戴上袖章。林彪、周恩来在集会上讲话，林彪排老二。

20日晚，广播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22日晚，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

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

23、24日，街上除四旧，改路名，剪小裤脚管，烧尖头皮鞋、毁大包头。

25日后，学校选派红卫兵代表赴北京，准备第二次接见，这次选派，是学校组织进行的，所派代表，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人进京回来后，学校已起了根本变化。不满于学校的选派，个别中学生自行上京。

27~28日，与班上另一同学一起，用1.5元购了一张到苏州的火车票，一直坐到北京。北京已有接待站。入住后，在各大学抄了两三天大字报，看到了对刘少奇的批判。取得了毛泽东像章、为人民服务牌牌、拿到了毛语录，参加了第二次接见。回沪车上，与北京的一个大学生同厢，了解了北京的可玩之处。

9月~12月。

初，刚自北京回来。大串联已开始。

没几天，班上其他三同学要我一起再上北京，更有其家长来我家的（其实我那时是班上最小的，整整比大部队小一岁）。于是与他们约法：到北京后要去玩的地方。

第二次进京。到北京后，那几位变卦，要他们出去玩，不是肚子痛，就是脚酸，在再一次见了毛主席后，兵分两路。我走京广线，到武汉，长沙，去韶山，转重庆，下广州，浙赣线到外婆家，在外婆那儿调养到次年一月。

两次进京在家时，华山路市委小花园已有北京大学生来沪煽风点火，每天晚上那儿是大辩论的地方。

第一次看到武斗是火车路过浙江诸暨，天欲黑未黑，火车站上扁担、铁耙高举，人群你进我退。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文革中，把识字的再教育为不识字的运动，叫：知青下乡。千万个乱蹿乱蹦猢猻似的的孩子在“广阔天地”闹腾，少不了整些令人喷饭的勾当，把一严肃运动抹个花里胡哨。荒唐年代荒唐事，啼笑皆非，亦泣亦喜，苦乐交织，滋味如何，看官自己叭嗒。

看 青

秋收将至，偷青日甚。想起那天不管地不收的知青，队长计上心来，开会称：“知青是毛主席的宝宝，今年就给他们看青！”看青是神仙日子，扛火药枪遛达，回窝棚烧包谷，一天两个全日工，爽！当地人七姑八舅亲戚多，看青玩假中饱私囊，年年看青偷青，年年丢青贴工，队里亏吃大了。亏队长想得出，这知青什么不敢整？你说大坟山有鬼，赌碗菜油他就上那过一夜，还在你祖宗牌前出恭。敢偷青？难说他就敢轰你一炮。别不把队长当干部，这招真让那些偷青老手没脾气。

庄严接过革命的火药枪，煞有介事扛着它神气活现地游荡于田边地角，不时放一两炮吓唬吓唬麻雀和窥视毛豆包谷的孩子，一周下来，看青效果极佳，队长十分得意他的英明。然而，知青不过是大孩子，先是不愿值夜了，把枪机绑上绳子绊于路口后大睡；后来不仅自己吃个肚儿圆，还把邻队知哥知妹邀来共飧，村中舆论大哗，队长加强查夜。一夜，队长不幸误绊机关，下身被轰，大怒，猛扣工分，众知青鬼火怒，阴谋射杀队长家大黄狗，我持枪行刑。不料枪药多了，扣扳机后从底火处喷出的火药吹我个糊头赖嘴。

一阵忙碌，狗肉飘香。一知青心不忍，谎称打了偷青人的狗，邀队长共享，队长欣然赴筵。孰料狗肉发病，筵后，我头大如鼓，队长卵大如球。事情败露，神仙日子狼狈结束。

偷 菜

翻粪，即将粪堆边翻开捣碎边泼上各家粪坑挑来的屎尿拌匀发酵。这活累，得爬二里坡一担担将大粪挑到场院，一耙耙翻粪肥，一瓢瓢泼屎尿，小山似的粪堆要翻几天。这当口，青黄不接，断粮了。

天黑定，收工，仅骗得二三洋芋吃下，腹内饥声如鼓。上床，辗转难眠，饿屁喧天。昏暗中，传一声无力长嚎：饿啊——。便有响应：哪怕一有一锅一青菜！遂达成共识：偷菜！于是，两知青提一化肥口袋出发。

夜暗如漆不辨五指，又行梁上君子事，待摸到村边，已是心慌腿软战战兢兢。二人约定要动静小动作快，即卧倒向菜地匍匐前进。到得地头，一知青麻利掰了一抱，另一知青近视，爬到地里恍见前方有脸盆大的一块白亮发出奇怪声响，凑近审视，一股鲜粪味扑鼻——当地农民有在自家自留地解手之习惯。该知青刚反应过来，就听一声凄厉惨叫：鬼——！二知青窜起，如惊狗飞射，途撞粪堆，抹一脸粘糊。

到家，不敢点灯，摸黑煮菜。喘息甫定，魂魄渐归，听菜锅歌唱，想美味佳肴，吞滚滚涎水。忽觉味道不对，点灯，立刻沮丧万分，一夜辛苦，只落得：满头屎尿，一锅烟叶。

画 像

逢“秋老虎”，无风，狗都不到日头下。热浪蒸腾，景物摇曳，又放倒一块地的包谷。汗早没了，包谷叶划破的皮肤已无汗碱腌咬的痛感，晕忽忽扔掉镰刀，把自己仰面摔倒，狗一样张开冒火的嘴，想从瓦蓝的天上发现哪怕小小一片云，闭眼，全身钝痛，有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的感觉。恍惚中，忽听大吼：聋子！喊你没听见？是队长。闭眼想象他的气急败坏有点想笑。他蹲下为我遮住阳光，说公社要来开会，把仓房黑板上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换成“农业学大寨”，再画幅主席像。仓房？对于我简直就是避暑山庄！给几个工？就10个，不干我找别人。我睁眼说：去！

活该利令智昏。仓房阴凉令昏懵脑袋清醒，方觉这政治工分难拿。写字好办，主席像是好画的？邻公社那个会美术的知青就为画主席像成了反革命。上山继续干活？瞅门外阳光蛰人，打死不去，遂决定不要工分，混！

写好大字，心突然忐忑，不画，得罪队长？公社印象？招工上调？终老桑梓？惶惶如热锅蚁，几攥粉笔，终不敢落。奈何，仰天长叹，目光掠过对面老墙，主席对我微笑，遂三呼万岁，请下宝像贴于黑板，使黄粉笔画出万道金光，大功告成，功德圆满。

裤 子

山区苦寒，布金贵。可偏兴裤管口袋粗的大档裤，与知青的瘦裤腿对比鲜明，他们在庆幸自己富有的同时，时常感叹知青的困窘。于是，便有了关于裤子的故事。

头回分到一包日本化肥，都说好，不仅指性能，还指那尼龙包装口袋，都在盘算。化肥未用，争端乍起，先是队长副队长，后又会计，社员说他们“敲猪匠打牙祭——炒（吵）得卵子翻天”。终于白热化了，开社员大会，要来个“全民公决”。

开会与争吵几乎同步，嘈杂中，累了一天的知青统统涎水长流鼾声起伏。深夜，知青们被唤醒，会场雅静，队长宣布：考虑小知青裤子困难，社员一致同意，日本尼龙口袋给小知青，缝一大档裤，换着穿！知青们先是愕然，继而大笑，至人仰马翻涕泪横流，随后谦虚谨慎，坚辞不要。

莅日，连夜制好的尼龙大档裤被宣布为“礼服”，供外出开会学习做客用。队长首先试穿，只见大腿正面“日本”赫然，臀部“尿素”鲜亮，知青们当即赋诗一首：我们队干部，穿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都说是好诗！

鼠 汤

鼠，大秽。啖鼠，闻之作呕。然不查而食之，皆曰：香！知青房系牛圈改建，鼠多，其大如兔，鼠精是也，猫鼠对峙悻悻而散，不鲜见。

冬日早饭，是就灶门口的火光做的，昏暗。轮值的人需咬牙钻出热被窝在众人起床前做好饭菜，昏暗中有将抹布与干酸菜共切煮汤令食者撕扯不烂的事件。

某日，一轮值男知青被捉弄，闹钟提前一小时将他唤起，生火做饭烧水煮汤，水沸揭盖，高温蒸气直冲房梁，在灶火劈啪、烟道呼隆和沸水哗啦声中，他忽略了一点小小的动静。煮汤时，坐在灶前的他又眯着了，待大家起床，汤沸良久。上桌，一知青舀汤浅尝即眉飞色舞，惊呼：好香！众人抢食，赞叹不已，缺油水的肠胃得到极大满足。汤盆顷刻见底，舀汤的女知青又一惊叹：好大一块肉！众人挤至灶前，蒸汽散尽，锅里赫然漂动着煮褪了毛、即将煮烂的——硕鼠！惊愕数秒，全体争先恐后抢出房门，面对粪堆就是一阵狂喷猛射，呕个轰轰烈烈人仰马翻。

日后，几个知青饿饭之时，一人喃喃，其口唇吧嗒有声舌头乱舔作神往状，问其故，答曰：那日鼠汤香啊……。

咬 狗

狗咬人，常识。村狗凶悍，视知青为异类，相遇必穷追猛咬，少有例外。也有意思，知青的狗咬农民，哪怕他穿得再板扎；农民的狗咬知青，不管你装得多农民。狗眼看人清，不会咬错的，不象人咬人，乱咬。然而人逼急了也咬狗，就新鲜了。

上山出工，晌午吃烧洋芋，二女知青因噎找水，寻至对面山坳小村，忽闻狗吠乍起，刹时大狗、小狗、黄狗、黑狗、公狗、母狗冲出数十，领头一大狗赫然似小牛犊般，吠声如雷。二女知青魂飞魄散掉头迅跑，凄厉哭叫声传数里，奔命中突想起村人所教：下蹲作捡石状。狗们犹豫，然大狗却不理会，依旧猛扑，二人复起狂奔，狗嘴几触小腿。二人泪汗满面，声嘶力竭，几乎同时绊倒。回头见狗们涌来，情急之下，一女知青猛地返身面对，四肢着地臀部高翘，呲牙咧嘴狂呼怪叫作扑咬状。奇迹出现，大狗犟直四脚重心后坐急刹车，群狗止步，眼露惧色。该女知青见有机可乘，遂趁热打铁，一声怒吠纵身扑去张嘴便咬。狗们哪见过人咬狗这等阵势，惊呼哀叫落荒而逃。

二人坐起，面面相觑，惊异这奇特效果。随即哭得涕泪滂沱，少倾，想纤纤窈窕淑女竟行恶犬疯狗事，不禁击掌拍腿又笑个不亦乐乎。

鸡 宴

一夜间全村鸡瘟。都说是知青干的，也不知是知青中的谁，但确是知青中的谁从哪偷吃瘟鸡将骨头弃于村里，作孽！爹妈的孩子老太婆的鸡——心头肉啊，那是她们盐巴火柴的“鸡屁股银行”。山民不食瘟牲，以病禽贯于事者门前并铺之于诅咒，是淳朴山民惩罚的风俗。沮丧的知青们闭门枯坐倾听咒骂和濒死禽类的哀号，委屈、恼怒令每个人都以恨恨的目光审视他人。

诅咒消停。开门，病鸡一地，夕阳下似酷烈战场。人人面色沉重，静默片刻，便有对话：埋了。埋！可惜。是啊！不如……。不！还是……。那就……。啊？……吃？众知青抱拳发誓：对不住众乡亲，日后出息了不赔鸡誓不为人！张罗杀鸡，却生愁：鸡太多。于是背运晒场，将鸡头向前看齐，使板锄铲……

生平没见过这么多裸体鸡，能让你头皮发麻。1.2米的大猪食锅沸腾终日，烧炖煎炸一吃几天，便吃出了鸡屎味，挂满伙房天棚的鸡怎么看都是尸体，鸡的膀子大腿皮肤心脏肾脏肝脏大肠小肠直肠一听就恶心，一闻就反胃，后来进伙房就呕吐，再后来见活鸡都头晕。剩余全都“慷慨”赠与邻社知青，令他们也有了相同感受，终无浪费。

二十几年后，知青中真有人回去办了鸡场，但不是出息了，而是下岗了。消息真伪不论，确凿无疑的是：他不会再吃

鸡了。

烧 蜂

后来才知道，山民取蜂蛹很艺术。一带盖小篓绑于长竿，远远将竹篓套住蜂巢，一拉，竹盖即把篓口封住，之后烟熏水溺或放飞，绝无被蛰之虑。可当时知青尚未接受到此类“再教育”，取蛹的结果就有些悲壮了。

那是一只巨大的、吊在曲里拐弯的马尾松上的蜂巢，村民们说有十几层，那可是一大碗焦黄喷香的蜂蛹啊！五个男知青串通欲将蜂巢窃为己有，收工磨蹭于人后，待人群消失于山路尽头，返回取蜂巢时，发觉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五颗光头凑一起略为商量便决定：火攻！于是裹满松油的火把杵上了蜂巢。正所谓“捅了马蜂窝”，刹那间，群蜂涌出，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空中很快聚集了愤怒的一团，其声酷似轰炸机。那是被山民们称为“土甲子”的野蜂，体形硕大，凶悍顽劣，山里蛰死人畜的事皆由其所为。蜂群俯冲，五人的抵抗顷刻演变成屁滚尿流的奔逃，惨的是一无遮拦的光头，成了蜂群复仇的显著目标。此时拿收蜂工具返回的村人见状大喊：躺下用树枝打！也奔来救援……。

知青点一夜忙乱，昏迷中的呻唤不绝于耳。清晨，五人醒来，忽觉眼皮沉重不见天日，遂用手掰开互相端详：只见肩上物件晶莹紫亮肿胀似球口鼻如豆怪异之极。便有吃吃小笑及致哈哈大笑。女知青们闻声而入，五人急问：蜂蛹呢？女知青未答，却哭了。

敌 台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境外华语广播均在被禁之列，美、苏电台皆为敌台，听敌台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判刑坐牢。也是物极必反，知青早厌倦了国内电台的千篇一律，听“澳广”唱邓丽君已为时尚，但在公开正规场合仍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有了这个故事。

大皂角树上的喇叭刺拉拉响了，照惯例，队长几年如一日的喊工开场白就将响起：女人都起床了，男人睡着还有什么意思……。一男知青内急，奔粪堆，刚拉出一股舒畅，便与睡眼惺忪出门小便的队长打了照面。这时，音乐过后的喇叭里传来软软女声——莫斯科广播电台。队长面色忽变，手提裤子以难以置信的敏捷冲回屋子。喇叭停了，队长讪讪蹙到男知青身旁，以少有的温柔求其保密，男知青一脸坏笑：我没听见什么，是活路太累导致暂时性耳聋。于是，他得到了放田水的“幸福劳动”。

在田埂刨一板锄，卧等田垄水满。阳光灿烂，心情爽朗，枕如茵绿草，听淙淙流水，看蓝天白云，“幸福劳动，愉快生活”，该男知青快活欲仙……。沉重脚步传来，背粪的行列映入眼帘，一个跛子令男知青的兴致一落千丈，放田水的原是那残废军人。他找到队长，骂：混蛋！队长说：我们都混蛋。真希望你再调错电台。不会了，我把旋钮拆了。苦笑摇头掂起背篓，男知青的“幸福劳动”终结。

如 厕

农村的厕所叫茅厕（Si），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便可。茅厕不分性别，一般以咳嗽为号，因耳背、刹车不及或讯号失误时常发生尴尬；还因松毛遮挡不严令春光外泄；吸烟和照明也烧过茅厕，有悖于安全文明。为此知青决心改革，文明如厕。

首先采用翻牌制。即在一木片两面分别写上男女，如厕翻牌，避免尴尬又可容多人共用，但经常发生人在里面方便，好奇者或好事者在外面乱翻，翻牌制失败。后采用标志式，即如厕者搭皮带于墙头，起提示作用又避免咳嗽暴露性别使耳热心跳便意梗阻，却失败得更快：如厕者常眼看皮带消失而无可奈何。总结：改革不彻底！于是挖一长坑栽以木杆钉上油毡，本村自古以来第一个区分性别的文明示范厕所宣告诞生。

建成第二天即发现男女厕隔墙油毡出现豆大小洞，愤怒声讨后补之；第三天又出现一碗大的洞，愤怒声讨后复补之；第四天洞如脸盆，愤怒声讨后再补之；第五天起床隔墙竟整个坍倒。后来村童发现以石击毡其声悦耳贯通效果极佳，石雨过后，茅厕外墙百孔千窗，又有智者察觉油毡引火易燃，墙就尸骨无存，兀立的几棵木杆被当做椽子材料也尽数偷去，只余粪坑，乱石狰狞。文明示范厕所寿终正寝。

此后知青解手颇随意，虽方便，无粪肥，不久长。莫谈改革，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从此茅厕无恙粪肥丰盈。

批 斗

高寒山区穷，生个地主还真难，幸亏土改时硬定，不然知青下乡拿什么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文革时的黑五类中，唯地主不可再生，如同文物，随时间推移，更日见金贵。因而农村的批判会与城镇相比就显现出了另一种色彩。

按上级指示：知青下乡要上好阶级斗争第一课。斗地主，村里竟象过节，扫仓房、杀小鸡、买烟酒、煮米饭，还套牛

车去接，接待规格明显高于干部。知青纳闷，询问后得知，本村没地主，自然也没长工，都是从小村借的，人家还交代不让用坏了。

老地主颤颤巍巍的来了，难为了队长，一边对知青说：悠悠的，斗坏了赔不起，二天咋个完成政治任务。一边又要哄老地主：对不起你家，这回么还是坐着，头怕是要低点，人家学生娃娃老远来叫我们教育，你就教育一下吧。老地主大度的同意了。

酒足饭饱咂纸烟，老地主就坐，批斗开始。知青对批判会见多了，念稿子抑扬顿挫，尤其女知青发言，全体雅静仰望。知青发言后，老长工控诉：地主心狠呀，那年麦收下雨他死活不让下地，把我们关起来……他咂几口烟接着说：关着也就算了，还逼着吃大肉，把我们全灌醉了！是不是？你老实交代！老地主没动静，方知其昏睡已久，涎水吊老长。队长拍醒他，他即发表评论：人家学生娃娃的声音嫩生生的好听，你老声老气刺刺拉拉的难听死球！

口号声中，老地主老长工相帮着爬上备好的牛车，欢送似的。

2001-03-05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文革中，把识点字的人再教育为不识字的运动，叫：知青下乡。千万个乱蹿乱蹦猢猻似的的孩子在“广阔天地”闹腾，少不了鼓捣些令人喷饭的勾当，把一严肃运动抹个花里胡哨。说是趣事，却又似是而非，荒唐年代荒唐事，亦泣亦嘻，苦乐交织。正所谓：笑中有泪，乐中有哀。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感慨。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看 青

秋收将至，偷青日甚。想起那天不管地不收的知青，队长计上心来，开会称：“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宝宝，今年就给他们看青！”看青是神仙日子，扛火药枪遛达，回窝棚烧包谷，一天两个全日工，爽！当地人七姑八舅亲戚多，看青玩假中饱私囊，年年看青偷青，年年丢青贴工，队里亏吃大了。亏队长想得出来，这知青什么不敢整？你说大坟山有鬼，赌碗菜油他就上那过一夜，还在你祖宗牌前出恭。敢偷青？难说他就敢轰你一炮。别不把队长当干部，这招真让那些偷青老手没脾气了。

庄严接过革命的火药枪，煞有介事扛着它神气活现地游荡于田边地角，不时放一两炮吓唬吓唬麻雀和窥视毛豆包谷的孩子，一周下来，看青效果极佳，队长十分得意他的英明。然而，知青不过是大孩子，先是不愿值夜了，把枪机绑上绳子绊于路口后大睡；后来不仅自己吃个肚儿圆，还把邻队知青邀来共餐，村中舆论大哗，队长加强查夜。一夜，队长不幸误绊机关，下身被轰，大怒，猛扣工分，众知青鬼火怒，阴谋射杀队长家大黄狗，我持枪行刑。不料枪药多了，扣扳机后从底火处喷出的火药吹我个糊头赖嘴。

一阵忙碌，狗肉飘香。一知青心不忍，谎称打了偷青人的狗，邀队长共享，队长欣然赴筵。孰料狗肉发病，筵后，我头大如鼓，队长卵大如球。事情败露，神仙日子狼狈结束。

偷 菜

翻粪，即将粪堆边翻开捣碎边泼上各家粪坑挑来的屎尿拌匀发酵。这活累，得爬二里坡一担担将大粪挑到场院，一耙耙翻粪肥，一瓢瓢泼屎尿，小山似的粪堆要翻几天。这当口，青黄不接，断粮了。

天黑定，收工，仅骗得二三洋芋吃下，腹内饥声如鼓。上床，辗转难眠，饿屁喧天。昏暗中，传一声无力长嚎：饿啊——。便有响应：哪怕……有一锅……青菜！遂达成共识：偷菜！于是，两知青提一化肥口袋出发。

夜暗如漆不辨五指，又行梁上君子事，待摸到村边，已是心慌腿软战战兢兢。二人约定要动静小动作快，即卧倒向菜地匍匐前进。到得地头，一知青麻利掰了一抱，另一知青近视，爬到地里恍见前方有脸盆大的一块白亮发出奇怪声响，凑近审视，一股鲜粪味扑鼻——当地农民有在自家自留地解手之习惯。该知青刚反应过来，就听一声凄厉惨叫：鬼——！二知青窜起，如惊狗飞射，途撞粪堆，抹一脸粘糊。

到家，不敢点灯，摸黑煮菜。喘息甫定，魂魄渐归，听菜锅歌唱，想美味佳肴，吞滚滚涎水。忽觉味道不对，点灯，立刻沮丧万分，一夜辛苦，只落得：满头屎尿，一锅烟叶。

画 像

逢“秋老虎”，无风，热浪蒸腾，景物摇曳，正午，连狗都不到日头下。又放倒一块地的包谷，汗早没了，包谷叶划破的皮肤已无汗碱腌咬的痛感，晕忽忽扔掉镰刀，把自己仰面摔倒，狗一样张开冒火的嘴，想从瓦蓝的天上发现哪怕小小一片云，闭眼，全身钝痛，有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的感觉。恍惚中，忽听大吼：聋子！喊你没听见？是队长。闭眼想象他的气急败坏有点想笑。他蹲下为我遮住阳光，说公社要来开会，把仓房黑板上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换成“农业学大寨”，再画幅主席像。仓房？对于我简直就是避暑山庄！给几个工？就

10个，不干我找别人。我睁眼说：去！

活该利令智昏。仓房阴凉令昏懵脑袋清醒，方觉这政治工分难拿。写字好办，主席像是好画的？邻公社那个会美术的知青就为画主席像成了反革命。上山继续干活？瞅门外阳光蛰人，打死不去，遂决定不要工分，混！

写好大字，心突然忐忑，不画，得罪队长？公社印象？招工上调？终老桑梓？惶惶如热锅蚁，几攥粉笔，终不敢落。奈何，仰天长叹，目光掠过对面老墙，主席对我微笑，遂三呼万岁，请下宝像贴于黑板，使黄粉笔画出万道金光，大功告成，功德圆满。

裤 子

山区苦寒，布金贵。可偏兴裤管口袋粗的大档裤，与知青的瘦裤腿对比鲜明，他们在庆幸自己拥有颇费布料

的大裆裤的同时，时常感叹知青的困窘。于是，便有了关于裤子的故事。

头回分到一包日本化肥，都说好，不仅指化肥效能，还指那尼龙包装口袋，都在盘算。化肥未用，争端乍起，先是队长副队长，后又会计，连贫协主任都掺和进去了。社员说他们“敲猪匠打牙祭——炒（吵）得卵子翻天”。终于白热化了，开社员大会，要来个“全民公决”。

开会与争吵几乎同步，嘈杂中，累了一天的知青统统涎水长流鼾声起伏。深夜，知青们被唤醒，会场雅静，队长宣布：考虑小知青裤子困难，社员一致同意，日本尼龙口袋给小知青，缝一大裆裤，换着穿！知青们先是愕然，继而大笑，至人仰马翻涕泪横流，随后谦虚谨慎，坚辞不要。

莅日，连夜制好的尼龙大裆裤被宣布为“礼服”，供外出开会学习做客用。队长首先试穿，只见大腿正面“日本”赫然，臀部“尿素”鲜亮，知青们当即赋诗一首：我们队干部，穿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都说是好诗！

鼠 汤

鼠，大秽。啖鼠，闻之作呕。然不查而食之，皆曰：香！知青房系牛圈改建，鼠多，其大如兔，鼠精是也，猫鼠对峙悻悻而散，不鲜见。

冬日早饭，是就灶门口的火光做的，昏暗。轮值的人需咬牙钻出热被窝在众人起床前做好饭菜，昏暗中曾有将抹布与干酸菜共切煮汤令食者撕扯不烂的事件。

某日，一轮值男知青被捉弄，闹钟提前一小时将他唤起，生火做饭烧水煮汤，水沸揭盖，高温蒸气直冲房梁，在灶火劈啪、烟道呼隆和沸水哗啦声中，他忽略了一点小小的动静。煮汤时，坐在灶前的他又眯着了，待大家起床，汤沸良久。上桌，一知青舀汤浅尝即眉飞色舞，惊呼：好香！众人抢食，赞叹不已，缺油水的肠胃得到极大满足。汤盆顷刻见底，舀汤的女知青又一惊叹：好大一块肉！众人挤至灶前，蒸汽散尽，锅里赫然漂动着煮褪了毛、即将煮烂的——硕鼠！惊愕数秒，全体争先恐后抢出房门，面对粪堆就是一阵狂喷猛射，前俯后仰呕了个轰轰烈烈。

日后，几个知青饿饭之时，一人喃喃，其口唇吧嗒有声舌头乱舔作神往状，问其故，答曰：那日鼠汤香啊……。

咬 狗

狗咬人，常识。村狗凶悍，视知青为异类，相遇必穷追猛咬，少有例外。也有意思，知青的狗咬农民，哪怕他穿得再板扎；农民的狗咬知青，不管你装得有多农民。狗眼看人清，不会咬错的，不象人咬人，乱咬。然而人逼急了也咬狗，就新鲜了。

上山出工，晌午吃烧洋芋，二女知青因噎找水，寻至对面山坳小村，忽闻狗吠乍起，刹时大狗、小狗、黄狗、黑狗、公狗、母狗冲出数十，领头一大狗赫然似小牛犊般，吠声如雷。二女知青魂飞魄散掉头迅跑，凄厉哭叫声传数里，奔命中突想起村人所教：下蹲作捡石状。狗们犹豫，然大狗却不理会，依旧猛扑，二人复起狂奔，狗嘴几触小腿。二人泪汗满面，声嘶力竭，几乎同时绊倒。回头见狗们涌来，情急之下，一女知青猛地返身面对，四肢着地臀部高翘，呲牙咧嘴狂呼怪叫作扑咬状。奇迹出现，大狗犟直四脚重心后坐急刹车，群狗止步，眼露惧色。该女知青见有机可乘，遂趁热打铁，一声怒吠纵身扑去张嘴便咬。狗们哪见过人咬狗这等阵势，惊呼哀叫落荒而逃。

二人坐起，面面相觑，惊异这奇特效果。随即哭得涕泪滂沱，少倾，想纤纤窈窕淑女竟行恶犬疯狗事，不禁击掌拍腿又笑个不亦乐乎。

鸡 宴

一夜间全村鸡瘟。都说是知青干的，也不知是知青中的谁，但确是知青中的谁从哪偷吃瘟鸡将骨头弃于村里，作孽！爹妈的孩子老太婆的鸡——心头肉啊，那是她们盐巴火柴的“鸡屁股银行”。山民不食瘟牲，以病禽损于事者门前并铺之于诅咒，是淳朴山民惩罚的风俗。沮丧的知青们闭门枯坐倾听咒骂和濒死禽类的哀号，委屈、恼怒令每个人都以恨恨的目光审视他人。

诅咒消停。开门，病鸡一地，夕阳下似酷烈战场。人人面色沉重，静默片刻，便有对话：埋了。埋！可惜。是啊！不如……。不！还是……。那就……。啊？……。吃？众知青抱拳发誓：对不住众乡亲，日后出息了不赔鸡誓不为人！张罗杀鸡，却生愁：鸡太多。于是以背篓运至晒场，将鸡头向前看齐，使板锄铲……

生平没见过这么多裸体鸡，能让你头皮发麻。1.2米的大猪食锅沸腾终日，烧炖煎炸一吃几天，便吃出了鸡屎味，挂满伙房天棚的鸡怎么看都是尸体，膀子大腿皮肤心肾肝脾大肠小肠直肠……一听就恶心，一闻就反胃，后来进伙房就呕吐，再后来见活鸡都头晕。剩余全都“慷慨”赠与邻社知青，令他们也有了相同感受，终无浪费。

二十几年后，知青中真有人回去办了鸡场，但不是出息了，而是下岗了。消息真伪不论，确凿无疑的是：他不会再吃鸡了。

烧 蜂

后来才知道，山民取蜂蛹很艺术。一带盖小篓绑于长竿，远远将竹篓套住蜂巢，一拉，竹盖即把篓口封住，之后烟熏水溺或放飞，绝无被蛰之虑。可当时知青尚未接受到此类“再教育”，取蛹的结果就有些悲壮了。

那是一只巨大的、吊在曲里拐弯的马尾松上的蜂巢，村民们说有十几层，那可是一大碗焦黄喷香的蜂蛹啊！五个男知青串通欲将蜂巢窃为己有，收工磨蹭于人后，待人群消失于山路尽头，返回取蜂巢时，发觉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五颗光头凑一起略为商量便决定：火攻！于是裹满松油的火把杵上了蜂巢。正所谓“捅了马蜂窝”，刹那间，群蜂涌出，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空中很快聚集了愤怒的一团，其声酷似轰炸机。那是被山民们称为“土甲子”的野蜂，体形硕大，凶悍顽劣，山里蛰死人畜的事皆由其所为。蜂群俯冲，五人的抵抗顷刻演变成屁滚尿流的奔逃，惨的是一无遮拦的光头，成了蜂群复仇的显著目标。此时拿收蜂工具返回的村人见状大喊：躺下用树枝打！也奔来救援……。

知青点一夜忙乱，昏迷中的呻唤不绝于耳。清晨，五人醒来，忽觉眼皮沉重不见天日，遂用手掰开互相端详：只见肩上被称作头的那物件晶莹紫亮肿胀似球口鼻如豆怪异之极。便有吃吃小笑及致哈哈大笑。女知青们闻声而入，五人急问：蜂蛹呢？女知青未答，却哭了。

敌 台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境外华语广播均在被禁之列，美、苏电台皆为敌台，听敌台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判刑坐牢。也是物极必反，知青早厌倦了国内电台的千篇一律，听“澳广”唱邓丽君已为时尚，但在公开正规场合仍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有了这个故事。

大皂角树上的喇叭刺拉拉地响了，照惯例，队长几年如一日的喊工开场白就将响起：女人都起床了，男人睡着还有什么意思……。一男知青内急，奔粪堆，刚拉出一股舒畅，便与睡眼惺忪出门小便的队长打了照面。这时，音乐过后的喇叭里传来软软女声——莫斯科广播电台。队长面色忽变，手提裤子以难以置信的敏捷冲回屋子。喇叭停了，队长讪讪蹙到男知青身旁，以少有的温柔求其保密，男知青一脸坏笑：我没听见什么，是活路太累导致暂时性耳聋。于是，他得到了放田水的“幸福劳动”。

在田埂刨一板锄，卧等田垄水满。阳光灿烂，心情爽朗，枕如茵绿草，听淙淙流水，看蓝天白云，“幸福劳动，愉快生活”，该男知青快活欲仙……。沉重脚步传来，背粪的行列映入眼帘，一个跛子令男知青的兴致一落千丈，放田水的原是那残废军人。他找到队长，骂：混蛋！队长说：我们都混蛋。真希望你再调错电台。不会了，我

把旋钮拆了。苦笑摇头掂起背篓，男知青的“幸福劳动”终结。

如 厕

农村的厕所叫茅厕（Si），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便可。茅厕不分性别，一般以咳嗽为号，因耳背、刹车不及或讯号失误时常发生尴尬；还因松毛遮挡不严令春光外泄；吸烟和照明也烧过茅厕，有悖于安全文明。为此知青决心改革，文明如厕。

首先采用翻牌制。即在一木片两面分别写上男女，如厕翻牌，避免尴尬又可容多人共用，但经常发生人在里面方便，好奇者或好事者在外面乱翻，翻牌制失败。后采用标志式，即如厕者搭皮带于墙头，起提示作用又避免咳嗽暴露性别使耳热心跳便意梗阻，却失败得更快：如厕者常眼看皮带消失而无可奈何。总结：改革不彻底！于是挖一长坑栽以木杆钉上油毡，本村自古以来第一个区分性别的文明示范厕所宣告诞生。

建成第二天即发现男女厕隔墙油毡出现豆大小洞，愤怒声讨后补之；第三天又出现一碗大的洞，愤怒声讨后复补之；第四天洞如脸盆，愤怒声讨后再补之；第五天起床隔墙竟整个坍倒。后来村童发现以石击毡其声悦耳贯通效果极佳，石雨过后，茅厕外墙百孔千窗，又有智者察觉油毡引火易燃，墙就尸骨无存，兀立的几棵木杆被当做椽子材料也尽数偷去，只余粪坑，乱石狰狞。文明示范厕所寿终正寝。

此后知青解手颇随意，虽方便，无粪肥，不久长。莫谈改革，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从此茅厕无恙粪肥丰盈。

批 斗

高寒山区穷，生个地主还真难，幸亏土改时硬定，不然知青下乡拿什么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文革时的黑五类中，唯地主不可再生，如同文物，随时间推移，更日见金贵。因而农村的批判会与城镇相比就显现出了另一种色彩。

按上级指示：知青下乡要上好阶级斗争第一课。斗地主，村里竟象过节，扫仓房、杀小鸡、买烟酒、煮米饭，还套牛车去接，接待规格明显高于干部。知青纳闷，询问后得知，本村没地主，自然也没长工，都是从小村借的，人家还交代不让用坏了。

老地主颤颤巍巍的来了，难为了队长，一边对知青说：悠悠的，斗坏了赔不起，二天咋个完成政治任务。一边又要哄老地主：对不起你家，这回么还是坐着，头怕是要低点，人家学生娃娃老远来叫我们教育，你就教育一下吧。老地主大度的同意了。

酒足饭饱咂纸烟，老地主就坐，批斗开始。知青对批判会见多了，念稿子抑扬顿挫，尤其女知青发言，全体雅静仰望。知青发言后，老长工控诉：地主心狠呀，那年麦收下雨他死活不让下地，把我们关起来……他咂几口烟接着说：关着也就算了，还逼着吃大肉，把我们全灌醉了！是不是？你老实交代！老地主没动静，方知其昏睡已久，涎水吊老长。队长拍醒他，他即发表评论：人家学生娃娃的声音嫩生生的好听，你老声老气刺刺拉拉的难听死球！

口号声中，老地主老长工相帮着爬上备好的牛车，欢送似的。

干 部

存粮将罄，新粮未继，人心火躁。当值知青倒食入槽转身时，听身后传不满哼哼，登时恶火攻心厉声呵斥：还指望那两把玉米面？老子都没得吃！一声喝，唬得那货一机灵，红眼圆睁，做预备格斗状。那知青忍俊不禁，道：还哼哼呢，倒还象个干部了。

干部成了名号。然此干部非彼干部。干部是头猪。

干部较村里其他同类，应有足够理由自豪，可它除适应干部名号外，仍一如既往地憧憬食有玉米面的幸福生活，一如既往地以哼哼表示不满。浑然不知这名号之尊贵。

知青们叹谓，做猪也不能落到知青户！与原住民相比，知青生活物资与生存技能匮乏，原想养猪过日子，不料自顾不暇。加上“受教育”的低下地位，前途渺茫，苦闷压抑需得发泄。可怜干部自断脐入户以来，终日食不裹腹拳脚加身，这种牛马不如连鸡都不如的生活，成就了干部短小敏捷的身材和凶悍顽劣的特质。

不堪这种极不“猪道”的非猪生活，干部的反抗猛烈而凑效。某日，知青送粪归来啃土豆，无话，气氛沉闷。干部候于前，期些许漏食。猛地，一知青窜起飞身骑猪，干部反应迅速却目的性极强地顺坡朝粪塘疾奔，抵塘边，骤停，那知青遂以自由落体坠入粪汤。干部哼哼，绅士般离开。众喷饭，笑称：奋勇（粪涌）前进！却许久不见人起身，慌忙近前，见那知青仰卧污物一动不动痴望天空，口中喃喃绵绵不绝：想回家想回家想回家……。众皆黯然。

干部饿极，啃栏，栏断，获自由，出没于山民田地。遇妇女儿童相逐，竟凶猛攻击一路咬去；若遭遇山里汉子，就钻青纱帐游而击之。知青屡遭警告，囚之。然品尝了解放滋味的干部为争自由不遗余力，令猪栏一断再断。

山民几欲捕之而不获，惊叹：知青的猪比狗还跑得快！久之，疲了。知青们对山民警告阳奉阴违，乐得让干部野猪似的自觅其食而疏于管教，干部气焰日渐嚣张，竟掀翻了认为妨碍了它的、在自家自留地解手的新媳妇。干部坏了山里规矩，引发众怒，终招杀身之祸。干部死了。火铳打的。身上挖出小半碗铁沙。

农村宰猪喜庆，拾掇干部那天，知青点没有快乐。天阴着。

语 录

队长一句“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引知青嗤嗤小笑。再一句“把敌人打得象老奶尿尿稀哩哗啦”，哄堂大笑，传统教育会便毁了。鸡屎（知识——当地口音）青年欺我农村无人？队长恨恨，决定“以夷制夷”，瞎瞎便担负了对知青再教育的重任。此人眼瞎一只，干活不成，嘴巴了得，常以语录新词唬人，凑效，故尔也被村人归入鸡屎青年。有知青不服，又拿“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语录说事，队长磕了烟锅，按瞎瞎教的说：那是毛主席教育我们，你们是他老人家交给我们教育，辈分要弄清。得，事没说成，倒成了孙子。

但知青们很快热爱了瞎瞎的教育，因为瞎瞎不负重任激情满怀囫圇吞枣创造性地演绎联想排列组合，使教育会成了文娱生活极度匮乏日子里的味精。

某日雨，出工不成。队长不失时机地展开教育，知青雀跃。瞎瞎又在左胸补丁处别三只没有钢笔的笔帽以示慎重，银亮亮地闪耀着知识的光辉。他面色严肃，手举半个被丢弃的洋芋，煞有介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他独眼眨巴着，忘词了。到底是瞎瞎，顺口就编：是其他生产队。知青起哄：那不关我们队的事。瞎瞎正义在胸面不改色不为所动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一抓就灵新动向群众眼睛雪亮雪亮，备战备荒民兵胜利之本之本，吃草根树皮水深火热革命先烈打江山打江山，资产阶级丢洋芋丢洋芋，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就背叛修正主义我们不答应不答应，坦白从宽贫下中农金猴奋起千钧棒苍山如海血流成河……会场热烈非常，知青前仰后合热泪横流。有知青嚷嚷：别的队贪污浪费，我们不能，瞎瞎你就代表全队革命群众把它吃了！瞎瞎大喝：不须放屁！会场肃静。瞎瞎环视，满意所达到之效果，遂补充：毛主席教导我们。

教育效果达到，队长扬扬烟锅：天不早了，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绣花纳鞋底。散了散了。有男知青叫唤：我们不会绣花纳鞋底。队长不屑，撇嘴：还鸡屎青年呢。是男社员请客吃饭，女社员绣花纳鞋底。众皆哗然，队长进步了，估计也是瞎瞎教的。

屁 事

屁，不雅。这人身之气本与饱嗝无二，却因出处不同而“出身”迥异。人食五谷焉有不行屁事之理？骂之不雅而放之又放，虚伪。而屁话，尤辱斯文。放得却说不得，州官放得火百姓点不得灯？然知青打油：屁乃五谷气，肚里溜出去，放屁爽气，闻屁丧气。早反上了梁山。快哉！

春荒。阴雨。饥寒。为保热量而躺倒。想前途渺茫烦闷空虚，众知青眼望屋顶心事重重，寂静。应了“冷尿饿屁”的老话，肠鸣后便有喷薄欲望。可小心翼翼，反憋得声调怪异，丝丝缕缕绵绵不绝。终有男知青耐烦不得，掀开被窝冲天一怒，轰然酣畅。众效仿。偏牛圈改建的宿舍隔音极差，隔壁女生吃吃笑后还以颜色，亦不让须眉。一时间，不雅响动此起彼伏。此前少男少女尚羞谈这有声无形之物，此禁一开，不可收拾。有呼名唤姓以此相赠者；有举枪瞄准声型俱备者；有冲吉它听余音回声者……。更有甚者，竟以手捉之于鼾者鼻前释放，令呼噜骤停以解鼾声困扰难眠之苦。少年不识愁滋味。笑闹中，竟也暂忘了境困心烦。

山民自称应天府人氏，古风犹存。许是久居边地，风俗变异：同性间偶有这不雅响动尚祥装未闻，异性间则更不可造次。然知青不明究里，闹便闹了，谁晓会因屁惹祸？

知青户这日偏偏主食红豆，产气。出工挑粪，一壮硕村姑持粪瓢专司装粪。这男知青近前时，忽感腹胀难耐，然面对异性，一忍再忍。待粪桶装满挑担上肩起身用力，忍无可忍，如雷贯耳。其声之巨，惊落村姑手中粪瓢。悲剧发生。只见那村姑面色由红转青，捂脸掉头就跑。该知青愧疚，却不当事，挑担吱呀而去。地头，知青起哄没心没肺，闻讯而来的队长问明缘由脸色大变，狂吼“赶紧找人！”众人方知事态严重，忙向村寨山崖树林河沟人仰马翻鸡飞狗跳地几路狂奔而去……。声断气绝哭昏在地的村姑在河边大竹林里找到。村人终日出没于她家开导劝慰，知青登门道歉被泪水泼出，山民皆冷眼相对。事件由小队而大队而公社，知青户连日震荡着干部的咆哮。晕头涨脑的知青渐晓：此举山民视为大辱。按旧时规矩，据女方意愿，事主或娶该女，或赔钱财。队长说，新社会，不兴。人家也看不上你个麻杆，赔工分吧。知青诺诺：赔赔，他的不够就扣我们的。想那干瘦知青若娶壮硕村姑，身形1：2尚显不足，欲笑，却不敢。

此后一段时日，村童见知青，必蹈足击臀而歌：小知青——乱打（放）屁——恶（音：务）俗！是够恶够俗的。知青皆勾头滴水蔫败屁臭心虚气短无人敢应。屁，不可乱打！是为教训。

打 赌

知青吃饭使锅，Φ22cm的铝制品。一次盛够，省却回头添那不知还有没有的饭。包谷饭泡以“玻璃汤”，忙望嘴里塞，没注意脚下，栽倒，锅扣于地。拾锅，骇然，伏地不动，审视眼前赫然矗立的、托土坯那样扣在地上呈完

美圆柱体的饭。猜测那瘪腹里的胃，如何容纳这若大一坨？口洞无底，胃壑难填。山民均晓，若无充分之物质与心理准备，与知青相遇切不可“饭否”问候，一矣黏上，心绞痛。

胸无大志啊！十六、七岁的人，吃字当头，与豚无异。一说吃，便眼放绿光，因而，以吃打赌寻常事，形式各异，蔚为大观——生理反射类：入厕就餐、粪桶捞罐头；胃容量类：灌凉水；体罚类：倒立、俯卧撑、金鸡独立……其中体罚类非高能量食物而不赌，如肉食。一知青探家返回，携干面条二斤。眼馋，起哄，遂以100工分赌之，“一气喝成”。即：喝而不嚼。挑战者为减体积半熟即食，矣最后一口下咽，张嘴喘气口不能合。庄家不甘，命其闭嘴。乃闭。却不料饱嗝袭来，面条自鼻孔汹涌喷射……。100工分啊！捶胸顿足。

狗街有食馆，名“狗街食馆”。防碗丢失，每碗均烧有馆名简称：“狗食”。“狗食”有油水荤腥，对囊中羞涩又常年哽噎杂粮的知青来说，最实惠的，是门口蒸笼里的呛面馒头！细粮。顺溜解馋养胃。不知谁赌输，众人不远十里奔“狗食”而来。十个大馒头喧腾白暂香味扑鼻勾人食欲，便又有赌：立地独食。赌资：购馒头的钱和粮票。众人坐望赌者，是为监督。食至一半，腰带全放。卖馒头老者见状相劝，称呛面馒头“发”，恐撑着。不理。食之剩三，速度减慢。老者惊慌，阻拦，赌者推之。其踮脚尖以后跟墩地，期颠实胃中之物扩容，续食。其时已食之勉强，腰身犟直。众劝其放弃，并声言不予索赔。那老者已目瞪口呆，泥塑一般。最后一个，众人抢夺，未遂。赌者腮帮圆鼓却不能咀嚼，面色发青，眼珠暴凸，便伸手要水。此时，老者自失措的众人身后冲出，声泪俱下：千万不能喝水呀娃娃，要胀死人的！替家里的爹妈想想啊，钱粮我都不要了！赌者眼神疑虑，老者忙将钱粮取来，一松劲，鹅蛋大一坨自其口中匍然落地，脖子一伸，又一坨、又一坨……。老者连呼有救。

????国营食堂，钱粮是要付的。别过老者，回村。山路上，寂静无声，只闻喘息和脚步噤噤。一知青猛抬头狂喊：狗日的馒头——！暮色苍茫的山间，远远近近地荡起一阵回声。

狗 冢

同为沦落命，惺惺相惜，其被女知青带回时，肮脏邋遢。乍见男知青的冷脸，张皇，益发委琐。吃食匮乏，平空添口，男知青不满。只因不知饱足的胃比女生耗粮，嘴短，眼见其入而发作不得。经女知青们一番洗涮，再露面，其瓜子脸白净，大眼睛波光流溢，尤其小腰，一拧就出了风情，两声怯怯招呼，令人怜惜。女的？遂以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主角名字相予：花妮。

毕竟苦出身，花妮勤谨。上山下地看家值夜鞍前马后任劳任怨，颇招女生喜欢。与男知青之距离，是冬雪天猎回一野兔后拉近的。烟屁股劲大，穷知青命大。又臭又硬的德行花妮仿效，遇赠与，漠然接受，挑逗，概不买帐；对自家人迎来送往谦恭有加；有知青往来，任穿着破烂仍极尽礼数；若遇当地恶少心怀不轨的覬覦，那大眼睛射出

机警凌厉足以令其却步。断顿，知青举户回城打秋风。月余而归，花妮瘦骨嶙峋身负数伤守望于门，院内秋毫无犯。近前，花妮摇尾哽咽，幽怨眼里落两粒清泪，众人眼烫。

花妮命薄。知青出工，那执掌知青命运的权势者目空一切强闯知青户，花妮拦阻不成遂裂其腿肚，任狂踢乱踹仍不松口。傍晚，围着几近踩扁的花妮，女生垂泪，男生黯然。花妮死了，埋于自留地。是夜，无话。

翌日，男知青全体称病在家。迟暮时分，女知青收工，闻得荤香扑鼻，猜那几个臭小子定是发了不义财。相视一笑并无多话。此乃规矩：吃得说不得。那是个寡得拍个苍蝇都想送嘴里嚼咕的年月。洗涮毕，围住炖肉盆即开扫。筷勺翻飞口舌吧嗒惟不闻人声，食至半途方觉肉味。那女知青狐疑，起身出门，返回即哭，男生低头，女知青们恍悟，掷箸而泣。少倾，一男知青跳起，犹带悲声：花妮昨晚托梦要做最后贡献，岂能辜负？再说身体乃革命本钱，没本钱还扎屁根干屁的革命呀！抽泣未平。男知青循循诱导：古有衣冠墓，花妮的头和骨以皮裹之筑冢寄托我们的哀思。仍泣。男知青端盆怒道：那我倒了去！拦下。毕竟荤腥难得，经年而不遇，遂边吃边哭诉：那次在山里崴了脚不是花妮回来拽你们我早喂狼了……云云。哭诉声中，汤毕肉尽。

冢不大，半米来高，墓前木牌上书：花妮之墓。与花妮同类比，史无前例。风光。

数十年后知青返乡，冢已荡然。原址上，那女知青喃喃：那次在山里崴了脚不是花妮回来拽你们我早喂狼了……众皆默然。

旷野，有风声呜咽掠过。

神 医

那年月书是没有好生念过的，转着圈地学工学农学军，都弄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该男生入“红医班”，跟解放军医疗队“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巡回过，插队后将破挎包漆个十字，装些药物器具随身携带，神圣了，任谁都不能动。再让电影《红雨》“一根银针治百病，贫下中农人人夸”一煽呼，便痴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被翻成破扇，到处搜偏方。出言必称经络，抓草必呼妙药，见人就说有病。看这个的舌苔，翻那个的眼皮，无论男女是只手扯来便摸脉。别和他提医，否则他“望闻问切阴阳五行”地能烦得你撞墙。

干活歇稍，一知青由他号脉，待他渐入佳境，抽手以趴在身边打盹的大黄狗之前腿替之，兀自吸烟去了。他只说别动，并未睁眼，随后呼吸均匀涎水长流，竟眯着了。队长干活哨声一响，他一机灵即回归角色，说：有病！那知青老远冲他嚷：你才有病。哄笑。

农村缺医少药，山民求治。其感责任重大，须实践。知青除上红汞碘酒或开心逗乐，敢把自己交他收拾？他就收拾自己。某日大伙回来，惊呆：其鼻歪眼斜，咿咿唔唔，手脚抽搐——他用银针把自己扎成个刺猬。众人施救，其缓过来，胯下已精湿臊臭。近年读《知青启示录》里有“医痴”将自己肚子拉开割盲肠。此“医痴”，彼亦“医

痴”，异曲而同工。

骄阳似火。赶集，路遇老头以手撑地，表情难受。他两眼放光，趋前打问，知其恶心。忙扶于树荫，取银针，命老汉以掌置膝，照虎口一针扎下，边捻边打量老汉。老汉许是中暑，荫凉和针刺令其松活，聊起来，说拉稀吃烧大蒜，奇效。对脾气，嘴聊手捻滔滔不绝。回过神来，忙问：有无针感？老汉不知何为针感，解释：酸麻胀。老汉急呼：有有有，早想说的，不光手酸麻胀，腿也酸麻胀。低头看去，惊一身冷汗：那针已穿透虎口扎入大腿，忙拔针。老汉起身活动手脚，面呈惊异，称奇，说膝盖疼几天了，没想到治恶心把腿给弄好了。

“神医！”该知青名声大噪，惊动公社，遂送医训班，发给红药箱，当“赤脚医生”。

此后，该知青就真象电影红雨那样“出诊翻千重岭，采药攀万丈岩”，终日神游山里。可知青们一说神医都笑，说：真神，神癫癫，是够神的。再后来，“贫下中农人人夸”的他被推荐上学，学兽医。知青们送他时都情真意切地说，只要不医人，我们就放心了。

因果

“师曰：老天下雪不下水，雪落地上化成水，由雪变水多麻烦，不如直接就下水。生答：老师吃饭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屎，由饭变屎多麻烦，不如直接就吃屎。”一开饭，该男生必谈五谷轮回之物，有好吃的时候尤如此，保留节目。除寻开心外，实则期待人因恶心不食而多吃多占。有女知青斥其：吃屎的嘴！其不恼，指饭菜说：我们都用嘴间接吃屎。知其别有用心，怎奈拳击死猪，奈何不得，其乐此不疲连连得手。事皆有度，久蹲茅厕不觉臭，疲了。其故伎重演，众充耳不闻，至多笑骂：缺德鬼遭报应！

风顺雨沛太阳好，赶山季节。女知青拾得蘑菇，烹之。挨晚，该男知青腹空，不待收工便偷偷溜号。进门闻得山珍之味，涎水咕涌。蹑至伙房，腆脸陪笑。知其来意，女知青警告：少在这转，等大伙回来。无机可乘，悻悻回屋。然香味毕竟关不住，丝丝屡屡挥之不去，心痒猫抓，腹内饥火愈盛。鬼使神差，晃悠出门，待发觉自己身在伙房时，手里多了一盛饭物什。凑近锅台，谄笑道：给点吃的。女知青以锅铲唬之：吃屎！其借势发挥，笑答：可能。如便后以草擦拭，漏，指染，本能一甩，指头砸墙，疼，条件反射，以嘴嘬之……女知青以锅铲怒拍其项背，其缩头耸肩飞速伸手至锅中一舀，溜之大吉。

收工。知青们进院，见女知青惊慌无措立于院中，男宿舍砰啪乱响伴以粗重喘息和怪异喊叫，似有惨烈搏斗。冲入，宿舍一片狼籍，该男生不知如何上得房梁，其精神亢奋两眼放光口吐白沫端一根锄把作英勇搏斗状，俨然《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众愕然，问其故，女知青说缘由，一知青大叫：蘑菇没煮熟，中毒了！即奔去寻赤脚医

生。知青们一涌而上将其勒住。赤脚医生至，急呼催吐！闻讯之乡邻早已携带给牛灌药的竹管、粪桶等一应物什，拥那叫“牛医生”的放牛老汉奔来。平日稀松老汉，此时如将军发号施令，命勒好中毒者，以水稀释鲜牛粪，竹筒盛之欲灌。知青阻止，疑问。老汉圆睁双目怒喝：救命要紧！知青半疑半信讪讪而退，眼见两竹筒青黑稀牛粪汨汨灌下，该知青随即吐个倒海翻江……

深夜，该知青魂魄渐归，四顾。众人始长喘一口气。一放松，便有吃吃笑声，问何故？云：我说他是吃屎的嘛。说屎者吃，此乃因果。众乐翻。

三 醉

烟茶酒，嘴里走，天下头，怕个球。旱烟烤茶老酒在嘴里过一遭，心畅了，气顺了，天宽地阔。再起身，赳赳山汉，艰辛世事皆“怕个球！”此乃老天赐予山民润泽锈涩日月的宝物。山民待客亦如此。客入，让于火塘上首，递铜头玉嘴烟锅，一袋烟后，心定神安；颠起烤茶罐焦香弥漫，酹茶汤入口，心旷神怡；哗唧唧酒碗排开，包谷酒香，就心醉神迷了。

烟茶酒“未成年不宜”。当知青却是无论年龄一夜成人。三醉，是成人的洗礼，是那片土地代知青的父母为知青行的成人礼。

听得唢呐响，趑去，婚宴丧饭，便吃，礼却拿不出。有白眼，视若不见。豪“螃蟹哥，八只脚……”酒歌醺醺。举碗齐眉，仰脖，亮碗，落三滴，罚！热闹，主家高兴。宴毕，一路歪斜。乡间数年，酒喝无数，包括赤脚医生的酒精。那十五岁还尿床的小知青，喝必醉，醉必喊妈妈……醉乃经常。怕的感觉缘自酒房遭遇，厉害了。那次讨水，烤酒师傅在热气蒸腾的酒房睡得不知今夕何年。喝空水罐，便有发现：酒甄上有塞住的竹管，拔开，液体温热。尝，香而不辣，嘴接之，你来我往。“好酒不打头”，未感醉。悄然溜之，出门数十步，凉风袭，忽觉踩波踏浪，山倒树歪，遂地复天翻……一干人醒于次日夜，其间消耗酸菜老汤两坛，浓茶一桶。此后一段，不谈酒。是为一醉。

弹尽粮绝。全体倒立，无硬币滚出，五分一包的“经济烟”亦成奢望。是夜，打火把撅腩遍寻小院，得烟屁数棵，内有二角七一包的“金沙江”，好烟屁！山民吸旱烟，射烟痰，表情若仙。神往，求吸，山民慨允。卷棕黑“兰花烟”塞于烟锅，含玉烟嘴凑火，装得老练。头两口未过喉，辛辣劲烈口水狂涌，便明白山民为何抽烟射口水，便也射。山民吸旱烟过嘴不过喉，“放屁烟”是也。知青不晓，猛吸几口过喉入肺，肺灼。一呛，口水吞下，胃灼。此时想装老练亦不能：肺憋胃翻，心脏狂跳，眼飞金蝇，一头冷汗，手脚冰凉，就地栽倒。知青装老练，山民不知情，内疚，将知青背回，趴大锅沸水四周狂吞水蒸汽，曰：“吃汽汗水”。数日后，头晕干呕心慌症状渐消。此为二醉。

山民待客以烤茶。小茶罐烤于火塘，冒青烟，茶一捧放入，沙沙颠动。少倾，焦香，不枯不生，水入罐，“嗤”一声，罐溢，吹下，再溢再吹，连续三次，称“三漚”，颇考火候。茶罐置于热灰煨沸，取小盅盛之。只见牛眼小盅内汤色棕黑，其酳似能扯丝，奇香。喝烤茶讲究：闻其香令口舌生津，后以唇舌沾之咂摸其妙。客套聊天说话，以白水“换口”，再尝。此茶以品为主，可知青牛饮为常，不晓其妙，只想这主家小气，此一盅半口不到，何以解渴？然茶香诱人，一饮而尽。主家尚期客人夸赞，见状色变：不是嫌茶不好就是寻事来了。忙续之。干杯！再续。再干！如此喝法，结果可想。凡喝者均糙肠寡肚眼花手抖虚汗阵阵，清口水长流不止，持续一周方解。其乃三醉。

酒醉二，烟醉三，茶醉五天手脚瘫。多年后得知，都是乙醇、尼古丁和茶啡碱给闹的。此一闹，却让我们更深地走入山里人家，懂了规矩，体味了乡情与文化，成人了。

三醉啊！无有三醉，算不得一条山里汉子。

回 家

白雪衬映，运煤的简易公路黑蛇般逶迤。死蛇！年关近，车少，搭知青的更少，搭男知青者尤少。路那端，家的温暖、城市的气息、父母的眺望……归心切，难言喻。搭车难！那次送负伤男知青至路边，手挥断，车不停。后男生匿，女生招呼。闻刹车，男生出，伤者推送驾驶室，好话说尽，方允。然距城几里，伤者被借故甩下，可怜其满身血污蹒跚步行。终误医时，落残。

天黑了。翻山越岭而至，苦守一天行之不得，焦躁。“回家过年”的念头执拗，惟此无它。一跺脚，走！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年轻气盛，便走。毕竟回家乃快事，话便多：鸟司机！日后我当司机专拉知青。专拉女知青吧？笑。说笑渐行渐稀，至无声。饥生寒，寒助饥，愈演愈烈。饿，如木片刮胃。寂静中有无力嘟囔：求你们谁，有屎屙泡热的我吃。回应是噤噤踏雪声。走得迷糊，忽闻狗吠，惊而后喜，趋前求乞，得冷包谷饭一挎包，分食。再走，回家！

翻过大垭口，至国道。车灯扫过雪雾，拦之不停。老办法：扒！于大坡等候，车再至，趁其减速，奔后厢！傻眼：后厢板挂满刺藜。鸟司机早有防备。心一横，据路而坐，逼停一车，众欢呼起身，那司机一脚油门，车擦身驰过。几番拦车不成，发狠，以石断路。一拉煤拖斗车停，众一拥而上，各自于粉煤堆上蹬坑蹲踞。车行，舒气，风如刀，呛回。把身体缩至最小体积，挎包捂脸，防尘防冻。煤粉掩身，反觉暖和。

天亮，互视，人皆半埋于煤粉，与煤同黑，没有嬉笑。至城郊大路，无往日兴奋，依旧迷糊。车进城，一知青忽觉不对，起身，大叫：要把我们拉哪里？众人抬头眺望，遥见公安局大门，慌乱，猛敲驾驶室棚，不停。一知青

脱衣趴于驾驶室顶，手一顺，蒙了挡风玻璃，车急刹，惯性使那知青前滚于车鼻再滚落车前，不动。司机忙下车，众人随之。近前，那知青睁眼问：都下了？听答复肯定，起身便走……

城里清晨的大街突现一群行走僵硬、满身乌黑的面目不明者，行人讶异，侧目绕行。内心徒生逆反，索性横行高歌：

沐浴灿烂阳光，胸怀远大理想，

我们革命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心向党……。

嘶嚎发泄中，有泪，肮脏黢黑的脸上开两条白道，煞是醒目。

傍晚，城市街巷声传居委会大妈的通知：年关将近，知青回城；各家各户，管好家人；防火防盗，看好家门……。

过年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qz.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灭虱

“三同”，即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逢一满身虱子的老知青被推荐上学，公社不失时机开展教育现身说法：“红与专”不仅“滚一身泥巴”塞一肚杂粮，“同住”是关键。言下之意：不长虱子不革命。若要“红”，虱子拱。头皮发麻。有传说，那知青是专门向农民讨要了虱子饲养于身实现的革命化。一笑了之，未在意。然而，想不革命都不行了。知青去公社受教育，队里派根红可靠之老贫农看家。该老贫农稀罕知青被窝“恁个白”，享用之。从此，知青便与老贫农之虱的后代子孙，展开了坚苦卓绝的持久战。

生虱，烦腻，时有不恭之辞，一“踢左脚”之女知青以“革命虫”为之正名。有捣蛋男生捉“虫”趁其不察而赠，“革命火种”星火燎原，该女知青终入“革命队伍”，同仇敌忾了。痒！不可耐，手忙脚乱，顾此失彼，随时伸手抓挠于衣裤内。形态不端庄倒也罢了，可这虱子吃人还羞人，不时爬出领口招摇于脖颈，令颜面尽失。愤怒！采取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剿之：六六粉、敌敌畏、算子……衣物搓洗暴晒、水里溺、雪里冻，用火烤尤解恨，听虱落火中噼啪作响，大快人心。可野火烧不尽啊！遍施酷刑，虱生生不息剿而不灭，人虱相持。

虱喜热，遇热蠢蠢欲动，此乃最佳灭虱时机。冬晴日，墙角地头男女老少烤太阳打灭虱人民战争。自清门户的，协作相帮的，一派动人景象。有捕获，比大小，辨公母。掐之，暴一声响，胜利豪情油然而生；咬之，也暴一声响，恨恨：你吃我我也吃你！酣畅。更有彻底革命者，索性脱衣铺地暴晒，虱与虱蛋暴露于光天化日下，猛抖。再一声断子绝孙切齿，顺衣缝毗拉刮去，便有晶亮虱蛋垒积指甲壳，灿然。魏晋先人“扪虱而谈”那叫风流，而此时我们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噼啪声此起彼伏，既享受冬日阳光和征服快意，又混了工分讲究了卫生，乐陶陶。

这乐趣城里人享受不到就深恶痛绝。家长均晓知青身上豢养有微型动物无数，至家门而拒入，撵往澡堂，衣物浇以沸水，漂一层……不痒了，手没了抓挠，不习惯。返回乡里，再痒，又不适应。抚身上新创旧痕，涌满腔新仇旧恨，奋起决战！非斩尽杀绝而后快，寄生虫们的末日到了。被褥蚊帐鞋袜连皮带都烫之于沸水，床铺家具地板墙角连板壁皆喷撒以农药，灭虱之战终以知青彻底之胜利而告终。

他日，再见农人们捉虱其乐融融，知青怅然，竟感失落了。

县汇演，本公社落第，挨批。引不喜文艺的书记重视，取经便晓：启用知青！宣传队吐故纳新，本地青年遂成少数，内心郁闷。知青自视甚高，往日看公社宣传队演戏，一派鸟状，只为取乐。得知遇，受宠若惊，为“政治任务”殚精竭虑赶排节目。月余，书记审查，众人卖力。“东风吹，战鼓擂……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一番歌舞，感觉良好，静候指示。书记意见有三：一为劲道差，“战鼓擂”而不闻鼓声，轻歌曼舞没有革命气势。二为女知青腰太细，皮带扎成一乍，非膀大腰圆如何“一定胜利”？其三，既为贫下中农服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听不懂，应以当地话“前四盖热门一定射累”为准。并指示本地队员示范。憋一肚子气的本地青年焕发冲天干劲，舞姿铿锵，地板咚咚，确有“战鼓擂”的动静。当唱到“前四盖热门一定射累”时，众知青鸟状欲露，拼命严肃，辛苦了得。才不坚持真理呢。谁不愿在这里流“香汗”而去地里流臭汗？再说，书记掌管知青前途，当然坚决贯彻书记指示！知青们思想通，干劲冲。排练，汗流浹背，跳得竟比本地青年还劲道了。书记满意，但他没料想，矫枉过正啊！这帮娃娃没事还找事呢，不然怎么说知青难收拾？

赴县演出在即，书记提出“演习”，以木板搭台于收割完毕的田坝。夜至，山民闻讯早早收工而来，坝子上黑压压人声鼎沸。大汽灯煞白，舞台雪亮，书记国际国内本省本县本公社一片大好的形势报告后，浓眉大眼膀阔腰圆的演员李逵似地登场，演出开始。很劲道的歌舞声中，台下山民指指戳戳评价争论，谁谁腰粗是好劳力，谁谁膀肥是块好“地”，谁谁的咪咪饿不着小娃……。而意见最统一的是：干这活是很出力，记十个工分不亏。知青们除腰衬棉垫化妆夸张外，相约在“东风吹，战鼓擂”节目时全体奋力跺脚，贯彻书记指示便有了故意的成分。报幕毕，伴随跺脚，“鼓”声隆隆，“东风吹，战鼓擂……”气势夺人。舞至高潮，乐队起立，台前台后咣咣跺脚，舞台尘土飞扬，此情此景感染观众，均以“嘿咗嘿咗”加油，气壮山河。书记笑得灿烂，这般劳动态度这般劲道，何愁好评？感慨：一抓就灵啊！

该节目结尾是以重复口号与劲道十足的动作结束的，此时舞台上下同呼“一定射累！一定射累！”全场跺脚，惊天动地震耳欲聋，谁还能听得见舞台发出的痛苦呻吟？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只听得一阵忽隆喀嚓劈啪巨响，灰尘弥漫，柱歪台垮坍了去，现场一片狼籍。黑暗里滚作一团的演员中，竟闻被努力压抑着的吃吃偷笑……

近年，见小孩们跳什么“劲舞”，张牙舞爪咣当咣当的，不屑：就这？早年咱们就玩过了的。

“只要能回城，扫街掏粪都干！”这狠话，知青说者甚众，没说过也想过。每至秋季，招兵、招工、招生传言飞扬，人耳竖得比狗耳直。一个名额，引无数绿光荧荧的眼睛。知青八仙过海各找门路：有权势者、有能力施惠者、劳动表现佼佼者……。无门路者众多，不甘认命，便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自然千奇百怪。有自残卖身付惨重代价离开的；有扬言烧房而猪圈失火走运的；有作恶一方令山民送瘟神的；有砸锅卖铁买手表贿赂，待上班后再状告受贿者收回手表的……。多了，其惨烈、无奈和下作，无趣可言，不提。拣趣者道来。

该知青体弱，好不至先进积极，坏不至生疮流脓，头一拨，走了知青里的好恶两极，他没份，郁闷，便一头插进被窝。数日出来，其发如鸟窝，眼珠翻白，念叨不休。神经了？众开导，其怒：你才神经！某日，其眼冒精光忽复常态，自此天黑即出，于无人之际发怪异之声，夜阑方归。众知青盼第二批招工，各想心事，不搭理。时逢鬼节“七月半”将至，村中闻鬼哭，有说是“鬼索债”。村边烤烟房的值夜老倌无论给多高的工分也不干了，人们夜至不再串门，关门闭户准备纸钱柏香。“七月半”黄昏，家家备好浆饭，供奉于柴灰木炭画在路边墙角的圈内，焚香烧钱。村内青烟缭绕，景物竟飘渺了。天黑尽，怕惊了来取供奉的鬼们，连狗都关了，全无了往日喂牲口家畜时的狗吠牛鸣，村子了无声息。

月上东山，岚气初升，景物朦胧。村内月光幽幽，香火点点，静谧，气氛诡谲了。蓦地，一无分头脸之物出现，于岚气香烟中飘荡而来，在队长靠满包谷草的墙脚伏下。少倾，妖声渐起，时弱时强。其音渺渺，阴风惨惨，令人毛发耸立。咿咿唔唔中，队长先人姓名依次报来，无遗漏。屋里有女人捂嘴惊呼，队长声音颤抖：先人有话就讲。呜……哇……欠债啦，咿……哟……有招工就赶快把XXX送走，消灾免祸，嘘……唔……。此时有风袭来，包谷草簌簌发响，满地纸灰打旋，黑影忽听身后传沉重响动，遂感脖颈有热气喷来，味如坟草。惊悸，猛回头，牛头马面……脑际闪过这个词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失踪一夜的他于黎明时分被同宿舍知青找到，其与嚼包谷草的大黑牛同卧，气若游丝。

该知青如愿以偿。据说队长亲自游说于公社，递烟陪笑，铺陈该知青动人事迹，动情处，声泪俱下，差不多要下跪了。知青们做梦也没想到，装神弄鬼也成门路，皆摇头，苦笑。

荤腥

几个知青于河埂出恭，起身发楞：那排泄物晶莹剔透点缀些红椒，煞是好看。不记得吃了多久的煮洋芋佐以烤干椒蘸盐，制造出这般模样的粪，干了就是白粉末，风吹就了无踪迹。卫生了，肥效谈不上。那初中小男生冲上粪堆朝天而跪，双手高举状若鸡爪，嘶喊：想吃肉啊——！唉，缺荤腥，肠子寡淡如肥皂洗过，竟活得连做造粪机都不合格了。

细想，那年月还是有荤腥。非正常渠道：鸡猪狗猫马牛羊；正常渠道：鹊鸦鸟蛇獾兔虫。鸡是钓的，以饵相

诱，鸡上钩挣而不叫，收之，都会。狗是打的，火铳锄把，也有偷吃猪食的狗被罩于槽内以大锅开水烫毙。鱼是炸的，民兵来查炸药，枪竟被拆了。牲畜病死，山民埋了，夜里刨出就烤。吃猪是邻社知青相邀，谁想他们竟自活猪屁股硬剜一块肉来招待客人……。非正常猎荤行动非常事，正常行动又扛枪不遇鸟可遇不可求。以稀有荤腥应付锈迹斑斑的肠子，实在是杯水车薪。

去公社交烟叶返回，日头偏西，饿。到路旁村子打听知青屋，趑去，屋里没人。按惯例，无论认识否，只要是知青，吃便是。主人若不在，吃了留个条子就行。几人急慌慌于甄子里撬冷饭时，不经意间发现一瓶猪油，大喜，以筷子挑了就吃。那叫一个过瘾啊！每一毛孔都舒展着流淌出幸福来。那知青收工回来，是个女的。见这几个小子冷饭冷油正幸福得无以名状，呆立门口，便流下眼泪。几个大小伙面面相觑，后悔，光想吃，没注意屋子摆设有性别差异，知道是女生也不至于非吃那油不可呀。嗫嚅着道歉，那女知青抽泣不语，益发尴尬，羞愧难当。良久，女知青平静，道：我们怎么就落到这一步了！叹罢，以开水涮了油瓶里的剩余内容煮菜……。饭后，几人劈柴挑水楔锄头磨镰刀卖力表现，天黑才踏上回村的路。后来知道，这丫头老爸被监督劳动，身份“黑”，招工什么的根本轮不着她。路上，几人内心歉疚，约定，无论谁先招工出去，头月工资必须买猪油还人家，以弥补良心亏欠。月亮作证，击掌为誓，庄之严之，很男人。

那小子幸运，先得到招工表，几人在送他时都不言语，只拿眼睛看定他。他毛了，嚷嚷：不就是头一月工资买猪油吗？我连买俩月！小子们笑了，挥手作别。那时学工工资18.2元，猪油是带来了，可听说那小子连做了俩月讨口要饭的叫花子。后来，这几个男生凡离开农村者，都没忘了给那女知青稍干肉腌肉还有油，直到她离开农村。友谊就此延续了下去。

近年聚会，见人惊异他们几十年的友谊，几人笑称：我们之间经历过急风暴雨考验的同志加兄弟的革命的友谊，是猪油凝成的！

老黑

老黑，优良品种，来自省城。牛！牛气冲天，目中无人。若不为爱情，老黑才不来这鸡鸣三省山旮旯呢。初来，老黑分在公社良种站。异性闻讯至，只要愿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简单！可老黑就矜持，任谁不理。可那天见队里拉车的小母牛，魔怔了，闯破藩篱将良种站的人扯一路筋斗跟了来，良种站没法，留队里。优良品种，有户籍的，金贵。村民敬畏。

老黑特立独行，满村晃悠，吃队上的草，喝挑水村民桶里的水，霸道。那知青也犟，挑水偏不让老黑喝，老黑跟来，知青怒，返身出门劈脸就尿。哈，老黑眯眼咂吧，惬意！自此，日日来候。队长正愁白养牲口，见状开窍：

都是上面派来的，都犟，让他们同犟，纵有差池，也非队里之过。那知青放牛了，赶老黑相好一干牛等上山，并不理老黑，老黑怏怏跟之。出村，老黑好强，挤开打头牛，获牛铃及尿水奖赏。知青暗喜，得寸进尺，便想牛背横笛，老黑耸臀低头，知青自牛脖滑下，裤勾于角，牛头一仰，那知青裤子被脱，于牛角飘扬。

老黑天生领导。晨出暮归，铃响牛随，自寻食自归圈。老黑在，牛不散，省心。山间水草丰润处，牛群皆争，顶架，胜者牧之，乃规矩。老黑常胜，有功！打斗之伤该知青悉心料理，不失时机地饲以尿水，老黑投桃报李，允骑。该知青曾受其辱，内心耿耿，将老黑套以耕具，耙田。老黑漠然，待那知青上耙，猛挣，耙翻，耙齿勾裤脚，人翻。老黑漫游稀泥，对泥中翻滚的知青叫骂充耳不闻，直至那知青裤子又被脱下，方止步于田埂，啃青草。

老黑的牛儿子能撒欢了。是夜有盗牛贼，窃老黑不成，便看上黑之妇孺，黑力拒，贼调虎离山，且战且退，遂隐。黑返回，圈空，遂奔知青屋，狂哐。知青闻声凄厉，情知有变，提扁担。见知青出，老黑拔腿先去……知青赶到时，战斗已毕：一贼肋断倒地；一贼被牛角叉双腋顶于土埂。二贼被绑送公社，以“盗窃耕牛破坏生产”罪逮捕。嗣后，老黑对那知青俯首帖耳，耕田耙地无所不能，可就不让旁人使唤。队长曾让那知青带老黑到地头，又让其回村背粪。少倾，见老黑奔回，耕具残骸一路散落。知青遂成专业驭手。人牛情深。

两年后，老黑忽于月黑风高夜断了腿，废了。公社来人看过，准予屠宰。队长怯怯告之守候老黑垂泪不已的知青，那知青让等，乃去。待其归，伸手让老黑舔，那手里是攥了盐的。此时，老黑突淌两行浊泪，知青嚎啕，遁去……

此案最终无果。后闻，邻省有劳教释放分子被挑了脚筋，跛了。谁知道呢？不关心。

夜 盲

突然地，就都看不见了。天擦黑，明白听见门外村民脚步、钩担吱呀和孩童嬉闹，任大睁眼睛，就是漆黑莫辨。摸索点油灯，围坐昏黄光晕，惶恐。山民说得了“鸡蒙眼”。鸡没有夜视能力，人如何得这毛病？连续吃干腌菜汤泡包谷饭，口唇生疮牙床溃烂。知青是“有知识的青年”，很快找到原因：缺叶绿素吧？那得吃蔬菜呀。于是后悔不迭。

山势陡峭，山村地少，知青没划自留地。村民良善，以菜相赠。无地，吃之坦然。数月，村民为知青无地鸣不平。迫于舆论，队上将河滩地划与。此地卵石密布，雨季淹，洪水冲，不可耕。队里也无奈啊。知青未知生活多舛，笑闹欢呼，借夯土工具，要椽子木板。队长不解，但鉴于知青体恤，解其舆论压力，允之。翌日，知青盘地，社员出工。待收工回来，村人愕然——半个篮球场赫然河滩。没心没肺的小子们耍得欢实，引一群孩童喧哗。

有地没菜了。村民不送了。该自己种的。但球场毕竟是脱离父母后建成的首件作品，知青陶然，未有感觉。后来活路重，累半死，球场人迹渐稀；又后来篮球被割开，补了破解放鞋；再后来发了洪水，河滩地复归原样；再再

后来就“鸡蒙眼”了。

原因明了，遂求重新划地，队长面若苦瓜，知青不忍，徒返。之后，轮值女生见收工男知青变出青菜，惊呼：偷——。男知青嘘：难听！君子不耻。此乃“丰收舞”是也。偷便偷，还“舞”之，化腐朽为神奇了。这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插曲《丰收舞》的创作者，闻此不知何感想？陋行冠以雅号，少了心理障碍，普及推广，终至女知青。收工，该女顺菜瓜，闻人声，情急掀衣藏之，捧腹与村民擦肩，紧张发抖。身后议论：象是怀上了？该女木然驱动双腿回来，脸色煞白表情呆滞，众招呼，其醒，一个抖战，手松瓜落碎于地，大恸。

“舞”者出没，舞之蹈之，村民不堪，呼声再起：给知青划地。不想知青“舞”得顺了，坚辞不要。村民默然。此后知青晨出，门口不时可见一捆蔬菜、一小箩菌子……。涕零。

辞典：夜盲症——由缺乏维生素A导致视网膜视紫质减少所致。需食富含维A之动物内脏。这类食物在当年无异于珍馐，想吃而不得啊！

但“鸡蒙眼”是好了的，怎么好的？不晓。反正与蔬菜无关。

汗颜。还“有知识的青年”呢，噫！

站 长

山中有条铁轨，铁轨旁有个小站，小站有老站长，老站长总说“购票上车”、“验票出站”。

晨至，火把将尽时，小站就在那山间了。静谧。露湿黛绿，叶落晶莹，滴答有声，似有回音。晨雾牛奶样漫漶，浮起站房，淹没月台和手拿信号旗的老站长的半截身子。那是幅令心归复安详的画。脚步骤缓，露浸泥染的脚不再恣纵。画，就印在了脑海。

若非封山，小站乃出山首选。票是不买的。一天十分，分值五厘。辛苦一年，反欠粮钱。窝火。有钱也不买！老站长眼望虚无地说：购票上车。知青嚷：人民铁路为人民，人民坐车不要票！彼此心照不宣见惯不惊。车至，有知青自前车跳下奔后厢上车，矫健。知车上查票，奔车后部。知青都逃票。上车人少就占厕所，爬天棚，钻座位。人多就于某站“换乘”已查过的车厢。展转腾挪，险况叠出，每次都把老站长惊得直叫：悠点，看摔着！

逛省城，就一说，便走。一夜山路，饿。一知青提来大网兜，热气蒸腾。说：老站长给的。他候车时寻煮洋芋香味摸进站长室，抓一个倒着手吹，见站长进门，讪讪。站长问：都一起的？点头。一大锅洋芋便倒进了网兜。

返乡。依然逃票。谁想查票提前。发车后见餐车那头骤乱，忙涌往前车厢，于前方站“换乘”。那偷站长洋芋的知青正卷缩于昏晃梦周公，被擒。众知青跳下前车奔后车时，见那垂头丧气的知青被交到站上。为保全多数，顾

不上他。运气丑，放屁也砸脚跟。众知青一上后车便全部落网。餐车，男知青摘军帽拍于桌子，称全身就这最值钱，看着办；女知青哭啼，大诉悲情。车长教育后，轮着念语录，直到小站灰白的建筑在山间出现。

出站口，老站长照例念叨“出站验票”，拦下蔫败屁臭的知青问：还有一个呢？不语，站长色变，厉声喝问，遂答。老站长丢下众人，电话联系，那边告之：那小子逃了。

夜半，又一趟车至，那脱逃的知青见无乘客，混不上车。遂钻过列车另一面，却门门紧锁。听发车铃响，情急，将瘦小身子塞入车门盖板下那四级台阶狭小的空间。列车疾驰，风如刀，切割暴露的肌肤。风呛，气短，呼吸艰难。身体热量被无情搜刮，渐僵。该知青遂感严重，忙以军用挎包带自缚，听任头顶盖板处漏下的污水小便淋漓一身……每秒都难熬。渐渐，身体居然不冷了，反觉舒适异常，瞌睡袭来。该知青警觉，咬牙瞪眼，喊：“要活！”他知道没喊出来，他喊不出来了，但他意识到必须这样做，他一直在这样不停地“喊”。

老站长第一次违犯路规：在站内及前方无任何异常的情况下使用了禁行信号。他将那知青从那狭窄空间“抠”出来时，那团身体竟掰展不开……。

许多年后那知青回来，小站只停客混短途车了。还是那个站台，还是那座站房，数十年风雨剥蚀，小站老态龙钟。一座新站正于不远山坳处建设，传阵阵机械轰鸣。让过那些匆匆的山民，缓缓走向出站口。还是那句“验票出站。”他递上车票，眼前幻化出老站长那永无表情的脸。他想说：老站长，这次我是买了票的。可脖子硬了，眼泪夺眶而出……。

对 子

人穷年穷联不穷。一联一年那！过春节，新桃换旧符，驱邪避晦期盼希冀就都在这联里了。景况任差，对子不能少。知青刚到时，曾见画黑圈的红条纸贴于门框，不解，后得知，那是以小碗描圈充门联的。对联公社是有卖的，对于十个工分才五分钱的山里人来说，爬山过河在其次，可那值好几个鸡蛋呀。既有知青，求之便是。自冬月杀猪到腊月的冬闲里，乡人携红纸带仨俩鸡蛋一把毛烟甚至几两黄豆就陆续找来。写春联，对于值守知青点百无聊赖的知青来说，有吃喝，有润笔，有村姑崇敬和被大人撵来观摩“书法”的细娃，物质精神双丰收，提劲！搬桌子，拉架势，扼腕运气，大字报水平的毛笔字舞将起来。如此，方圆几里的村子，便都有了知青“鬼画桃符”的作品，顺带培养了“知体”书法传人（几十年后回去还见那些字的错误写法，愧疚）。

知青一肚子语录毛诗，懂啥联不联的。秋后有村人娶马家姑娘，求婚联，硬给写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横批还“全无敌”。可好，那马家女子夜半叫声绵延半月，队长说是对子写的。什么事啊！

久了，知青还是积了些新老对子的，可山民为表达意愿，让改动联中字词，为常。

娶马家媳妇的新郎又来，说上次婚联太猛，让弄点悠缓的。知青收“等外烟”而欣然命笔：“人欢马叫学大寨，纲举目张赶昔阳”，谁想冬闲的新郎干劲冲天，夜夜不空。村人笑骂：真真人欢哩马叫哩，欢实。

打趣中，年味浓了。

有不谐：疤脸到，人避让。文盲疤脸，性恶，曾为进城造反司令，“结合”进大队班子，老说省里县里有干爹若干。村人又怕又恨。其擎一精心揭下的老联横蛮拍于桌，命写。其做派，知青不爽，冷眼。其施故技：以前途出路要挟。知青瞅那联：天增日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老联，喜庆。疤脸说他老娘翻年大寿，要这联改字，联中必得有“娘”。知青眼珠转，乐。从命。将上联“人”改为“娘”，告成，村人亦为知青松口气，皆大欢喜。可一夜间，疤脸门联下联的“福”，被一张写了“爹”字的红纸片覆盖，这联便成了“天增日月娘增寿 春满乾坤爹满门”。纸片粘得不露痕迹，以至于众人皆乐，唯一人不晓。直至村中细娃童谣似地齐声反复诵读：娘增寿，爹满门……爹满门。疤脸方醒，怒揭“爹”字，大骂三天。

人穷年穷联不穷啊，那个春节过得乐呵，家家都在笑。

填 表

公社带话，让等通讯员。山那边的知青也叫去背春荒借走的粮食。这阴湿天谁愿出门？便猜拳。锤子剪子布！赢了。爬上知青户前田坝里的大草垛，有些幸灾乐祸地目送那背运的伙伴过河。几番雨后，秋寒日甚。那三条呈十字交汇的清澈小河，平日皆踏石而过，此时浊流齐腰。那知青涉过河，登上裤子招招手，便没入缭绕于半山的雾气。暮秋，草枯叶败红土裸露，旷野稀疏矗立些草垛，大路了无人迹，有野狗惶惶而过，风中几声鸦噪。寒噤，鸡皮陡生。掉头看知青房，铅灰天幕下死寂如坟。无趣。草垛释放氤氲热度，草甜味醉人，恹倦，昏昏欲睡……忽闻暴响，见通讯员砸门，便骂。其急呼：招工表！心狂跳，一跃而下。通讯员交代：快找那小子填表，明天我带走。忙进屋将表埋进包谷面，拔腿就走！

入夜，两人别过邻社知青，返回。刚翻过山顶就摔了个天旋地转顺坡滚去，浑身钝痛。火把没了，夜黑如漆，听彼此喘息，却看不见。秋末山里能冻死人，只有走。没了方向，便顺山势而下。刺蒺藜条劈头盖脸扫挂，树桩石头绊人跟头连连，走的没有滚的多。身上精湿，扎了刺，到处火辣辣的疼。后只要感觉下坡，索性抱头滚去……人瘫软如泥了，待心跳平缓，便感寒冷浸骨。忽闻哗哗水响，寻声摸去。这山沟河对岸一溜几个寨子，随便进个寨子就行。河里的泥沙枯枝冲刷撞击，腰腿伤口疼痛难忍，呼痛的嚎叫自牙缝迸出。踉跄上岸，跌跌爬爬行不远，又有河，疑惑：该是田坝了呀！不可能回头，咬牙再过……热量散失，相互拉扯的手如僵蛇缠绕，浑身抖索抑制不住，

颓然而倒，几口泥汤呛入，人便顺水飘去。晕呼中撞上树干，本能地一把抱住：他们被冲到了岸边。一人挣扎上岸，伸手拉水中人，不起，说水里暖和。岸上人抖颤着哭喊：起来填招工表啊——。

上岸的他们一头撞上了个草垛，二人用最后的力气撕扯着钻了进去……

次日午，二人醒，抬头，傻眼：知青房就在面前。回望，一溜连滚带爬的痕迹绕三条河的十字交汇点划一个巨大的弧。他们连过两条河，又从上游被冲到了家门口。颤颤起身，两人衣服仅余些布条，身上血糊漓拉伤痕累累。两人发愣，猛醒，大叫：“填表！”。

通讯员恐怕早走了。不敢耽搁，扒点剩饭就直奔公社。夜半敲开门，灯光下，两人青紫肿胀渗血的脸令书记大惊。顾不得解释，递招工表。书记说招工的半月后才来。二人说：那通讯员……书记笑：他在上一个大队喝醉了。

悻悻而出，翻入公社会议室蜷缩一隅，无言。少倾，黑暗中劲暴一声：我——操——！

情 书

牛屎还真收到了情书？！男知青翻地，绰号“小青瓜”的小女生找来，把叠成燕形的纸条给他：冷姐给你的。其得意，挥纸条，挤眉弄眼。全体沮丧：不仅为每人输掉一包烟，还应验了鲜花与牛屎之关系问题。“小青瓜”见状，茫然。

牛屎其实不差。长胡子了，肩宽了，肉鼓了，喉结骨碌，很男性了。行为也有异：搽“百雀灵”了，挤青春痘了，使镜子了，讲卫生了，帮女生干活了。山民说得透彻：小公鸡开叫了！公鸡斜翅膀蹬脚围母鸡转的样子，巨流氓。尚存男女界限残余的知青耻笑，牛屎轻蔑：小青屁股娃娃。那还没长开的小女生对其“不同”表示疑问时，其刚吐出“小青……”便想起性别，话到嘴边改成了“小青瓜”。还真恰如其分，遂成绰号。其傲然宣称：月内必得“冷美人”芳心，情书为证！众唱：鲜花（那个）插在那牛屎上呀。其曰：牛屎富含营养，正合适！想那冷姓女知青矜持得跟她的姓氏一样，牛屎竟异想天开，均愿以烟打赌。

牛屎的攻坚堪称火力强劲。从帮厨砍柴挑水一直地里的活计，一帮到底。吃过晚饭找个茬就跑女宿舍：写信问字借书找针心得笔记主义信念远大理想还有上海奶糖炒黄豆烤洋芋……非半夜而不归，那执著，啧啧。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堡垒就是这样攻破的！牛屎还真收到情书了。在知青点这是头一份！其激动难耐，翻地就心不在焉，一会就溜了号，众人知道，他消受情书去了。情书，对于小青头们来说，神秘了，新奇了，撩人了。收工就往宿舍赶，一路发誓，坚决抢来观摩学习。其实不用抢，众人进屋就感觉不对劲：牛屎垂头枯坐，一包“等外烟”抽得云遮雾罩，只半天工夫，嘴唇生了一圈燎泡。众愕然，打问，牛屎将头往床上一偏——情书就摊在床

上。围观，抬头，眼神交换，有人鬼脸，随即大笑倒地。那“情书”字体劲健力透纸背，尤其那三个惊叹号下的点，都被戳成三个大洞。可见情绪之激动——

“女生宿舍晚八点后拒绝男同志来访！！！”

呜呼，牛屎的、也是本知青点开天辟地的第一份情书哟。众乐毕，忽觉不妥，遂安慰：这就是情书，烟你还是赢得了。乱中，无人察觉“小青瓜”何时摸来，她手捧“情书”眼望虚空作沉思状，口中傻呵呵地喃喃：是了，爱情了！刚直起腰的人们遂再次栽倒。

牛屎上到底没插了鲜花，种了小青瓜，成一家了。大伙说牛屎种瓜得豆。小青瓜嗔：瓜豆何指？忙摆手，当然你是瓜。牛屎道：还小青瓜呢，都老倭瓜了。话音未落，拳如雨……

打 食

打食——山里话中打柴打鞋打野物之众多“打”中之一打。意为：淘生活糊口。非“打”而不得食。蛮荒意味犹存。物竞天择啊，也是正道。

地瘦田薄产量低，上公粮上余粮又是“爱国粮”、“卫生粮”等鸟号召，粮袋瘪了。不打食帮衬，难熬。知青乃纯粹的无产者。无房无地无生存必须的经验技能物资储备和家族后盾，抵御饥谨能力明显低于原住民。打猎，没那手艺；赶山，只能捡漏食；跳“丰收舞”，满目青苗；钓鸡，山民对“鸡屁股银行”盯得紧……这“打食”就奇异了。

知青浪子，识得“人解凉，狗断肠”的中药马钱子，捣碎裹饵诱狗食下，便至河埂候之。少时，干渴难奈的狗窜来，狂饮，旋即腹胀如鼓，哼唧展转。浪子笑指：倒！便倒。使孩童报其主，山民不食瘟，况死狗，施与浪子。得逞。不想来了“打狗运动”，狗绝，此法休矣。再想辙：于晒场把学生时的少年长拳、广播体操逐一演练，半大小子们敬畏，拜师。浪子啃鸡腿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武德”教育，欣任教头，安享供奉。不想学了广播体操的徒儿以“冲拳运动”招摇乡里，终惹麻烦。某日，浪子酒酣，醉眼迷离，有人寻其“切磋”，架不住徒儿怂恿，接招。待清醒，发觉自己漂荡于清水茅坑，徒儿们“轰”的散了。失了供奉的浪子又有发现：木匠为嫁姑娘娶媳妇的人家做箱子，仅以红墨水涂染，便集水墨汁乃至红汞碘酒各色染料绘极其恶俗之图案，竟得青睐，遂成漆匠。然嫁姑娘娶媳妇并非常事，漆匠所得那点吃食挡不住粮袋日浅。

数着包谷籽度日的滋味，难过。终于，浪子以令淳朴山民目瞪口呆的“打食”手段，成为了他们暗自认可的“人物”。

大队头头坚持不要返销粮，并不对社员肚子负责。浪子终于开始吃“百家饭”，挨家挨户，一路吃去，不重复。浪子始终不承认是要饭，自不需行头道具。一矣人家饭上桌，进门抄碗舀了就吃，并不理会人家说得有多难听。

浪子自有理论：不是我要来，是毛主席派我来，当然吃“派饭”。要饭有理。霸气！连吃几家清汤寡水的菜糊糊后，浪子打住。街天，浪子破军衣以烂草绳扎着，没了后跟的解放鞋如拖鞋趿着，大号搪瓷碗钢盔似地顶着，一根棍子腰刀那样夹着，歪斜于公社大门柱革委会牌子上，似笑非笑盯着出入者，并不言语。这很捣毁形象。不成体统。他被注意了，赶而不走，被“请”进去，后来又打着饱嗝送出来……。再后来，公社通知去拉返销粮，浪子在公社的言行被披露，说他威胁：若不给返销粮，他将进城以此形象展现于县革委、省革委大门。

犯上。在这山旮旯里，算大事了。于山民来说，是大好事；于头头们来说，是大坏事。惟浪子没事，依旧悠然于乡间。

妙论

缪知青有这本事，正经说辞到他嘴里皆非驴非马讲成相声，尚能脸无表情直面轰笑。公社知青会，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其发言：滚泥巴抹牛屎磨茧子养虱子把自己培养成真枪实弹的农民老倌。众暴笑，主任气极，拍案怒斥：妙论！都晓应为“谬论”，众知青却以坏笑附和：妙论！他很妙论！“妙论”乃成绰号。就妙论吧，又没说错什么。妙论一脸无辜。笑中，并无人品味其内在含义。妙论之谬论之精妙，后来才为知青们所认知。

知青慰问团将至，公社重视，主任现场动员。知青从山上田间零散而来，大队部笑声就此起彼伏。笑薅地男生鱼网似的背心、笑翻粮女生老太样的头巾、笑背煤的黑、笑耙田的灰。妙论腋夹牛鞭斜挎粪兜，黑绿粪液顺屁股流了半身，臭气熏天轰轰烈烈地来了。文书要提粪兜出去，他不让，说这是工分，出门就成村童的了。笑声如浪。妙论不满：笑什么？世界观大粪臭五谷香滚泥巴抹牛屎要真枪实弹！眼见有人笑瘫，主任脸色变绿。他没了长篇大论的心思，言简意赅：一、慰问团来，知青都要当面表态扎根农村并与慰问团种“扎根树”以示决心；二、要体现知识青年风貌，不准穿瘦裤脚等奇装异服。看看你们，简直是一群……。妙论严肃接上：革命接班人！主任一摔袖子，走了。

主任走了，知青愁了。当着各级组织正式表态永远呆在农村？难！那时的娃娃还没练就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的硬功，非此即彼的选择，真真愁白少年头。惟妙论无愁，上山下地吃饭睡觉。众奇，探询。妙论说，到时候他先发言，谁也别抢。再不多言。

慰问团来，集体种“扎根树”的创举自是头项内容。慰问团非生身父母，却都是知青家长。河埂上，老父母们握锄的手抖了，知青们接过来，卖力栽树。开会，讲话致辞一番热闹后，知青表态。众看妙论，其半梦半醒。会场一静，就都明白了。降温！便都装了迷糊。一时间，静若真空。这“表态”令主席台的尴尬非常，慰问团的互递眼

神心照不宣。主任坐不住，欲言。此时妙论开口：愿做革命螺丝钉，拧在农村就扎根。一旦工业战线、城市建设、保卫祖国需要，就把我起出来，我不惜头颅热血挺身而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革命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革命青年听党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真正妙论！知青据此创造发展发言踊跃，慰问团报以阵阵掌声……

只一夜，“扎根树”成了拔根树，顺水东流去。公社欲追查，慰问团顾左右言他，登车绝尘而去。后听说，此后慰问团所到之处，皆先与知青促膝谈心，循循善诱，知青的大会发言就如出一辙，遂成经典。

妙论，高人那！

首 长

首长在部队官至班长，回村便称班首长。朝鲜战场的功臣当了民兵营长，该叫营首长了。可叫顺了，还叫班首长，班首长总在纠正，不厌其烦。

民兵集训，知青要求编一个班，班首长略想，允。这下，在学校学军到部队训练过的小子们风头出尽：队列，把民兵眼睛看直；劈刺，灵巧迅捷；障碍，玩似的；瞄准，一说一套唬得班首长发楞。好兵！班首长得意于自己的决策。仅数日，知青班就没了正形，睡懒觉串知青户，就等打实弹过枪瘾呢。集合，他们出列就叫班首长！声之怪诞惹一片笑；夜访，班首长的老驳壳枪被拆，弹簧蹦了一找大半夜；让他们教练队列差的民兵，待班首长检阅，却是全体左手左脚地一顺边。班首长怒问，答：我们也让他们给带一顺了。有老姬告状：看操练看得我孙子都不能好好走路了。班首长眼冒金星。

知青班的鬼脑壳们，为班首长之爱之恨。其军事技术好，定能在县民兵比武中挣足面子；其洋相百出，影响军纪还有本首长威信。思忖，定要杀其嚣张气焰。

县武装部长到了。毕竟事关本地荣誉，又有实弹射击之诱惑，知青班立时严整。班首长满意：关键时刻不稀松。果然，所有科目令领导们频频称许，班首长乐得皱纹扎堆黄牙毕现。集合讲评，班首长宣布：请领导观摩演习——抓特务！武装部领导惊喜，鼓掌。这得一个班扮特务。民兵们不愿意，惟知青班报名。不出所料：鬼脑壳们巴不得。班首长一阵目标方位的，知青明白了，就那秃山包，草都没几棵，如何藏人？不好玩！班首长瞪眼：军中无戏言，服从命令！知青对视，眼珠转，乃去。班首长诡笑。日落，紧急集合，几百人密密麻麻围去，这阵势，连苍蝇也休想逃出包围，“特务”在没有隐蔽的秃山包被擒，无悬念。班首长没去，他设一大堂，等小子们被捆进队部。看你们狂！他手抚惊堂木挺胸拔背威严于桌后想象审讯场景，很过瘾。起风，马灯摇曳，班首长抬头，几条影子悄声窜来将他按住。定睛，竟是“特务”们。他们二话没有，麻利塞嘴捆绑。然后桌子上就摆了烧包谷烤洋芋干蚕豆和酒，小子们嬉笑：抓特务咱打小就玩，要玩就玩真的。你不喊，就优待俘虏，喝酒。抓特务的让特务抓了。班首长恼怒，却也暗自感慨这几个鬼的脑壳。无奈，点头。几个人围桌子喂班首长吃喝起来。

班首长就醉了。他靠凳子上嘟囔：你们几个鬼脑壳哟……好兵哟……在朝鲜要是带着你们……。他突然眼泪纵横哽咽了，叫着大牛三狗那样很土的名字。断续述说中，知青们知晓，班首长那一个班都躺在了朝鲜。知青们肃穆，起立，静默。稍许，他们头一次在非正式的场合发自内心地叫了班首长一声：营长！

军 臭

军臭，绿色胶鞋，解放鞋是也。其：一为军用品，二因脚汗与微生物相互滋养散发臭鱼烂虾刺鼻气味直冲不幸嗅者脑门令其恶心作呕呈有害气体中毒状，故尔得名。

军臭自穿上就没有过刷洗的记录，算懒吧。可水里泥里粪里的，天天洗也洗烂了。过河若有闲心偶尔也命各脚趾抠蹭摩擦，鞋口黑色泥水突突外冒，色淡了，便算洗过。鞋臭，尤其刚脱的时候，本天经地义，习惯一会就不觉臭了。不想知青点那小女子少见多怪，被军臭呛一口，如遭奇耻大辱。那天收工，累，话都懒得讲，鞋一蹬就瘫倒在床。那小女子轮值做饭，大呼小叫要我们吃饭，见没人理会，便气急败坏奔来，却象被使了定身法似的突然止步，屏了呼吸，面色发青，眼睛翻白。旋即捂鼻扭身狂奔而出，被门槛一绊，人便横着射了出去……。对我们的恶毒诽谤就随这悲剧的发生开始了。

略举一二。说我们一脱鞋，宿舍就升腾一片蓝雾，苍蝇蚊子纷纷望下栽，老鼠争先恐后向门外奔，还没翻过门槛就趴那里呕吐。说我们在河里洗脚，下游的鱼儿漂了一河面，全中了毒。说我们把鞋放在打盹的队长脸前，队长因此昏厥一天，鼻斜嘴歪一周不能理政……。有这大威力？那蚊子臭虫不照样叮我们一身红包、老鼠把我们的军臭都咬了洞。说近朱者赤，没说近臭者吃呀。就这样，出名了，山风带着这些动人的故事在乌蒙山区传来传去，所到之处，笑声如浪。我们名声大了，真真顶风臭十里！

其实这算什么，户里最小的知青，将狗骑于胯下，以军臭强捂狗鼻，呛得那狗喷嚏连连，涕泪狂流，后见军臭就躲。刚下乡还没改了穿袜子的习惯，军臭里的袜子裹着脚汗泥极黏糊，刚抽出时可以粘蚊蝇；干硬了就比赛谁的袜子能耸立于不倒。一次那哥们脱袜一甩，竟粘在墙上，众笑。夜半闹鼠，来去于头脸，烦！这哥们顺手摸一棍子挥去，鼠惨叫。点灯，他攥着的是那粘在墙上后干硬的袜子。以袜毙鼠，够威够力。

军臭后来破了，被老鼠咬了洞，当时感觉挺透气的；后来帆布帮子成了绉绉，就用麻绳捆着穿；再后来只剩了胶质的鞋尖和鞋底，成了拖鞋；最后鞋底拦腰折了，我们也习惯于赤脚了。那年冬天，我们的脚全都开了血口子，尤其脚跟老茧最硬最厚的地方，像小孩嘴，疼得钻心。我们学着老乡，拿胶泥填塞那些口子。

返城后，老茧渐褪，某日洗脚，忽见盆底有泥，那糊裂口的胶泥包在肉皮里竟然那么些年！感叹。在网络上偶见《消失了的词语》一文，有一词条：解放鞋——自2003年5月1日新型作训鞋装备部队，伴随我军官兵50多年并风

靡民用市场的解放鞋淡出。解放鞋的时代过去了，那个崇尚革命和艰苦朴素的时代。

哦，永别了，军臭！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春天刮着风，

秋天下着雨，

春风秋雨，

多少往事随风逝去……

照片上这个长满野草荒芜一片的院子，曾经是木楼五个青年队中最气派的大院，乍看上去，颇有北京大四合院的风范，只是更大些而已。当年的院子中间还经常停着队里的东方红拖拉机，显得生气勃勃。我高中毕业下乡前，曾和几个同学到木楼考察，试图选一个好一点的青年队。一来到西里，马上就被院中的拖拉机以及当时是整整齐齐的大院吸引住了。二话没说，回学校就在志愿书上填了西里。那曾想到了西里才知道，这是全公社最落后的一个青年队，不过好在还有个拖拉机作安慰。一年后，当我成了队里的女拖拉机手和车长，几度下决心要改变西里的落后面貌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甜酸苦辣。然而我从未后悔过选择了西里，也从未后悔过我在这里度过的一段知青生涯。

井台其实故事多

照片前方这排房子，我们下乡时并没有。那里原有一排排的钻天白杨和院里唯一的水井。沁阳水浅，挖开地皮一米多深就能见水。所谓水井，也就是一个深点的坑加上砖砌的井沿而已。井在男生宿舍前面，而男生宿舍离厕所较远，所以大家都觉得井水不太干净，尽管掏了很多次井，吃的水仍要从村里的吃水井挑来。井水冬暖夏凉，女生们常在井边洗头洗衣服。这时，男生们就会过来帮着从井里往外提水，然后顺手递件衣服给女生让帮着洗洗。慢慢的这种随机帮忙逐渐演变成了固定的互助。谁帮谁打水，谁帮谁洗衣服都有了一定之规，颇有点一帮一，一对红的味道，并由此衍生出许多故事。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我在西里的三年里，几乎从来没有帮任何一个男生洗过衣服。因为当时我特别讨厌洗衣服洗碗这种事

情，宁愿从井里往外提水。所以我经常和同宿舍的女生合作，和她们一起洗衣服。只是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井台洗衣服时，一个刚刚摔坏手的男生端着衣服走过来洗，我看看井边没有其他女生，又无法逃走，只好硬着头皮向这个男生伸出援手，帮他把衣服洗了。记得那件衣服下水后又厚又硬，非常难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院里原来还有另一口井在大门附近，那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坑。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突然从井边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大家跑出来找了半天，才发现队里最胖的女知青奎娥正在那深水坑里挣扎，真不知她是怎么进去的。大家忍着笑好不容易把她弄了出来，后来就把这口井给填了。

哪些才是“玉米棒”

秋天时院子里总是堆满了各种各样收获来的果实，其中最多的是挂满墙上和树上的一串串金黄的玉米穗。等到玉米干透后，劳动一天后的知青们又多了一件事：剥玉米。于是晚饭后大家围成一圈，中间堆着待剥的玉米，随着剥出来的玉米越来越多，圈子越来越小，什么时候剥完了，大家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剥玉米一般是用已剥去了玉米粒的玉米芯在另一个玉米上搓，开始时大家总是兴致勃勃，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然而时间一长，一天的劳累悄悄袭来，说笑声渐渐低沉，个个变得昏昏欲睡。

一天晚上，正当大家似睡非睡，仍机械地向最后一点玉米进攻时，突然听到“老头”余龙智的一声大叫“我的脚！”所有的人都睁开了眼睛望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老头”的脚在月光下看上去和玉米棒差不多，不知谁睡眼朦胧抓起来就使劲搓了几把。给“老头”一搅和，大家的瞌睡全没了，剩下的一点玉米也就很快剥完了。

谁是西里“球星”

大院中间有一个篮球场，照片上那个破损的篮球架还依稀可见当年的风光。晚饭时分，往往是球场上最热闹的地方。爱打球和会打球的男生在球场上龙腾虎跃，女生们则端着饭碗坐在场外，一边吃饭一边指指点点。每逢这时，球打得好的男生就会格外卖劲，从而赢来场外一片喝采声和闪烁的目光，这让不会打球的男生颇觉得英雄气短。记得球打得最好的是二李，李海清和李亚军；二流水平的好象有阎保成，孙宏庆，任怀庆，张二元等。球打得好的人可以时不时地到公社篮球队集训，即有好伙食又不用下地干活，让不会打球的男生很是羡慕不已。女生中会打球的人不多，印象中也就果齐鸣和我能投个篮或跑个三步什么的，其他人似乎连球都拿不稳。

我比较爱好的运动是用网把双方人马隔开的运动，象排球和乒乓球，后来又添了个网球。据其他女生评论在这几项球类里我能算是男子组的中上水平，有些男生为此很不服气。不过大家还是承认，我和阎保成组成的乒乓球双打在西里几乎是所向无敌。保成罹患癌症已经去世，我也就再没有机会和他一起“重铸辉煌”了。

他们依然很年轻

篮球场东边的草地上，印象中还有一些单杠双杠以及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一天傍晚，大家被院中的阵阵嘈杂声和口号声惊动，纷纷跑了出来。只见院子里有七个男生排成一行，高举着拳头，新剃的光头正热腾腾的冒着气，嘴里还阵阵有词地念着什么。原来哥儿几个正在进行剃头宣誓，誓言内容大致为：为了将来能更好得完成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任，从现在起，他们要坚持早上锻炼身体，决不再睡懒觉。最后以一段节奏激昂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作为结束。看着“七兄弟”严肃的模样，我们几个女生强忍着没敢笑出声，有人不小心“嗤”了一声，也被旁人愤怒的目光吓得咽回去了后面的声音。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七兄弟”不知上哪儿跑了一圈儿回来，然后就在单双杠上腾飞翻滚起来，七个汗水淋淋的青皮光头在阳光下上下飞舞，烁烁闪光，煞是好看。这一动人的景色持续了两三天，晨练的队伍便销声匿迹了。球场边的青草也越长越高，萋萋野草最后把那些单杠双杠都淹没了，只剩下不知谁的破袜子依然搭在上面隐约可见。这几个男生当时住在同一宿舍，记得有李亚军，阎伶俐，阎保成，任胜利，段建成，张勇和魏茂林。正当他们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一次几乎把他们送入死神怀抱的“煤气中毒”让他们再也无法坚持剃头时的“宣言”。“小舜”段建成还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终因无钱医治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七兄弟”如今只剩下五人。

当我用平淡的口气谈论我那些早逝的知青伙伴时，我其实心里很难过，我常常看到朋友们笑着向我走来，依然是那样年轻，依然是那样充满活力。

人人都有一首歌

虽然是下乡，但由于是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同学同在一个青年队，感觉上和仍在学校差别并不大。只是同学变成了同

伴，上课变成了上工，下课后各自回家变成了收工后一起回大院。原来是好朋友的仍是好朋友；原来不熟悉的，在这里变得熟悉；原来就熟悉的，在这里变得更熟悉。既然是年轻人在一起，文娱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吹吹弹弹，拉拉唱唱。当时院子里最流行的乐器是口琴，几乎人手一个。我就是那时学会了吹口琴，开始吹一些象“北风吹”、“东方红”一类简单的曲子，后来就可以熟练地吹出一些较复杂的曲子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是很多人的口琴练习曲。只要每首新歌一出来，马上就会有人找来歌词和歌谱。如是好听的歌，院子里就会听到处有人哼唱。豫剧《朝阳沟》中有很多知青们喜欢的段子，记得队里有个傻小子一天到晚扯着嗓子唱“我的心比那冰棍还凉”，据说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可到了我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记得李亚军最爱唱的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还有一个和这首歌有关的故事。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哼这首歌的第二段，当他唱道“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时，坐在他边上的一个青年女子瞪了他一眼。他又接着唱道“悄悄望着我不声响”，那女子气得拂袖而去。李亚军爱侃，这故事当时我们听着也就是半信半疑。我那时特别相信报纸上的话，曾犹豫豫地问过他这首歌是不是批判歌曲。他对我不屑一顾地嗤了一下鼻子，说了一句粗话，大意是说我小学生一个啥也不懂。

“老头”余龙智最拿手的是样板戏，八个样板戏背得滚瓜烂熟，每一出都能从头唱到尾，饰演各种角色且不用看稿子。“老头”特沉醉于这种表演艺术，逮着个人三句话一投机他就会唱起来。可惜的是嗓子不太好，刚听时还有点新鲜感，时间一长就有点受折磨的感觉。后来一发现他有表演的欲望，就连忙找个借口溜掉，实在不行也只好闭着眼睛受一会儿罪。有一次公社开知青代表大会，代表们发完言后主持会议的公社李书记让大伙儿出个节目娱乐一下，东里青年队的一个代表就建议让余龙智唱一段样板戏。我们西里的代表赶紧向他呲牙咧嘴使眼色，不过已来不及了。“老头”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台，可逮着一个好机会！这家伙把他最心爱的《杜鹃山》从“家住安源”开始唱起，一会儿是“柯湘”一会儿又是“雷刚”大有不过把瘾决不下台之势。后来其他几个青年队的代表也看出苗头不对，趁他换气间歇时一起使劲鼓起掌来，希望他就此打住我们好散会。谁知“老头”越发兴起，掌声一停，他深吸了两口气说了声：“还有”，接着又唱了起来，真让大家哭笑不得。那天为听“老头”的《杜鹃山》，我们差点儿连公社的会餐都没赶上。没办法，推广样板戏的积极性还是要鼓励的嘛。

你是否还记得

逢年过节，知青们还会排练一些节目，大院就成了排练场。记得一年公社汇演，我们一心想拿上个名次，很卖力地排练了一台节目，希望公社汇演完能参加县里的汇演。节目里有三句半，大意是批林批孔的；有口琴合奏、样板戏清唱等，

最后是一个压轴节目，即大型表演唱。结果到底还是被东里青年队的节目给比了下去。东里有个张兰琴，读书时就颇有节目编导才能，我们也只好甘拜下风，破灭了进城的梦。当时表演唱所选的歌名我已不记得，好像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歌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首歌：

“塞北的狂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膀；我们的一生，要写下新时代的春秋；我们的奋斗，让世界改变了模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五七道路多么宽广。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在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为了表现这首歌的意境，我们曾绞尽脑汁地为其设计表演动作。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动作是唱第一句时，要挺直腰并把胳膊举在眼睛前，作出狂风再大也不怕的姿势。现在想想，很觉得幼稚可笑又可爱。当年唱这首歌时，颇有点荡气回肠，壮士断腕的感觉。现在唱起它，仍觉得很亲切。不知道我的知青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它？

无言的“朋友”

院子的最东北角，是队里的牲口棚，有时我们也叫它马房。队里的几头牛和一匹从部队退役下来的马都放在这里喂养。晚上时分，棚内的灯光和牲口有节奏的咀嚼声会把知青们带到这里聚在一起聊天。马是一匹战马，干活不怎么样，却是很多男生的心爱之物，他们喜欢骑在马背上奔跑在田间小道上，一过驰骋疆场之瘾。一天下午，这马风驰电掣般地冲进了院门，没等大家看清楚怎么回事，它已经冲进了马房。再仔细一看，只见贺水平在门框上吊着。原来贺水平正在和战马练习骑马钻马肚和捡牛粪等高等骑术，忽然听到附近驻地部队的一阵军号声，这马大概以为是集合或吃饭之类的召唤，顾不得背上末流骑手惊慌的叫喊，扬起四蹄迅速奔回了“营房”，军令如山倒吗。若不是贺水平急中生智伸手抓住了门框，他今天也当不了焦作市“亿万大饭店”的副总裁了。

棚里还有几头耕牛，春种夏收样样离不了它们。牛不仅干活任劳任怨，还是有感情的动物。记得有一次一头牛得了“牛瘟”，无奈之中只好找人把它杀掉，当这头牛中刀倒下时，我们都看到旁边牛的眼睛中也流出了眼泪。这让平时满不在乎的男生们心软起来，赶快找来毛巾把它们眼睛蒙住。从此之后，我对这些不会说话的生命就有了一份尊重。说起牛，西里知青个个都忘不了一头金黄色的老犍牛。它力气很大，脾气又很温顺，每逢找不到男生帮我们推车发动拖拉机时，这头牛就成了我们最好的帮手。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趣事。我和燕琴成了青年队的拖拉机手之后，队里的几个男生很有些“酸葡萄”情结，经常讽刺我们的拖拉机是“推拉机”，要人推牛拉才能发动。不如卖了多买几头牛，大家驾着牛

车一起走社会主义阳关道。我那时爱车如命，虽明知这些话不能当真，还是一听就炸。男生人多嘴杂，吵来吵去我总是处在下风，恼羞成怒之余，只好拿出杀手锏，让“牛哥儿们”从此别坐我们的“推拉机”。过了几天，我在我的桌子上看到一篇署名“赶牛车的人”的短文。文中写到：

关于“牛车好还是拖拉机好”的问题，说起来也没什么好争的。不过看着神气十足的“车长”气得要哭，倒让我们暗自窃喜。你想你是队里的拖拉机手，酷爱你的“铁牛”，我们没有那个福分，难道就不能让我们“酷爱”一下憨厚老牛拉的车吗？其实牛车的好处你没有体验过，你也就没有那种赶牛的快乐感，给你讲一个老牛的故事，希望你也加入“牛车好”的队伍。

茂林和我常常赶着我们的老犍牛到三十里外的西万乡给队里换面，一路上要爬坡、过河、穿过城区。说来有趣，我们的这头牛有一个特点，回家的路记得特别清楚，一路上不管拐了多少弯，走过多少叉路口，它总是能按原路返回。它不但认路，而且还会躲避。走在路上，不管是前面有车或者是后边有车，只要喇叭一响，它就会自行将车拉到路边行走，如果遇到大车或者是其它车辆离我们的车太近而比较危险的话，它还会靠边停下来，等别的车过后再走。所以，每次回归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上车便倒头就睡或者尽情地胡吹神侃，从来不管路怎么走或者走到什么地方，任由老牛把我们拉回家。许多次都到家了我们还不知道，直到别人把我们叫醒，爬起来一看，老牛已把车安全地拉到牛屋门口。

咱们这头老犍牛还有一个秘密。在它的尾巴上方有一个穴位，只要用手按着这个穴位，老牛就会快跑起来，跑起来的速度绝不比咱们青年队那匹退役“战马”差。而且只要你不松手，即使它已累得口吐白沫，也会一直不停地跑下去，颇有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只是我们很心疼这头牛，很少动用这个秘密武器。

怎么样，“牛车”不比“铁牛”差吧？最起码有你享受不到那种轻松，你有的只是瞪大双眼、凝视前方，随时随地去处理险情的危机感。

下次你的“铁牛”消极怠工时，欢迎你来乘坐我们可爱的“牛车”。

看了这篇短文，我虽然没有投降到“牛车好”一边，倒也没再坚持原来的禁令。

悠悠岁月说当年

二十多年后，当我又一次来到这个大院时，我第一个想看的其实地方其实是当年我们亲手建立的一个小图书室，但我又很怕写它，怕写得不好破坏了它留给我的一份美好。图书室是位于大院最西北角的一间小房子，与队里的伙房成直角相邻，看上去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我曾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了我大学时代，撰写了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我曾到过亚洲之北的北京图书馆，在期间流连忘返；我也曾在斯坦福大学的迈耶图书馆和哈佛图书馆内，惊叹其藏书之丰富以及计算机查询系统之完善。然而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忘怀的却是西里青年队这个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小小图书室，是在那里点着油灯读书的日子。

我们的图书室很简陋，墙上挂着木制的报夹，夹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书架是由木板、砖头和窗格拼凑成的，上面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床板和长凳支成了读书桌，桌子四周放着长短不一的凳子，记得有一条凳子只有一条腿，还要靠在另外的凳子上才站得住。图书室的书不算多，找到本好书大家还得排队轮着看。尽管如此，这个小小的房间却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块绿地，它给我和朋友们在西里村的知青生活带来了一抹春色。每天开饭时及收工后，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年轻的歌声和笑声带走了一天的疲劳，也冲淡了对前途对未来的惆怅。读书看报的乐趣，填补了不少空虚的日子，同时带给了我们星星点点的希望。最令我们得意的是，这个小小的图书室还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农民和其它大队的知青，让我们这个几乎处处落后的青年队总算有一点光彩耀人之处。

图书室是当时青年队队委兼保管秦勇的杰作，他一直对此津津乐道，引以为豪，也让队里的其他知青和带队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说起这事儿，我还真有点不服气。本来吗，我是大家公认的书迷，就连在我们大院驻过的解放军某部干部战士都知道西里青年队的“车长”最喜欢看书，岗哨交接班的记录上我们宿舍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的。那时我每次出车路过公社和县城时都要到新华书店去租几本书看。记得一本书一天要一分钱，但由于我把书拿回来后，其他伙伴们也想看，所以一本书要在院子里转上一个月才能拿去还掉，租金就成了三毛钱了。要知道，队里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才一毛钱，看书却消耗掉了我的大部分工分。图书室建好后，县知青办为了表示支持，不禁捐赠了很多书给我们，还让公社和县里的新华书店免费向我们借书。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呢？当秦勇告诉我他的想法时，我心中很有点沮丧，白白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还把一个出风头的机会让给了这个小保管。不过想到有了图书室可以免费看到很多书，拨了一下小算盘，我也就

没和他计较这个荣誉该归谁的问题，还是高高兴兴地利用职务之便帮着他拉东西、找书、布置房间、跑知青办，忙得不亦乐乎，只是从此再也没有从“门缝里”看过他了。这小保管倒也通情达理，有了什么好书总能记得先给我留着，让我省去不少排队等书看的烦恼。

青年队的院子现在变了很多，图书室的那排房子已找不到，不知是被拆了还是划到了院外。无情的岁月！我站在可能是当年图书室的地方，一首《往事随风》的曲子在我心里久久地回响着。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看着眼前残旧的房子，仿佛还能听到有人在喊：今天轮到我看这本书了。不知我那些当年争书看的朋友，现在是否已拥有了自由的空间去读自己想读的书？不知我热爱的这块国土上是否从此不会再有任何一片文化沙漠？

祝愿人人都平安

在将结束这篇关于青年队大院的故事时，我突然想起了这里发生过的一件最悲惨的事，那就是拖拉机手王永的葬礼。王永因驾驶事故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这个大院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留在了西里，他就埋葬在木楼的土地上。出事的当天，他刚刚和东里的一个姑娘定了亲，怀着满心喜悦登上了驾驶座；出事的前一天，他还对我说要和我谈谈青年队的工作。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拖拉机手，一个普普通通的西里知青，但他却是他年迈父亲唯一的儿子。至今我都还能看到那天满目的白花和满目的黑纱，能听到满院子凄凄惨惨的哭声。每逢此时，我都想祝愿人人能一生平安。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课间休息啦！给大家讲个故事解闷儿。

我在内蒙和西藏生活各过五年，这十年的时光里我看到过很多奔跑在草原和雪山里的狐狸。每一回我都会被它们吸引，直到它们跑远。而每回看到它们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聊斋故事里那些美丽的狐狸精。你想，如果在广袤的雪原上，突然出现一个圆圆的毛球，它有着黑色的耳尖和粗粗的尾巴，你该是多么兴奋！那一年，我们一位知青不知道从哪里捡到了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狐狸，他却认定是小狼，就把它抱回了家，决定养大了它看看会是什么样的。没想到的是，那小家伙可真倔，给什么东西也不肯吃，闹开了绝食！你把一块肉放在它左边，它就把脸扭向右边。你再把右边也方块肉，它就索性将头高高地昂起，左右都不看。没几天，这小东西竟然或或地饿死了。

那年我回到离别了多年的草原，去探望过去插队的时候相濡以沫的牧民们。在一个叫做那敦木德的家里，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十分吃惊的事情：当年那敦木德是我们草原上最最彪悍的青年，他身高一米九几，常常骑一匹菊花青高头大马，手中的套马杆就象顶蒙古包的柱子！我们乌力亚斯泰草原上有三个著名的摔跤手，他是最最厉害的一个。其他二人便是他的好朋友夜喜和南木吉拉。这三人都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狐狸。他们打狐狸的办法比较原始，就是满草原地查看狐狸的脚印，然后放狗追。其实打狐狸也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消遣，就象咱们城里人有的时候会去钓鱼一样。

那天，我们三个人发现了一只很奇怪的老狐狸，它不象别的狐狸那样是红色的，它是只地道的银狐。这种狐狸在草原上是根本就看不到的。更奇怪的是，那狐狸没有尾巴！有经验的牧民一看就知道它曾经有过别铁夹子夹断尾巴的历史，因此它一定是一只很聪明狡猾的狐狸。三个人都意识到，今天肯定会有一番很好的较量了。果然，那狐狸在六条猎犬的疯狂追逐下逃上了山，一下子钻进了一个比人腰粗不了多少的土洞子。三个人十分兴奋，决定派夜喜钻进去将狐狸拖出来。他们就在夜喜的腰上绑了根绳子，以便使他能退出狭窄的洞子。夜喜果然在洞里抓住了狐狸的两条后腿，就喊：“快拉我！”外边的二位将他拉了出来，连带那狐狸。他们用马棒很残忍地将狐狸打死了，兴高彩烈地将它栓在马鞍上，下得山来。

这时，山下的土路上走过一架牛车，车上坐着个老年人。那人看见了他们的猎物，就惊骇地叨唠道：“罪孽呀，罪孽！你们打的是山神啊！”三个年轻人根本不相信迷信，哈哈笑着，纵马跑了。可谁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夜喜和南木吉拉就相继死去了。夜喜有个很好的家：一个漂亮的老婆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没想到一天，两个孩子拿着小牛粪铲在山顶上

玩儿，突然一阵乌云遮天，电光闪过，一声霹雳，两个孩子竟然都被劈死！接下来，草原失火，那火从很远的地方烧作一条龙，不偏不倚正朝着夜喜就扑去。他家的蒙古包顷刻化作灰烬。他和他老婆虽然没死，但老婆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赶起牛车，回到几百里外的娘家去就再也不肯回来了。夜喜开始酗酒，终于有一天从马上摔了下来，却偏巧将头跌在块拳头大的石头上，死了。要知道，那片草原上方圆上百里地你也找不到几块这样的石头啊！南木吉拉的死更古怪，他搭汽车到公社商店买茶砖，突然觉得很晒，就在那卡车的车斗里躺下来睡着了。等车开到公社社委会所在地的时候，司机叫他下车却不见有反应，原来他已经断了气！经检查是睡觉的时候脑袋被汽车狠狠地颠了一下，内出血！

三个人只剩下那敦木德，他这才开始紧张了，常常一个人失神地看着他们三人曾经抓过狐狸的那个欧布根敖包山，远远地你能看到山上的马尼堆（人们祭祀山神用的）。他处处小心，人也因此变得忧郁。然而他越是谨慎越是出事。那天，下大雨了，他从他的菊花青大马身后走过。以往，这马虽然烈倔，但在主人面前却服服帖帖。可是那天当他穿着雨衣经过的时候风把雨衣的衣襟猛然吹起，马便受到了惊吓，突然蹶起蹶子来，双腿象闪电一样朝着那敦木德踢去。只听得“卡嚓”一声和一声惨叫，那敦木德的小腿骨就断了，白花花的骨头从肉里露了出来……

家里人这时再也顾不得什么，满草原到处打听那个指责过那敦木德他们三个朋友猎狐的老人。终于，就在邻近的公社将这个叫作巴图的老汉找到了。但那老人却连续地摇着他那转经筒一样的头，说：“他们罪有应得，我无能为力了。”但在家属的一再哭求下老人答应去为那敦木德接骨，他说：“也许我能把他的骨头接上，但不能保证他不瘸。”他喝令那敦木德拖着那条伤腿从蒙古包里爬出去，对着欧布根敖包山磕了三个头，就为他将骨头接上了。那敦木德瘸了，从此不再杀羊杀牛。每到家里要吃羊或牛的时候就从很远的地方专门请人来帮忙操刀。可是即便这样，他仍然没能逃脱厄运。几年后，他得了食道癌……

我重归草原的那天见到了他，这时他已经没有了多少气力。我们不谈关于身体的话题，而是聊起了当年他当东乌旗摔跤手时的荣耀。他突然问：“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天气比过去热了？”我说：“是呀，是热。”他又问：“你是不是也觉得现在的炒米不如过去的好吃？”我说：“是呀，现在的沙子太多。”他这时看定了我，再问：“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的青年人不如当年的我们？”我说：“那还用说，他们现在连马也不会套了呀！”这时他沉默了，半天才叹了口气说：“那你就也是老了哩！”我们就不再说话。

当我表示要离开的时候，他指指我的相机说：“给我拍张照片吧？你下回再回来的时候，乌力亚斯泰草原上就已经没有那敦木德了……”他努力地 from 床上坐了起来，靠在了墙上。拿起了马头琴，轻轻地拉动了弓子。那首曲子我听过，知道是歌颂母亲的《我翻越金色的圣山》。我微笑着说：“挺好，笑一笑呀。”他笑了，挺凄然。我今天贴到网上来的照片就是当时我为他照的。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再后来，我回到了北京。再后来，听说那敦木德也到北京来了。他是来看病的，却死在了北京的医院里。是知青将为他料理了后事。据说，他住在医院里看着窗外说出此生的最后一句话是：“北京没有山……”。我没有去医院看他，也不是因为忙。我不相信他们三人的死是因为狐狸的报复，人生无常，谁又知道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呢？巧合而已了。后来我又在1996年到过草原一次，我发现草原上最火的地方竟然就是欧布根敖包了，自从有了那敦木德他们三人的故事，那山便成了人们年年祭祀的地方。

2001年2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柴湖农场位于安徽利辛县和凤台县之间的一片湖地之中，隶属阜阳地区农林局管辖，是一个中小型的农作物良种繁殖场，只有三个知青连队（农业连、副业连、机耕连），一个场部后勤处，外加不足百余名农业工人，大约一共有五百多人吧。我先在劳动强度最大的三连干了一年，而后又到劳动强度最小的场部职工子弟学校当了一年的老师。

柴湖农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这并不完全是不愉快的回忆。要说苦，知青的劳动强度的确不是普通农民可以相比的，因为农民干活是为了生活，能省力气时绝不会多付出一点动能。而知青干活有时只是为了“炼一颗红心”，人为的制造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不追求得到具体的物质收获：比如说：冬天农活不多，早上必须天不亮起床出操，出完操之后要去挖一个小时的菜地（翻开冻土让太阳晒）、等到肚子饿得发虚才能吃早饭！要命的是那被挖了n遍的冰冻菜地第n+1天早上还要再挖、不断地挖下去……说是地越挖越熟、人越累越红、人勤地不懒嘛！要说乐，也不是没有，几百号年轻人聚在一起，有唱有跳、有说有笑。凡逢年过节，不管是元旦、春节还是三八、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十一……大约除了六一之外的所有节日，都有全场性的文艺汇演和篮、拍、乒比赛。在那个年代而言，文娱活动还是算十分的丰富多彩的了。说实话，如果不考虑“将来”，我们大多数知青还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可惜，人总是要长大的、要成家立业的，一想到这些就会让人不免心中升腾起莫名的惆怅。好在有了中国的十月、好在有了恢复高考、好在有了知青大返城……

牧区11年，步行的经历很有限。那次丢失女生事件，两个人都是骑马。几次危险的经历，也都是骑着马，伴着马群。暂且搁下不表。

似乎有限几次关于步行的记忆都是与回城探亲返队有关。

可能是最艰苦的一次步行却因一次巧遇避免了。

大约71年春天我探亲返乡，走东路，经过东北的白城、乌兰浩特、大石寨返队。

最后，在我们公社南部的乌拉盖公社下汽车。离我们大队最南端的居民点还有60里。那时，没有伊妹，没有手机，没有传真，没有电话。一封信走几个月不算意外。所以，没有人来接我。在那个公社我也没有一个认识人。下车时已经下午。我只能步行走完这60里路，还有一个旅行袋。估计要走一夜。

沿着路走到公社所在地最后一个住土坯房的人家时，我感到渴了，进去要点水喝。

主人胡大娘不仅热情招待我吃喝，还让孩子去找来不远的两个北京女知青。一个是裴安娜，现在是北京朝阳区某办事处干部，一个是张雪霞，现在应是武汉26中教师。于是，到她们的蒙古包吃晚饭，聊天。第二天早上，骑着裴安娜四蹄踏雪的大黑马回了大队。

那真是一匹难得的漂亮马，又高又大。第三天要把别人的马送回去。当时在附近的知青们说不能让人家小看，选了当时知青的坐骑中最高大、漂亮的一匹黑白大花马，让我骑着去送还邻公社女知青的马。这匹大花马的主人是我们队的高子奇，多年前就已经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国家级裁判。

素不相识，就让人连马带鞍（老笨知道，马鞍很值钱）骑走，现在的人，想都不敢想。

“我们是乡里的土克西，回到城里看稀奇，背上糍巴和糯米，还带着两只老母鸡。。。 ”这首改自《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知青歌，当年学唱时一点也不懂，只觉得好玩。轮到自己下放，春节回汉探亲前，才体会到那份心情。于是，哼着这么首歌，开始去筹备这些东西。

知青在下面苦了一年，到了春节前回家，总想要表示表示。不过，钱却大部分还是父母寄来的。工分哪够呢！采购得最多的是老母鸡和鸡蛋。老乡家的鸡也好，蛋也好，比起武汉黑市的价格还是要便宜不少。所以，约上一两个知青，带上知青的狗，就上了路。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有时，一天下来，走了足有好几十里路。沿途最先“欢迎”我们的大都是各村条条凶恶的狗。好在我们也有条狗作伴。那知青的狗最懂狗仗人势的道理，只要知青在身边，是绝对不怕任何老乡家的狗的。有时，和老乡家的狗撕咬起来，知青便冲上前去，毫不犹豫的挥舞着树棍帮知青的狗助威。奇怪的是，好狗不与人斗。但老乡的狗总经不住知青与狗的合力，最终当然是知青的狗胜利。就这么慢无边际的走，与一家家老乡讨价还价。一旦老乡答应，这捉鸡也颇费周折。一般都是老乡拿一把谷子出来把鸡子引过来，那乡下的鸡难得吃上一顿谷子，往往有了吃就忘了其它。于是，站在一旁故作镇静的知青转眼就变得象老鹰一样凶残，还专门看准肥一点的母鸡，时机一到，就猛扑过去，逮个正着。也有的知青，为了表示更大的孝心，买了鸡还不够，还想买狗。老乡大都不愿意卖狗，但也有家里实在是穷的老乡，为了有几个钱过年，也就答应卖狗给知青。狗可不象鸡，你不把它打死是带不走的。一般是用麻绳先做好个活套，交给老乡，老乡把把它套上狗头，然后交给绳另一端的知青，自己便不忍看地躲在一边。知青忽地一下把绳提起，那狗就空有一身力气也无法使上。接着，用铁锹猛拍狗鼻子，不一会儿狗就断了气。

回家的一路上，也是受罪。那时火车上人的位子都不够，何况是鸡、狗呢！狗反正是死的，只当是一件行李。鸡可都是活鸡。也由不得是死是活，反正也象行李一般到处放。回到武汉，少不了死了好些只。鸡儿，鸡儿你莫怪，你本是锅里的一碗菜。

终于，在星月下，一身狼狈的赶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远远的看见家里的一盏灯火，亲情由然而生。。。

插队期间，河西走廊一带的农村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旱灾，许多农田颗粒无收，导致大批的农民外出逃荒或寻找其它出路。

我们插队的那个生产大队由于地处庄浪河畔，故而有許多水浇地，因此还有一部分收成。起码社员们的口粮不成问题。

那时正赶上生产队里掀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大搞科学种田的热潮。生产队里让我们知青搞试验田，引进小麦新品种。正好当时我父亲还在甘肃农业大学工作，我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问他们学校是否能提供一些小麦新品种供我们在实验田里试种？父亲很快就回了信，说学校可以免费提供少量的种子给我们试种，并让我们派人去拿种子。生产队长一听喜出望外，第二天就让我上了路。

但当我走到火车站，等火车来了一看，就傻了眼。因为我们中堡车站虽然上下车的人不多，但火车上的人太多了，车厢的车门干脆都不开，车窗也只让下不让上。由于当年铁路上跑的都是蒸汽机车，甚至连火车头的储煤厢上都坐满了逃难的农民。中堡只是一个站，列车只停了几分钟就拉响汽笛，起步开动，可我还未能登上列车呢。在那紧急关头，我灵机一动，疾步追上火车头，顺势扒上了火车司机上下车用的悬梯。就这样扒在悬梯上，一直等火车走了好几站路，等车头上下来了一些人，才轮到我登上火车头的储煤厢。上去之后才知道，由于火车头喷出的煤灰颗粒直往脖子和眼睛里钻，在那上面也不好受。

列车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出了河西走廊，翻过了乌梢岭，接着就进入了腾格里大沙漠。那里风沙很大，气温骤降，使火车头储煤厢上的人冻的坐不住了，都逐渐下来站到了火车头后面的边沿和列车车厢的连接处。我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一动也不能动，感到很乏味，于是就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旁边有几个好心的难民和农村妇女好几次提醒我，不让我睡。说一不留神掉下飞驰的列车去，就会没命的。我往下一看，也的确如此。因为脚下就是铁路和枕木在飞速向后逝去。此时我也感到确实有危险，这才不敢继续打瞌睡了。

好不容易从上午一直熬到了下午5、6点钟，虽然滴水未进，什么东西也没吃，但列车总算到达了当年甘肃农业大学的所在地——黄羊镇（因最初多野生黄羊而得名）。这所农业大学是当年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

号召，从兰州迁到这地处偏僻的腾格里大沙漠边沿的黄羊镇的。从黄羊镇火车站到农大也没有汽车，路上甚至连人都很少能见到。我只好步行了十多里路，才到了那所学校。当我见到父亲并述说了在火车头上与逃难人群一起的经历后，父亲也感到很惊讶。说若早知是这样，就不让我来了。

不管怎么说，我总算还是活着拿到了那些小麦种子，并最终返回了知青点。但当年与难民一起逃难的那次经历却使我终生难忘.....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斗转星移、岁月流失，但三十年前发生的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的一件往事却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这一天，对于六十团五连的全体干部、职工、知识青年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因打黑熊，拖拉机陷进别拉洪河，为救拖拉机，竟有六位战友失去了生命。作为我，一个十七岁少女，刚刚踏上生活的旅程，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人的生命就是那么脆弱，昨天还和你在一起工作的战友，一夜之间，竟独自躺在冰冷的河水里，将永远的长眠在地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连是新组建的连队，生活特别艰苦，住帐篷、喝雪水、要想吃一些肉食，就靠老职工打的袍子、野猪、野鸡、和黑熊等。要过“五一”了，连里决定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安排四月三十日去伐木、采回一些野韭菜，一位老职工和一位哈尔滨老知青小熊开着拖拉机去打黑熊。

四月三十日，吃过早饭，在战指导员和秦副连长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二十三人乘坐拖拉机拉的爬犁，一路上唱着歌开往树林。

到达目的地，我们三排的任务是：一部分人伐木、一部分人采野韭菜。我和一位老北京知青李际平，一边采野韭菜、一边掏老鹰蛋。李际平长得特象阿尔巴尼亚人，所以大家都亲昵的叫他老阿。他爬上树掏老鹰蛋，我负责拿老鹰蛋，老鹰蛋像鹅蛋那么大，鹰蛋炒野韭菜特别香。午饭是从连里带来的馒头和咸菜。

吃过午饭后，我们继续伐木。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打黑熊的老职工，气喘嘘嘘地跑回来，神色慌张，他告诉指导员，打死一只七、八百斤重的大黑熊，共打十二枪，在拉黑熊回来的路上，拖拉机陷进别拉洪河的沼泽地里。指导员一听就急了，他吩咐打黑熊的老职工和

我们六位女同志在林子里等着，又派两名男职工回连队去叫人把另一台拖拉机开来，他和秦副连长带领十一个人去救拖拉机。

老阿临走时，来到我身边，从包里掏出两个馒头给了我，他说：“给你吧，等你饿了好吃”。（现在想起来，如果他没有把馒头给我，也许他不会死）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林子里等了一会，我跟两位天津知青说：“不如我们也跟两位男职工回连队”。当我们决定走时，回连队的两位男职工已经走出一段路了。我们三人在后面紧追。

这时，天上又下起雨，路变得泥泞不堪，我们穿的棉衣都被雨水淋湿了。此时，又冷又累、饥肠碌碌，我把老阿给的两个馒头三个人分吃了，缓解了饥饿之苦。我们脱下湿棉裤扛在肩上，在泥泞的沼泽地上连滚带爬地赶路。穿过一片树林，那两位男职工的身影就消失在

树林中，我们失去了方向。那时，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她俩说：“我们不走了，就坐在这里吧”。当时我想，要回连队的主意是我提出来的，如果坐下来，不被野兽吃了，也得冻死在这里。我说“不能坐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再说雨也停了”。我们艰难地走着，我抬头望着天空飞翔的小鸟，真是羡慕极了，我非常伤感，觉得我们还不如一只下小鸟那么自由地飞翔。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此时此刻，才感觉到死亡的来临，同时也感到求生欲望是那么强烈！最后决定，在我们站立的地方一直往前走。我们想那两个男职工回到连队，肯定会跟开拖拉机的人讲，我们三人在往连队走呢。大约在七、八点钟，拖拉机的灯光透过片片树林，隐隐约约照过来，于是我们就朝着拖拉机灯光的方向奔去。眼看拖拉机就要从我们侧面开过去，我们三人都快急死了，最后，我把湿棉裤扔给她们，拼着命往拖拉机方向跑去，等跑到拖拉机跟前，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

我们三人坐上拖拉机向别拉洪河那片树林开去。那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确实感到是从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回来的。

到达林子里后，我们把湿棉衣放到拖拉机上烘干。燃起一堆篝火，我们六位女同胞和两位男职工在林子里呆着。不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狼的叫声，这一夜，我们觉得时间过的那么慢，清晨四、五点钟，姓盛的职工从林子里走过来，（我们还以为是野兽呢！）当他走到我们面前时，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死人了，老阿和王九成都死了，老阿是在昨晚八点钟，王九成是在昨晚九点钟，他和秦连长是背靠背地在河里站了一夜，才没有被冻死。他边说边吃馒头，我都记不清他吃了多少个馒头，最后是两位老职工怕撑坏了，不让他吃了。

天亮了以后，我们九个人去救人，记得当时我们是手拉手往别拉洪河里走。刚开始走时水很浅，刚到膝盖，谁知再往前迈一步，水一下子就没了到了我的胸口，立即我被两边的人拉上来，惊魂未定的我，刹那间解开了战友们死亡的秘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又冷、又饿、又累，在深浅不一的沼泽地里苦苦挣扎，最后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

我们把活着的人救回来，已确定死了五个人，战指导员生死不明

。

我们带着救回的人坐着爬犁回连队，连里的人远远看见我们三个人坐在爬犁上，都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我们三个人会活着回来，还以为我们死了。

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那两个馒头，死亡的也许不是李际平，而是我们。

我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到团里去，袁书记向我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头绪特别乱，前言不搭后语，袁书记叫我镇静下来，把事情经过讲清楚。后来在袁书记的亲自指挥下，团里组织其他连队年青人到别拉洪河拉大网找人，找了十多天，最后战指导员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些天，连队里阴云密布，大家都非常伤感，买了六口棺材，挖了六个坑。死去的战友亲属陆续来到连队，我们一边陪着安慰他们，一边给死去的战友做被子和褥子。

入葬那天，亲人们、战友们，那撕心裂肺地哭声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回荡。就说我们的指导员，他参加过淮海战役，枪林弹雨都过来了，然而竟死在小小的别拉洪河中，连尸首都未找到，战指导员的爱人面对空棺材，她那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难以忘怀。

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整整过去三十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六条生命和两个馒头这件事使我在三十年的旅程中，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并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无论生活中多么艰难困苦，前进的道路多么崎岖，我都能勇敢地去战胜它。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岁月流失，被洗刷掉的是记忆，但是，铭刻在心上的人和事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越来越懂得过去的经历对我一生所拥有的价值和意义。

翻开我的日记，有一页是这样写的：

1975年11月28日，阴，北风

昨天，我去张炉大队找好朋友张岩，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晚上没回来，住在她那儿。没请假在外边过夜，心里有点犯忌，怕管点的贫协代表批评。今天回来还没进门，就听见林香玉告诉我，说大队党支部决定派我带队去吴屯生产队接管生产队班子。

.....

大队书记找我正式谈了。鼓励我敢于挑重担，党支部支持我。当时，我挺激动，虽然我没有思想准备，但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表示一定要努力完成，不遗余力。

晚上我开始做准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材料带上，又写了一个我明天在全体社员会上的发言提纲。

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

我愿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接受党的考验，亲爱的党，放心吧，您的女儿不会让您失望！

第二天，在吴屯队部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

大队党支部书记公布了知青接管小队班子中我们每个人担任的职务，说完，书记自己带头鼓掌，但是没有几个响应，社员用敌意的目光看着我们，我的目光迎了上去，有党支持，我什么都不怕！

我的大名刻了章，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生产队在政府行政级别以外，没有公章，队长的章就是权力的象征，办什么事，都要盖上。因此，章就别在我的裤腰上，随时用随时拿，没有印泥时，就用嘴哈一哈，使劲儿地按来按去。

开始几天，我有一种神圣感，带领一帮知青，经常晚上关门开会，研究如何对付社员的消极抵抗，大家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像出征的战士，雄纠纠，气昂昂，起五更爬半夜，跟着我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斗！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

那时正是冬天，队里没什么活儿，但是学大寨，战严寒，不能闲着。正好秋天修的梯田把熟土翻到一边，生土和石头露在表面，我们女劳力就负责往外捡石头，挑石头。

头一天干下来，我们都累得上不了炕，我的膀子压出了血痕，我知道其他知青不会比我好。

“我们太缺乏锻炼，要咬牙坚持，一定挺过这一关，”我鼓励大家。

“队长，我们上当了，你没看见她们的挑筐又浅又小，我们的挑筐又深又大，她们两筐没我们一筐多。”

“装筐的时候，故意给我们装得满满的。”

“哦？我怎么没注意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明天我们给他们装满筐。”我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来领导他们的，不是受他们气的。！”

谁知，不到一个月，担任副队长的知青和生产队的下台会计杨山庆打起来了，不知道是当地人成心挑事还是我们知青不冷静，反正我们动手打人了，把杨山庆打得鼻口窜血。

“不好了，知青打人了，出人命了！”

社员们满村嚷嚷，一会儿功夫，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聚集到队部。我从山上匆匆赶下来，杨山庆的妈、媳妇和兄弟、嫂子立刻围住我，“队长，知青打人犯不犯法？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个理儿。”我看看杨山庆的惨样，再看看我们知青的劲儿

头，知道闯祸了。我瞠目结舌，想退出去，但是，杨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我，不让我出去。

这时，杨山庆对他们说：“你们围着人家小姑娘干什么？咱找大队书记评评理。”一句“小姑娘”把我的自尊打垮了，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小姑娘？我强忍住眼泪，从社员给我让开的路出去了，

知青点里乱作一团，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杨会计成心捣乱，有说我们的队长太不冷静，我强打精神，布置了目前的任务，一是注意新的阶级斗争动向；二是各就各位，该干什么干什么；三是不要再和社员发生冲突，即使我们有理也要忍让，否则我们无法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事情的处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大队书记的意见是一边倒，责任全在知青这一边，党支部决定撤销全部男知青担任的职务，并把他们调回大知青点。我和其他几名女知青留下。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并宣布杨山庆担任生产队的副队长，主抓生产。

我在这个事实面前不知所措，我认为大队党支部这样处理是不公平的，至少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是忠诚积极地执行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可到头来却是这样？

杨队长找到我，对我说：“你和我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我会配合你把工作做好，你是一个知青，到我们这里来不容易，万事开头难，有些事我慢慢告诉你。”

就算他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稳住了我的心，但是我在大知青点里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回来的男知青都说我是汉奸，是我出卖了他们，为此，我的饭经常没有保证，个别知青经常找我的碴，给我脸色看，我感到非常委屈，几次想提出不干，但又觉得这样做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守在油灯下，怀着一颗激动的心，含着热泪，写了一份又一份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这是我的生命支柱啊（后来才知道，我写的报告早被人擦屁股了。我为我的那片赤诚被人亵渎而感到悲哀）！

自从杨队长上任后，村里的事情好管多了，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村里的派性又起来了。原来他们一致反对我们知青，目标是共同的，现在他们一派掌权，反对派当然要出来闹事。这时，有人反而来找我反映杨队长的问题。

我终于弄明白为什么会让我们知青来接班子。在我们之前，大队党支部已经决定让杨山庆挑头搭班子，但杨山庆不

干，他知道队里穷，队长当不好是落埋怨的，再说对立派有人在大队当领导，从中作梗的事少不了。他认为不管谁来当队长，都不会不用他，因为队里的文化人少，又都在外面干，他是独份。万万没想到书记一气之下，把队里的全套人马都换成知青，这下可好，所有的矛头都朝知青来了，我们成了替罪羔羊。也许这是大队书记的一步好棋，牺牲了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卒，换来全盘活棋。通过这种办法，逼着杨队长上任，即使我们不打人，也会找别的理由换下去，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靠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干不了庄稼地里的事。

春天，闹春荒，队里有好多人家没有粮吃，队里仅有的一点喂牲口粮被拿出来救急，粮食成了人们心中最宝贵的东西。谁拥有分配的权力，谁就具有绝对的权威，而这个权力被杨队长抓过去了。

开始播花生，社员上工的出勤率陡然增高，能出工的都出来了，我挺高兴，播种进度很快，我每天在种籽库里带领女知青用农药拌花生种。这天山上传下来话，天好，还要加班播种。我有些纳闷，进度够快的，把人搞这么紧张干什么？于是，我上了山，找到杨队长。他说，你真傻，能提前一天就提前一天，要不然花生种就吃光了，人的肚子有数，一天不能吃两天的东西，要是拉长战线，消耗不就大了？

“这花生种拌了农药，吃了要中毒。”

“人要饿急眼了，还管有没有毒？你没看这几天出工的人格外多吗，就是解决肚子问题的。”

“啊，我没想到这些。”

“你们知青有国家拨下的商品粮，当然不知道老百姓挨饿的滋味，饿得人连死的心都有，还怕中毒？先添饱了肚子再说。为什么叫你们女知青拌花生种，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要是社员干这活，连吃带拿，又要损失一些。”

我愣愣地看着播花生的劳动力，心里空空的，我弄不懂他们，因为，我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相差太远。

麦苗返青，绿油油的一片，可没几天靠社员家门前的就被鸡鸭猪啃光了，为这事我开了好几次全体社员会议，强调几次，仍没有制止住，反而向里边延伸了一截。公社书记下来检查工作，看见了地边的麦苗被啃光了，火了，把我叫来训了一顿，限我马上制止。我说开了好几次会，都没有成效。

“撒农药，要大敢地干，勇敢点，农民的觉悟很低，他们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不考虑整体利益，我们要打粮食翻身

仗，支援世界革命，怎么能让鸡鸭猪把庄稼都啃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书记的话给了我力量，我马上从库里拿出剧毒农药“乐果”拌上高粱米撒在地边上。

不出半天，鸡鸭毒死了不少，死了家禽对农村妇女来说，简直像死了爹娘老子，站在田头就嚎，哭的我心里直颤，我对自己做的这件事又有了怀疑，杨队长说：“这事管的好，三令五申的事不听，不怨咱。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不怕。”

我感激地看着他。

战酷暑，队里每天都要拉草积肥，累的我们吃不下饭，加上伙食不好，没有油水。我们的腿肚子发软。

一天下午，队里的几个知青向我请假，要去公社看电影《海霞》，其实他们暗地里嘀咕这事时我都听见了，他们是想借这个理由休息半天，而我当时非常果断地告诉他们不行，那几个人几乎是在苦苦哀求我，这并没能打动我，越是在斗志涣散的情况下越要坚持原则，否则就成了一盘散沙，我扭头走了，给他们扔下一句话“谁今天敢去看电影，我就扣谁十天的工分，还要开大会点名批评。”

他们没去，也许是怕我真的开会点名，也许是怕我真的扣他们工分，事后，我为此得意，为我的尊严和权威得意，我知道他们怕我，这就足够了。然而，事过二十年后，我得意不起来了，一想起当时他们的哀求神色，我就想哭，其中有一个年青小伙子回城后得白血病死了，我已经永远无法弥补那个遗憾。

公社要抽调汇演节目，大队党支部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这是个荣誉，我兴冲冲地回到生产队，把这事告诉杨队长，他听了之后，不仅没高兴，反而皱起了眉头。

“队里活忙，正是铲三遍地的关口，把人调走，耽误活计可是大事。”

生产组长在一边急了，“这怎么行，要把人调走我不干了。”

我也火了，“抓了革命才能促生产，这是公社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只能完成，不能后退。”

“他们别的生产队为什么不参加，非叫咱队参加，耽误庄稼谁负责？”

“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理直气壮地顶他。

“不要庄稼你让俺们吃草哇。”他一转身走了。我怔怔地站在那儿。

杨队长看着进退两难的我，温和地笑笑，“你看这样好不好，每天晚上排节目，给排节目的人记双倍的工分。临演出的前一天给你一整天时间串节目，好不好？”

我使劲儿点头，眼窝已经热了……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经过我们的努力，演出很成功，我们得了奖，大队书记乐极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66年9月20日

北京宣武门外有个天主教的大教堂，现在还在，就是北京人叫“南堂”的那个。

大教堂东边连着一个院子，以前是修道院，1960年代初，被改成了教师进修学院；文革破四旧抄家的时候，这个已经停课闹革命的学院成了“红卫兵造反战果库”，也就是存放抄家物资的地方。这个“战果库”号称“三库”，一二三四的顺序是按照规模大小排列的，“一库”在天坛，占了公园北部的好大一大片，“二库”在月坛，也占了公园好大一片。

1966年9月20日，也就是那一年的今天，天刚黑，街上的人就听见“三库”里面有人喊“进来小偷啦，快抓小偷哇，别让他跑啦！”宣武门临近西单，本就是热闹地方，那时候又时兴大串联，闲人异常多，立刻围上来一大帮革命群众看。

只见那小偷翻上墙，后面追赶的红卫兵们也翻上了墙。小偷顺着墙头往教堂那边跑，红卫兵们紧追不舍也在墙头上面跑，好像大家都练过平衡木。小偷跳上教堂的窗台，又从窗台攀着窗沿上了教堂顶，红卫兵们不怕牺牲，也跟着上了教堂顶。小偷不停地朝上爬，红卫兵们也不停地朝上爬；教堂顶太陡，不论小偷还是红卫兵，都不免偶然有些跌跌滑滑。每有蹉跌，便引起仰视围观的革命群众一阵惊呼，好在都是有惊无险。

小偷继续爬，红卫兵们也继续爬，好像都忘了他们正在高空作业，平时只有消防队才敢练这个。热闹闹大了，围观的革命群众越来越多，除了群众，管人民专政的警察也闻风而至。眼看这小偷马上就要爬到教堂的最高处，围观的明白人议论说：“操，这丫还瞎爬什么呀，还能往哪儿去，除非这丫会上天”。说话间，小偷已经爬到了教堂的最高处，最高处的那个十字架，只剩了下半边的小半截，上边的大半截，早在三个星期前就灰飞烟灭了。

上有苍天上不去，下有追兵下不来，他的确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的小偷抓着十字架的下半截探出身，扯开嗓子喊。喊的是什么，起初听不清，底下革命群众正在忙着七嘴八舌乱嗡嗡，待到静下来，只听得半句话，话音未落，人已经跳了下来。

这个人留给我们的最后半句话是“……偷，这是我奶奶的戒指！”

三十六年过去了，这个世界恐怕不会有几个人还记得他，想起他。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还记得，而且也记得追赶他的那群红卫兵的头头是谁。这头头，现在已经进步到副部级了。

1966年9月22

1966年9月22日，也就是那一年的今天，梁漱溟先生开始写作《儒佛异同论》，时年七十三岁。

二十多天前，红卫兵来了，“三代所藏书稿字画一夕就火，革命小将入主吾宅，设造反司令部”，梁先生被赶进了曾经住过老仆人，后来堆放杂物的小南屋。

从此之后，他或者被拉去批斗（批斗的会场还在，当时是西城工会的小礼堂，现如今是托福和鸡阿姨的补习班）；或者被罚跪示众（示众的地方也还在，当时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口，现在不排练了，是迪斯科舞厅，出出入入的红男绿女们，大概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脚下踩着的台阶，就是一代宗师被挂上大牌子罚跪的地方）；或者扫厕所（这个厕所现在还是厕所，但是已经被翻建）。梁太太吃的皮肉之苦，比梁先生更多。地毯厂的革命女工、新街口的革命居民，以及“西饮红造团”的服务员们，只要闲得慌了，就把她揪出来斗。所谓斗，就是打，皮带、鞋底子、炊帚、扫把劈头盖脸地一齐上。古稀之年的老太太不禁打，瘫倒了就把她拎起来斜倚歪靠着小树继续抽。这树还在，已经长成大树了，卖早点的小贩在原本是梁太太的位置摆着馄饨锅。

1966年9月22日，“夜大热，汗流浹背，向壁凝思，凌晨起写《儒佛异同论》”——那一年的今天的凌晨，梁漱溟先生在没有任何书籍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利用红卫兵让他写交代材料的白纸，开始“每夜可得一千多字，结句成篇，积少成多”……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

当时也有一个消息曾激起小伙伴们的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的莘庄中学和川沙县的高桥中学。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能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越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象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一九六七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三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切块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三十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四十岁以前的表情，归上帝负责，四十岁以后的表情，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四十岁改成二十岁。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五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卖”，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

第一眼，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是重点中学，有高中部，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如果临近部队大院，则更为不幸。一九六四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

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报复情绪。

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上则倾筐倒篋，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如此绝妙好词，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擅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内地大院文化者不能办。此为衙内语，是大院文化剥了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八旗者，霸气也，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这才能酿出这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瓶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就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一九八三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注一）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仁，一九四九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五十年代更名为继光，六十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尽管叫继光，但六十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述两类略好一些。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初一”，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认为我们没有受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校时，他们举办过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才领我们进教室。我记得我们那个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因为一进校就贴出过一份长达十一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里话”，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

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四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四万藏书中，还有许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象回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少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象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

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

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六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五毛，包括剃头洗澡。花六毛钱定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象现在的人月收入一千，以一千二百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 LONG L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理由是：你现在用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开端，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的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九点开门，八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份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读禁书，也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枝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一个“！”，写完即扔，扬长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麼，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雷轰顶，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我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儿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六七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这些人听后十分意外，因为我当时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十二个班，六百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不可能因为是我所写而撤消这一案子。当时又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进校抓人，风声鹤唳，气氛迹近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消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对她提过意见，这一下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麼给什麼，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的这一问题。这个案子后来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一本一本全撕了。

我成天抬不起头，但也得到过一些温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辅导员李敏，当时是她在初一进校不久发现了我

这个苗子，推荐我做了那个劳什子“连长”，不料却是个闯祸坯子，惹事的孽种。出事后，她曾在体兰馆前的那块草地上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却边说边流泪。她的恋爱对象是高二（1）班的同班同学邱洪琪，校内大联合以后的红卫兵团长，人也正派。每有集体性集会或游行，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个，让路人看得眼睛发亮，可见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过邱洪琪交过底，要他抵制那个男教师对我的逼迫，否则以我当时之幼稚，怎能顶过这个男教师索书逼书的压力？我离开上海后，时常想念这位善良的辅导员，十三年后返沪，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夫妇。（注二）另一个助我过关者只能暗中出力，而且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工宣队队长，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五十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我多少年提心吊胆，一直认为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一九七二年在插队的地方招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问我父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后来生活投下阴影？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到《上海文学》这种地方，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的兴趣依旧，但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敏感，也落下了一块心病。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先历史，后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一九七四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真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象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B52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七十年代的最新理论著作，无异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星。毛泽东总爱播火玩火，但这一次从效果看，他肯定是玩砸了。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先反噬他自己？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那时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伟人，还是大众，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大概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就我而言，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五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

教授。我不知道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也许还是以前者为多。后者即使有，也是极为朦胧。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充实目前文革精神史过于乾瘪的研究现状。我在下面只能再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八十年代初为做硕士论文去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刮目相看。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他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却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让他说服老李，我要一张厂革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再换开一封介绍信，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老李果然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好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就全凭我自己去说。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拥挤的车厢里想好了一套说辞。一到省委宣传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五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五分钟，我却觉得有一个小时，如坐针毡般难受。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真是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分享喜悦；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供应的书目，汇成一张总书目，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那张介绍信的作用。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穿上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钢笔，尽量学出一副省军级写作组成员的派头，去福州路上海书店，直奔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双臂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购的书目，未见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五百格的大稿纸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那么高级的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采购清单？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善意帮助。当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设想，那就是人家已经识破我们，只是心照不宣，不说而已。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又热情推荐还有一些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的书，“这本很吃香，那本在外面更难搞到”，语气如此热忱，就不象在公事公办，按级别配置“反动书籍”了，而是一种标准的职业行为，在推销紧俏商品。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十六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二十三本，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推荐买下的。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超过后来八十年代西学热中许多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前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是我自己想的，它就来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看到这句话，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一九七四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花了三百多元人民币，几乎整整一年的工资。捆起来是四大摞，两人四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硬币，只够我们乘十七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九八二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老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

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则与他有关的渺小故事了。

1 9 9 9 . 2 . 2 , 沪上

（注一） 这里应顺便交代，我之所以迟迟不能接受王朔小说，也难以同意将其评论为平民文学、后现代试验、意识形态的有效瓦解或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与我文革中的这段记忆过于深刻有关。后来，我也有幸落入过那种大院，穿过几年那种颜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则更难纠正这种偏见。

（注二） 令人不解的是，我后来回母校参观校史展览，翻阅名人名录，独独没有这一代人的身影。据说其它学校也有类似情况。空白处，反有一段各方都觉寒心的记录？

【全文完】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

真饿呀！大家见面就聊定量，聊解饿之道，聊做饭的技巧，希望用二两大米做出三斤干饭；交换着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那个饭馆面条给得多的情报。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一辆拉尸体的车，也看不见成群的要饭的，更没有倒毙在闹头的饿殍……表面上看，远没有十月革命后那段困难年代恐怖。但饥饿感深深地笼罩在北京人头上。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可卖，连糖块都很少有。卖菜的地方更是空空荡荡，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昔日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分配供应，每户只几棵，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拣。每人一个月凭本可以买二两白糖，以补充热量。另外，每人每月供应半娘糕点，凭点心票买。火柴、猪肉、细盐、淀粉、碱面、肥皂、芝麻酱、粉丝等，全都要购货本，定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外汇。

晚上七八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初一时，学校宿舍离西单很近）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学校体育课停上，生产劳动课取消，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班里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全校大会不再举行，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连班会也很少开，务必让学生们早早回家。据老师说这是市委指示：要劳逸结合。

我常常不到上第三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响，脑子里全被食堂的馒头、米饭、红薯面窝窝头所占满。到第四节课时，饿得根本听不下去课，连有些女生也不例外，屁股晃来晃去，坐不住，好象椅子上有钉子。上第四节课的老师都非常通情达理，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晚下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象一群小鸡一样飞快地朝食堂跑，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三两，有人四两。我中午是四两，早晚三两。吃完后，仍觉得饿，要把碗里的菜汤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离开饭厅好凄凉，看着别人还在吃着，无比的羡慕。饭厅里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四两饭五分钟就吃完，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填食物更有吃东西、装东西的刺激。吃完赶快离开饭厅，省得看人家吃眼馋。回到教室，又得熬漫长的钟点吃晚饭。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饥饿感觉最少，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但上午要上课，早晨二两不够；又试过四三三，也不行，中午少吃一两，那感觉就大不一样，好象没吃饭。一五四试过、三三四试过……最后，经过反复实验，还是采用了三四三的吃法，（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觉得这最适合自己。为了解饿，我还试过早饭时，把一个馒头换成两碗粥。连喝三两粥，当时是觉得饱了，但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头昏眼花，每人都不够吃，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象保护金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保存。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是全国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亲戚朋友之间，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算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啊！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能比丢十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要乞讨钱，或许可能会要到一两毛，你要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还记得有同学说她的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同学间为二两粮票而翻脸打架的时有发生。连买豆芽、豆浆、豆腐脑也要粮票。领粮票时，要一斤一两地数清楚，比到银行取钱还小心。这年头，粮票太宝贵了，谁也不敢大意。

每星期六回家，家里的保姆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三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在家吃饭，每顿饭一人一碗米饭，我根本不够吃，可又不好意思说。不敢在父母面前伸手要吃的，害怕碰钉子。

父母有钱，常常买些高级点心补养，但他们很少给我吃。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豆腐、黄豆、饼干等。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从没有给我尝过一口。父亲曾对我说：“你不要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我们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待遇，现在你回家吃饭，吃的很多东西都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不要不知足，要艰苦朴素，不要讲吃讲穿。”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老是馋得慌。父亲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得太饱活不长。”可我只想吃饱饭，不想活得长。人挨饿的时候，最迷恋的是吃饭，顾不上长寿问题。

如果某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比如，在家吃三天零一顿的饭只交三斤粮票。但保姆精明的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她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的事和这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让我们小孩必须遵守交粮票的规矩。父母从不想想我们为什么不给家粮票，根本不管我们饥饿与否。说穿了，他们就怕自己的那点粮食被孩子多吃一口。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的、冷酷的界限。起码我们家是这样。

这个保姆五十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是一个大官儿的三太太，酷爱抽烟。她会奉承人，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所以她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她刚一见我面时，因为我不爱说话，她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现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损人利己。老想方设法少给家里粮票，剥削家里的粮食。”她真是铁面无情，无论谁来了，不给粮票就不给饭吃，毫不含糊，跟饭馆收钱的一样。记得白杨的小孩安美，那时常来我家。有时她没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象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家里吃饭，有几个人，做几碗饭，一点不多做。母亲偶尔善心大发，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给我装到瓶瓶里，让我带到学校。但粮食却绝对不多给，半个馒头的便宜都占不到。我和父母的隔膜，这时可能更深了。在我饥饿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吃饱了吗？”他不敢问。他知道，我要是告诉他饿，他也没办法。他不会把他自己的吃的给我。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块纸、鸡蛋壳……我知道，他们每天都躲在北屋里偷吃高干的特殊补助食品、高价点心、高价果脯。但小时奶奶教育过我，人穷要穷得有志气。我再饿，也没有向父母要过吃的。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到姑姑家吃顿饱饭。

姑姑家虽然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筷子，厨房里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的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的家更对自己有吸引力。因为饥饿的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不是笔直精细的象牙筷子，不是细花瓷碗，不是古色古香的家具。

姑姑把我从婴儿带到四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的感情。她后来跟我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可能是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

去姑姑家蹭饭吃，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渐渐引起了姑夫的不满。姑夫是个传达室看门的，人很老实，本来对姑姑言听计从。时间长了，对我白吃他们的饭，不交粮票越来越有意见，开始和姑姑争吵。但姑姑总是护着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窝头团子的事。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很冷，我饿得要命，心想晚上只有三两粮食，怎么解饱，就又垂涎起了姑姑那个小小的家，我虽然有惭愧感，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因为姑姑家是我唯一可以敞开肚皮吃饱的地方。我到姑姑家去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还可以给自己省下晚上的三两粮票。我就步行了二十分钟来到了姑姑家。

这时大约五点钟，姑姑还在托儿所工作，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我本能地走进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人在饿的时候，对粮食的嗅觉好得要命，这黑黑的棒子面团子，散发出浓浓的芳香味儿，令我馋涎欲滴。心里暗暗祈祷：“姑姑啊，对不起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对不起了！”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地吃掉。吃完一个，饿得更厉害，接着又吃了第二个。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三口的晚饭啊，可我却什么也顾不上想，好象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至今，那窝头菜团子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黑褐色，槐树皮一样粗糙，外表虽难看，却好吃极了。我本来就想吃几个，给他们剩一点，但一吃起来，就控制不住，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吃完下一个，还想再吃下一个……好不容易有个吃饱的机会了，怎能罢休呢？我心里念叨着：“姑姑，对不起了，我实在是太饿，管不住自己。”很快就消灭了一笼屉。

如同溃破了的堤坝，我一吃起来，就不可收拾，完全失去自制力。虽然已经饱了，还想再吃。似乎多吃一个，就多一分安全感。什么礼义廉耻，什么仁爱孝悌，全置之脑后，脑子充满了窝头，充满了渴望吃东西的激动。结果不一会儿，另一笼屉的菜团子也全都给吃光，足有二斤多！吃完了，我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他们老两口和一个儿子的晚饭呀！但人一饿，就顾不上德了。我给饿成了一头猪，在疼爱自己的姑姑面前，露出赤裸裸的贪婪本性，除了吃，别的全不顾。

当我吃完后，姑姑也下了班。我看着姑姑那消瘦的脸庞，蜡黄的皮肤，开始感觉惭愧。我低声地吞吞吐吐地对她说：“姑姑，我实在饿，把笼屉里的窝窝头都给吃了。”

姑姑惊讶地睁大眼：“什么，两笼屉都给吃了？”

“嗯，都给吃了。”

姑姑看见我那么认真，知道这是真的。她一点也没有责怪，表情安静，眨巴眨巴眼睛，不在乎地说：“吃了就吃了吧，没关系。”裂着嘴干笑了笑。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要有姑姑这样的母亲该多好！

姑姑关心地嘱咐：“你可别撑坏了啊，要少喝点水。听见没有，别撑着。唉呀，可怜我的儿啊……”

我紧紧握着姑姑的手，感激地望着她。“姑姑，那我就走了，还得上晚自习。”

姑姑与我握着手，一步一步送我到门口。我象犯罪了一样，生怕碰见姑夫，赶紧溜走，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中。

姑姑对我来吃她的饭，从没有一点点怨言。她真是为了子女可以把自己完全牺牲了的母亲。多年后，她在我和父亲的矛盾中，虽然站在了父亲的一方，与我疏远。但我对她的养育之恩，救命之恩，却终生也忘不了。

她那时刚刚四十来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瘦的象个骷髅一样，两个眼睛陷在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里，非常可怕。她干瘪的胸脯都没有我的鼓；脸上的皱纹深的吓人，颧骨突出，象两个瘤子……却任着我伏在她单薄的身体上吸她的血，补养自己。用她的血肉支持着我的自尊。

姑姑真是比母亲更象我的母亲。

在自己家里都吃不饱，在学校就可想而知了。成天饿，下了课就上街转，寻摸着有什么吃的可以买。因我们学校在城里，又是住校，根本没地方搞吃的，除了到姑姑家蹭饭，就只好挨饿。

粮票重要，但钱也很重要，如果没钱，万一碰上卖吃的，也买不了，只好挨饿。我每月伙食费大约是八块钱。为了使自己能富裕一点，就骗母亲说是十四块。这样除了母亲给我的二块钱零花外，我每月能多有六块钱。但有时当母亲对我好时，望着她慈爱的目光，我不忍多骗她的钱，就少骗一点，说十二块，有时又说十三块，月月都不一样。好象少要她两块钱，心里就踏实一点。这样就露出了马脚。

我干坏事还讲良心，当然很蠢。母亲开始怀疑，让父亲到师大附中去问。父亲先找了我的老师，后又找了学校食堂管理员。一问才知道伙食费根本没这么多，我每月都多管他们要六块钱！这件事当然不光彩，即使是骗自己父母的钱。

记得，我还偷过宿舍同屋的吃的。那时，我放在褥子底下的几本新买的书，如《柯楚别依》、《恰巴耶夫》等都不翼而飞。我气得要命。当时宿舍里就我和徐赤裔（当时石油部长徐今强的儿子）。我没有任何根据就怀疑是他偷了我的书。他的枕头旁边或床底下，常常有大鸭梨、大苹果等水果。我既怀疑他偷了我的书，就心安理得地偷他的水果吃，以此报复。一次，我在他的枕头旁发现一个小孩脑袋那么大的梨，大得出奇，被我偷偷吃掉。他好象不象我这么饿，也不在乎丢吃的，见了我还笑咪咪。我偷吃他东西的借口是他可能偷了我的书。每逢自己饿了，就到他的床头乱翻，看看有没有吃的。

我是这么矛盾，一方面热心地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

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偷偷拿……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

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渡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

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

（编后：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那是写旧社会的，这是说新社会的。与上面“红楼”文对比着读一读，

岂不是妙趣横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们那个大杂院，共七户。卢家是“坐地户”。我家和其余五家，都因动迁从四面八方搬来不久。一九六六年元旦前，凑齐在那个院里了。春节，互相拜年，和睦友好的关系从此奠定基础。那一年我十七。初三。

卢叔是“院长”，以“坐地户”虔诚的热情，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管理我们这个大院的责任，晚十点插大门；早六点开大门；比较公平地划分各家各户盖“门斗”和煤拌棚的面积；撵走到院里玩闹的野孩子；对出现在院里的行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盘问；突然断电则严肃地查寻原因；不失一切时机地树立威信。

他三十七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一岁。可在我心目中是长辈。曾参加抗美援朝，立一次小功。复员当铁路乘警，得意过一阵子。天生的驴脾气，动辄以保家卫国的功臣自居，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屡屡触怒领导，结果仅仅由于一次两厢情愿的“男女问题”被开除公职。不服，研究法律。上诉。认为按照法律条文，自己是在与那女人将“入港”而未来得及“入港”之际被“捉奸”的，算不得事实上的“奸情”。上级机关批驳：开除公职，依据的并非法律，是道德。未来得及“入港”算他走运。果已“入港”，就不但要开除公职，且要判罪了。那女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老局长的年轻夫人。他各方奔走，到处辩白，希望获得同情。闹腾两年，难以翻案。万般无奈，只好继承他父亲卢老麻子的衣钵，干起推手推车敲鼓收破烂的行当。用他自己的话说，枪林弹雨闯过来了，却一个跟斗栽倒在一个女人怀里爬不起！“他妈的不过就是怀里呀！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呀！”他常与人谈到自己当年这件功倍成半极可悲的“风流韵事”。因为“就是怀里”，“就是一个女人”，无比委屈。委屈中流露出很不上算的意思。“他妈的是她先挑逗的我！她是局长夫人，不先挑逗我，我敢勾搭她

么？他妈的事发后她倒哭哭啼啼，反咬我一口。如今还当上了科长！”他对败坏了他名誉、断送了他前程的女人恨得咬牙切齿。可每次诅咒之后，总这么说一句：“他妈的她真有股子骚劲儿，叭地飞个媚眼，谁是男人也酥半边身子！”分明还有点旧情难忘。

亏得卢婶对他极其宽大，一贯采取“无为而治”的可嘉态度，绝不怨恨。他也由这次惨重的教训得出一个睿智的经验——“家花虽不及野花香，到底是自己的，什么时候想摘什么时候摘！摘野花太不安全，太不安全。”

“破烂的换钱”虽数“下九流”的干活，收入倒比当一名乘警可观。屋里屋外，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尽是一堆堆的破烂儿，卢婶从不嫌碍眼。

“管它是干什么的，花钱便当就成呗！我家那口子爱哪天开资就那天开资，市长不是还得一个月才开一回吗？”卢婶对生活也持一种“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

哪天卢叔赚钱多了，她便使出一位堪称优秀的厨房夫人的浑身解数，做上七盘八碗，全家香香美美饱吃一顿。碰上卢叔犯懒不肯出门挣钱的日子，便熬一大锅高粱米粥或苞谷面粥，从早喝到晚。院里的女人们都说，卢家的大人孩子不亏一副胃肠。只有我母亲对这种初一撑死初五饿死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却没发表过评论。

卢叔自从情感经历受挫，对“野花”再也不存半点浪漫。变成了个专一不二的丈夫。收破烂以外的剩余价值，全部体现在酒棋二字上。守着酒瓶子，哪怕只有咸菜条，两斤“老白干”醉不倒他，自诩是“酒太极”的功夫。一旦醉倒，便捧着半导体歪在炕头听京戏。这是七成醉的表现。八九成醉的时候摔东砸西。十成醉的时候怵目惊心，握一把菜刀或一柄斧头，站在房顶上跳跃着骂大街，扬言和张三拼命，和李四不共戴天。张三或李四，大抵会来为了什么事向他赔礼道歉。这条街上住的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谁愿和他拼命、和他不共戴天呢？“大哥，别生气！我那是醉话，咱哥儿们！你是我大哥！我哪能跟你拼命啊！……”他见好就收。能见好就收，证明他那十分醉也是不无水分的。我们院的人家没搬来前，他已经获得了两个绰号。当面一个，背后一个。当面人称他“卢二爷”，包含敬畏的意思；背后提起他，则都叫他“卢二驴”。我们搬来后，他企图只对我们公开第一个绰号，保留第二个绰号。事不由己，只好左耳听愿听的，右耳听不愿听的。

母亲最初挺惧怕他，曾叮嘱我们：“千万别惹他啊。惹了他，他拎着菜刀斧头闯进家里来拼命，你们爸爸远在外地，是妈能抵挡了他？还是你们能抵挡了他？”母亲的惧怕心理影响着我们。我们见了他，都赶紧低下头退避三舍。

有次他又喝到十分醉，大雪天，脱光了膀子，从他家房顶转移到我家房顶，跳跃着破口大骂某人，操一柄铁锹，舞得上三下四。蹦塌了我家一大片房顶。吓得母亲和我们躲在屋里不敢出门。过后，母亲到他家去，用些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慰他。

他受了感动，对母亲说：“老嫂子，难啊！我一个收破烂的，又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名分上低三分，不借着酒装驴装虎，怕受欺负呀！”第二天还买了两听罐头送过我家来，给母亲“压惊”。

母亲又这样对我们说：“其实你们倒也不必怕他。他心眼不坏，不过是个驴脾气，得顺着毛儿摩挲。顺着毛儿摩挲他，他还是通情达理的。”

大概因为母亲深谙与他相处的科学之方法，他对母亲从此很是尊重，不叫“老嫂子”不开口。使我们渐渐对他感到亲近起来。

他棋下得确实好。没被开除公职前，曾荣获全省职工象棋大赛冠军。那是他所获得的最辉煌的荣誉。傍晚在街头电线杆下摆出黄杨木棋盘紫檀木棋子时（冠军的奖品），不可一世的样子如同拿破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

棋如山，落棋不悔。是当之无愧的马路坛主，街头棋王。所向无敌，非他自吹自擂，乃公认的事实。

和卢叔最早建立交情的是姜叔。姜叔是一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大集体性质的小小制本厂的工人，卢叔的新棋友，因有幸加入卢叔的棋友行列，颇引以为荣。两人由棋友而朋友，推动两家关系过从甚密。

姜叔家的左邻是张叔家。张叔是一个区属的一个片儿的几个小商店的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负责同志”，算我们这个大院里有点权力的人。其余几家买不到火柴、灯泡、肥皂、酱油、面碱一类东西时，少不了要走走他的“后门儿”。他乐于为众邻开这类小“后门儿”。

姜叔家的右邻是孙叔家。孙叔是当年哈尔滨市独一无二的龙江木器厂家具车间的主任——正科级。比起张叔来，在众邻眼里，身份自然又不同。他是个很有官相的人。天庭饱满，地庚方圆。他不爱说话。无论在院里还是在街上，你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他绝不主动对你开口。邻居男女们都认为他摆科长的架子。其实是他的本性如此。

孙叔家的隔壁是窦叔家。窦叔是一个街道机修厂的车工。那个厂比姜叔的制本厂还小，八十多人。窦叔和斜对门的马叔相好，都具备那么一点点音乐细胞。窦叔有一把小号，马叔有一支黑管。晚上常合奏，都是院子里的孩子们崇拜的人物。

除了我的父亲，马叔就是院里年龄最长的一个男人了。那一年五十。据说念过“国高”，又是煤炭公司的会计，便成了我们院里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他也难免好以知识分子自居。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和我同岁，也读初三了。

我们家是院里生活最艰难的一户，受着众邻居的许多帮助。怀着感激的母亲，对哪一家都非常卑恭。父亲虽然远在四川工作，家里却悬挂满了他的奖状，体现着我们这个家庭崇尚容誉的家风。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贴在我们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两侧的大红字标语。证明着我们那一代中学生思想意识中明确而又远大的使命感。

十七岁的我，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发育不良，还没长到一米六。吃野菜造成的浮肿虽以消退，对饥饿的印象却镂刻在大脑皮层上。如同纤细少女般瘦削单薄的肩膀扛着一颗自以为成熟了的头。全中国和全世界装在里边儿。它仿佛随时会被种种热忱和种种激情一下子鼓破。

陈家全平百米世界记录——美国四十多个州的数万公众在白宫前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向欧阳海学习！——向王杰学习！——向钢铁战士麦贤得学习！——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儿子阮文追学习！——向越南人民的好女儿贞姐学习！——参加反对“日韩条约”的集会——参加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集会——参加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诚地接受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学大寨支农——学大庆支工——学军时刻准备狠狠打击敢于来犯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学习李素文，争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

兵……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亲爱的同志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

“拉丁美洲火山爆发了，美帝国主义正在灭亡……”

“我是一个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

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们便会有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传板上，画着毛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并肩站在一起的油画；画着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亲切握手的油画；书写着醒目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阿友谊万古长青”、“美帝必败、越南必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

阮文追、贞姐取代了我们内心里卓娅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的共和国一起密切关注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帝反修斗争的形势。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每个月只发给我一张买五两肉的肉票；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规定给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粮是不够我吃的；不介意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捂了的；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电灯泡而在蜡烛光下完成作业；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面碱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馒头；不介意我们的新家是大跃进中家庭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舞之下盖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银霜，夏季漏雨，墙皮反潮。不介意一切。“忆苦思甜”在我身上发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着，形象，具体，深刻。补充以其它各类“忆苦思甜”活动，我简直没半点理由对我们的共和国抱怨什么，对我诞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新中国的幸福怀疑什么。

由小学生而中学生，仿佛一下子有永远也参加不完的运动等待着我去参加，有永远也学习不完的死了的或活着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要求我一个接一个不断去学习。我乐此不疲。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全部体现在我身上。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使我铭记不忘的运动我不过只参加了三次：大炼钢铁运动——我将家里的一口小铁锅捐献到学校去了，害得母亲以后只能用一口大锅又做饭又炒菜。实现共产主义运动——我和我的同学们组成宣传小组，在公共汽车上和试点商店中宣传无人售票售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觉将钱投入投钱箱就下车或拿了东西大摇大摆离开商店的人批评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觉悟太低，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共产主义才迟迟不能实现。不久那些试点公共汽车和试点商店便一概取消。因为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

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取”，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挖蛹运动——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荡荡走出校园，以班级为阵容，包围一个个公共厕所，展开“歼灭战”。提出的口号响亮而具有战斗性——“挖出一个蛹，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伟大口号。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灵活多变的公式。如在作业本上自己寻找出一个错别字并加以改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者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后来初中下乡劳动时，演变为除掉一棵杂草，也等于除掉一个阶级敌人。反之，若锄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战场上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友。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下乡劳动中，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眼女同学，一锄头下去，锄倒了一片苗。同学们开她的批评会，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释：“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学们听了个个愤然，七嘴八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个排的战友啊！”“你这是犯罪！你的锄头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致使她接连两天没吃饭，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干枯的秧苗，泪涟涟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

基于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行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举不胜数。如今细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个模式的一代人。谓予不信，重新闭关锁国，对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婴儿一律实行“专门”教育，想以什么主义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后不“造就”出什么主义的一代忠实信徒才怪呢！

惭愧，象我这么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从收破烂儿的卢叔那儿获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卢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门坎，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围着小炕桌吃饭。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窝头，一盘咸菜，一碟酱，几根葱。

母亲端着碗，抬头看了卢叔一眼，反应迟钝地问：“搞卫生？”

几天前，精神病院寄来了催交哥哥的医疗费清单——三百余元，母亲筹借不足这笔钱，连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我知道母

亲毫无热情应付街道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进行的卫生大检查运动。

“老嫂子，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卢叔振振有词，语气十分庄严，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认为你制造政治谣言，扰乱民心了！”母亲善良地告诫他。

“嗨，老嫂子，我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还敢制造政治谣言吗？我今天收了一卷报纸，其中有一张《北京日报》，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场运动不就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么？”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该操心的事儿。他老人家认为应该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话题一转便问：“他卢叔，你能帮我筹借些钱么？你大侄子的住院费……”

“这……”卢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帮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数难逃蛙！”

“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母亲复叹口气，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中央那么多大干部，就没有一个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议提议，先别搞运动了，先就灾要紧啊！”

“不是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我说的三家村是吴南星那个村……”卢叔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么星？共产党不是反对迷信么？还讲星相啊？”母亲被卢叔的解释搞得愈发糊涂，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瞧着卢叔，以为他又喝醉了。

卢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没醉。

“听了半天你也没明白！吴南星是个人，写了本书叫什么《燕山夜话》，报上批判说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卢叔努力要使我的没有文化的母亲明白而且相信，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始。

“《燕山夜话》不是吴南星写的，是邓拓写的。”我对卢叔的话加以纠正。

《燕山夜话》我读过。《三家村札记》我也读过。这两本杂文集，继秦牧的《艺海拾贝》出版后很受喜欢文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视，争相传阅。《一个鸡蛋的家当》已在我的许多同学之间成为互讽的隽语。但我当时却不知道邓拓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亦不知“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我一直以为邓拓和“吴南星”是两位作家。

“你一个小孩子掺什么言！”卢叔因为我指出他张冠李戴的错误，有几分不高兴，训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辩，饭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窝头，离开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旧报中翻找到使卢叔对我母亲发表了一通预言的那份《北京日报》。

果然，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竟占了三个版面！

那一张报纸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浏览那篇文章，卢叔不知何时离开我家，已站在姜叔家窗前，高声大噪地说：“姜大哥，读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哈尔滨晚报都没订，哪儿读《北京日报》去？”姜叔家传出姜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有一份，一会你看看！”

“不看，没那闲工夫！”

“马大哥，马大哥在家么？”卢叔又转移到马家窗前。

“什么事啊？你满院大呼小叫的？”马家窗前，出现了马叔瘦高的身子。

“你这大知识分子，该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吧？看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看过了啊。”马叔不动声色。

“有何见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场什么政治运动了呀？”卢叔总算找到了一个可能有共同语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马家的窗台。

马叔也扫了他一大兴：“无可奉告，我是个不谈政治的人。”

卢叔识趣地从马家窗台上蹦下来了。

张叔踱出家门，调侃的地说：“你卢二爷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政治了呀？”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张叔继续调侃道：“你别假积极，要是再搞场什么运动，说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卢叔嗓门更高了：“我卢二爷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顺的工人阶级了，总还没被开除无产阶级队伍吧？起码谁也得承认我还算个流氓无产阶级！只要我还沾着无产阶级点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绝对不忍心整到我头上！”

“好！说得有理！”张叔哈哈大笑。

卢婶从屋里走到马家窗前，拽住卢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边说：“你给我回去！你给我回去！灌了几口马尿，就东家西家地扯闲篇，让人讨厌不？”

卢叔被扯将回来，见我还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发呆，不无遗憾地嘟哝：“全院就你这么一个关心政治的！亏咱们这院还是个‘四好’院！”

姜叔随后跟过来，说：“得了吧！张口政治闭口政治的，好象你是个政治局委员！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头，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盘棋来，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杀几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一盘！”

“赢我？你姜大哥还嫩得很哪！”卢叔精神大振，兴奋中枢顿时转移。

于是他们就下棋。

一会儿，马家传出了黑管和小号的合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

我仍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坐在卢家那堆旧报中思索：报上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个信号吗？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果真就要来临了吗？我有点不相信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四月十六号的报纸，那一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一号了，这几天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马叔和窦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于邓拓和吴晗两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们遗憾。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将！你死棋无解了！”猛可地，听得卢叔满怀胜利喜悦大喝一声。

春天的晚风习习吹拂。院里那棵老榆树轻轻摇晃着满枝肥嫩的榆钱儿。月亮在人们不经意间升起来了。向我们的庭院慷慨地洒下如水的月光。憋闷了一冬季的院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这个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愿呆在家中。

两个棋迷又重新摆开了一局，张叔不知何时凑在了旁边，喝五吆六乱支招儿。

女人中传来了母亲不很舒朗的笑声。

我很久没听到母亲笑了。

连平时不太合群的孙叔也迈出了家门，自言自语：“今晚院里好热闹！”说完，转身进屋了。一会儿搬了把椅子又出来，坐在自家门口，手捧着半导体，戴着耳塞，不知独自听什么节目。

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院里其他孩子们聚在马家窗外，静听黑管和小号的合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在院里悠悠回荡。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夜晚，是我们院所有人家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和睦的，友善的，安宁的，愉快的夜晚。

那个难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语文老师姓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位四十多岁身体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举手。”

我环视两旁，无人举手。

我犹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许久没移开。她仿佛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学举手。

过了几分钟，还是再没有一个同学举手。

她终于对我说：“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笔盒沉思起来。她脸上有种惴惴不安的表情。好象她预感到了某种威胁，但又不知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她的反常神态使同学们奇怪。坐在我两旁的同学将目光投到我身上。

终于，她抬起头望着大家，以诚恳的语调低声说：“同学们，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检查，承认错误。上个星期，为了指导大家学习杂文写作，我曾在课堂上向大家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公开批判，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我给大家读过的那几篇，是这两本书中问题最严重的几

篇……我……我已经向学校领导交了书面检讨……我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于……在课堂上间接地传播了坏思想……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很内疚……我欢迎大家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犯这种性质的……错误……今天的作文课，不再写杂文了，改写记叙文，文题不定……大家任选吧！……”

说完这一大番话，她脸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绢擦脸。

在大家埋头写作文的时候，她轻轻走到了我身边，低声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有话对你讲。”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将教室门掩好，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师的错误非常严重，你要是对老师今天的检讨还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当面向老师提出来……”

我的语文成绩一向较好，是她喜爱的学生之一。我连连摇头，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没有。”

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

“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

“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

……

哈尔滨郊区农村发生严重虫害。两天后，我们全校师生到松花江北支农去了。苞谷苗长起了一尺多高，大头菜刚开始抱心儿。铅笔那么粗火柴杆那么长的青色肉虫，白天怕晒，隐蔽在苞谷苗和大头菜的叶背面，却不停止啃食。天可怜见！社员们的黄泥小屋后墙上，无一不用白灰刷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争取高产稳产，努力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学习大寨好榜样，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标语，由于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粮食未收，生产队今年竟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的地步！仅有的一台破旧的喷雾器也坏得根本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

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

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立刻失声尖叫，仓惶跃起，奔逃开去。有的浑身瑟瑟发抖。有的脸上吓得变了颜色，冷汗淋漓。

几个平时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学都不愿显示他们的勇敢了。

老师也是怕的。老师怕也只好装出不怕的样子给同学们做“示范”。“示范”无效。老师就在地头组织我们坐下来学英雄人物，学革命先烈。

老师说：“大家想一想，如果麦贤得和我们在一起，会象我们这种样子吗？”

同学们都羞惭地垂下了头。

老师又说：“大家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连死都不怕，我们今天却怕危害农作物的肉虫，可耻不可耻？”

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但仍没有一个人表示愿作榜样。

老师最后干脆说：“反正这个生产队的虫害包给我们班了，早灭一天虫，早一天回学校上课。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已比其它中学落后了好几节，你们升不上高中可别怪老师！”

大家纷纷抬起了头。

升不上高中，对我们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比老师更清楚。

于是我们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万条青色肉虫的“战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灭虫？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

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疯昏厥了。

然而为了早日返校上课，每一个同学都以最大的勇气克服胆怯。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们。我们命中注定将受它愚弄。正如收破烂的卢叔所说的那句宿命观点——劫数难逃。

我们在江北农村度过了“五一”。

支农劳动结束后放了三天假。

我们重新开始坐在教室的那一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很久，不见一位老师的影子。老师们被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什么“紧急会议”。

忽然安装在教室门右上方的喇叭箱里传出了校长的声音：“全校同学们，经校领导和全体老师一起讨论决定，今日不上课了，收听重要广播。收听后，召开全校大会！”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又侵犯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领海领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又掀起了反华叫嚣了？蒋介石又向大陆派遣特务组织了？我国外交人员又发表了什么庄严声明或强烈抗议了？……

全班同学交头接耳，猜测判断。

喇叭箱嗡嗡响了一阵，一个男性严峻的声音开始冲击我们的耳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我顿时想起了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在经历了灭虫劳动后，我变得很神经质，夜里常常做恶梦，梦见自己浑身爬满了青色肉虫，它们啮咬着我。

早已将卢叔那天晚上的预言忘得一干二净了！

果然如一个收破烂的卢叔所料！

那个男性的严峻的声音继续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充满浩然正气，充满压倒一切的战斗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体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几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我内心里煽起难以平静的情绪。

“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入’的……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

“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的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

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广播结束，教室内仿佛弥漫着炮火硝烟。静极了。同学们都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现着僵刻呆板过分的严肃，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个历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彻底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战斗檄文”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班主任老师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张报纸。她还没结婚，只比我们大七八岁。我从小学考入这所中学的那一年，也正是她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所中学的那一年。她出身于纯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同学们，”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发抖：“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清除资产阶级黑线的严峻斗争中，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奋勇冲上去！冲到第一线去！下面我再给大家读《解放军报》四月十八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这篇社论强调——“搞掉这条黑线，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话，是毛主席的话。

“同学们，”班主任读完社论又说：“过一会儿全校师生要在操场上召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宣誓大会……”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最后落在我身上，说“梁晓声，你写一篇决心书，一会儿代表我们班发言。”说着她看了一眼手表，提醒我：

“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要写多长，要快！能表达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决心就行！今天的发言不排顺序，我们班是四好班，一定要争取第一个发言！……”

我的思想生了双翅，驾着这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荡宇长风翱翔，翱翔，“扶摇直上九万里”，根本无法降落在稿纸上。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钟内写不完一篇象样的决心书，使我们这个“四好”班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丧失了第一个登台表决心的机会，正要举手推却，见语文老师走了进来。

“姚老师，”她对班主任说：“能不能让我占用几分钟时间？我有极其重要的话对同学们说！”

班主任皱起了眉头：“你想说些什么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学们检讨自己……在课堂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严重错误，不，不是错误，是罪行！我……”说话一向从容不迫的语文老师，因急切而结巴。

“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班主任不愿意。

“姚老师，我……我恳求你！……”语文老师的语调几乎带出了哭声。

“等开完全校大会你再对同学们说吧！”班主任的态度十分坚决，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开全校大会之前说的呀！姚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吧！……”语文老师真哭了起来。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愿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许。

“同学们，”语文老师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一边说：“同学们，我上次对你们的检讨很不深刻！上次的检讨中，我还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不过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去认识……他们是一伙黑帮，他们反动透顶，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个，不，我不是，我虽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于想说明清楚她自己是什么，一时越说不清楚。她语无伦次起来。

我坐在第一排，离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泪不断涌出的。她手中那条小手绢已湿成了一团。我鼻子有点酸。我心里暗暗怜悯她。我知道，她绝不是存心要在课堂上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她不过就是想给同学们读几篇范文而已。如果我当时知道她因被划过右派，丈夫跟她离了婚，并带走了她唯一的一个女儿永远不许她相见，随后她在某农场被改造了四年，两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联名担保下方得以回归教育队伍，我想我不仅会怜悯她，也许还会对她产生同情。

为了提高我们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这是全班同学都不能否认的。

“梁晓声！”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惊，不由得站起。

“你还不快写！”班主任有几分生气了。

我又立刻坐下，从书包里翻出纸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头脑中混乱一片。

“庞老师，你不能再侵占我们班的时间了！”班主任的语调，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是抗议了。

“我……我……”语文老师再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头，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门口似乎欲转过身来，也再看我们全班同学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觉她意识到了又一次厄运将落在自己头上，怅怅然若向我们继续解释什么，替自己辩护什么。她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并没转身，缓缓地离去了。

全体同学都望着教室门口。教室里鸦雀无声。

从此她再也没给我们讲过课。

“李元昌！”班主任叫起了班长，说：“开全校大会时，你要带领咱们班同学喊口号！”

“喊……哪些口号呀？”班长讷讷地问。

“按照我写的喊。”班主任说着，走到我跟前，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便写。写好后，经同学们传到了班长手中。

班主任又说：“李元昌，现在你立刻组织同学们到操场上集合！梁晓声，你可以留在教室里写发言稿。”

走廊里传来了一片脚步声，不知是哪一个班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了。

“快，快！”班主任着急地催促大家。

于是同学们一窝蜂地拥出教室。

走廊里又是一片脚步声。

刚刚安静了半分钟，众多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脚步声中，我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盯着这行字我愣了几秒钟，意识到这一行字也正是刚刚听到的报上那篇声讨文章的标题，大有“照抄”之嫌，刷刷两笔划了去，重新写下“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打倒谁”一行字，又发愣。一句句充满战斗性的话在我头脑中盘旋，全是《解放军报》那两篇文章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集中思路，将那些话排列在一起，凑成决心书。

整个教学楼终于彻底安静了。

我的语文老师仍占据着我的心。她刚才那样子真使我难受。

握在我手中的笔就是她送给我的。

有一次作文时，她见我蘸水笔写字，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用吸水笔？”

我回答：“吸水笔丢了。”

她说：“那你得买一支呀！”

我接连丢了两支吸水笔，不愿再向母亲要钱。难言之衷，也不愿向她解释，便低下头去继续写，不回答。

她见我使不惯蘸水笔，深一划浅一划的，便默默地将她这支金笔放在了我课桌上。

下课后，我到教员室去还她笔。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家生活很困难是不是？”

我点了一下头。

她又问：“我这支笔你使着还好吗？”

我又点了一下头。

她说：“就送给你吧。我倒是用蘸水笔用惯了，用得着吸水笔的时候不多。我还有一支圆珠笔呢！”

我说：“这是金笔呀，我怎么能……”

她打断了我的话：“快拿走了吧，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我现在要批改几篇作文……”

也许因为这支笔是她送给我的，我再没丢过……

“梁晓声，你还坐在这儿发愣呢！老师都快让你给气死啦！”

一个女同学吁吁带喘地闯入教室，嚷完了话又一股旋风似地消失了。

糟糕！全校大会已经开始了！

一阵阵口号的声浪从外面扑入教室：

打倒邓拓！

打倒吴晗！

打倒廖沫沙！

打倒“三家村”黑店！

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

虽然“决心书”除了标题还一个字没写，我也不敢再耽误一秒钟了，顾不上多想，扯下那页只有一行标题的纸，万分紧急地奔出教室，一口气从三楼跑到一楼，直跑到操场上才收稳脚。

操场上临时摆了几张桌子，算是个“台”。学校的领导们端坐在“台”上，全校学生一班班盘腿坐地。一个班级的代表正一手握麦克风，一手拿发言稿激昂地大声发言。十几个期待发言的学生身体紧挨着身体排在发言者后，生怕谁“夹楔”似的。那一天刮大风，操场刚垫过沙子，沙尘笼罩着所有的人。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我跟前，极度失望地问：“你在教室里干什么来？决心书写好了没有？”

我不敢告诉她除了标题一个字都没有写，撒谎说：“写好了。”

她信了，就将我推向“台”那边：“快去吧，发言时要情绪饱满！”

轮到我发言，我先喊了一通“打倒”之类的口号，接着大声疾呼：“我们革命的学生，坚决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要做阶级斗争前沿阵地上的敢死队！不怕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战斗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回合！有我们在，就有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在！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掌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

这番话，是我在情急之中在未轮到我发言的二十几分钟内一句句硬憋出来的。没有发言稿，效果反而更好，情绪也的确饱满。因为众多的人所营造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已使我完全开始相信，邓拓、吴晗、廖沫沙毫无疑问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除了他们，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尚未暴露反革命嘴脸！如若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又为什么要连续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首先动员起来了，作出了战斗姿态，我一——一个诞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学生——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岂能置身于这样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运动之外？！

我归到班级坐下以后，情绪仍然十分激动。发言时沙子迷了我的眼，我没顾上揉出来，这会儿眼泪就一个劲儿

地往外淌。

班主任从后边走到我身旁坐下了，将她的手绢塞在我手里，表扬说：“很好。你的发言很好。你的感情也很对头！老师刚才有点错怪了你，别生气。”

她大概以为我的眼泪是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淌出来的。

校长在讲话中这样说：“正如初三二班代表发言所说，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这就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这就是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无产阶级义愤！……”

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校长引用一个学生的话，也算是“史无前例”的。

班主任亲切地微笑着瞧了我一眼。

我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好不得意！

语文老师出现在校长身旁，恭恭敬敬，虔虔诚诚地弯下腰对校长说：“校长，我曾在几个班的作文课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虽然我已经写了书面检讨，但很不深刻，请您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进行批判吧……”

因她说话时口也对着麦克风，我们听到了。

校长未看她，也未置可否。继续讲话：“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将必然从北京深入开展到全国，从社会深入开展到我们学校……”

语文老师就那么微微弯腰站在校长身旁，不死心地等待着校长的讲话结束。

校长直到讲完话也未看她一眼。

她又失去了在全校同学面前公开检讨和批判自己“错误”的机会。

几个同学往楼内搬桌椅和扩音器的时候，她仍怔怔地站在那儿……

口诛方罢，继之笔伐。

各班派同学到总务处领纸、墨、笔，开始大写特写声讨“黑帮”的“战斗檄文”，或画漫画。

我们班首先将一条“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誓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血战到底！”的字字巨大的标语贴到了

校门两侧——它向全社会声明了我校革命师生旗帜鲜明的立场，也弥补了我们“四好”班没能第一个在全校表决心大会上发言的荣誉损失。

“战斗檄文”尽属“即兴创作”。

我写了一句：“邓拓、吴晗、廖沫沙”，

有同学立刻续一句：“他们三个是一家，”

第三句来得更快：“他们反党反人民，”

第四句早有人想出来了：“你说该杀不该杀？”

大家齐声读一遍，合辙押韵。

“结束在问号上么？问谁呀？”

“还问个什么劲？该杀！”

“对！加上两句——该杀！该杀！！”

“再加一句——打发他们回老家！！！”

更有众多同学从旁提出商榷，补充。

于是一篇“战斗檄文”墨汁淋漓地贴到了走廊上：

邓拓、吴晗、廖沫沙，

他们三个是一家，

他们反党反人民，

你说该杀不该杀？

该杀！该杀！！

打发他们回老家！！！

不久这诗体“战斗檄文”不胫而走，从校内流传校外，成了千万小女孩跳皮筋时唱着很顺口的“革命儿歌”。

由一代小女孩传给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从一九六六年一直唱到一九七六年……

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员室，所有的老师也在舞笔弄墨。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我有，但不知老师所问究竟何意，出于一个中学生保护自己的本能，立即摇头否定：“没有，没有！同学们胡说八道！”

她说：“你肯定有！老师要求你贡献出来，当作同学们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许我有……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个正在写“战斗檄文”的老师悬腕止笔道：“姚老师，要是他能找到，先给我们化学教研组批判用吧！我们这些教化学的老师还谁也没看过呢！”言罢，又落笔挥洒起来。

我见他写的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的反动实质就在于，攻击的矛头是直指党和毛主席的……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竟没有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学和老师读过？鬼才知道！

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互相道出几句真心话。

“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鉴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跟他动手。搞得他十分（九监）（九介）。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间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街道和马路两旁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都有人在贴“声讨书”、“决心书”、“誓言”以及“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忠信”之类。受到毛主席老人家高度称赞和评价的大字报最初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种种内容产生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中国人，都唯恐自己在这场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被认为表现消极，漠不关心。人民随时准备声讨党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伙“黑帮”，口诛之笔伐之。因为人民绝对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也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基于这种“绝对相信”，可以推测，如果人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定会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是那么习惯于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永恒的信仰，极少有人冷静地关注到，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而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推动起来的。人民更不可能预想到，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将党中央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让党政军各级领导者和每一个中国人明确表态，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天很黑。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记忆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幸亏有那件大衣啊！否则，穿着湿衣服湿裤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冻死。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昼夜交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对，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对伍，红卫兵的对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对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的。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对伍。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象隐藏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里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四个多小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在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东西。肠胃饱了。湿衣服被身体烘干了。太阳出来了。人人都觉得暖和了些了，便兴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几名解放军都很善于鼓动情绪。领唱，挥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将人人的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亢奋。

街道两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儿，开不了门。一户户的窗口贴着一张张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脸，没够地往外瞧我们。有人渴了，向他们讨水。他们就打开窗子，捧出一杯杯热水，茶水。讨吃的，他们也极慷慨地给予。道谢，他们都说不用谢，招待外地红卫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当年红卫兵中有手表的可不多。几名解放军战士也没手表。那位营长倒是戴着块手表。可大家都不愿向他问时间，怕他轻蔑我们的耐心。便不隔多时，敲窗子问一次屋里的首都居民。他们不厌其烦，有问必答。有些老人和孩子，则主动地打开窗子，一次次向我们报时间：

“八点半了！”

“九点！”

“九点二十五！”

“九点四十五！”

“十点啦！”

于是满街一片欢呼声：

“十点啦！十点啦！”

“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啊！”

欢呼过后，队伍还不见动。满街的红卫兵骚乱起来。

解放军努力安抚，说是刚刚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体不适，检阅我们的时间有所推迟。

仿佛一盆凉水泼向众人头上，满街红卫兵的情绪顿时低落。都唯孔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登不上天安门城楼，这一天检阅不成我们。

等呵等呵，至中午十一点半，拥挤在那条长街里的我们的“杂牌军”，在正规军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走动。

东四大街（也可能是东单大街）被红卫兵的对伍水泻不通地占领了。三十人一横排，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跑一阵停一阵地前进。

能听到《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声了。

天公作美。夜间虽然寒冷，白天竟晴空万里，红日当头。

转上通向天安门的马路，队伍由三十人一横排而六十人一横排了。各路大军总汇合，欢呼“万岁”的声浪从前方黑鸦鸦的人头上滚将过来：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如远闻海潮。

欢呼声仿佛在招唤我们，盖住了解放军统一步伐的口令。对伍乱了。没有对形了。变成一股人流，一阵阵势不可栏地向前汹涌，一阵阵冲到了铜墙铁壁似的，以更汹涌的反力卷荡回来！

终于，我望见天安门了！

终于，我接近天安门了！

天安门城楼空空荡荡。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个多小时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

看见了毛主席的，还再想看见。没看见毛主席的，不甘心没看见。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象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门或面朝天安门，全不由己，只有顺着那股漩涡转。

《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了！

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带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啸了。群情鼎沸。“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

也许我离得太远了，也许天安门城楼太高了，出现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

沐浴着下午的阳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没我预先想象的那么高大。站在天安门城上，在我们的仰视中，甚至可以说显得很渺小。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统帅”，简直显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中毕竟最高大，所以我还是一眼就判断出了哪一个是他老人家的身影。并且别的人一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动，都站得很靠后，只能隐约看到些头。所以实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成千上万红卫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

毛主席显然也非常兴奋，一会儿走向东侧，一会儿走向西侧，一会儿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国徽之下那个地方。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挥手向红卫兵致意。时而挺身远眺，仿佛在注视天安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俯身低视，仿佛要同仰视他的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交流什么感情。“林副统帅”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毛主席走向东侧他跟随到东侧。毛主席走向西侧他跟随到西侧。毛主席站住他亦站住。毛主席远眺他亦远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挥手，他挥语录。我们能仰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却只能仰到他的头和肩。尽管离得远，尽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毕竟显得伟岸，而他“最亲密的战友”却象个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所挡，又想象毛主席那样大幅度的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的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万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女播音员广播完，男播音员接着广播，语意相同。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象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的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兴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着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场”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场。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以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辨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么，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么，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检阅早已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干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印。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

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么？”

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点点头。

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

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

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是蒙文写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亲笔写的！你想一元钱一个字就买去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就那么不值钱啊？她们的签名就白送给你啦？一分钱也不算啦？十年二十年后，要成立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什么的，我这破背心是有展览意义的！”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

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

省委领导人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受什么批斗之苦。

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象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不能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并不看重因而才推出来的潘复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睐，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他们的范大哥仅仅获得了一个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仅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骗了。被愚弄了。他们愤怒了。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宣布诞生的当天，他们在全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几条是：

“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意在指其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挤。

“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东北新‘鼠’光好景不会长久！”

“我们要坚决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

“炮轰派”即此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潘复生被他们从疗养病房中请出来时，对他们不但确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简直受宠若惊。他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呢！造反派们没给他什么厉害的颜色看，允许他继续住在高干病房中“疗养”，他就很觉得是自己的大幸运了。造反派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弯腰低头，浑身瑟瑟发抖，不敢拿正眼看他们。当他们告诉他，要“结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前来试探他有没有这分野心，畏畏怯怯地连声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当他们终于使他相信了这种命运的大转变时，他激动得刷刷流泪，信誓旦旦地向他们

保证，从此永远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不但由“靠边站”而被“结合”，而且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

他一坐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第一把交椅上，立刻对他们翻脸无情，实施严厉打击的铁腕。他将那些敢于“炮轰”的学生统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令逮捕、通缉，视为要犯悬拿。他自以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御批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公正论之，他肯定希望全省从此太太平平，政局安稳。这是任何一个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都会产生的政治憧憬。也不失为顺乎民心的憧憬。

但“炮轰派”们并未因他的镇压而屈服。他们更加愤怒了。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再度权倾一日再度被打翻于地的。他们由公开“炮轰”而转入“地下活动”，四方呼吁同情，八方串联盟军，伺机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他们对他既蔑视又憎恨。

被昔日的造反派弟兄们称为“范大哥”的范常委，正因仅仅当上了常委而没当上“革命委员会主任”感到失意，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心怀不满，便籍口潘复生镇压为“东北新曙光”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战士，退出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与这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战士还凶恶的全无半点无产阶级政治良心的“潘家委员会”彻底决裂！

潘复生没有足够的胆量逮捕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不得到中央文革的允许，他奈何不了范正美这样一个人物。他恼羞成怒，却又无计可施。实际上，他各方面的威望，也的确不能与范正美相提并论。而中央文革之所以确定他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仅仅因为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有过一条批示——革命委员会还是要以革命干部为主，老、中、青要以老为主。中央文革甚至连潘复生是何许人都不甚了了。所谓以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名义发来的贺电，不过是“中央文革”炮制而已。

范正美的决裂行动，使踌躇满志，刚刚春风得意起来的潘复生当头遭到一闷棍，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的政治头脑清醒过来之后，立刻采取拉拢手段，表示愿意亲自向中央文革上书，替范正美吁请一把“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交椅，与范正美同握权柄，共举大业，然而为时晚矣！

“老造反”范正美打心里就跟本瞧不起潘复生。他这个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人物，要坐的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副主任满足不了他的政治愿望，也实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索性一反到底，孤注一掷了。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他充当起“炮轰派”们的领袖来。

“炮轰派”的中坚力量，大抵都是姓名落地有声的响当当的老造反派，范正美的生死“战友”，他们的的确确是一批从来不知什么叫“怕”的造反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冲杀杀，所向披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

潘复生居然妄想一举剿灭他们，他们岂能咽下这一口恶气？“范大哥”又重新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更有何惧哉？他们如虎添翼，士气大振，斗志凶猛，信心倍增，要将这个刚刚诞生的使他们不称心的鸟“革命委员会”一口吞下方解心头之恨。他们由地下活动复转入公开斗争，形成了对“东北新曙光”的极大的威胁。

一切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实现政治愿望，感到失意的组织，纷纷集合在“炮轰派”的大旗下，声势日益壮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风雨满楼，摇摇欲坠。

“炮轰派”们二次夺权，一举攻占了几所大学和几座大工厂，作为“根据地”，召开了数万人的“炮轰誓师大会”，成立了“炮轰总司令部”。

潘复生为挽救局面，巩固交椅，以省军区政委名义，下令军队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武装捍卫。他也只有这唯一的政治选择了。

被中央文革限期迫令解散的“八·八团”的头目们，见有机可乘，召集各路旧部，组成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归顺省“革命委员会”，愿听“潘主任”指挥调遣。

潘复生正苦于没有群众组织力量的支持，对“捍联总”的成立大加赞赏，亲自参加“捍联总”的成立大会，将当初与“炮轰派”们说过的“同呼吸共命运”的话，又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了一遍——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选择。因为这样一来，他这个刚任命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实在是太容易被“炮轰派”们又抓住一条与中央文革早已定性的“保皇派”组织沆瀣一气，镇压真正“革命”左派的罪名了。但倘不如此，仅靠军队来对付“炮轰派”，镇压的罪名更是无法洗清。利用“捍联总”这一群众组织与“炮轰派”较量，毕竟可以混淆视听。

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

“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

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

“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

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学“炮轰派”组织，而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炮轰派”。

十七岁的我，不，那一年我应该是十八岁了，当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加入“炮轰派”也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谁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事儿。象《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样，排上它十万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轮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轰派”的也并不是什么“正义”感，而是一种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人的一种常常自以为高贵的精神。又常常是与可悲的英雄人物们的命运同时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显示出高贵品质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驱使他们大冒傻气，一往无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八·八团”解散那一天，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由哈军工“八·八团”的领袖宣读中央文革措词严厉的“最后通牒”。读罢，宣读者泣不成声。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请求大家宽恕我。”

于是万人恸哭。哭声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个受了莫大委屈而又无处申诉的孩子。

万人边哭边唱：

远飞的大雁啊，

请你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八”战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笼罩会场的悲剧精神。

也许我看过的悲剧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它们对我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起到了影响。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英国的辉格党人，在渗透着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方面都令我无比敬仰。

悲剧精神是失败了的或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们的永远不败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中，象条经过训练的狗寻找踪迹一样，嗅到哪里有“悲剧精神”的似乎高贵的气味，就满怀准备自我牺牲的心理投奔向哪里。

“八·八团”演变为“捍联总”，对所有“八·八团”的旧部来说，由受压而开始压人，可能会感到复仇雪耻的痛快，扬眉吐气的骄傲。但对我来说，它正是因此而丧失掉了一种悲剧精神。它便同时也丧失掉了足以让我去为之斗争的号召力。

这好比两个拳击手的较量，我的感情总无法站在获胜者的一方，与之分享胜利的得意。而总是站在被击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并且我从来就不习惯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失败的痛苦比胜利的骄傲似乎更能丰富我内心的情感。我甚至认为深刻的情感从来都产生于失败的痛苦之中。失败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与深刻的思想是孪生姊妹。没有体验过失败的痛苦所获得的胜利，其骄傲，得意，兴奋和喜悦，都是索然无味的。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胜利者会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论道。

在“捍联总”与“炮轰派”之间，我便当然要加入后者的阵营了。

“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加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简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愿为之去死。觉得那样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贵的，无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轰派”占领的几所大学工厂被围困了起来。

“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

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

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

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

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不给“炮轰派”的儿女们办结婚手续。不给“炮轰派”的出生婴儿落户口。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的崭新政权”对“炮轰派”采取蒋介石对“共区”的封锁政策。

“捍联总”的广播车每天在“东方红城”驶来驶去，耀武扬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会变，

日夜在磨刀，

妄图反夺权，

我们时刻准备打，

誓死捍卫新政权……

“捍联总”的战歌，每天响彻“东方红城”。

“炮轰派”则采取“哀兵战略”，派出“别动队”，在黑夜分批将家属孩子掩护到“根据地”，与他们共患难。

于是许许多多市民，渐渐开始同情“炮轰派”来。“革命委员会”和它的“捍联总”大失人心。

“炮轰派”获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战略防御”转而“战略反攻”。

设在“哈一机”的“炮轰派”总部，常常派出“别动队”为自己的战士及其家属子女们搞粮食、煤、木柴、医药、蔬菜、孩子们的读书文具。因为“哈一机”是制造装甲车和坦克的，“别动队”出击，便有装甲车和坦克开路。

装甲车和坦克开到某一粮店、煤场、菜市或医院，手脚敏捷，身强力壮的“别动队”队员们，彬彬有礼然而气势凛凛地找到头头脑脑，说：“我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生存向你们借粮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蔬菜”、“借医药品”……

他们象当年八路军的武工队一样，短枪明面插在腰间，岂敢不借？

胆小的立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地回答：“好说，好说，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够不够？人手不够我派几个人帮你们装车！……”

胆大的可能会斗胆问一句：“什么时候还啊？我对上边总得有个交待呀！”

“什么时候还？等我们夺取了政权再还！”照例是这样的回答。

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写一份“借”据：

今借某某粮店面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两桶。革命胜利之后，如数归还。

“炮轰派别动队”

一九六七年×月×日

还要郑重重地盖上“炮轰总司令部”的鲜红大印。

还要嘱咐一句：“别弄丢了，好好保存，等我们掌握了政权，凭着它来找我们！”

当然一百袋，两桶不过是象征数字。

但他们有一点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骂，很象是“借”的样子。“借”据上写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绝不贪得无厌。

他们走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挺好的。有人甚至认为“炮轰派”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借”东西还留“借”据！“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组织不是怪少见的吗？

“别动队”没有给“炮轰派”的声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相反，倒是给被“捍联总”攻击为“炮匪”的他们涂上了种种传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样喜欢。传奇色彩竟冲淡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别动队”给“东方红城”带来了许多新故事。老百姓对这类新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茶余饭后有了谈话的资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着这些话题。用他们的想象丰富着这些话题。演义着这些话题。

“炮轰派”有时也使“捍联总”难以预测地冲出各个“根据地”，汇聚一起，举行示威。那是挺壮观的情形：装甲车和坦克前头开路，后面压阵。有时出动三四辆，有时出动五六辆。连他们的广播车也焊上了装甲钢板。坦克的乌黑炮筒高昂着、随时准备射出“愤怒的炮弹”似的。装甲车的机关枪口，前后左右不停旋转，虎视眈眈。“捍联总”虽然有省军区发给的优良枪支，但毕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省军区也没有装甲车和坦克。所以当“炮轰派”举行示威，“捍联总”便偃旗息鼓，绝不敢与“炮轰派”发生正面冲突。而老百姓则夹道观望，为其军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里，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普遍地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说：“左右也是个乱，总归也是个乱，那就让‘炮轰派’乱他妈个够吧！他妈的中国乱到不能再乱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结

束！要不是没个结束的！”

我们学校是“捍联总”掌权。只有几十个“炮匪”。我们不敢在学校里暴露身分。我们仍得参加“捍联总”的活动。我们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员”吧！我们经常对“捍联总”的活动进行点小破坏，比如将他们写在“紧急通知”上的活动时间偷偷更改啦，藏起他们的旗帜啦，盗走他们的公章啦，撕毁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啦，割断他们的广播喇叭线啦，以“炮轰派别动队”的名义往他们的头头家里写恐吓信啦……我们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如同革命电影中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觉得是在与“白色恐怖”进行卓越的斗争。

我们认为所做的一切还是不够英雄，无非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做的一些事。连“小兵张嘎”为革命所冒的风险我们还没冒过呢！

我们渴望着经历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们凑在一起商量，英雄所见略同——人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参加“炮轰派”的“别动队”。

腰间明面插着短枪，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抖擞威风，招摇过市，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将一份“借”据啪地拍在一张桌子上，凛凛地说：“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借……”

或者凛凛地说：“你们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随‘捍联总’了！我们‘炮轰派’总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权的！……”

那是何等的气魄？

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们一个个激动不已！重要的并不在于“总有一天”“炮轰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权。我们对什么乌政权一点也不感兴趣！政权掌握在谁手中对我们反正都是一个样。重要的在于，除了当“炮轰派别动队”，还有当什么更能使我们显示出自己是些铁血男儿呢？“别动队”——比什么造反团之类响亮多了！

于是我们纷纷咬破手指，合写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轰派别动队”的血书，由一人揣身上。当夜，我在家留了一张纸条——妈妈，我和我的战友们到我们的根据地去了。我们要为我们的根据地的存在而浴血奋战！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万不要难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乃我和战友们的铿锵誓言！

我悄悄离开家，与我的“炮匪”伙伴们会合在一起，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哈一机”外，摸过“捍联总”的封锁线，由一个下水道口涉着齐胸深的污水钻入了“哈一机”围墙内。

“炮轰派”的第一“根据地”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四辆装甲车三辆坦克成两列停在大门前，仿佛只要一声令下，就破门冲出。数千人头戴柳盔，手持大棒，严阵以待。另有三百余名“别动队”员，荷枪实弹，分乘六七辆卡车，个个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发。

原来“炮轰派”的一支“别动队”在执行“特别行动”时，受到“捍联总”袭击，尽数被俘，据“内线”报信，连日来倍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学地下室。

他们要去营救战友。

我们刚钻出下水道，便被发现，押到了一个女头头跟前。

她面容清秀，英姿飒爽。穿一套无领章无帽徽的男式棉军装。

她问：“你们从下水道钻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齐声回答：“坚决要求参加‘别动队’！”

她又问：“你们不是‘炮轰派’，要求参加‘别动队’干什么？”

我们七言八语告诉她，我们是“炮轰派”。

“什么人批准你们加入了‘炮轰派’的？”

“没谁批准，我们同情你们，我们自己批准自己是‘炮轰派’了！”

一个伙伴振振有词地回答。

她微笑了，转身望着她的部下们，大声说：“听清楚了吗？连这几个中学生也同情我们了！我们的处境真落到这般田地么？”

她的部下们却一个也没笑，异口同声回答：“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浴血奋战！死而后已！”字字铿锵，显示出坚如磐石的意志。

她又转身望着我们，充满自信地笑道：“你们也听清楚了么？‘炮轰派’并不认为自己可怜呀！”

我们争抢着回答她，正因为“炮轰派”在强权镇压下不屈不挠，我们才由衷地敬佩“炮轰派”！我们既然投奔“炮轰派”而来，就绝不回去！我们要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呈出血书交给她。

她看了一会，似乎大受感动，递给另一个人看。

那人看完，传给第三个人。

我们的血书在“炮轰派”的队列中一一传阅。

忽然队列中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潘复生！救回我战友！”

大棒擎举如林，数千人连声高呼：“救回我战友！打倒潘复生！打倒汪家军！打倒耗子兵！”

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又是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故“炮轰派”称省军区为“汪家军”。

“捍联总”捍卫“东北新曙光”，“曙”字被“炮轰派”贬为“鼠”字，故“炮轰派”称“捍联总”为“耗子兵”。

我们的棉裤棉衣都被下水道的污水泡湿了，直到我们的一个伙伴冻昏过去，才使他们发现。

她赶快命令一个人：“带这些小鬼到浴池去洗洗澡，再找几套棉衣给他们换上！”

于是我们被带到“哈一机”的职工浴池去洗澡。

等我们洗完热水澡，换上替我们找来的“炮轰派”孩子们的衣服走出浴池，偌大的院子里已空寂无人。

我们奇怪地问人都到哪里去了？

带我们洗澡的那个人说：“去营救我们的战友！今天是我们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一定要给潘复生一次严厉警告！”

我们质问，为什么不等等我们。

他说：“这不是儿戏，有生命危险！头头命令不许让你们跟去！”

我们正是为了要冒几次生命危险才来投奔他们的，赶上了这样一次机会却没让我们去！

我们又遗憾又愤怒，质问是哪个头头的命令？

他严肃地回答道：“是潘二嫂的命令！”

“潘二嫂？就是‘黑大’那个潘二嫂？”

“就是曾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前为‘炮轰派’家属募捐那个潘二嫂么？”

“就是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个女头头么？”

他告诉我们，正是。

我们见到了“潘二嫂”！而且还跟她说了话！我们一个个都感到荣幸极了！这稍稍弥补了我们因为错过了一次

出生入死机会的遗憾。

“潘二嫂”在我们心目中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炮轰派”女豪杰！

“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并没结婚。何以被她的“炮轰派”战友们称为“二嫂”，我们则不得而知了。

一次，“炮轰派”的广播车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闹市区相遇。所谓“仇人对面，分外眼红”。但那一次双方展开的是一场文斗，不是武斗。

“捍联总”的广播车内坐的是一名男广播员，手中拿着厚厚的一份广播稿，照稿宣读。

“炮轰派”的广播车内坐的是“潘二嫂”，手中无稿。

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一方有稿，一方无稿，优势似乎全在“捍联总”一边。

“潘二嫂”虽然无稿，却镇定自若，唇枪舌剑，出口成章，滔滔不绝，遣词用句，尖刻辛辣，应答质问，逻辑清晰，冷嘲热讽，幽默百出，引马恩列斯之经，如数家珍，据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续三个多小时的一场车头抵车头的辩论，甘拜下风的倒是“捍联总”！里三层外三层站在人行道上观热闹的市民，为“潘二嫂”大鼓其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掌声中狼狈地退到一个街口，拐弯开走了。

从那一天起，“潘二嫂”三个字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几乎传遍整个“东方红城”。连“捍联总”的许多人提起她都很佩服，不得不承认全市休想找得出一个能辩论得过“潘二嫂”的人！

据说潘复生在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上也曾讲过：“象‘潘二嫂’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谁能把她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谁就等于为我们的新政权立了一大功！只要她肯弃暗投明，我潘复生保证给她个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当，即使她要当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又据说还真有人去拉拢过她，遭她严词拒绝。

她是个死硬到底的“炮轰派”。

后来她时常带领“别动队”在全市各处演讲，为“炮轰派”募捐。

我曾远远地听过一次她的募捐演讲：

“公民们，我是潘二嫂！我在此向你们伸出求援的双手！正义之神在我和你们大家的上空，她此刻默默地注视着我和你们。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没有父亲母亲？‘捍联总’对我‘炮轰派’实行种种封锁，妄图将我们置于死地

而后快！我‘炮轰派’战士个个死不足惜，但我‘炮轰派’战士的妻子儿女是无辜的，他们的父亲母亲是无辜的！他们无辜的妻子儿女和无辜的父亲母亲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因为参加了‘炮轰派’的工人兄弟们的工资早已被停发了……”

只要“潘二嫂”往哪一站，一开口演讲，围观的市民，凡是身上带着钱包的，不管你是否认为“炮轰派”有理，你都会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衣兜掏出钱包来！

“潘二嫂”就具有这等本事！她那表情，她那声音，就是能令你感动！她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似的。

而在她身旁，“别动队”员抬着一个大箩筐，人们纷纷往那箩筐里扔钱。连孩子也不例外。每次她都能募捐到满满一箩筐钱！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老百姓，十分的“仗义疏财”。他们普遍比现今要穷得多，却普遍不如现今的人们对金钱看得那么重。这也是“潘二嫂”当年次次募捐成功的条件之一。

倘若今天，纵有十个“潘二嫂”，为着更加能引起人们高尚情操之目的，只怕是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募捐到一箩筐钱！修复万里长城啦，中国儿童基金会啦，支援非洲灾民啦，工资二百来元的人，也是只舍得捐出一角二角的。国库卷如不是分配指标从工资中扣除，十有八九的人可能就不买。

一切都今非昔比了。

中国人的头脑不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简单了，甚至是变得过分的精明了。因而从前那种“仗义疏财”也是今非昔比了。我有时简直不能不怀疑：这也算是一种“反思”么？

我很迷惑……

当年“炮轰派”中有一说法——“范大哥”的理论，“潘二嫂”的口才，冯司令的组织能力。冯司令者，冯昭逢也。他们被合尊为“三杰”。

我们能不觉着是种荣幸么？

“潘二嫂”在募捐时，“捍联总”有好几次可以捉拿她，但据说潘复生有指示，对“炮轰三杰”，没经省“革命委员会”下令，不得捉拿。更不得加以伤害。

在这一点上，公正论之，潘复生还是挺爱才的。他一直到最后，大概仍怀着几分劝降他们的幻想。当然只能是幻想了。

而“潘二嫂”不许我们这些写了血书投奔“炮轰派”大本营的中学生参加那一天大规模的营救行动，无疑是不忍我们也去冒一次出生入死的危险。体现着女性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仇恨、恐怖、无谓的似乎有理性实则无理性的种种疯狂行动中，的确也时时有良知和人道的光环闪耀。它说明到底毕竟是人而不是疯子进行的运动。是人在干着疯事。

那个带我洗澡的人，又带我们到“炮轰派”家属们的住地，分别给我们安排睡觉的地方。“炮轰派”的家属们，十几家几十人合住在各个车间内。各个车间都很冷。

女人们在哭，孩子们在叫——是那些被“捍联总”抓去的人的家属。

我身临其境，对他们的一种巨大的同情和怜悯顿时从心底涌起，觉得是来到了受暴政压迫者中间，产生了一股要与那暴政呐喊着挑战的刚勇豪烈的气概。其实，当年受压迫的又何止“炮轰派”及其家属呢？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不都是在受着一种暴政的压迫而同时又压迫着别人么？暴政也并不能说是“东北新曙光”，它毕竟代表着力图安定的趋向。暴政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捍联总”和“炮轰派”不过都是那暴政的必然产物。在这二者之间，是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无所谓是与非的。

忽然响起了警报声。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捍联总”的一支人马，趁大本营实力空虚，发起了进攻。扬言要一举拿下“哈一机”这个“炮轰派”的顽固堡垒。

于是一片紧张。女人们更哭。孩子们更叫。

几十名留守大本营的“炮轰派”战士聚集到了一起。

其中一个大声对女人和孩子们吼：“不要哭！不要叫！你们哭，你们叫，‘捍联总’也是不会发慈悲的！有我们几十个人在，就保证你们的安全，绝不会让‘捍联总’攻进来的！”

几十名老工人也自觉组织起来，人人寻找到可以当武器的东西，对他们说：“我们跟你们一块去守卫前后大门！今天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俩赚一个！”“死了，咱们的人会给咱们报仇的！”“男的女的，老少爷们，王八蛋‘捍联总’要是真攻进来了，谁也不许作孬种！咱们生是‘炮轰派’的人，死是‘炮轰派’的鬼！”

有个女人也振臂高呼：“姐妹们，咱们也要操家伙，跟王八蛋‘捍联总’拼命呀！”

于是女人们，连同一些半大孩子，在这样一种同仇敌忾情绪的互相煽动下，也纷纷寻找应手的武器，预备拼命。

我激动得要哭，何等豪烈的场面！我所渴望体验的悲剧精神和英雄主义，是整个儿将我主宰了。

我寻找到了—跟长铁棍，紧紧地握在手中。

于是人们冲到了院子里。

几盏探照灯开了，院子里亮得如同白昼。

一部分人扑向前后门。一部分人守卫在四面高墙下。

我甚至想象到了“哈—机”被攻占后的惨景：男女老少的尸体横倒竖卧，人人死后手中仍紧握带血的武器。想象到了被母亲死前掩护地压在身下的幼儿，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哇哇哭声。想象到了我自己应该怎么个死法才更英雄更悲壮，临死应该呼喊什么口号。按照我的想象，也可以说按照我的意愿，我应该在其它人全都死光了之后再死。应该面对着无数的一步步包围上来的“捍联总”们，怒目而视，首先毁掉武器。可惜我拿的是一根长铁棍，只有塞进炼铁炉才能毁掉。要拿的是一支枪就好了。就可以做到死了也不将武器留给敌人了。要拿的是一根爆破筒就更其好了！那就可以做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关于武器的这一节想象，虽然英雄得可以壮烈得可以，悲剧味儿也十足，但分明地是只能想象一番，根本无法实现，只得不去细想。呼喊什么口号却是完全可以早作打算的。我想到了雨果小说中那个法国骠骑兵上尉，他在滑铁卢为拿破仑而战死的时候，面对一步步向他包围的英军喊了一句什么来着？对，只喊了一个字——“屎”！那当然是很轻蔑的意思啦！不过“捍联总”们能领悟么？他们要是没看过雨果的《九三年》呢？要是虽然看过了并不记得那么一名英雄的法国骠骑兵上尉呢？他可不是书中的主人公啊，仅仅是个被雨果一笔带过的无名角色呀！那就再喊一句“炮轰派万岁”吧！

屎——

“炮轰派”万岁——

英雄是足够英雄的了！壮烈是足够壮烈的了！似乎总归还缺少点悲剧味儿……

对，对，“毛主席万岁”是不能不喊的！为毛主席而战而死，毛主席在北京却肯定不知道，还不是悲剧么？当然是为毛主席而战而死了！不是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和这么多人又是为了什么图的什么呢？

只喊三句口号。再多一句也不喊了。大概英雄地壮烈地死前，也只来得及喊三句口号。

第三句不一定要喊完，可以喊到“万”字，便张大着嘴，将“岁”字堵在口中，缓慢地倒下身去。不要向前扑倒。一定要向后仰倒。一定要叉腿而立。倒时一定要伸展开双臂。缓慢地直挺挺地倒下去。尸体要呈“大”大形，倒在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

我正徒自想得海阔天空，几辆装甲车和坦克从仓库里开了出来。大本营的装甲车坦克是足够自卫用的。

高墙外，“捍联总”的喇叭在喊叫：“炮匪们听着，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是演‘空城计’，赶快打开大门投降吧！否则我们攻进去，绝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高墙内，“炮轰派”的喇叭也响了：“耗子兵们听着，你们有胆量就进攻吧！我们众志成城，视死如归！……”

前后大门打开了。

“捍联总”们呐喊着冲了上来，但一见出现在门口的是装甲车和坦克，又退了回去。

装甲车向夜空扫射了一阵机枪。

枪声过后，墙内墙外一片寂静。

“捍联总”们悄悄撤走了。

“炮轰派”的装甲车和坦克却一直象把门兽，堵在前后大门口。然而都不敢麻痹。怕“捍联总”们是疑兵之计，再次袭击。只是有些看去就分明不顶事的女人，被劝说带着所有的孩子们睡觉。

凌晨时分，“炮轰派”的大部队回“营”了。也就回了他们的战友——十一个活的，六具尸体。四人是被毒打至死。两人是因不堪忍受毒打，跳楼自杀的。

被就回的人中据说包括“炮轰派”总司令冯昭逢。他不但遭到毒打，还遭到假活埋的威胁。埋至胸口，让他承认“炮轰派”是反动组织，以司令的名义宣布解散。他宁死不屈。真的宁死不屈。大概因为他是“炮轰派”的司令，“捍联总”没敢真的就活埋了他，又把他从坑里挖了出来……那天晚上人太多，情况也太混乱，我们竟没能荣幸地见到这位宁死不屈的冯司令。

大本营一片女人的痛哭，一片男人的怒吼，笼罩着复仇的强烈氛围。

头头们当即开会，十几分钟后就作出决定——举行示威游行。

于是许多人又开始忙忙碌碌地赶制担架，做花圈，写挽联，剪黑纱。

九点，几千人的示威游行大军开出了“哈一机”。照例是前面装甲车和坦克开路。装甲车头十字交叉披着黑纱，交叉点是一朵洗衣盆那么大的洁白的纸花。坦克罩着白布。这一次出动四辆装甲车，四辆坦克。不擎红旗。只擎白布挽幛和白布丧幡。颁布了纪律，不喊口号，不唱歌，一切行动听指挥。出于“哀兵战术”的考虑。真正的“哀兵战术”。六具尸体放在担架上，以白布罩之。几十名身强力壮者轮番抬。白布挽幛上写着的一行浓墨大字是——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人人胸戴白纸花，臂戴黑纱。大队人马庄严肃穆，沉痛无声，浩浩荡荡

地向市内行进。

一进入市区，广播车内就放出了哀乐。队伍随着哀乐的旋律走。交通为之中断，围观者人山人海，似乎倾城出动。

哀兵战术

队伍一直行进到省“革命委员会”楼前，坦克的炮筒缓缓扬起，对准了楼正面。据说那天省“革命委员会”预感到事态发展严峻，正在开会，从窗口望见装甲车和坦克开路的示威队伍出现，一个个惊慌失措地离开了会场，钻进各自的小汽车内仓惶而逃。公务员们一时没个逃处没个躲处，就打开几扇窗子，用竹竿挑出他们的白色工作服摇动不止。

“让潘复生站到窗口来！”

“潘二嫂”凌厉的声音从“炮轰派”的广播车内传了出来。

一笔写不出两个潘。按说他们是一家子。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而潘复生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潘二嫂”又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则是今天也说不清道不白的事了。本就是一笔糊涂帐，死者尽是冤死鬼。江青最初宣扬“文攻武卫有理”，后来又说：“武斗中死去的人，死了活该，死得比家雀毛还轻！”反正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说怎么有理。可悲可怜的是那些冤死鬼。更其可悲可怜的是死者的妻子儿女父亲母亲。在武斗中死去的，大抵是中青年人。

那些挑出“白旗”以示投降的公务员冲着外面喊：

“潘复生早走了！常委们早走光啦！”

“千万别开炮呀！我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呀！”

“炮轰派万岁！炮轰派万万岁啊！”

不开炮，“炮轰派”岂能善罢甘休？

轰！……

轰！……

轰！……

“炮轰派”真正炮轰“东北新曙光”了！

接连六炮——对空放了六发演习弹。

如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都在楼内，是否往炮膛内装填真炮弹，就无从知道了。

隔了一阵，又是六炮。

六六三十六炮——自打解放以来，哪一年国庆哈尔滨也没放过礼炮。老百姓们可算听到炮响，见识坦克开炮的情形了！

有一发炮弹击中楼顶的避雷塔。尽管是演习弹，也将避雷塔击倒了。

楼内传出一声声女人恐惧的尖叫……

也巧，姜叔在围观的人群中。他发现了，将我扯出了“炮轰派”的队伍，说：“你跟我回家去！”

我说：“不，我要和‘炮轰派’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失败在一起！”

他说：“你是想要了你妈的命呀！你妈都快为你急疯了你知道不？”

我说：“姜叔你回去告诉我妈，我梁晓声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他凶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戴着棉帽子，帽耳朵护着脸，脸倒没被他扇疼。不过他使劲太大，扇了我一个趔趄。

“炮轰派”队伍中立刻跨出几条大汉，围住他喝问：“你为什么打我们的人？！”“你年纪不轻的一个人，怎么动手打小孩？！”

姜叔用他那带有浓厚山东腔的语调说：“俺是他叔，俺是他叔……”害怕起来。

几条大汉问我：“他真是你叔么？”

“是亲叔么？”

姜叔抢着回答：“真是，真是，亲叔，亲叔……”

他们对他喝道：“没问你！”

我说：“是我叔，是亲叔……”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承认他是我亲叔了。

姜叔又陪着笑脸说：“他昨晚没回家，他妈快急疯了！您几位看，是不是让俺带他回家呢？……”

那几个汉子就对我说：“你回家吧，再别到我们那里去了！……”

姜叔不等人家把话说完，连声道：“多谢，多谢！……”拽着我的手就将我拖走了。

“慢走！”

那几条汉子又喝住了我们。其中一个向我们走来。

姜叔一脸忐忑之色，小心地问：“不是您们让我们走的么？”

那人指着我说：“就他这样子，碰上‘捍联总’，还能回到家么？”说着，从我胸前取下了白纸花，从我臂上取下了黑纱，揣入他自己兜里。

……

回到家，见了母亲，吓我一跳。仅隔一夜间，母亲变得几乎使我认不出了。她头发凌乱，双眼红肿，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没洗。母亲她起码老了十岁。

母亲好象也认不出我来了。母亲的眼神儿直勾勾地瞪着我。不打。不骂。不说话。就那么瞪着我。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母亲瞪了我许久才说：“他姜叔，让他走，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他不是我的儿子！”

姜叔对我说：“还不快向你妈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我低声说：“妈：我保证……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母亲却往外推我：“你走，你走！你别向我保证！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儿子！”不由分说，将我推出了家门门外。

姜叔也跟到了外边，训我：“你看你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你要是把你妈气疯了，你们一家两个疯子，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对得起你爸么？对得起你弟弟妹妹么？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反省！再敢走，我替你爸管教你！打断你腿！”

他训了我一通，又进屋去劝母亲。

一会儿，弟弟出来了，手中拿着煤棚的钥匙，怨恨地对我说：“妈叫我把你锁在煤棚里！”

我一言不发，乖乖跟在弟弟身后，听任弟弟把我锁进煤棚。

我蹲在煤棚一个不透风的角落思过。

“大串联”的两个月加上投奔“炮轰派”的一夜，我确是在把母亲一步步往疯路上推呀！

可怜天下母亲心！

可怜“文化大革命”中的母亲们的心！

直到半夜，弟弟才将我从煤棚放出来。

一进屋，母亲就对我喝道：“跪下！”

我双膝跪在了母亲面前，不敢抬头。

“你知错不知错？”

“妈，我知错了……”

“真知错假知错？”

“妈，我真知错了……”

“那你就别怪妈了！老三，拿剪刀来！”

咔嚓！咔嚓！咔嚓……

我的头发，被母亲一剪刀一剪刀地剪下，纷纷落地。

“把鞋脱了！”

我脱下了棉胶鞋。

母亲又将我那唯一的一双棉胶鞋的后帮剪掉了，使那双棉胶鞋变成了一双棉拖鞋……

第二天早晨，我趿着那双棉拖鞋走到破镜子前一照，见头发被母亲剪成了“鬼头”。我注视着镜中那瘦削的表情木然的少年的脸，心中涌起了真正的悲剧意识……

“炮轰派”们终于使中央文革也震怒了。

“中央文革”指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语录。

一天深夜，我们全院的人都被枪炮声惊醒了。

卢婶怀抱着最小的孩子，象一只恐惧的母猴，在院子里到处乱窜，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打过来了！打过来了！……”

枪炮声一阵比一阵密。一束束火红的弹道划破夜空。

正是中苏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年代，全院的人都以为是苏联军队不宣而战了呢！惊慌得程度不必描绘，可又不知是逃命对，还是守着家对。

整条胡同骚乱起来。

街道主任陪着一位军人出现在院里。

街道主任对众人安抚道：“都别慌，都别怕！有什么可慌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夜里攻打‘炮轰派’们的老窝！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的枪炮声！都到院外去集合，请省军区的李干事给我们讲话！……”

院里的人就走向院外，跟着胡同里的人往胡同口走。附近几条街道的人都聚集在我们胡同口的一片开阔地。静听省军区李干事宣布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的联合通知：一、“炮轰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二、一切参加过“炮轰派”的人，限三日内，必须向所在单位或街道委员会主动投案自首。三、“炮轰派”的头头，全属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要犯。揭发者有功，捉拿归案者有大功。同情者有罪，包庇窝藏者有大罪，也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枪声炮声直响到“东方红城”出现了“新曙光”才渐渐稀落。

那天夜里有近万人攻打“哈一机”、“哈师大”等几处“炮轰派”的“据点”。他们由“捍联总”的“敢死队”、工厂里的学徒工、郊区的农民和省军区的战士组成。凡参加攻打的郊区农民，每人发十元钱，也有说发五元钱的。工厂里的学徒工提前转正。“捍联总”的“敢死队”和省军区的战士们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和犒劳，就不知内情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真枪、真炮、真子弹和真手榴弹。预先派出侦察员实地侦察。并由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们和省军区作战处的参谋们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哈一机”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哈师大”在那一天夜里被攻陷了。

所有的“炮轰派”据点在那一天夜里全被攻陷了。

守方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也有饮弹身亡者。

攻方身亡者追认为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守方身亡者死有余辜，其家属为他们承担“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

有人说那天夜里双方共死了十几人。也有人说不止十几人，而是几十人。究竟死了多少人，无法确知。但双方都死了人是无疑的。

“炮轰派”那天夜里将全部装甲车和坦克都尽数发动了起来，准备全军覆灭，决一死战。后来是几个头头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

他们宣布时说：“我们有罪，让我们几个人来承担这一武斗事件的历史罪名吧！让历史的法庭只审判我们吧！……”

“炮轰派”们被命令高举双手排队投降，每人身上都至少挨了一刺刀，女性也不例外……

范正美和冯昭逢在掩护下逃离“东方红城”，赴京请罪，替广大“炮轰派”向“中央文革”恳求对广大“炮轰派”群众恕免专政……

“潘二嫂”当天被捕，投入监狱。几日后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缓。

据说她在公审大会上不卑不亢，一切罪名俱认不讳。不失以往辩论风度。宣判后，她慷慨陈词，企图替广大“炮轰派”群众进行申诉，刚说了几句话，便被押了下去……

省市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举歼灭“炮匪”的重大胜利和宣判会的实况录音。省市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及清查“炮轰派”的通告。

我家的录音机已为哥哥卖到了寄卖店去，一直无钱赎回。我是在姜叔家听的广播。没听完，我便跑回自己家，扑在炕上，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自然是并没有被清查到头上。十八岁的我，内心里又是觉得侥幸，又是觉得羞耻。倘我也与许许多多“炮轰派”一起被公审，被宣判，可能我内心的痛苦倒会少些。

但果而那样的话，母亲是肯定会疯的。

我所渴求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从此深深地埋葬在了我心里。

那一次我是哭出了太多太多的眼泪。

我还是瞒着母亲到“哈一机”去了一次，去凭吊我所渴望实现而终于没有追求到没有能实现的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

我是什么主义也没有追求到什么精神也没有能实现……

“哈一机”的所有楼房的所有窗子都不存在了。遍地是被子弹击碎的玻璃。仍有些孩子在各处寻找子弹头。据说第一天有些孩子竟捡了满满一桶子弹头，卖了几十元钱。

每一个房间的四壁都布满了弹洞。我在一个房间里数了一下，竟有四十三个弹洞之多！

……

如今这一切是早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了。它成为过去是真的。但它真的成为历史了么？它记载在历史的哪一页了呢？哪一页也没记载着。倒是“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地载入了史册。或许因为它毕竟是伟人所发动的吧？不能光芒万丈，也足警世千秋。但愿我的这篇“自白”，可当为历史的一份“补遗”，权作对那些为“文化大革命”而死的人们的悼词，亦权作对我们千百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肤浅的“箴言”……

潘复生是已经死了。不知对他下了怎样的一个结论。

范正美又在哪里呢？

冯昭逢又在哪里呢？

“潘二嫂”又在哪里呢？

倘他们都已不在我们无产阶级的监狱中押着，并没有被定为“文化大革命”的终身罪犯，获得了自由的话，我愿他们都有一个好妻子或好丈夫，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正过着他们自己的平平凡凡的日子……

一代天骄，十年浩劫，俱往矣！

算起来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子曰：四十而不惑。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我的鬼头发长了发后，天气已暖，我便怀着一颗什么也没追求到什么也没能实现的彻底的失落了一切的心，为着每个月十五元的报酬，扫马路去了……

第二年我就下乡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于北影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是一名下乡知青，但严格的说应是回乡知青。六八年七月哥哥姐姐响应号召，一同到内蒙落户插队去了，不到一个月，噩耗也降临到我的头上。由于父亲所谓的种种历史问题，六八年八月我随父母还有奶奶一起被遣送回山东老家，那年我才十三岁。在那里我经受了許多同龄人没有受到过的磨难，所以一提起那里我就很伤心，也很激动。毕竟哪里留有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留有我洒过汗水的土地，布满我脚印的山岗，还有我亲手种植的树木。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那些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关怀的人们，更有那割不断的一丝丝乡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回了第一次原籍，并因此解开了我对原籍的种种怨恨。

我与厂领导去威海出差，办完公事返津。我们在烟台登上返回天津的列车，当列车快到莱阳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回原籍去看看。厂领导爽快地答应了，并准予我三天的假期。莱阳站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在车站前多了许多做生意的小商贩，车站前的街道变化也不大。我在车站前徘徊、犹豫，车是下了，我要到哪里去？回那个曾经给留下许多痛苦的村庄？回去找谁看谁？还是到邻村的朋友家？他们还认我不认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回想当初回乡时，我们要吃没吃的，生活用具也十分缺乏，就连做饭的柴火也没有。虽说刚安顿下来时，父亲单位给了那点可怜的安家费，那可是杯水车薪呀，一花就完。当时没有人敢帮助我们，处处遇到的都是横眉冷对，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物质方面的缺乏还能将就，精神上的迫害就更可怕了。我挑回的水，前面那桶水还可以食用可后面那桶水里，常常会被一些孩子扔进石头、泥沙，甚至还会有吐的口水。夜里常常会被砸门砸窗的声音所惊醒，糊窗的纸也经常被捅破，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会有打倒我父亲的口号声。闷的傍晚，村民们都到户外乘凉，我不敢出去乘凉，因为，我一出去就会遭到多个孩子的同时攻击。不是我不敢与他们打斗，如果是单打独斗，就那么几个营养不良的孩子，我还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次我出去玩耍时，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孩子欺负我，随后我们发生争吵，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他们交了手，我将两个孩子的鼻血打了出来。可那些村民们，不去管教自己的孩子惹事生非，反而逼迫我父母去给他们赔礼道歉，还得赔偿钱物。面对这一切，逞强好胜我，不得不认输，成为一个任人欺负的孩子，处处躲躲避避着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对我们不友善？是不是我的祖辈真有什么欺男霸女的行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由于那时我还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压迫，更不懂阶级的由来。我父母没有向我讲过我们家祖先的历史，也没有讲过父母的经历，我对我的祖先和这个家庭的历史是一片空白。遣送我们时，我父亲单位那位姓孟的头头所说的话，一次次地在我脑海里翻滚：“你爷爷是大地主，你父亲当过伪乡长，背这盒子枪，牵着狼狗，提着马鞭子，鱼肉乡民。”面对这些现实状况，我相信了，如果是假的，这些人

也不会如此地对待我们。我恨这个家庭，更恨自己降生在这个家庭里。

刚送回原籍时，我父母还准备让我继续上学，可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使我放弃了继续上学的念头。那时，村里的小学教室散落在村内，哪里有空闲的较大的房屋，就拿它来当教室。在我们的住处附近，就有三间空闲的破旧不堪的房屋做为教室。遣送回原籍的第三天我准备上学去，想看一看这里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就到这个教室来了。我站在教室门口向里观看，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各式各样的凳子上，有的甚至坐在石块和土坯上，用土坯当腿上面放一块长木板就是课桌。墙壁因长年的烟熏火燎已经呈褐色的。黑板是用水泥加墨汁抹成的，黑板的正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标准像两侧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这是一间无法与正规教室相比的教室，是一间简陋的不能在简陋的教室了。

此时，教室内一位男教师背对着门口，正在训斥着一位男学生，他说的胶东话我还听不太懂。那时我是这个村里的新闻人物，我走到那都免不了让别人向我行“注目礼”。我一到教室的门口，里面学生的目光自然就被我吸引过来，那位正在气头上的男教师，发现他属下的目光都向门外看，他也转过身来观看，发现我这个“狗崽子”在教室的门口，影响到他的尊严，不由的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大声咆哮道：“你在这里看什么！”当时我一愣，茫然不知所措。这位教师见我不走，就急步向门口走来，嘴里嘟囔的什么我没有听清。这时我才意识到情况不妙，这位歇斯底里的教师是冲我来的，我赶紧转身逃掉，好似漏网之鱼。我逃离了那个教室，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难道这就是我要去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我能学到什么？我怕了，怕那个教师更怕那些学生。当天晚上我与父母说，我不准备上学了，我害怕他们。那时候我父母也顾不了许多了，生存是最关键的问题，从此我失学了。

在我们被遣送回去第五天的夜里，村里召开了批判我父亲的大会，就在这次批判大会结束后，我对我的家庭有了新的认识。当开批判会的通知下来后，我很矛盾，我不愿意去开会，因为我将面对着的是，贫下中农们的诉苦和那些斗争的场面。可我又特别想知道，我的祖辈父辈到地都有那些罪恶。我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来到会场，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偷偷地坐在那里，等候着历史的重现。

会场设在村里的联中（学校），主席台是用石块与泥土砌成的，大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大小，两盏明亮的汽灯，挂在主席台的两侧，台下坐着一院子来开会的全村社员，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我父亲和文革中常出现的那些标语。一位老师带领着一群学生正在唱着“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等歌曲。此时的我，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不敢抬头观看，好像我是在等候着历史的判决。当主持人宣布批判大会开始，我父亲与那些被管制的分子，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由全副武装的民兵押上了台。今天是召开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所以，我父亲走在那些被管制分子的最前面，并押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左右一边一个民兵持枪而立。

一位村干部宣布了对我父亲的管制决定后，再由村民们揭发批判。第一位上台发言的人，是一位与我父亲年龄不相上下的人，他

一上台就打了我父亲一巴掌，引得下面的社员一阵大笑，并伴有一阵一阵的口号声。令我最难堪的场面出现了，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我真不敢去想。场面逐渐平静下来，这位批判者就问我父亲：XXX你记不记得你打过我！我父亲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位又说：“今天共产党给我作主，我还回来了！”由于他没有文化，也可能是他第一次在当众讲话，讲得语无伦次，车轱辘话来回说，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父亲为何打他的原因。我还从接下来的几位批判者口中得知，我们家曾是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地主，有三四百亩地，有着全村最大的院落，家里常年雇有长工，养了不少的骡马。其中有一位批判者，用手指着会场四周的房屋说：“这些房屋都是他们当年剥削我们的见证，这几间是存放粮食的房间，哪几间是住长工的房间，……。”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召开批判大会会场周围的房屋，就是我祖先当年居住过的房屋，我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大院落中的。

批判大会在我的期盼中结束了，此时我反而想让这个批判会在继续开下去，因为，我很想知道我的祖先们是怎样的人，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令我欣慰的是，听了半夜批判大会的内容，除了说我父亲打过一个人外，没有听到那些鱼肉乡民的事情，更没有那些欺男霸女的事情。只不过说了些我家以前的日子如何富裕，贫下中农们如何穷。为何过得富裕我没有听明白，只听说是靠剥削贫下中农们才过上好日子的，如何剥削的也没有听明白。

回到家中，我问父亲为何打人？父亲苦笑着回答：“他该打！”然后就闭口不言了。好奇的心理促使我，想多了解一点过去我家的历史，但当时我父母不敢对我讲那些过去东西，怕我这个不知深浅的孩子在外惹事，他们始终没有对我讲过，任何关于我家过去的历史。所以，当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从村民的闲谈中得知的。

我的祖辈们都是当地的名绅。我爷爷哥仨，我爷爷是老大，因是长子，在家里主管一切事物。我二爷山东农学院毕业后，在家乡办学校、农场、苗圃、养殖场等。什么“鸡屋子”“猪窝子”“南园子”等地名，都与当年我二爷的这些活动有关。我姑奶奶嫁到莱阳城北的一户地主。我父亲是独生子，在大排行中是老大，在天津的河北工业学院毕业后回乡，帮助我二爷经营农场和养殖场，还当过教师。在抗日战争中，曾当过几年的乡长，带领着乡队与日本鬼子打过仗。我的两位叔伯伯叔叔在抗战期间，弃笔投戎，报考了黄埔军校，也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过。我姥爷是莱阳城北关的一户地主，我母亲还是我村第一任的妇女主任。我还从村民们的口中得知，我家以前在烟台、大连、营口等地由买卖，在烟台还有一大片果园。我在原籍的那几年，经常听到村民提到什么芽接、枝接、土接的果树嫁接术语，还有什么“巴克夏、约克夏”优良品种的猪，还有“来航鸡”什么的，这些都是当年我二爷与我父亲引进的，至今还是那里致富的强项。总之，从这些村民的嘴里，听不到我的祖辈和父辈有任何劣迹，更听不到那些欺男霸女的事情来。关于我父亲打人一事，原来是这样的。当年我父亲在家乡任教时，在家乡办了一个夜校，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年轻人夜晚来夜校学习。我父亲费了好大的辛苦，才从封建保守的乡亲们中，动员了一些孩子们上夜校，其中包括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开课时间不长，那位曾被我父亲打过的人却说：黑灯瞎火地大姑娘小媳妇在一起准没有好事。这话传了出去，许多家长都不让孩子们去上夜校学习了，这个夜校也因此而停办了。我父亲找他理论时，一气之下打了这位说怪话的人一巴掌。

还有一个现象很令我奇怪，我们本村的人，对我们畏之如虎，唯恐占了我们的光。邻村的人好像就不那么怕与我们交往，有的邻村人还主动与我父亲打招呼，或者向我父亲问一声“老师好！”更有甚者还对我父亲挑大拇指呢。面对这些情况，我就不明白了，我很疑惑。后来，我父亲平反后，在与我父亲的闲聊中，我才明白这些情况的由来。

那些向我父亲问好的人，以前是我父亲的学生。在我父亲当乡长时，对附近村庄的人与事都有过照顾，所以他们对我父亲很尊敬。抗战期间我原籍兵荒马乱，当时在莱阳的各种势力中，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县大队。在这三种主要力量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是可能结成联盟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按道理讲，日伪军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军共同的敌人，但有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同伪军或日军暗地里进行勾结，对付共产党。县城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村往东十里地的万第镇，被国民党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占着，共产党的武装，在万第镇东面海阳县与莱阳县地界的大山中。日本鬼子与汉奸队白天活动，但是不敢离莱阳城太远，那帮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他们双方是互不侵犯的，但对共产党这双方都打。一到晚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组织和宣传抗日运动，他们的活动处于地下不敢公开。我的一位表叔（我姑奶奶的儿子），当时是当时莱阳县的书记，曾多次派人在夜里，给我父亲送马列方面的书籍和抗日方面的宣传材料。由于那时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处处提防那两方面的敌对势力，经常使偷偷地来偷偷地去，神出鬼没的。有一次我表叔想找我父亲谈谈，夜里派人来请我父亲，他派来的人，事先并不知道两人的关系，在夜里偷偷地翻墙进去，将我父亲抓住。由于前几天闹土匪，闹得人心惶惶，我父亲以为他们是土匪呢，就趁他们没注意，撞倒了身边的看守跑掉了。后来才知道，在这些“抓”我父亲的人中，就有我们邻村的人，都是些地下活动者。那个向我父亲挑大拇指的人，就是当年来“抓”我父亲中的一位。我父亲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辞掉了乡长一职，到外地做生意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地明白了，这些村民们当时的举动，也并非是对我们有什么刻骨仇恨，只不过是形势的需要而已，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村里按姓氏分了三大宗派，各宗派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现象，斗来斗去连绵不断，无论是哪家宗派掌权，最后还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用我们当攻击对方的引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嫉妒”这个可怕的因素，才导致了一些愚昧和无奈的村民，对我们作出了种种不尊重的事情来。

我的原籍地处胶东半岛的中部，曾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山村，村庄的四周种植了许多杏树，有着满山的果树和层层梯田。由于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把村里的杏树几乎伐光了，拿去炼了钢铁。再加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村民们的心都给搞散了，人也搞懒了，自然也就从一个富裕的山村，变成一个贫穷的山村了。在那个时代里，越穷越搞运动，越搞运动越穷。

在这种的环境中，象我这样的“狗崽子”是被冷落的，处处受到排挤和压制，虽说后来对我父亲落实了部分政策，但是不彻底，所以我很难从被压抑的阴影中走出。国家给与知青的政策我也没有享受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什么招工呀、升学呀根本就没有我的份，压根你就别想。我在本村的朋友不多，不是我不想朋友，而是怕给人家添麻烦，也很少有人愿意与我这个“狗崽子”做朋友。为了少给父母惹麻烦，我不敢多说话，只会认真地劳动，努力地学习农业技术，用劳动成果来驱赶我心中的苦

闷。二十来岁时就是队上的技术骨干了，扶犁耕地、扶耩下种、赶马车等有点技术性的农活，我是样样精通，在本村的同龄人中无人可比，可挣的工分却比同龄人少。记得有一位老农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家几辈都没出个会种地的人，没想到现在出了个你。”

多年的非人待遇和艰苦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的发育，一米七七的身高，在村里也算是一个相貌堂堂英俊后生了。虽说没有上过中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毕竟是大城市里走出来的，比那些村里的初中生们强多了。面对这些情况，使我产生了要离开这里的念头，到哪里去？我很茫然。

本小队有一位姓李姑娘，比我小一岁，由于家境困难，她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参加生产劳动了。我两人在劳动中，互相的配合很默契，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位姑娘。她是我们小队中最漂亮的姑娘，文化程度在我们小队女孩中也是最高的。（那时原籍的女孩子小学毕业的也不多）她心灵手巧，为人热情大方。她父亲是我们小队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位心地善良淳朴厚道的庄稼汉。不知为何，谣言四起，说我与那位姑娘搞恋爱。当时村里穷，我们小队更穷，光棍比比皆是，换亲、三角换亲的现象很普遍，我们小队中没有一位姑娘，愿意嫁给本村的男青年。象我这样的背着沉重的政治枷锁，处处受到压制的“狗崽子”，那敢有任何的非分之想。那时，我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当一辈子“人下人”的打算，也没有那个胆量，与一位党员的女儿搞对象。面对谣言我无法申辩，尤其是这种事情，谁会相信当事人的话。可这位姓李姑娘从不否认，也从不辩驳，谁问到她此事，她就一笑置之不做任何回答，被问急了，她就会说：别听他们瞎咧咧。为此事，她父亲在村党员会上受到质问：党员的女儿为何要与地主的后代搞对象？阶级立场哪里去了？……等等。

我无可奈何，只好听命运的安排了。再一次劳动中，趁着周围没有人，她偷偷地问我：“俺三妈（当地人叫管自己的婶称为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去相对象，我不想去，你看我去还是不去？”一个姑娘向一个小伙子问这样的问题，事情就不言而喻了。我考虑到我的处境和当时的情况，我不能因为自己，耽误了她的的美好前程。我相信我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幸福的，只能给她带来种种她想不到的痛苦。当时我也很矛盾，她确实是个好姑娘，有许多村干部的孩子在追求她，都被她拒绝了，谁能有这样一个好姑娘作为对象，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让她去相对象，不是我所愿，不让她去，可我不忍心看到她与她的家人，受到我们的牵连。面对严酷的现实我违心地对她说：“你还是去吧，只要你一去相亲，起码也能平息这些谣言，对你、对你的家人都会有好处的。”说完我低头干我的农活去了，不敢再看她一眼，她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从此后，我有意地躲着她，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她，愿她能找一个她如意的郎君。后来听说，在我离开原籍的转年，她嫁给邻村的一位教师。由于这个姑娘，在那种年代中对我的情意，才使我这个“狗崽子”找回了我还是一个“人”的感觉。我由衷地感谢这位姑娘，是她唤起了我的自尊，我也因她而感

4月19日

昨天我系秘书一直在与学生联系，因为听说周三有三个学生在听完那个教授的课后曾经与他一起下饭馆。两个男生是导演系的，而一个女生是哪里的，叫什么，却不清楚。学生听说这个情形之后引起了恐慌，据说有的女生吓得哭了。秘书在很晚的时候来电话告诉我，那女生不是我们系的。

今天接到了学生的来信，一个女生这样说：“主题：老师保重！

宿舍的人在一夜之间，全部搬走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倒是不怕被传染了。某某（是我把老师名字避讳了——老笨）老师的事情让恐惧空前蔓延，无论做什么，说什么，这真的是一场战争，没有人知道怎样可以带来安全，包括我一直以为安全的新疆，也有了病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规律，人类强大也好，虚弱也好，这样的事情还是会有自己的规律。也许，很快，一切都回过去，唯有恐惧，是最消磨人的意志，也许。没有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或者是面对困难最好的办法。您认为呢？祝老师身体健康！！

”

我回信给她：“现在是所有的宿舍都这样人去楼空了吗？快告诉我。别慌，我会马上看你们去的。其实大家都没和××老师接触，不过个别人。注意一下就好。有的时候躲避也没有多少用处。白天多到院子里看书活动，晚上回去睡觉通风，不与其他人一起下饭馆。这些措施会有效果。应该相信这个疾病是暂时的。人总会由办法。虽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估计恐慌还会加剧，在混乱之中要保持镇定的心态，因为只有镇定才能有好的局面。人人都会由面对死神的时刻，一生中难免几次这样的经历。告诉自己勇敢一些，就像那些真正的战士一样。也祝你健康。”

还有一个学生发来作业，是一个我布置的写作业。我很感动。我要用伊妹儿来指导他们。于是我回信说：“作业收到，很高兴你能这样刻苦。大家现在心情怎样？请告诉我目前的状况。你在那个宿舍？你们宿舍的人现在如何了？一定要镇定。不要无端地恐慌。作业我会认真地看，有问题给我打电话：×××××××。也请随时把同学们的情况告诉我好吗，谢谢你啦：）”

不知道网友们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建议？

4月19日傍晚

我到学生宿舍楼走了一圈，那里真的是很恐慌。平日嘈杂的学生楼里冷冷清清。当然，一些学生是家在北京，回家去了。一些学生也可能到朋友亲戚家或者上街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买了火车票和飞机票，回家去了。家里人对孩子十分担心。

学生中什么样的传闻都有：有人说得病的那个教授已经死了。有的说最早得病的一个成人学生也已经死了。其实他们都没死。最有想象力的是有人甚至说什么北京要戒严，连不对从哪里来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还有的说，学院现有病人7人，有18人隔离观察了……总之，添油加醋的闹得所有的人都好像生活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

学生们对我不戴口罩到宿舍看望他们感到惊讶。我告诉他们，如果在院子里我是不戴的，到超市我就戴，到医院我也得戴上。可是宿舍里目前没有疫情我就没有必要戴了。

我看到一个新疆来的孩子，她一个人在空空的宿舍里看书，很静的样子。我问她怕不怕，她说她刚开始很害怕，可现在想想怕也没用。新疆太远，不能回家。她现在想想好好学习。她的态度很令我感动。我想，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孩子。

有一些男生胆大，还在楼道里拍摄作业。看见我，他们就用摄像机拍摄我。因为他们同时在拍摄一个叫做《非典型性日子》的纪录片。

回家后，把情况向书记作了汇报。希望能早点把学生的情绪镇定下来。学院必须把实际情况向学生讲清楚，不然反而更乱。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学生对领导的信任度有多少，很多事情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猜测和传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4月20日

今天是周日，学院里必往常冷清了许多。过去操场上多处是打球的，今天却冷清了。路过学院西餐厅的时候看到那里比平日更空。这餐馆十分有趣，过去曾经是一家很火的川菜馆，后来改成了比萨饼和西餐，因为太贵，上座不好。老板十分着急，就想了一个办法：开设20元自助。没想到刚刚有点起色，突然来了非典……我问老板生意怎么样，他苦着脸说：学生都跑了，哪里还有人吃？

我一早给学院的书记打了电话，他已经到了学校。我告诉了他我的建议：一、要查明学生去向；二、把疫情用专栏和广播的形式不断公布；三、建立学生骨干的定时汇报体系；四、免费发放药物和口罩；五、有专人负责作好非典的大事记；六、保护老师，没事情的尽量不要到学校来……书记说，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准备明天开会布置。而且他说将在学院宿舍门口摆摊，解答学生的问题。

下午，看到了国家的举措，说是要有非典的学校停课，所以估计明天就会停课了。不管最初到底是谁在掩盖疫情（从网站统一不让谈论疫情这样的行为来看，也不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作为！），今天的中央总算有了正确的态度，我头一次听到了中央承认错误，真不容易。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说明新的领导班子比较透明。有了这样的态度，对防止非典是极为重要的。

我无法估计那个得病的教授到底会给学院带来怎样的危机，我只能祈祷学生和老师们都平安。

十分令我感动的是，我这两天收到大量朋友的电话和伊妹儿、短信等等，学生和朋友的关心是这个时候最令人心里温暖的。

4月21日

今天学院开了一上午干部会，通报了学院学生吓坏了的情况，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

一、通报疫情：我们学院的两例病人目前都好转了，好像没什么问题。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好转何以这样快。因为即便是普通肺炎也还要一段时间。但这是真的。

二、学院把接触过的老师和学生都隔离了起来，干脆利索。尽管现在在我看来并不一定就是非典。

三、在学院组织起一个严密的防非典网络，每天有事儿没事儿都自下而上地报告情况，天天逼学生检查体温。

四、大课全部停止，小课继续上。成人教育基本停止，原因是他们要从校外赶来，怕路途麻烦。

我所在的系，学生跑回外地家中的有十几个人。听说有的女生是哭喊着要跑的，有的男生也是家里立刻开了车来接走。那些家长也没闹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也不考虑如果孩子真的有感染会不会给家人和家乡带去麻烦。其实，在学院应该是最稳妥的了，因为至少比没有经验的地区我们经验多。我们系的老师挨着排给所有的学生都挂了电话，最终整理出一个学生动向表来。直到刚才才完成。

学院里的谣传太奇怪了，说是某某老师也病了，甚至传说院长已经死了（院长开会时说起，大家笑得厉害），还有的人听外间传说我们学院死了一半什么的……当然，这是对某些政府官员掩盖实情的反弹，也有青年学生对处理突发事件没有心理能力这样的原因。他们没有见过什么，所以比较脆弱。他们不了解事情的时候毫不在乎，刚刚看到一些情况就天塌地陷了。

学院的老师都很感人。一些平日不太到校的老师这时都亲临宿舍和学生聊天。从这些老师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生动的东西。

4月22日

今天学院相对平静。我们把所有学生在哪里都摸清楚并且联系上了。学院领导说，应该换个位置想想，如果学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会怎么样？确实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能让学生在宿舍里没人管，如果我们不到宿舍去，我们怎么有权力让学生在那里住？

学院今天更加紧了防范措施，把所有的学生都量了体温，让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一天两次定时报告情况。

今天上午，我为高职同学上了课。同学们都很认真，认真得有点过分严重了似的，倒让人觉得好像是在上都德的《最后一课》，哈哈。其实没那么紧张啊。

下午，学院通知，说是在一个有我校老师居住的楼里发生是一例非典，得病的人是外单位的。立刻，我们要求那些同楼的老师都“休观”了。哈哈，新名词。

学院的师生今天情绪似乎稍稍稳定了下来。

4月23日

今天下午学院领导传达了市里开会的内容。看起来情况比我想象的还严重。不少大学的校长汇报了自己学校的情况，普遍的问题是在校学生情绪极端混乱。有的学校女生吓得嚎啕大哭。另外，北京收容病人的措施也比较混乱。一些情况我不便在这里讲了，总之，情况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我们学院情况比较糟，没想到我们还算比较太平的。因为我们学院的两例仅仅还属于“疑似”，另外，已经有一周了，那些被隔离观察的人也没有发烧。

学院有单独的隔离处，外边锁了大门，里边的人不能出来了。如果他们再有一周没有什么动静就说明可以放心出来了。

今天今天上午我还是给前来上课的学生讲了四个小时，下午到学生宿舍走了走。其实那里早以使人去楼空了。我给学生带去了毽子和跳绳，让他们轻松轻松。

今天看了中日医院的医护人员奔赴第一线的电视报导，眼泪竟然忍不住流了下来。那些年轻美丽的女孩互相拥抱着，轻轻地耳语着，然后毅然上了汽车……我能帮助她们什么？只能默默地为她们祝福。我夫人看了后说：如果

需要招募义工我现在就去。我知道她这样的，她不是一个说大话的人。

我晚上给学院书记打了个电话，慰问的意思吧。我知道这个和我同龄的人这些日子心理包袱有多重。他告诉我，市里说让我们自己看着办，自己建立隔离区。他苦笑了，说：我们得自己来了。我告诉他，这个时候我们会和他在一起。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到。只要学生能平安。他说，同舟共济吧。这个时候，心里确实感到一种悲壮的意思。

我们明后天将对学生宣布自学的决定，如果有学生想离开学校就要登记并体检，证明健康后离校，但不许再回来。留在学校的将不许离开校门一步。我们希望能用这样愚蠢的办法来控制疾病。

学院老师真的是很棒。那些表演系的老师平日嘻嘻哈哈，但到了关键的时候却从容镇定地鼓励学生，天天和他们一起。

回家后，听夫人说已经开始有抢购风出现了。郊区也已经不安全。我告诉她，我肯定是要值班的，如果我病了才会换第二个人上来。现在我们系只留下了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个一个是书记，一个是秘书。我决定每天只留下一个人来照顾学生并对外联络。为的是一旦一个病了还有人能顶替。所以我对夫人说：“和你商量一下，你回你家去吧。这样万一我病了也好有人照顾老人。”可她却只说了一个字：“不！”

北京的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但我相信，北京人会在惊恐过去振作起来。因为只有团结才能度过这个难关。

一个老师来到我们办公室，我们商量着等非典过去组织一个男声四重唱。他很高兴，说：“太好了。一定不要表演系的人参加。咱们都是业余的，让他们这些平时牛轰轰的家伙看看咱们的水平！”这个时候能开个玩笑都让人心里暖轰轰的。

著名导演谢飞患病

原来我不想说他的名字，现在看来已经公开了。他这些年很少拍摄电影的，原因是审查电影的领导太过左，中国电影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谁都看得明白的，不过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只有谢飞张口便批评领导，并且领着几十个导演要求电影立法。这还了得？这不是犯上吗？他只好好不拍电影，改电视剧了。这些年他不太回学校了，有时候在外地办电影学院之类的。不知道他是哪里来了干劲，总之最近突然回校来，并且说愿意担当研究生教学的顾问什么的，于是就和老师们多多地接触起来。谢老师的课程也十分上座，所以他的课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突然他病了，把和他接触过的老师和学生都隔离了。他在课后还和学生一起下饭馆，那些人被隔离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导演系的几乎所有老师都被“休观”了。现在由许同钧老师主持工作了。

谢飞老师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会用自己的乐观来抵抗疾病的。听说他很快就降了烧，目前送到地坛了吧？

今天上午还会有紧急会议，知道是什么布置，我要上班了，诸位保重。谢谢大家的关心和鼓励，我们互道珍重吧。

4月24日（疫情突变）

今天学院局面几乎失控。坏消息不断出来：那个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病危；那个住在学院宿舍楼里的病人已经死亡；最糟糕的是一个表演系99本科的学生被证实是非典，而他在周四还在上表演排练课并且还和同学一起吃饭；另外，学院与谢飞一起吃饭的两名学生听说也是不知道哪里去了；表演系的学生突然散了，其中有很多是与那个得病的学生有直接接触的人！这是该系老师告诉我的。

学生闻风而逃，学院里前所未有的混乱。学院领导不再坚持要学生留在学校。其实情况，容再报。

4月25日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系里值班。有学生告诉我，某某老师已经病逝了。我告诉她不要听信传闻，她却说是那老师邻居告诉她的。我立刻致电院长大人，回答我说：“今天没什么好消息。不过没听说那老师去世的消息。如果有应该先告诉我们。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学院宿舍的学生依然恐慌，回家的学生也在恐慌之中。他们从北京各处打电话来慰问老师，汇报自己的情况。我只问一个问题：你们体温如何？

听中国青年报的朋友说，现在很多人已经有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咨询了。他们正在组织心理咨询师来干这个事情。

学院相对平静，因为没有课程了，显得冷冷清清。我在网上发布了学生作业，希望他们能按时完成。如果是这样，也好把他们拴在家里，而且心情也许会平静一些。

我今天一边上班，一边看学生的作业，效率倒还是相当高。我想，如果现在没有非典，能给我这样消停的时间该多好？

4月26日（一患病学生不治）

今天要请大家原谅，不太想说什么了。

今天那个得非典的学生去世了。他的名字叫周晟，28岁。到电影学院来进修美术，广告设计专业。我没见过他，但听同学们说这个孩子为人厚道，因此有很多朋友。他知道学习机会不容易，而且家境也不宽裕，也许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学习机会，因此就格外珍惜，到处蹭课听。我不知道他听过我的课没有……十天前还欢蹦乱跳的一个青年就这样走了。想想实在不敢让人相信。

谢飞老师情况不明，听说也有病情上的反复。

今天就说这些，哥们姐们保重了。

一个同学的来函如下：

刘老师，我听说周胜的事，其实很难过，因为我是认识他的，很久之前他曾经给我发过信息，是一个关于五个然的，记得是遇事处之泰然，历尽沧桑悟然等等，现在想起来都像遗言。他喜欢苏格兰风笛，上学期还给我借过盘。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宿舍的人都没有女朋友，现在，只有他没有。说起来，都是伤心的话题。对所有的人来说，这都显得太残酷。希望他其他的同学都没有事。但是，生活还有继续，是吧？老师也不要太难过。似乎我说这样的话对老师都显得很不应该。希望老师永远坚强。影评附在后面，越发觉得自己不努力，今天晚上会再改，看看和老师想的不一样。

4月27日

今天还是值班，北京太萧条了。这么多年我没见过这样的冷清：大街上没什么汽车，饭馆里的大师傅在平日生意最好的时候却围在一起打牌，往日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竟然只有一个人！有个小伙在打出租车，但等了半天也没有……这是一种让人心疼的萧条，心疼。

学院自然还是没有人，我依然给所有在学校住宿的孩子打了电话问他们的情况和体温。然后狠狠地批评一个男孩的创作，在他的眼睛里，周围的人都是卖淫女、同性恋、吸毒者或者性变态……我说，你难道没看到生活中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而只有在你的作品中才是多数吗？我还说：如果你这样写，我就给你个不及格，因为我不能告诉我的学生你可以对生活抱有这样灰暗的观点。一个人如果专一描写生活的污浊，人们就会转过身来看看作者是不是污浊。因为只有戴了污浊的眼镜才能把生活都看得污浊。也许本来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宽容一些，而且有人说艺术问题和世界观是两回事儿，老笨你管得太多。但我总是忍不住。后来那个学生很伤感地对我说：老师，我不是存心这样搞的，其实前边的老师都批评过我这样的毛病。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感受的。后来我们聊起了天儿，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从他不懂事就在打狱里，好不容易出来又再次进去。他不仅没有父爱，而且没感受到生活的温情，生活好像对他特别刻薄，和他作对。我听了他的话却没有改变我的态度，我告诉他，到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对人性绝望。“你保护好自己心灵深处的温情，因为有了它你才是一个人。”这个时代，我们的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体验，这是现实给他们的，我能说什么呢？

一个没回家的漂亮女孩来到办公室和我聊天，她是新疆来的孩子，过去是个主持人。我给她一个题目：一天，有一个同学被发现了非典，于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就被隔离在一个单独的院子里了。他们共同住在一起十五天。你能告诉我这十五天里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吗？姑且把这个故事就叫做《十五天》吧。其实，这是我们剧作训练中的“题材分析”练习。她很高兴，走了。

本来以为今天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消息的，没想到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过来，什么全完蛋了。电话那边说：听说××老师已经上呼吸机了！

我知道，他的生命到了关键时刻，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挺住。就在我值班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无助地挣扎……

我知道自己比较脆弱，我记得我在论坛上说过我怕死。那是真话。我看着亲人死去已经不是一回了，所以我在很多时候会问自己：你知道哪天是你的吗？

我告诉自己，生命没有什么注定的意义。生命是个自然界的物理过程。

非典过去我会干什么？我的生活会和没有非典以前一样吗？我不知道。

应该勇敢一些，让我的学生看到他们的老师是多么坦然。那女生说：老师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没回家是因为这里有你在。你在身边的时候我好像就能够心情平静。

可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么糟糕。

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在岗位上

我们学院的书记虽然有点概念化，但他真的是个挺朴实的人。他一直在岗位上。另外，我们的一个张医生因为学生要隔离，他必须照顾，就和那些学生隔离到了一个小院里，我有很多天没看到他了。因为那个门是上了锁的。我的一个同事叫钟老师，他是管理外国留学生的，他干脆住到了办公室……

我经常会在学校的宿舍楼里看到老师们的身影。另外，学校的工友们天天都在工作，消毒。那些农村来的女孩子看见我很高兴，告诉我她们很害怕。可她们有这份工作不容易，所以谁也没想回家。

学院为学生们安装了闭路电视，放外国电影。还打开了广播喇叭，给学生讲非典知识。我的一个学生就在那里管理喇叭了。

我们系的支部书记在家里每天向全国打电话。问学生的情况和体温。我很感动。

我们学院的老师真的是很尽职的了。当然，我说的是留在学院的老师。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4月28日

今天学院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病例，大家简直是数着天数过日子。那些被隔离的人已经在小院里住了十多天了，依然没有发烧的。真令人鼓舞！我们的张大夫也和他们关在一起，相信他不会忘记着短短的半个月。

外地的一些学生都回家了，他们纷来电话询问学校的事情。看来对学校还是有挺关心的。有的学生竟然要求回来，说在家太闷了，想上课了。可过去他们却多么希望放假啊。

看来，大家逐渐地镇定下来了。随着时间的延续，会越来越镇静。

今天我们系支部书记来值班了。她一定要我回家休息，下午我睡了好大的一个觉！

上午，学院开了系处会议，通报学院党委会的内容和市委的要求。具体内容恕不在此多说了。

我觉得我们学院处理情况还是比较及时的，而且我们头头真的是很尽职尽责了。为了避免司机感染，我们院长亲自开车和该系系主任一起到医院，医院有规定不让进去，他们便和主治医生通了电话。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还是挺英勇的。

其实，上级领导也更加不容易。比如市委常委、教工委朱书记就亲自给学校打电话来问这个学生的病情，而且市里还组成了专门给他看病的专家小组，抽调了3名大夫专门抢救他。可惜没能抢救过来。

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已经很久没回家了，24小时值班，没有人有抱怨的。

今天给系里的老师打了电话，发现所有老师都很从容。有的在机房做他那电视剧的后期；有的在为学生批改作业；一个老师忙着编书……总之，好像大家都没闲着。一位姓庄的老师 and 姓戴的老师接到电话，说，您辛苦了，如果需要我，我马上到学校去，千万别客气。这些话在今天听了心里很热。

如果让你评价一下两岸三地的非典处理表现你会怎么看？我得到到目前为止：香港第一，大陆第二，台湾第三。

首先，香港把很厉害的疫情控制住了，而且靠了自己的力量和机制。他们顶住了压力。香港人在近些年里总是多灾多难，什么鸡瘟、猪瘟，什么亚洲金融风暴，现在就又来了个非典！他们的生活从过去的辉煌一下子跌落了下来，失业人口增加，工资减少……当然，这应该说和回归祖国没有直接的联系。有些情况是全球性的，甚至是天灾人祸。但是我们能想象得到对于香港的长官们说来他们身上的压力会有多大。非典之后，香港乱了一阵，接着就人人戴起了口罩。可是那里的人很快就镇静下来，尤其值得敬佩的是香港的医生护士们，他们认真于职守，不吵不闹，默默地迎战死亡。没有他们，香港不会有今天的防非典形式。而香港的艺人们确实也像网友所说的那样，他们众志成城，关心本港，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许在香港有很不同的政见，但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却是真诚的团结。也许，他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只有靠他们自己了？前些日子，看电视，突然听到《东方之珠》的音乐，而配合的画面却是香港人万众一心地抗击非典的画面，我的眼睛立刻就湿润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很棒。过去我看不起港人，觉得他们文化无根，觉得他们文化沙漠，觉得他们因此而显得商业气太重，少了一种超越金钱的真情。但现在看看，我至少应该承认过去的看法是很有偏见的。

大陆呢？最初我是很生气的。明明在说假话，明明灾难来了还不让百姓知情。我就贴了贴子，警示大家灾难在临近，说“世界应该向北京学习，因为北京的非典数量永远不长。”可近来，我也看到了更多的情况。比如说，在关键的时候目前的机制依然是有效的。在北京，很多有良心的人表现得那样英勇无畏！北京的医生太好了。他们很少有人后退。我们系一位老师在读小学的女儿问他父亲：“爸爸，什么是非典啊？”他父亲回答说：“非典是发给每个人的一份考卷，考考这个人的素质。”确实是这样的。全民族的素质都在这时经受着考验。面临瘟疫，北京没有慌乱，学校的老师们保护着自己的学生，医生保护着自己的病人，领导保护着自己的下属，百姓保持着幽默感……这些使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我甚至感觉到，很久没有的那种同事间的温情，师生间的温情和恋人间的温情。一个女生坚决不肯听从母亲的意思回外地的家，她一定要与自己的男朋友在一起。后来她的母亲不得不妥协，让她把男朋友一起带回家去。刚刚公布真实非典情况的时候，我甚至对形势很灰心，但现在我心中的信心在增强着，因为我看到了周围那些为了抗击非典而默默努力的人们。

当然，问题还是有。我们看到了不少当官的素质太差，本来是因为他们干了失信于民的事情，却说别人造谣是别有用心。又把文革那一套拿出来吓人了。在这个时候何必呢？这个时候要的是团结，要的是具体的措施，要的是放下领导的架子和百姓亲近。可那些人还是习惯性地板了官僚的脸，溅着唾沫指责别人。太不可爱了。看看香港的官员，他们尽管有的时候显得无力，但总还是亲切的吧？总还是实事求是的吧？两厢比较，大家不难有评价。

而且，我们的宣传也不到位。一些领导用了过去一贯的方法，动员会，口号，什么“党委要成为核心。”“党员要争当骨

干。”“非典时期坚持三个代表。”有很多基层的领导人是十分好的人，他们每天奔波在抗击非典第一线，可他们还没能在具体实施方案上下功夫。也没能群策群力。比如，应该研究对付一个学校大楼里出现了一例非典的几套办法，然后从中间找到一个最佳的。而不是临时想一个是一个。应该想在前，而是不事到临头再想。可是他们却把该考虑的精力用来搞空洞的动员上了，开了半天会，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我再次声明，其实我是很敬佩一些基层领导的为人的，他们这些日子心理上 and 肩膀上的压力都很大了，而且他们很努力。但可惜，常常没用在实处。

最糟糕的是，非典的突然来临暴露了我们的官僚体制中人浮于事的毛病。比如我们学院，不断地让填写表格，人事部门让填写老师姓名、年龄、生日、住址、电话……学生管理部门让填写学生姓名、性别、生日、住址、家长姓名、电话、邮编……难道我们那么多高级电脑都白买了吗？难道我们过去那么多的机关人员坐在办公桌前一天天地白忙了吗？那些数据库是早就该建立的啊。这样的机制面对非典，就暴露出了不能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来。

国人的素质也有问题。举例：我们把学生严格控制在学校宿舍了，可学生们却根本不懂得遵守纪律。他们晚上偷偷爬墙出去，有的人一去就是两天没影。昨天竟然有个学生出去聚会，喝个酩酊大醉，回来后就拉肚子，发烧39度多！你说说，这样的学生你拿他怎么办？糟糕的是，并不是少数学生这样啊！还有的学生，由于平日里没有挫折教育，没有切实的人情教育，他们不爱别人，只爱自己，遇到事情先就想到自己。立刻慌了，哭！闹！望风而逃！不惜冒了把病毒带给亲人的危险往家跑。有的男生对女生说，非典了，你干脆和我一起住吧。那女孩总算明智，说：我总不能为了逃命把自己就这样给人吧？

在北京的大街上，那些随地吐痰的人还是到处可见。

我们学院的家属宿舍里有了一例非典，是外单位的。那个老同志不幸没抗过去，去了。可他的家属据说的不让人消毒，而且还在楼道里和户外四处逛。有人对他好意劝阻，他竟然对人家大打出手，朝人家身上吐口水。吓得提意见的那个棒小伙拔腿就跑！哈！人家随口就携带了高级生化武器哩！

这些年，中国的泡沫道德在消退，有人管这叫道德滑坡。如果我们对这样的情况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遇到非典，不会不受到惩罚。我们在灾难过后要从此把道德种植在深深的土壤里，而不是空中。

尽管这样，我们依然应该有理由相信政府目前的努力，我甚至于认为我们这一任政府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非典也考验他们，让人民在心里掂量每一个人，并且为他们记上点什么。没有比今天的国人心里更清楚的时候了。

相比之下，台湾真的是让我感到意外。我原来一直对台湾的应变能力有期待的。我曾经很钦佩台湾人的文化素质。他们中的很多

人受过西洋或者东洋教育。他们有民主思想。他们可以批评领袖。台湾人热衷政治……可这次一看，太失望了。大敌当前，还是能让人感觉到当年抗日之初那种慌乱，那种自私，那种不顾民族情谊，那种狭隘。台湾的病例并不比香港和大陆更多，可人们却一夜之间就乱了套。当官的没有大将风度，对不媒体大骂，病人一点不镇静，在那里嚎啕，医生遛了，人民对医生一味责怪……太让人伤心了。难怪有朋友看了这样的情况说，如果有一天大陆和台湾打起来，就照他们这个德性，还是不堪一击！当然，也许不能责怪台湾人民，当局的处理缺少人情味儿。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台湾青年志愿者出现了！真棒！中国人还是有好样的！相信台湾人通过非典也会对自己的生活空间作出深刻的反思。相信那里也有很英勇的人，就像当年我们看到过的张自忠将军他们一样。台湾的非典虽然是由抱怨、谩骂和慌张开始，但必定会以团结、奉献而终局。我相信我的同胞。

我在想，大陆没在这个时候攻击台湾，香港没在这个时候抱怨大陆，台湾没在这个时候排斥大陆和香港。这就是时代的进步。中国人是到了抱团的时候了。政客们只有在分裂的时候才能保住自己的地盘，而人民却希望着民族的团结。也许非典会给很多人这样的启示吧？

以上我胡说了很多。我知道在咱们老三届这里有很多高级的脑袋，所以以往我是不太爱议论什么的，怕挨板砖，嘿嘿。可非典时期，诸位G G M M宽容吧，就让老笨胡说两句。别见笑啊。

我看到很多关心我的网友鼓励我的贴子。其实我这里根本就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危险。学校现在是最安全的了。天天关了门，消毒。每天没多少事儿，就是问问学生体温什么的。而且，我从家里抱了个被子来，中午就睡上一觉，别提多惬意了。哪里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吓人？你们来看看就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了。把我这样的情况看得无比英勇，比较可乐了，让我看了脸红。也许后边有需要我英勇的时候，不过现在骇早呢。现在是最舒服的时候，如果事情再稳定一点，我看搞搞写作应该是很好的环境了。一个值班的老师看到楼道里没人，就开了录音机引吭高歌，她说，多好！过去可不敢这样。

诸位，情况当然很严峻，我们学院的那位老师依然没有消息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非典能过去，可咱们总得找点乐子吧？如果我过去胡写的东西让大家沉闷，那就是我的过失了。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毛病，有的时候太多愁善感，把自己弄得跟个娘们儿似的（嘿嘿，我可没有贬低美眉们的意思）。还是让我多写点开心的事儿吧。下面，我发一个非典时候学生写给我的故事给大家看看。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4月29日(1)——谢飞渡过难关

哈哈！太高兴了！

刚刚收到一个人发来的手机短信，一看我就跳起来了：“以下是谢飞的来信，请转告大家，今天已闯过了十四天的鬼门关，死里逃生，体温呼吸正常，开始恢复期，谢谢连日关怀，谢飞。”

真是太好了，我高兴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昨天学院开会，说是谢老师情况不好，已经上了呼吸机，而且下不了地了。我心情很沉重，回家告诉夫人了。可夫人说：谢老师没什么问题。依他的性格一定能挺住的。我也是这样希望的。前天夜里，我整整一夜都在寻找谢飞，记不得为什么找他了，好像是要找他上课，可怎么也找不到。醒来，我总觉得心头压块石头似的。我对夫人说，谢飞是一个很可爱的性情中人。他什么时候都是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例如当年他曾经当副院长，他竟然说要文学系和表演系干什么？没用。撤了算了。当然他只是说说。一次我问：你觉得你的《本命年》有什么缺点吗？他笑着说：缺点？好像没有。大家知道他的性格，所以谁也不会拿他当院长，总是张口闭口就叫“谢飞”。

记得在朱辛庄的时候，他趴在二楼的窗户上向下看，下面聚集着老师们正在等候下班回家的班车，有人看见他在那里张望，就笑着喊：“谢飞，你不下来在那儿干什么呢？”谁也没想到，谢飞作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口型，大家当时一愣，接着就哈哈大笑。他的口型虽然没有发音，可谁也能明白，他说的是：“操你妈！”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院长吗？

刚看完谢飞的短信，我正满屋高兴地走，突然电话想起，竟然是美国南卡的叶坦。这家伙和我一起在内蒙插队，虽然不是一个大队，但在水库一起干过。 he 现在是南卡的终身教授了。这家伙是个乐天派，什么时候都大大咧咧的。他打电话就问我怎么样了。他告诉我，从电视里看到北京的口罩根本不灵，立即从美国UPS公司订购了100个美国口罩，寄给了北京的邱居亮。而他打不通邱的电话，让我电话通知他及时取货并分发给知青哥们。

啊啊！这年头！知青哥们儿还是如此仗义而单纯！妈的！非典算什么？

今天好高兴啊！

4月29日傍（2）

今天没值班。书记说让我好好睡觉，她在那里应付。学院规定每个班必须两个人，可我们系只留了一个人。要说，一个人其实已经够用了。我们系现在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留多了人反而不好。两个人轮流值班也就成了。

学院里，所有的餐厅和饭馆全部开着。中国学生看不到了，反而是一些外国青年在那里溜达。看着他们男男女女打打闹闹的样子，很受感染。

我的汽车早就扔在那里没开了，上面的土厚厚的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里边的汽油也没了。于是我对老婆说，干脆咱们加油去，顺便洗洗车。我们往常都到香山的加油站去，那里加油的人可以免费电脑洗车，我算过，开到那里所用的油钱肯定比10元擦车费少，所以就老到那里去加油。往日，那里的车辆特别多，洗车得排队。可今天到那里一看，只有我的汽车。问工作人员，说是加油的人少了一半还多。

加完油，想到离香山很近，今天难得休息，而且高兴，就对媳妇说：咱们也浪漫一把吧，到香山去看看。估计那里没有什么人玩了，清静且安全。可我想错了，那里的停车场上根本没有地方停车。山道上是不是比平日人少我不知道，反正到处能看到游客。那些人们都不戴口罩。山路，山花开得正闹，红男绿女，相依相偎，哪里有非典气象？我长叹一口气，很久没有这样平静的心态了，尽管只是暂时忘记了非典，暂时也好啊！夫人说：如果没有非典，这是多么好的季节啊。话里话外，流露出对生活的珍惜之情，而这种感情在过去她可不太有。也许，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知道什么是最可珍惜的。

回家，照例买点菜自己来做饭。可没想到平日里蔬菜成堆的菜站里今天竟然几乎没什么东西了。我买了一个别人挑剩下的茄子、一捆不太好的菠菜和一把还不错的蒜苗。问小贩原因，他说：“根本没菜可上了。出了北京，人家一听是北京来的车，你给再多钱人家也不卖你菜。躲你还躲不赢！”他还告诉我，实际上通往外地的路也被各地的人给堵了。就在这个时候，小贩的手机响了，是家人问他咱们办。我听他大着嗓门用河南话高喊：“咦呀！莫啥！我们都挺好！你开车只管来，害怕就带上个胶皮手套。啥个非典不非典的，开车只管来！”看他那样子，很有几分豪迈。

进屋一看电脑，收到六个学生的故事梗概，看来这一下子就要看上一晚上了。学生都好，既然有心情写故事，看来情绪也都稳

定下来了。还有，这一下午收到同样报告谢飞消息的短信就不知道多少了！

上了咱们这个论坛，看到大家替谢飞高兴，开心！真的开心！谢谢诸位插友诸位G G J J D D M M了。胡乱写的东西看来多日也搅的大家不安。看来以后我应该再沉着一点儿，少给大家添堵。诸位，等非典过去，我们聚聚，好喝一回吧。现在刚多少天啊，我又开始怀恋高朋满座的日子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qz.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4月30日

今天学院十分平静。本来学院领导规定每天要交一次学生情况调查表，表里写明今天学生的体温有没有问题什么的。可今天却通知如果没情况就不必再报那劳什子表格了（本来我就觉得是形式主义的玩意儿）。

令人高兴的人，谢飞老师的情况确实进一步好转，他现在目前体温 36 度多一点儿，现在已经摘除了呼吸机，自己坐起来吃饭了。我在想，等下次见到他一定提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生死关头想了些什么。我对这个事情总是很好奇。

另外一个表演系的学生马元情况就更加好了，体温正常，精神很愉快。已经度过了难关了。

关在小院里的学生和张大夫还没出来。听说他们每人一个单间，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聊天。估计除了闷一点儿，其实日子过得还是满舒服的。

今天见到负责学院国际培训中心的老师。他从闹非典起就没回家，每天住在学校里。看得出他可是闷坏了，在学院院子里走来走去，看见我大老远就高兴地挥手。他告诉我，外国学生竟然还有 30 多人没走。

今天有的老师到了北京植物园，他们所见和我昨天看到的一样：植物园里人可多了。大家都在开心地玩儿。

北京的非典没有平息，可北京人的心情正在从混乱中平静下来。

另外，我把咱们网友给我那学生的故事提的意见转达给她了，她大喜过望，让我在这里表达对 HANGS 和胡叔叔的敬意和谢意。

5月1日

今天，那些因为谢飞老师而被在各自家中隔离休观的老师终于解禁里了。这些家伙一出门就像小鸟似的跑到学校。很多老师围着他们中的一个，听他们讲休观的感受。都说：妈的，憋坏了！然后就狠命地呼吸，狠命地抽烟！

我问了其中有关人的夫人，他在家期间是什么表现。夫人说：“我们两个人都被休观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被谢老师传染了。可他却说，咱们俩得分开，不然万一我传染了你就不就完了？可我却没听他的。他后来看着我说，你这人还真行！”夫人说完就“咯咯”地笑，笑声里有几许自豪和亲切。

另外，学院家属宿舍里那个外单位的非典患者的家终于被隔离消毒了。学院为了做到这一点费尽了周折。那家人大概因为有人不幸而心态有点激动，一直不让人消毒，自己也不隔离，每天在楼里和院子里来回乱窜。学院报告了很多上级部门，竟然在那个病人去世过后很久也没人理睬，指导学院向海淀区发出“强烈要求”，这才有人来干预。总算解决了。

一个老师告诉我说，国家为了治疗这些非典病人真的是下了本了。一个人平均一天的费用竟然高达8000元。而治愈的人均费用则高达20万。我的天！如果这是真的，还真是够惊人的了。

今天，学院里充满了安谧祥和的空气。通报说，谢飞老师的病情日渐好转，已经退烧了。但还要等一些时辰才能判断他能否痊愈出院；而另外一个表演系的学生也度过了难关，目前肺部阴影在缩小，体温正常，情绪很好。

学院给每个学生家长发了一封热情洋溢但多少有些概念化的信，是个意思，不能要求我们的行政领导都把信写成美文不是？

我今天在系里值班，突然街道体育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正在楼下排练室里组织五一乒乓球赛，请你来参加。

哈！看来不管非典现在是否控制住了，至少大家的心情是被控制住了！跑出楼道，但见这个五一的天空正多云转晴。

5月2日

值班，很烦闷，原来很不愿意上课，现在却觉得这样干呆着实在没多大意思。

学院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有两个学生私自跑出学校住宿，受到了纪律处分。对现在的一些学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面对空空的校园，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什么时候也没有这些日子考虑国家前途多。很久不这样考虑了。

我知道非典会过去，我知道人们又会上学和逛商场，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面临着怎样的局面呢？

5月3日

昨天回家太晚，没能向大家汇报。其实也还是没什么汇报的。

昨天学院依然平静。我去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导演系的系主任，他是因为与谢飞接触而被学院隔离的一个。见到他时，他正准备钻进夫人开的汽车。我问：到哪里去？他哈哈笑了，回答说：还没想好。不过我们俩被关了这些日子，闷坏了。到哪里去也可以，只有一个心情，就是出去转转！

你看，人是多么需要自由啊！他才被休观了两个星期就憋成饥不择食的游客了。

学院里的小院也已经开了原本锁着的大门。所有与非典患者有过接触的人都没有发烧迹象，于是都放生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小院门口那块“隔离区”的牌子还在。后来一问方才知，原来那些学生虽然被解禁，却不愿意回到原来楼里的宿舍去。原来是在隔离期间住的是单间，而且大家关系日渐友好，竟然对小院有所留恋。再说，回去也怕宿舍的同学对他们多少还有点戒心。所以索性自己把牌子再竖立起来，还住在里边。

奇怪的是，非典病人不是对所有人都传染的。比如学院家属楼的那个已经去世的老人，他家中的几口人，一个都没被感染。另外，谢飞老师家人也是都平安无事。学院其他与非典患者亲密接触的学生也一个都没发现病情。是不是说，有的非典病毒的传染性比较小呢？不得而知。

值班的时候，学院党委书记来了。坐在那里和我聊天。我们谈到了招生考试，谈到了学生毕业作业，谈到了恢复上课的困难。总之，有很多事情已经被搞得不知道如何办了。学生总要毕业呀，他们要答辩，要开毕业典礼。专升本要报名，研究生要录取……书记说，上面会有安排的吧？

接着，我们也讨论了今年来教学出现的问题。也许在别的学校这样的情况不太明显，可在我们学院却十分突出：没人愿意多上课，没人愿意写教材，没人愿意给学生留作业，没人愿意参加系里的研讨会……总之。不太爱干学校的事情。原因很清楚：外边的世界诱惑太大。这些老师都是年富力强的，他们在外边搞创作。挣得多的人究竟能有多少收入？我不太清楚，但一年40万的收入应该是有的。一集电视剧如果两万稿酬，二十集就是40万。而我看到有的老师从来就没有停歇的时候。总之，学院不是可能满足人的欲望的。所以，现在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而教学质量却有待提高。一些老师不是讲课，而是混课。他到课堂上放个片子就走人，学生看完就下课。有的老师连学生期末考试试卷都不批阅，一放就是两年！其实，学院的教学已经跟不上时代，研究生的教材亟待编写。很多教学问题要研讨……怎么办？我问书记。书记回答说，本来是准备开始搞教学的。可现在非典了！看来非典不仅误事。而且给误事找到理由。我想，现在大学一定都有各自很多问题吧？家长把孩子交给了我们，可我们的教学却跟不上，实在惭愧。

昨天之所以没能向大家汇报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没什么可说的新情况。二是我下了班就到妹妹家了。妹妹是一个活宝，她追求现代生活。要有汽车，要有房子和好的装修。她最早开夏利，后来汽车也不断地换，现在开赛欧。过去在城南买过一个120平方米的大房子，挺好。装修后住了一段，却又卖了，然后搬到城北，又买了一个140米的复试房子。她一点也不怕累，喜欢折腾和超前消费。过去，我们这一家人只有过年才到一起聚会，可前两天弟弟妹妹和爸爸都跑到妹妹家聚会了。大家一起唱卡拉OK。我因为值班，没去。看来非典有利于亲情，也算是个副产品吧？

这两天，尽管大街上的人少了。可锻炼的人多了，吐痰的人少了；常回家看看的人多了，而逛商场的人少了；上网的人多了，上街的人少了；看新闻的人多了，看电视剧的人少了；打电话的人多了，学习的人少了……不知道别的城市是怎么样的？我想一定大同小异吧？

5月4日

今天没什么新的情况。学校依然十分安静。我已经有好多日子没敢到老爹家去了，老爹自母亲去世，身体好像一下虚弱了不少，哪里敢轻易“惹”他。可昨天他开始呼唤我，让我一定过去看看，因为他和照顾他的女孩清华两个人闷死了。所以下班后我和夫人买了点菜呀水果呀点心呀就跑去了。没想到老爷子说：“我要去香山。”好，就去！我告诉他，我刚刚去过，那里人很多，不过现在已经五点多了，应该不会有太多人了。可是没想到汽车开到香山公园门外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那里的人可真多啊，汽车根本就沒地方停！

老爹兴致极好。给清华不断地讲香山的相关故事，讲49年的时候毛主席住在香山的情况，还讲到如何在母亲肚子里来到北京，如何生在中央党校之类的。最后，老头要到松林餐厅吃饭，我以为这里的餐厅一定也会和城里一样，不会有人光顾。可到了那里却发现高朋满座，大家都愿意坐在外边吃，看着山花，闻着槐树花的香气，喝着啤酒，是一种享受。很多年轻朋友在草地上野餐，他们打羽毛球，甚至做广播体操，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受到感染。你到香山，不仅能放松，而且能找到一种久违了的精神状态。

爸爸吃饭的时候要从外边移到屋里，我本来希望能看看风景的，可也不得不依了老人。进屋之后坐定，方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这家餐厅，为什么要进屋吃饭，他说：“我和你妈上次来就坐在这个桌子上吃的饭……”老爹好可怜啊。

我拍了很多数码照片，可因为像素设得太大，照片很大，不太搞上传。以后鼓掇小点再给大家看。

下面，转贴一个新闻：

著名导演谢飞病情稳定 十天后就可出院(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05日01:49 北京娱乐信报

谢飞看起来精神很好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本报记者正在采访谢飞 信报记者 孙京龙 / 摄

23集电视剧《日出》在北京电视台开始热播，而该剧导演谢飞却因感染非典型肺炎住进了地坛医院。与病魔抗争了十几天后，这位著名的导演目前已经度过危险期，病情稳定，他的主治医生蒋荣猛告诉记者：再过十天左右，谢飞就可以回家了。

昨日下午，记者通过“捷视宝”可视电话，采访了正在恢复期的谢飞。

病好后就去教书

昨日下午，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可视电话安在了谢飞病房的床头。15时10分，电话接通了。本报副社长、副总编辑胡富在电话里对谢飞进行了慰问。

屏幕上，躺在床上的谢飞侧着脸，握着听筒的左手显得有些吃力，但看起来精神很好，语气很轻松也很开朗。他说：“我的病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谢谢你们关心。我今天刚刚撤去呼吸机的脸罩，但是还需要吸氧，从早到晚一直在吸。”多说了几句话，谢导的胸脯就开始起伏，放慢语速后，他仍旧很乐观沉稳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谢飞说，4月16日发烧开始，他就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工作。18日进入隔离区后更是什么也不想不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全心全意治病。他表示，“现在我惟一的事情就是治病。完全治好病后，我还要(回北京电影学院)教书。那么多学生还等着上课呢。”

最大的乐趣是看电视发短信

从4月18日至今，花甲之年的谢飞已经在地坛医院度过了17天。17天内，除了每天配合医生治疗，谢飞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电视和给亲朋好友发短信。谢飞说，刚进来时，手机非常繁忙，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问候电话。长时间的讲话大大增加谢飞的耗氧量，呼吸由此经常变得急促，很不利于治疗。后来，医生“发了火”，对谢飞的电话进行了关机管制，只允许他在病情好转时主动打电话向家人报平安。此后，即使是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他的声音。

谢飞告诉记者，再后来，与外界沟通更多的是靠发短信了。因为短信不用说话，也不会太累。“我已经闯过14天的鬼门关了，死里逃生啊，体温和呼吸都已经正常了，开始恢复，谢谢大家连日来的关心。”……他每发出这样一条信息，换来的是朋友们更多的祝福，每次看着这些，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再过10天左右就可出院

关于谢飞染病的原因，有种说法是他在一家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时，偶然感染上的。到底是不是，谢飞和他的家人也不是很清楚。他的主治医生蒋荣猛告诉记者，现在非典病毒传播的途径很复杂，是不是体检传染很难确定。

谢飞说，他现在已经完全退烧了，食欲也好了很多，医院的饭菜也挺对自己的胃口，米饭呀肉呀水果呀天天都吃得挺香的。谢飞

还说，他相信地坛医院医生的医术和经验，因为在他住院的期间，已经有10多位病人康复出院。现在自己就是天天数着手指盼出院。

他相信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能回家了。

蒋荣猛大夫也证实了谢飞的观点。他说，刚来医院时，谢飞的病情确实很严重，发烧、胸闷、呼吸困难、肺部阴影等症状非常令人担忧。医院对他迅速采取了紧急治疗措施。在无创呼吸机、激素治疗、免疫药物支持、营养补充、心理治疗等多种手段作用下，5月1日起，谢飞的病情趋向平稳。高烧下退、胸闷减轻、饭量增大、气色见好、免疫指数提高等临床症状综合反应，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闯过了鬼门关”。“按照现在的情况，10天左右谢飞就可以出院了。”蒋大夫乐观地估计。

病榻上关心自己的新作

尽管躺在病榻上的谢飞，嘴上说“现在惟一的事情就是治病”但是心里还是放心不下的自己的作品。据谢飞的妻子讲，现在他关心的是电视剧《日出》的播出反应和另外一部新作《豪门惊梦》的送审。23集电视剧《日出》是根据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同名经典话剧改编而成，现正在北京电视台一套热播。

谢飞自己也说，闲下来时，在病房也会看看电视，也看自己拍的电视剧《日出》。不过最让他操心的是《豪门惊梦》。这部根据香港作家梁凤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由秦汉和斯琴高娃主演。该剧已经在3月拍摄完毕，目前正在送审。谢飞估计，到下半年，这部电视剧就可以和广大观众见面了，到时候，自己的病也就好了。

远在南极的儿子不知情

身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师辈的谢飞，创造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形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位医生，而且是一位赴南极参加科学考察的医生。谢飞说，儿子是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今年29岁。去年11月，他被医院外派作为科考队的随队医生奔赴南极，到明年春节才能回家。在南极，不能打手机，也不能用电脑发邮件，所以和儿子的联系特别少，只能偶尔通过海事卫星电话聊几句。

这次生病，远在南极的儿子根本不知道。生病的这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和儿子联系上。谢飞说他也挺想儿子的，但是心里更多的是替他高兴。虽然南极也很苦，但是儿子由此避开了“非典”的劫难，做父亲的替他感到高兴，觉得这是一种福气。

真心感谢白衣天使

生病期间，谢导每天接触最多的人就是自己的主治医生和几位护士。他讲述说，每天一早，护士就来到病房帮助他洗漱、量体温，然后送早点，准备治疗……还经常在工作时和他聊聊天，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她们每次进来，都穿着厚厚的隔离服，我看不清她们的脸，这么多天也没有把她们的名字和人对上号。但是她们真的特别辛苦，我真的从内心感谢她们。”

说了一大堆话后，谢导的胸脯又开始起伏，说话也有些气喘了。记者不忍心再让他多说话，问他还有什么最想说的话时，他回答：“我希望北京防治非典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希望能尽快切断病源，能够打赢这一仗！”对于即将到来的国际护士节，谢飞激动地说：“感谢白衣天使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92岁的母亲毫不知情

谢飞是革命先辈谢觉哉先生最小的儿子。从小受家境熏陶，谢飞为人谦和，待人平易。

他的母亲王定国今年已经92岁。她和自己的孙子一样，也对谢飞的病情浑然不知。这位不简单老母亲是位老红军，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目前，这位老妈妈正在外地。据谢飞的爱人讲，谢飞生病的事一直瞒着她，怕她老人家知道后非要回北京。为了老人的安全，谢飞夫妇和其他亲朋好友已经统一了口径，不让老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信报记者张薇

谢飞档案

1942年8月14日，谢飞出生于陕西延安，籍贯湖南宁乡。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电影学院教员、导演系主任，副院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电影评论协会理事等职务。

谢飞单独执导或与别人联合导演的作品已有10部之多，其中《我们的田野》(1983)，《湘女萧萧》(1986)、《本命年》(1989)、《香魂女》(1992)和《黑骏马》(1995)五部影片，以其代表性和风格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艺术创造手法。

5月5日

我一直不知道诸位是如何把照片放到网上的，现在我试试。如果成功，这是我那天和老爹一起逛香山时照的。香山开满了这样的鲜花。

5月7日

我本来以为非典也许没什么了。可今天老爹打来电话说，他们院子里又有一位小学老师得了非典。老爹说：“你也注意着点儿吧，别刚刚缓缓你就到处瞎跑。”老爹还说，明天他们党校动员为义务人员捐款，他正好刚刚长了一月2000元工资，一下会补发10000元，他就把它们都捐了。问我这里捐没捐，说，如果要咱捐，你就捐。我说：知道知道，我肯定会捐。

现在，你下班之后到公园，真是很好的享受。人少，花开得也好。今天5点到了景山公园，看到一位退休老妈妈在画那里的牡丹，我就把牡丹、老人和老人画的牡丹都给拍了下来。很油时代特色的。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哲人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但我想，做天使太难，做野兽也不易。人最好还是把自己当成人，有缺点错误不怕，只要有人性，有人情，有人味就行的。如果背离了人的本性，迟早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当良心发现后，无尽的痛苦会让人至死不得安宁。

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一生为人谨慎，宁可自己吃亏，绝不欠别人的情。然而有一件事却由于自己一时的人性缺失留下了莫大的遗憾，负疚的痛苦折磨了我三十多年……如苍天有眼，让我在有生之年见到那位“姐姐”，向她道歉并求得她的原谅，我的心才可能归于平静……

那是1969年初。我刚满15岁，上了三年初中搞了两年半文化革命总算毕了业。革命小将替毛泽东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使命，又要响应老人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练红心。我大哥在新疆乌鲁木齐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任宣教科长，我想与其下乡不如支援边疆当兵团战士。那时父亲是走资派住“牛棚”回不了家，我一天到晚缠着母亲去非去新疆不可。母亲拗不过我，又担心近路途太远不安全。我说我参加过大小串连，再远的路也不怕。母亲看我实在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便答应过了大年初一让我走。

那年春节毫无喜庆气氛。偌大中国，七亿人民不是处于整人状态，就是处于被整状态。双方日子都不好过，因为两者关系的变化乃至完全颠倒随时可能发生，完全取决于老人家的政治需要。经过多年政治运动，国家一贫如洗，市民过春节连半斤花生都保证不了，所有商品都凭票供应，而且样样少得可怜。除了精神压抑物质匮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千家万户骨肉分离。人人脸上都像刷了胶水，可谁也不敢表示不满，人们出门个个戴着口罩，男人的帽檐压得极低，女人用围巾包得只露出两眼。

七亿人尽管吃不上，穿不上，但是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在中国版图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整齐有序地站队，恭恭敬敬地敬祝这个万寿无疆，敬祝那个永远健康。豪情万丈的红卫兵小将们更是慷慨激昂：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我虽然被列为黑五类子女，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我从来认为自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派。我的老家在白洋淀，父辈叔伯弟兄七人全都参加共产党抗日军队，都是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革命干部。大哥在兵团也是党员干部，母亲当居委主任，带领老太太背毛主席语录，她比谁背得多。我们家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庭？我打心眼里忠于毛主席，从未有过半点私心杂念，甚至认为不少红卫兵小将没有我的革命精神彻底。包括这次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认为我比起那些在本地下乡的同学革命精神更彻底。

大年初二早晨，妈妈给了我一百元钱，泪眼涟涟千叮咛、万嘱咐放行了。我来到火车站买票。单独出这么远的门心里总是有点发怵。这时，旁边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声音吸引了我：“姥姥，我要回乌鲁木齐，我要回乌鲁木齐”。那位年约六旬的老太太说：“别闹，姐姐去买票了，咱们一会儿就走”。这可是个机会，如果能和她们一起到乌鲁木齐就好了。

买票回来，只见一老一小旁边又多了一位高挑姑娘。她穿着当时流行的绿军装棉衣，蓝军裤，扎着一条红围巾戴着大口罩。我把自己的口罩摘下来，上前问道，你们去乌鲁木齐吗？姑娘长长的睫毛下黑亮的眸子闪出惊讶的目光。我掏出车票说，我刚才听小姑娘说的。我要去乌鲁木齐哥哥家，和你们搭伴走行不行？姑娘回头看看老太太，老太太也许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眼神，姑娘摘下口罩，我的眼前一亮，真是出众的美丽。她说：“小同学，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你不怕受累咱们就一路走吧”。

我喜出望外：“谢谢你，太感谢了。”

上车后，我和姑娘就聊开了。她说她叫李凤英，原籍是河北武安人，从小在新疆长大，住在乌鲁木齐郊区，是67届乌鲁木齐女子高中毕业生，大我五岁。本打算回老家插队，可是老家的条件很差。这次是接姥姥回新疆，一齐回乌鲁木齐郊区插队。小女孩叫小红，是小姨家的孩子。我告诉他，我不想在本地下乡，所以去找哥哥，想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她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全国各地到新疆的人都不愿回去。接着她轻声唱起了一首歌：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仓……她的嗓音非常好听，我说，你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吧。她迟迟没有开口，过了好一会儿才悠悠地说：“是的，一切都过去啦”。

与她同行让我有说不出的愉悦，我忍不住说：“我叫你姐姐行吗？”“当然行，我就缺个弟弟呢。”

我们买的是通票，需要在郑州倒车，人不用出站，等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列车。那趟车晚上十点以后才来。我们四个守着行李还要等三个多小时，小红闹着要吃零食，姥姥掏出钱来，让姐姐去买。一会儿，我发现有两个青年围着姐姐，姐姐扭着头不理他们，他们却嬉皮笑脸地不肯离开。我怒火中烧，飞快地跑过去。一把将姐姐拉到身后说：“妈妈叫你回去”接着怒气冲冲地问“你们想干什么？”

那两人觉的我年纪不大好欺侮，就想打架，我毫不示弱。正巧有公安路过，他们只得讪讪地走开。姐姐回来后仔细看着我，好像不认识似地说：“没想到你人不大，胆不小。真打架你敢吗？”。我镇定地说：“敢打我，我绝对饶不了他们”。姐姐紧紧攥着我的手，好久没有松开。

姥姥浑身哆嗦着说：“唉，这是什么世道。凤英，戴上口罩，捂上围巾，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姐姐顺从地戴上了口罩，两个大大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感到全身有一股暖流在回荡，更感到责任重大，于是警惕地环视周围，觉得自己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终于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乘客不多，我们四个人占了两排座，我和姐姐并排坐着。一开始还有说有笑，到后半夜大家都犯困了，老太太搂着小红先睡了。姐姐让我睡她看行李，我伏在桌上很快睡着了。朦胧中觉得有股异常的气味。原来姐姐爬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我一动不动，感受着异性的发香和气息。我长这么大，从未如此接触过年轻美丽的异性。在班里，由于我的年龄最小，尽管我的学习不错，是学校乒乓球队的，可那些漂亮女生从不正眼看我。现在的异样感觉令我的心情无比舒畅，我生怕姐姐醒过来，只想让时间延续下去。

一夜很快过去。天亮后我才注意到，同车厢中有不少是上海知青。他们大都是兵团战士，与外地人相比，鹤立鸡群，谈吐不凡。姐姐很快被他们吸引过去，和他们热烈地交谈起来。

我和老太太、小姑娘百无聊赖地坐着。老太太满脸沧桑，从来没有笑模样。小姑娘也许是先天营养不良，总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我无心与她们交流，望着车窗外无边无际的戈壁滩。我的心如同戈壁滩一样，失去了绿色，一片荒凉。一股酸溜溜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奇庄”姐姐从椅子背面探着身“你过来”。

我问道：“什么事？”

“叫你来你就来”。

“我困了”。姐姐走到我身边二话不说，把我拉过去坐到她身边，对着那几位上海知青说：“这是我弟弟。你们看长得像不像？”

“不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姐姐突然把脸贴到我脸上说：“这是我表弟，我最喜欢这个弟弟了。”

天哪，我的脸憋得通红，耳朵嗡嗡作响，心快跳到了嗓子眼，我醉了……

单调的行程引发了无数话题。大家七嘴八舌谈起了这些年的变化：六三年全国学雷锋，人人办好事。那时学校的厕所都被大家打算得干干净净，乘公共汽车都是主动给他人让座，办好事从不留姓名，哪时的社会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文革开始，打扫卫生的任务交给了牛鬼蛇神。乘车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同学们还想让座，可是如果把座位让给地富反坏右，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从此大家便不再让座。

文革兴起使大家只相信一个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认一个理，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儿女揭发父母，学生批斗老师，徒弟殴打师傅……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实，使大家更加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行动。”（毛泽东语）中国要反修防修，就得走这样的道路。

后来谈到了武斗话题，姐姐的脸顿时阴暗下来。她说，有八个同学在武斗中牺牲了，其中有文艺宣传队的最好朋友。他吹笛子在乌鲁木齐学校比赛得过第一，如果不是文革肯定会保送到音乐学院。如今他们就埋在校园内。

上海知青说，就是武斗搞得太凶，大家都跑回上海了。现在局势稳定了，领导要求必须归队否则除名。所以大家连春节也不敢在上海过都赶了回来。

姐姐转过来脸问我：“你在武斗中没惹祸吧。”

我说：“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小，从来没参加过武斗，不过有件事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什么事？”

“有一次，我们驻校战斗队领到了一批手榴弹，因为那一阵手榴弹质量不好，出过几次事故，头头让人扔几颗试试，我也跟着他们看热闹。高年级的同学躲到河堤后，往河沟里扔了两个都炸了。这时一个同学说，咱们把手榴弹绑到树上，试试爆炸威力有多大。于是他们把手榴弹绑好，从用一根长绳拴住拉火环，用力一拉没响。大家都害怕了，过了好半天，探过头去一看，傻眼了。原来手榴弹脱落了，而且拉绳把手榴弹里面的簧都拉了出来，弄不好一碰就炸。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说，你们都别动，让我去绑好，这颗手榴弹归我放。当时谁也没说话，我跳上土坡，三下五除二，把手榴弹绑了个结结实实。回来后，他们早躲开了。我拉住绳索一用力就把手榴弹引爆了。大家过去一看，胳膊粗细的小树被齐根崩断了。最后一颗是军用手雷，为首的同学说，奇庄今天有功，这颗手雷归你放。打那以后，同学再也没人小看我了。”

姐姐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你呀你呀，真不知天高地厚，胆也太大了。”

我说：“我是白洋淀人，是小兵张嘎的老乡。”

一个知青说：“真是嘎小子，这种事，给我一万块钱，也不会干。”其他人纷纷附和说，绝对不干。

那天夜里，姐姐说，伏在桌上睡觉太累了，你也别那么封建。她指着自己的腿说，把头枕到这儿，快躺下。我看了看老太太，老太太一付似睡非睡的样子。我二话没说顺从地躺倒。她用棉袄蒙住我的头搂住我，真舒服呀。也许是太疲惫了，我还没缓过神来，就睡着了。夜半时分我醒了，从洗手间回来后主动与姐姐调换了角色。姐姐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躺到我的腿上就鼾睡起来。在单调的，无休止的车轮与钢轨磨擦声中，整节车厢的人都进入了梦乡。老太太和小姑娘脸朝里，睡得很香。我入神地看着姐姐，她的脖子好白呀，脸庞如象牙般的洁白晶莹，一缕黑发弯过耳畔妩媚迷人，长长的睫毛那么浓密，凝脂般的鼻翼轻轻翕动，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她一定做着好梦，脸上漾着甜蜜的笑意。我好想搂住姐姐，象白天她对我那样，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可是我不敢，事实上我一动不动，平静又不平静地度过了短暂而漫长的一夜。我真想让这一刻化为永恒，可太阳还是无情地升了起来……

遗憾就在这天清晨发生了。

姐姐和姥姥去洗脸。我哄着小红玩，这几天我和小姑娘很熟了。那一刻，我鬼使神差般地从拿出了一本印着彩色毛泽东头象的毛主席语录，兴致勃勃地说：“小红，我教你，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小红推开语录摇着头说：“狗屁红太阳，我不要红太阳。”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好像要炸了。她竟然说狗屁红太阳。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么点小孩能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她家大人教育的结果。

我想起来了。毛主席说，现在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是在在郑州，老太太看到不良青年，就说这是什么世道。她一天到晚冷若冰霜的样子足以证明她对现实的不满。

对了，姐姐对毛主席的文攻武卫也充满了仇恨，她对我完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飞快地进行着自己的推理和联想：她们一定是对当今社会充满刻骨仇恨的黑五类家庭，她们准是逃回老家混不下去又溜回新疆的。自己不与她们划清界限，反而与她们打得火热，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我拿定主意，尽快离开她们，再也不和她们接触。

等她们二人洗漱回来，我面无表情地拿起自己的背包说：“后边车厢空座不少，我去那边看书去。”说罢，我没有看她们一眼，扭头就走。

到了后边车厢，我躺在长椅上，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亵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论是任何人。

我盼着姐姐过来，也害怕姐姐过来。我不知道，如果我和姐姐说话，我还有没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又反问自己，你不是黑五类子女吗？你有什么权利和别人划清界限？但是另一个声音告诉我。父亲是虽然挨批斗，但是我们一家人个个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历史总能还我家以清白，我们家与那些真正的黑五类家庭有着本质区别。造反派越是不承认我家是革命家庭，我越要区别是非，在任何时候都自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分清敌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想到这里，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直到下午，姐姐终于过来了，她坐到我对面椅子上一声不吭，想等我解释。可我躺在那闭着眼硬是装着不知道她的到来。过了好久好久，姐姐说：“奇庄，这是为什么？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请你说明白，你这样做是为什么？”我绷紧了嘴巴，横下一条心，就是不说话。我害怕话一旦说出口，自己就没有勇气坚持下去。

姐姐继续说：“明天清早就到乌鲁木齐了。我本想陪你玩玩，去我们老家看看。万一你年龄小，生产建设兵团不能收留你，我想请你到我们家插队，等你年满18岁再进兵团……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小弟弟。”

我尽全力克制着自己，使她的声音变成耳旁风。我一定要做到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继续上当受骗。没错，她们一家就是聊斋中的画皮，《西游记》中的白骨精。再不划清界限我定会陷入灾难深渊。我猛地坐起来，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她，不容商量地说：“你走吧，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姐姐惊呆了，她也许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会如此回答。一串大大的泪珠顺着她的鼻翼缓缓淌下来，她紧紧地咬住嘴唇，用围巾捂着脸抽泣着离开了。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时光是怎么过去的。只感到天旋地转，茶饭无心。我想，也许这就是私字和私情作怪吧。毛主席语录又一遍遍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终于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车厢中响起了乘务员的广播，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乌鲁木齐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提前作好下车准备。

姐姐三人的行李不少啊，加上我的帮助还那么吃力，她们能带走吗？这个念头刚刚闪过，又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绝不能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对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向严冬一样无情。可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一次分手，也许再也没有见面机会了，如此温柔体贴美丽善良的姐姐怎么可能是坏人？交织在矛盾中的我，内心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激烈的搏斗。

不知为什么，我还是盼着见上姐姐一面，哪怕只是远远地看她一眼。一抬头，姐姐居然来到了我的面前。她带上了大口罩，扎紧了红围巾，递给我一张纸条后转身走了。

娟秀的笔体这样写着：

奇庄弟：你说你哥哥的工作单位是工一师宣教科，告诉你行走路线：从火车站乘某路车，到某某站下车。愿你一路走好，一生走好。姐姐。

走出车站，漫天风雪，一片洁白。远远望着她们三位蹒跚的身影，我心中充满了矛盾。我想去帮她们一把，可此时我的腿比铅还沉重。

见到哥哥，我迫不及待地讲了这经历，想让哥哥帮我分析一下自己做的对不对。哥哥说，你真是混蛋，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懂什么，哪有你这么上纲上线的？快去找人家赔礼道歉。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乌鲁木齐女子中学，学校一片萧杀寂静。找到值班老师，老师说有李凤英这个同学，可是现在已经毕业了，无法和她取得联系。我问，有她的家庭地址吗？老师说文革这么乱，谁还保存个人资料。走出学校办公楼，我看到了冰雪覆盖中的几个水泥墓碑。我径直过去，肃立默哀良久。

我最终没有留到兵团。半个月后，我重返故乡，随即到曲周县龙堂公社下乡。我再也没与姐姐取得联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遗憾。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有难以言表的悔恨……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惟愿凤英姐姐早已忘记那个曾经的无情无义“弟弟”。

人兽之间，存乎一念。遗憾是人性发现，良心发现。人生集各种矛盾于一身，于家、于友、于业、于国谁无遗憾？敢说自己没有任何遗憾的人，恐怕是少了人性，多了兽性。能改正的不叫遗憾，能补救的不算遗憾，能淡忘的也不是遗憾。怕得是无法挽回的遗憾，怕得是留下无穷忏悔的遗憾，怕得是即将告别人世尚有愧对他人的遗憾……

一大早，宿舍的走廊静悄悄的，如此寒冬谁也不愿早起，都还缩在被窝里，惟有烧火墙的老翟师傅在走廊里挨个给炉子添煤。突然，女孩悲凄的哭声将寂静打破：“爸…爸…，我哥死了…呜呜…”大家都吸了一口冷气，顿时睡意全无。接着传来老翟沙哑的吼声：“回去……你给我回去……别到这儿给我哭丧！”同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那是使劲用铲子拍在炉盖上发出的。老翟怎么了？大家感到纳闷。

老翟原是一车间酸洗甲班的班长，那是全厂最累、最脏的地方，那儿挥发在空气中的硫酸呛得人喘不过气来。1953年老翟从朝鲜回来，胸前佩着英雄勋章来到了酸洗甲班，一干就是20年，一直当着班长。老翟还是厂、冶金局和市里多年的先进工作者，长年日夜三班勤勤恳恳地干活，少言寡语，满脸憨厚，除了年年拿回家一些印了字的茶杯和毛巾外，再没什么好处。

老翟很快老了，一是恶劣的劳动环境，二是难以支撑的家庭。他有三子一女，三个儿子下乡以后陆续回城，大儿子安排了工作，老二老三在家“赋闲”，吃老爹的，最小的是女儿，正在上高中。大儿子结婚后，全家仅靠老翟一人的收入支撑，老伴长年有病，连家务都不能胜任。雪上加霜的是去年大儿子突发癫痫，不能上班，没有工作的儿媳便领了两个孙子住到了婆家，一下子给翟家又添了好几张嘴。去年老伴得病躺在床上，今年大儿子的病不见好，反而每况愈下，几次送医院抢救。连年的家庭不幸耗尽了老翟的精力，“先进”的光环又迫使他在厂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长此以往，老翟怎能不未老先衰！他在干活时开始出错，几次将酸浸后的盘元未经清洗就直接送入了烘炉，导致线材质量受损，有一次人还差点落入酸池，厂里只好将他调到后勤，到职工宿舍烧火墙。

老翟似乎麻木地抱头坐在炉旁，露出花白的头发，已起床漱洗的工友们过去劝他赶快回去料理，然而他一动不动，茫然地看着大家，浑浊眼睛里滚动着泪水，声音愈加沙哑地，似自言自语地说：“他倒好，一撒手啥也不管了，好哇，一了百了啊……”儿子的死似乎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老翟似乎一下子又老了不少，被烟火燎了一夜的脸青得可怕。

工友们一边劝老翟回去，一边去人替他到办公室请假、到财务科借钱，若不借钱，老翟断办不了丧事。财务科借了一百元钱给老翟，还是由厂革委会主任亲自批的，因为财务科长说老翟已欠厂里七百多了，若不是革委会主任批，谁也不敢再借给他。这些钱看来老翟到死也还不上，他每月才干巴巴四十六元工资，糊口尚且不够，怎能还债。

几天后老翟来上班了，虽然人又瘦了，但却精神了不少，他穿着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蓝卡其中山装，见到大家

忙不迭地点头道谢，工友们头一次见到老翟如此精神，穿得如此整洁，并不见一点悲哀，多少有点诧异。还是老翟自己道出了原委，原来，在女儿来报丧时，老翟正身无分文，天天夜里就开水啃窝头，他自己好应付，可一大家子怎么办。儿子死了，要钱办丧事；老伴躺在床上，要钱看病，过去拉下的饥荒还没还，他哪敢再到厂里借钱。如今，工友们帮他借了一百元钱，他丧事只用了不到一半，余下的钱够接济他半年的了，他怎能不精神呢？

本贴由河水于2004年6月21日20:24:04在《华夏知青论坛》发表.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万籁寂寂，昨夜的枪声停息，大江两岸又恢复了如初的宁静。朝阳灿烂，波光粼粼的南坎江水，缓缓徐徐，奔向下游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一觉醒来，微寒的风中带着雨后的湿润，昨夜惊心动魄的一幕，浑如一场不太真实的噩梦。

饿，饥饿的腹腔拗动着隐隐作痛直冒酸水，四下找寻，无一可食的野果，雨后的岩石旁有几株车前草引诱着郎小宁，他蹇过去拔起车前草，拧去带有泥土的根系猛嚼起来，只一会，那几株车前草就被郎小宁嚼食一空，胃里有了点东西，人也精神起来。

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儿童节，天刚昏亮，腊戍掸邦大监灯火通明，郎小宁和昆明陈仲立老师、知青王信如，四川知青姜古礼、陆诚，云南大学学生老徐一行十三人，清晨由缅警押上开往南坎的军车，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遣返中国。下午六时，车队抵达南坎，南坎移民局官员点名画押，验明正身，驱车押送江边。一只竹筏已在江边等候。一夜大雨，江水暴涨，洪波翻腾湍急汹涌，江面被洪水拓宽了一倍。十三人像一群押赴刑场的死囚，缅警为郎小宁等打开手铐，双手合十祝福，躲在树后，观看好戏上演。

近乡情怯。看对岸一江之隔崇山峻岭南来之路，郎小宁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觉祖国河山如此壮丽，弄岛公路上传来阵阵久违的汽车喇叭声。远望南来云深处，故乡、童年追逐的小巷、年幼的妹妹、狱中的老父……，郎小宁泪水夺眶滚落。这一干人面色凝重，等待着命运的发落。对岸的壕坑中，不明身份的军队在壕坑中奔跑，枪口在余晖中清晰可见，看来已是凶多吉少。竹筏渐渐逼近江心，骤然枪声大作弹如飞蝗，撑筏的摆夷汉子将竹筏撑往上游，把落水的人让在射程之下。枪声暴起，郎小宁等人纷纷跳水逃命，只有云大学生老徐不谙水性呆立竹筏，被送上对岸。落水的人挣扎呼号载浮载沉；上了岸的各自向南坎大山逃去。郎小宁和王信如、姜古礼、陈诚、杨文武游上了缅甸的岸边，等候着尚在江流之中的挣扎沉浮的陈仲立老师。陈老师被湍急的江流冲向下游，在浅水沙滩处摇晃着站立起来的他，在一排密集的枪声中倒下了，郎小宁几人见倒下的陈老师再也没有站起来，便强忍悲恸趁夜色向南坎大山逃去。

仓惶的逃亡途中，郎小宁与其他人失散了。黑暗中，郎小宁不敢叫喊，他敲打石块以图与其他人取得联系，除了空谷回音，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孤独无助感笼罩了郎小宁。不知走了多久，南坎城的灯火远去，天上的星星也稀落了，此时他想：王信如和姜古礼他们也不知逃到那里了。走过一段公路岔口，远远看到村寨的灯火，又累又饿

的郎小宁刚坐下歇口气，想稍后进村。突然，村寨枪声乍起，火光交织，郎小宁吓得逃离公路，躲进山里，待天亮再作打算。

嚼过几株车前草，郎小宁呆坐在一块石头上，心里盘算着怎样寻找失散的同伴，想来昨夜乍起的枪声，一定是失散逃亡的难友遇上了缅甸哨卡，但愿上苍垂怜，让他们逃过劫难。山下公路上出现了一个人，郎小宁一阵惊喜：会不会是失散的同伴？他大着胆子走下山来，公路上的那人也发现了他，朝他藏匿处用云南方言大声喊叫，原来这位老乡见他在山上，大声问他有没有看到他走失的马。

吉人天相！郎小宁大喜过望，想不到绝路上遇到了云南同乡。对方看郎小宁跑了下来，误以为他见到了失落的马，问“大哥你格有瞧见我呢海骝马？”小宁下了公路，这位三十来岁的云南汉子走了过来，露一脸焦急，又大声问小宁有没有见到他的海骝马。小宁走了过去，把昨晚发生的遭遇告诉这位云南大哥，请他帮帮忙，带他去他们寨子。这云南大哥告诉小宁，从山口小路走下去就可以见到他们寨子了，说完又急着找他的马去了。

沿着山口小路往下走。已经能看到炊烟袅袅，山寨鸡犬相闻，远远传来牧牛的牛铃叮当。小宁加快脚步，往下急奔。几间茅舍草屋坐落在路旁平地，走进路旁一户半虚掩着小门的人家，这户人家正在吃早饭，主人家见他这闯进门的不速之客，客气地叫他一声大哥，相邀吃饭。桌上摆着一盆米汤，一大碗南瓜和腌菜。小宁顾不得客套，一屁股坐上长木凳，等主人家给盛饭。房主人想不到略作客套招呼，小宁竟毫不客气等着饭来伸手。泡上米汤，一口气送下肚七八碗饭后，小宁启口讲了话。

主人家明白了小宁的来意，但一家人要忙着去采茶，没工夫陪他找头人，表示歉意后，叫小宁再沿路往下走，到寨中就可以问到头人刘钦蒙的家了。到了有汉人的村寨，小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再望下走几步无妨，反正此时饭饱汤足，来了精神，长了气力。小宁走了不到半小时的路程，一片云山开阔，南坎江象条伸延弯曲的玉带，展现眼底，瑞丽傣家人的金佛塔，在阳光中闪耀着辉煌，佛寺悠扬的钟声激荡着大江两岸的山谷。

没费多大的事就找到了头人刘钦蒙的家。此时，刘钦蒙正抱着水烟吸得呼噜直响，见到小宁只示意小宁坐。刘钦蒙二十七、八的样子，木着蜡黄的脸，招呼小宁一声坐，便没了下文，只是把那水烟一个劲的猛吸，直到吸完了两支崩卡烟，才把烟筒放下，不等刘钦蒙开口，小宁便主动把昨晚江中遭袭被打散的遭遇告诉了他，刘钦蒙似乎打小宁进门就已经知道他的来路，轻描淡写的应了一句：“哦，你们就是昨晚在江边挨打的那伙。”然后告诉小宁，他今天下南坎有事，有话等他晚上回来再说，说完背起筒帕，走了。

小宁满腹狐疑，看刘钦蒙此人有点阴阳怪气，会不会下南坎去告密？他向主人家大嫂打了个招呼，就去房前屋后、寨前寨后走走溜溜，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也好三十六计，溜为上策。

峨兰山寨，位于中国大陆云南边陲重镇瑞丽弄岛对岸、缅甸紧邻中国一江之隔的南坎县背西，南坎山脉中的一

个山寨。岷兰分上下寨，上寨人仅三十余户，人家；下寨较大，约计七、八十户，总属下寨管辖，刘钦蒙是世袭头人，岷兰人男女服饰各异，女的身着对襟大袖缀花边衣服，头饰银片钱币围帽，脚穿绣花的、象割草镰刀横立的夷方鞋，有人称他们为汉傣傣，他们则自立名号为夷方人。

日见西倾，早晨食下的车前草和米汤泡饭，经过一天的折腾已荡然无存。夷方人家一天只食两顿饭，小宁只得眼巴巴的望着饭锅咽酸水。肚子饿事小，如果刘钦蒙把移民局的警察引来抓人，那才是肚饿事关重要。他强忍着腹饥，先到寨头高坡观看动静，万一头人引狼上山，也好趁早钻山沟坳。

赶南坎街的人陆续返回来了，刘钦蒙背着筒帕一头汗水的上了寨门回家，闷声不吭，就抱起水烟筒呼噜噜抽起来，待两支香烟吸完，饭菜摆上了桌，不见主人下令开饭。到掌灯时分，人回来完了，小宁才和刘头人一家大小和长工坐上了桌，男男女女一声不响闷头吃饭。饭后，女的刷锅洗碗喂猪，男的给骡马上水加料，折腾了大半夜，直到去外寨吃喜酒的老头人两口咳着嗽回来下马。

一大家人忙得象走马灯，小宁无所事事，谁的眼神瞅向他，他就冲那人露露齿点点头。老头人咳完嗽吐了痰，才发现坐在木凳上翻白眼的小宁，便招手示意叫小宁过去。躺在竹榻上的老头人抽完三坨鸦片烟，吐了一大口浓痰后问：“你府上是哪点的？”郎小宁听得云山雾罩，不明白“府上”二字何所指，一时楞在了那里。“你格听得清秀？我讲的汉人话，你格是汉人？”小宁总算摸到点门路，搞清了“府上”是地方，“清秀”是领悟明了的意思。小宁告诉老头人，他是到边疆来的学生，听说外面好就跑到缅甸来了。“你贵姓什么？叫什么大名？”小宁毕恭毕敬地垂手一一答来。老头人又问：“你祖上是那里的？”这下把小宁问哑巴了，老头人不屑地瞪了小宁一眼：“亏你还是个读书人，祖宗先人是哪姓氏的人都闹不明了弄不清秀，还跑来外面混什么场合！”老头人象突然想起似的问小宁：“昨晚掉江的是不是你们一伙？淹不死你这猫命，算你祖宗先人积德！”

郎小宁闹了个大红脸，耷拉着个脑袋，听着老头人的训斥，只能唯唯诺诺，头点得象鸡啄米似的。后来才知道，老寨主夫妇到小凸嘎寨吃喜酒，恰逢被缅军打散的四川知青姜古礼三人逃到小凸嘎，小凸嘎头人以为白捡了三个劳动力，不料姜古礼要求李头人先杀头牛给他们补补身子，说他们累虚了没力气干活。结果三个人放四头牛，李头人捡回了三只饭袋，那姜古礼还吹嘘姜太公是他的祖老爷。

刘钦蒙叫女工阿秀收拾厢房小楼，并告诉小宁陈仲立老师被抓到了，关在南坎监狱。心事重重的郎小宁上了厢房小楼，一开门，一股怪味刺鼻难耐，一张破藤席上弓身睡卧着一个人，用一根竹管和一只小瓶子做成的吸食鸦片的烟具，对着小菜油灯吹得烟雾缭绕。这人见小宁开门进来，翻着一只怪眼冲小宁咧嘴一笑，微弱的灯光下，只见一蓬乱发满脸污垢，一对发黄的大板牙，尖长的三角脸就象地狱中跑出来的活鬼。

“大哥，坐，坐，来一口”。小宁坐下后，那怪眼吹饱了洋烟，一边掏着烟罐一边同小宁拉起了家常，郎小宁得知他是老头人家的长工，南坎的摆夷，姓龚名本，叫岩龚本，岩是傣语大哥的意思。岩龚本说，他父母都是吹洋

烟吹死的，十三岁就成了孤儿，父母没给他留下半点家产，唯一留给他的，是一套吸食鸦片的烟具，他想念父母的时候，把帮工放牛得来的工钱买成鸦片膏，从此他就可以每晚和父母在一起了。

未到三十岁的岩龚本，长期吸食鸦片，人已经苍老得象五、六十岁的小老头。他说十七岁那年，缅甸政府大戒毒，他被警察抓进了监狱，不得吹鸦片，他咯血咯得死了过去，警察把他拖了出去，丢在缅寺和尚庙，他想，出家当和尚也好，无奈毒瘾发作如百蛆附骨，打熬不过，岩龚本上了南坎山，在崆兰老头人家做了长工。每日晚上老头人吹过的第二道烟屎，便成了岩龚本陪伴父母的迷魂药。

可能是他呆头傻脑，没有向老头人提出来杀头牛来滋补身子，或是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缘故，老头人收留了他。小宁想，自古勤为人喜，懒为人厌，只要脚勤手快多做事，冲每个人露个善意的笑脸就行。以后，郎小宁每天早饭后跟着工人上山挖地采茶，晚上回来陪老头人聊聊东南西北。

来到崆兰山寨一晃两个多月过去，寨里的人都知道老头人家里来了位昆明学生，小宁也学会了闲暇走门串户与寨里的老人拉拉家常，和同龄人交个朋友。人熟了，小宁常被寨里的年轻人取笑，他的不谙世事被当作新闻在寨子里传播。小宁碰到的话题千篇一律：“小宁哥，你有没有摸过姑娘的大奶子？有没有同姑娘睡过觉搞过好事？”小宁否定的回答惹来一阵哄然大笑：“可怜哟。好可怜哟，二十岁的汉子，连大姑娘的奶子都没有摸过，女人的‘好玩处’都没得干过”。还说他们十二、三岁就已经开张了，想不到天底下还有小宁这种丢人现世的男人，老天爷白白生条杵棒给你夹着。传得一寨子大姑娘小媳妇都知晓，议论着小宁是否被阉过。更可气的是有些小贼头偷看小宁小便，看看小宁有没有真家伙。

事情还不是那么简单，这些笑话传到了老善寨王道士的道观，王老道也找上门来了。王老道捻着几根鼠须，咬文嚼字似是而非的对朗小宁说了一些做道士的缘分，开口闭口老子曰，说小宁与道家有善缘，有慧根。佛家讲的是徒弟寻师父，道家讲的是师父选徒儿。王老道特别把“选”字诠释得含义广远，看来今天非把小宁弄成个牛鼻子小老道不可。

小宁洗耳恭听，听听这老家伙有多大道行。王老道唠唠叨叨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好善之心，学圣之理，德由善汇，教以德名。说来道去，却原来王老道收过个蠢徒弟，把王老道化得的香油钱偷了打酒喝，被老道逐出山门，没了人给老道烧水做饭，听说小宁是昆明落难的学生，来捡个现成徒弟，日后也好侍老奉终，有个批麻带孝的徒儿。

王道士费尽口舌，看小宁轱辘着眼珠，钳口不言，误以为小宁大彻大悟，看破红尘，已成正果。王老道饱食了一顿刘头人家的黄煎豆腐老咸菜，顺手满满拣了一肥料口袋洋芋，抬头看看日头，喝令小宁背起那袋洋芋跟他走。小宁问：去哪里？“跟我回去呀，这还用问？”小宁笑了，这一笑使王老道看穿了小宁的心思，可把王老道气歪

了，这时老头没有了“好善之心，学圣之理”破口大骂了起来：“你这×党教化出来的匪类，天堂有道你不走，害得老子白费精神来收你”。说完骂骂咧咧的走了，连洋芋也不要了。

王老道一走，把阿秀逗乐了。“小宁哥，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去做小道士呢”。小宁思量，才不会去做什么劳什子断子绝孙的道士呢。岩龚本咧着大嘴来凑热闹：“他又不给吹洋烟，给吹洋烟我倒是想去做道士爷哩”。老头人见王老道收徒不成，竟在他官宅大骂起来，也觉得有失“道风”，说：买牛买马也人家心甘情愿，哪有强人所难，智力又不是水浒中的蜈蚣岭。

王老道走了，又来了胡银匠。不知怎么，这些天来老头人家里可热闹了，晚上小宁采茶回来，钦蒙大嫂打趣地对我说：“郎小宁，你今年红鸾星动，我家可有喜酒喝了”。小宁听得一头雾水，心中迷惑，是不是哪家佛寺、大佛爷要找衣钵传人收小和尚了？胡银匠和老头人出了一夜的洋烟，不知嘀咕些什么，第二天问了小宁一些话，背上筒帕喜滋滋的回去了。今天老头人格外开恩，叫小宁换换衣服，不用下地了，下午有客人来。

来到崂兰两个多月了，这类来看热闹的见多了，见怪不怪，顺其自然，管他呢。采茶本来对小宁来说就是件磨性子的苦差事，老头人叫小宁不用上山，小宁落得清闲。中午时分，听得堂屋里叽叽呱呱，小宁躺在小楼上，神游太虚，叽叽呱呱的吵闹在小宁耳中象是群鸭子。只听见大嫂在吹法螺：“我们家小宁，人家是昆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呢，一表人才，斯文得如同没过门的大姑娘，前久差点被王道士骗去做小道士哩，就看你两姐妹哪个有缘分了”。

小宁被大嫂叫下楼来，只见堂屋桌上堆满大包小包的糖果食品，两个涂脂抹粉、浑身缀满银饰的妖精，圆睁杏眼上下打量着小宁，眼前的景象倒有点电影《萝蔓花》的味道。小宁笨拙地冲来人咧咧嘴表示礼貌，就坐在木凳上，心里在算计着这两个妖精身上挂了多少斤银子。这时候的小宁犹如唐三藏进了女儿国，一任这两个女子肆无忌惮地，象马贩子买马从头到脚评头论足。

胡银匠的这两位千金，稍高点的大概是姐；那个又矮又肥象只滚山猪的恐怕是妹子了。她说：“小宁哥，你爱在我们这里吗？如果你爱在我们这里，我爹会把你接到我家，把手艺传给你”。说完，冲着她姐姐咕咕的笑了起来。这下可好，上门招亲来了。小宁小道士做不成，又要当上小银匠了，这胖女子好象已经把小宁当成她的姐夫了。

大嫂也在旁边帮着说话，说胡银匠家在南坎山上，是数得上名的富有人家，如果小宁到胡银匠家上门入赘，改不改姓都成，只要小宁允诺，婚事的一切费用都由胡家操办，只要小宁的人就行。姐姐有点矜持，老把一身银饰弄得叮当响。小宁心里掂量着小银匠这个名词，想象着洞房花烛夜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他同这女子下了一大窝崽，男的女的都有，南坎山上的胡银匠渐渐变成了郎银匠，他的后代又变成了小银匠，他的女儿也穿着镰刀鞋、夷方衣，一头脸的银饰，成了《萝蔓花》电影里的浑身缀满银饰的五百两。

小宁正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幻想着另一个不属于小宁的小郎银匠，猛听得大嫂一声断喝：“你答不答应？人家

在等着你的回话呢”。这一喝令小宁惊了一头，忙问：“答应……答应什么？”两位胡千金已经等得不耐烦，摇得一身银饰阵阵发响，这下可把尽力撮合的大嫂气昏了：“小宁哟，你真是老木猪掉进粪坑有福不会享，胡家大小姐一枝花般的俏模样，哪点配不上你？”

胡大小姐气得泪花在眼眶里打转，胡二小姐气得一身肥肉乱颤。小宁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哀：牢狱、囚犯、苦力、小道士、小银匠和这两个珠光宝气的姑娘，就是命运的归宿？小宁此时想得太多了，小时候那些有着神秘色彩的加尔各答、新德里、好望角以及那位衣襟飘拂的老船长……。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小宁现在依然是逃犯，是缅甸政府随时可以捉捕的逃犯，等待小宁的，是监狱。

望着这位端庄多情的南坎姑娘楚楚可人的眼眸，小宁有些于心不忍，但又是那么无奈。家，他多么渴望有个温暖的家，相厮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姑娘在南坎大山中做郎银匠终老一生？小宁感到人生是那么无望。不，绝不能在这里停留下来，小宁得走，走得远远的，走到一个没人知道他是谁，一个陌生的海角去脱胎换骨。“阿妹，请你原谅我，承你错爱，我会把你的好心永铭于怀，你是我第一个碰上的好姑娘，你们不了解我，我是不能在这里住下来的，我得走，远远的走”。

胡家姑娘从小宁忧郁而又坚毅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天空那只孤独的纸鸢。那只天际断线的纸鸢。

送走了胡家姑娘，心中一阵空虚与茫然，老头人一家，都用奇异的眼神看着他，想看着一只不可理喻的怪物。一家人除了岩龚本，没人和小宁交谈。过了几天，胡家寨来了人，胡家姑娘没有放弃希望，给郎小宁带来了两套衣服、四百缅币和一条绣花手帕，说是过几天，还要来看小宁。

日落黄昏时，郎小宁经常一人孤寂地走到寨后山丘，站在几丘坐西面东的孤坟旁，呆呆的眺望：一览无遗的瑞丽坝子，南坎江象条银色的飘带，蜿蜒缓缓流过，弄岛公路奔驰的汽车不时传来喇叭声，阡陌纵横的田垄、田间小径、傣家人的小竹楼魂牵梦萦的南疆故园……。思乡泪就沿着脸颊滴滴滚落。小宁能回去吗？等待着小宁的是一片灰色的天空。不，小宁决不能回去，绝不能步父亲终老牢狱的后尘！就算暴尸荒野，也是一种不屈的悲壮。

荒草丛中，这几丘望乡孤坟墓碑上的字迹，有的已经模糊，隐隐字间还能辨认得出。

.....

杨汉仁 云南江东梁河人氏，生于民国××年，歿于民国××年。

杨李双果 江东梁河人氏，生于民国××年，歿于民国××年。

.....

丛冢已经荒没，孤坟望乡朝拜着故国的山山水水，他们的命运是否也和我一样，被迫离开眷恋的家园，终老异域。小宁心碎了，无声的咽泣，他多想回去呀，象那些有着阳光般的笑脸的人们，走进一所理想的学校府，去完成理想中的抱负……光荣的参军入党，小宁却不能，先天的黑色胎记，注定了小宁的命运。

都说路在脚下，小宁却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缅甸合法身份证、到处是缅军哨卡，郎小宁真的只能入赘胡家寨？象这几丘孤坟，百年之后，墓志上镌刻着一个知青的命运。小宁不敢再想下去了，不能等着胡家来迎亲，走到人间读他追寻的大学。

同年，刘钦蒙头人替郎小宁向当地政府取到一张缅语叫“妥抗撒”的临时身份证，拿到身份证明的那天，郎小宁只身一人悄然离开了南坎大山，踏上南行驿站的程途……。

（发表于曼谷〈世界日报〉）

以下是华知回帖：

读后感

素面

《崂兰山寨》读罢，惊心动魄。老实说，这样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讲太过陌生。它是如此艰涩，如此沉重，几乎使人不敢相信这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同时代的，却与自己所经所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生，但，这就是真实。

老三届知青们之所以让我敬佩，除了他们具备敏锐的思想，聪慧的头脑，骄人的业绩，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拥有比我丰富很多的生活经验，走过更为艰苦的人生历程。而这使他们更富内涵，更有责任感和对事物的把握性，他们也更自信，更具备在拼争的社会中居于优势争取成功的素质。

刘义的作品，详细、生动，使人仿佛身临其境。跟随着他的笔端，我登上了冒着枪林弹雨的竹筏，在激流中遥望祖国；我蹒跚在人迹罕至的南坎山中，忍受着饥饿和恐惧；我来到了与祖国一江之隔的崂兰山寨，在陌生、贫陋的异族人群中寂寞度日……生活的艰难尚可忍受，最难忍受还是那种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的精神折磨。而主人公终于不甘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踏上了追求之路。

这篇作品，书写了历史，再现了那时的知青们对命运的抗争。当年云南边境附近的知青们，因着政治形势和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很多人都曾出入边境，参加了血与火的战斗，他们如浴血凤凰般飞腾，在相对严酷的环境下，接受人生的艰苦磨练，脱胎换骨，从只有一腔报国热血的懵懂青年走向成熟。而他们中那些远去他国的人们，不管现在的境遇如何，再也摆脱不了的是沉甸甸的思乡情感。

与老三届知青们的接触，从他们那里汲取人生的营养，我获益匪浅。

谨此，遥祝在生活在异域的知青们安好！

深切悼念牺牲于缅甸的知青朋友..... [图] xpf 22:57:20 7/10/02 (30)

[德]珂罗惠支 志愿者

我们这一代知青啊！我们是唯一被上一代人克隆得最好的一代， 呼伦河 20:49:02 7/10/02 (606)

我们曾经是“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我们的信仰，也正是被塑造了我们的那支手击得粉碎。然后，我们就象蒲公英的种子那样，被一吹，吹到广阔天地间，吹到天涯海角，自生自灭。有多少人夭折在那如花的年华，而我们更多的人，穿过了命运的惊涛恶浪，走到了今天。如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伙伴，我们这些人，要永远以兄弟姐妹相称。

作者是刘义还是刘舟？可以网络转载吗？ skyheart 23:41:57 7/09/02 (无内容)

回复 hzp 23:01:03 7/10/02 (56)

关于作者请看楼上，能否转载待作者回话 sw 23:54:56 7/09/02 (无内容)

难忘的历史魂系着知青家族的成员们，尽管各自的命运不尽相同。 高粱米 23:15:57 7/09/02 (无内容)

深切怀念那些为命运所迫的当年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知青朋友们！ 老知青 21:26:09 7/09/02 (344)

这一篇来稿，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世界，我们为当年那些为命运所迫，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知青朋友们的苦难遭遇而流泪。

我们可以自私地庆幸我们自己，我们还能走到今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历史轮回，但悲剧决不能让它重演！我们每一位知青都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请转告刘义：能把那些墓地、纪念碑拍点照片回来吗？真想那些好兄弟啊 战友 18:25:41 7/09/02 (无内容)

和他相比，我们应该是幸运的！ 缺月 17:03:15 7/09/02 (127)

起码没有背井离乡，没有枪子从耳边扫过的恐惧，没有长途跋涉之劳顿，没有……

珍惜和平和温饱，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珍惜有网上。

说的对 老城 12:40:28 7/11/02 (无内容)

孙伟，作者还在继续写吗？请转告他，我们等着更多更真实的叙说。 胡发云 16:09:29 7/09/02 (无内容)

向生活,长眠在那里的知青哥儿们致敬! DDN 11:13:46 7/09/02 (50)

故事好象刚开始。 河水 08:34:12 7/09/02 (无内容)

经历了风和雨，对生活更向往…… 海宽 02:36:07 7/09/02 (485)

这是80年代初期天津歌唱家于淑珍唱的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一段时间，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是到内蒙牧区草原插队的北京知青。在蒙古包中生活了11年。父亲曾经坐牢10年，戴反革命帽子改造25年。为自己年轻时候的一次“抱不平”的冲动，他不仅自己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也让自己的子女们从小就生活在歧视、压抑和屈辱之中。但是，所有这些，都没能改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社会的向往。经历了风与雨，品尝了甜与苦，是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更执着、更坚定、更勇敢的追求。

相信，我们会有许多共同的感受。

真实再现和永远记住这段血泪写的历史 三叶虫 23:01:24 7/08/02 (无内容)

知青是个群体,让那些诅咒知青的人见鬼去吧! 天娇 22:59:37 7/08/02 (无内容)

将把这篇作品收藏进华夏知青网页。 号子 22:00:23 7/08/02 (无内容)

真实地再现 老地 21:50:40 7/08/02 (340)

刘义的纪实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知青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曾在瑞丽插队三年，峨兰山寨就与我所在的傣寨隔江不远处。文中所叙之事发生之时，我已经招工回城了，但我还在瑞丽时，就发生过一次缅甸政府军向中国移交抓到的知青的事。文中所指的对岸的军队，是缅共，缅政府军先将知青交给他们，然后由缅共再移交给中国。

希望能看到刘义的其它作品，孙伟，加油。

看了老地的。。。。 大石头 08:28:13 7/09/02 (18)

哎！边陲知青史。 知了 19:05:31 7/09/02 (无内容)

孙伟请他到华知网，还可以与号子们联系约个专题聊天节目哟。 知了 19:08:53 7/09/02 (20)

泰缅山区上网有困难，只能等他回国再说了 sw 23:57:32 7/09/02 (无内容)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知青生活是多彩的，不一定只有一种颜色…

有些事情，不是几句话能说清，以后有空再慢慢说。现在只能随便说几句。

几千万知青，肯定是生活经历各异。有的是自愿去的，有的是被迫去的，感受肯定不同。从城市到农村，有的从“贱民”变成了平民，有的从贵族变成了平民，感受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出现不同的声音应该是正常的。不必认定只有一种声音是真实的，其他声音是虚假的。

20年来我一直明显地感到，去内蒙牧区的知青与其他地区的知青确实存在差距。我想，可能原因不在知青，都是北京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原因可能在于牧民比其他地区的农民更单纯一些。牧区很大程度是原始社会形态。牧民没有什么阶级观念。牧民不会根据一个人的出身去评价一个人。

我是78年离队，是我们大队36个北京知青中倒数第二个，应算“最后离队”一批知青中的一个。

看看今天进城民工的处境并不比我们当年下乡知青好到哪去，看看今天多少贫困地区的穷人家女儿沦为妓女，对比我们作为知青时的精神状态（重义轻利）和今天社会上的普遍精神状态（唯利是图），我对“十年浩劫”的说法缺乏共鸣。

从报上看到，最近北京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保护北京人就业，限制外地人进入一些行业。部分知青是这些保护政策的受益人，北京政府也确实为保护这部分知青做了实事。我却感到有愧于当年曾接纳了我们的老乡。

我固然不想站在“知青白领”的立场，但也不想站在什么知青的立场。在底层生活了11年，挣了11年工分，我已经习惯于底层的视角，对于那些“吃商品粮者”关于失去某种生活待遇和教育机会的抱怨，我已经缺乏共鸣。

作为一个公民，我希望国家强盛，希望百姓富裕，并一直在为之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大声赞扬知青这一代人曾经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希望在经过20年拜金主义扫荡的中国人的精神废墟上，清理出哪怕一小片静土，播下几粒真情与高尚的种子。

今天。在华夏知青已经聚集了一批难得的人才。我希望这些人能够合力为社会、也为自己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一些看法的差距不应该影响做事。

记得某位名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你还在幼年的时候，书会象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有时带着你去遨游广袤的宇宙，有时带着你去探索色彩斑斓的地球，有时又把你带到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岁月，教你认识人世间的崇高美丽与卑鄙丑陋。当你逐渐成为朝气蓬勃的青年、成熟的中年，书象一位知心的朋友，无论你在人生、事业、爱情上成功与否，特别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它不会讽刺嘲笑你，而是默默的给予你支持和鼓励，帮助你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当你步入老年的时候，书又象一位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护士，抚慰着你在荆棘丛生的人生路上留下的伤痛，耐心地陪你做各种智力游戏，使你不至于过早的失去思维的能力。有书陪伴的人生应该是幸福的。

然而被称作“知青”的这一代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却由于荒唐的原因几乎失去了和书的交流。我受到的完整的教育只有小学六年和初中一年共七个年头，当升入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我们曾经尊敬的老师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知识也成了万恶之源，因此不用再读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在停课闹革命中渡过了中学的另外两个年头，就这样作为初中毕业生在一九六八年的深秋，和其他许多“毕业生”一起，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当年的“知识青年”中，象我这样既没有什么知识也不是青年的“知识青年”可能是不少的。尽管在那疯狂的革命年代，在广播、报纸和大字报上看到的几乎都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教，而人类对知识渴求的天性是不会泯灭的，特别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但负责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老师——贫下中农的知识比被再教育的我们还要贫乏，这样书就成了寻求知识而追寻的目标了。可是经过“破四旧”的洗劫之后，还能够找来读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

在广阔的天地里摸爬滚打了大约一年后，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才逐渐懂得了“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真正含义，不少人开始消沉。为打发枯燥乏味日子，除了喝酒打牌、偷鸡摸狗，读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每当有人从家里回来总能带一两本书，一般以小说居多，很快会在周围传阅，回想起来不少名著就是那个时候读过的。

在下乡后的第三个年头，由于家庭的原因我从辽南的丘陵转到了祖籍山东，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个小村子虽说是祖籍，我却是第一次到那里，离开了青年点，有些象和“组织”失去联系的感觉，而孤独寂寞更激起了求知的欲望。下乡的时候年龄小，这时候如继续去读高中的话岁数也是不大的，中小学校都开始复课了，但象我这样家庭有“问题”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又有哪所学校愿意“教育”呢？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高玉宝

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里，发出“我要读书”的呐喊时是怎样的心境了。家里原来的一些藏书早已流失殆尽，后来结识了几个喜欢读旧小说的朋友，《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读到的，当然也读了不少诸如《小五义》、《施公案》这样的旧小说。这样虽然也能暂时满足一时读书的欲望，但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欲望始终没有磨灭，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因此就想办法找些在校学生的教材来看，读后却发觉索然无味，那时的教材很混乱，自然科学方面只有“三机一泵”之类的知识，难道人类几千年的知识就是这些东西吗？

世界上的事存在着许多偶然与必然，有时真让人感觉很奇怪，满足我的读书欲望，使我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的竟是生产队里挂面房！作为一项副业生产，队里办了一个挂面房，加工出售挂面来增加一些收入。生产挂面的各道工序主要靠人工，就连轧挂面的机器也是靠人工转动的，这机器把和好的面轧成薄片、切成细丝，晾干后再切割成七、八寸长的挂面。最后一道工序是包装，把挂面用纸卷成一个小捆，边上用浆糊粘牢，每小捆半斤左右，村民们把这样的一小捆称为“一纸挂面”。包挂面的纸用的都是旧书，拆去书钉后每页书纸用来包一小捆正合适，既方便又实用。这些旧书是推着独轮车走乡串户卖挂面的人顺道收来的，也有从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买来的，里面什么书都有，竟然还有《毛泽东选集》呢！贫下中农是最讲究实际的，兜里揣着本小红书，需要学习时就翻开来念，要抽烟时就撕下半页来卷上烟叶有滋有味的抽。负责包挂面的是两个女孩，一次我从挂面房前边路过，听见里面有女孩子说笑，就走进去看个究竟，在参观挂面加工过程的同时也发现了包挂面使用的那一堆旧书。由于对书的偏爱，看到了这么多的书自然要翻一翻了。书是胡乱堆放着的，希望能够有所发现就要一本一本的找，小说故事是不会有，再破也不可能有人把它当废纸卖掉的。苍天不负有心人，在累得腰酸背痛的时候终于找到一本文革前的教材《平面几何》，虽然已经没皮没底破烂不堪，但主要内容还是可以读的，拿着这意外的收获兴高采烈的离开了挂面房，回家后仔细的把这书重新整理装订，还用牛皮纸给它弄了个封面，它就成了我的一本有价值的藏书了。

自从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以后，就开始把挂面房当成了我的图书馆，一有空就到那里去寻宝，经过不懈的努力工作，这堆旧书终于让我翻了个底朝天，又找到了几本残缺不全但仍有阅读价值的书。每当挂面房有新收来的旧书，我就要到那里去翻上一遍，开始几次挺顺利，也没有人说什么，但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因为这毕竟是集体的财产啊！读书的欲望还是压倒了这不安。一次我又来到挂面房，一边在旧书堆里翻着一边和包挂面的女孩子们说着闲话，队里的保管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这个保管是个“红管家”式的人物，不过只是对别人严格，而他自己却是“以队为家”的，就是队里有什么东西，他家里就肯定有。他看到我手里拿着的找好的几本书，问我拿了干什么，我说拿去看看，他说这是队里花钱买来的啊，我自知理亏也不好说别的，只是说我看完了拿回来就是了，好在他也没有强行让我放下。

就这样在这些废纸堆里找出了几十本当时无法买到的书，多数是文革前的初、高中教材，虽然残缺不全，也不配套，但是还是比那时候学校里的教材系统一些。另外还有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印特别深的是一本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物理学》，处理问题是用微积分的。后来书店里有一些文革前的书陆续出售，又买到了一套

《世界通史》和《高等数学》，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文理知识都有，也购买了其中的几种，如《无机化学》、《天文知识》、《社会发展史》等。评水浒批宋江的时候还买到了新版的《水浒全传》，当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想把以前读残缺本的一些遗憾补上。当然，这些都是进工厂做了翻砂工后有了收入才得以实现的。

由于有了这些书的陪伴，使我在乡下的生活不再寂寞和毫无生气了，也正是由于这些书的作用，使我这个只有初中一年级水平的人在一九七八年能考上大学。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有了自己的一些藏书，学校图书馆里的书想借就可以借来读，书店里书的价格虽显得贵了一些，但遇到喜欢的好书还是要把它买回来，即使没有时间读完它，放在书架上闲暇时随手翻一翻，心里总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愉悦的感觉。每当工作之余流览着自己的藏书时，总会想起我人生里程中的第一个图书馆——挂面房。

本贴于2005-10-13 21:23:07在乐趣园→海阔天空→华夏知青论坛发表.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转眼告别学生时代已30多年，曾经历了许多事情，有汗有泪，有乐有苦。但令我不能忘怀、刻骨铭心的事却是38年前参加的那次历时47天，历程2500里。从武汉到北京的徒步长征。这次初涉社会所经历的风雨让我受益终生。

一 出发宣誓

1966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使我们的前途发生重大的改变。那时盛行全国的串联有坐车的、坐船的、也有徒步的。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们选择了徒步。我读过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读过《星火燎原》，读过《欧阳海之歌》。崇敬那些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的先辈，渴望亲历社会，渴望体验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希望用社会的风雨开阔自己的视野，磨炼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当时最普遍的心愿。

那年10月27日上午6时，以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初三（七）班为主的10名同学背着背包，戴着臂章，打着红旗在我家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思想是纯洁的，表情是严肃的，誓词是发自内心的。“经风雨，见世面；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做意志坚强的青年。”出发不久天就下起了雨，阵阵秋风裹着凉意向我们袭来，衣服湿透了，道路泥泞了，迎着风雨我们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二 宣化店

宣化店位于大别山腹地，革命老区，是我们景仰已久的地方。尽管宣化店不在北上必经的铁道边，但按原定计划，我们决定进山前往。那里山青，绿色如染；那里水秀，清澈似镜；那里人好，热情如火。

离开武汉第6天的下午，我们进入了宣化店境界。徒步长征的第一周是最艰难的，每个人的腿都象抽筋一样的疼，脚上打满了血泡。涉水过河又使破开的血泡里灌满了沙子，挪一步就是一阵钻心的痛，背包显得格外的沉重。我们抬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艰难地向前迈进。队伍拉开了，有几个同学掉了队。

天渐渐黑了，周围的景致模糊起来，路越来越难走了，但离宣化店还有15里，按这样的速度走下去，恐怕要在深山里过夜了。正当大家焦急的时候，前方来了几位推着板车的小姑娘。原来打前站的尖兵到了宣化店的接待站向那里的老乡说明情况后，这几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姑娘立即动身迎下山来，望着滴着汗水的脸庞，带着笑意的眼睛，我们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情景和到了目的地后端上来的黄豆烧肉，用头发丝熟练地穿破脚上的血泡，教我们又

快又紧地打好背包的景象融合在一起，使我们想起了在电影里看到的老百姓支军支前的镜头。

在宣化店我们停留了两天，听老红军讲当年的故事，参观周总理的指挥部，和那里的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宣传，饱饱地感受着老区那种融融亲情，那些朴实无华的言行使人心灵净化，贴心暖肺的关心使人情感升华。

三 七里营

七里营位于河南中部，黄河北岸，因毛主席视察过而闻名全国。在到达七里营前，我们在河南路过的许多村庄，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缺水少粮。

缺水在河南南部较为普遍，许多地方没有池塘、没有井，河溪也很少，有的村庄用水要一个壮劳力用一个早工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挑。农户家用水常常是先洗菜，再洗其它东西，最后用来煮猪食。一滴都不舍得倒掉，因此尽管老乡知道我们是从城市来的学生，热情地要我们洗脸洗脚，我们却实在不忍心用。一连十天，我们只是在途中遇上小河、水井的时候，才痛快地清洗清洗。

粮食，特别是细粮在河南农村也是十分宝贵。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整个国民经济都在恢复中，城市的状况开始改善，农村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有一天，我们住进一户七口之家，为了让我们吃饱，这家的大娘为我们做了一顿黑面煮红薯，用一只手无法端起的海碗为每人盛了一碗。而这家整个冬天的口粮就只是方桌下堆着的几百斤红薯。临别时，我们留下双倍的饭钱——每人两毛钱，大娘发现后拿着钱一直追到村口。

到了七里营，眼睛感觉亮澈多了，人们见到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不仅地里庄稼长得旺盛，棉花有一人多高，棉桃很多、很大，显然是优良品种，而且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是十分振奋的。我们在毛主席视察过的棉田里和老乡一起采摘棉花，并留下6朵最大的棉桃做成一个棉朵。这个大棉朵我们一路上精心保管，一直把它带到了北京。

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生，我们无法想象什么是真正的富裕，怎样才能富裕起来。当时我们只是深深地希望河南其他地方也像七里营一样富裕，老乡也像七里营的老乡一样幸福。如果需要我们做出贡献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四 白家寨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地震。震后第二天，周总理就赶赴震中指挥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十分牵挂灾区，真想亲眼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11月26日，我们到了邢台，看过地震灾区的展览，深为那里的情况所感动，决定绕道300多里到白家寨。29日，我们踏进了白家寨。白家寨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地震发生后，庄稼遭受严重摧残，99%以上的房屋倒

塌，70%以上的人员死亡，几乎每家都有亲人遇难。我住的那家农户老人、孩子都不在了，只留下这对中年夫妇。但在白家寨我们没有看到眼泪，没有看到悲伤，看到的只是坚强和那种与天抗争的奋斗。

虽然时隔半年，这里仍余震不断，走在桥上能感觉到明显的摇晃。尽管新房已经盖起来了，晚上人们只能睡在新房边盖的只有一人高，一道炕那么大的土坯棚里。清晨起来，到处是白茫茫的霜冻，有的地方甚至挂起了冰挂，北方的冬天威严肃煞。往远处，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硬骨头连”、“铁姑娘排”的旗帜在寒风中猎猎飘扬，白家寨人在热火朝天地重建家园。在白家寨两三天，我们多次与同炕而眠的铁姑娘们相约一起劳动。但每天早上起来，她们早已不知去向，她们为了让我们好好休息，约定不告知劳动的地点。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找到她们，不仅是为了尽尽心意，是她们那种豪情，那份勇气燃烧了我们与天抗争的激情。就这样，像捉迷藏一样，我们找遍全村，找出很远的旷野，终于我们的汗水在冰天雪地中与她们流在了一起。

五 八九点钟的太阳

离开白家寨继续北行，12月的冬天刺骨的寒冷。10月离家时所带的一件毛衣，一床薄被已无法抵挡严酷的朔风了。晚上两人合盖两床被子。裹着毛衣睡，早上起来无衣可加，全身冻得僵硬。于是我们打上背包就来上一段急行军，两个小时走出30里路，全身暖和了再吃早餐，晚饭后再赶30里宿营，一连10多天日行100多里。

12月11日夜，我们到了距北京50多里的芦沟桥，住下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想到第二天就要进入北京，大家兴奋得睡不着觉，唱起毛主席语录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感到热血沸腾。有同学提议：我们要在早上八、九点钟进京完成长征。于是半夜三点钟，我们出发了，没有睡意，没有疲倦，只有笑容，只有歌声。终于在早上九点多钟，我们精神抖擞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城楼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再次庄严宣誓。

徒步长征的47天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但使我们长大了许多，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我懂得了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需要坚持，坚持就有希望；需要友爱，友爱就有力量；需要激情，有激情就有信心；需要拼搏，拼搏才能胜利。

回忆起来，我这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人的婚礼。

无论是在过去那“革命”的旧时光，还是在充分张扬个性的当今，喜庆是婚礼的主旋律。主人的盛情款待，客人的良好祝愿，新婚夫妇巡回敬酒等都成了婚礼的必须节目。由于内容的雷同，仪式的相似，参加过的这些婚礼大多也成了昨日黄花，烟消云散，逐渐退出我的记忆，唯有一次无意中参加的襄河上海知青噩梦般的婚礼却在我的脑海中的记忆依然如此清晰，难以磨灭！

那应该是七二年十月的事了吧？

那天我从场部回到四分场玩，同学们都去上班了，我有点无聊，便一人来到大队部看报。翻开一摞报纸，几封信滑落了出来。无意中一瞥，怎么还有挂号信呢？这些人也真是的，既然寄挂号信来，肯定是家中有要事，他们也不给人家及早送去，哎！这封厚厚的用牛皮纸作信封的挂号信上是从上海寄来的，收信人为上海知青赵水南。再细看这信封上盖的襄河收信时的邮戳居然是六天前的！我动了侧隐之心，坐不住了，起身往女生宿舍走去。

到了宿舍前，见一女生在晒被子，就上前想让此女把信转交。谁知说明来意后，那女竟生硬的告诉我：她不在我们这里住，信你送到×××家去，她现在住那里。×××他不是“二劳改”吗？赵怎么会住在他们家呢？我怀着重重疑惑，通过询问，找到了赵的住处。

走过杂乱不堪的小院，我叩响了外屋的门。

“进来啊”里面有人应答。

打开门，一股刺鼻的异样怪味直冲脑门，令人作呕！憋着呼吸，进入内室。嗨，室内有好几个人呢？其中的几位还是比较熟悉的上海知青。

“毛大夫，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赵水南奇怪地问道：“坐，坐。小李，烟呢？给毛大夫敬烟啊。”

我用眼光巡视着这赵的新居：肮、乱、差三个字即能简言之。一对用大红颜料新漆的箱子可能就是新房唯一的稍像样的摆设了。窗户上贴的二个歪歪扭扭的用红纸剪成的喜字告诉人们：今天是赵水南喜庆的日子。

蓦然，赵水南把才看过的信扔给了边上的同学，自己却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大声地哭了起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全都不知所措，倒底发生了什么事？看着赵因悲痛而不停上下抽搐的双肩，我几乎愣住了。

“不要哭，不要哭。纵然是天大的事，哭也不解决问题啊”我让人递上毛巾并劝说道。

在我的一再劝说下，赵边抽泣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来信中的内容。

原来赵的父亲为了能让女儿脱离襄河，利用上海职工内迁的有关可以带一在下放的知青子女同时入厂的政策，已主动报名去了四川内江的一个山沟的厂里，并用挂号信的形式寄来了赵水南的调动接受证明。

听完赵的叙述，刚才还是充满嘻笑的屋里顿时静的怕人，新婚的丈夫站在炕桌旁，拿着碗筷呆如木鸡；老公公端着装满菜肴的大盆子，不知怎样安慰新上门的儿媳才好。见此窘境，我对众人打个招呼，想溜之大吉，但被其他几位男女知青拽住，硬按在炕桌边不让走。

回忆到这里，我再也没了雅兴来描绘这婚宴的细节。沉闷，苦恼，泪水和不停地劝导充斥着这婚宴的全过程。

临走时，我趁人不备，在炕桌的一角悄悄地放了二十元，权当是我对一个上海女知青新婚的祝贺吧。

留言人：毛时法 时间：2005-8-14 12:56:57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坐在电脑前，燃起了香烟，看着这袅袅上升的青烟，不知怎么的，心中有种淡淡的惆怅……。哎，只能任凭思绪飞扬。襄河往事如用黑白胶卷拍成的影像，徐徐展现在我的眼前。

她，襄河某分场上海知青，高干子女（据说其生父时任国家**部部长），长得人高马大。文革初期，当北京红卫兵南下浪潮席卷浦江两岸，如火如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时人人自危。她积极支持、推行了谭立夫“红色血统论”在学校的肆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等等怪论纷纷出台。其自持根正苗红，有学校有恃无恐，把北京红卫兵的“红色恐怖”一套东搬运用到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罚跪、斗争、高帽、牛棚、肉体惩罚等法西斯手段风靡一时。其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谁知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其也卷到了襄河种马场。

其女虽然身到了襄河，但左的可爱的面貌依就不改。上身穿着也不知从何处翻箱倒柜寻来的大襟或对襟衣服，下身永远是条洗得发白的军裤，脚蹬解放鞋。办事、说话仍是造反派脾气不改，风风火火，咋咋呼呼。每次开会时总能听到其操着满嘴京腔在大声朗读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行动。”在其的言传身教下，一时间，其所在排的女生以不苟言笑，严肃、朴素著称于襄河农场；在夜晚，油灯下苦读毛泽东著作在此排蔚然成风（至于是否读进去什么，只有天知道！）

一天，场部来了辆俄制 д е р （音：捷尔）卡车替分场送面粉。谁知面粉卸完后，竟被该女所带的几位女将给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此事在襄河历史上可是件破天荒的事。消息传开，卡车四周顿时被看热闹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经打听，原来她们要求上九分场去参加革命工作。当时襄河开发了九分场，因才开发，条件相对艰苦，故暂时没安排知青上去。这本是农场领导对知青的关心，谁知此事不知怎么的被此女等获悉，她们强烈要求上九分场去，本来这也无可非议，但遭分场领导婉拒。头脑发热的左派人士竟动起这等主意来，强行拦车要求前往。

只见以该女为首的几位女将在汽车保险杠前一字排开，无论司机如何劝说，纹丝不动。她们一边边背诵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样子。分场领导孙俊洲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只能采取缓兵之计。百般劝说她们先到分场办公室里把这事情慢慢说清楚，然后与总场联系，尽可能满足大家的愿望。此女先是不从，后经其他领导一再劝说后，总算同意孙的意见，汽车才得以放行。此事给分场领导来了个下马威，从此分场人人皆知有个高干子女不好惹。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事慢慢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而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分场迅速传开：***招呼也不打，擅自离开了农场去当兵了！听到这消息，当时我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呢？当初她立志在农场干一辈子革命表态的铿锵之音还在襄河大地回响，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呜乎！倒底人家是高干子女啊，来去自由，谁能管得了呢？

留言人：毛时法 时间：2005-7-28 15:29:36 地址：安徽合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轰”的一声巨响，把梦中沉睡的我们全部惊醒。发生了什么事？南北炕上的几十个脑袋全部从被窝里抬起。

“赶快集合，赶快集合”伴着急促的哨声，有人在窗外喊叫着：“打仗了，打仗了！”

什么，打仗了？黑暗中我们都不知是怎么穿上的衣服。大家跑到宿舍前的空地上，一看连长，指导员一脸严肃地早已站在寒气逼人的夜色中。

大家按平时训练时的顺序排成了二列横队。

“同志们！苏修已开始向我国大肆进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上级领导指定的位置。”连长开始了简短的动员：“现在大家要听从我们的命令，全速前进。路上不得喧哗，抽烟。要紧紧跟上。明白了吗？”

“明白了”大家整齐有力地回答。

“出发！”随着连长的有力的大手一挥，队伍迅速朝笼罩在黑暗中的东山方向行进。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哪？是进山打游击吗？这些大家都不得而知，也没人问。队伍排成一路纵队，踩着积雪，沿着前不久才挖的战备战壕疾步前进。

尽管那夜没有月光，但被冰雪覆盖的大地泛着白光，仍可清楚地看到几十米远的地方。

队伍在静静地前进，无人说话，只有脚底下发出的沙沙声，间杂着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声，偶尔不知从那里飞向天空的红绿色信号弹，更加重了沉闷的战争气氛。

回想起几个月前告别父母，我虽然也曾流下过热泪，可是我并不后悔，好儿女就要志在四方，我们到东北来，就是用自己年青的生命屯垦戍边。毛主席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可是天天和黑土地打交道，丝毫没有任何临战的味道，多少使人有点失望！今天终于可以闻到战争的硝烟，心中是既紧张又兴奋。

“往后传，不要掉队”正当我正遐想万千时，口令迅速地从队伍前面传了过来。啊！真和电影里见到的急行军一样，定睛一看，队伍已接近东山了。冬日的夜真是寂静，无情的风吹打在脸上冰冷冰冷。我喘着粗气，一步也不拉地跟着往前一阵小跑。

队伍继续在迅速地移动，然而却没往东山深处去，却又折了回来围着分场周围在运动中。周围是白茫茫的一

片，脚下的积雪被我们反复的脚印踩的又硬又滑，不时有人摔倒在地，爬起来，又迅速赶上了队伍。此时的我心情已逐渐平静下来，不禁地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打仗就听到一声响呢？大家什么都不带，用什么和敌人干？

可能有这想法的人不是我一个吧？行军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队伍开始了一阵骚动，原本安静的队伍变得吵闹起来，原来队伍转到了大队部前。

“停止前进”连长大声命令：“原地稍息。今天大家的表现很好！战备拉练很成功！同志们辛苦了！”

乌拉！大家的欢声雷动，传得很远很远……

留言人：毛时法 时间：2005-8-13 13:34:0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沉默者的呼喊

——黑龙江省尾山农场七知青罹难30周年祭

今年3月13日，是我的七位知青战友罹难30周年的忌日。30年前，那一场因烧荒引起的大火在瞬间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让他们成为永久的沉默者。

尽管在他们身后曾有不少媒体对他们短暂的人生作过这样那样的描述与赞颂，并将他们的死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选择，但那只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他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所作的想象与升华。而作为永久的失语者，他们的真实存在和生命欲求则被历史遮蔽了。

隔着30年的岁月风尘回望历史，那惨烈的情景依然如在眼前……………

1976年3月13日，一个阴风呼号，春寒料峭的日子，那天，我正在农场宣传科上班。近午时分，忽然听说紧靠五大连池边的六队着了火，已有几名知青被烧死。因为电话线被大风刮断，消息无法传递，一位哈尔滨女知青跑着到场部通报了噩耗。

闻知这一消息，场部机关的所有人员都惊呆了。农场领导马上组织人力去六队救火。出发前，我捋下手表交给了留守的广播员，其情其景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随乘坐的卡车赶到了六队，其时，大火早已随风势卷到了别处，地里只留下一片黑乎乎的焦炭。

据六队的领导介绍，这场大火是由相邻的格球山农场烧荒引起的。因为风越来越大，火随风势朝我们尾山农场六队迅速蔓延。因为怕粮食、种子等国家和集体财产受损，六队领导立即组织了知青救火。想不到火势越来越大，火不但没有被扑灭，相反还有七名知青在大火中丧生。

那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能见到这七位知青的遗体。六队的知青告诉我们，这几位知青实际上不是被烧死的，而是窒息而死。因为风速快，火从身上一燎而过，那几位知青身上只是衣服被烧掉了，皮肤上并没有太多的伤，肤色还是嫩红的。

七位知青的遗体很快被送到了场部卫生院。农场领导命人打了七口棺材安放他们的遗体。七口黑色的棺材在场

部卫生院的门口一溜排开，静静地等待亲人们来作最后的告别。那段时间，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场部，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毕竟这七位知青是为救火而牺牲的，农场党委要求我们宣传科迅速整理出他们的事迹材料，向全场广大干部、职工和知青广泛宣传。

采访中，我们发现，这七位罹难者多为普通知青，既非党员，也少团员。有五名上海知青，两名哈尔滨知青。死者中有六位女性，一位男性，其中还有一对姐妹。

对于遇难的同伴，六对的知青都表示了由衷的悲哀和痛惜，同时也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内心的困惑和不满：

当火势太大，人力完全不能扑灭时，为什么不赶快撤离火场，以保全全体知青的生命？即使一定要付出牺牲的代价，为什么党员、干部不去赴汤蹈火，而让普通的知青去死、特别是让柔弱的女性首当其冲？最重要的是，在救火之前，有关领导为什么不向知青传授逃生的要领？

这些民间话语，在当时不可能被官方所接受，我们也无法写进表彰这七位知青的文章中。但它们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成为我今天写这篇悼念文章的最初动机。我想，这七位战友虽然早已被剥夺了生存权和话语权，但他们最想说而来不及说的，也许正是这些话。作为他们的战友和当时事件的亲历者，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被埋藏了30年的心中的话语。

事件发生后，农场上下对此事的性质都心知肚明。这显然是一起因指挥不力造成的重大人身伤亡事故，这七位知青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些日子，农场与六队两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心情可想而知。

谁曾想，一个偶然的机缘，居然使这件事化险为夷，柳暗花明。而其间的穿针引线者，正是我当时所在的宣传科，具体执行者则是本人。

那年四、五月间，我因母亲有病回上海探亲。回家之前，宣传科长听取了上海慰问团驻尾山农场分团一位女同志的建议，让我写一份介绍七知青事迹的材料，到上海交到解放日报社。

回上海后，我遵嘱将材料送到了解放日报社。之后，因忙于照顾母亲，也未去过问。一个月后，我探亲假满，便回到了农场。

我万万没想到，在我回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农场因为“3.13”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原来，我写的那份材料发在了解放日报内参上，被当时主抓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看到并作了批示：“英雄的战斗，火红的青春。”从中央到省的各大媒体闻讯纷纷来到这个地处黑龙江省北部的农场，采访这七位知青的英雄事迹。

姚文元的批示和众多媒体的大力宣传，使农场有关领导如释重负。因为一起重大事故借此得以转变性质，成为一个集体的英雄壮举，他们也由事故的直接或间接责任人变成了把普通知青培养成英雄战士的再教育者和人生导师。

从此，这个名不见经传、几乎年年亏损，被知青贬为穷山恶水的尾山农场，因为出了这七位英雄而成了一个“培养英雄的摇篮”。

1976年国庆，尾山农场的一位副场长和六队党总支书记应有关方面的邀请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瞻仰了毛主席遗容。这在当时，是一种最高的荣誉和待遇。

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实在有些荒诞，但在当时，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

我之所以要在30年后的今天重提此事，不是为了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毕竟那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但那毕竟是七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啊！最小的才19岁，最大的也不过28岁，正是花一样的年华。他们有享受青春、爱情和幸福的权利，有生存的权利。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了。与鲁迅先生当年写《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心情相似，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让天下所有人都来珍爱生命，不仅珍爱自己的生命，也要珍爱他人的生命。

这七位知青被葬在了五大连池边，他们的魂永远留在了北大荒的土地上。他们牺牲不久，大批知青就开始陆续返城，只留下七座孤零零的坟茔遥望故土。

岁月如流，转眼30年过去了。30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却是相当漫长的一个时段。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今天，30年，足以让人们淡忘过往的一切。可是，那七位知青战友却一直在我的心中存活。年仅十九岁的哈尔滨女孩杨淑云那稚气未脱的面容，上海姑娘檀文芳娇美的笑靥，还有朱慧丽、朱慧娟这对双双葬身火海的姐妹之间的手足深情……都让我难以忘怀。

但愿这篇不成祭文的祭文能告慰这七位战友，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我想对他们说，曾经与你们同甘共患难的尾山知青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你们的死不仅让我们学会了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也唤起了我们对只有一次的生命的珍惜。30年来，因了你们惨烈的牺牲与付出，我们对生命的价值有了全新的理解，从而活得更加脚踏实地。我们已不再会为虚妄的理想和廉价的激情作出无谓的牺牲。

我还想对他们说，请原谅我没有称你们为“英雄”，而用了“罹难者”这一名称：我并没有将你们的死上升到当年的高度，倒不是因为姚文元倒台，我们就一笔抹杀了你们的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我只想去掉加在你们头上的英雄光环，将你们还原为普通人，并以普通人的情怀去猜度你们的内心情感和欲求。我想，如果有来生，你们一定不会对自己的生命作如此轻率的处置。你们将从自己的价值理念出发，作出最适合自己这一独特个体的独特选择，

并独自承担由这一自主的选择带来的种种或利或弊的结果。因为生命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有权对自己的生命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必再像当年那样，在一元化的价值理念统摄下，除了死亡，别无选择。

春节期间，我与原尾山农场六队的一位老友通了电话，她告诉我，今年夏天准备与战友回农场为七位知青扫墓，以表达内心最深切的怀念。

我相信，曾经在尾山农场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场火灾和在这场火灾中丧生的七位知青。而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七位知青的鲜血和生命已融入我们的成长过程，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永生的。

本贴于2006-02-12 15:28:09在乐趣园→海阔天空→华夏知青论坛发表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长征故事(1) —— 从阻挡串联说起

红卫兵长征，正规的叫法是“步行串联”，是为了避免铁路的压力太大，中央在66年11月底发出号召，还有一篇文章《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所以大家都叫长征了，也都成了“长征干部”。我经历的长征很短，都没有走出省，清平还走到了北京，比我强。

说起串联，我还有过一段阻止串联的经历。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很多学生开始往北京跑，顿时火车站挤满了人，学生们不买车票就冲上火车，秩序大乱。铁路和市委求助于红卫兵，我们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商量了以后觉得人都跑光了学校的文革没法搞，就决定阻止北上串联的行为。我们在火车站摆了三道防线，站外一道，检票口一道，站台上一道，看到学生模样的就拦下来。我是在站台上的，是最后一道防线。有学生冲上站台的就叫他们回去，有些硬冲的就拉下来，再不听的就拿皮带抽。我那时个子小，只有一米五，不象现在大胖子，我拿了个手提扩音器，声嘶力竭地一遍遍喊着“革命的同学，我们应该留在学校里，把文化大革命搞完了，大家一起上北京去见毛主席！”这么弄了十来天，终于抵挡不住革命的潮流，831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我们自己也赶快溜上车，跑出去串联了。出去后先到了长沙，住在虫二楚天他们的长沙一中，晃荡了十几天。他们的饭真难吃，没什么肉，就是辣椒，辣死了，每顿饭都是受罪。跟着我们又到了武汉，一伙人参加冲击湖北省委，批斗张体学，最后湖北省委收买我们，给我们的人每人送了一本精装版袖珍毛主席语录，大家撤兵。武汉的伙食很好，有热干面、豆皮、鸡汤等等，当时算是很好吃的东西了，比起湖南真是天堂。到了九月下旬，学校来电报说十一有接见，要我们赶快上北京。我们在九月二十五到了北京，听说有名额上天安门，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决定比谁的爸爸官大资格老，终于选出了几个上天安门的代表。

十一那天国庆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闹腾了大半天，我们都累得半死，不少人挤去邮电局打电报给家里，说是见到了毛主席，我就没有这个兴趣，跑到西单去玩了。十一那天晚上，毛主席准备到群众中来，再搞一次轰动，谁知出了个大麻烦，这个麻烦讲起来也是惊心动魄，结果毛主席把我们红卫兵晾在一边了。所以66年国庆的晚上，毛主席没有什么镜头出现。

过了国庆，又晃荡了几天，我们就回家了。火车上二天二夜的那个挤，真是可怕。最重要的就是占领厕所，否则一路受罪，男孩子还好点，拿个茶缸就可以尿尿，女孩子就倒霉了。回到广州，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只好从火车站走回家。

第二天回到学校，发现我们成了批判对象。因为我们是搞血统论的，和北京老兵（后来组织联动），长沙红保军，武汉三字兵，西安红色恐怖，沈阳红后代是一样的组织，被陈伯达点了名的。一时间学校里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们灰头土脸。但是我们真的回到学校还是有不少同学害怕我们，于是派出代表和我们谈判，要我们离开学校。我们自己也觉得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出路何在呢？在校外游荡了一些时间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文章，我们就商量要走出去。去哪里呢？找了好多地方，都不能统一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到四十二军的潼湖农场去，我们有个同学他父亲的部下在那里当师长，他同意接纳我们。

风声鹤唳中，我们竖起一杆“长征队”的大旗，告别了正在批判我们的学校，踏上了征途。（很有点当年红军逃离根据地的味道呢）

长征故事(2) —— 三件宝和再见小鸭子

长征队一共有五十三个人，除了我们本校的还有外校的四个。为了长征，我们做了很多准备，还向真正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和老军人们请教过各种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地图和行军路线，制定了行军时间表，棉被衣服水壶饭碗等等必不可少，武器每个男生一件，我带的是一把三角刮刀。为了对付疾病，我们准备了很多药品，配备了二名女卫生员，是初三的桂英和文慧，在我们长征的路上，她们是非常有用，最受欢迎的人，在长征路上，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伤病了。我还带了三件宝贝，是一般同学们少有的：小军用蚊帐，一幅绑腿，二双和尚袜。那个蚊帐只有一人宽，一米八长，很轻巧；绑腿是土黄色的；和尚袜的底子是双层纳线的，很结实，袜筒是粗布的，比较长，绑扎后不易进沙尘。这些都是母亲给我的，是她在部队时用过的。母亲说和尚袜边上抹点肥皂，长途行军脚不易起泡，我日后果然没有起泡。走前母亲还教了我怎么打绑腿，教了几种方法，我只学会了一字法和鱼鳞法。其实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行军速度不太快，每天走的距离不太远，打绑腿没有什么用处，不打腿也不会肿。我还带了一个神秘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做的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12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们出发了。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大部分人都回到学校，住在了教室里，第二天天未亮，我们就悄悄集合完毕，悄无声息的开拔，给当时的气氛平添了几分诡秘色彩。我们这一大群在全校师生关注中心的人突然消失，使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顿时失去了靶子，引起了种种猜测。人们都认为我们肯定是北上，甚至有人提议去拦截我们，却没有人想到我们是向东再向南，一直朝着边境线走去，如果这个行踪暴露，绝对是一场大轰动。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在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走出了五公里多，天也亮了。第一天领队的是张果老（外号），他叫大家休息吃东西。吃完后我们然后继续走路，这时离开学校远了，人也轻松多了，我们如潜龙入海，意气风发起来，一路上不断地唱起歌来。有人提议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作为我们的队歌，我和几个队员不是很同意，就唱起“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把最后一句“再见吧小鸭子我去上学了”改成“再见吧小

鸭子我去长征了”，后来唱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实际上的队歌了。

第一天的路程不是很远，大概就是二十多公里。但是我们的队伍里也出现了走不动和掉队的人，我被安排在收容组，陪着那些一瘸一拐的同学慢慢走，跑前跑后的，无形中我每天多走几里地。那时我们组织比较严密，有队委会，尖兵组，收容组，后勤组，卫生员，鼓动员等等。整天都走得很慢，下午时分大多数人就走不动了。我们只好找了一间学校宿营。后勤组的人打好热水给大家洗脚，这时才发现有一半多的人脚上打了泡，有大有小，洗脚的时候咿呀鬼叫。两个卫生员忙不迭的跑来跑去，她们用针灸用的针在那些人脚上的泡泡小心的刺个孔，再用头发穿进去，让泡里的水流出来，她们把那些男孩子的脚鸭子抱在怀里没有任何忌讳。我的脚没有起泡，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脚上起泡的男孩子们享受她们的温柔。不过，第二天我的运气就来了。。。

长征故事(3) —— 小算盘，三光行动，鱼石软膏，她的发香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第一天的疲劳使得我们在第二天晚起了许多，吃完早饭，出发时已经是八点半了。好在昨晚两个卫生员的辛劳，除了个别人，绝大部分脚打泡的队员已经消了泡，恢复了体力。这天的任务不轻，第一天我们只走到了黄埔，今天的目标是中堂镇，行程四十多公里。这对于没有经过多少锻炼的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平均速度只能达到四公里左右，全程就要走十个多小时了。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齐步走！”在这重复过几十上百次的口令声中，我们排着整齐的两路纵队，男生在前女生在后，齐步出发了。我们走进了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心情比前一天更好了，已经收割完晚稻的田里，新播的紫云英长出嫩叶，田基上的一排排香蕉树幌动着大扇子一样的蕉叶，在北国寒古隆冬的时候，岭南依旧是翠绿一片。因为我们几乎穿着清一色的黄军装，加上步伐整齐，农民们都以为我们是解放军，年轻姑娘们和我们相遇时用斗笠掩面而过，小伙子们则大喊“大军同志，唱支歌来听！”于是，我们用歌声回答他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

走过长途路的都会知道，排着整齐队形走路是很闷的。走着走着，随着各人速度快慢，队伍就走乱了，最后走成了一堆一堆的散兵游勇，平时要好的朋友们自然走在了一起，讲起各种奇闻轶事，也互相逗趣取闹。有个同学平时比较抠门，口袋里经常装着各种零食，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往嘴里塞，如果别人发现了管他要时，他总是说“这是最后一个了，这是最后一个了”，大家都叫他小算盘。这天路上高三的老头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当讲到刘备三请诸葛亮，诸葛亮对刘备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小算盘突然插嘴“人和不如，啊，啊，啊，人民币！”一伙人哄堂大笑，算盘这个名字叫得更加响亮了。现在他是房产商了，真正的算盘，也许那时的精明奠定了今天的基础。

在行进途中，我们搞了一次强行军，为的是试验究竟能走多快，一小时下来，累得半死，走了六公里，整个队

伍拉的有一公里多长。强行军后走路的速度会猛然下降，得不偿失。后来我们的行程都是以平均速度四公里来安排的了，就轻松一些，可以长时间坚持。

行军到底是个苦差事，六七点钟时天色暗了下来。今日灯火通明的珠江三角洲那时却是漆黑一片，天黑了，心情没有那么好了，脚步也沉重起来，偶尔有汽车驰过，我们赶紧侧身，躲避被卷起的滚滚沙尘。好不容易在晚上九点左右，我们终于走到了中堂对面的河边，尖兵组的人因为没有找到渡船，急得到处乱转。在磨蹭了半个多小时后，找到一条小船，分几次把我们渡过了河。过河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我们又饿又渴，都很土匪了，我们冲进公社食堂，把炊事员从被窝里拉起来给弄吃的。我们先是把水缸里的水喝了个精光，炊事员找来一萝筐白天吃剩下的米饭，因为没有菜，拿了一桶酱油给我们。我们每人分了一小碗饭，再把酱油全部倒出来，浇在饭上，开始狼吞虎咽，都只是吃了个半饱。那晚，公社食堂被我们扫荡得水光饭光酱油光，我们称之为“三光行动”。中堂酱油的香味在我的鼻子里存在了很久很久，以至于90年代初我在东莞开办一间服装厂时，还专程跑到中堂去“食过返寻味”，结果是大失所望。

饭后，我们到公社小学里安顿下来，在等待后勤组的人到食堂烧洗脚水的时候，我听到文慧叫我，我过去了。她一边打开药箱，一边问我：“你的手怎么样了？”

“我的左手手腕上在出发的前几天长了个疖子，红红的有些痛，当时我问过她要不要紧，她看过后叫我到卫生所敷上鱼石软膏，说过两天疖子就会穿了，脓流出来就好了。她坐在凳子上，叫我把手伸出来给她看，说着就来拉我的左手，我本能地把手一缩，她“嘿”了一声，又来抓住我的手用力一拉，我这回没有缩，她用的力大了，我握着拳头的左手一下就捅在了她鼓鼓囊囊的胸脯上。文慧抬头看着我，眼里露出凶光，我也很迷惑地看着她。过了一会，也许她发现我确实没有什么邪念，就开始缓和了。文慧拆掉我手上的棉垫，她的左手握住我的左手，右手用棉签蘸着消毒水把我手上的鱼石软膏清洗掉，这时她离得我很近，她的头就靠在我的头下面，一阵女孩子的发香飘进我的鼻子里，加上我的手被她那细嫩的手捏着，真是有点昏昏然。那时的我对于男女之情还在很朦胧的阶段，身体没有发育，还没有一种主动去接近女孩子的冲动，梦里“尿”湿裤子也是一年以后的事情，然而这种接触还是让我很兴奋的。我低下头看她，觉得她长得挺好看，她不多，脸的模子很端正，特别是她的一弯柳眉，刚才发怒的时候倒剪起来，现在平卧着，很是动人。正着迷时，手上一阵疼痛，原来文慧挑开了我疖子的脓头，把脓挤出来，一直到挤了不少血出，她才住手。她在清洗了我的伤口后，拿出一支四环素眼药膏，抹到我的手心，再包上棉垫，贴好胶布。我有点怀疑的问她“怎么用眼药膏？”文慧瞪了我一眼：

“眼睛都能用，手还能用？你不知好歹啊。”

那天晚上很久都睡不着，由于这件事的启蒙作用，我开始观察哪个女孩子长得怎么样，其实观察的结果是，年轻的女孩子都长得不错。。。

起床哨响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睁开眼睛，昨夜一夜没睡好，脑子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会是文慧的眼睛和眉毛，一会是她的手握着我的手，一会是我的手碰到了她的胸脯，走马灯似的来回转，醒来有些头痛。洗脸时见到文慧，我好象感到心里有鬼，赶快避开。

吃早饭了。炊事员因为觉得昨天晚上有些对不起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去运了百来斤河粉回来，炒了二大锅炒河粉，还放了很多空心菜，绿油油香喷喷的，我们早已饥肠咕咕，每人都吃了两三碗，直到吃不动为止。交饭钱时，炊事员还说我们交多了，只收了每人一角五分钱。珠三角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吃饱喝足，我们站好队，排头的旗手征民哗啦一声挥开了队旗，在当日队长马骝的带领下我们出发了。初升的太阳刺得我还未醒透的眼睛有点睁不开，队伍走得很快，中午时分，我们就走出二十来公里，进入了东莞县的县城——莞城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它简直就是一个缩版的广州，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任何一个镇，其繁华程度都是北方的县城无法相比的。一条条青石铺砌的街巷，一排排的小卖铺和商店，摆卖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商品，令我们看得眼花，虽然我们是在广州生活，却也是都在住的附近活动，很少到繁华的地方去。摸摸口袋里的钱，我真想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

先到的尖兵组的人把我们引到莞城大饭店，这里的人对红卫兵热情有加，特意腾空饭店的第二层楼面，专门接待我们，并且按照饭店的方式点菜上菜，顿时我们大有奢侈的感觉。这顿饭有四菜一汤，油水特别足，吃的我们满嘴油光，长征路上有如此佳肴享受，实在大出意外。收钱的时候，价格并不贵，每人三角钱。在吃完饭后，我和几个人提出游玩一下东莞县城，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说我们是出来革命的，不是游玩的，队委会里也是意见不一致，我们开始争吵起来。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卫生员桂英跑过来对着队委会的几个人喊道：“不好了，古丽和艾丽病倒了！”

古丽和艾丽是一对新疆的维族姐妹，民族学校学生，不知是谁的关系，她们号上了我们的队伍一起出来长征。她们二人是伊斯兰信徒，完全不吃猪肉的，连猪油的味道也受不了。前两天她们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或者干吃点米饭，今天有个大饭店，队委会就想为她们改善伙食，叫饭店炒几个鸡蛋，煮一个菜汤给她们，还特别嘱咐饭店不要放猪油。可是，饭店师傅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洗菜锅。那时饭店炒菜多用猪油，虽然是用花生油炒的鸡蛋给她们吃，但是里面还是有猪油味道，她们吃下去以后就出毛病了，古丽和艾丽不断的呕吐，身上还起了过敏的红疙瘩。我们有些回族的同学，偶尔吃点猪肉，也不见得有什么事，像古丽和艾丽这么严重的反应，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吓得够呛，赶快把她们抬到附近的东莞机电厂医务室，洗胃、打盐水吊针，桂英和文慧也给医生打下手帮忙。闹腾了一阵子，她们总算缓解过来，但是我们这天是走不了了。下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到莞城逛街，大家有买用品的，有买零食的，我偷偷的买了一个扣肉罐头。

晚上，队委会为了活跃一下今天的紧张气氛，加上大家也休息了半天，晚上也不累，就决定开个联欢晚会，节目由个人自报自演。晚饭后，在工厂的礼堂里，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圈，开始表演节目。自从大串联开始，我们这群人就没有这么齐整的聚在一起了，晚会显得格外热闹，引得工厂的工人们也都一圈圈的围了上来。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在马骝高亢的朗诵声中，晚会开始了。第二个节目是曙光那段非常受欢迎的快板：“有个美国军官A B C，外号叫做土豆皮，，，只听叭的一声响，他倒地来了个嘴啃泥。”接下来的三句半《越南人民打得好》、对口词《批判教育黑线》，都很不错，解放和支前一对双胞胎兄妹的对唱“兄妹开荒”，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把晚会推到高潮的是谢中华的“旗舞”，给他用二胡伴奏的是诚力。他们都不是我们学校的，中华是一个中学的宣传队长，诚力是艺术学院民乐系的学生。在二胡拉出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乐声中，中华高举一面红旗出场，走场、舞旗、金鸡独立、亮相，接着在诚力有意加快的伴奏催促下，他不断的滑步、劈叉，几个不停的旋转，把红旗舞成了一团火，最后连串的空翻，红旗在他的身下漂过，当他戛然停止，举旗做出造型时，我们喝彩声叫成一片，一直盯着中华舞步的小凤不停的拍着巴掌，直到大家停了她还在拍。中华在前面挥着旗打拍子，我们一齐唱起了“红旗红旗革命的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你”，顿时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厮杀拚搏的战场。在这一阵狂热的高潮过后，似一汪清水从帕米尔高原流下，给我们发烫的胸膛注入了清凉的温情，两个身穿浅绿色长裙，头戴小圆帽的姑娘，轻盈的飘进了舞场。古丽和艾丽，经过下午的休息，喝了文慧给她们做的鱼粥，已经恢复了过来，能歌善舞的新疆姑娘是不肯放过这个晚会的。古丽和艾丽顺着观众圈子，边唱边舞边走，在舞到男生面前时，总要用火热的眼光进行挑逗，脸皮薄的男生赶快转过脸去，脸皮厚的就大声嘘叫。在她们舞到场地中央的时候，又有一个盛装的姑娘冲进了舞圈，古丽和艾丽围着她转了起来。这是个高挑个的漂亮姑娘，文革前从舞蹈学校转学来我们学校的，她的舞技不在两个维族女孩之下。三个人边唱边舞，唱的什么我们基本听不清楚，只听到反复的一句“美丽的姑娘玛丽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女同学叫做玛丽莎了。当她舞到我们面前时，她的眼光射向我身边的北战，完全像维族女性那样的进行挑逗，北战嘴里嘟嘟囔囔的说“这么恶心”，眼睛却没有离开过玛丽莎。最后，“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晚风中传播着牧人的笑语，马头琴声四处飘荡”的歌声响起，这是北战的压轴独唱“不忘阶级苦紧握手中枪”，歌喉并不是很好的他，非常投入的把一曲草原悲歌演绎得催人泪下。当他唱到“复仇的决心催动着骏马，奔向那红旗飘扬的远方”时，我发现玛丽莎的眼里闪着泪光。

晚会散了，我们三三两两的走向住地，我走着走着，突然被人狠狠拍了一下肩膀，队长马骝把我拉到一边，沉着脸低声问我：“你今天下午买了什么？！”我不禁暗暗叫苦：惨了，我的扣肉罐头！

编者按：曾经插队在湖北恩施利川的武汉知青，现在谈起当年在山区农村生活仍然感慨万千，特别是在山区的打柴，更是记忆犹新。

黄：在我一年半的插队生活里最快乐和最辛苦的事都是上山打柴。打柴上山时就象旅游一样，一路打着空手看风光无限的层峦叠嶂，听山林中清脆悦耳的小鸟唱歌，那晶莹透明的晨露，那习习的山风惬意地从身边吹过，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可下山时就不一样了，沉甸甸的柴就象无数个小虫子撕嚼着肩膀，脚下滚动的碎石吓得人胆战心惊，去时那“心旷神怡”早就荡涤无存，只有步履艰难的一步一步的煎熬了。可是到了又一个休息日，我们仍然又欢天喜地去打柴。

刘：人一辈子会淡忘很多事，但利川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想当年刚到利川时的我们，真是不知愁的滋味。只要有空闲，我们小队的知青会全体出动，背着手风琴到小山坡上，对着清彻的清江水，拉着悠扬的曲子，我们则边摘野菜边引吭高歌，引来好多生产队的农民看稀奇。随着时间的流逝，柴米油盐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上山砍柴占注了我们大多的休息时间。记得有一次，天不亮我们四人就出发，留下一个同学为我们做饭。去的时候高高兴兴，一路欣赏沿途美景。辛劳了大半天，扛着大捆的木柴下山来。可天有不测风云，突然之间大雨滂沱，泥泞的山间小道让我们胆颤心惊，而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又累又饿的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只好将我们的劳动成果沿途播撒，最后每人只扛了一个“A”字架回家，而此时已是能够看见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

龙：说到打柴，开始我们还真的是搞不懂；山区到处是山，到处是柴，为什么还要到几十里路的地方去打什么鸟柴真是稀奇了。我们可不相信呢，我们爬到齐跃山的那一边的山上去砍别个公社的树，哪里知道才轻轻地砍了一刀，嘿，满山都叫起来了“咚咚咚~~~~”满山都叫起来了，那回音啊，真是大得吓死人的，我不甘心，快速地砍了几棵小树，也顾不得满山的咚咚声，拖起就出了山林往回跑，不一会儿就有个声音传过来了：“是哪个龟儿子啊？！”在路口，一个包着白色头巾的中年男子迎面走过来，对我们说到：“哦，原来是大学生啊！”我们见他这么说，反到是很不好意思起来，我说：“么样啊？”他说：“这里的树还小，这里封山呢，不能够砍树子的。”“我们不晓得呢。”他说：“要是别个，那就要罚工分，既然是你们大学生，那就算了，不过把砍的树留下来。”原来想他要是抖狠那我们也处理好些，拷他几巴掌算了，见他这样说，我们反而很不好意思了，我们撒了一根“城乡”牌的香烟给他，对他说：“树也砍了，我们下不为例了嘛，还是让我们拿回去吧。你以后赶场路过我

们门前，到我们那里坐坐、抽根烟几好。”闲扯中，我们了解到他是这个队里的队长，他见我们没有和他要狠（他原本认为我们要和他抖狠的），再加上他原本就对我们这些“大城市里的大学生”的敬畏感，在他接下我们撒给他的并给他用气体打火机点燃的第三支八分钱一盒的香烟后，他满足地吞下第一口烟，对我们扬扬手，“走吧，以后再莫到我这里来哦，日后我到你们那里喝茶。”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了，当年的我们抽着八分钱一盒的香烟，每天挣八个工分折合二毛四分钱，在那些乡亲们眼里，我们却是很优越的，我们自己也有着无限的优越感呢。现在想起来，总还有一种甜甜的惬意，那种感觉也许是时代所赋予的吧。

说到打柴，你还别说，真的是有很大的学问呢。我到利川以后的第一次进山打柴，是和同队的几个青年一起去的，同样是在山林转悠，可是老乡们都找到了很枯的树枝，而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我们只好砍那些活着的树当柴，人家的柴又多又轻，我们的柴又少又沉重。你说山里的人没有我们强，为什么比我们能干呢？原来，打柴也是有学问的呢，只是因为我们的不屑于此道没有认真地去学，所以至今都还不知道其真谛之所在。现在想起来，当初用一支八分钱一盒的香烟都能够换来的知识，到现在还不知道，实在是大大地不明智了。当然，当年的我们最后也能够打到很干的柴，只是费的时间比同去的老乡要多就是了。虚荣心伴随我成长，现在虚荣心是少了，但是人也到了暮年了。但原现在的年轻人少一些虚荣心，多一些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把握好自己，也就比我们多一些机会了。

陈：古人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山区得路简直不是路，那就更不用说扛着柴走山路了。我们在山区的生活最苦最累莫过于上山打柴了。

打柴中我们学会了高声长叫一声借以解除疲劳的窍门。我猜想那就是山间号子的远朴由来。打柴中我们累了就长呼一声，渴了就用树叶兜口泉水喝。

打柴的前夜就得准备好干粮，清晨4点多钟出发，晚上6点左右才能回还。打柴所经过的山路除了爬山过沟外，无论怎么走都免不了要翻过一个特别陡峭的山头。一条路是攀岩过去，3、4米高的岩壁要踩着石头缝揪着树桩攀上去，另一条路路程长些，也爬一个50度的坡，陡得就象滑滑梯。刚开始打柴我们就走那条路程短的路，有一次一个同学攀岩的时候不小心滑下去，手刚好砍在柴刀上，鲜血淋淋，农民抓了一把止血草抹在她伤口上，才止住血。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走那条危险的路了。

记得有一次去打柴，下起了雨。我们挑着柴淋得满身透湿，一路上尽是泥浆，又稀又滑。我们穿着草鞋也无法攀住滑，下坡的时候大家干脆象坐滑梯式的，咕噜噜的滑下来。回到家里我们是汗水、雨水、泥水裹成一团。

每次打柴回来都累的我们瘫条，需要个把星期才能恢复。有次我们挑得过多，一个同学打柴回来后发了几天高烧。沉重的柴担压在我们稚嫩的肩膀上，身上的汗水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现在回忆起来，是多么的辛苦！这些是农村妇女都不界入的农活，那时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以前书上所说樵夫的

甘苦。每次打柴如同冲锋献阵奔赴战场。这些苦难的经历在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处在现在安逸生活中的我都觉得难以置信了。

于：比起你们，我们打柴最“安逸”。我们小队在山沟里，离街上最远，因此打柴最近。我们就住在柴堆里——村边就是山林。

冬天，如果没有早工，我们就上山砍柴。我们通常都是到远一点的深山里砍柴，因为为了保护山林，近处都要封山育林。

我们的小队长就是到武汉去接我们知青的贫下中农代表——张XX。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队里的社员都很怕他。要是有人偷砍了封山育林的柴，他会把偷砍的柴摆在地坝头，嘍一早晨，嘍得使人抬不起头。亏得我们的小队长管得严，别的小队山上早就光秃秃的了。

我们早上砍了柴后，先顺山涧溜下山，然后再堆码起来。那里一户一堆，谁也不会动别人的。我们能扛动多少就先扛多少回去，剩下的什么时候来这附近上工，收工时再顺便扛一些回去，砍一早上的柴要扛好多天。

农民打柴是为了卖钱，我们是自己烧。有一次我们小组一个同学为了补贴生活开支，打早去卖了柴，我们左右不依，分析来分析去，现在回想太可笑。

农民烧的柴都是妇女们在山林里打的枯枝。上工休息时，在山林边打一背筐，收工时背回家。后来我们队的女同学也学她们这样。我们的烧柴在当时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的小队长曾在外面吹我们存了一万斤柴。有一些离城近离山远的同学，到我们这里来要或者来砍柴，我们总要送一些柴给他们。每次总是惹得小队长埋怨我们，认为我们不会攒家。

还有我们山里烧火坑是用树兜子，因为树兜子很熬火。有的火坑一年四季火种不断，这要多少树兜子啊？看看现在城里的树兜子都做了盆景，可惜我们毁掉了多少好盆景啊！

听说现在那里烧火也提倡用煤了，不准上山砍柴，但我想枯枝总是应该可以砍的吧，因为枯枝和过多的枝叶会影响山林材木生长。

真想去看看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经历四年多的爱情考验，我和‘方’准备六月份结婚，但推迟了。一方面因家具没干，不能漆油漆，二来农村认为上半年结婚不吉利，所以推迟到十二月。我选定在1969年元月26日，即农历十二月初九举行婚礼。按照当地农村的习俗，结婚要选有“四”，有“六”，有“九”的日子最吉利，因为这里面含有“喜”、有“肉”、有“酒”的意思。虽说我不信这些，但入乡随俗，于是也就选定了这一天。

知青与知青结婚，我们是第一对。三月份，队里批给我三棵树，我们做了一套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矮柜，一个厨柜，一张饭桌，一担挑箱。

结婚前我们将决定告诉了父母亲。那时双方家庭都比较穷，她家姊妹多，她是大女，母亲受迫害，文革中又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结婚也没什么送给你们，这里是一床丝绸被面，还有你姐姐和大弟给的八十块钱。”边说边流泪。

我说，“结婚是高兴事，再苦再累我不怕，就怕你流泪。”“好，妈不哭”。

结婚那天，因经济困难，加上路远，不方便，双方的家长和亲人都没有来。

生产队为照顾我们结婚，特提前杀了一头猪，多分给我们六斤肉；又派人到塘里用鱼罩罩了四条鱼。（一种专门捉鱼的工具，是用竹子编的像北方冬天烤火用的烘笼一样，上面有一个口子，四周是孔。）

下午，妻子和几个知青一起，借的借碗，杀的杀鸡，杀的杀鸭，洗的洗菜，忙的不亦乐乎。

婚礼上的酒是妻子自己亲自用大米酿的，很纯；鸡鸭是自己养的，蛋是自家鸡鸭生的，还有平时积攒的一些腊肉、腊牛巴（阉制后用火烘烤的干牛肉）、火焙鱼等，在妻子的精心安排下，准备了九菜一汤，一共四桌，意思是十全十美，世世平安。

我不想大操办，所以除本队知青外，没有通知其他知青；生产队三十一户社员，每家派一人参加，共二十六人，（除四类分子外），加上知青，共四十多人。

晚上六点二十六分，婚礼在鞭炮声中，由贫协主席宣布婚宴开始，接着由我妻子和帮忙的知青轮流给各桌上菜，上到第六碗菜时，我拉着妻子的手给大家一一敬烟，劝酒。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菜，（那时农村办酒只是在每碗菜面上放一点荤菜，没有全荤的菜）三十几斤米酒也喝的精光。

酒后，田主席把我拉到厕所里，偷偷递给我一个红包，说，“上面不准请客送礼，但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一点心意，每人一块钱，除了买毛选和宣传画外，还剩二十一块钱，给你，千万别作声。”我一再推辞不要，但田主席执意不肯，于是只好收下大家的一片心意。

十点多钟，大家在厅屋中央燃起干树蔸，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吃糖果花生。

这时，最喜欢搞笑的金明高声说，“今晚大家别光记得吃，要不要看节目呀！”“要”，没想到大家的口气竟会如此的齐，好像训练过似的。

我自高奋勇地唱了一首广播中刚学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歌词非常简单，就一句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这首歌，今天知道唱的人已经很少了。

唱完后，大家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喊道，“满妹子来一个舞蹈好不好！”知青中有人说“满妹子有情况，不能跳”。

“不行，跳一个也行”，社员一起叫着说。

因为那时妻子已经有四个月身孕，没办法，只好跳了一个独舞《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唱得好不好，跳得美不美，还要不要？”“还要，刚刚的歌太简单了，不行，再多唱几首苏联革命歌曲，好不好？”社员又一阵鼓掌。

当时反修搞的热火朝天，我有点犹豫，不敢唱。知青中有人高叫，“反修，又不是反革命歌曲，唱，要用中俄文唱！”贫下中农也一股劲地么喃着。

我清了清喉咙，先用中文唱了两首苏联民歌《红莓花儿开》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后演唱了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最著名的歌曲《小路》，然后用俄文又重唱了一遍。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苏联老师教我们唱的。我越唱，声音越激昂。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好漫长一直通到遥远的前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陪着我的爱人奔向前方从今天起，我和‘方’将踏上这条爱情的小路，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多曲折，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和鲜血，陪伴她一直走向遥远的前方，绝不退缩，绝不叛变。

2006年7月13日

远山的震撼

——此文献给我深爱着的勤劳善良却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

1969年3月底，我们奉大队之命上山扛木头，说是给学校盖房。那时的中条山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依仗着年轻，又充满对神秘大山的向往，我们几个男知青卷起几件厚一点的衣服，带着干粮，跟社员一行九人踏上征程，向大山深处开跋。

漫山遍野的小草已经张开小嘴，吐出一点点嫩绿，把大山染的绿蒙蒙的，象罩上一层绿色的雾。我们问队长：走到目的地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一天吧。我们又问：一天走多少路？他说，一百二吧。说的漫不经心。啊？一天要走一百二？山路？我们有点见傻。没办法，硬起头皮走吧。哼，那几个女生还哭着喊着要跟来呢，要真来了，就该真哭了！

一路上，看不见树，甚至于连像样的灌木丛都没有，队长说要走出三十里外才能见到柴禾，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所说的柴禾是可以打成捆，插在扁担两头担起来的那种大的灌木。三十里之内的已经被砍光了，而且短期内休想恢复。说得人不由一阵心寒。

我们不时地问这问那，队长和乡亲们也不厌其烦的讲解。我们转过弯弯的马鞍桥，爬过高低不平，满是青石的风葫芦岭，绕过蜿蜒的大洼小洼，在凉水泉边吃馍馍。那凉水泉是几块青石围起来的，面积大概只有40cm见方。水深约30cm，水面挺高，距石面大约3cm，清澈见底，里面有一个黑色的长着长长的几条腿的昆虫在游动。队长说不怕，那是水蝎子，没有毒，也不咬人。于是队长带头，俯下身，趴在青石上，用嘴对着水面，唏溜唏溜喝起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人是这样喝水的，都不敢喝。乡亲们依次喝着水，吃着馍，鼓励我们：这水最好，不管天多么旱，有多少人喝，这水面永远这么高；而且不管你身体强弱，天气冷热，任你喝多少这水，决不会害肚子！终于，我们也不管自己是人，还是别的什么动物，都趴在这水面上喝起来。果然，清冽甘甜！

我们穿过一道石门，二道石门，三道石门，又走了不知多少路，总算到了一个小山村，这时天已经黑了。队长说，今天就在这里歇了，明天早上进原始森林。这个村只有三四户人家，村里人见了我们，非常热情，让我们进他们的窑洞。但是，队长只跟他们借了一口大锅，谢绝了人家的盛情。那天晚上，我们吃着自己带的馍馍，喝着队长

用借来的大锅熬的白面浆糊，在一个存放草料的窑洞里享用了我们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顿晚餐。

真是走累了，仗着人多，说说笑笑，脚上打了泡都没感觉。吃完饭，一个个东倒西歪，顷刻，鼾声四起。第二天，我们几个知青几乎同时跳了起来——每个人都被跳蚤叮了一身红红的包！奇痒无比！好像这跳蚤也欺生，同来的乡亲们都没挨咬！或者，——知青的肉嫩？有可能！

当我们真正走进原始森林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切！高大的数不清的参天大树耸立在我们面前，它们伸出无数长长的手臂，为我们撑起一个巨大的伞，诠释着我们上学时学过的所谓“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只有那从树叶的缝隙中射下来温柔的光柱告诉我们今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地下软绵绵的，到处是落叶，一层一层的，不知道有多少层，也不知道有多厚，干净极了，一尘不染，我们甚至想躺在上面打滚。扒开树叶，到处可以见到不知从何处流过来的泉水，同样的干净，同样的一尘不染。队长说，这水是好水，喝了随便喝，决不会害病的。但是没有人喝，因为谁也不渴。

空气是湿润的，弥漫着绿色植物的芳香，沁人心肺，这天然的等离子，天然的氧吧，谁到了这里，都会变得贪婪！我们使劲的做着深呼吸，企图把一辈子的新鲜空气吸进肺里储存起来慢慢享用！啊——，我们忘情的喊着；啊——，啊——，啊——，大山和森林多情的回应着。我们激动，我们感动，这就是大自然！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这就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强烈震撼：人啊，你是多么的渺小！

在这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我们居然遇到了一户人家。说是一户人家，其实只有一个人。在沟底一块稍稍平坦的地上有一幢黑乎乎的用石块垒成的低矮的房屋。我们弯着腰，钻进一扇同样黑乎乎的木头钉成的门。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看到一个安详的老婆婆。老婆婆见到来了这么多人，高兴地几乎从凳子上跳起来。老婆婆脸色奇白，与周围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能是长期生活在黑暗里的缘故。但是老婆婆很健康，头发乌黑，动作敏捷，而且穿得非常利索整洁。好一阵，我们才看清屋里的东西。一张低矮的床，一口大锅卧在一个土灶上，一个木头搭起的台子，上面摆着一些盆盆罐罐，房屋的一角还有一台木制的织布机。

我们和老婆婆一见如故，没有任何客套就攀谈起来。原来老婆婆还有一个老伴，去年过世了。她们是日本鬼子来后逃到大山里的，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男耕女织，相依为命，这样过了几十年。忽然，老婆婆问：圣人涧（县城所在地）的日本人走了吗？我们大笑起来，告诉她，日本人早被打跑了，现在已经解放20年了！老婆婆哭了，泣不成声。她说，自打日本人来以后，她和她的丈夫就跑到这深山老林来了。从那时起，他们再没有出过山，也再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任何亲戚！

刹那间，一切都凝固了。再没有人笑，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呼吸。这黑暗的小屋仿佛像一块巨石压在我们的心上。过了一会，队长问：你还回老家吗？老婆婆擦擦眼泪，喃喃地说：回啥哩，我谁也不认识，人家也不认识

我：再说我还要守着我老汉，不能离开他啊……

后来，老婆婆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她煮的牛肉，非让我们吃不可。她说前几天下大雪，牛被冻死了，只好煮来吃。我们每人吃了一点。临走时，队长把我们带来的白面送给她。老婆婆十分高兴，因为山里只能种玉米，她已经三十多年没吃过白面了！

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可能老婆婆已经不在人世，当年和我们一起扛木头的人有的已作古。每每想起此事，便思绪万千。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万恶的日本鬼子，建立了自主的人民共和国。无数抗日英雄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让我们敬重和怀念。那么老婆婆和她的丈夫呢？我仍然对他们充满敬意。他们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可能他们很懦弱，但是他们成功的逃脱了日本鬼子的魔爪，没有让鬼子杀害蹂躏他们的罪恶企图得逞，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用自己极其微弱的力量保卫了爱情和生命。他们活了下来，并且白头到老。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被深深地感动着——他们不是很令人敬佩么？

作者：中条山人 2006-11-30 18:58:20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黄韧带肥厚

(一)

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浑身发抖，抖得几乎跳起来，以至于两个护士不得不使劲地按住我，那惊恐的神情好像在拼命按住一个突然诈起的僵尸。“你紧张？”蓝色的帽子下面两只惊诧的眼睛盯着疲惫的我，这三个字仿佛是从那紧紧的口罩缝里跳出来的。“不。”我说。我是下决心做这个手术的，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下去很可能导致瘫痪。我心里真的不紧张，也许那时我的植物神经不听指挥了。

“怎么得这个病呢？”可怜的妈妈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大儿子去了青海，二儿子又去了山西，儿行千里母担忧，多少年来不知道她是怎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沉重！老大是回不来了，孙子都有了；老二好不容易调到离家近的地方，却又被病魔放倒，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妈妈那雪一样的白发，那刀刻般的皱纹，那一脸的无奈，那迷茫的眼神，让我心酸难忍，让我永生难忘。

持续的腰疼使我不得不休假。腰疼多少年了？在中条山时就疼过，但没有这么厉害。周大夫简直是个庸医，就知道补肾——每次摸完脉总是故做深沉地：肾虚啊，补补吧……真见鬼，我夫妻两地生活虚什么虚？多亏那天周不在，一个实习大夫坐在周的位子上，拿着一本日文书在看。我以为是周大夫坐在那，便招呼了一声。他抬起头放下书，说，他有事没来，我可以给你看看么？我是来这里实习的。

他微笑着，三十来岁。我也笑了，很好这人说实话，没见过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实习大夫的。他看得很仔细。“你去看看西医吧，我感觉你可能骨头出了问题，先去地区医院拍个片子，然后再说下一步。”这位中医怂恿病人去看西医，足以证明他没有门户之见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不会忘记这位年轻的医生，虽然他没有诊断清楚我的病，但是是他把我从误区中拖了出来，从此我再也没把补肾作为主攻方向。可惜当时的检查手段太落后了，医院里只有X光机，医生们拿着模糊不清的骷髅般的胶片猜测

半天，然后煞有介事地说这也增生那也增生。

(二)

手术室的医生护士忙着给我输大量的镇静剂。好不容易不抖了，却又咳嗽起来，剧烈地咳，从来没有过。“你害怕吗？”医生问。“不。”“你抽烟吗？”“抽。”“你以后不要抽烟了，你的气管痉挛多厉害，麻醉药都不管用了！”也许跟抽烟真的有关系，但我心里真的不害怕吗？一上手术台四肢就被紧紧地绑在四根铁管上，根本动弹不得，耳边尽是刀剪相搏的金属撞击声——象我们村里过年时杀猪——你说你不害怕？

那是1983年1月4号，我给爸妈买了十斤鸡蛋忍着腰疼回了天津。下了火车我怕鸡蛋被挤碎就走了六站地回家——这无疑是我的病提前爆发的一个因素。第二天早上，我又忍痛挑了三担水，把水缸挑满。我认为自己离家十三年，对爸妈尽的孝心太少，所以每每回家尽量多干一点活儿。谁知这三担水是导火索……吃晚饭时，我刚刚盛了一碗饭，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抓住我的右腿使劲地拧起来——象拧毛巾一样，我大叫一声，扑倒在床上。我不停地打滚，不停地喊叫，顷刻间我浑身被汗水浸透。

爸说受凉了！妈说太累了！我哭了！泪流满面！腿好像断了，象是遭遇了车祸。对过院黑龙江兵团返城的万里哥闻讯赶来带来几片可待因说吃了先止疼。南院天津郊县插队返城在某厂当厂医的小徐也跑来了，你趴好，我给你按摩。但是我无法趴好，因为我无法保持一个姿势，剧烈的疼痛让我任何一个姿势无论是坐还是躺是歪着还是靠着都不能超过十秒钟！

那一夜我是在疼着翻滚着哭叫着中度过的。可待因只能让我浑浑噩噩地熬两三个小时，我困极了想睡觉但疼的睡不着。第二天，对门的万里哥把卫生院的石大夫请到家里给我看，他分析可能是风湿也可能是腰椎有问题，就让我去卫生院烤电。

去卫生院的路上遇到和我一个公社插队的小崔，他已返城在菜店卖菜，蹬着一个三轮板车，看我一瘸一拐的大惊失色，你怎么了？我苦笑：不知道。我送你去卫生院！小崔把我扶到三轮板车上一直把我送到门诊室才转回去上班。——已经多年没见小崔了，1999年初的知青大聚会也没见他——不知现在是退了还是下岗了？热乎乎的多普勒灯让疼痛缓解了一点，石大夫给开了些消炎痛和B1谷维素之类营养神经的药让我带回家吃。

从医院回家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蹬三轮车的老人送的我。他不忍心看我那痛苦的样子，非要我坐他的三轮车不可。遗憾的是老人连我的家门都没进就悄然离去，而且分文未取。现在想起来那天要不是这位善良老人送我回去，可能我会在马路上打起滚来——因为可待因的药劲已过，我刚进家门剧烈疼痛就又激烈地袭来！

(三)

“疼不疼？”医生用小刀在我的肚皮上划了一下，“疼！别刺！”我喊叫起来。怎么回事？已经足够成人用量了！“加大麻醉！”凉飕飕的一股液体通过一根小管又徐徐注入我的腰部……终于，小刀再划过皮肤时感觉是麻酥酥的，很温柔很舒服，象春风拂面。这时，医生们开始在我的身上大动干戈，我的鲜血渐渐地染红了他们的双手。而下达指令让他们动手的恰恰是我自己。

不知道过了几天了，病情在不断地发展。右侧坐骨仿佛被掏了一个洞，一棵筋似乎被强力拽着，一把一把的往外拉。我想起在村里打水有一次轱辘坏了，我就一下一下从井里往上拉那根拴着水桶的牛皮绳。而此时的牛皮绳好像紧紧勒着我的脚心，拉一下我就疼一身汗！后来左腿也疼起来，腰也剧烈地疼，象枪扎，象石砸，象斧劈刀砍！这是一种怎样的疼痛啊，没有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我甚至喝一碗水都不知要变换几次姿势。渐渐的，两条腿开始发麻。

天津的一月临近三九，西北风咆哮着，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至零下十几度。屋檐下挂着晶莹剔透的冰柱，玻璃窗上结满了美丽的冰花。记得小时候，常常趴在窗前在冰花上用手画，画小鸡、鸭子，白菜什么的，或者把嘴唇贴上去，印上一只小嘴。有一次用小嘴去吻玻璃的时候，不小心被窗台磕了下巴，流了很多血，吓得我大哭大叫。

没想到三十年后的冬天，我又开始大叫起来。天津的小杂院连房带院超不过100平米，8间10平米的小屋住着6户人家，那五户被我闹的鸡犬不宁，我在天津住了22天，疼了22天，白天黑夜的喊了22天，22天里我感觉睡不到十个小时。我很象契诃夫《渴睡》里的小女孩，困啊，困啊，但不能入睡。而这22天里我麻烦了多少人，数也数不清，我单位的领导同事、同学、儿时朋友、妈妈街道上的阿姨、邻居甚至好多不认识的人。

那时院里的人还买了水果来看我真叫我惭愧，我不断地为自己的扰民行为道歉，但是他们说你病我们也帮不了你，如果你喊着能轻松点你就喊。其实喊是不由自主的，并没有减轻我的疼痛。那时候我想起了许云峰江姐等许多革命先烈，我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能够保守住党的秘密是多么不容易！我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伟大！我想如果轮到我我肯定是做了叛徒。

(四)

李大夫一边动手，一边叫我按他的指令动脚指头。他说，为什么不用全麻，而用的腰麻呢，为的是在手术中你可以和我对话，配合治疗。但这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手术中我什么都能听见。我感觉这些医生忽然都变成

了木匠，叮叮当当的，好像锛凿斧锯都上来了，而且疼！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麻药只能麻醉肌肉和软组织，对于骨骼和主神经它们几乎无能为力！

我单位说我不能在天津住院，否则医药费不能报销。于是22天之后我单位派了一辆机动三轮车把我拉回来送进地区医院。第一个给我看病的是个主任，他把我摆弄来摆弄去问我哪疼，我说不知道哪疼，说不清。他特愤怒：你这么大人哪疼都不知道？简直是！其实神经疼是找不到准确位置的，尤其是我每天要注射几支“强痛定”（仅次于杜冷丁，据说现已被列为毒品），混混沌沌的往往是摸哪哪不疼，不摸哪哪疼。

听护士说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专门给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患者做手术，让他们能够站的更直一点，看起来个子更高一点，走路的摇摆幅度更小一点。护士说他很胆大，把病人的腿刺开，骨头重新摆摆，缝上皮打上石膏就大功告成。确实开了此类手术的先河，听得我后背直冒冷汗。

真正让我减轻疼痛并睡了一夜好觉的是一位姓刘的医生。他曾经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住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做牵引做好了。他红红的脸白白的头发，笑容可掬。他说，别怕，你这是享福病，不挡吃不挡喝，于是我的上半身被固定在床上，两个脚脖子上挂了两个重物，这就是牵引，一天两次，一次约三个小时。还要绝对卧床，不得乱说乱动。

我竟然能睡觉了！并且大规模地做梦——以前也做梦只是几秒钟就被疼醒，好像睁着眼睛在做，做的梦也支离破碎，毫无故事性可言。现在不了，醒了翻个身继续做，象电视连续剧。

我最常梦到的就是我在山西在中条山上追逐着漫山遍野的山花跑啊跑啊跑个不停。中条山上到处绽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黄的迎春花，红的山丹丹，白的和淡兰色的野菊花，我每每收工回村便随手采上一些带回来插在杯子里欣赏，社员们都笑话我，说那东西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柴烧费那劲干啥！今天我却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朴素而美丽的野花，也许它们在回报我对它们一往情深的爱恋，所以把我此时的梦乡装点的如此五彩缤纷，使做梦成了我的最爱！

（五）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我的两个胳膊被吊得酸痛。我不时地发出无奈的呻吟，“累啊，”，“累啊，”，但是医生和护士没有一个人理睬我，甚至没有人看我一眼。他们象一群装修工人在赶活儿——似乎雇主明天就要结婚办喜事住新房子。

妻从四川来信说，不行去四川看，他们能找到专家。我不太同意，因为京津地区毕竟在全国还算是发达地区，

是人才济济的地方，再等等看吧。妻很着急要来，但孩子才三岁，千里迢迢，一路上要赶船倒车的辗转七天。我就写信安慰她，说我们正在找专家，什么时候做手术再过来不迟。

那年的春节我是在医院度过的。我的同事们轮番给我送饭，饭菜的精致绝对胜过任何一家大饭店。这让我欠了一笔很大的人情。虽然我和他们在一起和睦相处了二十几年，但我仍觉得我是永远无法偿还这笔人情债的。我的这几个同事有两个是单位的老职工（其中一个不幸于2000年病故），还有两个部队转业的军人，其余均为插队知青——一对内蒙插队的夫妇（北京知青），一对黑龙江兵团战士夫妇（男哈尔滨知青，女北京知青）一个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两个河北插队的天津知青和一个本地知青。实际上我们都刚刚认识不久，是一种真诚的知青情结让我们一见如故。这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其实腰病的病因多种多样，但症状却大同小异。大都是错位或增生物造成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双腿的内外侧放射性或丝丝拉拉的隐痛，严重的不能站立行走，痛苦万分。如果你把所有类似症状都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或脱出），那就错了。当然这是我多年后总结的经验。

我的主治医刘医生就犯了这个错误。他是腰间盘突出做牵引做好了，他就认为我也是腰间盘突出做牵引也能好。终于在做牵引无效的十几天之后，他开始翻书——而此时我也在翻书。一个护士是我的老乡，我求她给我找一本关于腰椎病的书。

她值夜班的时候悄悄拿来一本《脊柱外科学》，但——是——，她说，你绝对不能让医生看到！我发誓！大约用了两天时间我把一本厚约6厘米的巨著粗粗看了一遍。然后我又把腰椎部分仔细读了一遍。看罢，不禁仰天长叹，看来我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刀了！……

（六）

我累极了，不由自主地叫起来，“我受不了了！快帮帮我！”一个护士跑过来，把一个小枕头塞进我的腋下，轻声说：“你再坚持一下，再有10分钟就好了。”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小枕头已经失效，我又喊起来。那护士又过来给我塞了一个小枕头，说，再坚持10分钟！我精疲力尽。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小枕头，还有多少个10分钟……

红脸白头发的刘医生要给我做手术，要把突出的椎间盘去掉。我说要考虑一下。你可不能让他做！一个两次在这里住院的病友说，他是有名的马大哈，曾经有个小伙子腿上长了个疮，他给看了几次，最后竟然把大腿锯了！还有一个被马车轧了大腿的农民由于他的疏忽活活疼死了！简直太惊心动魄了！我又向我那位老乡护士询问，答复是她来了三年了，尚未做过一例这样的手术，据说三年前做过一例，效果不太好。怎么不好呢，我问。怎么不好？就是术前怎么疼术后还怎么疼！——可怜的患者白挨一刀！

看来是不能在这做了，三年来没做过，起码手生，在手术台上躺也要多躺几个小时。我给天津的二姐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找人。当刘医生得知我不同意做手术时非常失落，他认为我看不起他，所以每天来查房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觉得他应该允许我选择——性命攸关总该是我说了算吧？于是他来了我就装睡。我们两个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当我要转往天津的时候，地区医院坚决不给我开转院证明，这样我的医药费按规定就不能报销。那时我的工资是四十一块，要承担约两千元的治疗费用无疑是在开玩笑。我甚至拿不出三百元的住院押金。我卖掉了自行车，以示不可逆转的决心——即使自费也要回天津去做。

我这人属于那种极没主见的人，别人说服我非常容易——这是个很大的弱点，它使我在后来的经济活动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却体现了少有的坚定。我必须站起来！因为我无法躺着面对我那年迈可怜的父亲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无情的生活磨难让她一身是病，剧烈的社会动荡摧跨了她的精神。她已经老了，她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了，她的身心再不能遭受打击了，我必须在送她去另一个世界之前给她老人家一点慰藉。

(七)

我已经没有气力喊叫了。我想起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记得下乡时，脚上长了一个鸡眼，走路疼得要死，我让两个知青把我按在土炕上，请来我村一个被公认为最心狠手毒的贫下中农主刀，硬是把脚后跟剝了一个血坑——没办法，得了病只好任人宰割——估计眼下已经是血流成河了……

天津给我看病的主治医生姓李，52岁。高大的身材，最少有1.85m，气宇轩昂，说话和蔼可亲象个绅士。他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结论是椎管狭窄。那椎间盘呢？椎间盘是好的。天哪！地区医院还没弄清好牙坏牙，就迫不及待的要下钳子，令人毛骨悚然！什么原因呢？造成椎管狭窄的原因很多，李大夫说，有先天性的，有外伤造成的，有长了异物（如肿瘤）的……我的呢？难说，现在咱们的检查手段很有限，还不能判断出病因，只能剝开看。我又一次毛骨悚然！

我受过外伤么？我竭力回忆，有一次去公社的路上有个社员牵着一头毛驴，他说让我骑。我还没骑过毛驴感觉很新奇就骑上去了。谁知他猛的拍了一下驴屁股，驴就窜出去了，一个猝不及防我从驴背上摔了下来，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半天没喘过气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次意外留下了祸根？不过即使是，也没什么价值，这并不是那种值得提倡的英雄行为。

“我的意见你要动手术，因为你的右腿开始麻，如果不及时减压，后果不堪设想。一般来讲我们尽量保守治疗，谁也不愿意做手术，医生也不愿意，因为手术是有风险的。你慎重考虑考虑。也可以保守治疗，比如烤电理疗、按摩、吃药都行，咱们医院都有，去别的医院也可以。你可以在天津把医院转一圈，如果觉的不理想，还回来找我，我照样欢迎你！”这是我至今见过的最有风度的医生，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又非常尊重病人的选择。

我没有理由犹豫了，我需要站起来，我渴望到街上去。妻从四川赶来，把三岁的儿子撂给外公外婆。李大夫说我可以自己走路，只是不能站直了。然后他教我，两腿微屈，弯腰往下至感觉不疼为止，两只手扶一个小凳子当拐棍，这样不用人背，也不必天天躺着了。一试，果然灵验！我想我应该庆幸自己遇到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从此我就经常抓着一个凳子光顾病房的楼道，走来走去的样子非常滑稽。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可能还没有引进核磁共振和CT，检查此类疾病主要靠X光造影。医生说他们新引进了显微镜手术，但没有人会用。这个概念我至今没弄明白，不知是不是现在流行的微创手术？所以做这种手术医生们也是如临大敌。他们要进行多次术前研究，制定多种手术方案，反复讨论把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写在纸上，然后研究出应对的最佳方案。对我的要求是手术之前严防感冒。

术前的检查顺序是1、碘苯酯X光造影，2、镁蓝定位，3、常规检查。简单的说，碘苯酯是X光穿不透的一种液体，在X光机里它的显示为白色。把它注射到椎管里，然后人被放置在X光机上，颠来倒去，把碘苯酯液在椎管里流动的路径拍下来，正常人应该是碘液顺利地从颈椎流到骶椎，而我是碘液到了腰椎4就停止流动。这说明腰椎4出了问题。如果碘液在腰椎4还能往下走，只是流速慢了，液流变细，说明椎管还没有被完全阻断，不是最严重的；而我是碘液到腰4之后一滴也不往下走，这就意味着我从腰椎4开始被基本阻断！下部神经已经难以收到大脑的任何指令。

造影之后头剧痛了一整天，医生说我很幸运，有的人要疼三天。镁蓝是金属颜色，用它定位就是把造影确定的椎骨位置染成蓝色，以便手术时准确下刀。这很疼，要打麻醉药，然后一针扎在骨头上，象我这样刚刚经历过剧痛的人都被扎的脸色蜡黄，大汗淋漓。每次做检查医生都会说不疼，朋友们千万不要轻信，医生们是最会骗人的。

(八)

终于李大夫停止了工作，面对着我，说，翘一下大脚指头，使劲！怎么样？很好，很有力量！双腿侧面有什么感觉？没感觉！以前的症状全部消失！一切正常！手术成功！我被送了绑，几位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转移到推车上，推出了手术室。妻子在手术室门口接过推车，谁知我又浑身上下抖起来，抖个不停。妻子问医生，他怎么跳起来没完啊？李大夫笑了，手术前就跳！好容易才给镇压下去。不过，现在可以随便跳！

第二天，李大夫托着一个托盘来到病房。托盘里有一块黄色的东西。李大夫说就是它让你险些瘫痪！这是腰椎4的黄韧带，它受过伤。受伤之后从创口处增生，增生了多少呢？增生的部分是原来自有的1.4倍。而后它顺着神经孔钻进椎管，绕脊髓一周，使脊髓不能向神经根正常地传达大脑的指令并严重挤压神经根使其发炎而产生剧烈疼痛。如果压迫神经的时间过长，会造成神经细胞的大量坏死，而人体的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于是就会麻痹直至瘫痪！

李大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病，他把它命名为“黄韧带肥厚”。

当我重新站在爸妈面前的时候，爸爸笑了；妈妈却哭了，不住地抹眼泪，呜咽着，不时地抚摸着。我也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一年后在我单位领导的帮助下，在省里一个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帮助下，我的妻儿调到我所在单位，结束了我们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又过了一年零九个月，妈妈离开了我们。妈妈去世时，我35岁；而这35年里，让妈妈牵肠挂肚夜不安寐的岁月竟整整有17年！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曾为知青

曾为知青。

所以，经历了一个前无古人所有后继者所承的特殊时代，经历了一个以其血肉模糊遍体疮痍的面目突兀凸现在历史长链中的一个特殊年代。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意识到，那个特殊年代留给我的痕迹，就像一位挚友所言，已犹如刻在皮肤上的纹身，鲜明、深刻而痛苦。

朋友和学生的眼中，常是一副落拓不羁，仙风道骨，都道是闲云野鹤，世外中人。一些日子里，更刻意自我放逐，在家中呼朋唤友夜夜笙歌，只说闲情风月，不言沧桑沉重，温言软语杯光舞影间，竟也以为自己曾有过多少幸福时光，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忽忽到了一日，与学生在中学实习，无意中翻到一个班的学生履历表，赫然发现，父母职业栏中，频频出现着同一个词：下岗，下岗，双双下岗。心中一下子惶惶乱乱，急急又翻回头，寻找着他们的年龄栏……没错！就是这个年龄！就是曾为知青的年龄！就是我的同一代人！！

即刻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学生不知所措，默然围之。

不能说……

又怎能向这些还是如花年华的年轻人说得明白？心底里，竟还会隐藏着那么多的泪水……

就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曾为知青的这一代人。

为了那些永远留在了过去留在了荒山野岭独江寒水边的孤坟，为了那些活在今天但已满眼风霜粗糙冷硬的面孔，还为了那一颗颗伤痕累累荆棘丛生激情不再温柔不再的心……

自己的心底，原也是一样的伤痕累累荆棘丛生。

从此，便只有沉重，只有夜夜的惊心，怕的是接到远方知青朋友的电话，说的是下岗失业家庭变故……

从此，便只有沉重，只有日日的惶惑，怕的是自己作为这一代人的幸运者，还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还不能做得更好，而让女儿和学生对他们的上一代有更多的信任和爱……

从此，便只有沉重，只有分分秒秒的追赶，怕的是自己还来不及将这一代人的历史，更详尽更真实地告诉女儿和学生……即便那一开口一下笔，句句蘸泪，字字泣血，就像在将生命一点一点地耗在里面……

我不后悔，我的活着，不再属于我自己。

因为，曾为知青。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

小学的地理课上，初次学到了塔里木盆地。知道它位于新疆南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麓，东到罗布泊洼地，北至天山山脉南沿，南抵昆仑山脉北麓，是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河携带着天山和昆仑山的雪水绕着盆地边缘蜿蜒流过，哺育了一块块断续的绿洲，象挂着一串碧绿的翡翠项链。盆地中央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仅次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因此又被称为“死亡之海”。

多少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令人畏惧又令人好奇的神秘王国。严酷的大自然在这里造就了巨蟒般的沙垄，高耸的沙山，令人心怵的流沙，以及起伏不定变幻莫测的沙丘。多少灿烂的人类古文明，被凶悍的沙漠吞噬。“丝绸之路”上盛极一时的楼兰古国，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墙，伴随着戈壁红柳在荒漠中瑟瑟颤抖。湮没在茫茫沙海中的米兰古堡，依稀在风沙中诉说着当年的繁华。沙丘上偶尔露出的探险家的尸骨，又一次警告人们死亡之海的威严。有谁知道，在这无边无际的沙海下面，埋葬着多少罕知的秘密？

我们的农场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所在的连队更深入到盆地里边，一条沙漠伸出的沙舌把我们连队和农场其它单位分隔开。每次从连队到场部，必须翻过这条要走二十分钟的大沙舌。在沙漠中行走，四周是大大小小差不多的沙包，找不到特定的参照物，很容易迷路。只有认准方向，凭自己的感觉走。沙包迎风的一面比较结实，可以行走，上面布满了波浪状的条纹。沙包背风的一面堆积着稀松的散沙，稍不注意踩上去，可以陷进去半人深。当然这些沙包比起大沙漠深处是小巫见大巫了。有时我站在沙包顶上，眺望着绵延至地平线的大沙漠深处，禁不住猜想，那神秘的深处会是什么模样？什么时候能到那里面看看？

连队的老职工告诉我们，连队初建的时候沙舌还没有伸到这里，当年的营房就建在现在沙舌的位置。以后一年年沙舌得寸进尺地向这边延伸，直到把营房围住。在这场人和大自然的格斗中，人并没有胜天，而是败北了。贪婪的大沙漠终于吞噬了营房，职工们撤到离沙舌有一段距离的盆地中，建起了我们现在住的营房。我跑到老职工告诉我的地方去查看，果然还能在沙包上看到几块土坯，上面有烟熏的痕迹。谁能想到，这沙包下面当年可是热闹的营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锁住这条肆虐的沙龙？

1966年夏末，那场日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在内地拉开了序幕。可当时新疆建设兵团还没有介入这场运动，处于激战前夕的平静。兵团还雄心勃勃计划往塔里木盆地深处开发新的团场。为了替兵团的远景规划

作准备，兵团测量队来到了我们团场。他们计划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把里面的地形地貌测定下来绘成地图，供兵团领导决策用。测量队的主要仪器是水准仪，需要有人扛着标杆在沙包间跑来跑去。这种跑腿的粗活当然不能让测量队的知识分子来干，测量队要求我们团派一个班的职工协助他们工作，就是干这扛标杆的活。我奉命率领一个班去测量队报到。

这一个班的人马基本上都是上海知青，知道要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大家都很兴奋。一到测量队大本营，我们就散开协助准备进大沙漠的物件。测量队要进大沙漠的都是年轻的男队员，女队员们留在大本营，她们的任务是根据各野外小组的测量图绘制出更精致美观统一的地图。别看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嘻嘻哈哈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这些年轻的测量队员中有不少是上海青年，他们实际是和我同一届或高一届毕业的。他们告诉我，他们高中毕业时高考成绩差了一点没考上大学。这时兵团测量队来上海招人，他们从落选考生中挑考分比较高的，向这些落选考生发出询问通知书，问他们是否愿意到兵团测量队工作，他们就这样来到了测量队。当时的风气和后来文化大革命大不相同，兵团职工对这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尊重的。望着这群快乐的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不知怎的，我心里有点酸溜溜。他们哪里知道，在这些给他们扛标杆，皮肤已经被戈壁滩的盐碱水泡成棕黑色的农工中，有一位和他们同届毕业，高考分数比他们高得多的三好学生啊。

命运哪，由不得你。党要你干啥就得干啥，什么三好学生，什么高考成绩，党不看这个。

我和一位上海知青农工小谢分到一位姓郭的测量队员这一组。老郭也是上海人，比我高一届。我们把铺盖，干粮，仪器，工具和生活用水捆好，挂在两只骆驼背上，就随着骆驼走向那神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

敬礼，塔克拉玛干，我来了。

（二）

驼铃叮噠，眼前的沙丘摇晃着向后移动，没完没了。

黄沙，黄土，似乎空气都染黄了，满眼一片黄茫茫。呈现在眼前的塔克拉玛干就象浩瀚的沙海，起伏的沙丘就象海上的波浪。在沙丘上有条不紊地行走的骆驼，就象在海上行驶的船只，不愧是“沙漠之舟”。骆驼真是上帝创造的尤物，专门帮助人类在沙漠中运输东西。它的驼峰中储藏着平时积累的水份和养料，靠着它们骆驼可以在沙漠上不吃不喝行走几天啥事都没有。骆驼刺是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它的叶片又尖又硬，扎在人身上很疼。骆驼舌头一卷就可以把地上的骆驼刺拔起塞进嘴里咀嚼，那尖尖的叶刺在骆驼嘴里翻来翻去竟然一点也扎不疼它，真是不可思议。骆驼天生一付好脾气，既不发怒，也不着急，慢条斯里的，如果你要骑它，它会把四腿蹲下让你骑好后再站起来。只是在它打喷嚏时要小心，不然喷你一身一脸的叶浆，让你哭笑不得。

老郭和小谢坐在骆驼上，随着骆驼的步伐一颠一晃。我和另一位农场职工跟着骆驼在沙包上行走。他的任务是送我们到沙漠深处的扎营地点，然后牵骆驼回大本营，今后每两星期他给我们送一次给养，同时把我们测好的地形草

图带回大本营。

走着走着，沙丘变矮小了。慢慢地原先被沙漠掳获的土地露了出来。有盐碱滩，有红柳丛，还有稀稀拉拉的骆驼刺。原来大沙漠最凶狠的是它的先头部队沙舌，攻城掠地无所不为。沙漠的腹地里并不完全是沙丘，有可供将来开发的滩地，还有生命。四脚蛇从它们栖息的洞里探出脑袋，在沙地上爬行一段距离，又匆匆地钻进另一个洞穴。嗡嗡的苍蝇围着你飞舞，像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太无休无止地讲她的故事。野鼠白天很少出来，晚上才是它忙碌的时分。我们甚至还看到一只野兔，灰不溜秋的，撅着小尾巴拱进红柳丛。盐碱滩上还撒落着一些羊粪蛋，那是维吾尔老乡赶着羊群经过这里的踪迹。老郭告诉我，他们在其它地方还看到过黄羊。地球上的生命是如此顽强，甚至在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都有它们的痕迹。这些小生命给我带来了一种亲切感，一开始的那种孤独感减轻了不少。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宿营地点。这是一处被遗弃的羊圈，一截断墙被流沙埋了小半截，还能看到，而其它墙已经不存在了。我能想像，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草场，有羊群，还有人烟。每到傍晚，牧羊人弹着热瓦甫，唱起忧郁的歌儿，

离恨的荒野上，我像那干渴憔悴的羚羊，

我像艾里甫一样病魔缠身倒在地上。

世间的情人们都会日夜彷徨，

却总盼像赛尔维树那样潇洒四方。

为我斟满酒吧，比拉勒要把它一饮而光，

玉液琼浆让我那破碎的心得到欢畅。

一切都逝去了，严酷的大自然吞噬了文明，只留下残墙断瓦。如今，我们再次向大自然挑战，要重新开发这片废弃的土地，做得到吗？

我们卸下物品，架好帐篷，还搭起一个简单的锅灶。趁着太阳刚下山时天上的余光，两个人赶快出去拣柴火，一个人揉起苞谷面准备烤苞谷馍，这就是我们的晚饭。

晚上，昏黄的煤油灯挂在帐篷里摇摇晃晃。老郭一件事一件事向我们交代。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始测量工作，苞谷面和咸菜就是我们每天的伙食。几个大军用壶中装的是水和煤油，每天早上我们用小军用壶装上水，再带上苞谷饼就是我们的午饭。水特别珍贵，吃用都是它，早上每人只能用一小杯水刷牙，洗脸就免谈了。如果我们在下次给养运来之前断了水，谁也别想活着回去。

夜深了，塔里木的深夜特别静寂，静寂得让人心里发怵。

哦，塔克拉玛干，明天你将怎样迎接我们？

太阳升起了，我们扛着仪器，标杆，水壶和干粮，朝着我们的测绘区中心走去。

太阳一出，沙漠就成了一个大火炉。毒辣辣的阳光像一支支热箭射向大地，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被热箭穿过，烘烤得上下翻腾。热浪汹涌，一浪猛过一浪，而光秃秃的沙包上连个遮荫的地方都没有。

老郭在一个沙包顶上支起了三角架，把测板和水准仪安装在三角架上，我和小谢扛着标杆走向远处的沙梁和洼地。按照老郭手势指挥，我们把标杆竖在指定的位置，让老郭瞄准测定。然后我们扛起标杆，走向下一个位置。老郭根据测出的那几个点的距离和高程，再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目测，在地图上绘出沙梁和洼地的形状和等高线。等到围绕这沙包一周的地图都绘完后，我们再转向下一个沙包。

在沙漠上行走当然比走平路累得多。沙漠可不象海滨沙滩那么舒适浪漫，那是挑选出来的地方，细细的沙又均匀又干净。大沙漠的沙什么颗粒都有，中间还夹杂乱七八糟的植物刺，硷块等。然而更艰难的是走硷滩。硷滩的表皮是一层硬硬的盐碱壳，下面是松松的硷灰。一脚踩下去，上面的碱壳碎了，脚陷入下面的硷灰中，浅的陷到脚踝，深的可陷到膝盖。在硷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那破碎的硷壳边缘把双腿刮出了一条条血道道。硷滩上的一串串黑窟窿，记录着我们走过的踪迹。

在烈日下走不了多久，嗓子就冒开火了，嘴唇干裂，真想喝口水。我们每人带一小壶水，那是管一天的，得省着点喝。我只是到干得撑不住时，才拧开壶盖喝一口，马上心不甘愿地拧上壶盖。第一天中午，我们集中到老郭的沙包上吃午饭时，老郭发现小谢的水壶空了。

“怎么回事？”

“干得受不了，我把水喝完了。”

“唉呀，小谢，怎么把一天的水喝了。。。喝这个，先把午饭吃了。”老郭把自己的水壶递了过去。

小谢不好意思地接过水壶。

老郭告诉我们，在大沙漠中工作，不能轻易把水喝干。一旦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比如失去联络，那点救命水可是至关紧要的。

水呀，生命之泉，你是多么珍贵。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水的珍贵。

那天的气温好象特别高，我又偏偏把水壶留在老郭的沙包上。好不容易坚持到中午，爬上老郭的沙包吃午饭时，我的嗓子火辣辣的，几乎要冒烟了。一上沙包，我就坐下来拧开壶盖，咕嘟咕嘟连喝三大口。喝到第三口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赶紧把嘴里的第三口吐了出来。擦上一根火柴，扔到吐出的液体上，那火柴杆居然窜出了硕大的火苗！

糟糕，我喝了煤油！

原来清早出发时，我不小心拿错了水壶，把煤油壶带了出来。

一旦发现喝错了，我马上恶心得想呕吐，真想把那误喝进去的二口吐出来。要命的是那二口煤油就象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怎么也吐不出来，我心里腻腻的，就像铁扇公主的肠胃让孙悟空搅得倒海翻江，那个难受啊。

“吐不出来的，算了，吃点东西压一压吧。”老郭把他的水壶递了过来。

我把苞谷饼吃了下去，但是那种恶心的感觉始终消除不去。老郭见我憋得难受，对我说：

“你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有小谢干就可以。”

可我死活不答应，

“我没事的，可以工作，不用回去。”

老郭见我执意不走，就说，

“那好，我们把这一片测完了就回去，今天早点收工。”

那天下午的滋味简直难以形容。干渴加上恶心，腻腻的，好象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煤油味。

水啊，水啊，多么希望有一大桶水，让我痛痛快快地喝个够。多么希望我现在就在天山顶上，看一眼皑皑白雪也舒服呀。那天池的水，真干净，真清凉，喝一口吧。呸，怎么一股煤油味？

张开眼睛，我还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丘上，沙丘就象一只大蒸笼，把我蒸得昏昏沉沉。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走完这一片，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回到家里，我就可以躺在帐篷里休息了。在帐篷里，我就可以喝水了。水啊，不是煤油吧。真见鬼，怎么又想起煤油。

终于把这一片测完了，我迷迷糊糊的跟着老郭和小谢往回走。回家途中，我们经过一小片洼地，那洼地底部渗出了一小汪水，那是盐碱水。顾不上了，用它涮一下口，驱除一点煤油味也好。我冲向洼地底部，捧起水就往嘴里倒。真是雪上加霜，那苦涩的味道使我终生难忘。

回到农场以后整整半年，我一闻到煤油味就恶心，那是后话。

（四）

我们在塔里木大沙漠中，还享受了一顿意想不到的丰盛晚餐，你信不信？

那天晚上，小谢在朦胧夜色中回到帐篷，手里捧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小谢把它放到地上，那团黑乎乎的东西爬了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刺猬。小谢真有办法，竟能在大沙漠中逮到这么个东东。刺猬爬得很慢，用手一碰，它就缩成一个大刺球，你越掰它，它缩得越紧。

我们把稀泥巴糊在刺球上，再把这个大泥球扔进火堆中。可怜的刺猬除了缩紧身子以外，没有第二招逃避灾难的方法，它越缩越紧，直到见了阎王。过了一阵子，我们闻到了肉香，把烤干的大泥团从火堆中扒出来。泥块一掰开，就连刺猬皮一起同刺猬肉分开了。把刺猬肉蘸着盐吃，那味道，油油的，嫩嫩的，香香的，热热的，咳，别提了。听说内地的“叫化子鸡”就是用这种方式制作的，真想不到，叫化子竟然有帝王般的享受。

大沙漠可比刺猬厉害多了，我们真的体尝到了为什么它叫“进去出不来”。

那天下午，老郭在沙包上打着手势要我们立即回到他那儿。我们爬上沙包，问老郭怎么回事。老郭一边急急地收拾三角架，一边指着天边一团黄褐色的灰雾说，

“不好，黑风来了。马上回去！”

我还有点半信半疑，有那么厉害么？但是看到老郭那紧张的神色，我不再多言，赶紧帮着收拾。我们下了沙包往回走了不多远，黑风就追上了我们。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我们还来不及准备，刹时天昏地暗，只听见千军万马在耳边呼啸而过，我们三人就失去了联系。

“老郭。。。”，我大声呼喊。

“走！。。。朝家的方向走。。。 ”老郭的声音夹杂在呼啸风声中，隐隐约约象从云缝中飘出。

“小谢。。。 ”

听不见小谢的声音，一切都淹没在狂怒的风声中。

我被裹挟在昏黄的沙雾中，耳边只有呼叫的风声，眼前1米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不能停留在原地，你根本不知道这场大风暴要刮多久，留在遥远的大戈壁中间太危险。必须朝家走，离家越近越好，可是根本看不清路，万一走错方向怎么办？没有其它选择，只有碰运气了，走！

飞扬的黄沙打得脸上又麻又疼，身体被狂风吹得跌跌撞撞，我努力辨认脚下路径的特征，脑子里回忆着早上经过的路途细节，希望能找到匹配的记号。呼号的风声不断地变幻，有时象千军万马在厮杀，有时象号角在怒吼，有时象妖魔在狞笑，有时象妇人在哭泣。耳边不时响起尖叫，

“哈哈。。。停下吧，你走错了路。。。 ”

我不断提醒自己，

“我没走错，相信自己，往前走！”

天地已分不清了，混沌沌沌。整个世界仿佛遁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据说盘古开天地之前，整个世界就是这么混沌沌沌。盘古真的很孤独，我忽然同情起盘古来了。

人的神经最脆弱的环节，并不是生活艰苦，恰恰是孤独。当大沙暴把我和同伴隔绝开以后，正是这种孤独无援的感觉折磨着我的神经。在这种环境下，人最容易恐惧，自疑，软弱，失去信心。在这种环境下，首先要战胜的恰恰是自己。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突然，风小了，眼前一亮，可以看到远处了。我猛然发现老郭正在离我不到5米处行走，小谢在离我20米处的沙丛中行走。原来我们相隔并不远，相互间竟然联系不上。这时，天已快擦黑，我们也快到家了。

(五)

在大沙漠深处呆了将近两个月，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返回大本营。

骆驼来了，我们把东西装好，跟着骆驼沿来路返回。路还是那条路，景还是那道景，然而，来时的那种新奇感神秘感已经不复存在。塔克拉玛干啊，你温柔，你暴躁，你亲昵，你冷酷。你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宝藏，你也有巨大的破坏力和恶劣的环境。希望有一天，人类能驯服你的暴虐脾气，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再次拜访你。

回到了作为大本营的团场，真是又熟悉又陌生。女测量队员们跑了过来，嘻嘻哈哈地跟满脸胡茬的老郭问好并开起玩笑。我和小谢也在帮助整理物品，想到很快要和测量队告别，心里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特别是老郭，这近两个月生死与共的沙漠生活，老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当时我们有强烈的自卑感，总觉得人家是兵团的知识分子，我们是边远农场的农工，差距太大，没有勇气向老郭要一个通讯地址以保持联系。分手以后我们和老郭就再没有联系。

实际上当时兵团测量队勘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任务还没有完结，这次通知我们回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蔓延到了新疆和兵团，兵团测量队要返回兵团学习和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和兵团展开以后，进军塔克拉玛干的计划再没有下文。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塔克拉玛干的命运将是如何？是祸，还是福？

你说呢？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回家的路

得知有人要探亲，平静的心一下子乱了起来，那渴望回家的欲望和未获批假的失望，如同二股涌来的潮流，它们汇合在一起，一浪高一浪低的撞击着我的心怀：“我要回家，我也要回家！别人可以探亲，为什么没有我。不行！我要找他们去。”这想法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加强着，搅得我一整天干活都没心思。

总算等到晚上开完大会，指导员老杨提着个马灯往家走去，他的家就在操场边那排草房的第一间，不远，我赶紧尾随其后。平时我从不喜欢同领导套近乎，总是敬而远之，此时也顾不得了，就在他跨入家门时，叫了一声：“老杨”。只一年多，我的叫声已夹带着云南味。

“哪样”？老杨扭头看着我，语气中带着一点不耐烦。

“我也要探亲，我想回家”。我直率而又哀求地说。

“不行，哪有想回家就回家的”。不容商量的口气，转身后一个高瘦的背影跨进了家门。

“我们会安排的，都回去，谁干活？”进屋后他又回过身来开导我，黑瘦的脸上挂着憨厚的真诚。

我随着进了家门，面对老杨的劝告却不知道说什么。我是想回家，但想回家算什么理由呢？不是理由，什么都不是，连我自己都觉得理不直，气不壮。政策规定二年一次，就是到了二年还要根据队里生产情况安排。现在二年还没到，家里没死人，也没人得急病，那就是没理由，没理由找什么领导呢？谁先谁后当然由领导安排了。

回到茅屋，呆呆地站在床前，心里闷闷的。别人可以走了，此刻，他们一定在高兴地整理行装。明后天，当出工叫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连队，车子呼呼地往北面开去，窗外的世界不断变化。谁也管不了他们，他们如同自由的鸟儿飞向远方的天空。而我呢？我将继续穿着那汗酸味的工作衣裤，脚登蚂蝗袜，抗着锄头爬山、挖地。在这单调寂寞的大山里，面对这一片砍伐过的荒山红土，没完没了的干活。当大雨飘来的时候，我依旧孤独的站着，雨水从斗笠周遍落下，脚下泥泞不堪。

我要回家探我的亲，想想又没碍着别人什么。怎么就象关进牢里一样走不了呢？二年一次，这二年也太长了，一天一天，白天黑夜的还要过多少天哪，想想我都觉得漫长的可怕。

我钻进蚊帐，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股无名的怨气堵在心里，连发泄的理由都找不到。不批，哎，熬吧！怎么办？我又能怎样？难道想翻天不成？你翻不了天，谅你也不敢。算算日子，已经熬过了一年，又大约熬过了200多天，没法，这日子还得过下去。

我呆呆地望着白布蚊帐顶，家，既是那么地亲近，又是那么的遥远-----。

接下来的日子有点难熬了，已经麻木的神经突然被一种希望刺激了一下，然后这希望就挂在那里，诱惑着我，却又够不着。

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漫长的日日夜夜。

那晚在清澈的月光下，领导们的大水烟筒“呼鲁鲁”一圈转下来后，会开完了，顺手也把批我探亲的事定了。

谁说领导不关心群众呢？这不，不是批下来了吗，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个人要服从集体，小局要服从大局。我心存感激。

所有手续一天办完，隔天背着一个军用黄书包，塞了一点洗刷用具。把近二年的积蓄数了数，大约一百多块，这是有生以来个人最大的一笔钱，不知外面情况怎样？藏在内兜里缝好，怕被人偷去。

匆匆的、愉快的、幸福的上路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qz.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客车停在澜沧江大桥前。

澜沧江，一条宽宽的夹在大山之间的江，大桥高高地建在江水之上横跨二岸。远远地我就听到江水“哗哗”的轰鸣声，我从车窗口看到了江水在翻滚着，撞击着向前涌去。

还清楚地记得，来时，几十辆载着我们知青的大客车依次神气地驶过了这座大桥，我们争向好奇地从窗口去目睹这条地图上标有的大江，从高处远远望下看去，大江使我有点失望：二边是山，并不太宽的江水在急急地向前流去。感觉并不雄伟壮阔，不过是一个地理标志，过了这江，就算是跨进了西双版纳。同车的不少知青因此而兴奋起来。大概是那么多天的奔波快到“家”了。

现在，我前后左右已难见一个知青的身影。他们各色身份，不同年龄，目的各异。车厢里气氛是平淡的，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外面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包括这热乎乎的空气，窗外的山及绿色的树。一直生活在被管理，被安排，被表扬和批评的约束中，一直生活在知青群体那种要表现，要上进讲斗争的生活里，这平淡的感觉和氛围令我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有点轻松，又有点空落。

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我不是什么学生什么知青，和他们一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还远不如他们，他们有的在昆明工作，有的在某县城工作，而我只是山沟里的一个农工。我的身份其实从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变了，但我从心里对它却迟迟不愿认可。

一车的人平静地坐在位置上，甚至都不朝外看一下，大江的大桥口，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检查的关口，人们在等待检查。

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从车门上来，枪挂在肩上，神态严肃的把我们全体扫视了一遍。大约想先从眼神里确定一下是否有坏分子或阶级敌人，然后挨个检查通行证。

通行证我有，我不怕，我是真正的良民。那是几页小小的普通印刷的纸，上面有我的名字，下面有红色的图章，货真价实。我象宝贝一样藏着它。我曾多少次想拥有它，拥有它就意味着拥有了探家的权利。现在我确实实

地拥有了，我骄傲而自豪地把它交到当兵的手里。我甚至觉得，如果他不检查的话，那倒是一种遗憾，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在关键时怎能不派点用场呢。



白天，客车翻山越岭，左拐右弯。驾驶员手握方向盘不停地扳来扳去，我们也跟着左右晃动，时不时屁股还要腾空跳一下。当客车驶入一块平坝地的时候，基本上是中午吃饭时间或傍晚休息时间了。

平坝地一般是小县城，如果是中午吃了饭就走。而傍晚则车子入库，驾驶员自己喝酒吃肉去了。我们记好车牌号各自找旅馆饭店。

这山区里的小县城实在小的可怜，一般也就是百来米长的一条街，二旁排列着一二层的砖房。旅馆往往仅此一家，先是登记，付钱的时候记得是五角，觉得太贵，想不通。不就是借张床睡一觉吗？又没损失什么，怎么竟要这么多钱。我大太阳下汗流夹背的干一天也就约9毛钱，睡一觉要花5毛，吃顿饭又是3毛（一碗饭，一小盘菜），那么就剩1毛了，还有二顿饭没吃？其它呢？

“快点，快点”见我磨磨蹭蹭地窗口里传来催促的声音。

赶紧卑恭地掏钱领了收据找到自己房间。

房间里放着四张床，挂着四顶已呈灰色的纱布蚊帐。捞开蚊帐，闻到一股怪怪的人体味，床单被子也不知多久没换洗。脏就脏吧，对我来说也无所谓，自己的床单被子在农场近二年也就洗过一次，干净不到哪儿去。盥洗室是几排房子合用一个，黑黄色的水泥台板上安装着一个个水龙头。洗脸相对方便，弯腰用毛巾掬一把就可以了。洗脚则是把腿翘起搁到水泥板上，打开水龙头，再弯腰用手洗。那时年轻，现在绝对做不了这个动作。

吃了晚饭后，看看时间还早无聊的很，于是跑到街上随便逛逛。听人说，前面一个什么单位在放电影，果然没走多远就看到露天扯着的一块白幕布。电影已经开始，但幕前怎么也找不到能够挤下我的位置。于是跑到幕后，幕后已有不少人，倒也看的清楚，就是图象反的有点不习惯，就这么站着莫名奇妙地看了一会也不知放的是什么内容。

晚上上床躺下，见蚊帐白布上有钢笔写下的二行字，好奇，仔细一看：“与上海姑娘同床与帐内……”“混帐！”白布上又多了一个正人君子留下的二个钢笔字。

软不拉几的挺不好写。

车子又上山下山跑了一天，晚上停在一个叫“墨江”的地方，墨江有没有江没关心过，也没见过。但墨江确实是在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抹黑。

饭馆里外站立着不少衣衫萎烂的人，衣裤的颜色基本上是黑色的，脸上也是憔悴的黑黄色。我买了一份饭菜，盛饭的碗不是白瓷的，而是黑红色的瓷，如水缸材料。我不免一惊。打我记事，还第一次见到这种碗。饭的上面放了一块金黄色的糕，是用包谷粉（玉米）蒸出来的，样子挺诱人并有一股香甜味。现在人要吃杂粮，那时粮食紧张，计划供应，这杂粮是强行替换进来的。

我在吃饭，饥民们站立在我不远的地方，直直地看着我的饭菜。我立刻想到小时候（60年代初）在上海见到的灾民，他们采用的手法是往你的饭菜里吐唾沫，于是你嫌脏放弃，他们就冲上来狼吞虎咽。我猜想他们或许会采用相同的手法，结果没有，他们可怜又老实。我心里想吃那金黄色的糕，在农场从未吃过，再说还有一种特别的香甜味吸引我，但我还是把它留下，立刻被抢走了。

离开饭馆，不时有人悄悄地要拿布票同我换粮票，一打听，感觉极合算。想想可以理解，那些穷苦的乡民连饭都吃不饱，这布票如同废纸一张，如能换一点也好。于是象作贼一样，躲开那恶神一般的纠察，悄悄地换了一点。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客车高高的位子上，望着窗外被纠察趋赶的小贩和远远站立的饥民，自我感觉一下子好了许多。肚子已经填饱，兜里还藏有钱，不用为吃饭发愁，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差距。这差距使我昨天表现的象一个财主，我是多么神气而又潇洒地把一块金黄色的糕随手一扔，俯视地看着饥民们抢过后往嘴里塞。



1

离开连队的第五天下午，客车驶进了昆明。

昆明，一股熟悉的城市气味扑面而来。在大山里待了近二年，城市渐渐离我远去。但城市始终在我的心底隐藏着。现在，它又活了，它蠢蠢欲动，它在撞击我的心怀。

我的脚重又踏上了城市的柏油马路，路是那么的平坦，坚实。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的。近二年来，我在没路的地方踩出路；茅草割破我的皮肤，古藤拉扯着我的脚。雨季天，那上山下山的小路是那么地泥泞、溜滑，稍不在意就会摔上一跤。于是我学会赤脚把五个脚丫勾起，脚横过来，弯腰降低身体的中心，小心地慢慢下山。进出连队的道路常在雨季天被塌方的淤泥淹没，有几次走过时淤泥漫到了我的大腿，我在泥中艰难地移动。

现在，我的双脚带着我的身体毫无阻力地重又融进了城市的人流和车流之中。我原本就是城市的一员。

我找到一家旅馆先安顿下来，然后还要去打听火车站的方向，也不知票有没有？卖到了哪一天？

他妈的，旅馆收费每天竟要我差不多一天的工资，真心疼，没法。

2

迷糊中闻到了一股臭味，睁开眼：这是哪儿？紧靠眼前是一大块东西挡住我的视线？好一会才想起，是火车长排座位的底面。而上面是他们的屁股，边上是他们一根根的小腿。空间狭小感觉如同被挤压在一个小木盒里，地板下车轮和铁轨的接头发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躺在车厢的地板上我已经睡了一觉。

我扭头，见一个高脚痰盂就靠在我的头前。如此近距离的看它，觉得它的体积庞大了许多。臭味就从这里传出。

痰盂是一个带小孩妇女的，小孩在火车上用厕所不方便，于是随身带上了它。用完后，顺手往座位下一塞，紧靠在我的头边。

我很累，坐在位置上身体二天没有放平过，终于忍不住钻到了座位底下，伸展四肢，太舒服了。那种感觉就如同一泡尿憋了太长时间，找啊找，终于找到厕所，于是一泻而快。

不管它，让它臭吧，反正下了火车谁也不认得谁。我不在乎，臭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多少次劳动休息时，我随意躺在杂草地上，蚂蚁小虫在我身上乱爬，起来拍一下又干活了。现在也就是有点气味，加上脚的臭味，它们混合在一起也赶不走我躺下的欲望。我要继续享受身体被放平的舒适感觉。

3

大概在离开连队的第八天，火车“咯切、咯切”地爬到了杭州。到了杭州我感觉就象一只脚跨进了上海，繁华慢慢地显露出来，月台上的推车里食物也丰富多了。车厢里上海话不断地飘来，就是浙江一带的语音也带着家乡话的味道。空气是湿润的，是低海拔地带江南水乡的那股气息。什么叫故乡？故乡就是那些人，那语音，那空气里包含着的气息。从车窗放眼望去，一片片平展展的农田，山在远远的地方，或者根本就不见山。我朝夕相伴的大山已离我而去。一切的一切意味着：我，就要到家了！

农场已远离我而去，似乎远到了无穷无尽的远方，我不想它，不愿想它，也不敢想它。一切似乎是做了一场梦。

快到家了，不知怎么我并不兴奋，远不如我得到通知可以探亲的那一段时间。

我已经探亲了，这是眼前的事实，事实不过如此。

我就要到家了，这是我的家吗？又是又不是。那里没有我的户口，没有我的工作，我去除了增加他们的负担外，又能带给他们什么呢？那是一个不容我立身安命的地方。我的家在哪里？我还有家吗？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有点似夹着尾巴的丧家之犬，又一次夹着尾巴回来了。

阴沉沉的乌云，阴沉沉的天。阴沉沉的天下面，一张张阴沉沉的脸。

一个庞然大物，一群摇着尾巴献殷勤的巴儿狗，一瓶腥红色的浆液，瓶上标着：

“阶-级-斗-争”。

喝上了浆液的人们，浑身躁动，脸色古怪，灵魂在躯体内挣扎着，扭曲着，拧成了一团奇形怪状。于是，善良的，友爱的人性被压抑了，亲切的，和蔼的，纯朴的笑容不见了。人们有的两眼闪着绿光，恶狠狠地对望，象一群饿狼，随时准备扑上去撕裂对方的喉管。有的惊恐萎缩，象霜打的茄子，象过街的耗子，嘴里念念有词：“我有罪。。。我该死。。。”。有的竖起耳朵，闻着，嗅着，不怀好意的眼光四处打探，想发现什么向主子报功。有的小心翼翼，闻风色变，躲避一切是非，只要不斗到自己，别人是死是活都管不着了。

一头鹿被牵出来了，长长的鹿角晃动着，似乎要想挣脱拴在脖子上的绳子。

“这是一匹马。”怪物哼哼一声。

“是马，是马，。。。您说得太好了，太对了！”巴儿狗们哄叫着，一片噪杂。

人们走来，低垂着脑袋，竭力不对鹿看一眼。“。。。对，是。。。马。”他们低声说道，走过去了。

有人忍不住了：“它是鹿呀。”巴儿狗们一拥而上，“啊哈，又揪出一个！”他被推着，揉着，“呀。。。 ”一声惨叫，空中一股焦油味，他的身上被烙上了一个烙印。

突然，我远远地看到，爸爸被推到了鹿跟前。他瞧了瞧鹿，不吭气。

“说吧，它是什么？。。。说错了也不要紧，言者无罪嘛。”巴儿狗堆出笑容，掐细了嗓子。

沉默。

“你说不说？。。。不说别想过去！”巴儿狗恼羞成怒了。

还是沉默。

建筑物内一阵喧哗，几个烙上烙印的人在绝望地跑，渐渐精疲力竭，有一个终于倒在地上。巴儿狗们拥上，拳

打脚踢，喊叫撕咬。鲜血流出来，他死了。四周的看台上，响起一阵狂笑。。。

爸爸突然张开嘴，他说话了，声音很轻，但很坚实：

“你们。。。不能这样，他们。。。也是人。。。 ” “抓住一个漏网的。。。他同情右派！。。。把他补上！。。。 ” 一阵噪杂，爸爸被拖走了。

“不！。。。。。” 我高叫着，要冲过去把爸爸拖回来。

一切都是徒劳的。人群闹哄哄的，我的声音被淹没了。人们挤来挤去，我根本冲不过这厚厚的人障。远远地望见，爸爸挣扎着，还是被烙上了烙印。

这是1958年，爸爸被补划右派。

五十四中学的操场上，新同学们整整齐齐坐成一个方阵。这是我进入五十四中学的第一堂政治课。校党总支书记站在台上讲形势，激动得声嘶力竭，“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了，不但你们能看到，我也能看到！”刚进中学，第一个月基本没上课。一连串的新鲜事，大街小巷到处搜寻废钢铁，为大炼钢铁出力。学校里还建起小高炉，把砸碎的铁锅，锯断的铁栏杆炼成一块块铁疙瘩。爬到房顶上，敲着脸盆大喊大叫，为的是吓破“四害”之一的麻雀的胆，让它累倒在地上死掉。访问新成立的虹桥人民公社，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一人一大碗共产主义大锅饭。

刚进中学，同学们互相还不认识。老师从成绩好，表现好的同学中挑选几个，指定为班干部，我当了中队委员。男女同学按个子排成两排，然后分别按高低排座位，每张课桌安排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每一列课桌后的同学算是一个少先队小队。

据说，开学不到两个星期时，班里有两个同学在教室里打赌。一个同学说他什么都敢做，另一个同学不相信。你那么厉害，敢写XXXXX吗？那个同学真的写了。

到底写了什么，在哪里写的，我直到现在都不清楚，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而且写过马上就擦掉了。反正这事让学校知道了。一天，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一位军官太太）板着脸走进教室，突然宣布这个写标语同学所在小队的男同学统统为“反动小集团”，把他们揪出来。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很不幸，我恰好坐在这一列课桌后面。

为什麼？

我们刚进中学还不到一个月，互相之间原先不认识，现在也不熟悉呀！何况写标语的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什麼事？

我们什麼坏事也没干，什麼事也不知道！

一共只有一次“有组织”的小队会，讨论小队活动。女同学提出要跳橡皮筋，男同学提出要踢足球。

难道就为这？

什麼也不为。因为全党要抓阶级斗争，学校必须做出点成绩向上表功。

什麼也不为。因为这个小队的男同学恰好出身都有点问题，最好的也是小业主，这些人怎么宰割都行。

没有证据呀！

唉，那个年头，有没有证据是无关紧要的！

连续一个多星期，上学挨批斗，先是班里批，然后全校批，放学留下来写检查。

我的中队委员被撤销，少先队籍被停止（长大后我才知道，“停止队籍”是他们发明的。少先队章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处分”）。

已经晚上7点多了，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什麼交代也写不出。我什麼也不知道，写什麼？从小以来，我一直是好学生，一直在表扬声中长大，做梦也想不到这突如其来的罪名。那位高唱共产主义的党总支书记，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食堂打来的晚饭。我看着那书记一口一口把晚饭吞下食道，听着他鼻子和喉咙里发出的哼哼哈哈声音，自己的肠胃也不由地咕噜咕噜叫起来。共产主义书记吃完饭，看到我的检查还是白纸一张，把脸一板：

“老老实实写检查，不写好不许回家！”他交代一位老师，“好好启发启发他。”打个饱嗝，自己走了。

老师开始开导了。

“你想想你是什麼呀？”“少先队员。”“少先队员应该怎么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做得怎么样？”“都很好啊。”“那你还是什麼？”“中队委员。”“中队委员要帮助同学，光自己好不行。你做得怎么样？”我把头低下了。“好多同学我还不认识。。。 ”“那就是了。写吧，这就是你的不足了。”老师完成了任务，松了一口气。

我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检查是这么写的：

“我是中队委员，对同学关心帮助不够，好些同学还不认识，有的还没有讲过话。。。 ”这样的检查如何报上去作为“反动小集团”的证据，就不得而知。

那时我刚满11岁，进入中学还不到两个月。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么？

我幼小的心灵是不会知道的，在神州大地，这类荒唐的冤案比比皆是，何止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但是，有多少发生在刚满11岁的小孩身上呢？

过了一个多月，又是那位大队辅导员，突然走进教室宣布撤销处分。我的少先队籍又恢复了，还是当班里的中队委员。理由呢？是我表现很好，改正错误了。他们是没有错的。而且，事情算过去了，从今以后，这事就不用再提了。这样的“处分”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然而，发生过就是发生过。我根本就没有错，怎么能说改正错误了？从小以来，家里就教育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人，错了就要承认错误。老师不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吗？毛主席不也是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的么？我执着地要求学校向我们公开道歉，承认错误。

太天真了！如果当权者能够知错认错，那中国早就不是这模样。

从初一，到初二，再到初三，我年年还是被同学们选为班干部。尊师守纪，勤奋学习，还是令老师们赞赏。可一提到这冤案，老师们一个个摇头。

“算了，不要去想它。”“算了，过去的事就算了。”“忘了它吧，只当没有发生。”可我无法忘怀，无法忘记被莫名其妙扣上罪名批斗的羞辱。也许，我从小以来受到的表扬太多了。也许，父母对我的教育太完美，太书呆子气了。也许。。

我所期望的公开道歉，永远也实现不了。学校不认帐了。

什麼处分？我们不知道，没有的事。

公开道歉？没门！

为什麼睁眼说假话？为什麼没人出来讲公道话？为什么做错了事不敢承认？

为什麼随意整人？为什麼。。

从小长大，我第一次遇到了一系列无法理解的难题。父母的教诲，老师的教导，报纸上，书本上，广播中，电影里，我所接受的一切道德伦理教育都无法给出答案。

真理在哪儿？

龙门楼，迎着朝阳，耸立在绿荫中。

先棉堂，披着晚霞，端坐在草坪上。

这是有近100年校史的上海中学。先棉堂取名于民间传说中纺织业先驱黄道婆的织房，龙门楼则纪念上中的前身满清时代的龙门书院。

上中是上海有名的常青藤学校之一，我报考时只收高中，后来开始收初中。每年，上中从上海市各区招收300名学生，从郊区各县招收100名学生，每50名组成一班，每届8个班。学生一律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学校内有商店，电影院，食堂，澡堂，俨然象一个独立王国。

上中有不少很有水准的老教师，据说去大学教书也绰绰有余。上中的学生来自市区和郊区各校的尖子，聚集在这儿再次较量，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我考入上中那一年，学校从400名学生中挑出50名外语好的，成立一个“高级班”，单独培养。我进入了高级班。

说来也巧，班里有将近十个高干子弟（局级，少将级以上干部子弟）。这些高干子弟，和我在五十四中学看到的吃喝玩乐八旗子弟大不相同。他们勤奋，肯吃苦，学习很认真。同时，他们又有很强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中的一部分，待人比较平和。另一部分则不一样。他们觉得，自己能进入上中，又进入高级班，将来的中国理所当然要由他们管理，因此在高中期间，他们已经在认真考虑未来治理国家的策略。记得当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权和美国对着干，学校还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他们却评论卡斯特罗充其量只能算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离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差得远。这使我十分敬佩，哇，这么高深的国家大事我可从来也没想过，他们的思想觉悟一定高得了不得！

这个班入学时就有好一些同学是团员，因为我初中的班上没有一个团员，加上我的年纪一直是班上最小的，对这些团员自然非常崇拜。他们一定思想觉悟非常高才会入团的。好极了，我不是一直觉得书本上讲的和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对不上吗？我不是一直想弄清什么是真理么？正好向这些团员请教。

我真诚地找这些团员谈心，告诉他们我心里想不通的疑惑，还告诉他们我在刚上初中时莫名其妙地受少先

队“处分”，学校又匆匆撤销处分，一直到初三都不肯公开认错的事。我期盼这些团员会热心地指导我，告诉我答案，我甚至朦朦胧胧地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思想觉悟也会提高到团员的程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谁想到，我又犯了一个大忌，团员是永远不会说组织和领导不对的，哪怕他们心里清楚。这些团员只会一味地指责我，说组织是永远不会错的，肯定是我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要我深刻检查自己。我的疑惑不但没有解开，反而更糊涂了。

唉，书本上电影中那些热情帮助别人的共青团员都跑哪里去了？

从高二起，班里的团支部被个别高干子弟控制。他们在班里大搞阶级斗争，实行红色恐怖。开始时，班里同学们还是比较团结的，慢慢地，这些高干子弟在革命词藻罩盖下的弊病开始暴露出来。他们有浓厚的“自来红”，在班里制造等级差别。革干子弟要继承父辈的革命传统，当好革命接班人。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地主资本家复辟阴谋。黑五类子弟必须检举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背叛家庭，投向革命阵营。同学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理所当然的是他们的统治属下，因此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始终是居高临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其次，他们评价同学表现的好坏不看他怎么做的，只听他怎么说的，喜欢听顺耳话，漂亮话，恭维话。平民子弟为了入团，不得不依附他们。一时班里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成风。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思想才能入团。这成了他们控制同学，背地整人的看家宝。本分的同学则人人自危，明哲保身。

从小一直是好学生，一直要求进步的我，当然也努力争取入团。可是，我把努力放在了行上，却没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的言。更可悲的是，我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怎么讲，和班里的假大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记得高三毕业前，团支部在班里开了一个讨论会，要求大家谈一谈学习董家耕，张韧的体会。董家耕，张韧是当时报纸上宣扬的放弃上大学直接去农村的标兵，我们班里的左王们正在营造只有不报考大学直接去农村才算革命派的气氛，当然他们自己是不包括在内的。

讨论会的气氛异常紧张。

沉默，久久的沉默，教室里静得连掉根针都听得见。

那个把高干子弟不吭气，我们是革命接班人，要考虑的是今后如何掌管好这个国家的大事。能不能放弃考大学直接去农村是团组织对你们平民子弟的考验，你们的思想觉悟怎么这么差劲呐，连个带头的都没有。

那些平时夸夸其谈，经常靠拢组织汇报情况的积极分子，都成了哑巴。说说漂亮话，唱唱高调他们不甘落后，但要让他们实打实真的干，绝对不会干的。那些不唱高调认认真复习准备高考的同学，也没有一个发言。你们积极分子平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现在怎么没动静了？凭什么要我们放弃高考？

沉默，沉默中大家紧张地对视，等待着哪个猎物落入陷阱。

世界上还真有傻瓜，我打破了这种心怀鬼胎的僵局，谈了自己的看法，“董家耕，张韧的举动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复习应考，以优异成绩让祖国挑选也没有错。如果大家都不参加高考，那祖国怎么挑选？如果最优秀的学生必须去农村，为什么不让高中毕业生考农村，考不取农村的才上大学呢？”啊哈，猎物来了！这些夸夸其谈的积极分子来了精神，争先恐后地发言。一顶顶大帽子压上来，什么对党的号召认识不足呀，学习目的不端正呀，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呀，唯恐天下不乱。

奇怪，你们平时连班级工作都不愿做，生怕占了你们复习时间影响自己高考成绩，你们明明比谁都想考上大学，怎么不敢说实话？怎么现在话倒过来说了？

奇怪，如果你们认为我的看法是错的，为什么不说说什么看法是对的，你们自己打算怎么办？说呀！

有趣的是，这些积极分子只敢批评别人这儿错那儿错，没有一个敢说出自己心里认为什么是对的，更不敢表态自己的打算。

讨论会圆满结束，这些积极分子心满意足地松了一口气。一来通过批判别人表现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二来可以逃脱无法表态的难堪，一箭双雕！

那个年头，言行一致的人多半没有好下场，谁叫你看不穿呢？

假大空万岁！那个年头，要想活得好一点，不这么做不行，实在迫不得已。

糟糕的是，上中的教育体制，还是那些高干子弟耿耿于怀的“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出题，打分十分严格，一视同仁，不留情面。要是教育体制早一点改革成他们喜欢的“无产阶级”体制，规定高干子弟的成绩至少80分，平民子弟的成绩最多80分，或者取消考试，由党委推荐成绩，那么，我后来遭受的苦难，也许要少得多。可惜，这样的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实现，而我早已成了老运动员。

当时，戴着红领巾上高中的我，太单纯了。我只知道尊师守纪，努力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却不知道人间还有妒忌和阴谋。高中期间，我年年都是班干部，也是班里唯一达到三好学生标准的学生。三好学生在上中是个很高的荣誉，要求很严，当时平均每两个班才有一个学生达到三好学生标准。

这样崇高的荣誉居然没轮到那些要想掌管国家大印的八旗子弟！

“只要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记不清是哪位政治家的名言。

大量的班级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连一部分晚自习时间也搭进了。他们还嫌不够，要我再多做些。

“我做的班级工作量已经多得不合理了，为什么还要压任务？”“这是团组织对你的考验，你学习好，多做些是应该的嘛。”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光考验我一个人呢？

我终于适应了这种状况，学习效率大概是这个阶段逼出来的。尽管自习时间远少于其它同学，学习成绩居然没掉下来。

这一招不管用，更糟糕的是，我在德，智，体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很难挑得出毛病。

只有从我的家庭出身下手。

他们一口咬定我和家庭划不清界限，轮番找我谈心，要我揭发父亲在家里的反动言行。我确实认真想过，父亲在家里究竟有没有反动言行。可惜父亲在家里比谁都革命，比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除了“相信党，相信组织”之类的革命言辞以外，再也没有其它的话。我实在不知道班里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入团，揭发自己父母如何反动的发言，究竟是编出来的还是真的。反正我不能讲假话，看不出就是看不出。我也曾真正苦恼过，为什么我的阶级觉悟老是上不去，我就察觉不到父亲一点反动言行呢？

苦恼也没用，阶级觉悟低，就认了呗。入不了团，就当革命群众吧。

这哪够？我只有彻底上不了大学，这个把高干子弟才放心。他们又轮番找我谈心，压我表态放弃考大学，直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我表示如果考不上大学，我一定会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建设兵团去。

这话等于白说。“你怎么会考不上大学？你想上哪所大学就可以上哪所。”“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就在于你考不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再去新疆，那就不是真革命。”这我就弄不懂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要高考让祖国挑选？干脆倒过来让大家考农村边疆，考不上农村的才上大学，这才对呀！况且班里的八旗子弟拼命复习，根本就不想去农村边疆（按他们的定义，就是反革命了）。你们可以当反革命，为什么我连假革命都不能当？

我不得不向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挑战。

“只要你们不考大学，我也不考。不管你们去哪儿农村边疆，我也去哪儿！”这下可好，这些团员再也不来找我“谈心”了。

高三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中的一天，忽然上中的团委书记邬某通知我到一个班中的高干子弟家，说有事要找我谈一谈。会有什么事呢？虽然这邬某喜欢和我们班几个高干子女来往，可对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

莫不是。。。要发展我。。。入团？

哪里可能，做梦娶媳妇吧。但我总认为会是件好事，也许团组织要交给我一件什么任务？带着一点朦胧的欣喜，来到了这位同学家。

邬某阴冷的神态大大出乎我的意外。

“我找你来，是要跟你算一笔帐，这笔帐早就应该跟你算了，今天，要把这笔帐跟你算算清！”我一头雾水，这邬某吃了什么药？我招了谁惹了谁了？凭什么这么平白无故地恶狠狠训斥我？

邬某活象在演戏，这出戏与其说是演给我看的，倒不如说是演给坐在一旁的那位高干子女看的。邬某用夸张的语调，要我老老实实交代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动言行，交代自己在家里干过什么坏事。

简直莫名其妙！我在家里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好事倒干了不少。那时我在家悄悄学雷锋，经常去建筑工地义务劳动，马路上帮助推三轮车，看到修下水道也会主动跳下去帮忙，这也是为将来的上山下乡作体能上的准备。这些我从来没在班里讲过，即使现在邬某叫我老老实实交代我也不会讲这些表白自己，因为我讨厌当时流行的那种干了一点好事，就马上公布自己写下的干好事日记，再把前前后后的思想斗争大吹一通的作风。

邬某演的这场戏的背景，在我离开上中多年以后，才露出冰山一角。

就在这个寒假，不知为什么，邬某跑到我父亲工作单位（上海戏剧学院）去调查父亲资料。说白了，父亲是脱帽右派，这已是人所皆知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再调查也没有多大油水。神奇的是邬某带回了父亲所在系党支部书记孔某写的以邻居身份揭发我在家中表现的揭发材料。

奇怪，孔某怎么能写我的材料？究竟是邬某异想天开提出要他写我的材料，还是孔某主动提出要写我的揭发材料，这个谜恐怕只有他们俩才能解开。

我和孔某从无往来。我只有周末回家，不是去图书馆，就是去建筑工地义务劳动，很少呆在家。他既不是和我一个单位，又对我根本不了解，凭什么揭发我？周末回家，偶尔碰见孔某，我总是礼貌地打个招呼。孔某当着我父母面，总是对我赞不绝口，什么德智体全面发展优秀生啦，有出息，了不起啦。就算他夸我是嘴上说说而已，谁能想到他会写我诬告材料？

真是人心叵测！

这孔某是50年代对高校“掺砂子”由天明糖果厂调到上海戏剧学院作党政工作的，喜欢的口头禅是“无毒不丈夫”。我上高中时，他提出老婆要生孩子，住房太挤，要我家借他一间房。父母把最大一间房腾出来给他。高二暑假时，他又向我父亲提出，要我帮他小舅子补十天课。他小舅子要考高中，功课跟不上。父亲哪敢不答应。

我费了最大的劲帮他小舅子补了十天课。天哪！他小舅子的功课不是一般的差，天知道他怎么能升到初三，连初一的题都不会！

结局还用问吗？他落榜了。

更糟糕的是，一旦考不上，里弄的大娘大嫂就天天敲锣打鼓上门动员你报名去新疆，真讨厌！他小舅子哪会上这个当，死也不会去的。于是赶紧躲到孔某这里避风，孔某正天天托门路，拉关系，为小舅子找工作。烦哪！

也许是命中注定要倒霉，我周末回家，正好碰见他小舅子。

“你好，考上高中了吗？”“没有。”“不要紧，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一样有光明的前途。”这真是我内心发出的鼓励他的话，没有一点恶意。我自己正是这样作思想准备的。我哪知道，这脱口而出的“到新疆去”四个字，比皮鞭抽在孔某身上还疼！

那一天，孔某脸色铁青，我父母吓坏了，问我说了些什么，我想来想去只有这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

这句话有错么？报上不是这样讲的吗？你孔某做别人思想工作时不也是讲这些话么？

孔某为我这句话很不高兴是事实。然而，孔某诬告我的原因究竟仅仅为发泄自己的恶气，还是他的哪一位上级跟我父亲有什么恩恩怨怨，非要把我们无辜的下一代的前程彻底摧毁才高兴，还是两者都有，只有等他自己良心坦白了。显然，他这种举动远远超越了当时一般思想左的人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没有不可告人的私心。

毕竟孔某和我毫无接触，他只能空对空杜撰一些罪名。什么“从小接受资产阶级印象派（一种发源欧洲的美术流派）的影响”，“学习目的不端正”，“一心想上大学”，甚至连“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决赛，家里大摆宴席”之类无中生有的事也出来了（我考完就直接回校，根本没回家吃饭）。这些“罪名”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当时足够让我入不了团。

按正常程序，我不是团员，团委的最大权力就是不让我入团。这恐怕不足以阻止我上大学，邬某必须通过非正常途径整我来讨好那个把八旗子弟。

这就奇怪了，一个堂堂团委书记，怎么要听学生的指挥？这奥妙就在于一个八旗子弟的母亲正是上海市教委办付主任，邬某正频频出入这个同学的家，用超乎寻常的左来显示自己的革命觉悟，希望博得教委办付主任的好感。

至今这还是个谜，邬某通过什么途径，居然能拿到我的档案，并在班主任对我的毕业鉴定下面，悄悄加上了两行字：

“在学校表现较好，在家里表现极坏。”“资产阶级苗子。”再把孔某写的诬告材料，附在毕业鉴定后面。

过了十八年，上中新领导宣布撤销和销毁我档案中邬某和孔某写的一切诬告材料以后，我又去探望了母校。熟悉的龙门楼和先棉堂还座落在那儿，进进出出的学生却完全不认识了。上中的门卫让我填一张会客单，问我要找谁。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当年邬某恶狠狠的声音：“这笔帐早就应该跟你算了，今天，要把这笔帐跟你算算清！”是呀，这笔帐是该向邬某算算清了。找他算帐去？不必要了。和文革十年中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同胞相比，与国家和民族遭受的苦难相比，我受的这点冤屈是小巫见大巫。何况我国的政策是从来不会惩处这些弄潮儿的（附录）。我相信邬某现在会在上海的某个角落一本正经地大谈改革开放，闭口不提自己当年左得可怕迫害别人的历史。大言不惭本来就是弄潮儿的共同特点。如果他的心底还有一点良心的话，不要再残害下一代，多少为人民做点好事就谢天谢地。

我在会客单上填上了当年我们高三的班主任。十八年过去，班主任明显老了，受尽沧桑的我就更不用说了。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并告诉我，这么多年，他每教一个班级，都会回忆起我，并告诉班里学生，当年有一个优秀学生，无缘无故被毁了。

真可惜！

当我告诉班主任这桩冤案的真实背景时，他惊讶得无法合上嘴。

“当时班里同学的毕业鉴定，都是我写的。你的毕业鉴定，我每句都写得非常好，一句一般的评语都没有啊！”一句“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的真诚的话，就把一个三好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苗子。

那时我才16岁。

平心而论，当时社会上还有不少好心人，党政干部中也有为人正派，作风廉洁的。不少同龄人回忆他们有个幸福温馨的童年和青少年，我相信他们说的也是真的。真羡慕他们的好福气，怎么我就很难遇到这些好心人呢？如果仅仅是我的命不好，这些卑鄙肮脏的人和事恰好都盯上了我，那算我倒霉。这些恩恩怨怨只能算个人的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只有多烧几柱香，求菩萨多保佑。

问题的焦点是，倒霉的远不止我一个。

为什么这些坏家伙可以有恃无恐？为什么没有一套有效的机制惩罚坏家伙，保护老百姓？更糟糕的是，为什么正直善良的人很少受到重用，而一步步青云直上的人中间，很大一部分恰恰是这些坏家伙？

其实，除了极少数人以外，这些干坏事的人内心深处，恐怕多多少少也有善良的一面。就拿这个写我诬告材料的孔某来说，也没有“毒”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地步。文革初期，他也受了冲击。当造反派要他交代干过什么

坏事时，他脱口而出：

“我背地里写了XXX儿子的不实材料。”没有他这句脱口而出的心里话，我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后来被北大除名的真正原因，会出自这个从无直接来往，见面客客气气打个招呼的邻居。

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恰恰是鼓励和怂恿人性中卑劣的一面。于是，正不压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变成了鬼。真可怕。

什么时候，再能够把鬼变成人呢？

还记得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话吗？

“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

附录：

1977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1978年后，本文写到的受难者们都陆续得到了“平反”。这时候，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法院控告一个1966年时的成年人制造伪证煽动学生造成了卞仲耘被害。1981年，王晶尧收到了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这一案子被拒绝，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但是，实际上王晶尧根本不可能在死亡发生的当时提出控告。在“文革”期间，“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假如王晶尧在那时控告，他自己也会变成“现行反革命份子”遭到严重惩罚。王晶尧不服，多方上书，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2月1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3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支持北京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说：“1966年6月21、22日师大女附中批斗校领导时，学生对卞仲耘同志的武斗行为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的结果”，“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作法所为”，而不是卞的丈夫控告的那个人的罪。

摘自《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作者：王友琴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真的是灵，一带上阶级斗争眼镜，看到的世界就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捕食场，人性就变成了冷酷凶狠的狼性。

当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刚考入上中时一群天真的要求上进的少年，一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同学，不到三年时间就会把其中的一部分当作落后份子甚至阶级敌人批判斗争，残酷打击。必须背后打小报告，把对你很友好的同学打翻在地才能表现出你的进步。如果你不先打倒他，他就有可能打倒你。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这么残忍，甚至不谙世故的中学生都不能幸免？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可不是吗？

就在班里同学正在争分夺秒复习，迎接高考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时间花在帮助几位班里学习最吃力的同学补课。我是班级学习委员，希望全班高考满堂红（后来果然如此）。可怜的资产阶级苗子还蒙在鼓里呢！

一切都是背着你进行的，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十五年后幸亏“四人帮”垮台才平反。老百姓没有权力申述，申张正义，更助长了党政人物为非作歹。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这就是那个专制的年代！如今有一些听信某些宣传而仰慕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你们真想过过这种生活吗？

当然，对有野心的八旗子弟而言，那个年代却是可以任意宰割他人而不必有所顾忌的年代。没有法纪束缚，没有群众监督。过瘾哪！留恋哪！

当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为什么班里那个把以左自居的高干子女专门盯住我一个人？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呀。如果这是出于他们本能的对出身不好子弟的蔑视，那班里还有其它出身不好的仅仅埋头学习，不参与班级工作甚至不争取入团的同学，为什么他们并不介意这些黑五类同学，偏偏要打击一个迫切要求进步，做了大量班级工作，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同学呢？

多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看到和听到一些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象北京男四中，一零一中学，那些八旗子弟整班里出身有问题同学的故事。发现这些八旗子弟说的话做的事，和我们班的个把高干子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附录1，2），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年有多么傻，我挨整不是偶然的。

还在高一，他们定了一个三年学习计划，立志在三年内超过我。他们的确努力了，学习成绩也进步了。但是，

目标没有达到。到了高三，他们意识到单靠个人努力是不可能超越我了。我仿佛成了他们今后攀登国家权力高峰的一块挡路石。

怎么可能？我学习再好也不会挡了他们的路。我虽然单纯，幼稚，但很清楚自己血统不行，绝对不敢有向上爬之类非份之想法。要是我早知道这些，我一定会在每次考试中故意做错两道题，让自己的成绩落在他们后面。可惜，当时我完全不知情。

15年以后，一位高中老同学才把内情告诉我。

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谁叫你那么突出？教训呀！

直到18年以后，一位当年的老同学才告诉我，团支部在背地里收集我的黑材料。

他们要他揭发，我平时究竟有过什么错误言行。并且威胁他说，不能把这些告诉我，一旦说出来，就别想上大学。他估计我肯定考不上大学了。

“这是为什么？”“唉，。。。妒忌啊！”高考发通知那天，全班又集合在一起。

那几个八旗子弟，踌躇满志地过来了。有了孔某的诬告材料和邬某的黑评语，这回该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就象被3K党抓住的黑奴，一把阶级斗争的大火，将把我和十字架一起送上西天。

“这三年，你这个右派子女够神气的，简直要骑到我们头上了。哼！等一会儿，。。。，有好戏看喽！”一群知道点内情的同学来了。他们十分勉强地朝我笑了笑，用怜悯的眼光看了看我，就象看一位被确诊为晚期癌症的病人。他们不敢想象，过一会儿该怎么面对这个直到高考前，还在忙忙碌碌为同学们辅导，为大家出学习园地的学习委员。

我也觉得怪怪的。怎么啦？才分开几个星期，就好象不认识似的。

发通知了，大家都录取了。而我。。。居然也拿到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那几个八旗子弟傻了，知道点内情的同学惊奇了。

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

没有错。

北大地球物理系招生工作组听说北大物理系有一位高分考生，因为档案里有不好的材料而正在犹豫，不敢录取。就把那位考生的材料调了过来。研究后决定录取。

地球物理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的，侧重于应用科学研究。新生入学后，系里要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在专业思想教育会上，系里告诉同学们，不要小看这个系，不要小看自己，高分考生就在我们系里。

会议过后，同学们纷纷跑到我这里请教学习经验，我这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位高分考生。（我的高考成绩：数理化外语四门总共381.5分，政治80分，语文67分。十分惭愧，为了不忘却这段历史，只有67分的功底，不得不硬着头皮拿起笔）开学后第一个月，几乎没上多少课。除了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以外，大量的时间用在排队列，练正步上。国庆十五周年快到了，我们要准备国庆节游行的队列。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六年前刚上初中，也是正课不上，搞杂七杂八运动。不多久，我就受冤屈挨整。这一回，说不准又要搞什么运动。运动一来，总有人挨整，有人倒霉。当然，也有人发迹。

倒霉的，不要又轮到了我。

这预感也真准，邪门了！

国庆节一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校园里展开。

臭名昭著的王XX“桃园经验”在各级传达。白区工作时的单线联系，背靠背方式照搬过来。什么“扎根串联”，“请上楼”，“下楼洗澡”，“脱裤子割尾巴”，。。。，整人方式层出不穷。北大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社教工作试点，中宣部的张XX率领社教工作组进驻北大。

工作组一进入北大，就把北大校系领导架空，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每个学生要写思想小结，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更要揭发交代父母的反动罪行。

我们系就有一个上海的考生，大会小会把父母骂得那个厉害，我简直都听不下去了。太假了！如果他的父母真那么反动，枪毙都够格，为什么还呆在家里好好的？

去公安局检举啊，何必在这里作秀？他成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典型，安然混过了社教（但他还是没有混过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工宣队找他谈话的前一天，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了。文革后还是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反动混帐父母，找学校要求为他落实政策。这是我十五年后才知道的）。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北大隔壁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不搞社教试点，象一潭平静的湖水。就在北大揪斗声不断，人人提心吊胆时，清华园内书声朗朗，学生们在专心学习。真羡慕他们。当时的清华校长蒋XX做报告时，还戏称“清华清华，一大二荒”，嫌校园里太冷清呢。

社教越搞越激烈了。

有同学在食堂里吃饭，没把红薯皮吃掉，留在饭桌上，被阶级觉悟高的同学发现了。这还了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啊！

一场声讨地主资本家复辟变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字报铺天盖地，把那个仇视贫下中农种出的红薯的家伙，给我揪出来！红薯皮里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薯皮是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的铁证，红薯皮象征着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水岭，红薯皮俨然成了是不是要亡党亡国的头等大事！

斗争面越铺越开，手段也越来越辣。

社教工作组的第一炮，对准了刚入学的新生。

工作组审查新生的档案，发现政治上不可靠的，格杀勿论。据说那场运动，北大共开除了200多名学生。我不确定这数字是否属实。但地球物理系招收的将近50名新生中，共开除了3名，这点是铁板上钉钉子——跑不了的。

第一个通知到的，是上海市一女中考来的石XX。她是位学习很不错的女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除名了。她悄悄地离开了。

再过了一个多星期，我被通知除名，没有给出理由。

我离开北大后，又有个福建同学林XX被除名，理由是他有海外关系。

十五年后，我和林XX都平反回到北大，又见了面。他告诉我，这个海外关系，是他的一个在印尼橡胶园当橡胶工人的舅舅，标准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吗？怎么变得不可靠了？天知道！

北大的社教从一开始就直接搅进了上层的内部派系争斗，一攻一防，社教工作组领导班子的人马换来换去，工作组手下的红人也随之变来变去。工作组一开始虽然拿刚入学的新生开刀，其项庄舞剑之用意却是瞄准了北京市委及其属下的文教口。后者也不是吃素的，几个月后就展开了反击。

一九六五年一月，彭X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三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XX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北大社教工作组改组，运动开始转向。据说，工作组掀起的针对学生的乱批乱斗风被刹住了，北大社教试点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我们这批已被工作组清除的学生，却是不了了之。社教初期的红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XX倒过来在国际饭店受批评围攻。引出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聂XX就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让当年社教中整过她的那些头头也尝尝苦头这一段冤怨相报，以毒攻毒的故事，那是后话。

最离奇的是我的除名，不能告诉我原因。当通知我的系干事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知道开除我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如果不告诉我原因，那我今后不是还会犯类似的错误吗？”系干事有些为难：

“我要请示一下工作组，明天再答复你。”第二天，系干事告诉我：

“我们研究决定，还是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样吧，你可以说，原因就是组织上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就这样一个搪塞的理由，系里仍然不敢写在纸上。我被除名了，连一张说明我被除名的证明和告示都没有。

是难啊，怎么能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幸好那个年代的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你有权，就可以在幕后决定一个人的前程。

啊哈，好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我离开了北大，一张为什么离开的证明都没有，连回去的火车票还是自己掏钱买的（系里补助我的钱不够火车票那一部分）。档案里已是内定白专而自己茫然不知，那时我17岁。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冬天的雪原上，有一群豪猪。冰冷的气温迫使它们挤成一团，抵御那刺骨的寒风。挤得太近了，那尖尖的刺就会把它们刺疼，它们又散开了。冷了，就往里挤。疼了，又往外散。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

这一群豪猪中间，有一只光皮猪。可怜的光皮猪没有一身豪刺，当那些豪猪往里挤时，它只能被活活地扎死了。

这是著名的《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一则小故事。

人生就是这样，当社会环境象冬天般寒冷时，你必须有一身刺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否则。。。唉。。。可怜的光皮猪啊！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欲上下而求索。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我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上海，我从小生长的城市，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街道车水马龙，可我找不到自己的路，人群熙熙攘攘，可我找不到理解自己的人。我真诚地相信老师的教导，报刊的宣传，组织的谈心。我认真地要求自己，帮助关心别人，学雷锋做好事。可迎接我的是一张张冷冰冰的面孔，一次次无情的打击。

这是为什么？

不相信组织！我已经把心都掏出了，还要怎么相信？我只不过不会打小报告，不会在背地里陷害别人而已。

没有和家庭划清界限！我确实认真地检查父母在家里的言行，如果有反动言行，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揭发。实在没有啊！可我不会编故事，不会牵强附会，不会无限上纲。毛主席不也说要实事求是麼？

既然你们的政治觉悟高，为什么不帮助我知道错在哪里呢？既然你们发现我有严重问题，把我从大学除名，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原因？让我知道错在哪里，有什么不好？

我问书本，找不到答案。我看报纸，找不到答案。我听广播，找不到答案。我翻遍雄文四卷，找不到答案。

真理在哪儿？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要成为社会青年（当时对失学青年的总称）了，社会青年是被人嗤之以鼻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指着他们叫：

“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依到新疆去。哈哈哈。。。 ” 打了个寒噤，我能面对吗？

没想到我的处境，比社会青年更糟。

上海市公安局户籍办公室。

户籍警惊奇得呛了一口，差点把茶水喷出来。

“什么？被学校开除了连张证明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杀人放火？

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反革命？” “什么？认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更有利于发挥你的作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开除的理由。依当阿拉是戇大啊？（上海话：你当我们是傻瓜吗？）” 户口报不上，我成了没有户口的人。

更加可悲的是，即使落到这种地步，我还是痴情地相信党，相信组织。

一个多星期以后，有人敲门。

打开门，敲门的竟是我先一步开除的石XX和她的母亲。她们听说我也被开除了，赶来问问什么原因。我告诉她们，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系里说不能告诉我。

她们忿忿不平地说，北大这样做实在没有道理。出身不好有什么罪？报纸上不是一直说，关键看本人表现麼？凭什么不看本人表现就把学生开除？

她们准备去市高教局告状，希望我也一起去。

我却说了一句当时发自内心，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被开除的原因，我相信党，相信组织。组织是不会错的。

我要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去。我劝你们也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去告了。” 她们惊呆了。

她们默默地走了。

以后我去了新疆，石XX下一年再次考大学，考上了同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分配到贵州。

历史真会开玩笑。我和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殊途同归，又回到同一起跑线。十五年后，我平反回北大学

习时，她考取了同济研究生。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在南大天文系学习时，她正好研究生毕业，到南大答辩。她知道我的情况，我也知道她的情况。可我不敢见她，我始终没有勇气面对她。

历史已作出公正的裁决，她和她母亲当时的认识是对的，我的愚忠是错的。每当我想起自己那时愚昧丑陋的表现，想起她们惊呆了的眼神，我羞愧，我自责，我无地自容。

相形之下，我走了更长的弯路，耽搁了更久的时间，经历了更多的磨难。这就是历史对我愚忠的惩罚，历史是公正的，无情的。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运动中最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主义，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就象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向神父忏悔。还记得《牛氓》中的亚瑟向他崇拜的神父蒙泰里尼忏悔的故事么？结果呢？唉。。。可怜的光皮猪啊。。。

六五年一月底，公安局通知我可报户口，我总算升格成了社会青年。

社会青年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学习一塌糊涂的，有表现一塌糊涂的，有身体欠佳的，也有品学兼优仅仅是出身不好的。

即使处在这样一个群体，出身仍然是主宰一切的。一旦有工厂招工机会，送去的总是出身好的，不管其表现如何。有些出身不好的，眼巴巴地等了六七年，还是没有工作机会。

宣传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是宣传到新疆去是有志气的革命青年么？

为什麼把根红苗壮的送大学工厂，把血统差的塞到新疆？不是宣传重在表现么？为什麼出身不好的处境和印度社会底层的贱民，纳粹时代的犹太人毫无差别？报纸上写的，广播中讲的，为什麼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呢？

这段时间，我默默地作去新疆体能上吃苦的准备，同时又苦苦地思索这些矛盾的答案。从小以来，父母，老师的教导，报刊，书本，广播的宣传，在我头脑中编织了一道道美丽的光环，现在被赤裸裸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虚弱，多么不堪一击！

不！我不认输！

被愚忠蒙蔽了双眼，我不相信说教是错的，我不相信自己从小以来的信念是错的，我宁可相信自己的阶级烙印太深，自己的阶级觉悟不高，因而找不到答案。

我问苍天，“真理在哪儿？”苍天不回应。

我问大地，“真理在哪儿？”大地不吭声。

我问熙熙攘攘的人群，“真理在哪儿？”人群中有的摇摇头，有的指指点点，有的不屑一顾，有的冷言冷语。

“哼，这种人哪配上大学，只配到新疆去！”“哼，假积极。还想知道真理在哪儿呢！”“哼，你哪能和我们比。还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真——理——在——哪——儿？

乌云翻滚，一阵闷雷从头顶炸开。一个苍老的声音，穿过云层。

“走吧，年青人。。。。离开这繁华的城市。。。。走到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里，你会找到真理的。。。”响雷滚向天边，苍老的声音依稀在回荡。

“走吧。。。，年。。青。。人。。。”

附录1：陈凯歌（北京四中毕业生）对“文革”前革命干部家庭学生的心态的评价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的味道，而无法逃脱。

摘自《少年凯歌》

附录2：文革初期红卫兵对同校同学的作为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

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一些人有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整个年轻一代在1966年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并且称他们为“红卫兵一代”。这样的看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有的学生还象他们的老师一样被他们的同学迫害。

比如，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家庭出身好”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坏”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其他学生则在斗

争会期间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一根长绳子绕过被“斗争”的十个学生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在这个学校的其它班级中也发生过。在同一天，校长卞仲耘也被打。卞被打死于下一日。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出入走小门，并称其为“狗洞”。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年的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强迫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任由皮带抽打。打的过程中，有同学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也是“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他爬着回家，因为被严重打伤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一位名叫郭兰蕙的学生，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能忍受侮辱，在1966年8月20日服毒自杀，死时19岁。杨爱伦，高一学生，“家庭出身不好”。遭到“斗争”，被强迫写“交代”。8月8日，她在学校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伤，但幸而未死。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狗崽子”是被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打死。曹滨海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同学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武素鹏被捆在一条麻袋里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

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

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学生王一民，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被殴打、侮辱和抄家。王一民自杀。

摘自《公民维权论坛》李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人生的旋律(六)

——车轮滚滚

坐上大卡车，带上大红花，
远方的年青人，塔里木来安家。
来吧，来吧，年青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啊，《送你一束沙枣花》。

听着这首当年的歌，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生平第一次，被敲锣打鼓欢送。

“敲锣打鼓的地方，千万不能去。”现在的年青人，聪明多了。当年的我们，傻呼呼的。

火车车轮一动，车厢内外，月台上下，迸发出一片呼天号地的哭喊。其悲壮的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孟姜女哭长城”。报名去新疆的知青中，只有少数是明确为“干革命”而去的。其它的，或者是好奇，好玩，糊里糊涂报的名，或者是为减轻家庭经济政治压力，为兄弟姐妹的前途，或者对自己就业前景彻底绝望，在街道里弄的压力下报的名。

在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相聚。

说是生离死别，也不为过。有一些知青此去以后，长眠在戈壁滩的沙包下，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当年的英容笑

貌，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天真地认为响应了党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边疆，等于赎了出身不好的罪，就象祥林嫂捐了门槛，认为阎罗王不会再来找麻烦一样。

可怜哪！祥林嫂最后的结局，正是他们的结局。血统就是血统，永远也改变不了！就象八旗子弟，不管其表现如何恶劣，永远是铁定的革命接班人一样。

我是为寻找真理而去新疆的，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弟弟跟着启动的车厢，跑了好一段。他想给我一个笑，我也想回他一个笑。都是十分勉强的笑容，苦恼人的笑啊。

望着亲人远去的身影，心中一阵凄凉和惶恐。

人生的道路，崎岖不平。深山密林，虎狼成群。急流险滩，蛰伏杀机。第一次离家去北大，就被莫名其妙地除名，不得不忍受被人猜测，嘲笑，抹黑和蔑视。这一次离家去更遥远的新疆，等待我的是凶？是吉？

人生难测！

四天火车，十天卡车，生平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车。荒凉的戈壁，卡车开几个小时看不到一点人烟。颠簸的道路，从座位上弹起来可以碰到卡车顶棚。沿途的风沙，每晚下车时一个个成了黑张飞。奇怪的是，离别上海时的悲怅心情消失了，大伙的情绪反而一天天高涨。一个颠簸，会激起一阵咯咯的笑声。激昂的歌声，从一辆辆卡车中传出。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是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 是什麽给了这些年青人这么高涨的热情？

如果你看过白杨主演的《祝福》，就不难理解了。

祥林嫂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捐了一条门槛，从庙宇中兴冲冲地走出。你还记得她明亮的双眸吗？你还记得她神采飞扬地逢人便说“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吗？

这些多年来一直被指责与家庭划不清界限，一直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扫荡的狗崽子们，如今捐了门槛，可以自豪地告诉全世界：

“我已经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我也成为了革命者。”他们相信，党团组织再不会把他们排斥在外，而会紧紧地拥抱他们，“。。。好同志啊！”好一场幸福的梦，美妙的梦。

经过十一天奔波（汽车开十天，途中休息一天），我们到达了终点，农一师四管处前进二场。据说那一年，整个农一师支边青年中，我们这一批纪律最好，情绪最高涨，这大概和我们这一批中狗崽子的比例高有关。

农场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沿，昆仑山脚下，离古城喀什大约4个小时汽车路。它处在最下游，上游的排碱水就泄放我们这里。农场就在盐碱滩上，有的地方连芦苇都不长。我们喝的水也是盐碱水，带点咸，带点苦，腻腻的，每天至少拉两次肚子。在大田里劳动，不时有人扔下坎土镩，往两边沙包奔。那准是要拉稀，憋不住了。

天天用盐碱水洗脸，皮肤变成棕色，上面裂开了大大小小的裂纹，就跟松树皮似的。

这里的水据说缺少一种什麼矿物质，不适合饮用。兵团派专业的找水队来这里找饮用水，也没能找到。我不清楚这里的水究竟少了什麼，只看到这里的老职工一上五十岁，满口牙基本掉光，可能是这种水作的怪。

包谷馍是主粮，油和肉很珍贵，平时是吃不上。蔬菜也不足，早上就用稀稀的包谷糊当菜。我们一开始是供给制，不论胃口大小，每人一个包谷馍。对我来说，一个包谷馍根本不够。每天劳动时，肚子饿得两腿发软，浑身出虚汗。调皮一点的，劳动时偷点懒，下工哨子一响，就快快回家。我可是劳动时拼命干，一到下工，就坐在田埂上喘气，走不动了。双腿软软的，走一小段，就心跳气喘，坐下来歇歇气才能再走。终于走到家天已擦黑，有时连队开过晚饭才走到，求炊事班长再打开食堂门吃点剩包谷馍。

记得有一次，我双腿软得实在走不动，很晚才走到家。连队正集合，值勤排长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事后他才知道我是饿得走不动路，刚到家，连饭还没吃上呢。

供给制的生活实际上很艰苦。每人每年两套平布军装，两套内衣裤和袜子，一双球鞋，一双皮鞋，每两年一套棉军装，一套被褥，一顶棉帽，一双棉鞋，一双毡筒，还有一个针线包。每个月三块钱津贴。平布军装很容易就被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扎破，连补衣服的布都没有，只能用线缝住。没多久，线再也缝不住了，只能任衣裤上开出大大小小的窗口，象一面面小旗，迎风飘舞。

更糟糕的是发的鞋子，抽到哪双是哪双，不准调换。我拿到的棉鞋太小，穿不上。皮鞋又太大，穿上直透风。冬天到了，我只能穿上那双透风的皮鞋，脚上裂开了深深的口子。

趴在地上练瞄准，脚上的口子被冷风灌得生疼，一直疼到心口。我只能在心里祈祷。

“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到明年冬天，我就能攒够钱。。。买一双棉鞋了。”那时，我用津贴定了《人民日报》和《青年报》，每月只剩8毛钱了。一双棉鞋9元，我即使什麼也不花，哪怕是寄信的邮票也不买，也要攒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双棉鞋。

慢慢地，脚上的疼痛开始隐退了，慢慢地，脚开始麻木了，慢慢地，脚什麼知觉也没有了。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不也是这样的麼？

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我决心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阶级烙印。连里打田埂劳动竞赛，手上的血泡破了，把坎土镢把都染红了，不但超过其它知青，而且盖过了连里的老职工和复员军人，拔得头筹。军事训练，获得优秀射手。就连拾花竞赛，吃饭时间也不放过，一只手抓包谷馍，一只手还在拾棉花，硬是挤进了拾花能手的行列。

农场有不少老职工，49年扛着枪，用两只脚从关内步行到新疆。54年就地转业一声令下，他们就默默地生活在这戈壁滩上。他们是真正老革命，贫下中农！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阶级觉悟”，竟然低得和我差不多。他们不带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用朴素的道德规范衡量是非。工作勤奋，踏实，待人真诚，不作假，不害人，他们就认为好。夸夸其谈，弄虚作假，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们就认为不好。他们弄不清无产阶级专政这套深奥的大道理，更相信的还是良心。要是有人陷害他人，他们就会看不惯：“没良心的，作孽啊！”他们的道德规范，竟然和父母教导我的完全一样！生活在他们中间，竟是如此融合，和谐。发生矛盾时，他们也会破口大骂，一旦矛盾化解，他们就会热情如故，不带小心眼。

和这些真诚的人相处，生活虽艰苦，心情是愉快的。回想在上中，北大期间，接触的人一个个象带了假面具，当面看不出，背地耍心计，反差真大！

他们从不居功自傲，相形之下，那些把胸脯捶得嘭嘭响，开口闭口“我们革命的后代”，“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弟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人，活象个拉大旗作虎皮，卖狗皮膏药的。

三十年后，不少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带着他们的子女，探望当年下乡的地方和乡亲。其它人很不理解：“你们当年不是拼死拼活地要离开插队的地方吗？现在又说那么怀念那里的乡亲。是不是有点虚伪？为什么你们不留在那里呢？”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在偏僻的农村，又不得不离开纯朴善良的乡亲，知青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我也一样，十分怀念乡亲们。

那时，我的书呆子习性还没有改掉。讲的话里总离不开大量只有书本上才用的书面语，怪别扭的。那些所谓低俗的，带色的话是绝对不讲的。我实际上并没真正和大伙儿打成一片。

记得有一次大田劳动时，刮起了大风沙。眼睛睁不开，嘴里嚼嚼都是砂子声，连气都喘不过来，大伙提前收工回家。回家途中，来了感受。想想自己从小到大，从来没想到吃的粮食，做穿的衣服的棉花，是乡亲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种出来的。多谢这场大风，让我感受到这些道理。浮想联翩，我不由的感动起来，脱口而出：“这场风刮得真好！”“什么？呸，这场鬼风还刮得好？”旁边的知青愤怒地叫起来。

这就是我当时的呆模样。

几年以后，我终于放下了书呆子的臭架子，该开玩笑时照开，该说粗话时照说，大伙儿这才告诉我他们当时对

我的评价。

我刚到农场时，就象不知从哪儿冒出的一个怪物，工作拼命干，待人热心诚恳，但是说话怪怪的，句句都是书上的大道理，就象党委书记做报告似的。

“这家伙大概想争取入党，往上爬吧？”过了一段时间，大伙琢磨着又不象了。“这家伙看上去不象争取入党啊。怎么他不巴结领导，靠拢组织，告发别人呢？”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大伙得出结论：这家伙十有八九神经有毛病，神经病！

本想到新疆寻求真理，没想到越弄越糊涂了。我说的，想的，做的和这些真正的老军垦战士，贫下中农是这么合拍，好象没有错。那为什么党团组织一口咬定我阶级觉悟低？

为什么北大要把我除名呢？

望着被鲜血染红的坎土镩把，“告诉我吧，真理在哪儿？”“早着呢，年青人。要想知道真理，你还得多多磨练。”坎土镩把摇摇头。

望着长出新叶的沙枣树，“告诉我吧，真理在哪儿？”“耐心点，年青人，再经过九九八十一磨难，你才会知道真理。”沙枣叶沙沙响。

好吧，我等着。心诚所至，金石为开。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真理的。

《人生的旋律》

人生的旋律--(七) 迎接新战友

人人哪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

哎——，来来来耶，赛呀赛江南。。。

这首歌唱出了美好的愿望，但毕竟还不是现实。

一九六六年初，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组建农三师。我们农场成为42团。供给制改为薪给制，日子好过多了。五月，兵团招生工作组赴上海招收新一年支边青年。我大概因为表现突出，又有一定代表性，被选入招生工作组。

这样，到新疆十一个月以后，我又重返阔别已久的上海。

五月的上海，正是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前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当时赞成的，反对的文章都还能在报纸上刊登。后来证明是“引蛇出洞”。那些天真地写反对文章的，文革中一个个被揪出来批斗，有的被活活整死，那是后话。

市委宣传部专门为兵团招生工作组作了一场形势报告，谈了上海市委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大意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形势下，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在文艺，宣传，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用隐晦的，曲折的办法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有的还钻进党内，上下勾结，内外呼应，大搞修正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忙于招生，这类阶级斗争报告听得太多了，就象“狼来了”一样，没太放在心上。

想不到，狼真的来了。后来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演化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前奏曲，那是始料不及的。

兵团招生工作组有不少上海支边青年，从各师选拔上来的。有的事迹在报上宣传过，大家比较熟悉。这些上海支边青年（包括我在内），将要用自己在新疆成长的亲身经历，动员和鼓励上海的青年报名去新疆兵团。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成长的事迹心得写下，在工作组内试讲，通过后再到社会上去讲。

试讲下来，一部分通不过（包括我在内）。领导觉得内容太平淡，高度不够，要修改后再试讲。

这使我很苦恼。因为咱们的思想境界就这么点，我不愿意人为地拔高。在农场劳动时，脑子里就想好好干，根本没有更多想法。要是劳动时又想共产主义，又想反帝反修，还要想和工农相结合，砍土镩准把脚砍了。对艰难困苦也是不用思考牙齿一咬就挺过去了。要是先把毛主席语录背一遍，再把雷锋日记想一通，再来点什麼思想斗争，这不就成了演戏？

怎么办？

正好，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替我解了围。

一天下午，工作组领导要找我单独谈一谈。原来，我参加兵团招生工作组回上海招生的事，不知怎么给上海戏剧学院（我父母亲工作单位）知道了。戏剧学院党委专门派了一个人找兵团招生工作组领导联系，他希望工作组无论如何不要让我的事迹见报，不要让我的事迹被公众知道。如果我的事迹见了报，戏剧学院的工作就很难做。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要求。

招生工作组里也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上海支边青年，他们父母的单位知道后，莫不欢欣鼓舞，有的还把青年请去做报告。因为这无形中帮单位领导做了一次活生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单位里有政治包袱的职工感受党的政策，至少他们的子女还会受重视，还有奔头。戏剧学院党委为什麼心虚呢？

工作组领导也觉得很奇怪。他们为难地对我说，“工作组到上海招生，不希望和上海的单位关系搞僵。这样吧，你换搞来信来访接待工作，不参加宣传报告动员工作，怎么样？”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呀，我马上答应了。

我隐隐地感到，虽然我和戏剧学院从无往来，但我好象成了那里某些领导的一块心病。

我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都会使戏剧学院党委感到紧张，恐慌，害怕。好象在我身上有一连串巨大的阴谋包在里面，只要我的事迹一曝光，他们就会无处遁身一样。孔某和他们，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逮住一个，一串都跑不掉，必须互相包庇着。

这里到底有什么鬼？他们为什麼要策划这一系列见不得阳光的事？这真是一个谜。

当父亲在四人帮迫害下病危时，我从新疆赶回上海。我希望父亲在临终前能告诉我，为什麼戏剧学院党委对其它一些真正有历史问题教员的子女包容有加，而对我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那么惊吓，恐慌呢？他们心虚什么？你们之间究竟有什麼积怨？

父亲痛苦地摇摇头，“他们心狠手辣，你斗不过他们的。”父亲最终什么也没有说，这个谜跟着他一块儿进了坟墓，也许永远解不开了。

我真喜欢来信来访接待工作，它使我接触到一些真诚的人，一些平凡而怀着真正革命热情的人。来信来访接待的人中，大部分是一些不符合招生范围的人。我的工作职责是感谢他们对兵团的关心和热情，同时告诉他们兵团招生的宗旨和范围，劝说他们继续在本单位干革命。

很多来自全国各地要求到新疆兵团的来信，我是含着热泪看完的。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九岁，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有双腿瘫痪的残疾人，也有正在学校念书的学生。

印象最深的是一封来自广东某县的来信。写信的是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夫妻，他们是青梅竹马，同班同学，男的是一家工厂的厂长。他们告诉我，从学生时代，他们俩就向往到新疆兵团。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热爱新疆的感情没有变。每当广播中，报纸上，电影里听到看到新疆的新闻和报道，他们就会激动不已。晚上躺在床上，他们会互相倾诉知道的消息，憧憬着自己去新疆的情景，兴奋得夜不能眠。多么希望招生工作组能帮助他们实现多年的宿愿哪！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代。一方面，一些党政人物肆无忌惮地欺压老百姓，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那些心怀鬼胎的人靠吹吹拍拍，靠汇报揭发他人，靠极左而步步高升。另一方面，大量的老百姓怀着真诚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和知识技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革命，甚至在遭受打击迫害后还是任劳任怨，忠心依旧。就好像一批根本不信上帝的人穿上了神父的外衣，道貌岸然地传教。广大的虔诚的教徒在洗耳恭听，在真诚地忏悔，仿佛神父就是上帝的化身，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旨意。阿———门。

当时的农垦部部长王震来看望我们，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在农场听过不少关于王胡子的传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勇猛，直率，粗鲁，政策观念不强的人。见到的王震似乎脾气改了，说话挺温和。他说话不多，大意是你们是毛主席的小兵，我是毛主席的老兵，毛主席的战士要听党的话。说完，他指挥大家唱起了当时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的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书呆子毕竟是书呆子，过不多久，我又开始犯傻了。工作组定期开总结会，总结一阶段工作。这本来是过过形式而已，人云亦云即可，再能贴上几张毛主席教导我们怎么怎么的标签，那就更动人了。没有谁正儿八经地用毛主席的教导一件件衡量的。

我那时大概真的把毛泽东思想溶化在血液中了，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要求已经够书呆，还真的衡量起工作组的工作来。这不，我一发言就语惊四座。

“招生工作组的工作没有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主要表现在对新疆的宣传没有做到毛主席教导的实事

求是，把好的地方说得太多，把艰苦的地方说得太少。将来青年到新疆后看到的现实与宣传的对不上，思想要起反复的。”大家惊奇地对望，谁也不吭气。有人巧妙地开了个玩笑，把话题扯开了。

会开完了，师干部股股长摇摇头叹息，“年青人哪，还没见过世面呀！”平心而论，工作组的工作作风和政策掌握，还算是不错的，比戏剧学院不知好多少倍。我用这种高标准要求工作组，确实苛刻了点。

六月里，新一年的支边青年开始陆陆续续进疆。我被安排第一批返疆，沿途护送第一批去农三师的上海支边青年。安排食宿，休息，上下车，处理途中出现的事件，忙一点，累一点，心里还是很高兴。能让新来的知青吃好睡好，减少他们初次离家的悲伤，平安到达农场，是我最大的满足。尤其是，我又看到了自己一年前进疆的缩影，看到了新来的朝气蓬勃的青年。

护送到团场后，我就留在新来的青年所在连队里工作。

赛翁失马，焉知非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部分招生工作组的支边青年挨了揍。

新一年进疆的支边青年十分愤怒，说工作组的青年把新疆吹得天花乱坠，把他们骗到了新疆，狠揍一顿解恨。

想不到，我不但没有挨揍，连队的青年还说，只有我没有骗他们。他们还记得我在火车上说的话。

“我说了什么呀？”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我们问你，新疆的哈密瓜多大，多甜？新疆的景色多美？你只说了一句：‘你们到了新疆就知道了。’”原来是这句啊。

看来，还是实事求是好。

DDN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曾几何时，它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

一场破四旧，砸碎一切封资修残余的大革命。

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

伟大领袖封成了神，升华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可惜，寥寥无几的朋友中，欧洲那一盏不灭的社会主义明灯，反目成仇。

睦南关外的同志加兄弟，忘了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兵戎相见。

忠实的学生波尔布特大开杀戒，成了千夫所指的屠夫，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政权。

曾几何时，它又被称为十年浩劫。

在这场运动中，扭曲的灵魂撕去了一切包装，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红极一时的付统帅，仓惶外逃，丧命戈壁，不再“永远健康”。

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旗手和她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了人人唾骂的“四人帮”。

走资派关进牛棚，又放出来“三结合”，再次打下去，又再次被“解放”。

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忠字舞。。。一幕幕滑稽的闹剧。

血统高于一切，有的命中注定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永世不得翻身，有的命中注定是革命接班人，将来要当皇上的，在全国范围搜罗美女“选妃”。

那些时代的弄潮儿，今天誓死保卫党委，打倒反党份子，明天反戈一击，打倒保皇派，投靠造反派。今天文

攻，明天武卫。今天安定团结为好，打倒破坏安定团结派性份子，明天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把在安定团结旗号下调和阶级斗争的异己份子，给我揪出来！今天欢迎工宣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明天又回马一枪，揭发工宣队是“四人帮”派出的黑爪牙。今天罗列罪名，把同事打入十八层地狱，明天落实政策，当时揪斗你是对的，是帮助你，现在落实政策也是对的，是党对你的关怀。

万花筒一般，眼花缭乱，要紧跟必须不断自己打自己耳光。

戏的内容变来变去，叫得最响的戏子总逃不出那几个。好在他们善于换脸谱，浓妆淡抹总相宜。

领导班子换来换去，走马灯似的。那些弄潮儿总有办法讨得新领导的欢心和好感，充当形形色色革命领导小组，专政队，专案组成员，狐假虎威，不可一世。

这是一个人生大舞台，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谁也无法逃脱。

这一段历史，有人不愿提起，有人不能忘怀，有人反复涂改。不管怎么说，它就是历史。不管怎么打扮，脱去包装，它还是真实的历史，刻骨铭心的历史。烙在心底的历史，是抹不掉的。

我在文革中的表现并不那么辉煌。我不但没有遇罗克那样清醒的头脑，犀利的眼光，文革一开始时，我甚至还是个虔诚的拥护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文革中是军管单位，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正面教育为主。我只能从报纸上，广播中的讯息来理解文化大革命，包括一些民间传来的消息。

初期红卫兵给我的印象极其糟糕。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群众组织，它只是一小撮八旗子弟为突显自己而构成的御林军，党卫军。当那个宋XX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把自己的名字由“XX”改为“要武”时，我的感觉就很不好，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他们的《红卫兵宣言》（附录一），骄横跋扈，盛气临人，和我上中班里的部份八旗子弟的口气何其相似。

事态的发展验证了我的预感。宋要武进入了臭名昭著的“西城区纠察队”领导班子，西纠的红卫兵把西城区“有问题”的人家抄得箱底朝天，更有的资本家，地主婆被西纠总指挥的手下在光天化日下活活打死。红卫兵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连皮带的宽窄也要由父母官衔的高低决定。广大的平民子弟是排斥在外的，少量被批准加入的平民子弟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领导。

这正是这些八旗子弟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体制！

这些红卫兵趾高气扬地走过街头，红袖章，绿军帽，腰束带金属头的皮带。

“一，二，一！”

嚓。。。嚓。。。嚓！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革命的你过来，不革命的就滚TMD蛋。

滚！滚！滚！滚TMD蛋！”

多么象当年纳粹党卫军走在柏林街头的神气。

红卫兵在街头看到谁不顺眼，就一把揪住他，“说，什麼出身？”

党卫军在街头看到谁不顺眼，就一把拦住他，“把证件拿出来！”

红卫兵随意冲进黑九类家抄家，翻箱倒柜，“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党卫军随意冲进犹太人家抄家，贴上封条，“到车站集合，去奥斯维辛！”

红卫兵得意洋洋地看着沾满血迹的皮带，“这地主婆不经打，十下就完了。”

党卫军得意洋洋地看着散发硝烟的枪管，“今天枪法还不错，五枪倒三个。”

何其相似！这并不奇怪，希特勒正是一些八旗子弟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他们朝思暮想的征服感，占有感，今天统统实现了。

可惜，好景不长哪。这个以“西纠”，“联动”为代表的红卫兵时代很快被淹没了。

一方面，大量的平民子弟可以参加的红卫兵，造反队组织纷纷成立，他们人数更多，势力更大，红卫兵不再是八旗子弟的专利。另一方面，这些八旗子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父母不久也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他们赖以生存的“血统论”倒打了他们自己耳光，讽刺啊！

潘多拉盒盖一旦打开，往后的事，那就由不得你喽。

我对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感觉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我对一些八旗子弟为首干出的抄家，破四旧，打砸抢这些侵犯人权，破坏国家的行为极其反感，另一方面，一张大字报又使我虔诚地拥护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5日，红太阳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附录二）。这张大字报竟然站在基层群众一边，抨击派往各校的文革工作组。更有甚者，大字报公开批评“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这话说到了我心里，我被震撼了。

我这么多年不是一直在寻找真理么？我不是一直想不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么？答案就在这里！伟大领袖说得多么清楚，原来我并没有错，而是那些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1964年那场社教运动形“左”而实右。

红太阳高瞻远瞩，英明啊！

五十四中的共产书记，大队辅导员，上中的团委书记邬某，戏剧学院的孔某，北大的社教工作组，。。。，一张张丑恶的嘴脸浮上脑海。就是他们！钻进党内，欺压人民，组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红太阳点名刘XX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我相信没错。想想他老婆王XX穷凶极恶的“桃园经验”，不打倒行吗？我怎么想不到这点呢？红太阳真伟大，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象一场巨大的龙卷风，文化大革命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吸了进去。形形色色的人物，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卷入了这场运动。

有的梦想回到封建专制时代，成为世袭的王公贵族，让平民百姓成为任凭摆布的奴仆。

有的则想通过这场运动，整倒自己的宿敌。有的把这场运动看作向上爬的机会，赶紧投机。

有的想在运动中泄私愤，谋私利。有的则真诚地为了国家兴旺，人民幸福而投入这场运动，被“引蛇出洞”，真的炮打那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

当然，不少年青人为能亲自参加一场大革命而热血沸腾，为保红色江山，刀山火海也敢闯。他们天真地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毛主席教导，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之类。红太阳不是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吗？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有“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劲头。也有的仅仅是觉得好玩，再不用上课，做作业，考试，可以跟着起哄，看别人带高帽子，游街。多来劲！怪不得当年阿Q都会喊“造反了！”

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是什麼能让全国上下失去理智，变得如此疯狂？为什麼眼看着国库掏空，民不聊生而大唱“东风吹，战鼓擂”赞歌？为什麼面对铺天盖地的冤假错案，整整一代的人才糟蹋而没人敢吭声？现在大概还没有条件作深入的探讨，我当然更不清楚。但是，我不相信这样一场运动凭一两个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能发动起来的，即使是造神运动。希特勒做不到，斯大林做不到，红太阳做不到，后来的慈父将军也做不到。这里面应当有更深层的原因，不是简单的一面倒原因。



破四旧毁坏了大量文物

要不是我正巧在新疆兵团，我也一定会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不是被迫的，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因为我从自己的切身经历，看到了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干部倒行逆施，残害百姓，我完全相信党内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更何况还有伟大领袖撑腰。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其它人类似我的观点，大概不会只有我一个。

话说回来，幸亏我没有跳进去。要是还在北大，跳进那政治漩涡，凭我当时那点政治水准，绝对会犯错误。就算咱没有在武斗中丢掉小命，也一定会干不少坏事，不管是不是自觉的。现在咱恐怕早已臭名昭著，没这点勇气来回忆文化大革命了。当然，我要是有弄潮儿那张厚脸皮，有什麼不敢写的？臭名昭著又怎么了？杀了人也可以说成人杀我，舌头是软的，嘴巴是圆的，不是吗？

1967年初，中央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以在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不许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我这才算亲

自体验了文化大革命。

然而，它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文化大革命。

我看到的只是一拨人去夺另一拨人的权。被揪出的走资派中，固然有罪大恶极者，也有不少没有什麼民愤，甚至受老百姓拥护的干部。他们之所以丢官，挨斗，仅仅是因为他们被划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派系。那些平步青云升官的，有一些工作勤奋，能为老百姓办事的，也有不少品质恶劣，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他们之所以得宠，仅仅是因为他们投靠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派系。不管什麼司令部，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权。领导班子换来换去，老百姓出了狼窝，又入虎穴。

除了所谓的走资派,大量被揪斗的,却是下面的老百姓。挑动群众斗群众,不用证据,只要有人喊一句,“把XXX揪出来!”,顷刻之间,飞来横祸从天而降。

常年被无产阶级专政扫荡的狗崽子们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更加凄惨。农场最早被揪出的一批人中，就有和我一块儿进疆的上海知青，包括进疆时我们班的付班长(进疆时我是班长)。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擅长水彩画。他和其它几个上海知青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号称“阿訇反革命集团”。

怎么回事？实际上他们几个年龄较大的知青那天在一块叫阿訇的大田劳动，因为在边疆艰苦的环境中，看不到一点前途和希望，甚至连找对象都难，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叹，

“算了，这辈子不结婚了。”

这话当真？

那还有假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不算不算，如果当真，你敢发誓？

发誓就发誓。我这一辈子打光棍了，如说假话，天诛地灭！

这还了得！用不结婚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

革命觉悟高的马上把这事上了纲。

他们被批斗了，白天带着脚镣下田劳动，晚上在隔离室里写检查。揭发批判的内容越来越深入，让我们这些阶

级觉悟低的人目瞪口呆。

有一幅付班长的水彩画，画了一些静物，其中有一只钟，时间为下午3-4点。这还了得！

伟大领袖说过“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不是公然对抗伟大领袖吗？

这是什麼逻辑？照这个逻辑，所有的钟表都是反革命，因为它们每天至少有22小时公然对抗红太阳。

一个多月以后，付班长受不了折磨了。一天晚上，他在隔离室叫了一整夜：

“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

天亮了，隔离室静寂了。付班长上吊死了。

一辆牛车载着付班长的尸体，在沙包上行进。牛车颠簸，付班长的尸体从草席中滑出，掉在沙丘上。

“TMD，你这个现行反革命，死了还不老实！”

赶牛车的骂骂咧咧，抡起坎土镩，几下就把付班长的手脚踩下，在沙包上把踩成几截的尸体草草埋了。

这就是我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这就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那时，我在另一个连队，处境不象付班长那么惨。初期，我还被大伙选入连队文革领导小组。可是，文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开会，我就和指导员（领导小组组长）发生了顶撞。

那次会议上，指导员要大家提揪斗名单。有人要揪一位上海支边青年，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不是反革命。”

“为什麼？”

“他是上海支边青年。”

“支边青年为什麼不能当反革命？”

“要当反革命人家就不会到新疆来。”

“哼，人要变的，变了照样会成反革命。”

“是的，我们都会变，凭什麼他就变成反革命？”

会议开僵了，最后以暂时不揪这个上海青年告终。但是，还是有两个老职工被揪了。虽然揪他们不是我提出的，我并没有跳出来为他们辩护，因为我对他们也不了解。不管怎样，至今我还是感到内疚。

下一次领导小组开会，再没有通知我参加，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清除出领导小组。那位上海支边青年后来调到其它单位，他大概永远也想不到自己差一点被揪斗这一幕。

运动越搞下去，荒唐的事越多。文攻武卫，支左，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忠字舞，。。。，毛主席说一句，半夜里也得爬起来，聆听最高指示。红太阳转送几只芒果，变成神一样供着游行。一个万寿无疆不够，得来几个才行。恐怕封建朝代也不过如此了，就象倒退了70年，大家匍匐在地，头也不敢抬，气也不敢喘，战战兢兢唱诺：

“老佛爷——吉——祥！”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到底是破四旧还是立四旧？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越来越多。然而，我依然膜拜红太阳。我相信，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下面的奸臣所为，红太阳迟早会洞察一切，拨乱反正的。

明君？奸臣？啊哈，这不也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全国上下，包括我在内，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封建意识。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文化大革命还搞得起来吗？



文革中揪斗游街的场面到处可见

附录一：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清华附中红卫兵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100%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 17 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

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 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人生的旋律--(九)锅碗瓢盆交响曲

1968年，我由付排长改当连队司务长，管菜地，喂猪和食堂。一大堆柴米油盐琐事缠身，成了我逃避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最好借口。差不多两年光景，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菜地，猪圈和食堂里。我特别喜欢逗猪玩，和猪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连队职工一见我往猪圈跑，就开始打趣：“司务长，又去看你娘子啦？”“哈哈，现在说是我娘子，一到分肉时，你们就吵着说是你们的娘子喽。”都说猪蠢，懒，脏，其实猪并不傻。猪能认人，当它们看到我走近，就会欢乐地小跑过来，喉咙里发出殷勤的哼哼声，然后躺倒在地上，等我给它们抓痒痒呢。当它们吃饱喝足，就会挺着溜圆的肚子躺在猪圈一角晒太阳。瞧着它们微眯的眼睛，滑稽地裂开的大嘴，那付得意的神态，什麼文化大革命，什麼阶级斗争，什麼大批判，都会被暂时抛在脑后。

有时我甚至在想，人的感情即使只能达到猪的水平，也要好得多。猪很单纯，谁对它好，它就对谁亲，猪之间从来也不搞什麼运动。人呢？且不说恩将仇报，光是见利忘义，落井下石，欺上瞒下，挑拨离间，见风使舵，就够你受的了。其实人的本性本来比猪好得多，只是那什麼什麼主义灌进去以后，才变得狰狞可怕了。

那个年月，司务长可不好当。说的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大田可以，种不出粮食可等国家拨救济，但是食堂菜地不行。不信？你拿社会主义的草喂大伙试试？不把你揍扁了才怪。别听那些唱高调的，革命口号喊完了照样要吃好的，差一点都不行。

可那阵子连日常生活用品都给革命掉了，什麼都缺。

买不到火柴，全连用木炭保存一点火种，每家早上去那儿引火回家做饭。如果那点火种灭了，我们恐怕要回到女蜗以前的时代了。肥皂没有，把草木灰泡在水里，用浸出的水洗东西。食盐没有了，平时不注意那玩意儿，一旦缺了才体会到它的宝贵。缺了盐浑身都没劲哪。别看这儿到处是盐碱滩，那盐吃不得，含大量的硝。我赶着牛车跑几个小时到山脚下，刨开上面的土，挖下面山根的一种石头。运到家后把石头砸碎泡在水里，泡出的水可熬出比较纯净的盐巴。没有食用油，到维吾尔老乡那儿搞棉籽油。长绒棉籽油有毒，要用烧碱提炼。炼油是门学问，碱要放得恰到好处，火候也十分讲究。火小了毒性排不干净，火大了油就成了糊糊。

戈壁滩上种点菜不容易，全连二百来张嘴就指望它了。记得有一年缺水，都深秋了还没下来水。菜地的白菜都散了架，没有最后一场水白菜就包不了心。全连的冬麦地也等着这一次封冻水，没有它麦苗过不了冬，要冻死。

好不容易水下来了，团场通知各单位用这点水浇冬麦，严禁挪作它用。我心急火燎跑到连长那儿要水浇菜地，连长没答应，说团里命令不敢违抗，先浇了冬麦再说。一星期过后，上面关闸了，大渠水退了下去。

我气急败坏地找到连长，那模样简直恨不得把他给撕了。连长抱歉地摊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我连吼带叫：“今年冬天全连将没菜吃，找谁？谁！”“我有啥办法。”“没办法？你要不支持伙食我也不干了！”“那你说怎么办？”“给我两个班，把大渠堵上，抬高水位，用空渠水浇菜地。”“连队的劳力不能随便给菜地用，菜地有种菜组。”“我不管那些，你知道没两个班大渠是堵不住的，时间不能拖。你要不给，我豁出去不当这个鬼司务长，今天就把这事闹给全连队听听。”连长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带着两个班来到大渠，从渠外挖土传到渠上，然后把土扒到渠内堵渠。别看是空渠水，水位逼高后也是蛮凶悍的，就象一匹野马，不甘被束缚在渠道里。渠水把推进的土冲掉，新的土又传了进来，就在比谁的速度快。我在渠中心推进的土的最前沿，边扒土边踩土，不停地喊叫：“快传土！快！”大家知道堵渠的成败关系到全连的吃菜，这次特别卖力，坎土镢上下飞舞，土从四面撒到渠上。就在堵渠快要成功时，我的手被后面递土人的坎土镢砍上了，沾满泥浆的手在渠水里洗了一下，看到砍了一个大口子，肉翻了出来，血不断冒出。大伙催我回去，我不甘心回到连队。这次还好是斜着砍上的，口子虽大，没有砍到骨头，要不我的手掌就残废了。卫生员告诉我，“伤口要缝线，但连里没有麻醉药，你只能将就着忍者点。”“没问题，缝吧。”缝了五针。

傍晚，菜地组长告诉我，大渠堵上了，菜地已经进水。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有些东西自己解决不了，必须出去买，那个年头，这是最麻烦，也是最危险的。

首先，农场就没有通向外面的公交车，只有农场卡车出去拉货时求司机搭个便车。回来更麻烦，即使盼到了农场卡车拉货回场，装满了货的卡车不一定有空间让你上，那就只能晾在城里晒人干了。

其次，农场卡车只能把你扔在一间招待所，去买东西地方还得再找便车。那时我还真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候在桥梁边，等卡车路过这儿减速，一个猛跑就抓住车板，再一个收腹就上了车，那功夫不亚于当年铁道游击队！据说有人失手后被卡车后轮碾死的，好在咱命大，阎罗王还没打算收留咱呢。

那时候城里也是多事之秋。喀什城里两大派武斗，高音喇叭对着广播，枪口对着枪口。有一天我正打算进城，一个熟人从城里回来，拉住我就说：“快别去，城里打起来了。我堵在打枪的楼里，好不容易才从后门跑出

来。”原来高音喇叭不知播些什麼，把两派惹恼了。开始开枪打对方高音喇叭，后来就打成打起来。流弹不长眼睛，嗖嗖乱窜，打死了一名街上的小贩和一位路过的赶毛驴驮水的老汉。老天，这条街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昨天我还在那条街上走！我要是挨了枪子，连里一二百号人还眼巴巴地等我买回的粉条呢。

还有一次，我去喀什买厨具。下午取东西，中午闲着没事，在街上逛逛。看到公园门口有张广告，好象是鲁迅的什麼展览。进去看看吧！公园没人看门，里面空荡荡的，没个人影。我有点纳闷，怎么喀什人都忙于抓革命促生产，连个逛公园的人都没有？

公园里有一幢房子，走近才看到挂着一块小牌子“三八五指挥部”。“三八五”是喀什最凶悍的武斗组织，我大惊失色，赶紧退出来。里面走出一个维吾尔年青人，他操着汉语，恶狠狠地问：“你来干什麼？”“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了地方。”我赶紧打招呼。

“走！”我马上离开，才走了十几步，就听见背后一声清脆的枪响。

我一下就懵了，一摸脑袋还在，赶紧头也不回地溜了。

看来我还是怕死的，革命烈士不好当，我还差得远。

DDN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好象是辛弃疾的词句吧。

我依然没有找到真理。红太阳的那张大字报出现时，我几乎认为找到了真理。可惜它昙花一现，被无情的事实粉碎了。真理在哪儿呢？找遍天涯海角，找不到踪迹。正当心灰意懒时，却猛然发现，它就在身边，那要到1970年底了。真会捉弄人！

1969年中，我心里堆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越积越多，它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我憋不住了，找到指导员，要借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

“我想从头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冷静地思考一下党中央的精神。”

没几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发话：

“有人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紧跟，还有怀疑，还要思考思考。行吗？”

不行！对伟大领袖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大伙儿丈二摸不着头脑，指导员在说谁？

我心里当然清楚。

1970年2月，中央下达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打三反”运动。我们这里要慢一拍，夏天过了才开始。这场运动到底想干什么？我也弄不清楚。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打说的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三反好象是反贪污浪费什么的，反来反去，也就反成了反革命。这次上级不知哪根神经搭上了，明确要求每个单位的“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内，一定要有群众选出的代表。这下可好，大伙又把我选了进去。

领导小组一选好，当晚就开第一次小组会议。这次会议，几乎是1967年初那次文革领导小组会议的翻版。有人提出要揪一个绰号叫“老棺材”的上海青年。又是老样子，我再一次跳了出来。

“他不是现行反革命。”

“为什麼？”又是指导员发问，他已不是三年多前的那个指导员。

“他是上海支边青年。”

“支边青年为什麼不能是现行反革命？”

“他的表现是差劲些，但表现差不等于现行反革命。打成现行反革命必须要有证据。”

“革命群众发动起来，证据就出来了。”

“那不行！不能先揪人再找证据。”

领导小组会议又是不欢而散。不过这个指导员可不象三年多前那个温良恭谦让，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清除出领导小组。指导员指定了一个革命立场坚定的人补我的位子，领导小组继续开会。当天晚上，老棺材被揪出来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那天晚上的揪斗大会我没有参加，我找借口到菜地值班去了。以后每次揪斗会，我一次都没有参加，不是拉面粉，就是卸柴火，反正总有借口。眼不见为净嘛。听说老棺材被斗得很惨，拳打脚踢都用上了。白天劳动，他必须完成比一般人更多的定额才能回来，所以老棺材每天都收工得很晚。

一个月以后，老棺材受不了了。一天，他突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抢救已来不及，老棺材死了，原来他已喝了1059农药。听说老棺材身上有一张临死前写的绝命书。这张绝命书被交给指导员，指导员再也没把它交出来，可能被他销毁了。绝命书上写了些什麼，谁也不知道。老棺材临死前想说些什麼？只有上帝知道。

文革中自杀已不稀奇了，老棺材的死只不过增加了一条闲聊的新闻。我们隔壁团场的政委，爱酒如命。一天，他们政治处的两位干事聊天，说起我们团有位上海知青，喝了1059农药自杀了。政委一下子跳了起来，瞪大了眼睛，

“什麼酒？什麼酒？我怎么没喝过？”

言归正传。老棺材自杀以后，下一个被揪的，就轮到我这个革命立场有问题的。

我的司务长职务被停止，白天写检查，晚上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教育。不能解释，不能还嘴。任凭下面喊口号，揭发批判，一解释就成了对抗革命群众。领导小组轮番政策攻心，什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哪，不认罪死路一条哪，轰得我脑袋发胀，迷迷糊糊。

另一个被揪出来的经不住这威逼，签字认错，图个一时安宁。我成了态度最顽固的。当时我也豁出去了，反正我没有什麼亏心事，要我承认任何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没门！

我在连队的人缘还不错，即使在运动最激烈的时候，群众也发动不起来。我也能感觉到，大伙儿在内心是对我很同情的，即使是不得不举手跟着喊口号，也是口是心非的。大伙的同情和关怀，支持着我度过那一段时光。

同志们哪，平时要多积德。善有善报，真的。

关在房间里隔离审查，倒给了我难得的清静时间，把从小以来无法理解的问题好好地想了想。从小以来，我一直非常认真地按红宝书讲的去做，至于尊师守纪，那就更不在话下。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没有少过。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在新疆这几年的表现应该是人人都知道的。

可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碰壁，从北大开除，到现在揪出来隔离审查。总说我革命立场不坚定，跟家庭划不清界限。都已经把青春献给新疆了，还要献什么才行？我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永远只是冷冰冰地指责我错？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对的呢？

真理在哪儿？

红宝书翻了又翻，找不到一句对得上号的。

老三篇读了又读，念不到一句解决问题的。

一句顶一万句呀！怎么不顶用了？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晚上，昏黄的煤油灯旁，我打开了《反对自由主义》。寒风钻过门缝，把灯火苗吹得一晃一晃。偶尔，一只小老鼠吱吱地爬过地窝子屋梁，诡秘地朝我眨眨眼，又一拨身拱进屋顶的草丛里。

对照《反对自由主义》，我还是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突然，一个念头闪出。数学中不是有反证法么？如果我能反证，答案不就出来了？

那就试试反证法吧。

假如。。。假如。。。假如《反对自由主义》中说的都是错的。。。

一股热气冲上了天灵盖。。。眼前金光闪闪。。。一时什么都看不见了。。。

金花飞舞，象金针金线，编织出美丽的锦缎，象金砖金瓦，修筑起雄伟的宫殿，象金弓金弦，演奏着如歌的行板，象金笔金纸，记载下动人的诗篇。

欢快的音符在跳跃。。。多温馨的乐曲。。。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吗？没有吼叫，没有仇恨。。。只有爱的旋律在流淌。。。

这是什麼地方？我好象又回到了童年，儿时的伙伴欢笑地跑来了，来吧，来吧。。。

把手拉起来吧，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

敬个礼呀，鞠个躬呀，

笑嘻嘻呀，握握手呀，

。。。。。。”

多么美好而温暖的世界啊！是真的吗？是天堂吗？

煤油灯的火苗在扑闪，还在昏暗寒冷的地窝子里，我还在受隔离审查，无产阶级专政还在残酷地进行。但是，一种冲动，一种预感告诉我，我这么多年苦苦寻找的真理，就要露出了。

咦，一位美丽的仙女，出现在地窝子。是我眼花了吗？

“你是谁呀？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为了寻找真理，已吃够了九九八十一般苦，该让你知道了。”

“啊呀。。。总算盼到了。快告诉我，真理在哪儿？”

“你先看看那本小册子。”

我再次打开《反对自由主义》，里面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话：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不坦白，不忠实，不积极，以个人利益为第一生命，以革命利益服从个人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利己的原则，同一切不利己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关心个人比关心群众为重，关心自己比关心他人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啊，我从小以来的所有疑问，全部得到了解答。

啊，我全明白了。

仙女抿嘴一笑，

“把本子合上吧，你会看到真理的。把它记在心底。。。 ” 仙女消失了。

我合上小册子，上面闪烁着五个大字：

“这——全——是——假——的！”

呵，这就是真理！它就在身边，它竟然那么简单！

打从找到了真理，我完全变了，象一只快乐的小鸟。多年来卡在心头的枷锁解开了，我还有什麼可忧闷的呢。批斗还在进行，恫吓不再有效，我反而变得乐呵呵的。大伙儿纳闷了，

“这小子吃了什麼药？越斗越来劲了。”

那些书上，报上的官话，不再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全是假的，谁还说那些。

老百姓的粗话，俗话，反而更贴心些。大伙儿开那些带色的玩笑时，我不再道貌岸然地躲在一边，而是跟大伙儿一块儿大笑，一块儿起哄。过年了，远离亲人的知青们，凑在一起喝闷酒。哥儿们把我当作自己人，邀请我一块儿喝酒。

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久。一杯酒下肚，烧得满腹乡愁都冒了烟。远在天边的亲人哪，何时才能再见面？这种日子，何时才有尽头？

“甭说。。。这些。。。伤心。。。的。喝！喝TMD的。。。一醉。。。方休！”

昏黄的油灯下，酒气，油烟，尘灰，还有嘈杂声，搅和在一块。有人哼起了忧郁的歌，有的开始划拳。

深深的海洋。。。闪开！汤上来了。。。你为何不平静。。。五魁首呀。。。啊哈，你输了。。。罚酒！。。。六六六呀。。。不平静就象我爱人。。。哎呀。。。踩我脚了。。。七巧板呀。。。哥俩好呀。。。她一颗荡漾的心。。。

然后开始跳了，一边吼叫，一边乱蹬脚，发散身上的酒气，发泄心头的烦闷。

我开始理解了。这些看起来思想落后和粗俗的言行，实际是无奈的抗议。比那些弄潮儿装腔作势的说教，要实在得多。我和大伙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家庭出身，阶级烙印，不再是我的紧箍咒。

什麼黑九类，这全是假的。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大批的富有家庭子女从小接受的是反面的教育。他们都可以投身革命，成为革命领导人和高级干部。而我们从小沐浴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下，从小接受正面教育，却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是什麼逻辑？毛泽东思想不是战无不胜的麼？怎么教育来教育去反而赶不上受反面教育出来的？

相反，我为父亲能在强权下讲几句真话而感到自豪。记得前苏维埃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过这样的诗句：

羡慕吧，

妒忌吧，

因为

我

是一个

苏维埃

公民！

我也可以自豪地宣告：

羡慕吧，

妒忌吧，

因为

我

是一个

右派的

儿子！



(1970年，从场部回连队半途小憩)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71年夏天，副统帅吃饱了撑的，一个跟斗摔到了温都尔汗。这下可好，再不永远健康了。

他一个跟斗不打紧，可给下面添了大麻烦。这话咋讲？原来兵团在1966年底有个文件，凡是1960年以后入伍的复员兵，不管在部队是伙夫也好，是勤务兵也好，一律提拔为连级干部，1960年以前入伍的复员兵没份。

这算啥政策？

原来1960年以后入伍的兵才算百分之百的副统帅的兵。大部份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就是这些一步升天的，我们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也是。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高小程度就算很有学问了。

早一两年入伍的复员兵当然不服气，骂骂咧咧的，

“你们神气个屁，老子当兵时，你们还只会拣羊粪蛋呢。”

连长，指导员也不甘示弱，

“你们懂个屁，老子是林副统帅的兵。你们是彭德怀的兵，懂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他们知道自己是托了副统帅的福，因此平时副统帅长副统帅短的常挂在嘴上，颇为自豪。

现在怎么脱身？

大大小小的领导们，都在想办法把自己和副统帅的关系抹掉。那么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呢？

“唉唉，那个时候嘛。。。啊。。。你们也知道。。。啊。。。言不由衷。。。"

啊。。。"

全国上下，形形色色的弄潮儿们，也伤透脑筋重新化妆。

“唉唉，那个时候嘛。。。啊。。。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啊。。。只不过。。。"

啊。。。 ”

紧接着，话锋一转，

“红太阳伟大呀！他老人家的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他说得太对了。林秃子就是阴谋家，野心家。那时，我是在无形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吹捧他的。同志们哪，其实我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我也早有警觉，只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

瞧，转得多快呀！

要是林秃子的阴谋得逞呢？他们的话当然会反过来说喽。

副统帅的这一跟斗倒是帮了我的忙。“一打三反”匆匆结束，指导员的气焰一下子收敛了许多。我因为在运动中自始至终没签过一个字，倒成了好同志，美其名曰“经得起考验”。苦了那些在运动中签名认错的伙计们，他们为了平反这冤假错案，以后折腾了好多年，申述了无数次，还多少留些尾巴。这是后话。

“还是你好啊，一个字也没签，我那时还认为可以坦白从宽的。。。 ”

“唉，老兄，怎么能相信他们说的？这全是假的。。。 ”

打那以后，我看问题的方法完全变了。以前从不怀疑宣传报道，现在是眼见为实，报道为虚。这一下了不得，好多事情的性质完全不同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吧。过去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是革命的大熔炉。现在看是个垃圾箱。我可不是说在农村的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 and 知青是垃圾，而是指实际的政策把农村当作垃圾箱。

何以见得？

先看看那些最最纯洁的革命接班人，那些高干子弟吧。相当一批根本就没进大熔炉。即使进大熔炉的，还没等熔了，就调走了。去农村的知青中，根红苗壮的纷纷选送到“肮脏”的大学和城市工矿，却把乌七八糟的狗崽子留在这“广阔”的天地。

走资派也好，现行反革命也好，刑事犯罪份子也好，批斗完后的下场总归是下放农村。没听说把大学部队里表现好的作为嘉奖送往农村，也没听说农村中的狗崽子，被揪斗后罚他不准再呆在这革命的大熔炉，下放到大学机关去。

你说说这农村成了啥？

再看看社会舆论。就听听城里在菜市场排队买菜的大娘大婶们聊些啥。

“嗨，咱二闺女下乡刚满两年，就推荐上了大学。”一脸得意的神情。

“哟，您老有福气。”

“瞧人家丫头多争气。”四周一片赞扬，羡慕中挟带一点嫉妒。

“咱小子这回总算上调了，为通公社和县里路子，费了老鼻子劲。”

“甭管咋的，能跳出来就好。”

那些子女还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家长，灰头土脸地听着，心里不是个滋味。

要是农村真是广阔天地，真是革命大熔炉，话就该这么说，

“嗨，咱二闺女上调农村刚满两年，才犯点错，硬下放她去上大学。”哭丧着脸。

“您老别难过，跟领导好好说说。丫头年青不懂事，好不容易来革命熔炉，有点毛病她已经认识错误了。再给她个机会，别轻易下放她上大学让她背个包袱。”

“万一真要上大学，让您闺女好好努力，表现好还有机会上调到革命熔炉的。”

四周一片安慰。

喂喂，各位看官，别笑呀，咱不是开玩笑，咱在一本正经地打比方。那用词就不恰当，什么“下乡”，“上调”，应当“上乡”，“下调”才对。

往后几年，嗨，神了，咱简直成了算命的，料事如神啊。

红太阳又让邓大人出山，掌管经济建设。不多久，还下了圣旨，“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安定团结”。看那帮大大小小的弄潮儿急得！曾几何时，他们高喊“打倒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他们，一直叫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就要无法无天，乱，只会乱了阶级敌人”。

赶紧急转弯。

坚决贯彻最高指示，拥护邓XX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同志们，不能打派仗呀，我们从来就是讲安定团结的。什么，问我前几天怎么说的？不矛盾啊，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安定团结嘛！你这个同志怎么啦，不要翻老账，要往前看嘛。

假的，假的，这全是假的。咱不去凑热闹。现在请邓出山，是借用这一股力量去制衡副统帅那一拨力量。说得好听，心里还不准怎么想的。

没多久，皇上又下了圣旨，“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邓又被赶下山了。这帮弄潮儿又忙了手脚。快查一下，我前些日子的报告里有没有提邓的名字。有？快把它删掉。

赶紧再急转弯。

坚决拥护最高指示！同志们哪，这家伙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走资派，本性难改。我早就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一刻也不能忘。什么，问我前几天怎么说的？我说什么啦？我从来就没说过不要阶级斗争嘛！嗨，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现在提安定团结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假的，假的，这全是假的。咱不去凑热闹。现在赶邓下山，是觉得江山稳了，要让自己的嫡系掌大权。不准哪一天，嫡系们把江山管砸了，还得请人家收摊子呢。

反击右倾翻案风，抓大儒，批孔夫子，学法家，。。。运动一场接一场。忙得弄潮儿们连卸妆都来不及。

假的，假的，这全是假的。咱不去凑热闹。

等到粉碎四人帮后，回过头看看这“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几年，哇！一张大字报都没写过，一次批判发言都没有，连跟在人家后面签个名都没有。我怎么变得那么聪明！

粉碎四人帮后，弄潮儿们第一次狼狈了。机关算尽太聪明，蹦来蹦去这么多次，太显眼了，这故事就不好编喽。啊哈，这回滑不过了吧！

且慢，别小看了，他们的功夫了得。

这不，过了一阵，新领导们还是被他们哄得晕呼呼的，哪怕是当年被他们斗过的走资派也架不住他们的功夫。这是后话。

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英雄难过美人关，真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我要是当了领导，恐怕也会被这些好同志们捧得飘飘然的。

话又扯远了。

1973年夏天，我探亲回到了久违的上海。

当年高教局分给我们家的房子，已给戏剧学院的一个弄潮儿党员霸占。文革前已故的戏剧学院院长（民主人士）夫人看我们家太可怜，好心腾出自己一间房让我们家临时住。不久戏剧学院就勒令我们离开。理由是中央有文件，凡是有外宾经过的大马路两边，不允许政治上不可靠份子居住。要是被外宾见到了政治上不可靠份子，岂不给我们国家的光辉形象抹黑？

我们家刚一搬出，戏剧学院就把那间房间没收，分给一个革命派党员。谁叫你这个前院长夫人不识好歹，同情牛鬼蛇神。吃掉你一间房间，活该！

我们家被塞到一间沿街（当然不是外宾经过的大马路）的小平房。其实它本来不是房子，是一幢三层楼房的小天井。把天井上面封顶挡个风雨，临时凑合着住人。房间里没有厕所，浴缸，要拉屎拉尿和洗澡必须到外面的公用厕所和浴室，真是名符其实的“上海屋檐下”。

房间太小，只能用学生宿舍的双层床睡觉。哈哈，这辈子没有机会上大学，在家里睡睡学生宿舍的双层床也好，在梦里过过当学生的瘾吧！

当时我们家五个孩子，前四个全部上山下乡，最小的弟弟正值毕业，前景也不乐观。我们四个上山下乡的，别说参军上大学根本没份，连上调也没有一个。在上海滩上要算最最没有“噱头”的家庭，尽管理论上我们家庭要算最响应党的号召的。不过这种理论最多骗骗自己，社会上可没人理睬你。

听说我从新疆回来，弟弟妹妹都从他们的农村农场赶回来，一家人又团聚了。

经过文革这几年，弟弟妹妹的经历也很坎坷。特别是我妹妹，我一去新疆，兄弟姐妹中就数她最年长了。有一段时间，爸爸妈妈都关进“学习班”，她带着弟弟们，天天到菜场拣菜皮煮着吃，硬是熬了过来。他们的故事，说来话长，以后在其它地方再写。

从天南海北赶回来团聚一次多不容易，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呀！说好了，大家来点高兴的。记住，只许讲高兴的话，回忆高兴的事，至少在今天晚上。

母亲特地染了头发，还破天荒地穿了一双皮鞋。父亲刮了胡子，精神多了。炒了几个菜，用的是弟弟妹妹从乡

下带来的土产，还来瓶葡萄酒，多少年没体会这样温馨的夜晚了。

大家围着桌子坐好，碰了杯，咪了第一口酒，那甜滋滋带点香味的液体，真舍不得把它咽下肚。千言万语，该从何说起？

墙外车来车往，人们说说闹闹，各种声音穿过这薄薄的墙壁灌进屋里。好象什麼什麼宴会也要奏乐的。哈哈，咱这顿饭级别不低，就跟国宴差不多，还有配乐的。还记得演“乌克兰大白猪”那会儿吗？就在这饭桌下面演的。

记得，记得，要是永远生活在那年代多好。

江西插队的弟弟先开腔，在学校里他是个调皮鬼，连少先队都入不了，下乡不到一年就入了团。跌破眼镜呀！他在一次村里仓库着火时，奋不顾身冲去抢救，评为知青标兵并入了团。

好消息，大家鼓掌，爸爸妈妈欣慰地笑了。

妹妹干活一向麻利，这不，在生产队插秧比当地农民还快。她的嗓音很好，小时候是少年宫合唱团的。一次随意唱了几句“沙家浜”，把大家惊呆了，连县里剧团都动了心。

好消息啊，“你就干脆去剧团得了，咱们家也出个阿庆嫂，了不得。”“我才不去，不喜欢在台上装腔作势的。”“你就做件好事，好歹让咱们家有个上调的。。。 ”嗨，瞧我这记性，说好了不提这些伤心事的。。。

该我了。去哪儿找高兴事儿？

咱能回来和大家见面，这就是高兴事，这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你想想，我们一个里委去新疆七个人，一个发精神病，一个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死了，一个被武斗的流弹击中脊梁半身瘫痪，一个被卷进“阿訇集团”批斗，逃离新疆不要户口了，一个得了重病，躺在床上。才几年功夫，就剩两个健康的。我就是这幸运的两个之一。。。

嗨，瞧我这乌鸦嘴，怎么说这些了？连句高兴话都不会说！

“对呀对呀，”妈妈接茬了。

“你们能健康回来，这就是最高兴的事。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一个少胳膊少腿的，这就好，这就好！”“哈哈。。。”，大家笑了，苦恼人的笑啊。

再抿一口酒，不知怎的，带一点苦涩。我告诉弟弟妹妹，已经找到真理。打那以后，看什麼准什麼，绝了。

“真那么神？那你帮我们看看，我们该怎么办？”“你们赶快抓紧时间自学。别看现在把知识分子骂成臭老九，不出五年，当局一定会创造一种理论，让知识分子香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国的政策永远是为高干子

弟服务的。他们不愿通过考试和平民子弟竞争考大学，于是当局就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制度而废除，改为群众推荐，领导申报，党委批准制。你看，现在他们的子女闭着眼睛都可以上大学了。”“说的也是。”“现在，他们的子女已跨进大学校门，五年之内陆陆续续毕业。到那个时候，还能把他们的子女说成臭老九吗？”“可当局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知识分子呀？”“那全是假的。那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现在吃到了。”话是这么说，可自学什么？怎么自学？

唯一有条件的，就是跟父亲学美术。有这么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身边，还怕学不到真本事？

好，说干就干，马上行动！

可父亲真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不但不肯教我，还说我搞搞数理化可以，搞美术不行，不是这个料。我们几个中间还只有小弟弟有那么一点天分。

只看才能，六亲不认，这哪行！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因材施教吗？看看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自己的子女多偏心！再看那些推荐来上美术学院的，有的入学时只会画一条线算地平线，上面画一个圈算红太阳。这个我总会画吧。

不行不行，不教也得教。

我们这就入学，举办开学典礼。

那天晚上，在昏黄的电灯下，把饭桌挪开腾出点地方。凳子摆开，弟弟们坐在上面算学员。我站在椅子后面装作工宣队长兼军宣队长再兼革委会主任。赶紧清清嗓子，要致欢迎词了。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上大学。热烈欢迎你们！

你们是由真正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推荐出来的，你们才是真正的工农兵学员。

这么多年来，你们夏顶烈日，冬迎冰霜，风里来，雨里去。什么苦没受过？什么农活没干过？谁是真正表现好的？比一比手上的老茧，比一比身上的伤疤嘛！

说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来就没比那帮血统高贵的差。。。 ” “哥哥，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怎么越讲越不象革委会主任啦！” “啊？。。。嘿嘿，我讲的跑题了。

同学们，你们的责任重大！

你们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对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我扫了坐在边上看热闹的父亲一眼，父亲苦笑着摇摇头。

“那些资产阶级教授必须认真教我们工农兵大学生，不教也得教！”这五分钟的革委会主任当完了，哈哈，好玩。苦中作乐，画饼充饥嘛。

家庭自修大学开学后，我才体会到，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讲的还真有道理。

我真不是学美术的料，不管怎么努力，画出的东西就是没有艺术性。用句时髦的话来说，我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就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最后，只有小弟弟成了美术专业人才，我们其它几个早就改弦易辙，走其它的路了，这是后话。

临回新疆前，我告诉弟弟妹妹一个秘诀。报上的话，多半是假的。真真假假，真假难辨。到底什么是真的呢？

“看高干子弟。”报上说好的，不见得是好的。报上鼓动你们去的地方，不见得是该去的。但是，高干子弟一心想去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高干子弟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一定假不了，亏不了。

信不信由你喽。



(1973年，探亲回家时编导的“下棋”。苦中作乐，就在“上海屋檐下”拍的照。我不会演戏，太做作了。

回上海探亲前，我已经辞掉了司务长，调到学校当老师。

那个环境下，司务长不是肥缺。十个司务长中九个想撂摊子，很难脱身。为了辞掉这个司务长，真费了一番功夫。

1972年，我们连队和另一个连队合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我和那个连队的司务长都不想继续当司务长，于是展开了一场互相推卸司务长的拉锯战。

我的理由是，他比我有经验。

这是真的。司务长不好当，有经验的司务长一个比一个油滑，没这点本事就省不了钱。我虽然书呆子气已经改掉不少，比起他们来，还差得远。不信？要给个例子？可以啊，不过老司务长嘴里是吐不出象牙的，我可有话在先。

那年春天，我赶着连队母猪去畜牧连配种，他正好也去那儿办事。配好种后，打算不交费直接溜回去，被畜牧连会计拦住。

“去办公室交钱，付了配种费才能走。”“帮帮忙吧，连队食堂穷的叮当响，就免了吧。”我赶紧陪笑脸。

就凭我那张笨嘴，还能赖得了帐？

“那不行啊，公事公办。”会计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

他老兄过来帮忙。

“干那个XXX还要交配种费？没听说过。”他故意装糊涂。

“你又来胡搅了，喂种猪的人工，饲料从天上掉下来？”“哎哎哎，你老公天天晚上给你配种，你给他交多少配种费？”“你这死不了的，讨打呀！”会计两颊绯红，举手要打。

我们哈哈大笑，赶紧逃开。他把我推走，朝我挤挤眼。这不，把配种费赖掉了。真本事呀，我望尘莫及。

他的理由比我的更强硬。

这次是他们连队合并到我们连队，按正常程序，应当是我接他的帐，而不是他接我的帐。说得在理。可这次我要是推不掉司务长，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脱身。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急坏了。

我找到了团政治处。我知道，团里早就在打我的主意，团子校已向团政治处提过好几次了。这次我主动找到团里求援，他们正好顺水推舟，反正两个司务长哪个接帐都说得过去。

团里把决定压了下来，那司务长死活不干。他蹦跶了几天，胳膊还是扭不过大腿，不得不接了我的帐。

“还是你小子精。”“老兄，多多包涵，实在是迫不得已。”办完交帐手续，团政治处主任找我了，他说要调我去子校当教师。欠人家人情还没还，我必须同意。回来经过营部，营长问我有什麼打算。我告诉他，团里要调我到子校。

“什麼？手伸得好快。不行，营里学校也缺人，你来营里，我找政治处谈。”回到连里，连长（新调来的。老的连长，指导员都调走了）听说我要走，马上跳起来。

“不行，哪儿也不能去，留在连里。我不放人！”正好团里要连里派一个加强班去唐皇山炸石头修水闸，连长马上让我带上加强班出发，尽管我从来也没炸过石头。

“调吧，调吧，人影都找不到了。哈哈，调个鬼。”炸完石头回来，已经过了几个月。胳膊总归扭不过大腿，我调到了学校。先在营部子校，一年后到团部子校。

“你能教什麼？”“小学一年级算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一学期把我美死了，连备课都不用，不就是教 $1+1=2$ 麼？

下一学期学校发现不对劲，要我改教四年级算术。还不对劲，再下一年，教初中。

再下一年，要我教高中。学生们乐了：“哈哈，我们升级，D老师跳级。”那年头什麼都反了过来，黄帅的造反日记在报上宣扬，学生们都学开黄帅了。咱的命怎么这么苦哇？咱上学的年头，尽挨老师的整。现在咱一当老师，还没来得及享受师道尊严，老师又成了龟孙子。

学校教英语老师原先是兵团农学院教师，1956年清华水利系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兵团农学院解散，他们也下放到农场。当时英语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课，中央文件中不是有“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豪言壮语麼？老夫子在上面念一句英语，全班只有三个半学生跟一句。有个学生有时跟，有时又不跟，只能算半个。念着念着，只有两个学生跟。再念几句，只有英语课代表一个跟。再往下几句，一个跟的也没有了。

平时脾气挺好的老夫子勃然大怒，对着英语课代表发开了脾气，“别人可以不念，你不能不念！”“为什么我不能。。。 ”英语课代表十分委屈。

“我念一句，你跟一句，咱们一唱一和，这出戏还演得下去。你要不跟，我的戏就演不下去啦！”我算想得开，这全是假的，认真不管用，但要误了农场职工子弟，也与心不忍。同学生们讲个条件吧。

“你们前半堂课如果能好好听课，咱后半堂课就给你们讲故事，怎么样？”“好吧。”学生们同意了，“不许赖哦！”我的办法还算混得不错。学生们给咱面子，规规矩矩熬完前半堂课后，就迫不及待地催开了，“讲故事！讲故事！”这是学生们最开心的时刻。我的故事开场白总是老生常谈，学生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没等我开口，学生们先替我讲，“在很久很久以前。。。 ”当讲到最精彩的情节时，我故意急刹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堂课分解。”哈哈，下一节课，学生们还得给咱面子。

一晃，几年过去了，到了中国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1976年。



（1973年，在营部子校前照相）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76年夏，长期受迫害的父亲病危，我匆匆赶回上海。

这一年事情特别多，周，朱，毛相继去世，唐山又大地震。真是鸡飞狗跳，长虫过道，按迷信的说法，要出大事啊。可不是吗，父亲挨批斗后离开了讲台，修了这些年防空洞，身体一直不错。突然诊断出肝癌，还是晚期，真是祸从天降。

周的去世，我确实相当悲哀。

那时我还在农场，教师们自发地做花圈，戴黑纱，举行悼念活动。有的泣不成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可以看出，大伙的悲哀都是真诚的，自发的。尽管周在文革中也讲了不少极左的话，做了不少极左的事，毕竟在文革期间能出来讲话的中央领导人中，他是唯一的带一点人情味的，哪怕是表面上的。他去世后，我们这些狗崽子们的日子，将更难熬了。

红太阳落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那时我已赶回上海，那天我恰好在公共浴室洗澡。突然广播大响，哀乐齐鸣，播音员用极其沉痛的声调，宣布了这一消息。广播一遍又一遍，浴室里大家哑然无语，没有一个哭泣。许久，我边上有个人在轻声叹息，“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灭的长明灯。。。灭了。。。 ”说不清他到底是叹息还是嘲弄，是哀伤还是快意。

不知怎么的，我悲哀不起来，看来，浴室里其它人也和我差不多。我的心底，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还回想起，几年前上级传达中央的一个什麼重大的好消息，说经医学专家诊断，红太阳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活多少岁也能诊断出来，真是神仙啊，这些医学专家也真会拍马屁。弄了半天，红太阳还是人，不是神。不知这些医学专家算不算误诊？

咱们这些中央领导人也真是，报上描绘得一个个跟伟人似的，还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呢。但只要涉及延年益寿的事儿，什麼鬼话都信。

走了。。。走了。。。今后怎样？。。。还会更糟吗？

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好象一下子钻进一个漆黑的隧道，什麼也看不见了。

隧道的出口在哪儿？

出口外面，会是什麼样的世界？

报纸上的文章，一篇篇火药味挺浓的，毛的接班人誓言继续高举毛的大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十年了，还没到底呀？文化大革命前的党中央委员都斗掉了一多半，还要斗掉多少才罢休？

毛的追悼会上，华XX，王XX，叶XX，张XX站在一排，阴沉着脸。他们在想些什麼？

他们都想得一样吗？说的是“紧密地团结在以华XX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真的还是假的？

神州大地，人们保持沉默。在沉默中生存，在沉默中观察，在沉默中思考，在沉默中期待。

父亲还在顽强地和病魔搏斗，我们四处打听治癌的土方，偏方。从芦笋到癞蛤蟆皮，都找来试了。在医学还没有发达到可以攻克癌症之前，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民间药方，兴许能出个奇迹。只要有救命的可能，稻草也要抓。

一天清晨，我去华东医院看望父亲。突然，看到路边墙上贴着几张标语。

“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看得出，标语是匆匆贴上去的，连浆糊还没干。

痛快！虽然当时我还不忍大声欢呼，心里那个痛快啊！

这是谁贴的呢？围观的市民在交头接耳。据说一些外地来上海读书的大学生，从北京得到一些消息，昨天半夜里就上街贴标语，他们已经被工人纠察队抓走了。

市民们只是看，没有言语。从他们漠然的表情上，你看不出他们是高兴呢，还是愤怒，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这是最安全的表情。大家都学会了防卫自己，我也是。

一个市民离开，装模作样地说了一句，“反动标语！”然后匆匆地走了。

我兴奋地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也非常兴奋，他悄悄告诉我，“这都是真的。”“咦，你怎么知道？”原来，父亲隔壁病床是一位煤炭工业部的付部长，他从北京来上海主持一个会议，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他的消息灵通。

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XX，徐XX把盖子捂得死死的。《解放》，《文汇报》两报上根本看不出四人帮垮台的信息。各单位领导接到市委指示，要他们管好本单位职工，严守秩序，不许上街，不许游行，不得轻举妄动。

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只维持了几天，终于，火山爆发了。

象决堤的洪水，象激怒的蜂群，象漫卷的野火，象呼啸的飓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上了街头。解放以来上海市

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群众性游行开始了。

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打倒四人帮”，举着自制的横幅，“打倒四人帮”，干脆敲着家里的盆盆罐罐，“打倒四人帮”。

有的商店放起了鞭炮，“嘭”，二踢腿窜得好高，“啪”，炸开了散了一地。有的商店用竹竿挑着个大乌龟，那乌龟倒挂着，四只爪子在挣扎。

“王八蛋，你也有今天！”马路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涂写着标语。

“清炖姚文元！”“油炸张春桥！”“红烧王洪文！”“爆炒江青！”我兴奋得象个小孩，从一清早就汇入群众游行的洪流。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自发地加入游行队伍。这是完全自发的游行，大家并不认识。然而，秩序井然，一人喊口号，大家都会跟。队伍向市革委会方向走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前进，进！

队伍在行进，人们开心地笑着，爽朗地笑着。这是发自内心的笑，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笑容。上海人在国内的名声一向并不太好，普遍的看法是“门槛精”，尤其善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观望。其它地方的人对我的最高评价往往是“你不象上海人”。这一次，上海人也走上了街头，倾泻自己内心的感情。打倒四人帮，高兴啊，上海人也控制不住了。

走过淮海路，延安路，南京路，一路往东走到外滩，再沿着黄浦江畔来回走。从清晨一直走到傍晚，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直到天黑，游行队伍才慢慢稀疏，不少家庭到餐馆继续聚餐庆祝，意犹未尽。

这些年来，一直是那些弄潮儿在台前台后跳来跳去，广大民众是沉默的多数。今天，沉默的多数呐喊了。尽管这么多年用阶级斗争理论（更准确地说，用血统论封建理论）来改造民众的思想，中华民族的传统善恶准则并没有从人们心中抹去。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大伙儿心里亮堂着呢。

有了这一条，中国就有希望！

原来，我所想的，我所感受的，和大伙儿想的是如此相近，如此不谋而合。我不再感到孤单，心里从来也没有

象现在这样充实。

因为，中国有脊梁，中国有希望。

电视台播送首都人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记得是由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X主持的。我永远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人民胜利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多少年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那些长眠在戈壁滩的战友们，如果能活到这一天，如果能听到这句话，该多么高兴！

假如上帝开恩，允许每个人在离开人世时，带一句他最喜欢的话，我就带这句。

父亲默默地去死了，平静地闭上了眼睛，再也不用在这纷杂的尘世中挣扎。

他在抗战期间去美国学习美术，是我国最早进入芝加哥美专和Yale大学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的学生之一。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和国内绘画大师刘海粟联系，兴冲冲地赶回中国。他也许太性急了一点，抗战结束回国，回的是国民党的国。要是他在美国再呆几年，后来所受的苦难可能会稍微轻一点。

与他同期或稍后出国的学友，同窗赵无极，朱德群等继续留在国外攻读美术，他们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画家，法国国家骑士勋章的获得者，获得了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的尊重。

我父亲选择回国，处境就大不一样。

解放前，因为同情爱国学生运动，被人告“共产党嫌疑”。系主任也不当了，仓惶逃到乡下躲避抓捕，靠打零工，做家庭教师熬到解放。解放后的遭遇更不用说，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到死还背着“特务嫌疑”。

实际上他什麼也不是，一个不懂政治，只会凭良心勤勤恳恳搞业务的一介书生而已。他把自己这一代毁了，自己的专长给埋没，下一代也给毁了，直到临死，子女上山下乡连一个上调都没有。子女上大学连边都沾不上，即使进了也被开除出来。自己的家也被弄潮儿党员霸占，只能栖居在上海屋檐下。

一念之差，结局竟会这么凄惨。

为什麼差别这么大？因为回国的缘故？

怎么说呢？热爱祖国，要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祖国，并没有错。如果不回国，他也不一定能达到同窗好友这么高的成就。因为它不仅与个人的才气，勤奋努力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环境机遇有关。

然而，他至少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不会戴高帽子游街，不会挂牌子批斗，不会被抄家，房子不会被人霸占。他的子女也有正常的学习工作权利，不会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更不会莫名其妙被大学开除吧。

祖国，我爱你。但是，你爱我吗？

因为他不善于做人？

这话算说到了点子上。书呆子不会做人，傻里傻气，必然被社会淘汰。什麼阶级烙印，这套血统论全是假的。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老教师中，他恰恰是为数不多的贫下中农出身，从小边放牛边自学画画成材的。要会拍马屁，会做人，会奉承，会随机应变，这才是真的。

解放前吃得开的，解放后照样吃得开，解放前混不好的，解放后照样混不好。当年把父亲打成右派的推波助澜人物，恰恰是解放前也混得不错，还有在解放前当福建省高等军事法庭法官，亲自判了几个共产党员死刑的。别看他们业务不怎么样，跟领导关系堪称一流。父亲不会吹吹拍拍那一套，结果遭了报应。

什么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哈哈，这全是假的。

父亲相信党相信组织一辈子。党也好，组织也好，从不买他的帐，到头来只落得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个当年密告父亲是“共产党嫌疑”的，49年跟着老蒋跑到了台湾。如果他今天从台湾回大陆观光，说不准哪一级政协主席还会亲切接见。

文革前，文革中把父亲往死里整的共产党员，革命派，弄潮儿，文革后无一例外的削尖脑袋跑到美国，拼命巴结侨界名流，公司老板，现在比谁都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社会，认钱不认人。

社会主义社会，认拍不认人。

父亲默默地走了，带着满身的辛酸，带着常年的迫害，带着批斗的屈辱，带着全家的贫寒，默默地走了。

我问过父亲，“你后悔吗？如果你留在美国，也许已是位知名的画家。”父亲摇摇头。

我又问父亲，“你遗憾吗？子女全家受你牵连，只能修地球，永无出头之日。”父亲点点头。

然而，有一点父亲是可以感到欣慰的，那就是他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奋起。历史的巨轮转过了艰难的一圈，地平线上已露出了曙光。虽然我们家庭还看不到一点光明的前景，但是，寒冬已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回到新疆，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

听大伙讲，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学校，整个学校欢乐得象开了锅。

老师们聚集在一起，聚餐庆祝。那天，老师们都变了样，疯了。平时板着脸严肃的，现在纵情大笑。平时不喝酒的，今天破例了。平时很少活动的，这次又唱又跳。

有个女老师，嗓音很好，可哪次学校活动叫她唱个歌，她都死活不干。今天出奇了，她主动站出来为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连那位教英语的老夫子，也要给大家唱个歌，非唱不可。

四人帮作恶多端，全国上下，要找个不痛恨四人帮的，难！金氏记录呀！

我回到了学校。

象春风掠过冰封的大地，冰开始化了，神州出现了曙光，中国终于开始变了。

报上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说得好哇！明明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还说什麼一句顶一万句，睁眼说瞎话。明明害苦了老百姓，偏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哪能不坏事。造神运动只能造出迷信，造不出真理。

大起大轰讲形式的“农业学大寨”不提了，代之以讲究实效的包产到户，那位做到副总理的标兵，也请他到适合他工作能力的地方去干活了。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好象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变香了。

记得我在73年就向弟弟妹妹预测中央在5年内会创造一种理论，使知识分子香起来。才过了三年多，这不，真的应验了。哇，我怎么聪明得邪了！

学校里也不讲学黄帅了，要回到尊师守纪的老传统。

变了，变了。有人笑了，有人愁了，有人发了，有人穷了。

对这些变化，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和看法，甚至有人指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可避免，众说纷纭嘛。过一段时间，表面的泡沫破碎了，里面的泥沙沉淀了，再来评价这些变化，也许会更清楚些，更客观些。

那，你是什麼看法？

我？我对这些变化的看法当然是肯定的，欢迎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不管怎么变，已经不可能比原来更差。因为，对平民百姓而言，就算是资本主义，也比封建主义的日子好过。只有对于王公贵族，过去的年月才是他们为所欲为的天堂。

同样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忽然变得富裕了。新鲜蔬菜，鸡鸭鱼肉在农贸市场冒了出来，生蹦活跳的。再也不用天不亮起来到菜市排队，用肉票买可怜巴巴的半斤猪肉。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衣服，装饰，不用耽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棒。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长大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不会天天有一群大娘大婶拥在门口敲锣打鼓喊口号：

“上山下乡光荣！留在城里可耻！”

即使你触犯了法律，做了坏事，也有法庭审判，告诉你判的原因，还允许你辩护。

也许现在还做不到真正法大于权，总比我们那个年代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甚至连处分你的原因都不告诉你强吧。

如果你留恋，怀念那个年代，可以呀，就怕你口是心非。应该开辟一个特区，让你们去那儿过过瘾。发给你们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副食品券，豆制品券，工业券，。。。当然，还有红宝书。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别忘喽，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分分秒秒讲哟。每次在你们中间抽出百分之五，作为阶级敌人揪出来。抄家，戴高帽子，游街，九十度，飞机式。然后出现两派，势不两立，文攻武卫，。。。。。

哎呀，太来劲了！我要承包这个特区！让外面人来观光，一定生意火爆。当然，进这特区的人一定要事先签约。万一你受不了自杀，或者被革命派整死，那是你自作自受，我可不负责。

瞧，又扯远了。

我们身在遥远的边疆，欣喜地看到祖国大地发生着一桩桩可喜的变化。这些年来，祖国遭受的创伤太深重，生

产建设被破坏得太深重，人民大众经历的苦难太深重，堆积的冤假错案太深重，积重难返哪！要拨乱反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是，国家领导人想为人民干点好事，他们也确实在一件件办了，这就好。

这些领导人中，不少过去曾附和过红太阳，做了伤害人民大众的事。文革恰恰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亲自体验了挨整的滋味和残暴。同时，文革把他们下放到基层，接触到苦难的大众。他们看到了危机，看到了不改革开放必然亡党亡国。

终于，一批共产党员站出来了，勇敢地迈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这里面包括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XX和胡XX。至于后来的一些事态及变化，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开始反思自己找到的真理。它的确指引我走过艰难的岁月，它的确无往而不胜，它的确解释了我从小以来想不通的一切问题。但是，会不会太偏激了一点？

我们所接触到的共产党员，主要是那些训斥我们，对我们实行专政的。他们其实是那些跳进跳出靠整人吃饭的，当然多半不会是好家伙。在那个年头，靠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活是爬不上去的。只有靠整人，靠打小报告，靠见风使舵，靠吹吹拍拍，靠欺上瞒下，靠践踏狗崽子，才能显示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才能扶摇直上。

看来，党内还是有一批沉默的，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他们没有泯灭自己的良心，对这一系列整人的政治运动，他们保持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四人帮垮台，这些人才浮现出来，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类型的共产党人。我找到的真理固然不错，但不应当指他们，注意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那段时间，听到的消息都是那么振奋人心，看到的变化都是那么有利于民，我几乎要认为自己找到的真理已经过时了。然而，一篇《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让我头脑冷静了起来。不！不要太乐观。正如毛主席说的，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些靠整人吃饭的坏家伙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不能轻易放弃历尽磨难才找到的真理。

一天，一位老师拿着一张《人民日报》，气急败坏地走到我房间。

“你看看，怎么会登这样的文章？”

《人民日报》一整版，登的是当年鬼见愁血统论对联的鼓吹者，赫赫有名的谭XX控诉四人帮对他迫害的文章。

才看了没几段，我的心就猛的一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上来了。

依然是八旗子弟那种蛮横，永远是别人不对的口气，依然是那种墨索里尼永远有理的逻辑。这位谭XX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毫无忏悔，毫无内疚。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说成是四人帮利用一个年青人单纯，不成熟的话大作文章（是这样的吗？看看附录吧，连一点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然后愤愤不平地控诉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说什么由于他的牵连，他弟弟参军，入党，提干都受了影响。

够了，够了！参军，入党，提干，这么奢侈的字眼，广大的平民百姓子弟连想都不敢想！当你们挥起沾满血迹的皮带，哈哈大笑地看着千千万万狗崽子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时，有过一点侧隐之心吗？上千万的同龄人还在农村边疆艰苦奋斗你不提，却为弟弟不能坐云霄飞车向上爬而耿耿于怀。株连九族不正是你所鼓吹的血统论的精华吗？只体会这么轻微的一点“牵连”，你就受不了？

死个万把蚁民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八旗子弟能轻易碰的么？

看完这篇文章，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四人帮的确干尽坏事，但是，审查你谭XX不是坏事。如果硬要算到四人帮头上，那就是四人帮干的难得的一件好事。

就算这个谭XX是一派胡言，《人民日报》的编辑是吃素的？他们审稿时应该能看出这样的文章登出来会产生多么拙劣的影响，起码要加点遮羞布。

我国有多多少少受四人帮迫害的家庭，随便找一个都可以写出十分感人的报道。为什么偏偏报道这么一个活宝？

雨过天晴，沉渣浮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看来，副统帅，四人帮手下的八旗子弟刚下场，又要换上这帮八旗子弟来掌管国家大印了。若大的一个中国就找不出其它人了，非要靠这帮八旗子弟掌权？

经过文革，确实有一部分党员，领导看到了过去的问题，体察了人民的苦难，开始着手顺应民意的改革工作。还有一部分，只是耿耿于怀自己被整，并没有想到一点老百姓，这个谭XX和他的保护伞就是。

并不是都变好了，也不是都没变好。

唉，中国还有苦难，人民还有苦难。

1977年秋天,学校校长调离,当年一起混的牛鬼们向团里推荐我接校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代。在正常的年代里,我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巴结领导,提拔当官的事绝对找不到我。而且,我是曾经被大学开除下来的,有“历史问题”,即使团里想用我,也会怕沾上阶级路线不清的污水而作罢。可在文革中,我和这些揪出来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混在一块儿。不但从不检举揭发他们,而且晚上和他们嘻嘻哈哈聊天。大家相当熟悉,我理解他们是挨整的,他们也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司务长期间,我还尽挑牛鬼蛇神进食堂菜地,真成了牛鬼班班长。

记得有一次,我要一个历史反革命当菜地组长,指导员用怀疑的眼光瞅了我半天,“他是历史反革命,在菜里放毒谁负责?”“如果菜里放毒,我负责。如果不用他,连里没菜吃我可不负责!”说起来,他还是个老革命呢。从东北加入解放军,一路打仗到新疆。1949年进疆时已是个排长了。社教时,他是连指导员,场党委委员,被人诬告家庭成分地主,就莫名其妙地开除党籍,成了混入党内的历史反革命。

“我从小是放猪的,被国民党抓壮丁,怎么会成了地主?”他告诉我,社教运动中全师揪出15人,全都是冤案。

“嗨,我也是在社教运动中受迫害的,我当然理解。”咱们俩越说越热乎了。

我手下的炊事班长是个自流人员,湖南人,姓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少地方断炊断粮,老百姓大批饿死,有的村庄人都死绝了。不能等死呀,还有点力气的,背井离乡,流浪,要饭,只要能给口饭吃,做什么都行。不少人流浪到新疆,就叫做自流人员。

老彭并不是庄稼汉,1958年,他已是湖南某县的一位年青的县委干部。那时搞大跃进,放卫星。各级领导怕落后,竞相虚报,假报产量。亩产粮食可以报到十几万斤。老彭看不惯,站出来反对,说不能造假,要实事求是。

结果呢?他被打成右倾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老彭一赌气,和年轻的妻子离了婚,独自跑到了新疆。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了当时的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什么。

“什麼天灾，是人祸！”一天晚上，都半夜了，老彭坐在床头，拿着一张信纸，两眼熠熠发光。

“老彭，怎么啦，这么晚了，不想睡了？”“我女儿上中学了。。。 ”那天晚上，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彭打开了话匣子，谈了很晚很晚。。。

瞧我这记性，唠唠叨叨的，说着说着讲到我的牛鬼班。

粉碎四人帮，牛鬼们官复原职，不忘老班长，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交了那么多当官的朋友。

政治处的组织干事，也是昔日落难时的老朋友了，天天到我屋里动员我接校长。我那张嘴怎么说得过他们。

“我有‘历史问题’。”“嗨，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怕，你耽心什麼？”“我哪是当官的料。”“没关系，我们支持你。”“我没能力。”“行了，行了，别谦虚了，我们还不了解你？”“我觉悟低。”“就冲你的觉悟找你。觉悟高的还不知把孩子们带成啥样的。”三说两说，我无话可说了。老朋友的情面难却，一个星期后，我点头了。

只有经过奇怪的年代才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我这种背黑锅的竟然当起了副校长。

学校没有正校长，我实际管全盘。按兵团规定，正职领导必须是党员，我永远也不可能。

我当校长的故事等会再说吧。看官们早就不耐烦了，他们要听爱情故事，就是柔情缠绵，或者揪心揪肺的那种。

哪有啊！

自打找到了真理，我就下决心不在新疆成家。尽管这里的父老乡亲纯朴善良，我不甘心在这闭塞的环境下生活一辈子。兵团规定单身三年探亲一次，双干户（成家的）十年探亲一次，谁还敢成家？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尽管支边青年都想回城，时间长了，少量能飞的都飞走了，飞不走的也绝望了。陆陆续续的，支边青年开始结合了，到1975年，除了寥寥无几三四个，其余的都成了家。我虽心灰意懒，知道离开农场无望，还是死硬着不成家。

有好心的哥儿们作介绍的，婉言拒绝了。有勇敢的姑娘主动表示的，婉言拒绝了。我的心已死，看破红尘，什麼也不想了。

家里急了，母亲更急。

有一位母亲的朋友，向母亲推荐了另一位朋友的女儿。她母亲工作单位从上海内迁到昆明，把她也带到了昆明。她在昆明一家纺织厂工作。姑娘听介绍人说了我的情况，挺爽快地答应谈。她母亲倒很担忧。因为自从她内迁

到昆明后，长期夫妻两地分居，吃够了苦头，她希望下一代再不要受这份两地分居的苦了。只要我能调到昆明附近，哪怕在郊区农场也行。

母亲把消息告诉了我。虽然我从未见这位姑娘，连照片都没见过，更没有谈过话，想想人家不嫌弃咱这戈壁滩农场的，还背着莫名其妙的历史问题，凭这点就把我感动了。但要离开新疆，何其容易！

我写信告诉母亲说，我没意见，咱们使使劲看，争取调离新疆。只有到调离成功后，我才和她直接联系。调不成就算了，咱不能害人家。

这是1975年。

这真是世界上最古怪的恋爱之一。我和她从未认识，从未见过面，讲过话，从未通过信，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可她知道我在努力争取调动，我知道她在等我。

就凭我这种老实巴交的人，还想调离新疆？没门。我要调成了，新疆早就没人了。

努力了两年，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精疲力竭，彻底绝望了。

我告诉母亲，算了吧，我这辈子是出不了新疆了。赶紧通知人家，别拖人家时间。

母亲不死心，再试最后半年吧，不行一定通知人家。

就在这时，平地一声惊雷。

恢复高考了！年龄放宽，老三届年龄都能考！我的年龄恰恰是六六届年龄。

上天有眼啊，给咱们平民百姓放开了一条路！我心里清楚，如果党委推荐，我连边都沾不上，可如果参加高考，我十拿九稳进入新疆前几名。咱要求不高，考个云南的师范学院就行了。只要能到昆明附近，考个师专也行。

顺利报好了名，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这几年正好在学校教书，现成的，连专门复习都不用，可以直接上考场。我想，那位远方的姑娘一定也是欣喜万分，相信我准能考出来，说不定正在掐指计算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出来呢！

有个印尼民间故事。说的是一位农妇上街卖鸡蛋，暖烘烘的太阳晒得她昏昏欲睡。

朦胧中，看到蛋生鸡，鸡生蛋，蛋再生鸡，鸡再生蛋，越来越多，卖了好多好多钱。

于是买了房子，雇了仆人。仆人端茶上来，太烫了。她生气了，踢了仆人屁股一脚。。。

蛋全被踢破碎，她的美梦也完了。

我当时大概也象这位农妇，高兴得得意忘形了。

高考越来越近了，我胸有成竹，有时忍不住来点胡思乱想。

十二年了，现在快要离开农场，重上学堂，回到家乡，还要成家了。这不是梦吧？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好象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真的吗？让我看看。。。

上卡车了。。。林带，渠道，沙包，戈壁，渐渐远去。。。哦，还有和我一起度过苦难日子的农场兄弟们，再见了。。。上火车了。。。过了吐鲁番。。。过了乌峭岭，秦岭。。。过了黄河，长江。。。故乡啊，我回来了。。。

一条狭窄的弄堂里，我敲响一间小门。。。那位远方的素未谋面的姑娘过来开门了。。。

“我来了。真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她是什麼模样？胖的，瘦的，美的，丑的？谁知道呢，心好就行。。。她会大大方方地说“快进来，快进来”，还是腼腆地笑着不说话？谁知道呢。。。

我该开口向她求婚了吧。。。该跪下一条腿？那多难堪！。。。算了，到时间看着办。。。姑娘答应了。。。嗨，哪能这么轻易答应，人家是黄花闺女呢。。。那这么着，。。。姑娘涨红了脸，最后羞羞答答地点了点头，算答应了。。。这还差不多。

我这就成家了，一个温暖的家。。。下班回来，粗茶淡饭，但是和睦恩爱，相敬如宾。。。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新疆十几年都没看上电视，现在家里就能看，多幸福。。。看新闻联播，还有足球赛。。。带球过人。。。沉底传中。。。好！

。。。起脚。。。射门！。。。

嘭！。。。电视机碎了。。。美梦碎了。。。

这一脚不是我踢的，是上面踢下来的。

高考前一天，专区招生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到农场（垦区）招生工作组，上面写着：

“不准DDN进考场。”为什麼？为什麼！

犹如五雷轰顶，所有的幻想，美梦，期待，全部完了。十多年哪，才盼到这一个机会。

我急急找到招生工作组的人，问为什麼我不能上考场。他冷冷地回答，“你不是老三届，这次高考没你

份。”“可其它不是老三届的知青为什么就能参加这次高考？”“你已经考过一次了，你心里应该清楚为什么。”是很清楚，就为我被北大开除这个“历史问题”，我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可中央不是说重在表现吗？我这十几年的表现还不够过硬吗？不信你可以问问这里各级领导，他们可以作证。

没用，没用。什么重在表现，这全是假的！

第二天，各团场考生兴高采烈地走进考场。我怔怔地望着他们，两腿发软，好象在一艘冰海沉船上望着他们上了救生艇。

眼前一片漆黑，完了，全完了。

我写信告诉母亲，我唯一的希望破灭了。赶紧通知人家，不要耽误她了。

母亲还在犹豫。

不能再拖了。我决定第一次向她的母亲。。。差一点就要当我丈母娘的。。。写了一封信，一封断交信：阿姨，您好！

。。。。。。

很抱歉，耽误了她两年宝贵的时光。我已经没有希望离开新疆了，请她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赶紧寻找自己的幸福。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不饶人。

。。。。。。

你们不必为我操心，即使呆在新疆，我也不会垮下去。

衷心祝愿你们全家幸福。

信寄出去了，我的心反而平静了。

现在，我只有一条路，一条唯一的路了。我反正已经豁出去了。

告御状！

向中央告状，要求平反冤案，重返北大！

-----附录：从对联谈起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作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全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决非大多数，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是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幅对联的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怕”，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是不痛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作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份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刚掌管学校不久，高考制度恢复，老百姓莫不欢欣鼓舞。

然而，七七年高考的结果，我们团的考生剃了光头，附近好几个团的考生也剃了光头。空欢喜一场啊。

比起党委推荐制，高考要公平得多。不怨天，不怨地，也不怨没个好爸爸，只怨我们自己的教育质量跟不上，不服不行。

我这个连参加高考都通不过政审的校长，该怎么抓这个学校？

唱唱高调？宁左勿右，可以少犯错误。

什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啦，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啦，我要唱也会唱。要这么唱，我就不是我了。

我是谁？不就是资产阶级白专苗子麼。咱只会资产阶级那一套。如果你要无产阶级的，别找我，找那些弄潮儿去。

想清了这一点，我就坦然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就抓教育质量，等着下一次文化大革命挨批斗。

说穿了，在连队混了这么多年，咱怎么会不了解乡亲们的心愿？农场的干部也是一样，因各种原因来到这戈壁滩，再出不去了。就盼着自己子女能比自己强，能学点真本事，干点技术工作，上中专大学，甚至飞出农场，飞出新疆。

在文革期间，这种心愿，大家都明白，可谁也不明说。怕扣帽子嘛。

算了，咱就做点好事，谁叫俺点了头答应当校长。今后哪一场运动给整了，记得给俺上支香就行。

先抓教师。要让学生有一碗水，教师就得有一缸水。农场学校教师，不少都是照顾这个参谋太太，那个干事太太调来的。当然有的很不錯，有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要调有真才实学的进来。

再抓学生。咱不讲那些漂亮话，就要让我们这个学校年年有学生考上大学，不再剃光头。有上榜学生领头，其他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就带上了。学生就是要学习，学校不是游乐园。当然，也要教学生做人。要有中国的传统美德，诚实，正直，勤奋，热心助人。不要带什麼阶级斗争眼镜，那玩意儿带上看什麼都走样。

还要抓制度。没个规矩学生就放羊。

就算是我的三把火吧。

三把火不好烧，烫手。

团里有三只出了名的凶悍的母老虎，干部家属，谁都不敢惹。我上任不到一年，这三只母老虎的屁股，就摸了两只。

一只母老虎的儿子，一向调皮捣蛋，欺负女同学，老师也不敢碰。一次上课他又摸女同学身体，老师把问题上交，看我怎么办。这样下去不行，给予警告处分！

母老虎毛发怒竖，气势汹汹走到学校操场，吼声如雷。

“D校长，你给我死出来！我X你妈，我X你姥姥，。。。”

不到半个时辰，我的祖宗十八代，都给骂翻了。

“我的妈呀，我长到这么大，还没听到这么凶的骂人话。”一位女教师颤抖地说。

我走出办公室，向母老虎走去。

老师们隔着办公室的窗口看着。

学生们躲在教室的窗口后看着。

“这里是学校，不准影响学生们上课！走，有事到团政治处谈。”

我不管她什麼反应，径自朝团部走去。她一愣，决不定留在操场还是离开，最后骂骂咧咧地跟我到了团部。

政治处主任两边磋商，我坚持不让步。只有在她孩子确实改正自己的坏习性后，才能撤销处分，否则，我下台可以，处分不能改。主任不愧是做政治工作的老手，不知他怎么说的，母老虎竖起的毛发搭拉下了，嘟嘟囔囔地走了。

学校好些年没正常考试，也没有升留级，班里学生的程度相差很大。老师没法上课，程度好的饿死了，程度差的撑死了。

学校决定恢复考试，恢复升留级，考不及格就留级。这下可好，有的班一家伙留下去半个班。另一只母老虎的女儿也留了级。这母老虎压根儿没受过这样的气，这还了得！

她拖着老公，来到我办公室。一进门，她双手叉腰，站在门边。有了老婆撑腰，公老虎发威了。

“你们的升留级根据什么？把上级文件拿给我看看！”

那时百废待举，上面根本顾不上学校制度，哪有文件？要等上级文件，早把学生们耽误了。

“这是我们学校规定的制度。”

“没有上级文件，你们规定的不算数！”

“学校有权规定制度。到这学校上学，就得遵守这学校的规章制度。”

“我的女儿不要上你这个臭学校！”

“学校制度不会变，上不上是你的选择！”

开学了，他们的女儿满脸不高兴，走进了留级的班级。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当时那样做是不是太急了一点，太猛了一点？如果是那样，那我应该向受影响的学生道歉。如果历史证明是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

不管怎样，学校的教育质量上去了。专区组织高中数学统测，我们这个偏远的农场高中，竟然获得平均成绩第三名。78年高考，我们学校有学生考上大学，不再剃光头了。同年附近团场还是光头。79年高考，我们学校有学生考上中央民族学院，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老师这把火更烫手。

学校决定招考老师，而不是由团里指派老师。这下团里大哗，议论纷纷。

为了避嫌，我让教导主任负责出题，监考，改卷，一切我都不参与。结果，考得最好的恰恰是农业连队的两名上海知青。这一下流言满天飞，什么D校长把题目偷偷地告诉连队知青啦，D校长偏心，D校长要搞上海帮啦，应有尽有。越传越荒唐，连D校长不要脸，D校长对女学生不怀好意都出来了。

说吧，说吧，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大不了下台，我本来也没想当官。但是，要压我退让，不可能！

好在团领导支持，招考老师的制度，坚持下来了。

缺教高中的老师，知青中已不太好找。

学校的协理员（兵团搞政治工作的，团级叫政委，营级叫协理员，连级叫指导员），老干部，真了不起，他的思想比我还解放。

“兵团有许多右派，高级知识份子，找他们来教书。”协理员提议。

好主意！我真佩服他的勇气。

协理员出差了，他走访各团场，带回三位右派。

一位也算是老资格了。57年反右前，他已是兵团司令部宣教科副科长了。整风时叫他们去开会，一定要他们帮助党提意见，不提不散会。他只好说了，提了两条。

一条是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有过也有功。一条是学苏联不能什么都学，要学他们好的地方。比如苏联的牙膏质量就不如我们，不必学他们。

没多久，《新疆日报》头版，大标题为“揪出反苏份子XXX！”他成了右派。当时中苏两党还没有闹翻，还在蜜月期，我们党还跟着老大哥骂斯大林。可不久两党闹翻，骂架了，以后九评都出来了。当年揪他反苏份子的弄潮儿摇身一变，又成了反修先锋。可他这位有政治远见，早就说出九评的话的，依然是右派。

一位当年是重庆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还是校学生会主席。整风期间，他和校团委书记两人代表重庆大学去北京参加全国青联，学联代表大会。回来传达大会精神，团委书记滑头，推给他传达。他傻不几几的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反右一开始，他就被打成了右派。

谁叫他老老实实传达大会精神，人家在引蛇出洞呢。

还有一位是北京的中学教师，向校长提了点意见，就成了反党份子，右派。打他右派没说啥，可说他反党份子就想不通。

“这校长本人就不是党员，向他提个意见怎么成反党？”

1978年年底，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给全国右派落实政策。按照文件要求，右派本人必须打报告要求落实政策，然后上级审查，重新下结论。

真是好消息啊，那就赶紧通知这三位，让他们打报告。尤其是那位宣教科长，这么有政治远见，早就该平反。当协理员通知他时，各位看官，你们猜怎么着？

按照国内电影，电视的模式，逃不脱这一幕：

特写，镜头拉近，一双布满皱纹的眼睛。

一双惊奇的眼睛，由惊奇转为迟疑。

慢慢地，眼睛湿润了，泪水涌出眼眶。

嘴张开了，嘴唇开始抖动。背景音乐声起。音乐声渐强，迸发出一声呼喊，

“感谢。。。党啊。。。。。”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科长的反应完全出乎我们意外。

“校领导，饶了我吧。这么多年下来，我已是惊弓之鸟。现在刚过了几天安定日子，我不想再折腾了。”

“不行，你必须写。”我告诉他，

“如果今后有人找你麻烦，你可以告诉他，不是你要写，是我让你写的，我不会推卸责任的。但是现在，你不能不写！”

这回党中央给右派落实政策是玩真的，不是引蛇出洞。

我们学校三位右派老师全部平反。

1979年，我离开学校以后，这位当年的宣教科长接任校长。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告别新疆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它的时候，

好象那哈密瓜，断了瓜秧。

白杨树下坐着我心爱的姑娘，

当我离开她的时候，

就象那都它儿，断了音响。

啊，戈壁滩上的来客，到了离开的时候。

1979年春天，我写给北大，教育部，国务院的上告信引起了注意。经过中央派人调查，弄清了这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平反工作正在进行，重返北大指日可盼。

北大已经调档，那位寄档案的政治处组织干事笑着告诉我，

“你的档案不轻呀，254克。”

在上告申述冤案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两类完全不同的干部。

这些年来，干部升迁的标准，离不开“路线斗争”。投靠的主子升了，你也上了。主子垮了，你也完了。所谓一人成佛，鸡犬升天也，个人的品质，操守和能力不是重要的。

这不是，文革一开始，刘邓阵营下的人马，呼啦啦全倒了。付统帅，四人帮旗下的，扑腾腾往上窜。文革一结束，原先神气的全萎了，原先倒下的又官复原职，神气了。当然，也有路线斗争高手，可以在不同阵营跳来跳去，永远是不倒翁。

老百姓看问题就不一样，认人唯贤。管你哪个阵营，哪套班子，如果这干部踏踏实实，关心群众，作风正派，就是替老百姓办事的好干部。反之，就是欺压百姓的坏家伙。实际上，哪个派系里还都有一些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哪个派系也都有一些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

四人帮垮台后，靠边的老干部们又回来了。十年风雨过去，有的体察到老百姓的疾苦，开始认认真真为老百姓做些事，包括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所产生的冤假错案。有的劣性不改，对自己被揪斗耿耿于怀，但对自己所整的人，所做的坏事毫无悔改之意。

这两类干部同时散布在祖国大地各处，给老百姓带来了十分错综复杂的感受。

有时闻到了春天的气息，有时又感到料峭的冬寒。然而，大气候是开始变暖了。

我所接触到的北大的干部，很幸运是属于第一类的。

学校和系里接到教育部转去的上告信后，认真地核查当年取消我学籍的材料，并派人调查当年诬告材料的真实性。学校的一位领导，当年是他签名批准取消我的学籍，这次又是他签名批准恢复我的学籍。

尊重事实，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我所接触到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干部，很不幸是属于第二类的。

我寄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告信，是我母亲亲自送给校领导本人。校领导一看，马上大发脾气，把信扔了。

为什么？

理由是“我们不接受个人申述，我们只接受组织对组织的申述。”

不对吧，哪有受害者本人不能申述的？我寄给国务院的信不也是个人申述？恐怕是你们自己心中有鬼！

这难不倒我。新疆的领导知道我在文革十年的表现，他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

协理员在我的申诉信后写上了“DXX同志申诉的问题，应当落实，应当解决。”团政治处盖上了大红章。

这回戏剧学院无可奈何收下我的申诉信，但是从不调查，从不处理，也从不给我任何答复。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冤案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北京来人到戏剧学院调查了。

戏剧学院尽了最大努力干扰，刁难，拖延。最后，调查人员终于冲破阻挠，见到了当年写我诬告材料的孔某本人。当调查人员问他为什么写一个从无接触来往的教职员工的材料，有什么事实根据时，孔某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时我资产阶级思想膨胀。。。 ”

于是，不到五分钟，一桩长达十五年的冤案，就真相大白。

在千千万万蒙冤受害者中，我算是幸运的一个。

这样的事，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不应该拖这么久才解决。

假如当时告诉我开除的原因呢？

假如当时允许我申诉？

假如当时老百姓有地方可以上告？

假如党政干部利用职权陷害别人有罪，要受到惩处呢？

答案是清楚不过的。

假如后来我遇到的不幸都是第二类恶衙内呢？

答案也是清楚不过的。

十五年过去，再弥补也不可能完全弥补了。

但是这件事本身，却可以引出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如果由此能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再不要受陷害，我

们所受的冤屈，也算值了。

1979年初，上海推出“顶替”政策，就此可以解决一部分上山下乡知青回城问题。我母亲马上办了退休手续。我们家几个子女都上山下乡，这一个顶替名额给谁呢？

弟弟妹妹都说要给我，理由是我出去时间最长，地方最远，生活最艰苦。可我眼看要平反回北大，这不把顶替名额浪费了？

“浪费了也认了，夜长梦多，早回来早放心。”弟弟妹妹异口同声。

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舍不得浪费这个名额，来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可我在回信中却说，我也认为自己最合适。

太自私了吧！也得替弟弟妹妹想一想。

我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如果我能早几个月回去，集中全力帮弟弟妹妹补习功课，数理化全包了，我相信一定能帮助他们考上大学。丢了一个顶替名额，换来几个大学名额，还是划得来。

就这么定，我办顶替。

离开新疆的告别礼，却是意想不到，难以忘怀。

四月初，到师政治部办退干手续，接待我的竟是当年一同去上海招生工作组的老熟人。他正有一件头痛事，要我帮帮忙。

原来顶替只对未婚知青，那些成了家的知青，就完全绝望了。一些成了家的知青，拖儿带女，来师部知青办绝食请愿，请求让他们回故乡。

他们睡在知青办的沙发上，地板上，搭着一条毯子，一气不哼，已经是第五天了。我那位老熟人正是知青办的，不能出人命哪，出了人命可不好交代。

绝食不吃饭，喝点水总可以吧！

他在水里加了糖，递给绝食知青。绝食知青喝水时发现加了糖，连水都拒绝喝了。

“你是他们老乡，请你帮我劝劝他们喝水。”老熟人本人不是上海知青，希望我出面帮帮他。

要是平时，我一定会去劝的。

可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太尴尬了。

说什麼好呢？你自己顶替回上海，再来假惺惺地劝人家，象话吗？

“我真的很难说话。。。我来师部办顶替手续回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劝他们，他们会更反感的。。。 ”

老熟人只好自己去了，

“喝点水吧，这回保证没加糖。”

绝食知青们没有反应。

“喝点水吧，你们老乡也来看你们了。。。 ”

绝食知青们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

这是什麼眼神啊！带着绝望，带着怨恨，带着哀伤。

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我低着头走开，活象战场上的逃兵。

我希望他们能吃点东西，别把身体搞坏了。我更希望他们也能有机会回到故乡。

在戈壁滩十多年了，谁都忘不了浦江水呀。

十多年前,高唱着“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不正是他们吗?坐在颠簸的卡车上,满脸灰沙,还咯咯地笑着的,不正是他们吗?

理想破灭了，只剩下严酷的现实。

为什麼会变成这样？

四月中旬，一个风沙天清晨，我离开了农场。

戈壁滩，白杨林，土坯屋，灌水渠。。。 ，朝夕相处的熟悉景象，远去了。就在这片土地上，我贡献了十四年最宝贵的青春。这里长眠着我的战友，这里有患难与共的哥儿们，这里有纯朴善良的乡亲，这里有我教过的学生。

在这里，我找到了真理。在这里，我锤炼了意志。在这里，我不再孤单。在这里，我不再自卑。

再见吧，农场！再见吧，乡亲！这里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今后无论远隔重洋，无论天涯海角，我不会忘记这里的。

卡车开过库车以后，风越刮越大。还没到库儿勒，风沙已把整个天空封的严严实实，嘴里一嚼都是砂子声，脸被风沙打得发麻。卡车在公路上艰难地爬行了一段距离，司机再也没有胆量朝前开了。我们被困在戈壁滩上。

事后才知道，我们遇到了新疆几十年从未遇到的特大沙暴（附录）。

天空黑沉沉的，几米以外什麼都看不见，狂风挟带着沙石，打得脸发疼，打得卡车车板砰砰直响。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的风沙，最要命的是，风沙大到喘不过气的地步。同车的其它人都喘不过气，要想急促呼吸都不成，气没吸进多少，沙子倒吸进不少。司机趴在地上喊，

“快趴在地上，掏个洞吸气！”

我们赶紧趴在地上，用手在戈壁滩上掏个洞，把脸对着洞呼吸，这才喘过气来。

我闭上眼睛，任凭耳边呜呜的风在号叫，十几年的边疆生活又一幕幕闪现。

。。。。。。

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我给兵团测量队扛标杆，测绘沙漠深处的地形图。中午，又渴又热，咕嘟嘟，我竟误喝了几口煤油。最后一口吐出来，还可以点燃。好恶心。。。

戈壁滩上，一间孤独的羊圈。上海和我同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战友在那儿放羊，终年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牧羊犬。。。

毒日下，我走进一间维吾尔老乡家买棉籽油。老乡好心地舀了一碗水给我。好家伙，好多小虫虫在里面一躬一躬地游！我一闭眼，连水带虫喝了下去。。。

通向墓地的路上，我和几个知青扛着一口棺材。我同一里委的一位女知青病故了。怎么这么沉呢？怪不得人们常说尸体死沉死沉的。。。

天黑了，场部到连队的沙丘上，我一遍又一遍地走，永远走不出沙丘，已经过半夜了，我急得冒冷汗。天亮了，只见沙丘上成圈的脚步印，鬼打墙啊。。。

大渠旁呼啸而过上百匹马，一阵怪吼。疆独份子煽动的少数民族暴乱份子冲向劳改队夺枪。我们连队紧急疏

散，我走向大渠要看个究竟。指导员在后面急叫，

“回来！你不要命啦。。。 ”

煤油灯下，大家呼口号，“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站在前面，低头弯腰，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寒冬，半夜里，我在猪圈里为临产的母猪接生。点起一堆火，用干草把刚生下的小猪身体擦干，再放到火堆边的草上。。。

唐皇山上，我抡起十二磅短锤打炮眼炸石头。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

过年了，哥儿们凑在一起喝闷酒，划拳，“哥俩好哇。。。全来到哇。。。 ”

课间休息时，学生围坐在身边听我讲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 ”

“D校长，你给我死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我走向咆哮的母老虎。。。

。。。。。。

这就是我的青春之歌，一点也不象“让我们荡起双桨。。。 ”

有悔？无悔？争来争去，我觉得没名堂。那个年代，那个环境，走什麼路由不得你。悔有什麼用？

天快黑了，风小了一些。卡车对着风那一面的油漆全给打掉了，就象用砂纸砂过一遍。司机招呼我们快上车，卡车向着北方开去。

大河沿（吐鲁番车站名）快到了，我听见了火车声。

快了，快了！再过四天三夜，我就要回到朝思暮想的黄浦江边啦。

-----附录：

1979年4月10-11日，出现罕见的大风，平均风力9-10级，最大风力12级，同时出现强沙暴，能见度30米，最差时只有1米左右，造成严重损失。死亡8人，伤2人，失踪9人。全县冬麦死亡61999亩，占总面积的19.5%，春麦死亡3244亩，占播种面积66.8%，大畜死亡43头，小畜死亡1621只。

---摘自《库车历史大事记》

上海，我从小生长的城市，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有个美国电影，Audrey Hepburn主演，说的是一位富豪之女，失去记忆后在一个穷木匠家过着穷人的生活。几年后，她恢复记忆回到了熟悉的富豪之家。家里金碧辉煌，灯红酒绿，宾客不绝，仆人伺候。但是，她却再也过不惯那种浮华，虚伪的生活。

在新疆呆了十几年再回上海，感觉已不一样了。经过十年文革，上海的环境已和农场大不相同。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提防别人汇报，告密。每个人说的都是当时的报纸广播上的官话，你永远猜不透他心里想些什么。

我因为顶替母亲到戏剧学院工作，这种感觉更强烈些。大概戏剧学院本身就是教演戏的，大家多多少少学到点表演的天赋。一到开会，你就听吧，“听了王书记的报告，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我深深地感到。。。 ”是呀，听了王书记的报告，使我豁然开朗，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王书记的报告真深刻。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我就想不到呢？觉悟还不高啊。。。 ”一个个表情严肃，诚恳，象在演戏。

农场哥儿们有啥说啥，坦坦荡荡的环境不见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忽然变得淡漠，虚假，甚至势利了。

我真受不了。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不能说没道理。

我不也是上海人？

唉唉，那倒也是。如果你说我不象上海人，我听了更舒服。

我给自己今后定了约法三章：1. 不参与政治，糊糊涂涂过日子就行。2. 不当行政领导，咱不是那个料，再不想摸母老虎屁股了。3. 不表现突出，甘居中游，记住过去教训，枪打出头鸟。

典型的中庸之道。中庸据说是中国人的美德，不是么？

咱不会说那些豁然开朗，深深感动之类肉麻话，开会时咱就不说话。如果点到我，一定要发言，咱就笑一笑，“嘿嘿嘿。。。 ”一笑顶一万句嘛。

北大复学通知已下来了，要求我比新生提前三天去北大报到。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帮弟弟们补课，忙到高考结束。然后我开始考虑去北大的事，离报到时间只剩一个半月了。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我决定再冒一次险：用这一个半月时间突击自学大学前二年课程，要求插班77级学习。

已经耽误了十五年，光阴如金。如果插班77级成功，就可以扳回一年半时间（77级是冬季入学的）。

更重要的，77级中还有不少老三届，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经历，说不定还能交上几个哥儿们。79级的新生太年轻了，和他们在一个班，他们恐怕当我是个出土文物呢。

但愿这是我的人生中最后一次冒险，以后再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幸亏高等数学我早已通过自学会了，这次只要集中精力自学物理即可。算一算，力学，声学，热力学，光学，电磁学，原子核物理学，一个星期学一门，正好学完。

抓紧时间，为了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光阴，冲啊！

也不知那一个半月是怎么过来的，天天起早摸黑自学，眼睛都熬红了。凭心而论，那种狼吞虎咽的学法，根本学不扎实，最多是似懂非懂而已。

顾不上了，先混过去再说，以后再慢慢消化。

不管怎样，一个半月后，那六门课都啃了一遍，所有的习题都做了一遍。还找了一个交大教物理的老师，请他用交大的物理考题考我一遍，估计勉强通得过了。

八月底，我又到了北京。

十五年哪，又看到了北大校门，图书馆，未名湖，水塔，一股亲切的感觉。时过境迁，当年天真幼稚的学生，现在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当年阶级斗争炮声隆隆的校园，现在是外语声朗朗，学生专心攻读学问的场所。变了。

看到了一些暑假留在学校的学生，应该是77，78级的学生吧。他们都是经过考试，由全国各地选拔出的佼佼者。我能跟得上他们吗？

系领导接待了我。他们告诉我，当年我们班那位被取消学籍的福建同学林XX，已在一年前平反，恢复学籍。他进入了78级学习，已经一年了。当时他们想起了我，但再也打听不到我的消息。正巧，不久国务院把我的上告信转到北大。

这位林兄的经历也很曲折。被北大取消学籍后回到福州，一直没有工作。这十多年，他四处漂泊，打零工糊口。当地机构看他太可怜，在文革结束前终于给他安排了清洁队工作，打扫粪池。好不容易娶了媳妇，工作才三年又平反回北大学习。按文件规定，工作不满五年上大学的不能带薪。为了圆大学梦，林兄一咬牙来到北大，靠每月二十多元助学金养活自己，养活没有工作的媳妇和刚出生的儿子。他的生活非常节俭，艰难。

幸亏我没有成家，一人饱了全家都饱，不然也麻烦。

系里让我提前报到的原因，是要确定我的专业，以便提前办好有关手续。他们告诉我，79级招了三个专业，问我要去哪个专业。

我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外。

“我要跳77级学习。”系主任诧异地看着我，“他们已经把基础课学完了，你跟得上吗？如果到时间跟不上，只有退学，不能留级。你可要想想好，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政治迫害喽。”“我想好了。如果跟不上，我甘愿退学，不会怨你们的。”“那。。。你跟系里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联系一下。他要考核一下你的实际水平，如果他签字同意，我们再给你办手续。”当天晚上，我到了副系主任办公室。

副系主任先简单地问了问我自学过哪些课程，然后问了些这些课程中的问题，都是些基本概念，我还能对付。

二十多分钟后，副主任问起我文革中的经历。然后，话题转到了文革中的北大。

再往后，聊起了中国知识份子的骨气和遭遇。再往后，我们干脆探讨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究竟还有没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痕迹。

一晃，快十一点了。

哎呀，我是来考核的还是来聊天的？怎么把正经事搁一边呢？

副主任在表格上签了字。

“你已经通过了。”第二天，系里同意我插入77级，问我选什麼专业。

我是不选专业只选同学，说哪个专业学生年龄大，我就选那个专业。

那就是地球物理专业。

我迫不及待地问了下一个问题，“有没有老三届？”“当然有啦，有好几个学生和你差不多年龄，还有同年的。”哈哈，太好了！只要有老三届，我就不是出土文物，就不会孤单。

你说怪不怪，一听说老三届，人还不认识，我就相信是哥儿们。

再过一天，同学们回校了。

系里叫来了77级地球专业的班长，通知他班里插入一位新同学，让他调整寝室。

奇怪，哪有三年级了还插入新同学？

同学们问班长，班长也弄不清。嗨，这事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

班长也是老三届，去云南兵团的北京知青。他待人热情，工作泼辣，三下五去二就调整好了寝室，然后带着我到各寝室转转，和同学们认识认识。

77级同学的素质比当年64级的要高，不少是各省市高考前几名。

那还用说，这么多年的尖子学生中挑出来的，个个厉害，卧虎藏龙。有的在文革中还坚持自学，那功夫更是了得。

更重要的，大部分同学都有插队经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更成熟，更冷静，不是那种扯阶级斗争大旗作虎皮的狂热型。

哈哈，太好了！这个班，我算是选对了。

更使我惊讶的，是同学们的文学修养相当高。

在一间寝室，我向大家作自我介绍。

“我姓D，大伙儿就叫我老D吧。”“老D？这名字我好象在哪儿听到过。”两位同学一下子站了起来。

“让我想想。。。呵。。。想起来了。。。。”聊——斋！”几乎是同时，这两位同学喊了出来。

原来《聊斋》中有个故事。一个人向一位算命先生打听一件事，算命先生给了他一付对子。

“猪血红泥地，城南老D知。”这个人走到城南，果然看到一位老农民在红土地上翻土。

哇，好渊博的文学知识！

我不仅佩服，而且自惭形秽。想想自己从小就不喜欢语文，文学方面腹中空空，象个白痴。唉，后悔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来不及了。

这么好的文学功底，他们怎么不考北大中文系？

北大，从建校以来一直处在我国政治漩涡的中心，一直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

不是吗？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到后来的反右，社教，文革，再到以后的四五运动，哪一次北大人都是首当其冲。

从敢破敢立的校长蔡元培，到先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再到后来敢说真话而被痛批的校长马寅初和那些大右派们，都是北大人。

北大人哪，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多少热血沸腾的志士，多少卑鄙无耻的小人，都出自北大校园。

时隔十五年，再次回到北大校园，恍如做梦。

阶梯型教室，当年在这里作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动员，现在又开始传授科学知识。

学生食堂，当年为了红薯皮，在这里贴满了声讨的大字报，现在弥漫着饭菜的香味，嗅不到当年的火药味了。

操场上，在环形跑道上又跑它几圈。记得十五年前，就在这里开新生运动会，我参加1500米比赛。就在这跑道上，超过一个又一个，最后100米冲刺，超过了最后一个对手，取得分组第一。

人生的征途上，也有比赛，也有冲刺，然而，规则却完全不同。裁判不再公平，道路长满荆棘，结局也残酷得多。谁想得到呢？

景物依旧，人物全非。过去的已经过去，要紧的是珍惜现在。

插入77级学习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向同学们打听了北京民主墙的地点。

说是不参与政治，心底里又挺关心政治，真是口是心非。怎么说呢，被这么多年政治运动搞怕的人，恐怕多数会有这种矛盾心态。就象被蛇咬怕的人，走到哪儿都会留意路边的草丛，不喜欢战争的人，会特别关心战争形势一样。

来到了慕名已久的西单民主墙。79年秋天，民主墙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了，但还是可以看到许多大字报。那些政论性的大字报已经不多了，大多数是那些赴京上访告状的人们，把自己所受的冤屈写出来贴在这里，以期唤起大众

的同情。

看了这一桩桩冤案，真是触目惊心。几个月前，我不也是这千千万万含冤受屈者中的一员吗？尽管我是幸运的一员，我不能忘记他们。

对民主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老百姓好歹有个地方吐一吐自己的冤屈，比起那有冤无处申，万马齐喑的年代，当然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以文革十年苦难换来的这点社会进步，实在是来自不易。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太脆弱了。离老百姓真正有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还差得太远。这种民主墙形式，也很容易被人利用，散布谣言，人身攻击，难以管理，迟早要被取缔的。

民主，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

学习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77，78级的学生。因为他们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多年，推荐上大学轮不到，只有恢复高考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来自不易呀。

很多年以后，大学的老师们印象最深的，还是77，78级的学生。说他们学风最好，勤奋，踏实，这是有道理的。

对我来说，上大学的机会更是来自不易，何况我不但要和同学们一起学专业课，还要抽时间消化那些生吞活剥突击自学来的基础课，那学习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听同学们说，一，二年级时，还比较松，那时经常有活动，还有舞会，进了三年级后就紧了。看来我这辈子没福体会“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的幸福日子喽。

算了，等退休以后再学跳舞吧。

起床，早自习，吃饭，上课，课间操，再上课，课后体育锻炼，洗个澡，吃晚饭，晚自习，回寝室，熄灯。

每天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紧张，单调，也有点枯燥，但我的心里甜甜的。

学习基本上跟上了，只有一门课除外，那就是外语。

我们当年学的是俄语。苏联老大哥嘛，要一面倒。现在行情变了，学英语，也是一面倒。这一面倒学英语是有道理的，因为世界上有份量的科技文献，90%以上是用英语发表。不过，可把我弄苦了。虽然系里说我可以俄语作外语成绩，我是不甘心对着大批的英语文献成睁眼瞎。

怎么办？

突击学英语。

既然我能把基础课突击学出来，说不定也能把英语突击出来。

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打听班里还有没有英语课。

77级的英语课按入学时的英语程度分为两个班，快班和慢班。我插进77级时，快班刚结束，慢班还有最后一学期。

跟慢班试一试？

向慢班课代表打听了上课的教室和时间，我悄悄地走进教室，当然，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上。

端庄的英语老师走进了教室，打扮还相当时髦。同学们刷的一下站起来，说了句不知什么意思的英语，就坐下了。我还算机灵，跟着站起坐下，没露馅。

老师用英语讲起来了，一句连一句，没有一点中文解释。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老师大概是在讲什么故事，那鸟语抑扬顿挫，怪好听的，就象树林里一只百灵鸟在歌唱。

突然，轰的一声，全班笑了起来。

只有我笑不出来，傻傻地望着笑得前俯后仰的同学们。

你们在笑什么？

下课了，我狼狈不堪地去见老师。老师看样子早已察觉到我这个不懂鸟语的外星人，“你是新来的？”“是的，我刚插入这个班，以前从没学过英语。您看我能不能跟上慢班？”“不行，你差得太远了。你应该跟新生一起从头学起。”老师说得的是对的，学语言不能投机取巧，否则是自己骗自己。

新生的英语课时间跟77级的专业课时间有冲突，怎么办？

那就自学吧。原本够紧张的时刻表，又加上了自学英语这一项。

买了许国璋的英语教材全套，我开始啃了。单词和语法可以自学，口语就不行了，非得经常对话练习才行。我那想当然的发音，恐怕只有自己听得懂。

记得刚学英语时，我请同寝室的同学为我念一句英语示范。他念了，“I am a student.

I love my motherland.”我跟着念了一遍，整个寝室都笑翻了。

“哈哈，老D，你要是去美国，联邦调查局准盯着你。”“我怎么啦？”“你这一口俄罗斯英语，十有八九被认为是KGB派来的。”“那我装哑巴行不行？咱做手势，死活不吭气。”算了，能看懂英文文献就可以了，口语就免了吧。

这一原谅不打紧，我的口语就注定一塌糊涂了。最值得我学习的，是北大学生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精神。

一天，在食堂里排队买午饭，前面两位法律系学生正在谈论当时报纸上披露的一桩诈骗案。一个小小老百姓冒充某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社会上各单位领导和有的名流趋之若鹜，送钱，送物，送游玩，还介绍女朋友，生怕巴结不上。

最后他露馅了，被公安局拘留，等待按诈骗审判。

“他的道德品质是恶劣的，但从法律角度审核，他并没有犯诈骗罪。”“你的根据是。。。。。”“诈骗是冒充别人身份，取得别人合法的权益。比如说，冒充某个遗产继承人的身份，取得那人应合法继承的财产，那就犯了诈骗罪。但这个人不是，他得到了一些并不属于被冒充身份者合法应得的东西。假如他真的就是这个高干子弟，难道这一切假公济私送来的钱，物，公款的游玩，还有送上门来的女朋友，都是合法的，都是应当得到的吗？”说得真好。只要有这点独立思考的萌芽，中国就有希望。

也许，到毕业后，他们也不得不屈从于当时的权势。但是，这种违心的屈从已不同于我们当年的愚忠。历史的车轮已向前滚动，那个专制疯狂的时代已经不容易回复了。

北大的教师教书，不仅教科学知识，也教做人道德。

记得有一次教线性代数的教师出外开会，著名的数学家丁XX教授来代课两星期。他身材魁梧，嗓门洪亮，完全不像影视作品中的文弱书生，更象个建筑工人。上课中不时来点即兴发挥，那才是最精彩的乐章。

一次讲到线性化和计算机，他又来了即兴，“有人说，总有一天计算机要超过人，因为它速度快，差错少。”我说，计算机永远超不过人。人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计算机永远也办不到。”教室里响起一片笑声，会意的笑声。

北大学生对民主体系的首次尝试，应当是80年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那一次。

当时的中国，人民代表也好，政协委员也好，党代表也好，一向都是上面钦定的。这些钦定的代表面对等额选举，铁定出线。他们只要博得上面欢心就行，从不需要对选民负责。记得有一次，几个选民想见一见本选区人大代表，听一听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吃了闭门羹。

我人大代表是为党和国家管大事的，忙得很。哪有时间听你们的小问题!这不是笑话？不是。

想一想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也是有一些知青代表人物吗？

其它的咱不了解，报上登载的一部分知青代表人物咱清楚。她们只会喊一些表忠心的口号，“最最敬爱的伟大

领袖毛主席，我们知识青年千遍万遍地向您保证，扎根边疆志不移，海枯石烂不变心！”其它呢？没有了。大量的知青生活待遇具体问题，大量的知青受歧视，凌辱的情况，向上面反映过没有？没听说过。

上面需要这样的代表，讨人喜欢，这样的代表也需要上面的栽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好呀，好呀。”“破四旧，立四新。”“对呀，对呀。”“要文攻武卫。”“对呀，对呀。”“打倒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好呀，好呀。”“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对呀，对呀。”“批林批孔。”“对呀，对呀。”“要安定团结。”“好呀，好呀。”“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对呀，对呀。”“批儒尊法，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呀，对呀。”“打倒四人帮！”“好呀，好呀。”多么听话的代表啊，当权者怎么做怎么对，永远不会说不。

多么象无锡泥菩萨大阿福，只会一个动作，点头。

北大学生需要选出真正对本选区选民负责，为选民代言的人民代表。

一些勇敢的学生站了出来竞选，公布自己的竞选纲领。

应当是这样，谁的竞选纲领能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他就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有的竞选人的思想是相当解放的，他们的讨论涉及到一些理论界的禁区，一些大家都意识到又不便（或者说不敢）挑明的禁区。他们对正在进行的改革还不够满意，要求上面把步子迈得更大些。

相比之下，我的思想显得保守。虽然我也清楚当时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我觉得上面能走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容易。要不是十年浩劫给了这些领导深刻的教训，恐怕连这一步也走不到。就象打仗一样，只有巩固了阵地才能继续往前冲。要是冲得太猛，给对方往后尾巴上一包抄，。。。，恐怕连自己先前的阵地都保不住！

也许我的棱角早已给十几年的风雨磨平了？

也许我已被十几年的红色恐怖吓倒了？

看来我不是勇士，更象个逃兵。我只能祝愿他们成功。

话说回来，一个海淀区人民代表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一大群无锡泥菩萨中间，能做些什么呢？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各族人民把你赞颂，

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

北京，不愧为祖国的首都。它不但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许多深入的思维，勇敢的尝试，前卫的形式，都从这里起源。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也看到，听到，学到许多开放的思想。

在紧张的学习期间，我受母亲委托，抽空拜望了一位父亲的好友，中国当今画坛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这位画家的绘画，一向是我很敬佩的，真想上门看看他的大作。

更重要的，我心底有个思索已久的美学方面的问题，正好能向他请教。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长廊的大柱子和梁上，彩绘的图案已经斑驳。院子里堆着一些杂乱的东西，显得有点拥挤。大师在客堂接待了我，旁边有一幅画到一半的油画风景。一番寒暄以后，我趁机道出了自己的问题：

“W叔叔，您觉得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超阶级的美？”

这有什么好问的？红太阳不是早就给出答案了吗？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具体点说，贾府的焦大，决不会爱上林妹妹的。

但我还是不懂，也许是我的阶级觉悟太低了。蓝天，白云，高山，流水，灿烂的鲜花，翩飞的蝴蝶，红彤彤的朝阳，绿盈盈的草原。。。，跟阶级有什么关系呢？

就说人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有点姿色的“狗崽女”，不是照样被军宣队，革委会，以及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追逐吗(更不要说用不正当手段糟蹋了)？无产阶级眼中的美人好象跟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嘛。

看样子，焦大眼中的林妹妹仍然是美女。焦大没有爱上林妹妹，不是没有贼心，而是没有贼胆。有朝一日，贾府中闹起了文化大革命，焦大当上了革委会主任，那潇湘馆里娇滴滴的林妹妹决然逃不出焦主任的手掌心的。

对于我这个大胆的问题，大师的回答非常干脆。

“超阶级的美?当然有。”

“你看那小桥在水中的倒影，多美呀。微风吹过，小船划过，波浪卷动着倒影，倒影尾随着波浪。暖色的倒影和冷色的天光互为映衬，互相追逐。。。，那节奏，那韵律，美呀！它有什么阶级性呢？”

太好了，我找到了答案。

又一个星期天，我从中关村上车，去城里美术馆参观《星星画展》。

《星星画派》是一批当时很前卫的美术爱好者，向长期独占中国画坛的观念化，模式化表现形式提出了挑战，他们探索用新的表现手法来表达画家眼中，心中的世界。

尽管我自认为不是画盲，平心而论，画展中相当一批画，我也看不懂。那些色块，线条组成的图案，太抽象，太前卫了，怎么捉摸也弄不懂画家想表现什么。也许是我的观念太陈旧了，为什么一定要弄清画家想表现什么呢？

然而，画展中有相当一批画，那么有震撼力，远远超越了过去的模式化的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叫《那时我们还年青》的油画。整个画面灰调子，表现了知青晚上在知青点里的生活。画面中央，一位知青提着马灯照明，一位知青正敲开鸡蛋煎荷包蛋。背景里，有的知青在拉小提琴，有的在哼歌，有的在看书。

多么熟悉的场面！我仿佛又回到了新疆地窝子，那昏黄的煤油灯在摇曳，锅里的包谷糊煮开了，看不到希望的知青们忧郁地唱着歌，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象我爱人，她一颗荡漾的心。”

一件好的文艺作品，真的能震撼观众的心，我体会到了。

我也曾经看过许多知青题材的美术作品，包括那幅歌颂知青烈士金训华“不要管我，抢救国家财产要紧”的宣传画。尽管画面上的人物形象高大，一个个就象《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似的，锵。。咚。。锵，丁步，亮相！他们就象发生在一个遥远陌生国度里的人和事，无法打动我。

奇怪吗？高大完美的形象赶不上平平凡凡的人物，因为他们是真实的人。

北大学生会经常请些社会上知名人物来校作报告，他们的报告经常是妙趣横生，不仅给我们拓宽视野，也启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是当时的作协付主席刘XX。他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把黑龙江省的大贪污犯王XX勾结腐蚀省领导，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事抖了出来。黑龙江省委十分不满，专门派人到北京，告他污蔑党领导。

他为此十分感叹，

“这么多年，我们天天盼法制。想不到法制刚恢复，第一个挨告的，还是我们。”

当时他还讲了这么一段话，

“作家的文学作品，就要象一面镜子。你的脸是干净的，照出来就是干净的。你的脸是脏的，照出来就是脏的。”

这段话，后来在批判“写真实论”时被拿出来批了。文学作品要象镜子，这是什么话？有利于四项原则的，照不出来也可以写。不利于四项原则的，就不能照！

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点道理还不懂！

可我怎么也看不出这段话有什么错。象镜子有什么不好？难道象涂脂抹粉的化妆盒才好？

唉，我的阶级觉悟呀，怎么老上不去？

另一位印象较深的，就是萧军。

一位豪爽的东北汉子，萧军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作家，倒象个京剧班子的武生。

萧军和萧红那段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当然也谈到了。最有趣的，还是他在三十年代和后来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决斗”的那一场。

张春桥当年化名写文章攻击鲁迅，暗箭伤人。萧军气不过，托人下战书给张春桥，要和他打一架决斗。那獐头鼠目的张春桥哪是萧军的对手，三下两下，萧军就把他打得趴下了。

历史真会开玩笑，解放后，萧军被打得趴下了。那张春桥却红得发紫，深得皇后娘娘宠爱，一直升到中央政治局常委。

有一点使我纳闷的，就是都说红太阳光芒万丈，是一切妖魔鬼怪都无处遁身的照妖镜。那这个劣迹累累的妖精张春桥，在身边这么久，怎么就照不出来？

在北大学到的最生动的一课，却不是在课堂上发生的。

一天，我正在图书馆复习，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有一间学生宿舍失火了。我赶紧收拾书本回去，看看我的寝室有没有受到影响。远远地看到我们的宿舍楼下面乱哄哄的，失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寝室！

原来两位老校工，抬着一桶清洗厕所的硫酸从走廊走过。经过我们寝室时，不小心把硫酸弄翻了。硫酸通过门缝流进寝室，浓浓的酸烟一下子就把寝室封死了。更糟糕的是，硫酸钻进床铺下的箱子，腐蚀箱子里的衣物。我有一件新疆农场带来的羊皮大衣，羊皮是农场自己土法硝制的。羊皮上的硝沾上硫酸，剧烈发热，不多久羊皮就轰的一声自燃了。

酸烟加上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熊熊烈火，吞噬着一切。两位在寝室里自习的同学，只能爬出窗口逃生。一位幸运地爬到隔壁寝室逃脱了，另一位一打滑，从窗口掉了下去。幸亏地面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同学，硬是把这位从三楼掉下的同学接住了。

没发生人员伤亡，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我们的所有衣物以及大部份书本笔记都毁之一炬。

班里紧急动员起来，帮助我们寝室同学。尤其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娘子军，立即为我们赶制了临时被褥。当时复印机还很不普及，她们硬是手抄了自己的笔记本，让我们学习不至于拉下。上山下乡过的知青就是不一样。这种友

爱的，真诚的同学之间关系与我当年在红色专政岁月中经历的残酷斗争的同学关系，真是天壤之别。

更加感人的，是来自社会大众的关怀。

我们寝室失火的事件，在报纸上曝光了。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信，寄到我们这儿。读着这一封封关切温馨的来信，我们的心益发不能平静。当我们在平静的校园里学习的时候，全国人民实际上都在关切地看着我们，希望我们扎扎实实学到科技知识，早日为祖国的现代化作贡献。中国还很穷，只有少量的幸运者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他们背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啊。

最令人感动的，是一封寄自山东农村的来信。寄信的是一位农村女青年。她从小就憧憬着将来进入大学深造，高中毕业时参加了高考。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降临到身边，她落榜了。她参加了工作，一份平凡而收入不高的工作。虽然遗憾，她仍然经常关注着文革后进入大学的大学生的报道。当她在报上看到了我们宿舍失火的消息，寄出了平时积蓄的100元，希望我们能集中精力学习，不要为生活上的损失所影响。

当然，我们把寄来的钱退回了，并且一一回信感谢父老乡亲的关怀。我们表示，在学校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然而，一位普通的农村女青年，一举手寄出了100元！这里的深情，经过上山下乡的我们，怎么能不清楚？

记得1969年，我探亲回上海时，特地在南京停一停，为的是亲眼看一看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当我站在那巍峨的大桥中央，看着滔滔江水从脚下一泻向东，感觉着火车开过时桥身的微微颤动，真是思潮起伏，当然还带着一点酸楚。

我为祖国建设的成长进步感到高兴。从小以来，我就期望着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多么希望能投身于南京长江大桥一类的项目啊。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自己是够格的，也会做出自己的贡献的。然而，我只配扛着坎土镩，跟着大轱辘牛车，住在土坯房，生活在就跟一千多年前汉朝差不多的环境，从事“更有利于发挥我的作用”的农业劳动。命啊！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愿那些有幸从事高科技，现代化建设的人们，

“好好干吧，让我们的祖国早日现代化，拜托你们啦。”

此时此刻，大江南北的父老乡亲，千千万万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包括那位纯朴的山东姑娘，不正是同样地期望我们吗？

“好好学习吧，让我们的祖国早日现代化，拜托你们啦。”

100元，你知道它是怎么省出来的吗？

一只颤巍巍的手，挪开鸡窝前的砖块，伸进鸡窝，摸出一只鸡蛋，小心地放进一只存鸡蛋的篮子。。。

一碗包谷糊，一块包谷馍，就一段咸萝卜，三下两下扒入嘴里。。。

煤油灯下，一针一针，把一件百纳衣补了又补。。。

拖着车子，行走两个小时，把戈壁滩上挖出的红柳根拉回家煮饭取暖。。。

100元，这里面凝聚着多少心血和汗水。

塞外的风霜，早已刷去了我当年的傲气。虽然我幸运地进入北大学习，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其实十分平常。许许多多天分和才华比我强得多的同龄人和年青人，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跨进高等学府。当我们坐在课堂里听课时，可曾想到，那些同龄人却在风沙里，烈日下，辛勤耕耘，生产我们学习生活所消耗的费用。

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吧。不是为了那个还不尽人意的国家机器，而是为了历尽苦难的神州大地。不是为了那些跳上跳下的政治人物，而是为了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临近毕业了。

紧张的学习进入收尾阶段。开始准备毕业论文，我的思乡情节也益发浓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摧。从十几岁离家到遥远的荒漠戈壁，再回北京重操学业，一晃十几年过去，我早已成了中年人。十年浩劫中，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父亲最后也不幸去世。我却身在边陲，无法给家庭一点帮助和支持，心里一直有内疚感。

回家吧，漂流多年的游子。回家吧，家乡的亲人在召唤。回家吧，金窝银窝不如家里草窝。回家吧，不论今后发生什么，大家患难与共，怎么也不分开了。

然而，上海和固体地球物理对口的用人单位很少，只有上海地震局算是对口的。

毕业前的一个暑假，和班里另外两个上海同学约好，去上海地震局问他们是否要人。

回答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原来他们主要是研制地震仪器，只需要学电子专业的，对理论地球物理人才不感兴趣。

那就是说，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要么回不去，要么回去改行，还要看毕业分配有没有上海名额。

还有一条路，考上海的研究生回去。

我真不想考研，我已经累了。学到这把年纪，应该参加工作，为老百姓做点事了。

让年轻人去读研究生吧。

何况，即使参加考研，也不一定考得取。77级报名考研的，都不是省油的灯。要和他们竞争，岂不是自讨苦吃？

然而，回家的诱惑是那么强烈，我无法抗拒。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试一试。放弃了不就连这一丝希望也没有了？

唉，谁叫俺生来是苦命，就再拼搏一次吧。

考研吧，管它考得取考不取，尽了力，也就问心无愧。

然而，偌大一个上海，竟然找不到一个招地球物理研究生的。咱这是啥命呀，想考研又得换专业，真要活到老学到老了。年龄大了，再学新专业，又得脱层皮。

再翻一下目录，看能不能找个接近的专业。

突然，跳出了这么一个专业“天文地球动力学”。招考单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导师是国内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

这是一门连接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的新兴边缘学科，正需要地球物理专业方面人才。太好了，就是它了！哈哈，我学的专业知识一点都不会浪费。

方向一旦明确，就开始复习了。

最要命的是英语。我那自学的半吊子英语，看一篇小文章都得翻半天字典，要想考研非得恶补才行。尤其是咱读英语的速度太慢，捉摸好久才能弄明白句子的意义，一考准砸。

乌龟能在龟兔赛跑中获胜，靠的是兔子骄傲睡大觉。可是77级那帮考研的兔子们个个机灵，跑得飞快还不打瞌睡。我只有争取英语考及格，其它学科考高分，才有可能把英语落后的分数拉回来。

那个暑假，我就在上海复习英语。

手头没有英语语法参考书，弟弟说，“不用买了。我有个同学就住在附近，我跟她借去。”那个同学很大方，“拿去看吧，我现在不用它，考好以后再还。”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本书，却借出了一段姻缘。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说起姻缘，这个暑假还有一段插曲。

暑假一天，舅舅兴冲冲来我家。

舅舅在大学里教基础英语。他教的班里一位同学向他透露，她的姐姐还没有成家，想托人介绍对象。舅舅一下子想起了我，决定做个大媒。

然而，我死活不干，连见个面都不同意。

“你知道我从来就不喜欢当介绍人，这次我觉得比较合适才介绍你。不管你们今后能不能发展，先碰碰头总可以吧。”“不行。”“为什么？”“因为她是高干子女。”“高干子女并不都是坏的，你的成见也太深了。”舅舅知道我当年

被班里个把高干子女整的经历。但是，他并不赞同我这种绝对化的做法。

我知道自己一概不见的做法是有些绝对。但是，我有我的苦衷。

如果在我被整的年月，我在戈壁滩农场劳动的时候，有个高干女儿同情我。那我没有二话，一定会非常感动，不会排斥感情的（天方夜谭呀。我在新疆农场十几年，别说没见到过一个高干之女，连听都没听到过。）。然而，我现在被裹在77级大学生的光环里，你怎么知道对方看中的是你本人，还是那光环？

文革中，那些革命觉悟高的高干子女，慷慨激昂地跳上讲台，和亲人划清界限的故事，倒是听过不少。今后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谁知道对方的革命觉悟多高呢？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咱惹不起，躲着点还不行么？

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个鳖亲家。咱不配当驸马，还是老实点找个平民子女。

暑假结束，返回北大。不久，就参加了研究生考试。

最花费精力的，还是那门英语。为确保考及格，我决定放弃中译英部份，集中全力考好英译中和语法单词部份。

当我坐在考场上，等待发英语考卷时，竟然一点也不紧张，还有点儿得意。

“哈哈，咱自学英语的竟然能考一回研究生英语，考砸也够本了。怎么说咱也考过一回，开眼界了。要能考到及格，哈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意外收获啊！”果然不出所料，刚把英译中和语法单词部份考完，时间剩下不多了。龙飞凤舞地在中译英部份涂了几笔，就交了卷。管它呢，捞一分算一分，捞不到也值了。

事后才知道，我英语成绩刚好过了录取线（70分）。好一次走钢丝！

考研的另外一件趣事，是理论力学考试。

考到一半，一道题把我难住了。折腾了好久，就是解不出来。中了邪了？

突然，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是题目出错了？”仔细一推敲，确认题目是出错了。于是，我在考卷上写明，这道题是解不出的。

如果把其中一个条件改一下，题目就有解了。接着我给出了修改后题目的解。事后才知道，那道题确实是出错了，应该是我修改后的条件。天文台决定，这道题去掉，不算分。然而，我能在考场上发现并指出这个问题，据说给阅卷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忙完研究生考试，接着就忙毕业论文。

我选择在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写论文。这里和北大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更侧重用实际地震数据解决实际问题。我的兴趣就是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正对我的路子。

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电子计算机。

那时的电子计算机，还是老祖母级的。用的是ALGOL语言，把程序打在穿孔带上。

接着把穿孔带装到一只庞大的计算机旁，那庞然大物哼叫一声，然后读带机就飞快地旋转。要是程序有错，那庞然大物就拉稀，把吃进去的穿孔带全都吐了回来。接下去我们就得查程序，找出差错部份。然后找到穿孔带上的出错部位，换上改正过的穿孔带。

如果程序通过，庞然大物就开始哼哼哈哈计算，身上的一盏盏小灯一闪一闪。就象那什么来着。。。啊。。。想起来了。记得小时候看猫吃老鼠，那猫一口咬住老鼠，不舍得马上吃下肚，喜欢侧着脑袋眯着眼睛咀嚼半天，喉咙里也是不时发出哼哼哈哈的声音。庞然大物嚼完程序，吐出一大堆表格和计算结果。哇，还真的把复杂的微分方程解出来了！

尽管是老古董计算机，照样把我激动得心潮澎湃。在机房里听着那计算机哼哼哈哈的电波声，比听肖邦的小夜曲还过瘾。高科技呀！二年半前，我还在马王堆汉墓的环境中生活。一家伙蹦过了一千多年，触摸到现代化了。不是梦吧？

地球所的导师非常耐心，从她那里，我学到了从一大堆纷乱的实际数据中抓出要点的研究方法。科研领域里，理论和应用是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在农场呆过了十几年后，我更喜欢应用。能亲眼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解决实际问题，心里才舒坦。

半年毕业实习写论文时间一晃而过，要毕业了。

将近半个班的同学考上了研究生，我也幸运地被上海天文台录取了。

不出所料，毕业分配没有上海名额。班上的其它上海同学由于有家庭实际困难，最后照顾回上海，但必须改行了。幸亏我考了研究生，不然真悬。

同学们也要分手了。四年（我只有二年半）的大学生活，朝夕相处，分别时真是恋恋不舍。

学生食堂一角，同学们围坐了几桌，聚餐兼告别。

有的回忆了四年中的生活花絮。

有的畅谈了自己的成长和同学的友情。

有的表达了对同学的祝福和期望。

有的表演了小提琴独奏，男声小合唱。

有的朗诵了自己当场写就的诗句。

叙不尽的友谊篇章呀。。。

临近尾声，班长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我们班有两对同学在毕业前夕喜结良缘，已经领证了！”哇，是谁呀？快公布名字！

好家伙，真会保密。

不行不行，连老同学都瞒了，罚酒三杯！

让我们举起酒杯，为友谊地久天长，干杯！

为未名湖，为地学楼，为北大，干杯！

为同学们的学业成功，为难忘的大学生涯，干杯！

为神州大地，为父老乡亲，干杯！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我在旷野上跑啊，跑啊，云彩退去了，微风停止了，雾气从四周弥散开。一团朦胧的光华，悬浮在雾气中，我伸出手，去抓那光华，却永远抓不住。

是什么声音，在旷野上回荡？

如歌如泣，似隐似现，像细述，像低吟，是二胡古曲《江河水》？“我真傻，真的。我光知道冬天会下雪。。。”，这不是祥林嫂在喃喃自语？

“回家吧，回家吧。。。”，这不是母亲的呼唤么？

多少回梦里醒来，耳边还响着熟悉的声音，多少次斗转星移，心里期盼着母亲的声音。

回家吧，多么亲切的呼唤。

时隔二年半，再次回到上海，已是八二年年初。

回家了，再也不走了。这回，即使用鞭子抽，我也不离开了。

好儿女志在四方，曾经是激励一代青年的响亮口号。然而，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磨难以后，目睹了制造这些口号的当权者把他们的“好儿女”送进了部队，大学，却把狗崽子在内的“坏儿女”留在了广阔天地以后，好不容易回城的“坏儿女”们知道了这些口号的真实含义，大多下定了不再离城的决心。我的革命觉悟本来就不高，又受了这么多年再教育，当然也是宁做燕雀不做鸿鹄。

离家这么多年，一旦决定不再走了，却发现好多好多事情要准备。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开始。

先整理行李。

暮然，发现那本考研究生时跟弟弟同学借的外语参考书。

瞧我这记性！赶紧先还书，顺便向那位同学道个谢。

说去就去，顺手拿了件父亲留下的当年修防空洞时穿的棉工作服穿上，活象个建筑工地的老师傅。

那位同学家不远，十五分钟就走到了。这是一条老式的弄堂，里面密密地排列着三排老式的楼房，每排楼房住

着近十家人家。弟弟的同学是个文静的女孩，说话挺文雅，却很老练。她的母亲也和我们聊了聊，一位温和的，很有经验的资深医生。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那天聊了些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因为本来并不熟悉，加之时间局促，我只聊了一会儿，表达谢意后匆匆赶回家忙其它的事。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趟致谢之旅，却把这篇故事的女主角推上了舞台。

要过春节了，家家户户忙碌起来。采办年货，打扫房间，除旧迎新，张灯结彩。

这也是我们多年后第一次全家真正回到上海团聚的春节。劫后余生，枯木逢春。妈妈特别兴奋，早就开始张罗。这顿全家团圆的年夜饭，我们盼了整整十七年。

十七年哪，我从一个纯洁的，被教条蒙蔽双眼的愚忠青年，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不再轻信宣传的中年人。

春节那几天，能干的妹妹理所当然地成为总指挥，我们几个笨手笨脚的被总指挥支得团团转。总指挥从早忙到晚，魔术师似的，一道菜接着一道菜变了出来。她手没闲着，嘴也没闲着。一会儿吆喝这个，一会儿差使那个。我们可是夹紧尾巴，不敢出一点差错。总指挥也不是真的不满意什么，就是要找点什么理由唠叨一番。活干完了，嘴巴说痛快了，她也心满意足了。凡是能干的女人，多半有这个怪毛病。

那几天，咱们的总指挥真是满足得云天雾地了。

大年初二，一清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开门，竟是弟弟的那个女同学提着一盒芝麻饼来拜年。

这是怎么回事？同学之间犯得着这么一本正经拜年？

莫不是。。。弟弟和她。。。那个。。。来电喽？

好事一桩呀！我们招呼这位同学，说这边太挤了，请弟弟带她到隔壁房间聊聊。

他们一走开，我就趁机大放厥词。

弟弟不小了，该考虑终身大事了。我看这同学不错，文文静静的，人又热心，说话也很懂得分寸，知识份子家庭出来的嘛。如果弟弟要征求家庭意见，我这个老阿哥投赞成票啦。

不一会儿，弟弟从隔壁房间过来，激动得满脸通红。瞧他那付模样，我又忍不住逗趣了：

“哈哈，老实交代，你们进展到什么程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说到哪里去了，人家早就有了男朋

友。”“那，她来干什么？”“她是来替她姐姐作媒的，她姐姐想跟你交个朋友。醉翁之意不在酒，哈哈，哥哥，那一盒芝麻饼是冲着你来的。”这下轮到我狼狈不堪喽。

“哈哈！”全家把肚子都笑疼了，弟弟更是得意非凡。

“我要为咱们家立大功啦！”活活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原来，弟弟平时和那位同学聊天时，早就大大咧咧把家里的底给透露了。那位同学全家不仅知道他有个哥哥在北大学习，而且知道他那个哥哥是个光棍，还没有谈朋友。

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她们有意介绍那位同学的姐姐，一位插队多年的老三届知青，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考上上海的大学学医的。但是她们吃不准我是否能回上海，一直在观察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到她们家致谢，她的母亲就特意过来和我们交谈两句，原来是要火力侦察，看看这小子够不够格当她的准女婿。好厉害，狡猾狡猾的。

虽然我是自投罗网，可我浑身土里土气，又披了一件工地老师傅的棉大衣。这付模样怎么会赢得人家大小姐芳心，还能通过准丈母娘的审查，真是一个谜。上海人通常是讲“噱头”，讲“卖相”的。这回怎么一个既没“噱头”，又没“卖相”的土包子能混过关？缘份吧。

弟弟求功心切，这几天激动得几乎要疯了，盯着要我表态同意谈朋友，但我还是不肯。我不打算和一个以前没有接触了解的女性谈朋友，我希望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了解，自己信得过的才谈。

那时社会上找女朋友的要求，通常是年轻呀，漂亮呀，活泼呀。也有要求女方家境好，自己有一定学历的。我的要求侧重点不同，对年轻漂亮学历并不讲究，但希望对方能够有共同语言，有插队的经历更好。从艰难的人生经历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对年青美貌，花花悄悄的浪漫追求已经看淡了，相互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要求实在很普通，在日常生活接触中应当是不难找到合适的人选。经人介绍的就很难讲，最不放心的是难以了解对方的革命觉悟。我的革命觉悟从来就很低，只会凭良心讲话。在那个年头，凭良心讲的话总归是“落后言论”。万一对方的革命觉悟很高，我的落后言论连在家里都不能讲，那日子怎么过？

算了算了，别去冒那个险，还是找自己看得中的革命觉悟低的人放心。

弟弟抱怨了。

“你的顾虑也太多了。人家哪点不好？连谈一谈都不肯。”说得也是。对方是知识份子家庭，文革中也吃过苦，被抄过家，父母被贴过大大字报。自己下乡插队八年，从没捞到过什么好处。上调轮不到，推荐上大学更没戏，只有等到“四人帮”垮台后才考上大学。她的母亲说话也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腔调。这种条件还有

什么可挑剔的？

可我还是不放心。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我必须向弟弟问问清楚。

“你有没有告诉她们我被北大开除去新疆，平反后回北大复学的经历？还是仅仅告诉她们我是77级考上北大的？”“当然说你是77级考上北大的喽，简单明了。那么复杂的经历哪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你想吓唬人家不是？”“这就对了嘛。她们认为我是77级正常考上北大的，所以愿意找我。要是她们知道我的吓人的经历，不准早就躲得远远的。咱还是别连累人家。”“你也别把人家看得都那么势利。虽然我不了解她姐姐，我那同学不象那种人。

她在班里人缘很好，从来都不左。”“不左当然很好。但是，不左不等于不胆小怕事。”这几十年一波连一波的政治运动，哪一次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出事，株连九族。在这种封建专制下要苟且偷生，胆小怕事明哲保身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上海人，因为上海人比其它地方的人又多了一层怕，怕丢掉上海金户口，发配到外地，再也回不来。

象我这种家庭和自己都上过黑名单，始终革命觉悟不高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政治运动中再次挨整，从而株连那一半和她的亲属。谁知道她们敢不敢面对这种潜在的凶险呢？

“除非她和她的家庭知道我的真实经历还愿意和我交往，我才和她谈朋友。否则就算了。”“哥哥，怎么跟你谈朋友还要那么多先决条件，简直比入党还难。先接触一下，以后再慢慢告诉她你的曲折经历也不晚。先培养培养感情嘛。”“那不行。感情培养出来了，再把吓人的经历告诉她，害得人家断也不好，不断也不好。这不是折磨人家吗？我要和她交往的话，第一次就得把这事告诉她。”“喔哟，拜托拜托。你这哪象谈恋爱，简直跟板门店谈判差不多，恨不得要下最后通牒喽。依勒新疆蹬蹇特了，埃是阿拉告告依阔（上海话：你在新疆呆得傻了，还是让我们教教你吧）。”弟弟的同学又来了一次，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想法。她告诉我弟弟，她的姐姐过几天要到嘉定去实习了，如果我愿意谈，希望能在她姐姐去嘉定之前先碰个头。

经不住弟弟的软磨硬缠，更何况对方的条件实在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终于让步答应谈了。这下把弟弟高兴得欢喜若狂，好象是跟他在谈恋爱似的。我倒反而忐忑不安，好象在淌一条河，心里没底，还不知前面深浅如何。我答应弟弟，第一次碰头不把自己受过迫害的经历捅开。至于第二次嘛，弟弟关照我，“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管不着。佛要讲蹇闲话（上海话：别讲傻话）就好，记住你是在谈恋爱。”第一次碰头是在晚上，还是在弟弟的同学家里。

在弟弟妹妹的强烈要求下，不修边幅的我穿上一套比较象样的服装，妹妹还特地帮我梳了头，不那么腊逼了。平时随便惯了，碰个头要这么梳妆打扮，还真不习惯。

我都差点要后悔了，早知道这么复杂，真不如找个在生活中熟悉的人。就象《五朵金花》中那样，随随便便，

还能唱什么“阿哥和阿妹情意深”呢。

第一次碰头一点也不浪漫，更没有“阿哥和阿妹情意深”的诗情画意。

我是弟弟陪着去的，女主角则是由她的母亲和妹妹作陪。我那张笨嘴就别提了，一句情意绵绵的话也讲不来，连风趣幽默的词也吐不出一句。更糟糕的是脑子里灌满了浆糊，连引个“今天天气真好，哈哈哈”之类的话题都想不出。幸亏她们和我弟弟很熟，不断聊些轻松话题化解僵局。我则象个小学生，她们问一句就答一句，再想不出其它话。

怎么笨成这付模样？真没出息！

女主角第二天要去嘉定实习，我也在几天内要去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研究生课程。

说好了先开始通信联系，第一次碰头算是圆满结束。

这个谈恋爱的第一次见面恐怕是够乏味的。

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赶紧问弟弟。

“哎，她到底长得怎么样？”“你不也看到了，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哪知道啊，我根本没敢抬头看。”多年以后，这位女主角已经成了我的内当家，我们又回忆起了第一次碰头的情景。

她告诉我，当我和弟弟走了以后，她和她的母亲，妹妹也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怪，“他怎么讲话时眼睛老盯着地板，好象和地板谈恋爱似的。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哎，别提了。下一辈子，我一定要早点谈恋爱。拖得太晚了，那些年青人该有的热情和纯洁的爱恋早就被残酷的现实榨干，什么情趣都不见了。

人生历程中少了这难得的一环，太可惜了。

怨谁呢？那个年头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个人崇拜在我看来永远是没有道理的。固然，自然界在它的儿女中分配它的恩惠时并不是平均一致的。但是感谢上帝，天赋好的人是很多的，而我坚信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在过着悄悄的不被人瞩目的生活。把他们之中的少数人选出来给予无限赞赏，并把思想上和品格上的超人能力归之于他们，我感到是不公平的，并且是低劣趣味的表现。

这段话是谁说的？吃了豹子胆啦？

是爱因斯坦的话。幸亏他老兄没赶上文化大革命，要不准是个现行反革命。这位科学巨匠的深奥思想和他的一系列听起来有点玄的谈话，我是直到上了研究生以后才开始慢慢有点领悟。

那一年，上海天文台从27位考生中录取了两名研究生。除了我以外，另一名是中国科大毕业的，特别年轻。这同一年录取的一老一少两名研究生，年龄相差十几岁，真是文革十年耽搁造成的特有现象，以后恐怕不多见了。

在上海天文台，我领略了以前从未体尝过的气氛。文革十年，使我国的科技事业落后于世界一大截。更糟糕的是科技人才出现了一条断层，文革前最年轻的科技人员现在都成了中年人。抓了十年革命，业务荒芜了，知识老化了，最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年龄也过去了。天文台的科研人员普遍都有一种紧迫感，争分夺秒读文献，补业务，力争早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气氛使我十分兴奋。就该这样，中国才有活力，中国才能进步，中国才有希望！

天文台的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戏剧学院的截然不同。他们不是欺压群众，谋私利搞阴谋，而是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解决具体问题。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大话，空话，官话是免不了要说一些的，我已经觉得很不错。

什么样的将带出什么样的兵，看来是有点道理。

那一年，全国各天文台招收了一批非天文专业的研究生，他们将集中到南京大学天文系上研究生课，同时补天文基础课。这样，我们两个考上研究生的在台里待了没几天，就打起行装到了南大。

南大当时正在搞基本建设，到处是脚手架和民工的简易窝棚，乱哄哄的。墙上，电线杆上贴了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启事。我猜想，在南大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最先学到的五个中文字恐怕是：

“因，本，人，不，慎。”当时，南大的教学风格和北大有明显的不同。北大很注重基本功训练，但是教材陈旧，我们上的课本都是文革前的教材，至少有十几年历史了。南大很强调研究国际上学术界的最新进展，他们的教材都是

油印的讲义，里面很多内容引自国际上近5年登载的学术论文。

相比之下，我大概更喜欢南大的风格。

来自全国各天文台的研究生，都住在同一宿舍楼。我的宿舍里的同伴就来自四个天文台。研究生们的年龄落差很大，有年轻的，也有大十几岁的中年人。令人高兴的是，有个陕西天文台的研究生老刘，年龄和我差不多。

哈哈，我又不孤单了。

这些研究生们思想活跃，学术造诣很深。有个一直坚持自学，数理功底非常扎实，他所用的数学工具只有数学专业的研究生才能接触到，我还没学过，连听都只能似懂非懂。就说老刘吧，自学天文成才，对中国古天文熟得如数家珍。他一说起古天文史，我简直象听天书，汗颜不止。

好极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他们在一起，我肯定有长进，沾光喽。

第一个星期，寝室里大家聊天都很谨慎，除了学术问题探讨以外，其它谈得很少。

这也难怪，彼此都不熟悉嘛。

一星期过后的一天下午，老刘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要问我一句话。

“我实在憋不住啦。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一定要问问你。”“什么问题呀？”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这么神秘兮兮的。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天，原来大家顾忌的是我！”怎么可能，开国际玩笑吧？我要是共产党员，那世界上就没有人不是啦！”“哈哈！”我们俩笑得喘不过气来。

说来也奇怪，每到一个地方，初次和我接触但不知道我的经历的群众总认为我是共产党员，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想通，我怎么会给人家留下这种印象。真见鬼了，我自己看看哪一点都不象呀，何况咱在革命领导眼中不但不象共产党员，还是个可疑份子和落后份子呢。

怎么搞的，莫不是我的书呆子病又犯了？

我们各天文台的研究生们很快熟悉起来，一起上课，一起讨论问题，一起锻炼，一起嘻嘻哈哈，还一起到校园外的小馆子吃菜煮面。

最有意思的是和南大的老师们讨论国际上最新的学术进展。为了准备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搜集和研究国际上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在一次次讨论过程中，我领悟到了光弄清这些文章的来龙去脉，还不算真正读懂这些

文章。只有看出这些文章的局限性，疏忽和论证过程中的简化假设之处，才算把它看懂了。其实，即使是发表在国际一流杂志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还是有缺陷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对一篇文章的看法和南大老师发生了分歧。为此我们争论了几个星期，争得脸红耳赤。最后，问题弄清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文章要比带着迷信的眼光看文章更能学到真正的知识，这大概是知识份子的职业习惯。怪不得皇上最担心，最头疼的就是这些习惯于独立思维的知识份子。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最高指示能让你怀疑的么？

在南大学习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科学请下了神坛。笼罩在科学外面那层神秘的纱巾一旦脱去，科学就成了一个个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构造出的建筑物。固然，经得起时间冲刷的只有真金。但是，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假冒的科学和投机的科学家混杂在其中，他们往往还混得更好。要想真正为科学作点贡献，除了要有勤奋，持之以衡，天份，机遇，还要有诚实和为真理献身的勇气。

中世纪，布鲁诺为坚持“日心说”不惜被教廷处死，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被教廷囚禁，要他放弃对“日心说”的支持。伽利略痛苦地跺着脚下的地球喊着：“它毕竟还是在转动啊！”我想，当时一定也有一些红得发紫，深得教廷宠爱的御用科学家，一本正经地证明上帝创造世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之类。尽管他们毕生荣华富贵，他们的研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后人不再记得起他们。当年苏联李森科之类所谓的“米丘林”学派在学术界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时，一大批象瓦维洛夫这样著名的遗传学家为捍卫遗传科学而不惜被流放，被逮捕，被杀害，甚至他们的家属亲友都被血洗（附录）。历史最终把学术上弄虚作假，政治上残害真正科学家的鹰犬李森科钉上了耻辱桩，相反，在监狱里殉难的瓦维洛夫获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可惜，这已经是他死后二十五年的事了。

中国也是一样。为科学坚持讲真话的科学家很可能毕生打入冷宫，受尽磨难，像水利专家黄万里就是。相反地，有的名气很响的科学家平时拿不出什么科研成果，一旦搞什么运动，他们的本事就出来了，在报上发表大块的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文章，或者批判其它科学家，比谁都凌厉。我想，当年我国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批判摩尔根的唯一主义基因学说，批判爱因斯坦相对主义的相对论，以及追随红太阳声讨“四害”之一的麻雀时，恐怕也有一批这样的科学家得到重用。

唉，为什么世道总是那么不公平，偏偏伪科学家总是混得油头粉面？

我该怎么办？做人怎么这么难！

在南大的日子里，除了学习前沿的科学知识以外，我还迷上了看体育比赛。

每当有什么好的体育比赛，我的心就痒痒的。正好我有个北大同班同学家在南大，她毕业后分配在南大教书。天一擦黑，我就忍不住去敲她家的门，“呵呵。。。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位老同学和她的母亲早就知道我的老毛病是什么，“电视机就在那边，你自己去看吧。”于是我自己打开电视机，沉浸在比赛场的气氛中。

记得有一次哪儿的艺术体操队来南京五台山体育馆表演，机会难得！可有一门课第二天要大考，这晚上的时间是临时抱佛脚的黄金时段，要不要去看表演？想来想去，还是去看表演。

嗨，咱这毛病犯得重，无药可救。

我从小并不喜欢看体育比赛，有趣的是，这个爱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步形成的。

那个年头，什么事都要套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弄得正常的生活和娱乐全不见了。

说话得小心翼翼，写文章开大会更得小心翼翼，就这样还是防不胜防，不准哪一天大祸临头。记得在农场时有一次去团部开批斗大会，每人发一块毛主席语录牌。举的时间长了，手累了，有个老职工把手垂了下来。这还了得，反党！原来手往下一垂，毛主席语录就倒了过来。反动啊，皇上的圣旨能倒过来看的么？

这位老职工莫名其妙地反了党，挨了批斗。

那个年月，生活内容极其贫乏，到处都离不开最高指示，连闹离婚也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八个样板戏垄断舞台，就这样我们还看不到，因为剧团到不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农场。记得已到了文革后期，总算盼来了一场电影《红色娘子军》。这是全团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团党委会不开了，一切活动停止，各连队早早收工，大家搬个凳子，走了一，二个小时，早早赶到团部等电影。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有那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加上二专列（《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我们不知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面包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

那个年月，唯一没有被无产阶级政治灌满的领域，就是体育。至少体育比赛的规则还没有被改造成无产阶级的。要是百米比赛的结果要查谁的家庭成份好谁就是第一，那毛远新和江青稳拿男女世界冠军了。要是篮球比赛的输赢不看比分，而是由红太阳钦点谁是左派谁得胜，那中央文革队笃定扫平天下无对手。

幸亏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规则还没有被世界各国体育界所认同。

看体育比赛时，我仿佛从一个撕杀的战场突然进入了一个宁静的殿堂，等级，偏见和歧视暂时消失了，平等和公正回到了世界。特别是观众们为中国队呐喊加油时，那万众一心的气氛，使我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狗崽子身份，变回了中国公民一份子。只有在那个环境，谁也不检查你的家庭出身，谁也不担心自己的家庭出身，谁也不在乎别人的家庭出身。

我越来越爱看体育比赛，尽管我还不懂得欣赏运动员的技巧，我喜欢那公平的规则，那环境，那气氛。那是文革中难得的一片净土。

我想，文革的恶梦一旦过去，中国最先赶上国际水平的领域应该是体育。

-----附录：

《科学王国里的红色恐怖》摘录 作者：笑蜀... 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到1940年春天,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真的有18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瓦维洛夫的副所长、育种家维克多·叶夫格拉福维奇·皮萨列夫, 细胞遗传学家格利戈里·安德列叶维奇·列维茨基以及塔拉洛夫教授、萨佩金教授……。

锒铛入狱的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又岂止是瓦维洛夫的18位部属, 接替瓦维洛夫出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不久的穆拉洛夫、副院长邦达连科, 还有萨拉托夫的育种家迈斯特院士, 也在大清洗的血雨腥风中被捕并被处以极刑。所有这些屈死者, 无一不是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公开批评者、瓦维洛夫亲密的师友。显然, 处死他们是为了给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领袖瓦维洛夫一记血的警钟。苏联安全机构一位领导人公开宣称, 他要捻死任何准备侵犯李森科的神圣无比的教义的人, 即便是列宁的朋友、最年长的布尔什维克克尔日扎夫斯基。反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在事实上已经构成苏联学术界的不成文法典中的头等罪名。

应对这些可耻的政治迫害事件负责的当然不会是瓦维洛夫。恰恰相反, 每一次逮捕都使瓦维洛夫极度震惊。当第一股逮捕浪潮袭来时, 他就曾致函友人: “令人惊异的事情象山崩一样地发生了!” 困惑和不满溢于言表, “有那么多人离队了。是从列维茨基、马克西莫夫和皮萨列夫开始的。事情要怎样才能结束, 谁也不清楚。” 他了解他的师友, 不相信他们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为了拯救他们, 瓦维洛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保存着瓦维洛夫当年写给当局的大量信件, 瓦维洛夫以研究所所长的名义, 请求把被捕的和被流放的研究人员送回列宁格勒, 担保他们是忠诚的。并且强调指出, 这些研究人员是某一领域的独一无二的行家, 没有他们, 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将陷于停顿, 国家的科技发展将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与米·伊·加里宁会谈, 他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呼吁。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他都要全力以赴地去拯救他的那些不幸的部属。植物学家马尔科维奇被捕后, 瓦维洛夫为之四处奔走。直到他自己被捕的前三个星期, 他还在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信, 请求撤消对马尔科维奇的判决书。在多方营救的同时, 瓦维洛夫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慰马尔科维奇, 常常寄信寄钱寄包裹, 寄去热情和光明: “我们不会忘记您, 我们需要您。” 这是他致马尔科维奇的信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还致函监狱长, 请求狱方给马尔科维奇以特殊照顾, 安排轻活, 使他的这位老部属有条件在狱中写出有关赴爪哇和印度考察的学术报告。马尔科维奇七十岁生日那天, 又接到了瓦维洛夫热情洋溢的贺信: “象领到毕业文凭那样, 这是一个美妙的日子。请不要忘记, 达尔文在七十岁那年才进入自己的鼎盛时期。向您致敬—愿您活到一百岁!” “如此厚待” 人民公敌”, 在风声鹤唳的大清洗时代, 该需要多么大的同情心和勇气啊。瓦维洛夫甚至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的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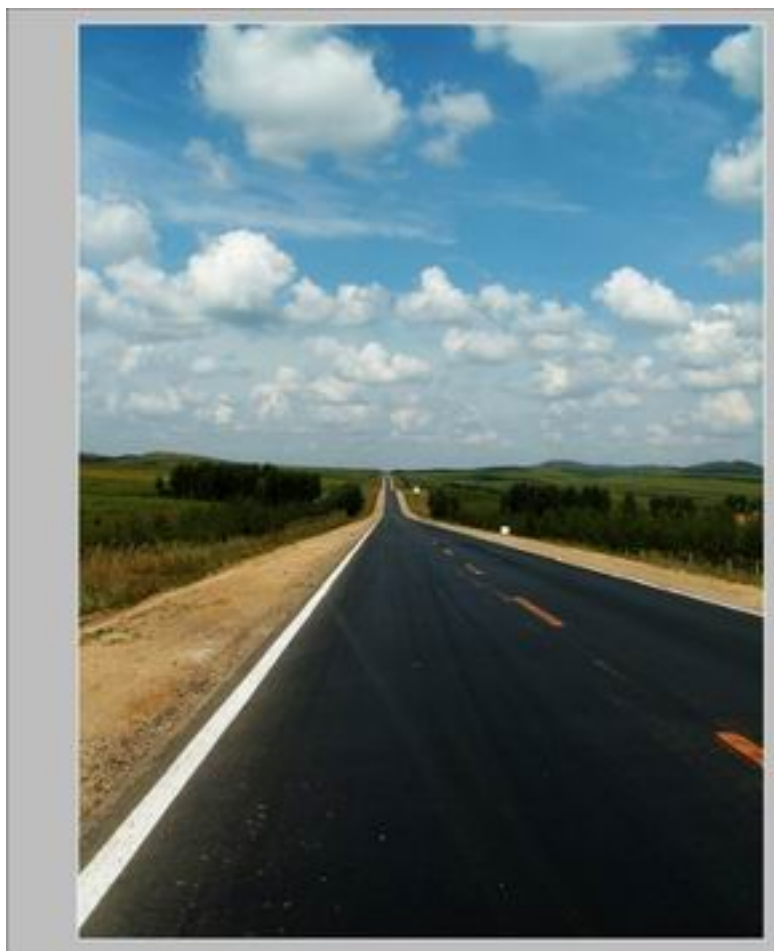
为马克西莫夫、科罗廖夫、库兹明、奥尔洛夫、列维茨基请命……但谁也没有得到拯救，他的勇气和努力的唯一后果，不过是进一步加深了当局对他的憎恶。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远处，贺兰山麓，近处，一列火车在行进。

敞开的货车上，坐着三个满身尘灰的姑娘。一个姑娘用手按着被风吹得直抖的头巾，焦急的眼神望着前方。

这不是《牧马人》中的李秀芝吗？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女主角李秀芝是丛珊扮演的。

朴实善良，善解人意，女主角李秀芝不嫌弃被打成右派的男主角，同甘共苦，无怨无悔。这样的女性正是千千万万受迫害者的梦中情人。我不也是这样么？就想找一个能理解自己，同甘共苦，有共同语言的对象。当然，象李秀芝那样美貌动人，是电影的夸张，我们是不敢奢望的。

我的那位女主角是不是也能象李秀芝那样？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我到南大开始研究生学业后，就和她开始了通信联系。第一封信，我就建议她看一看电影《牧马人》，并告诉她，下一封信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看了《牧马人》以后的感想。下一封信来了，我满怀希望地打开了信，结果却十分令人失望，她谈了一些杂七杂八的生活琐事，竟然没提到这个电影。我在信中再次提醒她，《牧马人》看了没有，怎么没看到你的感想？她在回信中抱歉地告诉我，马上要考试，她正忙于复习功课，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电影。

这下我的无名火上来了。

就两个小时的电影还抽不出时间看，不就是一次考试么？考个多几分少几分有什么要紧，看不看电影可是个阶级感情的问题。

下一封回信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有一点责怪语气。好象是说，希望你看一场电影谈谈感想，应当不是什么苛刻的要求，你连电影都没看，那我们能交流什么？

可怜的女主角弄不懂我从哪儿冒出来的火气，不就是一场电影么！难道他是个影迷，还是丛珊迷？不管怎样，女主角可是没发火，而是去看了这个电影。她在来信中告诉我，电影看了，清明节快到了，她要到南京来一趟，希望能和我面谈一次，包括谈谈看了那个电影的感想。

清明节的那个星期天，我们在南京的一个公园见了面。

她来了，穿着一条连衫裙，中等偏高的个子，普普通通的长相，但是落落大方，给人一种爽快又能干的感觉。因为通过几封信，稍微熟悉一点，我讲话时的胆子也稍微大一点，眼睛敢稍微抬高一点看人了。

一开始，我介绍了自己的缺点，象不注意个人卫生，不修边幅之类。她觉得这些以后可以慢慢改进，我觉得恐怕很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她不置可否，看样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缺点的严重性。接着，我们聊到了《牧马人》。

“我觉得电影拍得还可以。”这是她的总的看法。

“你觉得李秀芝怎么样？”“丛珊演得还可以，不做作，比较自然。”这是哪门对哪门呀，怎么讨论起演技来了？看样子她完全不清楚我问李秀芝的意图，我还是单刀直入把问题捅开。

“如果有一天，你必须放弃上海的工作和生活，不得不到戈壁荒原去过电影里那种牧马人的生活。你愿意吗？你和你的家人有这种思想准备吗？”这是哪门对哪门呀，怎么一开始谈恋爱就扯这些“触霉头”的问题？女主角一脸茫然，不知从何说起。

“为什么。。。要这样呢？”水到渠成，该把我的经历告诉她了。

于是我告诉她，我也和电影中的男主角许灵钧一样，是受过政治迫害的人。我去的新疆戈壁滩农场的生活，也许比电影中的场面更艰苦一点。虽然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什么错话也没说过，还曾经是个虔诚地相信党，相信说教的信徒，我还是被打入另册，即使到77年高考恢复时，我还是通不过政审，不能参加高考。

“那。。。你不是77级毕业参加研究生考试的？”“那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接着告诉她自己豁出去了向中央告状，要求平反冤案，重返北大的经过。在千千万万受冤屈受迫害的人中间，我算是幸运的一个。告诉她我是插入77级学习，然后参加研究生考试的。

讲完了这一段经历，我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心里坦然了，再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如果对方害怕了，畏缩了，或者讨厌我了，反感了，我都可以接受。我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怜悯。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吭声。

她在想什么？

想如何回绝我，因为我的情况太可怕了？想如何安慰我，因为我的经历太凄惨了？

想骂我两句，责怪我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早些告诉她，害得她浪费时间和感情？还是脑子乱哄哄的，因为这一

切都来得太突然，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想怎么说都行，我尊重她的任何抉择。

“真抱歉，一下子告诉你这些。不过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我的真实经历。”“我插队的生活已经够苦的，想不到还有更苦的。”这是她的第一句话，看样子她不是一个左左先生。

“好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今后再不会这样了。”这是她的第二句话，看样子多云转晴，她不打算回绝我喽。

“我可不那么乐观，我很可能再次受迫害，再次回到戈壁滩。”应该让她意识到和我交往潜在的风险，这就是我问她对李秀芝有什么想法的真实用意。

“怎么会？四人帮不是垮台了？文化大革命不是结束了吗？”我告诉她，四人帮垮台是建国以来极左势力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但是，极左的势力还大有人在，左的幽灵还在中国大地徘徊。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靠整人，靠极左，靠出卖良心而爬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弄潮儿，现在还蜷伏在祖国大地各处。他们现在也会随着潮流讲些改革开放之类的话，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弄潮儿。但是他们的心底还是留恋过去那个政治运动的年代，因为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以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把一大批潜在的竞争对手打倒在地，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以靠打几个小报告，喊几句口号轻轻松松地向上爬。特别是有一批弄潮儿，除了整人和马屁以外就没有其它真本事，要让他们靠真才实学和别人打拼，这不是存心要他们好看？因此，只要有风吹草动，只要气候合适，他们就会蠢蠢欲动以百倍的疯狂反攻倒算，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弄潮儿。

我还告诉她，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挨整受迫害时候的我，恰恰是个痴心地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教条的愚忠青年，而现在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学业的我，恰恰已经找到了真理，不会再受教条愚弄了。糟糕的是，在中国脑袋越清醒，越容易吃家伙。

因为我绝不会象弄潮儿那样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我这种性格这辈子绝不会入党，不会升官，也不可能受到重用。在下一场政治运动到来时，我倒很有可能被揪出来，再次受迫害。

“你不会不吭气？干嘛要说那些傻话？”我又告诉她，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和才能，我早就定了约法三章不参与政治，只要能安安静静搞业务就满足了。在政治学习，政治讨论场合中，我当然会保持沉默，或者讲讲今天天气很好哈哈之类毫不沾边的话。吃过这么多年苦头的我，多少也学会点这套中国社会的防身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连坐是中国统治阶层控制老百姓的惯用手法，政治运动中领导往往会逼迫群众人人必须表态是鹿还是马，你想躲都躲不了。如果被逼到了那个关头，在前途和良心两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我选择良心。

女主角又沉默了。

我这是怎么啦？能这么谈恋爱？我不能只管自己通通通讲得痛快，也得照顾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就算要讲，也得细水长流，营造点亲密的气氛嘛。瞧，这下可好，晴又转多云了。

唉，我这张嘴连乌鸦嘴都不如，该掌嘴！

我赶快打破僵局，对她说，我知道人人都希望有个幸福的家庭，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何尝不是如此。可惜的是现实太残酷了，我不想给对方一个虚假的希望。我找对象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只要对方能理解我，并在我万一受迫害时（如果我真的做了坏事，那就应该和我划清界限，这里我指的是完全无辜而受迫害）愿意象李秀芝那样同甘共苦就行。我不希望到那时对方跳出来在批斗会上和我划清界限，那样对双方都是伤害。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知道，这种思想准备是很痛苦的），不必顾虑回绝我就行，我完全理解，我会衷心祝愿你幸福。

她还是沉默。

我告诉她，如果还没有想好，可以先回去想一想，任何时候回绝我都行。而且，光你打算继续谈下去还不行，你应该把我的情况告诉你家庭，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才行。

“这是我自己的事，为什么要家庭决定呢？”她表示异议。

“你说的当然很对。可惜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株连九族的封建政策，我不希望因为我而伤害了你们家庭，我想你也不希望在他们不知情的状况下受我株连吧。”女主角回去了，带着一串悬而未决的问题回去了。

我相信，对她们来说这几天是个艰难的日子，接受我这样一个人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一个星期后，女主角回信了。她告诉我她的家里尊重和支持她自己的任何选择，她决定和我继续谈，如果我再次受迫害了，她愿意当李秀芝。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现在好了，多云真正转晴。

啊哈，牧马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有许灵钧就有李秀芝。

白帘子，白床单，白墙壁，白云，白雪，。。。好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哦，洁白的世界。。。那浮在天边的昆仑山顶，就是这般白皑皑的，。。。那清凉的雪水就是从那山顶流下来，一直流到戈壁滩深处，。。。在戈壁滩上顶着毒辣辣的太阳走路的时候，多想一头扎到那渠水里呀。。。渠水真凉。。。滴答。。。。

滴答，水滴下来了，水沿着小管子淌下来了，好清凉。。。那是什么管子，一直连到我的手上？谁碰了我的手？好像还有人在说话，那是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体温39度2，心功能结果还好，已抽血检查，用点滴。。。。”

什么点滴？我住院了？我生病了么。。。好像是的，那一晚上好难受哇。。。整晚上睡不着，心好像悬在半空，又好像跳到喉咙口，。。。好热。。。背上汗湿透了，我渴。。。。

是的，我住院了，从我懂事到现在，还是第一次。

在南大一年的研究生学习快结束了，还剩下最后两门考试，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就在这时，我感冒了，一开始咳嗽打喷嚏，接着就开始发烧。一个星期下来，感冒越来越重，脑袋都胀胀的。记得以前我也有过感冒，每次都是挺一挺就过来了，这次也挺一挺吧，再过二三天就考完了。可这次的感冒不一样，就象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搅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个难受！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对付不了你这条小阴沟？

咱们来硬的，我到跑道上狠狠地跑了几圈，直跑得心怦怦乱跳，气喘个不停。

跳吧，使劲跳吧，这下你该规矩点了吧，看你还七上八下不？

那天晚上，可就倒海翻江喽。

整个晚上，翻来覆去就听见扑通扑通的心跳声，见鬼，平时怎么听不见？那颗心脏简直象只拴不住的小鹿，在胸腔里乱蹦乱跳。见鬼了，深更半夜的还不让我睡觉，跳个什么呀，好像见到个非常漂亮的梦中情人似的。越睡不着我越急，越急就越难受，出了一身汗，然后又冷得发抖。折腾了一晚上，我精疲力竭，好容易熬到天亮，我已经虚得站不住，请同寝室的同学帮忙送我去医院。

南大校医院诊断为病毒性感冒转病毒性心肌炎，立即转到附近条件较好的鼓楼医院治疗。

鼓楼医院好象是一家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里面有不少医学院学生在实习。每当主治医师或主任医生查房时，这些实习的学生们就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每人掏出一本笔记本，主任医生说一句，学生们就刷刷地记下来，生怕漏了一个字。望着这些一边记笔记一边点头的学生们，我总觉得怪怪的，能这么学习的么？怎么听不到一个学生提问，也听不到一点讨论呢？虽然医科不同于理工科，但学习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相同的。如果两个老师观点不同，诊断也不同，那你记哪一个的话，听谁的好？也许医科学习中容不得半点质疑，谁是你的老师，他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这真是门奇怪的学科，我忽然想起了绝对真理，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我的各项检查结果陆续出来了，心电图显示“三联律”（每心跳三次中有一次早搏），与心肌炎有关的酶指标也远高于正常值，只有心脏还没有明显肿大，大概我平时坚持跑长跑，心脏还比较强壮。虽然鼓楼医院先按心肌炎给我治疗，他们还没有下最后诊断，因为过几天有一个专家来医院指导，他们想听听专家的意见。

专家来了，除了学生以外还加上一批主治主任医生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专家一个个病床走过来，在每个病床前翻一下病历，发表几句高见，然后转下一个病床。

这一次除了学生以外，连那些主治主任医生们也一个个掏出笔记本，专家每说一句，只听见下面一片刷刷的笔记声，只看见一个个鸡捣米似的点头。

专家走到我的床前，翻开了我的病历。

“这位病人的其它指标很象心肌炎，但是他的心脏还没有肿大，因此还不是心肌炎。”总共二分钟，专家说完了，走了。

我可是纳闷了，不算心肌炎算什么？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三联律”和其它症状总有个原因吧？有破也得有立，只要你能给出个方案，把我的毛病治好，说它是鼻肌炎也行，可现在什么方子也没给呀。这专家也真好当，连我这

个完全不懂医的也会当，只要把每种病的指标列出个一二三四五，拿病历一对，一条对不上就不算。

可如果每项指标都对得上，还用得着问专家？再说专家也不是神仙，也会有失误，当年医疗专家们不也是诊断红太阳可以活到150岁么？这位专家会不会就是当年给红太阳诊断的专家之一呢？

最高指示一下，鼓楼医院就把我的病改按普通感冒治疗了，每天吃几颗维生素C。

因为病房紧张，把我从病房换到过道的临时病床上，病房让给重病人住。可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发烧不退，“三联律”没有好转，有时还出现“二联律”（每心跳二次中有一次早搏），我每天出大量虚汗，人烧得迷迷糊糊。母亲和我的那位女主角都赶到了南京，她们都是干医这一行的，知道情况不对，向医院反映目前的对症治疗方案不见效。医院十分为难，专家已发过话了，没法更改。下面有个医生也看出情况严重，悄悄地对我们说，赶快转院吧，只要专家发过话，这个医院是绝对不会改变治疗方案的。

摆在面前只有三条路。1，留在鼓楼，等到心脏肿大再说，2，赶快转其它医院，3，回上海治疗。我决定回上海治疗，母亲有些担心（女主角还在实习期间，先回去了），万一在火车上发作，那不要命了吗？太危险了。我安慰母亲，不要紧，我命硬着呢，多少次生死关头都过来了，我不怕，留在鼓楼那才真正危险。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和母亲登上了回上海的火车，当时由于经济拮据，我们还舍不得买卧铺票，买的是软座票。火车开动了，我还发着热度，脑袋晕晕的，心脏还是象浮在云彩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不是吗，只要能熬过这几个小时，到了上海就有希望。

火车开了一阵子，我又有有点迷糊了。车旁的树木在眼前闪过。。。阡陌纵横的田野在旋转，云彩在飘浮。。。一队挑粪的农民在行进。。。队伍，行进。。。前呼后拥。。。医学专家。。。鼓楼玄武湖天文系悲惨世界雨果心肌炎巧克力包谷糊牧马人孔乙己香草橄榄托尔斯泰黄浦江，老城皇庙外婆的澎湖湾雀巢咖啡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南征北战中国女排面包会有的巴黎圣母院让列宁同志先走马太福音老三篇相对论贝多芬红与黑。。。

“上海站到了！”迷迷糊糊的我忽然听到了母亲欣喜的声音。

一到上海，马上去中山医院求诊，中山医院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马上收入病房住院治疗。心肌炎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养病，而我竟然还坐了几个小时火车从南京赶到上海，医生觉得不可思议，真是发疯了！

由于我在发病后没有得到及时休息治疗，疾病变得比较顽固，我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半年多，才算痊愈。

在我以后的科研生涯中，不再迷信学术方面的专家，甚至敢向传统概念和国际权威挑战，与我在鼓楼医院领教过这位医学专家的学问，多少有点关系。

半年多后，我回到上海天文台，耽误了这段时间，其它研究生已经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了。我不想迟毕业，争分夺秒地准备自己的论文，一年后居然赶上了其它研究生，首先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上海天文台搞科研工作，这是后话。

研究生毕业后不久，我又完成了人生的另一件大事，成家了，这是85年初。

按现在年轻人的标准，我们的恋爱有点枯燥无味，干巴巴的，还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没有如胶似漆的亲昵，没有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情意绵绵的书信，没有舞场海滩的浪漫。这些太平盛世时期的恋爱情趣是不可能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的，尤其是饱受苦难的阶层。然而，在那种环境下谈成的恋爱，却往往比现在舞会上一见钟情的浪漫恋爱更经得起考验，能找到一个理解自己，并愿意在我再次受迫害时同甘共苦的人，比什么都强。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得心肌炎的时候，女主角的家里有些担心。因为有的心肌炎病患痊愈不彻底，会留下早搏等一系列后遗症。如果我也留下后遗症，那就是一个一辈子的包袱。她们希望女主角好好考虑考虑，趁现在交往时间不长，分手还来得及，我也希望她好好衡量一下可能的后果。女主角摇摇头，哪怕我留下后遗症，她也认了。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犹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不是吗？

那个年头，住房十分紧张，要等单位分房子不知要等到哪一辈子。我们家房间挤，就在女主角家腾出一间房间，算是我们的新居，我就成了变相的“招女婿”。房间里有一套简单的家俱，还没有我梦寐以求的电视机，一方面我们经济紧张，一方面当时买电视机要凭票，我们还没有票。好在丈人丈母房间有一架老电视机，我可以跟着看电视过过瘾，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坚韧不拔的阿信，玩世不恭的济公和那首“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

从现在起，我可以过安安稳稳的日子了，阿弥陀佛。

谁知道，又有事情来了，我这命呀！

炮二平五，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卒七进一，

车一平二，车九平八，

。。。。

。。。。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就象一张大棋盘，极左的势力和改革的势力双方正在进行较量。到1985年前后，从棋面看极左的一方略居下风，但是他们不甘心失利，利用一切机会反扑。象什么反“写真实论”，反“精神污染”就是他们的手笔，然而效果不大，虽然一些弄潮儿跟着他们起哄了几下，一看风向未转，那些弄潮儿又马上缩回去了。于是弄潮儿们纷纷乔装打扮，有的把自己说成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有的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拥护者，还有的溜之大吉，干脆出国跑到自己当年千批万骂的资本主义社会，心甘情愿地跳进了资产阶级大染缸。

出国啦，出国啦。

就象当年的知青回城的浪潮，新一轮的出国浪潮席卷了祖国大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相当一部分都开始盘算出国的途径。从考TOEFL（一种申请美国大学要求的英语程度考试），找经济担保，联系语言学校，到办假签证，偷渡，找美国公民结婚，出国的途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有高等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联系出国最为积极，因为他们拥有学历和英语的优势，更容易拿到资助，拿到签证。天文界的研究生们不少在毕业前就在联系国外的学校，有的刚一毕业就走了，其它的毕业时大多已联系得差不多，出国留学是早晚的事。洋鬼子就是厉害，人家辛辛苦苦培养到研究生毕业，他一张录取通知书就把人才给钓走了，而且绝对是自觉自愿，愿者上钩的，洋鬼子可从没有威胁利诱过。

反过来这边也得扪心自问，美化自己丑化西方的宣传搞了几十年，为什么人才们不愿留在无比优越无比幸福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却偏偏要去那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为讽刺的是，出国风带头的并不是吃尽苦头的黑九类和狗崽子，恰恰是当权者最宠爱的弄潮儿和八旗子弟。

我大概算研究生中的另类吧，完全不为当时的出国热所动，安心于天文台的科研工作。这倒并不是我的思想境界有多么高尚，而是我累了。动荡漂泊了这么多年，现在刚开始安安稳稳做我所喜爱的科研工作，又成了家，我已经很满意，哪儿也不想去了。而且科研工作刚展开，科研文章刚一篇篇陆续发表，也不舍得中途停下。

另外自己年龄也大了，英语又不好，出国是年轻人的事，让他们去吧。

出国热没有传染我，却把我的太太——也就是前面的女主角——的心弄得痒痒的。

她觉得我应当出去，应当在国际学术界闯荡一番，不然是一种浪费。这不，一到晚上她就对我唠叨开了。

“你不是说你的性格不适合中国的环境，迟早要挨整的吗？你不是知道你的性格不可能在中国受到重用的吗？那你为什么不联系出国深造？”

“唉唉，话是这么说，可咱又不图升官发财，能搞搞科研工作就很不错了。天文台待我挺好的，咱过过安安稳稳的日子不好吗，何必去折腾呢？”

“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干出国际上一流的工作，呆在国内你永远也没机会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觉得是浪费？”

“唉唉，要是早个十年，我的条件是应该出去闯闯。可现在我年纪太大了，英文又不好，力不从心喽。”

“我不相信，你完全有能力把业务和英文弄好。”

“你哪里知道，我自己清楚，真的不行。”

不管太太怎么说，我就是摇头推脱，把太太气得没办法。

一天下班回家，太太告诉我，

“今天晚上起你到前进补习学校上TOEFL补习班，我已经替你付了报名费了。”

好家伙，赶鸭子上架呀！

我对补英文并不反感，自己的英文本来就很糟糕，应该补一补。在当时的出国热中，前进的TOEFL班算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我也很好奇想了解TOEFL是怎么回事，前进是怎么教的。

去上了课才知道，前进的强化记忆，强化训练方法对年轻人很有效，但对记忆力和精力都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年人不一定对路。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看看那些刷刷刷飞快地做题的年轻人，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和反应的敏捷度确实衰退了，年龄不饶人！

学习班结束时我参加了TOEFL考试，考试结果寄来时，太太兴奋地拆开信封，可是看到的却是令人失望的527分，离大部分学校要求的最低分550分还差一截。

“我早就说过，我真的不行喽，这回你相信了吧。”我却幸灾乐祸。

“你，你故意的。。。 ”太太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太太拿我没办法，只好向我的弟弟妹妹讨救兵。

弟弟问我：“你还记得当年叫我们自学的事吗？”

“当然记得，我说的没错吧，知识份子不出五年就香了。”我颇为得意。

弟弟又问我：“你还记得当年告诉我们的秘诀吗？”

“当然记得，看高干子弟，高干子弟干啥你们就干啥。”

“你说的很对，我们都按你说的做了，现在高干子弟都纷纷出国，你是不是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好家伙，把我给套进去了，这下呛得我没话可说，可我还是强词夺理，

“唉唉。。。话是这么说。。。可我真的累了。。。这样吧，你们年轻争取出国，我在国内照顾老妈，解除你们的后顾之忧，怎么样？”

弟弟们也拿我没办法，只好找我的母亲。

母亲并没有动员我出国，只是告诉我一条消息。原来当年写我诬告材料的孔某俩口最近刚拿到去美国探亲的签证，正在兴冲冲地准备出国呢。

这孔某文革初期也受了一点冲击，还下放到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解放时，听说他向戏剧学院领导表示不打算继续搞党政工作，想换换口味搞美术教育工作。

文革结束后，戏剧学院第一批破格提拔了两位副教授，其中一位竟然是孔某！

这我就弄不懂了，戏剧学院有一大批从美术学院毕业，勤勤恳恳教了几十年书的教师，为什么他们提不上副教授，偏偏提了这个从没上过美术学院，一直在做党政工作的老兄？

你这就洋泾浜（上海话：讲外行话）了，知道不知道，文革后孔某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要重新认识过去一直受批判的资产阶级“印象派”画派，在我国美术界解放思想上有贡献。

这我就更弄不懂了，孔某不是一向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印象派”吗？连我这个和美术从不沾边的人，他还在诬告材料上写了“从小接受资产阶级印象派的影响”，从而成功地使我被北大开除的吗？如果他真的认识到自己以前是错了，为什么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过去的作为？为什么他不敢向过去受他迫害和陷害的人忏悔？

真是个书呆子呀，脑筋一点不开窍。他过去哪是真的反对印象派，现在又哪是真的肯定印象派，就象在赌场里下注，该押红时就押红，该押黑时就押黑，这才能赢钱。哪象你们这些不开窍的书呆子，认定了一个就不会变，不输才怪！

凭心而论，孔某的画上的色彩搭配非常奇怪，脏得不可思议，确实有他自己的特点，一般人连模仿都非常困难。因为他有色盲，有正常色觉的人绝不会画出这样古怪的色彩组合。这不太滑稽了吗？高考时不是规定有色盲和色弱的考生不能报考美术专业的吗？你又洋泾浜了，与众不同才叫艺术，懂不懂？没听说西方一次美术展览，第一名画作的作者恰恰是一头大猩猩吗？猩猩能评第一名，为什么色盲就不能评副教授？

你这个同志啊，思想解放一点好不好！

瞧，我又扯远了。

在汹涌的出国潮中，象孔某这样嗅觉灵敏，头脑灵活的人是绝不会置之不理的。

糟糕的是，孔某的三姑六叔中没有一个是美国籍，临时找一个美国干爸爸又来不及，怎么出去呢？据说孔某对自己的女儿定了一条家规：非外籍人不嫁。他的女儿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终于攀上了一位加州的律师，嫁到了美国。过了一段时间，他女儿为他们办理了探亲担保，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出国了（附录）。

俗话说，知子莫如母，这话不假。

母亲对我讲的这一则消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那天晚上，我彻夜辗转难眠。我国现行的社会体制，对孔某这样的弄潮儿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整谁就整谁，即使他干的坏事被抖露出来，组织也会用一切办法庇护他，分房子加工资提职称哪一次都优先考虑他。这么好的社会体制世界上到哪儿去找啊，为什么他还无情无义削尖脑袋要抛弃呢？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被他痛骂的吗，为什么他宁可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党员副教授的桂冠，不顾一切的要去呢？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连八旗子弟和弄潮儿这些社会的宠儿都铁了心要去？吃尽苦头的我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就感恩不尽要好好工作报答祖国了，八旗子弟和弄潮儿都不爱国，我还单相思什么。

我那爱国的外衣其实也是纸糊的，这一则消息一来就把它捅破了。那一晚上，我越想越不服气。你们弄潮儿在中国神气活现，还不就靠着这社会体制，靠着政治运动中出卖良心，靠着吹吹拍拍有上面领导照顾。我就不信你们这一套在美国还吃得开，我也要美国，我就不信在美国凭真本事勤勤恳恳工作会混不过你们（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是完完全全错了，这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有新疆戈壁滩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垫底，我就不信过不了洋插队这一关。

天亮了，我告诉太太，

“从今天起，我开始复习英文，准备重考TOEFL, 我也要去美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只是一朵短暂的浪花。和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相比，人的一生就象一本巨著中的一页，象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短暂而渺小。五千年来在这片古老的中华土地上，发生过多少震天撼地的大事，流传下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沿着时间的长流上溯，从民国满清，到三王五帝，一个个王朝象一张张书页翻卷而过，各种各样的人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度过其短暂的一生。有的残暴凶狠，有的仁慈善良，有的奴颜卑怯，有的刚正不阿，有的贪婪奸诈，有的清廉忠诚，有的势利庸俗，有的坦荡高雅，有的妒忌狭隘，有的纯朴宽厚，有的孤傲寡欢，有的爽朗豁达。唉，人生百态，人生百态呀！

我站在这片苍苍茫茫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炎黄的子孙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谱写着自己的人生之歌。一个又一个权贵无不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好永远享受这荒淫无耻的生活，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久敌不过自然规律躺进了自己的墓穴。一朝又一朝君王无不希望自己万岁万万岁，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代，然而事与愿违，子孙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奸臣们贪赃枉法诬陷忠良，纵然焚书坑儒消灭异己，到头来只落得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江山易主万世唾骂。一代又一代老百姓无不希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自己能过上小康安乐的好日子，却不料贪官当道苛捐杂税无数，一年的辛劳还换不来全家的温饱。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民除害为国献躯，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无奈中国自古多奸臣，魏忠贤坑害忠良，吴三桂引清入关，汪精卫卖身求荣，四人帮祸国殃民，只看见一个个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却看不见轻舟已过万重山。唉，苦难的神州大地！

和共和国同时成长的一代人，转眼也成了两鬓灰白50开外的人了。当年，他们的父辈称他们为祖国的花朵，相信他们这一代会过上最幸福的日子。“祖国十年我十岁，我和祖国同欢乐”，当他们稚嫩的童音在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上迴响的时候，谁能想到他们将经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呢？谁能想到他们会被狂热的教义所引导，不少人曾经丧失过理智，扭曲过灵魂，疯狂地毁坏国家文物，破坏社会秩序，斗争过他们的父辈，师长和同伴，最后伤害他们自己呢？谁又能料到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年轻时失去了正常的学习和恋爱的机会，步入中年后又面临下岗失去工作，沦落为被社会遗弃的一代呢？

恶梦醒来，已是早晨，阳光穿过云层照射在草坪上。一群年轻人正在草地上跳舞，他们嘻嘻哈哈，谈论着流行的时装，崇拜的球星和歌星，新出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宽松社会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人，谁也不担心有人会在背后向组织汇报自己的言行，谁也不恐惧哪一天会被揪出来批斗。

一群幼童在草坪上快乐地玩耍，奔跑，“爷爷，快看，鸟，一只鸟在天上飞。”坐在旁边凳子上看着他们的爷爷和奶奶们喜不自禁地笑了。

谁能想到，在他们慈祥的笑容背后，在他们满脸的皱纹深处，会隐藏着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秘密呢？也许，他曾经偷偷地汇报过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的言行，使他的好朋友被揪出来批斗最后致疯。也许，他曾经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趁人之危地糟蹋过孤独无援的女青年。也许，为了能够上调或者被推荐上大学，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贞操。也许，她利用自己父亲的权势，挤掉了另一个知青的名额，自己上了大学。也许，他曾经冲进黑九类家抄家，挥舞皮带打伤了苦苦哀求的主人。也许，为了回城，他不得不抛弃了相爱多年的女友。也许。。。

即使没有人向他们追究以往的过失，他们的心底会永远地烙上深深的痛苦，这些时代的烙印会永远地伴随他们直至坟墓。忏悔吗？忏悔是需要勇气的，这样的勇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且首先需要忏悔的是那个罪恶的时代的始作俑者及其策划者，他们恰恰是毫无人性，不敢也不会忏悔的。

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那是一个多么荒诞和野蛮的年代，“你们为什么不去法院告他们？”他们怎么能想象那是一个有冤无处诉的年代。

孩子们也会问：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警察呢？”多么天真而自然的想法，他们无法想象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的。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年代，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更闪烁着金子的光辉，使人毕生难忘。在你被揪出来批斗的时候，有人会悄悄地鼓励你，“不要失望，我们相信你”。

在你举目无亲生活艰难的时候，有人会端给你一碗包谷糊或一块杂面馍馍。在你腰酸背疼割麦赶不上别人时，有人会不吭气地帮你割上一二垅。在你发着高烧滴水不进时，战友和乡亲们半夜里翻山把你抬到卫生院。在揪人如麻的政治清查中，有人冒着自己挨整的危险保护你，不让你受到冲击。当你因出身不好被那些革命派弄潮儿歧视唾弃时，有人却平等地对待你关心你帮助你。

我们是绝无仅有的一代，我们亲眼看到各种灵魂和人性脱去了平时的包装，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那些弄潮儿当年上窜下跳的表演，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见到了。其实人性中既有善良和正直的一面，也有丑陋和凶残的一面，只不过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丑恶的一面会受到法律约束，道德规范和社会舆论的压制比较少表现出来罢了。只有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定环境下，丑恶的一面才会受到纵容和扶植，才会出现鬼蜮成灾的局面。

又回到了亘古不变的老话题，人的短暂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

耳边响起了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在说，“人活着任何时候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你才能坦坦荡荡，问心

无愧。你参观过故宫博物院吗？那一件件给老佛爷祝寿的礼物和肉麻的条幅，都是那些吹吹拍拍的奴才官吏送的。别看他们当年红得发紫，高官厚禄，权倾一时，后人谁还记得他们？能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恰恰是当年贫困潦倒的曹雪芹，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从容就义的谭嗣同。他们坦坦荡荡，后人感谢他们，怀念他们，尊敬他们。美酒佳肴，24小时过后照样变成粪土，绫罗绸缎，难以掩盖内心的空虚。如果仅仅为着吃吃喝喝而活着，那和喂养的家畜有什么区别？”另一个声音在哈哈大笑，“得了吧，良心值几个钱？这一套根本行不通。历史永远只承认成功者，老百姓也只会知道成功者。你看看现在一连串电视连续剧中的大清皇帝，哪一个不是成功者？你不要管我心计如何，手段如何，只要我成功了，我有了权，我就可以改写历史。报刊杂志电影电视会把我描绘得高大完美先知先觉，御用文人们会发表许许多多歌功颂德的文章讨我欢心，历史学家们会按我的意愿重新编排史实。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不都是这么写下来的吗？老百姓又能知道多少？各级机构不都是这样的吗？不管我背着别人诬告也好，没着良心造假也好，厚着脸皮吹拍也好，只要我爬上去了，我成功了，后人敬佩的就是我。尽管有少量人知道真情，我不会让广大老百姓知道真情的，等到知情者先后进了坟墓，历史就是我的了。你看看那一个个荒坟野鬼，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就算他们坦坦荡荡，他们是失败者，老百姓怎么会知道他们？”第三个声音冒了出来，“想那么多干什么？咱们小老百姓就图个实惠，图个快乐。人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谁不想好好吃喝玩乐？咱的心没狠到陷害别人的地步，可咱也不会见义勇为帮助别人苦了自己。只要没整到咱头上，俺是明哲保身不管闲事光打自己小算盘。有便宜就占，不占白不占，有危险就躲，不躲该倒霉，吃亏的事咱绝对不干。你别说我是什么小市民势利眼，君不见这个世道只有那些门槛精会钻营的弄潮儿才活得舒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格言。想开点，伙计。人要为自己活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谁对谁错？我该听谁的？

我不知道。你说呢？

黄浦江水滔滔，终日不息地注入东海，灰蒙蒙的外滩海关大楼，静静地注视着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变迁。与共和国同龄的这一代人，现在已慢慢退出工作岗位，不久会慢慢退出人间舞台。这一代人用他们的迷惘，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狂热，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辛酸，他们的觉醒，他们的思索，给他们的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题材。他们用一代人的热血和生命，青春和奉献，用一代人的痛苦和遭遇告诉了他们的后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义是什么货色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夕阳西照，我站了起来，活动一下酸疼的老胳膊老腿，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微风吹过，一片悉悉瑟瑟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听清楚了，这儿的每个草屯土丘，每块残砖断瓦，每棵野藤枯树都在唱着一首古老的歌，一首流淌着先辈的血泪，辛酸和期望的歌，一首浸润着共和国同龄人的彷徨，奋进和思索的歌。

我继续向前走去，唱着心中的歌。

附录：

孔某两口到美国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听说在他们办好了移民身份以后，他女儿就和那律师离了婚，分得一笔财产，他们就搬到东海岸去了。律师在美国要算最厉害的人物，就连美国政府也得让他们三分，但是碰上中国的共产党员，远远不是对手。

据说孔某后来做小生意，发了一点财，在Connecticut州买了一幢比较大的房子，享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又听说他开始信佛教，不信共产主义了。但愿他这次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68年冬，我当连队司务长还不满一年。

一天下午，喂牛的老苏匆匆跑来找我，“司务长，快去，拉柴火的牛快不行了。”我赶紧到牛圈，只见那头拉柴火的黄牛倒在地上喘着粗气，血从鼻孔里流了出来。它的四条腿还在无力地挣扎，似乎想站起来，但那努力显然是徒劳的。看见我的到来，黄牛的头微微动了动，眼睛盯住我，似乎闪出了一点泪花。望着老牛的眼神，我仿佛听到了它的哀求，“老首长，看在我忠心耿耿工作的份上，救救我吧！”

我心底一阵抽搐，不忍再看下去。

两年前，它曾经是条很健壮的牛，肌肉发达，皮毛油光发亮。它拉过面粉，拉过肥料，也拉过柴火。干完活卸套时，它总喜欢摇摇犄角，用尾巴拍打几下背，好象表示自己还有劲。每当饲养员给它喂切碎的麦秸和玉米杆时，它总是不慌不忙慢慢地咀嚼，鼻子不时喷出两口气，好象在赞赏饲养员的工作。

文革开始后，连队的农作物收成越来越差。人吃的口粮都不够，喂牲口的精饲料也大幅度削减，只有在它们出门干重活时才配给少量。麦秸和玉米杆根本不够，它们平时吃的要搭配戈壁滩打下的干草。可它们干的活却越来越重，特别是去戈壁滩拉柴火的牛。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黄牛越来越瘦，皮毛不再闪着油光，稀稀拉拉耸挂着。到我接手司务长的时候，它已瘦得象一张牛皮下包着的一付骨架。

农场在大戈壁中，没有煤炭等燃料，各家各户煮饭取暖以及食堂生火基本就靠烧戈壁滩挖出的红柳根。人们为了生存，过度地损耗自然界产生的植物根茎，使得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开始大家挖房子周围的红柳根，周围的挖完了就挖附近的，附近的挖完了就挖远处的。食堂烧的红柳根就靠挖柴火的赶着牛车到远处戈壁滩挖了拉回来。越挖越远，一开始当天牛车还能赶回来，到我接手司务长的时候，牛车跑三天才能拉回一车柴火。

每当三天一过，我就在盼柴火。下午时分，只见两头瘦得皮包骨头的老牛拉着一车柴火，从远处歪歪斜斜地走过来。大轱辘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就象维吾尔老乡家的榨油机，把老牛身上残存的油脂一点一点榨干。老牛挣扎着，一步一步往前移，求生的欲望驱使它们坚持朝前扭动。往前走呀，再走上几步，就可以回牛圈休息，吃上拌着麸皮的麦秸了。

就象一盏灯油耗尽的油灯，老黄牛终于倒下了，生命之火正在熄灭。

“还有没有救？”我转身问老苏。

“恐怕不行了。”“不能放弃，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试试救活它！想想办法吧！”我咆哮起来，恶狠狠的眼光扫视四周的职工，好象要从他们身上挖出什么妙方。

如果能止住老牛鼻孔流血，帮它站起来，也许还有救。牛必须站着或者趴着，即使睡觉也不能侧躺。侧躺倒的时间一长，必死无疑。运输班长老张提议用土方试一试，

“给牛灌墨汁，它能止血。”那年头少不了要写大字报，连队其它东西缺，不缺墨汁。我连奔带跑到连队办公室，拿起一大瓶墨汁冲到牛圈，掰开牛嘴把墨汁灌进去。一会儿，鼻血好象止住了。我们几个人搭起手，一声吆喝把牛架了起来。老黄牛四条腿哆哆嗦嗦支撑着身体摇晃了几下，又再次倒了下去。也许力气已耗尽了，它再也站不起来，血又从鼻孔冒了出来。

“司务长，下命令动手吧。它撑不了多久，再不幸就放不出血了。”我难过地看了这位忠实的伙伴最后一眼，扭过头去，“那就。。。吧。”我说不下去，用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职工吃饭要紧，连长答应借给食堂一条大田劳动的牛拉柴火，但我必须尽快买来新牛。

农场根本没有牛可买，大田用牛都不够，要从外面运来。岳普湖县是个穷县，巴札（维吾尔语：集市）上卖的只有老弱病残的牛，等着挨刀子的，没有能干活的牛。要买能干活的壮牛，只有上伽师去。

伽师县是位于大戈壁中间的一小片绿洲。那里水草丰茂，牛羊膘肥体壮，巴札上不乏能干活的壮牛。由于四面的大戈壁包围，伽师和外面的交通联系非常不便，处于半隔绝状态。伽师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据说那里的水很特别，含一种什么物质，当地的维吾尔老乡喝了没事，而外面进去的汉族人喝了就不生孩子。汉族人要想调到伽师工作，必须是结了婚的而且已经有了孩子的。这传说是真是假咱也弄不清，当时买牛拉柴火是悠悠万事中的头等大事，咱也顾不上考虑其它后果，决定去伽师买牛。

当时去伽师买牛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少买回来宰肉吃的。为了保护牲畜不被大量杀戮，伽师县市场管理委员会规定带出伽师的牲畜必须要有市管会批准的证明。实际上谁也拿不到这样的证明，买牛的只有想方设法把牛偷带出来。为了杜绝偷带牛出县境的状况，市管会在几条通道上设立了检查站，一旦查到，没收牲畜，拘留违法者。

我没有其它选择，只有挺而走险去当偷渡牛的蛇头。

从岳普湖到伽师要走过一大一小两个戈壁，大的90里，小的70里。市管会的检查站就设在两个戈壁中间一小条有几棵树的平地上，那里是从岳普湖到伽师的必经之地。我请教了偷带牛出来的行家，他们说必须夜里行路翻过大戈壁，在天亮之前绕过检查站。

我挑了运输班长老张和我同行，他有丰富的赶牛车在戈壁滩走远路走夜路的经验。我们准备了够吃三四天的包谷馍和水，又去牛圈铡了几麻袋麦秸，还破例带了一小袋麸皮，就出发了。

牛车在戈壁滩上晃晃悠悠地前进，戈壁滩上空荡荡的，除了一点骆驼刺草和大大小小的碱包再没有其它景色。戈壁滩有好几种，大家在电影里常看到的不是黄沙滚滚就是遍地石砾。我们这里的戈壁滩其实并不是这两种，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盐碱滩。盐碱滩表面是一层硬硬的碱壳，碱壳下面是松松的粉末状盐碱土。一脚踩下去，先是“克嚓”，碱壳碎了，然后“噗哧”，鞋子陷进盐碱土里。戈壁滩上的路，其实就是牛车的大轱辘碾出的两条道，中间是杂乱的牛蹄踩进盐碱土产生的窟窿。

我穿着破棉衣坐在颠簸的牛车上，棉衣里面口袋中的几百元是从连队伙食费中挤出来买牛的。

那可是大伙的命啊，说啥也不能丢。和老张聊了几句，也没有更多的话，干脆靠在装麦草的麻袋上打起瞌睡。

戈壁滩上的小飞虫真多，耳朵边只听到它们的嗡嗡声，。。。真见鬼，戈壁滩上啥也没有，它们靠什么生活？。。。这水也怪，喝了不生小孩，运到内地叫大家都喝，计划生育不就成功了？。。。这西域地方就是妖气重，什么怪水都有，当年那猪八戒喝了女儿国的水，竟然还怀了胎。。。这该死的小虫是不是白骨精变的？没完没了地叮人。。。孙悟空跑哪儿去了？管管这些妖精。。。唉，可怜的老黄牛，瘦得皮包骨头就跟白骨精似的。。。对了，赶紧买新牛。

要小心，千万别让市管会抓到。。。什么，他们就在前面！。。。

我心里一惊，张开了迷迷糊糊的眼睛。

牛车还在晃悠，快到中午时分，70里的小戈壁也快走完了。

老张告诉我，检查站就在前面不远。我们的牛车离开了正路，拐进了戈壁滩，要设法绕过检查站以后再拐回正路。松软的盐碱滩比牛车压紧的正道难走些，只听见“噗哧”，“噗哧”的声音。一条大排碱沟挡在前面，好在里面的碱水不太深，拉车的牛一使劲，牛车就过去了。再往前走了一段，牛车回到了正道。

检查站后面的90里大戈壁行程依然单调无聊，嗡嗡叫的小虫依然伴随着我们走完全程。傍晚时分，稀稀拉拉的土坯屋开始出现，慢慢地演变成一排排杂乱的土房，伽师县城到了。

我们找了一家牛马客栈住下，先让牛饮水，再用麸皮拌了麦草喂牛。在牛细细咀嚼麦草时，我和老张啃着包谷馍，喝点水，就算我们的晚餐。客栈里闹哄哄的，除了我和老张，几乎是清一色的维吾尔老乡。他们一边喂着牛马，一边大叫大嚷，不知在讨论什么事。我只学会几句买东西用的维语，在这种场合下就什么也听不懂抓瞎了。跑

来跑去的老乡拎着晃动的马灯，投到地上墙上的人影一下伸长，又一下缩短，万花筒似的诡异。一阵又一阵听不懂的维语，突然爆发的一堆狂笑，搅拌着牛马的嚼草声，给我一种陌生和异样的感觉，一种隐隐约约孤立无援的恐慌。

这牛马客栈只有喂牛马的食槽，没有人睡的地方。赶车客不是睡在牛车上，就是睡在牛车底下。我和老张蜷在牛车底下，各自搭一条破皮大衣睡觉。那一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惊醒过好几回，一醒就赶紧摸摸破棉衣里面的口袋。

天亮了，是个晴朗的日子。

这天是巴札天，从一清早就有四方的老乡赶着牛车，骑着毛驴，或者徒步来到县城。巴札是维吾尔老乡买卖生活用品的主要场所，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赶巴札简直就象过节一样令人神往。

巴扎上买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吃的从酸奶，鸡蛋，包谷馕和烤羊肉串，到葡萄干，杏干和哈密瓜，用的从火柴，家具，工具，到牛车门框，穿的从维族小花帽到姑娘的长裙，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还有从外面带进来的东东，象英吉沙佩刀，打火机以至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都变戏法一样冒了出来。

我和老张一边在找牲畜市场，一边四处张望。我这没出息的眼睛总忍不住要瞄着卖食品的摊位。几个脏脏的小巴郎（维吾尔语：小孩子）围着烤羊肉串的摊子，眼光直勾勾地望着上面滋滋响的肉串，哈喇子流了下来。我比那小巴郎好不了多少，只不过把哈喇子咽了下去而已。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神气地掏出钱，“来一个羊肉串！”然后对准那一块最肥的散发着焦香的羊肉，狠狠地一口咬下去。其实那时的羊肉串并不贵，几毛钱而已。可是对我们这些农工而言，已经是个奢侈的数字。

牲畜市场是一块空旷的场地，中间竖着一些木桩子可以拴牛羊。

卖牲畜的维吾尔老乡大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傻傻地站在牲畜旁边，当买客查看牲畜时，他们又紧张又期望成交，但不知道如何表达。和买家直接打交道的其实是那些掮客，他们是一群老练而又油滑的维吾尔老乡。买客一出现，掮客就上前把他拉到牲畜边，吹嘘这牲畜如何难得，如何划得来。买客一旦开价，掮客就跑到卖主跟前，使劲地摇他的手希望他同意。如果卖主摇摇头不同意，掮客就回头跑到买客跟前，又使劲地摇他的手希望他再给个好一点的价钱。

这样来来回回跑，来来回回摇手，直到成交为止。这时买方交钱，卖方交拴牲口的绳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掮客就伸手问卖牲畜的维吾尔老乡要回扣了。

买干活的牛先要看它体型是否高大，是否膘肥体壮，四条腿是否正常没有残疾。当这些条件都满足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掰开牛的嘴检查它的牙齿。牙齿能告诉你牛的年龄。如果这条牛满口牙长齐，牙上的凹凸都有点磨平

了，表示它已经上了岁数，干不了多久。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趁牛不注意，抓它的尾巴或者用力捏一下它的屁股。如果这牛愤怒地蹬腿挣扎，表示它有脾气有性格，将来还有潜力。如果这牛性格温和，只是回头望你一下，任你摸屁股不动气，可能就没有多大培养前途。

我和老张转来转去，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牛。

差不多已是中午了，一部分牛已被买家成交牵走，我们还是在大海捞针。我心里开始焦虑起来，今天一定要把牛买到手，我们不可能在这儿呆一个星期等下个巴札。可是，没有合适的牛也不能乱买呀。绝望中，我想起了阿里巴巴故事中的祈祷，“芝麻芝麻快开门！”突然，老张捅了我一下，“司务长，你看那头牛怎么样？”不远处的木桩上拴着一条牛，那是一条年轻的小黄牛，头上的角才长出一点，在那里动来动去，显得浑身有劲。我的心跳加快，感觉中它正是我们想要买的牛。真见鬼，它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我们转了几圈都没见到它？也许真是上天有灵，芝麻开门了。

小黄牛真不错，从牙口看最多也就是两岁。老张对它也非常满意，他告诉我，这小黄牛只要调教几个月就可以出工，将来准是条干重活挑大橛的好牛。

掮客看出我们已经动心，拼命地摇我的手要我报价。可黄牛的主人一口咬定这是条出类拔萃的好牛，死活不肯降价。我跟他讨价还价，蘑菇了好一阵子，害得那掮客不停地跑来跑去摇手。

最后，掮客累了，我也累了，我终于让步了，只杀下来一点点价。我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收据，让老乡按个手印，然后抖抖索索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拿到了牵小黄牛的绳子。

牵着小黄牛回客栈的路上，老张悄悄地告诉我，因为钱的事必须由我作主，他刚才不好插嘴。

要是他的话，根本就不还价马上把牛买下来。这是一条多好的牛啊，值！要是被别人抢了买去，不把你肠子悔青了才怪！

回到客栈，天色开始转暗了，先拌麸皮麦草喂牛，然后我和老张拿出凉包谷馍，就着水吃开了晚饭。

一早出去买牛，忙了一天，我也确实饿坏了。我一边大口啃着包谷馍，一边美滋滋地看着小黄牛咀嚼麦草，心里那个得意和满足，别提了。包谷馍也特别好吃，简直跟羊肉串差不多。

其他住客栈的维吾尔老乡也陆陆续续回来，又有一批新的老乡来到这牛马客栈。客栈里热闹起来，水桶叮当声，打闹笑骂声，搅成一片，闹哄哄的。这时，又来了几个维吾尔年青人。他们看样子象当地有点势力的，他们一来，刚才还肆无忌惮的老乡一下子规矩了起来。他们和老乡们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阵子，也不知说了些啥玩意。然后，他们中有两个在客栈四处转了一圈，看了看吃麦草的牛，就出去了。

我和老张缩在牛车下面，一气不吭。不知是我的革命警惕性高呢，还是我做贼心虚，反正我的感觉很不好。现在连那些老乡瞅我们的眼神，哈哈的笑声，我都疑神疑鬼觉得大有玄机。我悄悄地对老张讲，那几个年轻人来者不善，说不定就是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咱们得当心点。老张也同意我的看法。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和老张决定，今晚就离开。

夜深了，维吾尔老乡们陆续吹熄马灯，躬到牛车底下呼呼入睡。

我和老张还在等待，不能性急，只有等老乡们睡熟后动身才安全。客栈里静静的，只有牛马的咀嚼声，有时牛会蹬一下腿，那是在驱赶牛虻。旷野上的虫叫声此起彼伏，黑呼呼的天空中繁星在狡诘地眨着眼睛。

该是出发的时候了，我和老张悄悄地从牛车底下爬出来，开始装车。然后把拉车的牛牵出来，在辕上套好。最后把小黄牛牵出来，把绳子绑在牛车的尾部。小黄牛十分懂事，不吵不闹顺从地让我们牵出客栈。把我喜得禁不住轻轻地拍拍它，小宝贝，你的革命觉悟真不赖，这么小就懂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老张叫我一起坐上车，可我心里不踏实，宁可牵着牛在地上步行，只有出了县城后我才能放心坐上车走。牛车在空荡荡的县城街道上行进，不管我们再怎么小心，大轱辘还是碾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两旁的土房阴森森的，黑洞洞的小街更增添了恐怖气氛。说不定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人就躲在哪一团阴影后面，随时都可能窜出来把我们扣住。这街道怎么变得那么长，没完没了的还有没有尽头？我的心紧悬着，“芝麻芝麻快开门！保佑我们安然出县城。”时间变得特别慢，好象在料峭的冬夜里凝固住了。不知过了多久，两旁的土房变稀疏了，县城的房屋慢慢地变成了一小团黑影淹没在广袤的大地中。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坐上了牛车。

终于安全地出县城了，只要在天亮前走过大戈壁，绕过检查站，这就大功告成。

悬着的心一放下，兴致也高了起来，我和老张聊开了家常。

一钩残月挂半空，惨淡的月光洒在戈壁滩上。戈壁滩上高高低低的碱包，零零星星的红柳枝，骆驼刺都好像披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轻纱，似隐似现，如同进入了梦幻世界。

老牛拖着牛车，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小黄牛知趣地跟在牛车后面走，显得对我们这两个新主人完全信任十分忠诚。牛车在戈壁滩上一颠一晃，就象大海中的船只。俗话说“老马识途”，其实老牛的认路能力并不亚于老马。戈壁滩上走回头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跟着老牛走。如果你心一急，想赶着老牛抄近路，打乱了老牛的节奏，那就很可能迷路，一辈子也出不了戈壁滩了。戈壁滩上迷路而死在里面的例子，不是罕见的。

不知不觉中90里大戈壁快走完了，牛车又离开正路拐入戈壁滩，准备绕过检查站。

在戈壁滩上走了不多久，迎面一条黑呼呼的长堤挡住去路，原来又是那条大排碱沟。

牛车上了排碱沟堤，老牛拖着牛车下水。牛车的大轱辘刚浸入碱水中，突然，老牛再也拉不动车了。原来小黄牛怕水，它的四足死死地撑住大堤，不让牛车把它带入水。不管我在车上怎么哄它拉它吓它，小黄牛早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忘得精光，坚决不下水。

我们软硬兼施，小黄牛意志坚定，软硬不吃。这样僵持了好一段时间，已经到了黎明前短暂的黑暗时分。我心里发慌，额上冒出了汗珠。老张也急了，他建议：

“司务长，必须一个人下水，把小黄牛推下水。”这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把全身衣服脱个精光扔在车上，跳上了排碱沟堤。一声吆喝，老张猛赶前面拉车的老牛，我用肩膀顶住小黄牛的屁股狠命往前推，小黄牛的腿一动弹，就势滑进了排碱沟。滑进水的小黄牛还是死命地往后缩，我赶紧跳下水，继续顶小黄牛的屁股。水下的泥更滑，没有多大麻烦就让小黄牛滑到了渠中央。小黄牛眼看前面的沟堤比后面的还近些，只好乖乖地往前走爬上岸。

这一段沟的排碱水有齐胸深。由于是碱水，只在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跳进排碱沟后，表面的冰层破碎，冰渣把胸口划出了一条条红道道。一跳进冰水最最刻骨铭心的是命根子区域一阵剧痛，其它感觉都变得次要了。在报纸上经常有谁谁谁跳进冰水抢救什么的报道，我看到的都是嘴唇冻得发紫，手脚冻得麻木之类的描述，怎么偏偏把这最最刻骨铭心的感觉忘了写了？究竟是记者不知道，还是知道的不愿写怕影响英雄人物的形象？真使人纳闷。

过了排碱沟继续往前走，东方已吐出鱼肚白。

检查站已落在远远的后面，我们又拐回了正路。我的身体已暖和过来，小黄牛湿漉漉的，耳朵耷拉着打着喷嚏，看样子已经认识到自己不听从指挥的错误。

天已发亮，新的一天又展现出它的朝气，小黄牛又活跃了起来。也许它在憧憬新主人会带它到一个水草丰满的好地方，每天吃着新鲜的嫩草，悠闲地散步？也许它在想象新主人将给它一个漂亮的牛舍，那里干干净净，遮风避雨，精饲料充足？

唉，苦命的小黄牛呀，你哪会想到等待你的将是繁重的劳役，少得可怜的饲料，和无休止的戈壁滩跋涉呢？年青时对未来的向往永远是美好的。我们从小不也是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吗？现在这些花朵们不正在经受无情的现实的煎熬吗？

我想起了倒在地上骨瘦如柴的老黄牛，想起了拉着柴火车一步一步往前挪的老黄牛，想起了奄奄一息眼睛盯着我的老黄牛。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唉，苦命的小黄牛呀，我们将要相依为命了。

本贴于2006-11-20 04:33:53在乐趣园→情感交友→纵横发表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76年夏，长期受迫害的父亲病危，我匆匆赶回上海。

这一年事情特别多，周，朱，毛相继去世，唐山又大地震。真是鸡飞狗跳，长虫过道，按迷信的说法，要出大事啊。可不是吗，父亲挨批斗后离开了讲台，修了这些年防空洞，身体一直不错。突然诊断出肝癌，还是晚期，真是祸从天降。

周的去世，我确实相当悲哀。

那时我还在农场，教师们自发地做花圈，戴黑纱，举行悼念活动。有的泣不成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可以看出，大伙的悲哀都是真诚的，自发的。尽管周在文革中也讲了不少极左的话，做了不少极左的事，毕竟在文革期间能出来讲话的中央领导人中，他是唯一的带一点人情味的，哪怕是表面上的。他去世后，我们这些狗崽子们的日子，将更难熬了。

红太阳落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那时我已赶回上海，那天我恰好在公共浴室洗澡。突然广播大响，哀乐齐鸣，播音员用极其沉痛的声调，宣布了这一消息。广播一遍又一遍，浴室里大家哑然无语，没有一个哭泣。许久，我边上有人在轻声叹息，

“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灭的长明灯。。。灭了。。。 ”

说不清他到底是叹息还是嘲弄，是哀伤还是快意。

不知怎么的，我悲哀不起来，看来，浴室里其它人也和我差不多。我的心底，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还回想起，几年前上级传达中央的一个什么重大的好消息，说经医学专家诊断，红太阳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活多少岁也能诊断出来，真是神仙啊，这些医学专家也真会拍马屁。弄了半天，红太阳还是人，不是神。不知这些医学专家算不算误诊？

咱们这些中央领导人也真是，报上描绘得一个个跟伟人似的，还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呢。但只要涉及延年益寿的事儿，什么鬼话都信。

走了。。。走了。。。今后怎样？。。。还会更糟吗？

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好象一下子钻进一个漆黑的隧道，什麼也看不见了。

隧道的出口在哪儿？

出口外面，会是什麼样的世界？

报纸上的文章，一篇篇火药味挺浓的，毛的接班人誓言继续高举毛的大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十年了，还没到底呀？文化大革命前的党中央委员都斗掉了一多半，还要斗掉多少才罢休？

毛的追悼会上，华XX，王XX，叶XX，张XX站在一排，阴沉着脸。他们在想些什麼？

他们都想得一样吗？说的是“紧密地团结在以华XX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真的还是假的？

神州大地，人们保持沉默。在沉默中生存，在沉默中观察，在沉默中思考，在沉默中期待。

父亲还在顽强地和病魔搏斗，我们四处打听治癌的土方，偏方。从芦笋到癞蛤蟆皮，都找来试了。在医学还没有发达到可以攻克癌症之前，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民间药方，兴许能出个奇迹。只要有救命的可能，稻草也要抓。

一天清晨，我去华东医院看望父亲。突然，看到路边墙上贴着几张标语。

“打倒四人帮！”

“打倒王张江姚！”

看得出，标语是匆匆贴上去的，连浆糊还没干。

痛快！虽然当时我还不忍大声欢呼，心里那个痛快啊！

这是谁贴的呢？围观的市民在交头接耳。据说一些外地来上海读书的大学生，从北京得到一些消息，昨天半夜里就上街贴标语，他们已经被工人纠察队抓走了。

市民们只是看，没有言语。从他们漠然的表情上，你看不出他们是高兴呢，还是愤怒，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这是最安全的表情。大家都学会了防卫自己，我也是。

一个市民离开，装模作样地说了一句，

“反动标语！”然后匆匆地走了。

我兴奋地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也非常兴奋，他悄悄告诉我，

“这都是真的。”

“咦，你怎么知道？”

原来，父亲隔壁病床是一位煤炭工业部的付部长，他从北京来上海主持一个会议，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他的消息灵通。

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XX，徐XX把盖子捂得死死的。《解放》，《文汇》两报上根本看不出四人帮垮台的信息。各单位领导接到市委指示，要他们管好本单位职工，严守秩序，不许上街，不许游行，不得轻举妄动。

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只维持了几天，终于，火山爆发了。

象决堤的洪水，象激怒的蜂群，象漫卷的野火，象呼啸的飓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上了街头。解放以来上海市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群众性游行开始了。

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打倒四人帮”，举着自制的横幅，“打倒四人帮”，干脆敲着家里的盆盆罐罐，“打倒四人帮”。

有的商店放起了鞭炮，“嘭”，二踢腿窜得好高，“啪”，炸开了散了一地。有的商店用竹竿挑着个大乌龟，那乌龟倒挂着，四只爪子在挣扎。

“王八蛋，你也有今天！”

马路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涂写着标语。

“清炖姚文元！”

“油炸张春桥！”

“红烧王洪文！”

“爆炒江青！”

我兴奋得象个小孩，从一清早就汇入群众游行的洪流。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自发地加入游行队伍。这是完全自发的游行，大家并不认识。然而，秩序井然，一人喊口号，大家都会跟。队伍向市革委会方向走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我们万众一心，

前进，前进，前进，进！

队伍在行进，人们开心地笑着，爽朗地笑着。这是发自内心的笑，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笑容。上海人在国内的名声一向并不太好，普遍的看法是“门槛精”，尤其善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观望。其它地方的人对我的最高评价往往是“你不象上海人”。这一次，上海人也走上了街头，倾泻自己内心的感情。打倒四人帮，高兴啊，上海人也控制不住了。

走过淮海路，延安路，南京路，一路往东走到外滩，再沿着黄浦江畔来回走。从清晨一直走到傍晚，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直到天黑，游行队伍才慢慢稀疏，不少家庭到餐馆继续聚餐庆祝，意犹未尽。

这些年来，一直是那些弄潮儿在台前台后跳来跳去，广大民众是沉默的多数。今天，沉默的多数呐喊了。尽管这么多年用阶级斗争理论（更准确地说，用血统论封建理论）来改造民众的思想，中华民族的传统善恶准则并没有从人们心中抹去。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大伙儿心里亮堂着呢。

有了这一条，中国就有希望！

原来，我所想的，我所感受的，和大伙儿想的是如此相近，如此不谋而合。我不再感到孤单，心里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充实。

因为，中国有脊梁，中国有希望。

电视台播送首都人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记得是由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X主持的。我永远记得其中的一句话：

“人民胜利了！”

当我听到这句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多少年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那些长眠在戈壁滩的战友们，如果能活到这一天，如果能听到这句话，该多么高兴！

假如上帝开恩，允许每个人在离开人世时，带一句他最喜欢的话，我就带这句。

(一)

大戈壁的风，一刮起来就没个完，已经刮了一天一夜，还看不出歇息的迹象。天地仿佛粘在一起浑浑沌沌，一片灰蒙蒙。灰黄的沙尘无孔不入，弥漫在戈壁滩上，撒落在小客栈的被褥里，粘连在食堂的馍馍中，也钻进卡车的驾驶室和篷布盖着的后舱。

顶着风沙行进在南疆公路上的卡车，就象在沙滩上爬行的甲虫，缓慢又吃力。卡车后舱里坐着的3男2女尽管用围巾蒙着脸，每张脸还是被灰沙涂得面目全非，就象京剧舞台上的丑角或花脸。这是1973年底，我们农场连队5位知青获准回上海探亲过年，大家约好了结伴一起走，坐上了农场去北疆拉货的卡车。

那个年头，升学无望，上调没门，探亲成了农场知青唯一的精神寄托。每当夜深人静，劳累了一天的知青蜷缩在地窝子里的铺板上，思乡之情如潺潺流水，滋润着干涸的心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故乡的亲人，故乡的山水，儿时的伙伴，校园的往事，一件件一桩桩从眼前闪过。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带点甜蜜，又带点苦涩。掰着手指算了一遍又一遍，再熬过多少个月，又能和亲人团聚了。

只有到了批准探亲的那一天，盼了几年的美梦才算成真。接下来就是把几年省吃俭用积累买的土产打包准备行李，打听和联系上北疆的便车，引得那些还没被批准探亲的知青又眼红又心酸。

尽管我们一个个归心似箭，急也不管用。农场离我们要去的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相距将近1500公里，卡车要开六天才能到，再坐四天三夜火车，才能到达黄浦江边。坐卡车并不舒服。我们的卡车上放着两只汽油桶，其中一只装满了汽油，那是为戈壁滩上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应急用的。空空的卡车箱里没有座位，我们靠着车挡板坐着，双手抓住车上的麻绳防止车辆颠簸把我们摔出去。戈壁滩的公路颠得够呛，不抓紧麻绳根本坐不住。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手已经累得抓不住麻绳，干脆把手绑死麻绳上，躺在卡车里，随它怎么颠，只要不摔到车箱外就行。

一路上的吃喝也必须将就，你要是指望好吃好喝那就别回去探亲。卡车开出阿克苏后，刮起了大风，我们开到一小站吃早饭。推开食堂大门，里面空无一人，饭桌上粘着一层黄沙，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黄黄的灰雾，就象在浴室里似的。好不容易敲开了售饭窗口，露出一张围巾裹着的脸。

“包谷馍没了，只有包谷糊。”“有没有咸菜？”“也没有。”“有没有剩下的包谷馍？”“昨天的。”啃着硬硬的凉馍馍，喝着夹杂着“嚓嚓”沙子声的包谷糊，实在谈不上什么享受。有一首当年的顺口溜，说的就是那年

头沿途的伙食。

“稀饭稀，开水稠，隔夜的馍馍打死狗。”条件虽然艰苦，可我们亢奋的精神状态始终没有低落。因为有了盼头。熬过一天，就少了一天，只要坚持到大河沿，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了。

第六天上午，卡车终于开到了大河沿。看到了交叉的铁路，一排排工房，散布的货车，听到了激动人心的火车汽笛声。大伙儿松了一口气，活动一下疲惫不堪的身躯，情绪高涨起来。快了，再过四天就可以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啦。

我们把行李堆在一起，留下一位男知青和那二位女知青看管行李，我和另一位男知青去售票处买火车票。我们打算在买好火车票后好好洗把脸休息一下，再吃点东西，等晚上登上火车，那就大功告成。

熬了几年啦，就盼着这一天。

大河沿车站上拥集了不少人，有的在走动，有的坐在行李上休息。他们脸色疲惫，焦急，有的在三三两两交谈些什么。

售票处前也聚集着一些人，当我把钱伸进窗口要买五张当日到上海的火车票时，售票员告诉我，“票我可以卖给你，能不能上得了火车那可不能保证。这里是中间站，能上多少人全看火车上有多少空位。”“没问题，买！”咱们是经过大风大浪的知青，还怕挤不过别人？太小看我们了！

买完票，一个人走过来搭讪，“你们是今天刚到的？”“是呀，你也是刚到的？”“哪里，我昨天就到了。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火车出发时人都挤满了，经过大河沿车站连续两天不开车门，这两天一个旅客都上不了火车。旅客越堆越多，这不，你们第三天的旅客又堆上来了。”怎么会这样？

“你不信？你看，这是我的车票，还是昨天的印章呢。”怪不得车站上这么多人，怪不得售票员卖票前先给我警告。

我们该怎么办？

(二)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列车，一天只有一班，晚上经过大河沿。这趟编号为54次列车的拥挤程度是远近闻名的，但是中途不开车门的情况，还没有听说过。

我们加入了滞留在车站旅客的行列，希望能打听到一点消息。旅客们忧心忡忡，消息十分不妙。许多旅客都赶在年底前回上海过元旦春节，54次列车的车票十分抢手，列车在开出乌鲁木齐时就坐满了。

今天晚上恐怕又是凶多吉少。

我们计划让这二位女知青先冲上火车，一位男知青递行李，我和另一位男知青负责挡住后面的人。

可如果火车不开车门，这计划就完全落空。我们也考虑过干脆坐火车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回上海。

乌鲁木齐是起点站，起点站总不会不开车门吧。听说有的旅客决定不在这儿死等，已经去了乌鲁木齐。

但是又有的旅客传来消息，乌鲁木齐几天内的车票早已卖完，即使赶到那儿，也只能买到一个星期以后的票。谁能受得了？

情急之中，我们想到了一个人。

在离开农场前，连队里一位哥儿们告诉我，他有一位铁杆哥儿们在大河沿铁路机务段工作，如果有麻烦可以找他。这位铁杆兄弟姓谈，也是上海人。我们支边进疆那一年，他顶住了里弄的动员，坚决不报名。我们到建设兵团以后，新疆铁路局到上海招人，他也来到新疆，正巧分配在铁路局大河沿机务段工作。

我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只有劳驾这位兄弟帮忙。

午后，一位男知青陪我去机务段工房找阿谈。那个年头，江湖上办事少不了烟酒开道。象我这种一本正经连烟都不会抽的，江湖兄弟很难把我当自己人，必须让会抽烟的知青帮忙捧场。

在一排排机务段工房门口问了几个人，我们就打听到了阿谈的宿舍。

“阿谈，快点过来，有人找你呢。”宿舍里一个人朝门外大声喊。

“叫啥，叫啥，耳朵都叫聋了。谁找我？”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人，边进边嚷。

来人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头上一顶帽子歪戴着，大大咧咧的，说不清带着点流气还是侠气。我们赶紧自我介绍，告诉他是连队里谁谁谁介绍来的。阿谈听到熟人介绍，态度立即变得温和了。那位男知青趁机递上两支烟。阿谈见我手中没烟，顺手递给我一支，男知青马上解释，“他不会抽烟。”“农场里混了这么多年还不会抽烟？”阿谈惊奇得瞪大了眼睛。

“嘿嘿，真的不会。咱是书呆子，书呆子。”我讪讪地自嘲，很不好意思。很明显，这一个差异立即拉开了阿谈和我的距离。

虽然我抽烟不行，讲话还可以。那些报上的官话和鬼话是绝对不讲的，讲怪话发牢骚咱的水平不亚于江湖弟兄。聊了一阵子，显然是臭味相投，大家十分融洽。

“咱们说痛快的，你们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阿谈又点起一支烟。

“实不相瞒，兄弟们有难，今晚上不了火车，想请你帮帮忙通通路子让我们先上去。”“这个简单，车站上的人我都认识，打个招呼就可以了。”阿谈说的很轻松。

“前两天乌鲁木齐开来的火车都不开车门，一个人都上不去，车站上已堆积了不少人。”我提醒他这事的困难度。

“放心吧，你们还信不过兄弟我？”阿谈还是满不在乎。

见阿谈说得这么肯定，想必有什么高招。我们放下心来，约好今晚火车到站时在月台见面。

天色渐渐暗淡，月台上的电灯亮了。昏黄的灯光下，噪动的人们有的来回走动，有的整理行李，有的探头张望，有的议论聊天。看样子第三天又到了不少新旅客，月台上的人比白天多了不少。我大致上估算了一下，大约有二三百人。今晚少不了又是一场恶战！

离火车到来的时刻越近，月台上的气氛就越紧张，不少旅客开始摩拳擦掌了。有的开始把行李堆在月台靠火车停靠的前沿，有的干脆把行李背在身上。就象站在起跑线后面的长跑运动员，只等号令枪一响，就可以抢跑道。

我们因为和阿谈有约，没有挤到人群中，反而把行李堆在外面，这样容易被阿谈发现。

终于，远远的一束灯光撕破了夜空，一声汽笛叫得人们的肌肉都开始颤抖，火车进站了。月台上人头攒动，人声嘈杂，夹杂着尖刺的哨子声。

糟糕，阿谈没有来！

“这阿谈会不会放我们鸽子？”同伴们有些怀疑。

“我想不会的，恐怕有什么意外情况耽搁了。”我知道江湖中最忌的就是言而无信，他们说了就会做，这和政治家大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我们赶紧把行李往月台上搬。如果阿谈来不了，我们就准备自己挤上火车。

列车靠着月台。透过列车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每一节车厢里不仅坐满了人，而且站满了人。看来列车在开出乌鲁木齐时就已严重超载。每一节车皮的车门都紧关着，连每一扇车窗都关得严严实实。

今天又和前两天一样，不开车门！

滞留的旅客涌向列车，有人使劲地敲打车门。路警们吹着哨子，竭力把靠近火车的旅客们驱赶开。

旅客们有的苦苦哀求，有的大声抗议，有的哭喊叫骂，“开门，开门！今晚TMD不开车门，老子就不让你开车！”变戏法似的，阿谈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简短地告诉我，出门时让一个人纠缠住，耽误了几分钟。

然后一边喊着“让开，让开”，一边带着我们往前挤。

“干什么？干什么？往后退！”路警使劲把我们往后推。

“我是机务段的，我有事要上车。”阿谈出面了。“管你什么机务段的，今晚谁都不许上车。”路警不买帐。

“XXX，你把眼珠子瞪大点，连我是谁都不认识了。”阿谈骂开了粗话。

“XXX，我当然认识你。上头有命令，今晚维持秩序，谁都不许上车。对不起啦，大家给点面子。”路警不甘示弱，回了一句粗话。

双方对骂了几句，看得出，上车是没希望了。

连阿谈也帮不上忙，完了，这回真的完了。(三)看到阿谈发脾气，我觉得有些内疚，赶紧劝他别吵。车门不开，路警挡道，这怪不得阿谈。

“小赤佬，眼吾子瞎特了，明朝要依好看！”阿谈愤愤地用上海话咕噜了一句，做个手势，示意我们跟他走。

我们跟着阿谈来到餐车车厢前。这里冷冷清清，门窗紧闭，滞留的旅客们都聚集在硬座车厢前喧嚣。

阿谈往两边一望，突然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餐车车门。原来列车的车门钥匙都是统一型号，机务段一般都备几把这种钥匙，便于职工有事上车。阿谈先上了餐车，我们赶紧往车上递行李。刚把行李递完，就见一群餐车服务员凶神恶煞般地冲了过来。

“糟糕，有人从这儿上车了！”“谁把车门打开的？谁？”“是我开的车门，我想上车买包烟。”阿谈回答。

“瞎说！你明明想帮他们上车。”服务员指着我们。

“我不认识他们。”阿谈矢口否认。

“什么事？什么事？”一位乘警赶了过来，腰带上别着一个手枪套，弄不清里面有没有真货。

“这家伙打开车门，把他们放了上来。”“谁让你上来的？”“我是这儿机务段的，想买包烟。”“你存心帮他们混上车，还想撒谎！是不是？”乘警逼问。

“我不认识他们，我只想买包烟。”阿谈不松口。

“你这小子装什么蒜！”“啪！”乘警火了，抽了他一个耳光。

“我不认识他们。”“啪！啪！”又是两记耳光。“识相点，不老实讲就别想下车！”“我不认识他们。”我们看着真难受，可一时又不知如何劝阻，如果暴露出我们和阿谈认识，岂不给阿谈难堪？

“还是让他下去吧，不然车子开不了。”餐车人员打圆场。

“今天便宜了你，滚！”乘警找到了下台阶。

阿谈被推到车门边。临下车时，他扫了我一眼，嘴角露出一丝隐隐的微笑，好象告诉我，“你们自己保重，兄弟我先告辞了。”我回了他一眼，好象告诉他，“兄弟，多谢了，咱们后会有期。”阿谈下车后径直朝前走去，再没回头，他的黑色皮夹克很快淹没在夜幕中。

“你们也下去！”阿谈刚下车，餐车人员就接着驱赶我们。

“求求你们，让我们留下吧。”两位女知青开始哀求。

“不行！你们混了上来，还想赖着不下？”“这位师傅帮帮忙，我们都买有车票，没有混票的。”我帮着解释。

“有票到硬席车厢上车，我们这儿是餐车，不能上车。”“帮帮忙吧，硬席车厢不开车门，不然我们也不会到这儿上车。”“怎么这么啰嗦？硬席车厢开不开车门管我们什么事。下不下？不下车就不客气啦！”我们就是不下。餐车人员把我们往车下推，我是最后上车的，死死地顶住车门，不让他们打开。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餐车人员气急了，有的推我们，有的拉车门，有的抢我们行李要往车下扔。两位女知青嚎啕大哭，死活不下。

餐车人员的劲越用越大，我们可不敢再用劲了。那旅行袋里的葵花籽和葡萄干是我们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的，就指望着它回家给家里过春节添点喜气。如果把旅行袋拉破了，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我们心疼都来不及呀！眼看行李要保不住了，我们总不能玉石俱焚吧。

为了打破僵局，我站了出来，“大家别争了，听我讲两句。我们都是上海人，都是出来闯荡在江湖上混日子的，桥不转路转，今后还有机会碰头。大家帮帮忙，做点好事，留点后路。各位师傅如果能让这两位女的留下，我们三个男的就下车。我们说话算话，决不为难你们。”两位女知青哭得更加伤心。

餐车人员商量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拉开车门，朝大家一拱手，“多谢各位，多多拜托啦！”说完就跳下了餐车。

两位男知青跟着跳下了餐车。

无情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好象听到了车厢里隐隐约约女知青的哭声，然而，车门再不打开了。

(四)

我们三个男知青拎着三只装满东西的旅行袋，孤零零地站在餐车边的月台上。其实我们每人带两袋东西回家，另一只行李留在餐车上让女知青代管。

一阵失落，孤独的感觉袭上心头。六天前，我们兴奋得象飞出囚笼，冲向蓝天的鸽子，如今却成了离队的孤雁。六天前，我们喜悦得象登上游轮的游客，如今却成了漂泊在孤岛上的鲁宾荪。茫茫大地，容不得我们选择自己的落脚之处。远方的亲人，相思容易相见难哪。

昏黄的路灯光，在月台上勾画出三个孤独的身影。一个悲悲戚戚的声音，在耳边蓦然响起。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都说人在孤独无援时感情特别脆弱，这不，咱和八百多年前的女诗人共鸣了。

我们该怎么办？

不能坐以待毙。我让一位伙伴留在餐车边月台上，守住那三只旅行袋。我和另一位伙伴再回到人群拥挤的硬席车厢边，看看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车门依然紧闭，人群中叫骂声不绝。我们夹杂在人堆里，就象在汹涌的浪涛中随波逐流身不由己。

有一阵后面的人猛地压了上来，人们站立不稳，往前倾倒挤到车厢的车皮边。又有一阵前面的人猛往后退，把我们挤得跌跌撞撞，踩到了后面旅客的脚和行李。尖叫声，哭闹声，哨子声，吆喝声和咒骂声搅拌在一起，灌得人脑袋昏昏沉沉。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列车静静地停在边上瞧着我们，没有一个旅客上得去。

人群中一阵骚动，原来有一节车厢的一扇车窗打开了一半。这是里面一位女乘客干的，不知她是被外面旅客的苦苦哀求感动了，还是外面有她的熟人或亲属，还是她受不了车厢里的闷热。外面的一位旅客马上把他的行李从窗口外面扔进了车厢，接着他设法从窗口爬进去。车窗位置比较高，他上半身进去了，屁股和两条腿还在窗外扭动，就象被大蟒蛇吞噬的青蛙在挣扎。后面的旅客好不容易把他推了进去，乘务员就赶了过来把车窗关死了。

可以看到乘务员在训斥那位女乘客，现在不管外面怎么哀求，里面的乘客只是无奈地做个怪脸。

这条路又被堵死了。

突然，远远地看到餐车门打开了，一位餐车服务员伸出头喊“行李在哪儿？”原来二位女知青在车上继续哭，说有一只她们的行李被我们带下去了。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交流，餐车服务员已经对她们的遭遇产生同情。

“行李在这儿。”留在那里看行李的男知青一下提起三只旅行袋，连人带行李挤上了餐车。

我和那位伙伴赶紧回头往餐车方向奔，一批旅客看见我们回头，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我们跑了过来。太晚了！等我们奔到餐车边，车门早已关上了。

我们俩人就象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在站台上毫无目的地游荡。看来要留在站台上过夜了。一阵冷风袭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糟糕！刚才为了行动方便，我们把棉衣都留在餐车边。现在行李都被带上了车，连件披的衣服都没有。

这漫漫长夜，我们该如何熬过？

(五)

“要不要再去硬席车厢那儿试试？”剩下的那位伙伴问我。

“算了吧，别浪费精力了。还是呆在这儿歇歇。”我已经泄气了，没精打采地回答。

“今晚怎么办？”“怎么办？就呆在这儿打发时间吧。”“就这儿？还不把人冻死了。”同伴叫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冷了就站起来跑步活动活动。”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车站那只钟上的指针快点旋转，早点转到太阳升起的时刻。

“滴答，滴答”，那秒针根本不理睬我们的心情，还是不紧不慢地走它的路。

我靠着一根柱子蜷缩着，想念着遥远的家乡和亲人。

北火车站。。。南京路。。。包谷湖。。。淮海路葡萄干黄埔江葵花籽红色娘子军戈壁滩老三篇白毛女奶油蛋糕凉馍馍老城皇庙盐碱地大批判大河沿革委会旅行袋。。。

真扫兴，杂乱的思绪始终无法凝聚出一幅清晰的图象。

突然，远远地有一扇房门打开。一行人从房里走出，准备穿过月台，到第一节卧铺车厢。

有人要上卧铺车厢！

他们是什么人？是领导干部？是外宾？反正是重要人物。

怪不得火车迟迟不开，原来在等他们。

“快，去卧铺车厢，冲！”我猛然跳起，朝伙伴吼了一声。

我们俩拔腿就跑，发疯似地往前冲。其它旅客也发现了，也有往这边跑的。好在我们离卧铺车厢比较近，加上两人空身没有行李，他们谁也跑不过我们。就在卧铺车厢门关上之前，我们两人硬是挤了上去。

“谁让你们上来的？快下去！”卧铺乘务员拦住了我们。

“这位师傅帮帮忙，听我给您解释。”我边讲边掏出火车票，态度十分诚恳。

我告诉他我们一行五人同来都买了车票，其中三人挤上了车现在就在这列火车上。我们两人没挤上车，可行李全在他们那里。我们现在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如果要在月台上过夜，即使冻不死也得丢半条命。请师傅高抬贵手，别赶我们下车。

乘务员看了看我们的车票，再看了看我们两人狼狈不堪的模样，迟疑地说：

“我们这里是卧铺，你们不能坐这里。”“那当然，当然。火车一开动，我们立即会走到硬席车厢去。”乘务员不再坚持，开始忙自己的事，只当没看见我们。

我们知趣地缩在两节卧铺车厢间的连接处，尽量不影响乘务员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的心始终忐忑不安，就象两只惊弓之鸟，随时可能被猎人的枪打下来。上帝保佑，千万别让其他人看见我们。如果乘警或者列车长经过这里，我们躲都没地方躲呀。

火车火车快点开吧！

好象跟我们开玩笑，时间过得特别慢。我们的心都急死了，火车还是一动也不动。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火车轻微地抖动了一下，轮子转开了。

火车开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们俩感到一阵轻松，这才相信自己真的登上了火车。可这轻松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当列车徐徐开过站台，我看到拥挤在站台上的人群，他们有的大声呼叫，有的愤怒地挥舞拳头。我的心又一下子沉了下去，一股负罪感升了上来，好象自己成了抛弃了大部队的逃兵，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硬席车厢里真的很挤，中间的过道，车厢的连接处都是站着坐着的旅客。车厢里十分闷热，还夹杂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气味。当我们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跨过坐在地上的旅客，终于来到那三位战友身边时，他们惊呆了，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不是在做梦吧？

拥挤的车厢里连找个坐在地上的位置都没有，我基本上是站着的。熬了一天一夜，列车到了兰州，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好在有个战友的哥哥在兰州工作，我有他的地址。我决定下车签票，在他哥哥那里休息一晚，再换其它车回上海。

告别了车上的战友，我跳下火车。沾满戈壁滩尘沙的列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长吼一声又开始出发。这是一列平凡的火车，可有谁知道，火车上的每一位旅客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的经历呢？谁能想到登上这趟列车时，发生过一系列不平凡的故事？

列车开动了。满载着一车的故事，满载着一车的辛酸，列车开进了历史。年年月月，人们告别了旧故事，同时又迎接着新故事。发生的事毕竟过去了，过去了也就成了历史，历史是容易淡忘的。然而，这一幕幕探亲途中的片段，就象那纷纷扬扬飘降的雪花，沉淀在我的记忆里。

本贴于2007-06-29 23:19:33在乐趣→情感交友→纵横发表.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一)序曲

湛蓝的天，好深，好远。乳白的云，好松，好软。

蓝天搂抱着白云，白云依偎着蓝天。

回首望去，走过的路崎岖，曲折，坎坷不平，伸展到朦胧的远方。路是不同的。

有的平直坦荡，有的崎岖曲折。有开阔的柏油马路，有泥泞的乡间小路，有绿叶遮日的林荫大道，也有戈壁滩上牛蹄踩出的小道。

人是不同的。有的坐上“奔驰”，油门轻轻一踩，便可一帆风顺到达远方。有的披荆斩棘，山穷水尽疑无路，历经艰险摸索前进。。。不管怎样，走过的路，就是走过了。走过的路，不会再回来了。走过一段，就离蓝天近了一点。能往前走，这是最重要的。

该有半晌光景了吧。不停地攀登，攀登，总算登上了一道山梁。老胳膊老腿的，不听使唤啦。歇会儿吧，比不得当年喽。想当年。。。嗨，提那干啥？喝口饮料，躺在那草坡上，定定神儿，喘口气儿？

微风穿过树丛，挟带着树脂的清香。那清幽的香醇，顺着毛孔，渗入肌肤，沁入心肺。哦，要醉了。。。叽叽喳喳的小鸟，叫得那么欢畅，那么无忧无虑。哦，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鸟，在蓝天下飞翔，在云彩间歌唱。忘掉尘世的烦恼，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听，好熟悉的歌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哟，好骏的马儿，跑慢点儿。。。“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好蓝的天，象无边的大海。。。那深不见底的蓝天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

记得小时候，我也喜欢躺在草坪上。痴望着蓝天，遐想着未来。。。

一条小径，曲曲弯弯，伸向灰蒙蒙的远方。一股神奇的力，驱动着我，沿着小路往前走。小路永无尽头。两旁的景物，隐隐约约，看不清楚，又似曾相识。一只无形的手指，拨动了心底的琴弦。。。

我要去哪儿？不知道，只是下意识的往前走。

我要找什么？不知道，只是朦朦胧胧一种欲望，一种冲动，一种追求。

寻找金色的童年？寻找忘却的记忆？寻找破碎的理想？。。。不知道。谁知道呢？。。。往前走吧，会知道的。。。。

阳光透过三棱镜，折射成七彩光华。沙沙的树叶，把光华切割成大大小小的光斑，抛洒在路面上。树影驱赶着光斑，光斑追逐着树影。。。这是什么地方？好熟悉啊。。。昏黄的路灯，窄小的弄堂，回荡着长长的吆喝，“臭豆腐干----吃阀，豆腐花----吃阀----”，“生炒----糯米热----白果，香是香来----糯又糯----”。这不是开明新村的弄堂吗？我童年的天堂。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

“爸——爸——”妹妹欢叫着，张开小双臂，奔向弄堂口，象一只小白鸽。

“爸——爸——”我也张开双臂，想要赶在妹妹之前，扑入爸爸的怀抱。脚下绊着什么，一个趔趄，脸颊重重地撞上了地面。好象听到“砰”的一声，真疼啊，眼泪冲出了眼帘。

一双温暖的大手，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抱了起来。啊，我比大人还高！靠着坚实的肩膀，我忘掉了世界的一切。心里好充实，好满足，好幸福。我笑了，脸上挂着泪珠。

这是哪儿？法国梧桐摇曳着枝干，26路电车“铛铛”地开过门前。喔，这是搬进武康大楼的第一夜。我躺在打蜡地板上，翻呀，滚呀，尽情地发泄心中的欢快。

这是1956年。上海市政府拨了一批高级住宅，指名分配给一些高级知识份子。我们住进了这幢位于当年法租界的楼房，对面就是宋庆龄的住宅。每天清晨，一大群洁白的和平鸽在天空盘旋，那清脆的鸽哨声回荡，迎接着新的一天。

宋庆龄奶奶当时想些什么？

我不知道。但从她热衷的福利，慈善事业，从她喜爱的白鸽，可以想象，她多么希望神州大地和平幸福，风调雨顺。人民相互帮助，相互关怀。

也许就是这样的环境，加上父母的一贯教育，与人为善，平等，博爱。。。，早早地播进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所想象的整个世界，只有美丽，没有丑陋；只有善良，没有卑劣；只有诚实，没有欺骗；只有博爱，没有仇恨；。。。就象爸爸妈妈叮嘱的那样，就象老师教导的那样，就象童话故事传说的那样。

哦，又回到了天平路小学。

“你们的时光是最幸福的，好好珍惜吧！”和蔼的沈老师又一次叮嘱。再说几句，沈老师，我听着呢。

沈老师，您还记得当年那个年龄最小，成绩突出的“乖孩子”吗？那个尊师守纪，帮助别人的好学生吗？尽管时光过去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您和蔼的笑容，亲切的声音。

我曾经天真地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老师，都会象您一样亲切和蔼，关心学生。如果是那样，您会是这样的教师中平凡的一员。可对我来说，您是那样的珍贵，因为您是教育我的为数不多的真心爱护学生的老师呀。公平地说，以后的老师并不都那么坏。但是，以后的环境，已不容许他们不讲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对学生付出真心的爱了。

灯光开了，灯光关了，又打开了。爸爸妈妈坐在那儿，笑了，笑得那么欣慰。我们5个小家伙，正给爸爸妈妈表演自编的“乌克兰大白猪”。主角大沐钻在桌子下，正在呼哧呼哧打呼噜呢。

也许，此时此刻，室外寒风凛冽，一场腥风血雨正在孕育。也许，此时此刻，那些在阴暗角落里盘算的人正磨刀霍霍，伺机对毫无防范的人下手。也许，此时此刻。

爸爸妈妈的心底正打着寒颤，为将来如何保护这5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而发愁。

至少，此时此刻，在房间里，在灯光下，还有温暖的一角，还有人间真情。至少，此时此刻，我们还在这小小的乐园里生活，无忧无虑。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喇叭里响着少先队队歌，我和其它新队员第一次戴上了红领巾，第一次站进队列，第一次庄严地举起了右拳。“时刻准备着！”啊，我长大了。。。

长大了干什么呢？当飞行员，飞翔在祖国的蓝天。。。当水兵，巡航在祖国的大海。。。不，当老师，为祖国培养下一代。。。喔，我要当地质勘探队员，踏遍荒山野岭，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

梦，是甜的。只有梦，是甜的。

梦里，我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才智。我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才智，只能在梦里。

呵，金色的童年。虽然短暂，却是那么温馨，那么甜蜜，那么难以忘怀。

童年的世界，充满着纯洁，友情，善良，关怀。没有门第血统，没有权贵金钱，没有阿谀奉承，没有中伤陷害，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折磨摧残。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夏夜的萤火虫，会勾起我们无尽的联想。冬日的冰晶，会让我们流连忘返。一块小石头，会成为我们珍藏的宝物。一句夸奖的话，会使我们兴奋难眠。

镜头飞转，熟悉的场景一幕幕浮现，交迭，又离开。。。

慢一点儿，别跑得那么快。。。记忆的闸门才刚刚打开。。。让我再捕捉一点闪光的片段，让我再回味一下甜蜜的年代。。。

哦，再见吧。。。我金色的童年。。。

(小学四年级)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曾为知青

曾为知青。

所以，经历了一个前无古人所有后继者所承的特殊时代，经历了一个以其血肉模糊遍体疮痍的面目突兀凸现在历史长链中的一个特殊年代。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意识到，那个特殊年代留给我的痕迹，就像一位挚友所言，已犹如刻在皮肤上的纹身，鲜明、深刻而痛苦。

朋友和学生的眼中，常是一副落拓不羁，仙风道骨，都道是闲云野鹤，世外中人。一些日子里，更刻意自我放逐，在家中呼朋唤友夜夜笙歌，只说闲情风月，不言沧桑沉重，温言软语杯光舞影间，竟也以为自己曾有过多少幸福时光，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忽忽到了一日，与学生在中学实习，无意中翻到一个班的学生履历表，赫然发现，父母职业栏中，频频出现着同一个词：下岗，下岗，双双下岗。心中一下子惶惶乱乱，急急又翻回头，寻找着他们的年龄栏……没错！就是这个年龄！就是曾为知青的年龄！就是我的同一代人！！

即刻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学生不知所措，默然围之。

不能说……

又怎能向这些还是如花年华的年轻人说得明白？心底里，竟还会隐藏着那么多的泪水……

就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曾为知青的这一代人。

为了那些永远留在了过去留在了荒山野岭独江寒水边的孤坟，为了那些活在今天但已满眼风霜粗糙冷硬的面孔，还为了那一颗颗伤痕累累荆棘丛生激情不再温柔不再的心……

自己的心底，原也是一样的伤痕累累荆棘丛生。

从此，便只有沉重，只有夜夜的惊心，怕的是接到远方知青朋友的电话，说的是下岗失业家庭变故……

从此，便只有沉重，只有日日的惶惑，怕的是自己作为这一代人的幸运者，还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还不能做得更好，而让女儿和学生对他们的上一代有更多的信任和爱……

从此，便只有沉重，只有分分秒秒的追赶，怕的是自己还来不及将这一代人的历史，更详尽更真实地告诉女儿和学生……即便那一开口一下笔，句句蘸泪，字字泣血，就像在将生命一点一点地耗在里面……

我不后悔，我的活着，不再属于我自己。

因为，曾为知青。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岁月如歌

——歌集《青春咏叹——知青喜爱的歌》序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

那是条什么样的河啊，涌一腔青春热血，淌数行凄清冷泪，掀几度不驯浪涛，曲折跌宕轰轰訇訇。

那是些什么样的歌啊，抒满怀少年壮志，咏一代人生悲欢，荡几多胸中块垒，抑扬起伏展转回旋。

你今生趟不出那条岁月的河，你今世忘不了那些岁月的歌，因为你，是芸芸众生中的特殊的一群——知青。

远去了长河落日涛声帆影，沉舟纤道渔歌号子早已深没河底。烟雨迷离，光阴荏苒，岁月将那无数或柔弱、或狂躁、或清澈、或浑浊的小溪汇成了一条荡荡大河，那平静无言地承载着大船巨轮的水波下，隐隐不断地流淌着一首逝去岁月谱就的大歌。

哦，歌如岁月，岁月如歌。

我以为早已被遗忘了。

3000万知青的苦难较之几亿人在一个神圣意志驱使下虔诚地相互折磨血泪纵横的劫难而言，犹如旷野虫鸣渊底蛙声。作为“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随“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完结了性命。沾着文革的光，曾几何时，关于知青的话题均讳莫如深，知青自嘲“既不光荣也不耻辱”的历史。在“光荣属于80年代新一辈”的新长征中，知青们将返城后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与诸多堵心糟心恶心伤心连同委屈忧伤一股脑吞下懒得发泄，不只为了生存，也为了忘却。然而偶有闲暇小憩，逝去岁月的旋律时常会一个乐逗、一个动机或乐句，甚至整个乐段从自以为平复的心底泛起。惧而避之，复入忙碌。

真的忘了？

那是3000万“共和国新生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这一涵盖了中国城乡，触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友的历史，这一国家付出300亿元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歌，在游荡；心，在流浪。

80年代中，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有关知青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它猛地抓住了人们的心。那首主题曲和女中音含蓄而深沉的演唱，以惊人的准确塑造了知青人的音乐形象及其对岁月的嗟叹和对青春的怀念，揭示了知青狂热——迷惘——消沉——振作的心理变化和生活历程。曲尽歌毕，曾声称“从此眼中不淌水”的知青汉子，枯涩的眼眶重又注满青春的晶莹。强烈的撞击使胸中的堤防轰然坍塌，汹涌着岁月的河与歌……

回眸远眺，歌声从岁月深处传来——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我们走在大路上……”

在这洋溢着革命热情和青春活力的歌声中，回荡着祖国的招唤，高扬着理想和信念的旗帜，承载着父辈的企盼。青年垦荒队员的行列合着歌声的节拍，奔向边疆农村，去“占领山头，开发荒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社会主义新农民”，建场、办场、插场插队，为理想献身，以“唤醒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模样”的气魄去实践报效祖国的誓言。哦，那垦荒的野火，开山的炮声，真诚的汗水，丰收的金黄无不诉说着对祖国的忠诚。在这行列中，行进着《年轻一代》、《军队的女儿》、“共大”学员、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这100万人的知识青年先行者，是一代中国青年的青春偶像。他们的歌已深深印在他们的弟妹们——后继者的脑海内。

“最新指示下达后，马上就要别故乡，

告别亲爱的战友们，知青就要去远方。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锻炼成长。”

1968年12月22日，这一忘了生日也忘不了的日子。

中国城市“红海洋”闸门洞开，那涌出、泼出的人流就此一泄十年，几十倍于先他们而去的姐姐们的人数。那时谁会想到这流出的是新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啊！谁又敢质疑“文革”这一以现代形式装载野蛮、原始内容的运动将给这一代青年以什么样的摧残呢？

《革命知识青年之歌》、《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广阔天地炼红心》、语录歌伴他们远行。歌声依然纯真嘹亮，步态依旧意气风发，热情不输姐姐们。对别人描绘的乌托邦幻景他们深信不疑，他们满以为他们能象铲除“封、资、修”一样，将千年积淀的贫穷落后打个落花流水，满以为只要“经风雨见世面”，他们这些“豆芽

菜”就会长成大树并且参天。他们并没有留意带着浓厚的“文革”风格的歌声中透出的不祥的意味，没有去想此行将给一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更没想到他们的歌声与父兄们的歌声相比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什么。然而，他们的动机是无私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他们的笔记本上抄录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雷锋的名言和金训华“一生交给党安排”的誓言。尽管后期下乡的“新知青”已明白这一运动是怎么回事，但那早已溶于血液中的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仍是最本真、最原初的动机。同他们的父兄一样，这种感情以及由此而生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其真诚是不容怀疑的。

少小离家，他们藏起对家乡父母的思念，在花季昂扬高歌走向生活，以尚未长成的嫩弱躯体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迅疾，“大风大浪”、“急风暴雨”劈头盖脸不由分说狂野地打来。现实无情地嘲弄理想，冷漠坚决地销蚀热情，生存严肃地教训幻想，孤寂牢固地困顿浪漫，蒙昧愉快地煎熬灵魂，秽行恣意地凌辱纯真，野蛮粗暴地践踏尊严，幻灭残酷地砍杀心灵……

灾难过后是一片死寂的废墟，面对的是漫长深重的苦难。

总有人对知青的苦难说三道四喋喋不休，总与革命先烈和旧社会的劳动人民去比较，是一回事吗？

其实知青歌曲所表现和告诉人们的，并非生活的艰苦、身体的劳累，这对于已有思想准备的知青们年轻的躯体来说算不了什么，而那理想、信念、追求、精神、欲望的破碎和无所皈依，那被心如死水万念俱灰的幻灭感咬噬着的不甘幻灭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拒绝沉沦而又无法抗拒不得不沉沦，这难道还不是人之苦难的极致？何况这是少年到青年转折期心理生理成长、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遭受的重创，它将影响人的一生，这还不算漫长深重？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胸有块垒，以歌扬之。知青歌曲就是在岁月之河的大跌大宕大起大伏大悲大喜大波大澜的落差中产生的。

思念故乡和亲人是知青歌曲的第一主题。

被抛掷异乡颠沛流离倍尝人生艰辛滋味的人们，对故乡亲人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思念。天南地北的知青的这一心理惊人的一致。《南京知青之歌》、《武汉知青之歌》、《告别广州》、《山西知青》、《沈阳啊沈阳》、《望断蓉城》、《从地角到天边》、《梦回》、《遥远的地方》、《火车》……“望断X城/不见妈妈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梦魂何处归/空有泪涟涟/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园家乡……”泪浸思乡曲，亦歌亦泣。“回家”这一渺茫而又固执的念头几近成为人生的唯一要求。在这一主题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自伤、自残、自杀的血泪惨剧，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忍辱含垢有幸病返、残返、困返的知青的心灵和生活，从此坠入了一个难醒的恶梦。

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在知青生活及其歌曲中，是苦涩辛酸的。

那时的知青恋爱属被禁之列，受教育的少男少女们一下乡几乎都要接受类似训诫：“……知哥一下车农二哥就

说……第三不许谈恋爱，免得在农村走不脱。”客观上回城、就学、参加工作的政策规定前提之一就是未婚，这些青春男女的婚恋大多陷于欲爱不成，欲罢不能的境地：“知哥知妹心一条/可惜我们命不好/等到哪年能回城/那时再把朋友交……”，“不是我不爱你/实在是没法爱呀/我的小妹呀”。那个时代变态畸形的婚恋观将爱情与“黄色”绑在一起，以“阶级斗争”高涨的热情和乐此不疲的精力对知青的恋爱予以了特别的“关注”，由此引发了不少因批斗、示众、游街、捆绑吊打导致的精神失常、自尽等事件。即便是以婚知青，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困窘的生活苦不堪言，返城时又被迫离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大返城时，就因政策规定而造成3000对夫妻离异的惨剧，有多少人的心灵一辈子也走不出那片阴影。

精神的压抑和物质精神的极度贫乏，使知青对那“高、强、响”的文革歌曲、样板戏、语录歌产生了排斥情绪，叛逆者们一把扯去了“黄歌”的封条，率先解放了一大批中外歌曲。不仅如此，他们还超前地“享受”了港、澳、台的流行曲。此举各地知青又是惊人的一致。

“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正处于发育阶段的知青们的饭食确实淡寡量少，笔者探家时曾有过上不上桌不用菜一气五大碗的记录，令弟妹瞠目结舌父母泪水盈眶。于是知青们便常有精神会餐，一曲《成都小吃联唱》：“钟水饺赖汤圆龙眼包子担担面……”唱得口中清水滚滚，腹内饥声隆隆；还有“稀饭是铁，干饭是钢，稀饭没有干饭香！”等等。对于那个疯狂时代的荒唐、愚昧、丑恶，知青歌曲极尽嘲讽讥诮嬉笑怒骂，有诙谐调侃的《知哥下乡》；有反话正说的《幸福谣》；有嘲己喻世的《楼上情歌》、《知妹的丈夫》……，为唱这些“黄歌”、“反歌”而横遭厄运的人很多，知青中的游唱歌手、“借曲家”、词曲作者首当其冲，流传全国的《知青之歌》的作者、南京知青任毅就为此受了近10年的牢狱之苦。知青歌曲是对那个时代的反叛。

知青歌曲的传播之广之快，在当时政治压力很重，没有任何现代传媒手段为载体的情况下，确属奇迹。文革是一个文艺畸形繁荣的时代，任谁都能喊上两嗓子舞几下子摆弄点乐器，这是知青歌曲得以流传的基础。知青中的游唱歌手走村串寨的吟唱，使知青歌曲在一地域内广为传唱，跨地域的流传则是通过年节、探家返城时各地知青交流的结果。那时，无论哪个知青都可以从歌声起处找到自己的同类，不管在何处，认识与否，一把被称作“流氓琴”的吉他、被称作“粪瓢”的曼德琳或口琴、二胡、笛子等随便什么乐器伴奏，一人开口便有人凑过来随声附和，往往演变成一群人的合唱，直到涕泪横流泣不成声。同样的命运、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思考，就有了共同的音乐语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知青歌曲的广泛流传奇也不奇。

结束了。这场非理性的、荒诞的运动，在否定文革拨乱反正和主动激烈的行动中终于寿终正寝。

“大返城”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的狂潮，如同一个终止式前的不协和和弦，将这一历时十余年的运动坚决地“解决”了。带着心灵的废墟和一无所有的褴褛，知青们回到了曾令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城镇。然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城市却以陌生的面孔迎接着他们，全然没有记忆中的亲切与温馨，接纳他们的城市和

当初接纳他们的农村一样不情愿：一个因生存物质的极度匮乏，一个因人口和就业压力而不堪重负，只是原因不同而已。进入城市生活后，他们的行为性格、思想观念均与城市格格不入，城市生活的经验和技能几近为零，于是就有故乡异客的感觉，脑中又时常荡起那埋葬了他们青春歌哭的岁月，那喂养了他们多年五谷杂粮的山乡。这群心灵即不属于农村又不属于城市、自我矛盾内心孤寂的人们，老是误车、老是搭错车的人们。

“不要问我从那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流浪，为了我梦中的

——橄榄树。”

这首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返城知青中广为流传的《橄榄树》，所表达的情感与意境，简直就是他们心态的缩影与象征。故乡？他乡？否非否，非否非，否否非非，非非否否。返城不知情寄何方，那份苍凉仍在心中徜徉。

“流浪的人归来，青春已不再”。

时代由精神至上蓦地转为物质第一，自我否定得如此快捷。对于从灾难中走来的知青来说，仅仅是“青春不再”？不要说知识文化，就连从前的一切生存手段与经验都已完全不再适用。时空转换，新旧交替，观念更新，飞速的变革未令知青们惊诧，对于生存教育，哪个人都有若干本工分簿的毕业证书，对“脚踩菠萝头顶香蕉”、“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沙锅里”的神话早已有了刻骨的体会，劫难中跋涉而来的人们，已略知天之高远地之厚重。尤其是这场伟大的变革与他们心底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爱，发生了强烈的共振。面对这一充满机遇、挑战与选择的竞争时代，他们毅然站到了新的人生起跑线上，尽管这要比其他人群付出成倍的代价。……寻业求职、筑窝建家、哺小养老；同时撑开昔日装盛土豆山芋等生存“硬件”的挎包拼命塞入今日生存所必须的“软件”，与儿女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要调整思想观念、生存环境、人际关系……。行色匆匆、满脸疲惫，步履蹒跚，三步并作两步急切地透支生命。当困乏夜归，看霓虹闪闪，情侣双双，笙歌曼舞。偶遇一群花季少男少女手舞足蹈喧哗而过，不禁心生几分感慨和艳羡。好累，想躺下、想睡觉、想治病、想尽孝……总在此时，那逝去岁月的旋律便神使鬼差般地响起，那远山野水大漠孤月，那垦荒野火密林流萤，那青春歌哭热血冷泪，那闭塞贫瘠如今依然落后的土地上知友坟头的寒星荒草、被贫困煎熬的父老乡亲就在脑际流过。心底那支歌响起，人生就有了参照，自信和力量又注入了并不年轻的躯体。

这种神秘的感应，是不是乡恋情愫？

故乡，知青们从岁月深处唱到今天，心却在流浪，它是一种情感归属？一种心灵依附？抑或是一种图腾？

十年磨难，二十年思索与沉淀，足够了，在当代知青们的意识里，故乡已非原有的具体所指，已升华得更为深邃博大。“梦断魂牵的岁月，留在记忆里永不褪色”，无论是现代知青题材的音乐作品里，还是当如今的知青吟唱那些逝去岁月的歌，故乡的含义均有了全新的所指。“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知青们在赶上时代步伐，找到生活位置，建立自己的事业，参与城镇建设的同时，从80年代的知青聚会到90年代的知青返乡、救助那方土地的孩子、为受灾乡亲捐款、投资那里的建设……已远非简单的怀旧了。

啊，那“曾经深爱、无奈、流过泪、舍不得，曾经拥有、失去、艰难的选择，曾经失眠、兴奋、为你魂不守舍，曾经年轻、冲动、为你喝醉过”的永远无法割舍的黑色红色黄色褐色的哺育了我的过去现在我为之真诚奋斗的脚下厚重的960万平方公里的热土啊！寻寻觅觅，故乡从来在心中。

哦，岁月如歌。那些不堪回首而又难以忘怀的岁月里，现实的飓风将被称作花季的五彩斑斓统统席卷抢掠一空，留下的是赤裸裸的生命的原色。有生命，歌就生生不息。往事可能被尘封，可能会被喧嚣浮华淹没，可能被更多更新的信息挤出大脑皮层，唯歌如同身心的创痕一样无法抹去，甚至就是这些创痕本身。岁月的歌，溶入了知青们抛洒真诚的血汗与泪水的田野、山林、高原；溶入了印满他们青春足迹的雪原、雨林、戈壁、海岛；溶入了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深爱着的黄天厚土。

烙有“知青”印记人们的歌，有浓烈扑面慷慨激昂风华正茂的青春气息，有狂热灼人的理想追求和信仰崇拜，有被欺骗被抛弃的愤怒和悲凉，有被劳苦困顿孤寂苦闷囚禁的隐忍与倾诉，有对荒唐谬误的辛辣嘲讽与讥诮，有绝望之中的探索与抗争，有恶梦醒来后的奋进与重振，有对岁月的吟咏与反思……惟独没有矫情做作。尽管知青歌曲及其所伴随的知青生活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利他精神、献身精神，由于“文革”本身对人类、人类文化、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反动，而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层悲剧的色彩；尽管知青们的创作从专业音乐理论的角度看来，显得稚嫩而不和规则，有许多歌遗留着明显的模仿的痕迹，有的甚至是采用了“借曲”填词的方式。然而，这却是那蹉跎岁月的真实反映，是苦难心灵的真情流露，是年轻生命真诚宣叙咏叹的青春歌哭。一个“真”字了得，血泪淋漓，肃然，峭然。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知青河从远方流来，一路吟唱，挟历史风雨，裹人生峻酷，穿滚滚红尘，将岁月交响成一首深沉凝重的歌。岁月流，歌声流，青春峡口几回头。回望青春，几度梦返知青河。几番低吟知青歌。每次溯流都多几分思考与感悟，发热的脑袋归于冷静，迷惘的眼睛又复清晰，混沌的心泉即刻清澈凛冽。走过青春，“知识青年”不再年轻，没有了生猛浮躁的狂热，不见了天真烂漫的稚气，代之以超然的成熟、肃然的理性和几分沧桑。走着，平和宽容而又坚毅昂然。敞阔大胸怀，迎猎猎劲风，唱起来！我的知哥知妹们，岁月不断歌不断。

知青岁月，是知青们荡涤灵魂、警醒人生的河。知青歌曲，是3000万活着和死去的知青们灵魂中的永恒。生活已将岁月、歌声连同知青的名字一同熔炼锻造在一起，直至地老天荒。

哦，歌如岁月，岁月如歌。

1997年4月22日昆明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北大荒教我学会了扛住

疏桐

去北大荒之前，肩上没扛过重物，顶多挑担水，洒一半；军训抗过枪，没多会龇牙咧嘴扔了。用儿时伙伴的评价：娇滴滴，像公主。多年后，伙伴无意中见我在马路上蹬着三轮车带老爸参加他们老同学合唱团的活动，嘴张大，又听说我一人折腾搬家啥的，觉不可思议：就你？居然……有啥好居然的，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吗。嘿嘿。

因得肝炎提前返京，在北大荒呆不到四年，与同去荒友相比少吃许多苦，可就这一点苦，也让我难忘受益至今，那就是学会了扛住。

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在铁路边扛东西（麻袋？想不起来了。疑似早老性痴呆），还要上跳板。怵死了。天生平衡感差，上学时屡屡从平衡木上掉下来挨体育老师呲儿。这可不是体育课，是练红心，有胆上，没胆假装有胆也得上。深吸气，紧猫腰，战战兢兢上了跳板。好在跳板不算长不算窄，撑得住。谁想这当口一火车开过来，其实跳板没紧挨着铁道，万一掉下来也不会碰到火车，还是怕死了，天生胆小。觉得轰隆轰隆的巨响正铺天盖地冲我压过来越逼越近，身子一歪肯定葬身车轮。没退路，只好僵在原地不动，死死盯着脚下，心里默念（出没出声忘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拼命集中注意力以保持身体平衡。那节骨眼只要能壮胆念啥都行，毛语最熟，张口就来，别说真管用，恐惧感被排除了。这叫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待火车过去，腿一软，差点趴下。

还一次是在三线。白雪皑皑的山下横七竖八堆着好多被我们伐倒拉下的木头。得把它们一根根摆整齐码起来。细点的木头，俩人一扛就走。费劲的是粗约半米多、长约六七米（？）的大木头，得十几个人分两排对付它。大多数人左肩不如右肩，那就轮着来。几天下来，左右肩都好使了。特自豪。虽然肩膀肿得像馒头，奇怪不觉得疼，木了大概。难的是上坡。走平路凑合，一二、一二……在铿锵有力的吆喝声中，大家伙儿动作整齐划一得像机器人。实在顶不住喊一嗓子，领头大喝一声“放”！集体摆挑。要命的是上坡。当你行至最高点时，原本平均落在每个人身上的重量突然泰山压顶般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一刻感觉自己快被压扁了，腿都短了，容不得想啥，玩命撑住身体，将全部意念集中在双腿，决不能让它们打弯。好，撑过去了。后来想想，那感觉有点像举重运动员举起杠铃瞬间。不同的是，运动员不堪重负可以摆挑子，我们不行，泰山压顶也不能弯腰，一弯大家伙儿全得栽，都得受伤。好在就几步路，长了不敢想。超极限光凭意志力不行吧。亏得那会儿年轻，体力尚可。不过腰也由此落下毛病，至今不爽。我们这拨人好多腰都不好，正长身体呢哪经这么压。而今体力差多了，意志力还凑合。全仗北大荒那点儿

经历儿垫底，否则娇滴滴一辈子。

还有是“扛”困。那会儿上三班，车间特安静。好多师傅睡觉，我们不敢。得撑住眼皮，不让它掉下来。赶上和张新一、安晓华这些爱唱歌的上一个班最好，一唱就不困了。好像是安晓华起的头吧，她胆大。唱什么忘了（破脑子）。反正一支接一支，师傅可爱听了，把他们都唱醒了，就都不困了，就都起来干活了。这叫唱青歌（青春的歌曲），促生产。张新一嗓音醇厚主唱，我和安晓华小细嗓溜边，合起来挺好听。刘崇慧要在也加进来，形成女声小合唱。唱着唱着，天就亮了。赶上她们不跟我同班，一人不敢放声，小声哼哼唧唧不解困，就死死盯着天窗盼亮。冬天难熬，夏天亮得早，三点就蒙蒙泛白，直到金灿灿的阳光射进车间，人一下就精神了。

还有扑荒火跑不动恨不得一屁股坐地上、腰扭伤疼得睡不着第二天咬牙爬起来一天没歇、上夜班发烧躺在车间阁楼上瑟瑟发抖、好久收不到爸爸的信后来得知他被关了牛棚日日不安……都一一扛过来了。

那个年代，岂止我一人在扛，每人身上都压着不同分量的担子，比我重的多得是。大家除了独自承受属于自己的那份儿外，还要与伙伴们共同承受，比如扛木头，当然有个前提，先得自己腰板挺直喽，加上众人合力才能扛得动。也就是说，自己先要站直了，别人才能帮你。这也是后来我生活中遵循的信条。

再比如扛危险，说到这儿，必须说说我的救命恩人：段敏实。不是他，没准我早光荣了。还是在三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伐倒的木头拉下山。怎么拉呢，把绳子拴在木头顶端，俩人一边拽一根往山下跑。开始觉得挺好玩，滑雪似的，长长的冰道被木头压得光洁如镜，飞驰而下的木头在我们连蹦带跳的舞姿中如脱缰野马般往山下冲。山下必须有专人看着，以防被疾驰而下的木头砸到。有一次，好像是温国华吧，正好站在下面，幸亏被旁人发现喊其快躲开才化险为夷。我是怎么回事呢。小脑不发达。那天有点累，正立在半山腰发呆，忽然有人从身后狠狠推了我一把，差点一屁股蹲坐地上，之后就听嗖地一声，一匹“脱缰野马”从我身旁踏雪而去。半天回过神：方知我发呆那会儿，一匹“脱缰马”正以生死时速朝我飞来，拉木头的人脱手了，我全然不知。幸好段敏实手疾眼快，一把将我推开，否则不死也得残。

说来惭愧，人家救了我命非但没报答，还“恩将仇报”。把人家两口子全传染上了肝炎。先是人家女朋友王殷送我回北京时被传染，继而她又传染给他。罪过啊罪过。后来住院期间，段敏实老来看我，被大夫怀疑是我男友，警告说生病期间最好不交男友，管得真宽，不过也真负责。现在少有这样的医生。为证明清白，赶紧让小两口一起来看我，还把那个大夫叫来仔细过了一下目。再后来，段敏实帮我搬家，从五楼往下扛特重的东西。他那会儿肝炎也没好利落啊。还帮我们家做了好多事，我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他们。想想那些年，这俩口子真没少帮我扛。可我为人家扛过什么，没有。这就是做人的差距。以人为镜，我想今后自己也要为他人扛点什么。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互相扛一扛，生活能轻松些。

回望走过的路，悉数深浅不一的脚印，感到一种富足。虽然在北大荒呆时间不长，但收获了力量收获了友谊收获了坚强。带着它们，我风雨兼程，继续上路，扛住了疾病，扛住了挫折，扛住了艰辛，扛住了孤独……其实负重未必是坏事。不是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嘛，能承重，生命方能贴近大地，脚下方有根基。

而今步入深秋，肩头还压着沉甸甸的担子要继续扛下去，我不怕，有从北大荒带回来的须臾不离身的宝物：坚强。它让我站直了不趴下；有曾经患难与共的荒友与我同行，他们让我心充满温暖光明，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漫漫苦旅踽踽独行；有家中温暖的期盼等我回去共度温馨时光，他们是我生命的天空。有了这些，相信自己能一直扛下去，为自己，也为别人。直到融入云淡风清天人合一的那天。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读一剑君文有感

读了一剑君《梅家婆婆的猪》一文，想起了我当知青下放在山区的日子。

我是下在鄂西北的山区，每每到快收苞谷的季节队里都要派人上山守夜的，怕辛苦了一年的果实被那些不劳而获的生灵偷吃了。这其中最讨厌的就是野猪了，好糟践庄稼的，一晚上可以把你的半个坡扫荡成平地。

又是收苞谷的时候了，刚刚成熟的苞谷就被一些小偷小摸的野猪来尝鲜了。不时听见村上的人说哪里哪里来了一群野猪，一晚上把好好的苞谷地拱了一大片。是呀，看着就要到手的粮食被野猪糟蹋了，哪个种田人不心疼！特别是在大山区，一年到头下来连饭都吃不饱，就指望这土里刨食呢，哪有那多的剩余来喂野物？就这样，上上下下几个村的猎人都联合起来，准备打一场围猎，消灭害人的东西。

先说这山里人一到苞谷灌浆后就要派人上山守夜打更了。一般年轻人是不会去守夜的，只派一些半老头或是鳏夫，天一擦黑人就要到岗。山上守夜好清苦，一个小窝棚高高的架在山梁上，在窝棚半腰搭个架子，铺上一些从山下带来的稻草，就算是个床了。人睡在半空中下面烧起一堆柴火，用以吓唬野兽和驱寒。遇到风吹草动的就冒起来打锣，这锣一敲邻近山头的守夜人也会应和，满山的锣敲起来吓得哪些偷嘴的家伙狼狈而逃。

有一天，我们已睡下了。房东的女人来拍门说：“知识青年大学生，你们快来帮忙哟。今晚可能会打到野猪的，你们帮忙烧点开水好烫猪毛呀！杀肉给你们吃耶！”

一听有野猪肉吃我们连忙爬起来，烧火的烧火，添水的添水忙的不亦乐乎。呵呵，有野猪肉吃，啊！好久没吃到荤了！野猪肉莫味道？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知道莫味道，笑了起来。灶里的柴火架的好多，火苗往外只飘的，舔着锅沿，好像也想偷吃点野猪肉。火光照得人的脸上红红的，烤在身上暖暖的。两眼望着火光也开始迷迷瞪瞪的了。火焰跳着舞，开水冒着热气，温馨的守在灶口。我们等着等着，歪头搭脑的打起了瞌睡。

忽然，房东女人冲到屋里大声的喊着：“快点快点，送信的来了说是哦打着了打着了，呵呵……。”一路跑回去烧她的水去了。她的笑声强烈地感染了我们，来劲了！往灶里添把柴，在往锅里加几瓢水，一窝蜂地跑到院子门口候着，翘首盼着。

房东女人告诉我们，打野猪呀，谁要是开了头一枪并且打中了，谁就可以分到猪头和猪下水，其余的平均分配。这关键的头一枪最重要，如果打的不在要害野猪就会发疯地朝那个人的方向冲过去，那才不得了呢。我们村的有个人就是在一次围猎中被野猪撂倒，差点连人都搞死了，幸亏大伙帮忙快捡回了一条命。现在脸上身上还留着难看的伤疤。所以，打准第一枪的猎人是要得奖的。听说是我们当家打的头枪！女人骄傲地说着。

哦嗨！哦嗨！哦嗨哟！！！！！！！！

一阵号子，打破了寂静的山野，一阵欢呼的人马抬着一个黑家伙，呼呼，呼呼地颠进了院子。一大伙人头上冒着热汗，不停地扇着衣服，高声地诉说着打野猪的经过。那种兴奋，那种欢快比过年喝苞谷酒还快活！

我走上前去，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黑家伙。好丑呀！一个长长的嘴巴突兀在前，两颗獠牙像两把匕首骄傲地挂在嘴边，好凶呀！一身都是臭哄哄的，黑黑的毛好长，浑身上下都是泥沙，裹得像盔甲。难怪这种土铳不好打准的。这次幸亏是用的独铳，要是用散铳就见鬼了。这是只雄性的猪，猎人说是个打头的，凶的不得了。几次围猎都把它跑了。这次不是狗子多，撵得这伙家伙飞跑，跑到了埋伏的地方，又算是白搞了。我看着躺在地上的野猪，好大的架子，长的很瘦，可能是没有吃饱。它要是蹦起来了，该有几吓人？它活着的时候该有多威风！就是因为糟践了庄稼，抢了人的口粮才成了我们尝鲜的对象。

大的腰子盆倒满了开水，把野货抬上架子去，一个人在猪屁股后面拿个吹火筒使劲地吹，慢慢的，野猪变胖了，也显得可爱些了。把滚烫的开水浇上去，熟练的杀猪匠快速地褪着毛。我们与贫下中农们快乐地笑着，等着品尝野猪肉呢。

房东的女人提着下好的肉回灶间去煮肉了。

山间的夜晚，启明星已经升起了，有几家的屋顶上冒着袅袅炊烟，飘着少有的肉香。

房东女人给我们盛了一大碗肉，我们也急猴猴地端着碗吃起来。一会就风卷残云了。

抬起头，互相一对视，问？好吃吗？哈哈，不好吃！怎么象母猪肉呀！

这是我真实的故事。不信？可以问问上山的老知青。

2001. 11. 2.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历史会记住他们……，……

《序》

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朱子云：“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无礼不成中国，无祭便无华夏”。千年风云，捍卫中国的不仅是勇士的刀剑，慎终追远的信仰坚守更奠定了华夏历尽风雨日益深厚的文明。

祭必华夏，华夏必祭。这是贯穿中国文明历史的最重大的礼仪。

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明年——2008年将是新中国历史上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纪念年，作为一名老三届人，蓦然回首居然夜不能寐！含泪写下这篇作文，与知青兄弟姐妹们共同纪念这个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西部老土敬上

老三届人

——上山下乡四十年祭

四十年前的初冬，当第一缕阳光照耀着大地，那些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少年们在政治风雨中徘徊、张望……。

神州上空一声巨雷：“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震动了万万千千的同学们前赴后继地离家远行。他们唱起“共青团员之歌”，打起了背包，迎着晨风、迎着朝阳走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纯洁的冲动，崇高的理想，神秘的好奇，无知的彷徨。他们在思维的交织与碰撞中跃动，他们在青春的美丽与浮躁中起舞，他们在生命的起跑线上点燃了并不靓丽的火花！这就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六届学生——数百万老三届人的上山下乡运动。

老三届人是中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主体力量，世界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大数量的学生在短短的时间里奔赴农村、兵团和农场，那是载在史无前例之上的又一个史无前例！这场运动让“知青”的名称牵动了中国的千家万户。

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几百年便有天才诞生，几百年也有伟人出世，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在民不聊生的时候揭竿而起，握锄头的双手挥舞着大刀长矛驰骋疆场，把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伟大领袖作了精辟地总结：“农村包围

城市”，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老三届人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可能就是伟大领袖革命思想实践的延续？！也要以农村包围城市来取得斗私批修的最后“胜利”？！潜移默化、高深莫测、声东击西、还是故弄玄虚？这一切，都在日后的政治动荡中失去了答案。

答案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可是老三届人的青春留在了农村。花样的年华，黄金般的时光，留在了祖国的广阔大地上！

中国现代革命史自辛亥革命起，历经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青年们热血沸腾，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日后只要提起“三八式”、“解放式”、“援朝式”都算是革命功臣。

而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用花样的年华付出生命的时光，在祖国贫瘠的辽阔领土上战天斗地。只获得了“知识青年”的光荣称谓，可是“知识”二字老三届人愧不敢当！

没有硝烟的弥漫，没有枪炮的隆隆，更没有血肉的厮杀。只有辛勤的劳动，只有艰难的生活，更有随风逝去的年华！这一代人献出的不是生命，而是与共和国同在的青春！

没有赞美，没有鲜花，也没有封赏。他们使用在农村锻炼出来的“钢筋铁骨”倔强地走在了人生的大道上！

没有了青春，没有了文化，甚至没有了健康。他们使用在农村锻炼出来的“钢筋铁骨”顽强地融入了已经陌生的城市和社会。

就凭这“钢筋铁骨”，他们倔强地与命运抗争！就凭这“钢筋铁骨”，他们顽强地与生存拼搏！他们为生活而低头折腰，他们为工作而任怨任劳，可是他们却说：“无怨也无悔”！

他们不是革命功臣，更没有经历过中国现代革命史。可是他们相信：就凭这钢筋铁骨，如果历史能够倒退，无论在辛亥还是在井岗，无论是抗战还是解放，他们都不会输给那个时代的青年，一定会并肩而辉煌！

老三届人与共和国同龄，从小便会唱那激昂的“国际歌”，通过艰苦的锻炼使他们明白了世上从来都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于是乎，从此面对的一切都默默地承受，不给已经极度困难的祖国再添负担。

日月乾坤、斗转星移、历史可以用风掣电驰来形容。他们没有辉煌，只有那与命运共鸣的“拉兹之歌”陪伴着老三届人的心——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已经平平淡淡地渡过了大部分的生命，这平平淡淡的大部分生命却经历了不平凡的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

他们中间的少部分人已经失去了平平淡淡的生命或者正在失去生命，老三届人的生涯让他们饱受煎熬和痛苦！牺牲在农村者有！早逝在厂矿者有！贫困在城市者有！痛苦在病榻者有！

一付沧桑的面孔，一尊疲惫的身躯，一双深沉的眼睛，一对勤劳的双手，一颗聪明又愚昧的良心！四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他们从风华正茂的少年走到今天，化成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人生而面临着风烛残年，四十年来，他们只有默默地无奈的付出和奉献，从未向国家伸手和开口。这就是他们——老三届人。

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老三届人不会忘记1977年的春雨，查全性老师不顾个人安危，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言，要求恢复高考！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当场拍板！总算给老三届知青们开辟了一条求知之路！这次恢复高考的历史性举措，让一部分老三届人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谢谢查老师！谢谢小平同志！

可是，大部分的老三届人没有能够改变命运。也许，共和国有太多太多的大事情需要面对了，逐渐地遗忘了他们。

疾风骤雨般的“文革”愚弄着他(她)们，让心未开的少年和幼年冲锋陷阵，他们付出了人生最大的代价——与荒唐的“文革”联系在一起；上山下乡的运动驱使着他们，让未就学业的少年离开了校门，他们付出了人生最贵的代价——金子一样的学习时光；祖国建设的热潮融入了他们，他们奉献了人生最高的代价——身体与青春；下岗分流的政策影响了他们，他们又奉献了人生最后的代价——工作岗位！今天，他们依然默默无闻地生活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为祖国的和谐稳定起着潜在的作用！

看起来很悲惨，听起来很伤心。可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些人生的重负而倒下！祖国的各行各业都曾闪耀着老三届人的身影，祖国的各个大学中都曾有老三届人的学生，他们无论日后融进了社会的那个阶层，都在不屈不挠地向命运抗争！

四十年过去了，区区的弹指一挥怎能够诉说他们的人生？！但是，人生的四十年的却在弹指的一挥间完成！历史也许永远不会记录下老三届人的一笔，可是，老三届人的经历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每个人都很渺小，渺小到被人遗忘！可是不要忘记，老三届人流逝的青春同样是共和国的青春，老三届人付出的代价也是祖国永远的痛！

他们用整整一代人的牺牲书写了没有硝烟的战斗，他们用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换来了没有结局的人生！可是，他们还在呐喊着：无怨与无悔！祖国，您听见了吗？您听见了吗！！

他们不是阿Q！他们也不是英雄！老三届人的经历和见识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父兄，无怨与无悔，是他们高尚的情操，无怨与无悔是他们在笑对人生！

其实，有怨也有悔，是不争的事实！蹉跎岁月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有怨有悔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仇视社会，更不是轻蔑生命，而是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这一代——老三届人的历史为何如此写成？！

其实，无怨与无悔，同样是不争的事实，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无怨与无悔不是弱智，也不是自嘲，更不是附庸，而是更加坚强地面对！我们的人生已经如此，那么，我们就要生活在健康和快乐之中！

上山下乡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也给他们留下了理不尽的恋情！谁教育谁的问题已经不复重要，老三届人从未忘记过那养育过他们的乡村和乡亲，也从未忘记过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列宁说过：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正因为他们融入过社会的底层，体验过那中国最贫穷的生活，所以，老三届人从来也没有背叛过崇高的理想和人性！

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说：“我爱国，可是，国爱我吗？”。您可知道老三届人的回答吗？也许这种答案会被人耻笑。但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我爱国，但是不会去问国爱我吗？即使是被淡淡地遗忘，我也仍然深深地

热爱着我的祖国！”。

正直、善良、勤劳、执著、侠肝义胆、勇于奉献、大公无私、乐于助人、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小恶而为之！
这些中华民族应有的品格在老三届人身上大放异彩。这就是顶天立地的老三届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英才后生辈出不穷！老三届人渐渐地驶出了社会的眼线，有人把他们的人生和品格精辟地总结成了一个字，那就是“傻”！

这个“傻”字总结的好！总结的太有才了！老三届人的“傻”，傻得可爱！傻得可圈可点！傻得不可想象！当年傻乎乎地跟着领袖闹“大革命”，后来傻乎乎地辍学去上山下乡，再后来傻乎乎的任劳任怨地与命运抗争，再再后来傻乎乎地下岗为后生的就业做出贡献，再再再后来……。这个“傻”会陪伴他们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中国儒家、道教与佛学的最高境界无外乎就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了。仔细想想老三届人的“傻”难道不是这最高的思想境界吗？！

中国现代最伟大的领袖教导说：为人民服务！仔细想想老三届人的“傻”不正是这句名言的具体实践吗？！

他们用毕生的“傻”，创造了小人物传奇的一代，他们用睿智的“傻”举起了老三届的人生！

社会渐渐地忘记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社会，艰苦奋斗、任劳任怨、与人为善的优秀品格在酸甜苦辣的人生中维持着和谐与稳定，永不言输、百折不挠的品质在坎坷的人生中仍然奋斗着现在与未来！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四十年过去了，“知青”们大都已年近花甲，活泼的少年行将变成横秋的老人。再过几年，当他们向后代人说起：“我们是知青”，孙子孙女们都会听不懂！

人类在进步，祖国在发展，社会在文明，“知青”的名称已经被逐渐遗忘，老三届人的历史记载也会不复存在，这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因为，他们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在印证着老三届人大写的“人”字！都在书写着老三届人留下的“心”声！

起立！

为老三届人鼓掌！

为老三届人起舞！

为老三届人放歌！

敬礼！

以人类的名义

向老三届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以同类的名义

祝老三届人安康幸福万事如意！

我的好朋友、当然是生死之交的好友了，当年、他也是他们青年点的点长，我们是同学、一起下乡、一起回城。所不同的就是：他们青年点是我们公社的落后典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能也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所致。因为在这个山沟里唯一的乐趣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所以22名知青最后组成了11个特殊的家庭，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青年点坐落在安民公社最东边的山沟里，也是辽宁省的最边上，翻过山头那边就是吉林省的梨树。在两座山的下面狭长沟里、一百多年前几户山东逃荒的人定居在这里，当然是清政府的腐败没落，已经没有能力去经管这个慈禧太后的狩猎场了，所以逃荒的人才选择了这里。他们又招来了亲戚朋友，朋友又招来了朋友，人家一点一点的多了，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自然村。在这里没有地主，更没有恶霸，人们都在耕耘着自己辛辛苦苦开出来的，贫瘠的山坡地。

解放了、合作化以后日子反倒一天不如一天。知青上山下乡又给这个村子带来了不小的轰动，小小的村子一下子分来22名知青，这还了得。知青个个生龙活虎的，女青年是花枝招展，男青年是细腿裤子三紧夹克，让这个山沟里的年轻人是大开了眼界，原来这衣服还有这么多新鲜样。

原本就不多的地，劳动力已经过剩，现在又来了22个壮劳力，不知是高兴还是忧虑，不过都得摆出个样啊，杀猪宰羊先招待一番再说。

我要说的就是这22名知青，来到这山沟里没新鲜两天就够了。且不说没水没电，一到晚上真的是难熬啊，除了狗叫什么动静都没有，那是绝对单纯的生活，那才叫艰难的熬岁月。第一年还行、国家拨给每个知青80元生活费，管你干不干活都有饭吃，生产队给派的炊事员、一天三顿饭一吨不差。可到了第二年就了不得了，分值年终结算10分工两毛钱，不用说青年，就是当地的壮劳力都欠队里的，国家给的生活费没了，炊事员队里也撤了，大家开始轮番做饭。可后来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做什么？那年月老天也欺负人，天天零下40来度天气特别的冷啊，吃的喝的没了、柴火没了，这日子怎么过啊！大家都在面临着生存的严峻考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的好友、就是这个青年点的点长、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开会的中心议题就是：今后大家怎么活法。大家的意见很快形成了统一：谁也不能离开青年点，不但要活还要活的有意思，要用自身的力量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刚好青年点22名同学，11名男生11名女生，不是狼多肉少，而是正合适，房间也是11间真是老天做美，就象是谁特意安排的一样。当时的青年点是中间一间是厨房、两边分别是五间，在老乡的帮助下，这回都

把它间壁上了前边开个门，变成了11个单间，同学自愿组合两个人一对，这就形成了11个特殊的家庭。这些大男大女们、原始的本能和对爱的追求同时得到了满足。房间小了取暖也好解决了，上下工的道上拣点柴火就能把炕烧热，和同学要好的老乡想帮谁也好帮了，吃的喝的都好解决了，另外两个人睡在一个被窝里自然就能互相温暖了。新的小家组成以后。大家的干劲也上来了，纷纷回沈阳购置了生活必需品，这11个小家当然的又是一番互相吃请燎锅底，酒过之后当然的又是一番狂侃，从此笑声歌声又重新回到了青年点。据说村子里的小孩，想要气球了就到青年点的后窗外拣，天天有。

大家一定想知道、这些同学以后怎么样了？72年我的好友和我一起回的沈阳，首先他和他的女友就断了，他回沈阳不久他的女友也离开了西丰到朝阳投奔了亲属，其他同学也随着不断的抽调而陆续的分手。

这11对同学最后只有三对维持到了最后，现在还生活在一起。

我写到这、心里不由然的有些伤感，今天我把这件尘封了近40的、发生在当年知青身上的特例讲给大家，我丝毫没有诋毁我患难与共的同学的意思。我要讲的是：不是我的同学无情而是命运无情，是历史无情，是命运捉弄了他们。可以说当年他们睡在一个被窝里、完全是为了活下去、是生活的需要，是最原始的生理本能的需要，实在是别无选择。面对零下四〇多度冰冷的世界，没有粮食、没有蔬菜，夜幕降临除了狗叫没有一点声响，更没有一丁点的文化生活，简直能把人逼疯。记得在我们青年点，我一个人弹吉他，就能把大家弹的泪流满面，那情节真是终生难忘。

一晃40来年过去了，今天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同学聚会时大家依然有说有笑，当年睡在一个被窝里的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而有的依然是对当年那一段真情的深切怀念，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依然是难忘啊。

我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让我得到了一位贤慧的老伴，上山下乡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劳动。然而如果还有上山下乡的话，我是绝不会让我的孩子去的，我会为她承担一切，哪怕拼上我的老命！

2008.1.1日 业务员

——写在兵团战友殒命四十年

(一)

我在Google地球上遨游，鼠标箭头常常在遥远的新疆——这片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上移动。在东经82° 35'20"、北纬44° 48'18"交汇处，我终于发现这里就是埋葬你的墓地。啊，绝对没有错！墓地是一片黄土高包，坡下有一股泉水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形成一池碧水，叫莫合泉。再往北是兵团农场的场部，地名叫塔格特。

点击鼠标，这块呈梯形状的土地渐渐放大并清晰了，甚至可以看出那一座座坟茔。战友啊，墓地里哪一座坟下埋葬着你年轻的冤魂？

整整四十年了。1968年8月15日，你在大革文化命的狂热年代，在上百人疯狂的喧嚣声中，瘦弱的身体不堪承受十几个人一整天的逼供折磨和棍棒拳脚，终于倒下了。那一年你只有十九岁，告别海河之畔的故乡和父母，一腔热血投入屯垦戍边，还不到三周年。

往事不堪回首。

记得是1968年8月13日的傍晚，在脱土坯工地上，你趁看管人员不注意悄悄走到我跟前，暮色中看不清你黑瘦脸庞的表情，听声音却是那样绝望：“我实在受不了了，没法活了……。”每天强迫超体力的劳动和无休止的毒打、折磨，使你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我只能无助地劝你，再忍一忍，再忍一忍……。8月14日天不亮，我们被看管人员从关押“专政对象”的土牢里押到工地上，十几个人各自在脱土坯的场地开始一天的苦役。天蒙蒙亮，有人喊，“孙卫国跑了！”俄顷，连队集合的钟声大作，各路人马对你展开了抓捕。是不认识路，还是无法忍受饥饿？这一天，你没能穿越戈壁滩逃离虎口。有迹象表明你曾躲进瓜地以哈密瓜充饥，也曾在夜间返回连队，钻进一户人家的灶房偷吃了一点剩面条。失策啊，你没能坚定逃离的决心，终于铸成丧命大错。

1968年8月15日，你逃离的第二天上午，被连队一个骑马的追捕人员抓回。我正在脱土坯，连队里突然又响起了当！当！当！令人心悸的敲钟声。我在远处工地上看不见你，只听见顿时人声鼎沸，叫骂声斥责声喊打声夹杂着砰砰的打人声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看管人员对我们说：“孙卫国给抓回来了，怎么样，能逃出无产阶级的魔掌？”随后，你被拉进连队办公室，遭到新一轮小范围的审讯、逼供、体罚和毒打。三年后举办的“打死孙卫国专案学习班”调查证明，那个文革中突击提为副连长的坏头头自始至终主持了对你的毒打和审讯逼供；那个后来从排长提为团场政法助理员的坏头头曾抡圆胳膊猛击你脾脏、肝脏部位，顿时你被打得跌倒在地，脸色骤变；两名我们

的同乡知青和另两名上海知青也大打出手，成为那天耀眼的打人“明星”……。

下午四、五点钟，你已经奄奄一息，凶手们也打累了，你又被押送到脱土坯工地强迫劳动。当你东摇西晃、踉踉跄跄地走近时，我不敢相认，一夜间你竟然变了一个人：面色灰黑，眼窝凹陷，双目失神，嘴角淌血，身体佝偻，破衣烂衫，神情恍惚，语不成句。此时，看管人员——那个打人手段凶残到令人发指的何姓上海知青，由于你的逃跑使他受到连队领导的责备，于是开始了对你又一次的折磨：令你手拿铁锹挖泥打土坯，你双手已无力握锹了，随后以铁锹打你身体，又用木棍打你头部，你站立不住时让你跪下，跪不稳又一脚把你踢到渠道里……。新疆8月中旬的天气，立秋刚过，早晚已有凉意。流动的渠水温度更低，汨汨流过的渠水淹没了你被暴打后的身体，加快了你的迈向天国的步履。何姓上海知青让我把你从渠道里拉出来，你躺在地上断断续续地说冷，我把我的棉衣盖在你身上。你躺着悄然睡了，在准噶尔盆地西部边缘的阿拉山下、艾比湖畔浩瀚的戈壁滩上，从此长眠不醒……。

西部天山的乌云渐渐压过来，那天晚上天阴沉得厉害。夜色中，秋雨急促地洒向久旱的戈壁荒滩。

苍天有情，为你哭泣！庶民何罪，遭此荼毒？

那一天是1968年8月15日。

（二）

记不清你是几月的生日，知道你1949年生人，和我同岁。1965年你初中毕业于市第一中学，这是全市最好的一所中学。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大旗高举，“血统论”肆虐。你父亲解放前为谋生而在国民党军队里一段短暂的经历决定了不管你学习成绩如何优异，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摆在你面前促使你“革命化”的“光明大道”只有一条——上山下乡。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在兵团农场连队住同一个地窝子，是战友，后来又是难友。

你个子不高，身体偏瘦，肤色黝黑，显得两只眼睛很大。绘画和书法是你的特长且十分优秀，据说少年的你，绘画作品曾参加全国少年画展并曾在日本展览。这一特长使你很快在农场有了用武之地。刚到农场的第一年，“社教运动”中你被派到场部画“忆苦思甜”家史，然后到各连队巡回展览；在场部开荒造田的大会战指挥部编写刻印小报；出黑板报、墙报、画幻灯片……。我很佩服你的天分，感觉你在美术、书法方面的造诣远远超过当时你十六、七岁的年龄。特别是你的毛笔字自成一体，舒放自然，你画的“忆苦思甜”家史堪称高水平的彩色连环画！绘画特长使你很快在全场出名，使你一到农场就脱离了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我们那时都很羡慕你，感觉你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将来一定是坐机关科室的材料。“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谁能料到，文革运动铺天盖地来临后，绘画竟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你亲手设计并绘制的场部和连队“红旗台”——那种兵团农场画在墙上的大型“五好”评比阵地，图案虽然已经过领导审查同意，但是当文革运动刮起怀疑一切的极“左”风潮时，你画的一个“红旗台”被诬为“颜色像

国民党旗”，另一个竟被诬为“刺刀对准伟大领袖×××”。“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这样诞生了！你不但画“黑画”，还写“黑诗”！然而，从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直至你离开人间，没有任何人拿出任何证据来证实你的“罪行”，你的“反革命行为”始终停留在群众口头流传的状态！三年以后为你举办的“打死孙卫国专案学习班”查明，“颜色像国民党旗”是指你绘制红旗台时使用了蓝、白、红三种颜色；“刺刀对准伟大领袖”是红旗台的左上角画有领袖头像，右下角则画有象征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两个战斗队”作用的图案，两部分图案各自独立，没有关系。至于写“黑诗”则是指你曾把李白的“静夜思”和孟郊的“游子吟”两首唐诗用毛笔抄录于绘画夹上，竟成了你作的“黑诗”！你想，“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女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画黑画、写黑诗”，你还能摆脱“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吗！捕风捉影，笔墨冤狱，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你在劫难逃啊！

兵团的边疆农场虽远在天涯海角，但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如激流，似狂飙，在农场连队也同样掀起了动荡和骚乱。刚刚离开城市离开学校十六、七岁的我们，既满怀政治激情又头脑简单幼稚，众多的青年被裹挟进无休止的派性争斗。你虽然不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在辩论中语言尖刻，讥讽的言词多次刺激了不同观点的另一派。人们对你印象深刻的是你有模仿他人语言的特长，嘲笑对立派时方言、声调、动作形神兼俱，惟妙惟肖，这无疑触怒了对立派，深深埋下了祸根。自恃清高无疑是一些青年学生特别是你的弱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对立派的坏头头一朝掌握了从农场到连队的领导权，首先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操纵一部分人开始对你进行疯狂的报复和迫害。

从你在6月中旬被“专政”到8月15日仅两个月的时间，“革命派”每天要对你进行无休止的体罚和批斗，此外还要完成繁重的脱土坯劳动，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可悲的是，负责看管十五、六个“专政对象”的两个人都是知青，其中一个竟然是你的中学同学。你的这位文革中不同派别的知青战友加老乡、校友，对你真是界限分明、不徇私情啊！他多次带着人趁夜深人静到关押“专政对象”的土牢把你提出来，在黑暗中对你猛打，你凄惨的叫声是那样的瘆人，我们在土牢里听得清清楚楚，仿佛至今还在我耳边响。后来你的这位校友自己曾检查交代，文革中他亲手毒打过不下三、四十人。你被逼逃出土牢，你的这位校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姓何的上海知青，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小学程度，他深感是“组织的信任”让他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能有看管“专政对象”的机会。何某长得瘦高，驼背，肤色黑褐，缺齿处镶一颗金牙，说话结结巴巴，根本听不出上海人吴侬软语的韵味，张口闭口骂人，整天打着赤脚横行，手提一根打人的大棒，一副凶神恶煞模样。我之所以多描写姓何的几句，是因为对他的印象刻骨铭心，历经四十年至今不能忘。何的残酷迫害逼得你只有冒死逃生，导致你被活活打死！我记得清清楚楚，一次深夜收工后，姓何的曾无缘无故不准你睡觉，勒令你头顶在地上，双臂向上举，身体呈三角形，整整一夜，坚持不住就要挨打。多少次你刚刚艰难地完成脱土坯的定额任务，姓何的借口达不到质量要求，一双赤脚猛踩你刚脱好的土坯，让你把烂泥推到泥坑里，重新和泥再干。毫无人性的何竟强迫你吃进咽下脱土坯的泥土。任务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了，何便强迫你在泥塘里滚来滚去直到全身沾满稀泥，还要你往自己脸上抹稀泥，然后命令你不准洗

去，穿上衣服上床睡觉，何对此嘻笑不已……。姓何的上海知青暴戾恣睢，曾毒打过三、四十人。我始终不理解这个十几岁的青年，何以对那些法西斯暴徒的兽行无师自通，乐此不疲？在何的摧残下，逃离已成为你唯一的活路。

有些记忆事后就模糊了，有些记忆则令人终生不忘。在天涯海角的边疆农场连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人们的疯狂行为持续有一年左右。这个特殊时期法制殆尽，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人的恶的一面极度膨胀，展示得淋漓尽致，这其中也有少数知青煮豆燃箕，相煎太急。我相信，这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最阴暗的一瞬间，虽然短暂，但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战友啊，你以血泪经历和生命的消逝记录了那一段苦难的历史。

（三）

悲剧远远没有结束。你不幸的消息传到家乡，思儿心切的母亲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突发精神病，几次离家出走要去寻儿，家人费尽周折几次将你母亲找回。最后一次在一个叫“小树林”的地方发现，你母亲已经自缢身亡！几天之内，连毙二命，家破人亡，你年迈的祖母不堪打击，心胆俱裂，撒手人间！你先于母亲、祖母而去，已无法知道因你而发生的这些身后人间悲剧了，想来你们祖孙三代早已在天国团聚，共叙天伦……。然而，进入天国的只是你的灵魂，你的躯体还在承受着人间的煎熬。1968年8月16日，你的尸骨被自己的棉被包裹着，在戈壁滩宿风沐雨一夜后，迎来了全连“现行反革命分子孙卫国批斗大会”的批判和声讨。死因被宣布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由“专政对象”拉走掩埋。没有棺木，没有墓碑，只有你的一座孤坟堆在戈壁荒滩。

天理昭彰。“畏罪自杀”的谎言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致死人命必将受到查处。1971年我有幸以“打死孙卫国专案学习班”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为你举办的为时数月的调查工作，并执笔调查报告。同时我还是你罹难过程的见证人。无奈文革尚未结束，极“左”思潮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历史的局限使迫害你的人逃脱了更严厉的制裁，有的只受到了党、政纪处分，有的则“逃过一劫”，逍遥至今。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曾以农场“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对你平反昭雪、重新安葬的工作。1972年，利用回原籍探家的机会，上级让我到你父亲工作单位实调，得到你父亲是“一般历史问题结论”的公函。在农场党委为你做出平反决定之后，我亲手为你购置了新军装、衬衣衬裤和被褥，与几个知青一起扎了花圈，在农场参谋长带领下，乘拖拉机拉上为你新做的棺木来到连队，全连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后，你被重新下葬在墓地。当我亲手把你已经散落的尸骨放进棺内摆好，为你铺盖衣被时，不禁潸然泪下，悲愤思念之情难以言表。

这以后我调离了我们共同生活过的连队和农场。数年后调回到故乡。我永远告别了这片曾经抛撒血汗、奉献青春的土地，你却永远留在了那里。几年后，听说迫害残害你的几个人受到处理：连队指导员和副连长被撤职，受到党纪处分；那个阴险狡诈升任副指导员的坏头头，被“双开除”，不久得癌症一命呜呼；主持审讯毒打你的那个升

为副连长的坏头头被“双开除”，此人实属沐猴而冠，不学无术，随后装疯卖傻，意在逃脱追究刑事责任；“抡园胳膊”猛打你要害处后升为农场政法助理员的那个排长被“双开除”，不久也死于癌症。几个知青打手，大概念其年幼无知，既非党员，也无官职，没有处理。但是姓何的上海知青应该是身负血债之人。这个知青的败类在专案学习班时亲口承认，你是死在他的手下，他已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何后来悄悄返回上海，不敢跟人来往，从此销声匿迹。姓何的返回上海，有可能是当时得到了有意的庇护。至于你的那个校友，参加专案学习班受到审查，一副忏悔相难以掩盖他卑鄙龌龊的灵魂，以后他找机会调离了农场，再无踪影。我相信因果报应，恶有恶报只是时间问题。你看，那两个患绝症而死的坏头头，不是上苍的惩罚吗？

1995年9月，在我们支边三十周年之际，受兵团领导邀请，我和几名知青重返新疆。去看望久别的你，为你祭扫坟墓是返疆活动的重要内容。当我们准备好花圈、烟酒、食品来到墓地，却找不到你的坟茔。此时距离为你重新安葬已过去二十三年，无人祭扫的坟茔，已经消失了。当年农场没有石碑，为你树立的木碑也找不到了。虽然我曾亲手为你下葬，抛撒一抔黄土，但面对众多没有墓碑的坟堆，不知你在何处。凭借大概的方位，我们摆好花圈、祭品，点燃鞭炮，低头伫立。透过鞭炮的硝烟，冥冥中我又看到了你清瘦的面容和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只是我们都老了，而你还是十九岁的青春少年模样。

你在共和国成立时诞生，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扬起生命的风帆，在文革的血雨腥风里殒命。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兴衰大事关联。而你生命之脆弱，人生之艰辛、短暂，归途之凄惨，每每想起更令我歔歔。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2008年8月写于孙卫国战友殒命四十周年前夕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新疆阿拉套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有一片宽20公里、长90公里的开阔地带——阿拉山口。现在这里是亚欧大陆桥中国最西端的桥头堡，而四十多年前，中国与苏联交恶的年代，这里却是“反修前哨”、战略要地。更著名的，这里是全国有名的大风口。阿拉山口南面四十多公里处有一片荒漠草原，一个农场的连队正对着大风口而建立，作为兵团的军垦战士，我曾在这里生活了九年，饱尝了风带给人的艰辛。

四、五月的春天，不等草原泛绿就开始刮风了。遥望北面的阿拉套山，只见晴空之下，山口一带的天际突然出现一片呈带状的灰褐色，几分钟后，灰褐色越来越宽，仔细看，滚滚烟尘向你涌来。凝神谛听，远方传来令人恐怖的呜呜声。不到半个小时，风逼近了。天空变色，咆哮嘶鸣，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几米以外，不能辨物。迎着风，你铆足劲也不能前行一步；顺着风，能把你吹跑几十米，勒不住脚步……。来自西伯利亚南下东移气团形成的大风，从阿拉山口这个大通道铺天盖地吹进新疆博尔塔拉的荒漠和草原，带走戈壁沙石碱土，越过天山，刮向内地，直至华北京津，甚至“出口”到韩国、日本。

这风有多大？能刮多长时间？我生活了九年的此地，每年4至10月多风，一年中平均8级以上大风日达165天，瞬间极大风速达每秒55米。论级别，大风可达11至12级；讲灾害，损失可谓触目惊心。记忆中，197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场11级大风把连队场院堆放的20吨小麦刮得颗粒不剩，掀倒场院“干打垒”围墙30多米；1977年4月一场风速为每秒55米的大风刮断电线杆24根，大树13棵；1984年一场大风，揭走屋顶10间，几十只牛、羊被刮进水渠淹死；1986年秋天，11级大风刮走稻谷15吨，折断树木300余株；1988年春天一场每秒49米的大风伴着雨和冰雹袭击而来，损失堪称惨烈，大树被刮断200多棵，小树连根拔出12万株，刮死、冻死牛马羊2200只。大风从艾比湖刮过，上千只野鸭奋起搏击狂风，终因折断翅膀、体力不支，死于湖内、湖畔。风停之后，野鸭残骸遍地，惨不忍睹。人们开着手扶拖拉机去捡拾和运回大量的野鸭，品尝野味。春天我们满怀期望播种，刚刚吐绿的蔬菜嫩苗经不住大风的蹂躏，一夜间变成焦枯的草；夏天我们满怀信心耕耘，收获在即的庄稼竟然全部被大风卷走——大丰收成为“大风收”。

我们那时盼望刮风。从早到晚地劳作让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筋疲力尽。取消星期天，十天才过一个“旬日”，公休成为我们的奢望。而大风天就不能干活儿了，可以享受“风休”——这是我们这里特有的、合法的公休。当天不亮伴随着大风声传来干部们“今天风休”的喊声时，我们在被窝里一片欢呼。这一天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睡上一天，任地窝子外面大风刮得天昏地暗，我们在被窝里睡得地暗天昏……。这大风通常刮一个对时，今日此时开始刮，到明日此时才能停，有时能连刮两、三天，一个月能刮十几次。

我们也惧怕刮风。特别是正在远离连队的地方干活儿，大风突然袭来，在茫茫戈壁滩上无处躲藏，沙石、碱

土、烧荒留下的草木灰打在脸上，令人痛苦不堪。路看不清，脚迈不动，人在狂风中拚命挣扎，任大自然肆虐欺凌，有时一两个小时才艰难地返回连队。在风中，人是那样的无助。我曾在艾比湖畔放羊，夜晚突然遭遇大风，刮倒了人住的帐篷，我们三个人被帐篷埋住。此时，你不能爬出来收拾，这里是距离阿拉山口最近的大风区，狂风大施淫威，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你别无选择，只有用帐篷布裹紧自己，只要人没被刮走就接着睡。真不可思议，那天晚上我竟然睡得很香！第二天风停了，我们从帐篷布和沙丘中爬出来，耳鼻口中抠出的都是沙土，三个人都互不相识了——全成了出土文物！

恶劣的自然条件，摧残着脆弱的环境，人难以在这里生存；过度的开垦，人为地破坏大自然，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我所在的连队，自六十年代初在这里安营扎寨，历经20多年的大风，最后败给了大自然，八十年代连队终于撤点并取消建制。昔日有着几百名生龙活虎的军垦战士、一百多名上海、天津知青为之奉献青春的连队，就这样从地图上消失了。

阿拉山口的风啊，你和消失的连队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样的苦涩！

2008.8.14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大凡曾是知青者，沒有不知道〈知青之歌〉的。我第一次聽到〈知青之歌〉，是在剛下鄉那年的一個冬夜。

那天黃昏時分，我們剛落成不久的知青大院，來了一位既黑又壯且鬍子刺紮的大漢，叫麥，是毅的朋友，六萬大山裡一偏僻山村的老知青，文革前就下鄉的，到那時已經近十年，這回說是要販賣芋種到廉江路過歇個腳。

既然是插友的朋友，還是知青的老前輩，我們自然而然熱情款待了。剛下鄉不久，還有國家補貼也還不懂得「勤儉持家」的道理，當然還是憑著對知青朋友的熱情，我們可真是下大本錢置辦了一席十分豐盛的晚宴。開席時已近午夜。自然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還有大聲唱歌，那時剛下鄉，會唱的大都還是很「主流」的歌如語錄歌造反歌之類，最「前衛」的也就只是唱一二首蘇聯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盡我們唱，麥一直不吭聲，光悶頭喝酒吃菜。我們以為是他不善唱歌或脫離社會太久不懂這些「流行歌曲」。

下半夜，女知青們都熬不住睡覺去了，只剩我們幾位男知青依舊興致盎然陪麥喝酒。走了女知青，大家也沒有唱歌的興頭了，於是就轉為吹牛聊天。都喝得七七八八的了，什麼話都借著酒意說出來，包括知青裡誰喜歡誰啦村裡哪家賣女蓋新屋啦什麼的，不鹹不淡地窮開心。這時，一直甚少開口的麥突然侃侃而談起來。他一席話下來，令我們瞠目結舌，竟一時間冷了場。

原來麥說到廉江販賣芋種是幌子，真正的目的是去販賣走私日本表，說話間還真從麻袋的芋種中掏出幾隻亮晃晃的金屬表來。「……窮到爛透了，我們那山旮旯，去年工分值四分半，算中下水準，大家都自找活路，蛇有蛇路，蛙有蛙路，膽小的販賣番薯，膽大的販賣女人，販賣走私表是中不溜的也只是知青才有的路數……我也膽大過一回——販賣了三個女人到境外，其中還有一個是一起下鄉的女知青。那是她們自願的，我算是給她們幫了忙……是賺了一筆，但後來都給了那個女知青家了，她父母沒了，還有三個在讀小學和初中的弟妹……」

不知是他的故事震撼了我們還是他個人本身震撼了我們，反正他在我們眼中頓時陌生起來、生分起來。我們剛下鄉不久，雖然知道農村苦知青苦，但確實無法想像會苦到這地步。大家實在是再也無法聊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場。麥也感覺到了，默默縮進柴房（他的借宿處）。

凌晨，我仍然輾轉反側睡不著，溜出大院拉尿。天賊冷。我打著戰尿了尿，正側身縮進大門，風中隱隱約約從後山傳來一陣斷斷續續的歌聲，蒼涼且悲愴。禁不住心生奇怪，誰有這樣的興致在冬夜野地唱歌？當我弓腰縮頭轉到後山溝，不禁愣住了——是麥，坐在土坎上，雖套著棉衣卻敞著懷，手中握著我們喝剩的大半瓶木薯酒。看到我，麥似乎不覺意外，沖我一笑說：「喝多啦心裡的話也藏不住了，把你們都嚇著了吧？」「唱什麼歌，挺有意思

的。」我是想轉移話題也是好奇那歌。「那是我們知青自己的歌哦，」說著灌了口酒，一抹嘴巴就唱了起來：

山鄉的夜晚，
多麼淒涼，
我坐在煤油燈旁，
思念我可愛的家鄉我的爹娘。
呵……呵……
呵呵……
家鄉的娘盼兒兒想娘，
痛斷肝腸，
什麼時候才能回到我的家鄉？

聲音渾厚、低沉、嘶啞，透著悲愴、哀婉與蒼涼，雖然近三十年過去了，我依然能感覺到當時那種從心裡往外滲透的寒意。

過後我才知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知青之歌〉，是經過我們那裡的知青改編過的〈知青之歌〉。我當時聽麥唱的是改編版的第三段，目前所能見到的公開發行以及網路流行版本都沒有這一段歌詞，但這段歌詞卻十分真實地反映了我們那帶山區知青思鄉盼親的悲苦心境。而且是通過「娘盼兒」與「兒想娘」這麼一種雙向思念痛苦的重疊渲染，來凸現知青下鄉給當時知青及其家長雙方所造成的莫大傷害。

次日麥就走了，以後再沒來過。不過分手時我跟他說了半句話：「我想我是瞭解你了……」他截住我的話頭，也撂下半句話：「我知道，是那歌……」

很快地，〈知青之歌〉（改編版）就在我們那一帶流傳開來了。

很久很久以後，我聽到這麼種說法：「就像革命者憑著〈國際歌〉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一樣，知青憑著〈知青之歌〉就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對此，我深有感觸。

附：〈知青之歌〉原版歌詞

藍藍的天上，
白雲在飛翔，
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
我的故鄉。
啊……啊……
長虹般的大橋，

橫跨長江，直聳雲霄，
巍巍的鐘山屹立在我的故鄉。

告別了媽媽，
再見吧可愛的故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春史冊，
一去就不復返。

啊……啊……

今後的道路多麼遙遠，
多麼漫長，
我們在心底深深地埋下回來的希望。

補記：〈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鄉〉，又名〈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南京知青。1969年5月的一個晚上，任毅譜寫出〈我的家鄉〉。此歌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知青中流傳開來，並被名為〈知青之歌〉。1969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臺以〈中國知青之歌〉為名播放了這首歌。1970年2月19日（陰曆正月元宵）夜，任毅在知青點被捕。同年8月13日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当知青时三次打架的经历

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人，尤其是男知青，很少有没打过架的。在文革当中，公检法被砸烂，地方上有人恶霸一方，打架成了知青保护自己、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北大荒的几次打架经历让人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村里，我们插队的兴旺大队有一名叫管再生的山东大汉，他来自山东潍坊，据他自己吹牛，他在当地担任过造反派司令，至于为什么来闯关东，他没有说过，如果他的经历真如他自己所说，大概应是他闹出人命才来北大荒的。我们大家平日都叫他“老管”，老管三十五六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剽悍强壮，他曾自豪地对我们几个知青说，他的胳膊比我们的大腿粗，他很像《水浒传》里的蒋门神，凡看过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得出同一个结论：那个企图刺杀列宁，刺探列宁住处，貌似黑猩猩的凶手，简直就是这老管的孪生。真不知他的祖先是来自何方落脚到山东的。

老管这人不喝酒时，也还算义气，对我们这些知青也算客气。但他这个人爱喝酒闹事，别看他那么大的块儿，膀大腰圆，装满二百斤黄豆的麻袋他两臂一用力，自己能扛到肩上，但他爱喝酒撒疯。老乡们都说他不喝正好，一喝就多。他喝酒后，除打架骂街是家常便饭外，还干一些欺男霸女的鸡鸣狗盗之事，村里的人都怕他，躲着他，不敢惹他。哪家的红白喜事不敢不请他，不请他怕他挑理，请他又怕他喝多酒闹事。他这个人用北大荒话说，叫做癞蛤蟆上脚背，不咬人，咯硬人。

一天村里盖房垒墙，我们青年点有位男八中来的高三学生陈建华（一位学究式的读书人，现在他念完博士留在了美国），那天他和喝了酒的老管一起在生产队里干活，他当小工给老管搬石头，搬了几块都被老管扔了下来，还嘴里不干不净的骂陈建华，书生气很浓的陈建华忍无可忍，反唇相讥，把老管在村里偷鸡摸狗，欺辱一位村里弱智姑娘的事当众抖出。恼羞成怒的老管顺手拿起一把瓦刀向陈建华劈来，很有心计的陈建华转身朝村后青年点跑，当看老管停步不追时，又向老管叫号，老管碍于村里一大群看热闹的乡亲，仗着酒劲追来。

当时青年点在家里的男生有我、肖庆平、梁大虎、吕学政、辛传东等人，我们被村里的叫骂声和围观人群哄闹声所惊动，推开青年点窗子一看，陈建华且骂且退，老管手握瓦刀满脸通红、杀气腾腾紧追不舍。一时间当知青的闷气和平日对老管欺男霸女的愤恨一下涌上心头，太欺负人了，竟敢打到青年点门上来。

我们五六个男生来不及走门蹬上鞋跳上外炕从窗子蹦到院子里，还没有等老管反应过来，已经冲到他跟前，不

等他还手，已被我们几个拳打脚踢放倒在地，在挣扎中老管试图去摸地上的石头，不知被我们中哪一位狠狠地踩了他手腕一脚，疼得他只喊妈。老管这个平日在村里专门欺负弱者的人，这次被我们足足实实暴打一顿，只打得他拼命叫爹、叫爷爷的央告我们，我们方才住手。周围看热闹的老乡们看呆了，没想到这帮平日文弱知青还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紧要关头人人都不要命的往上冲。

事后横行霸道惯了的老管鼻青脸肿足足在炕上躺了一个星期才下炕，他轻易再不敢喝酒闹事了。村里个别狗仗人势，特别在女知青面前常说些不三不四的人收敛了许多，青年点的门口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敢打上门来的人。

第二次在农场，那次是我们和邻居格尼河农场的一群恶少打架。图布新公社的土地与格尼河农场的土地相连，两家也时有矛盾发生。特别农场有一帮强人常在秋收时明目张胆来抢粮食，多次发生护秋老乡被打伤，许多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一天为四队护秋的知青梁大虎在磨石山护秋时，被格尼河农场一个分场的一群恶少围住，他们强行当着他面砸了几麻袋黄豆，并把护秋的梁大虎打了，然后拉着粮食扬长而去。

事情传到青年点，大家气炸了窝，在那个没有法制的年月，上哪讲理去？既然没地方去讲理，这个仇一定要报，我们侦察到那几个参与抢劫的农场“干部子弟”的情况和住处。事发后的第三天晚上，联络了和我们关系密切临近三个青年点的二十多名男知青，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的人大附中和西颐中学，大家套上两辆马车，带上棍子等家伙，半夜十二点偷偷出村，夜袭格尼河农场。

十一月中旬的北大荒，晚上寒风朔朔，地上覆盖着一层银白色的霜，寒气袭人的月亮挂在灰蒙蒙的天上，马蹄和车轮在冻硬的大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二十来个人分乘两辆马车，大家都戴着毛绒绒的皮帽子，一付林海雪原上小分队的劲头。那帮恶少的住地已被我们在白天摸清，精细的人还画了草图，农场住地距我们村二十多里路，北大荒的马车是四匹高大的马拉着，不一会就到了农场村外。

大家选好地方，留人在村外看住马车，其他的人悄悄摸摸进了村，尽管大家脚步很轻，还是惊动了村里的狗，不时传来一阵阵激烈的狗叫。我们也顾不得这么多，按照事先约定好的“作战方案”，分成两个组，包围了那伙恶少赤中两个为首者的家。

我们十来个人围住一个刷着蓝油漆的三间瓦房，木头院门很容易打开，一条看家狗从黑影里朝我们扑过来，被前福河青年点一男生手疾眼快一垒球棒打在狗的腰部，狗干嚎一声被打翻在地。我们五、六个人冲了进去，由灶房又冲进睡房，用电筒照在炕上，一个满脸横肉的男子被惊醒后已抱着被子缩到炕的一角，梁大虎一看，指着那人说，就是这个王八蛋。我们中有两个人跳上了炕，把那个恶少赤条条从炕上掀到地上，在一顿拳脚之后，他交待抢来的粮食都放在另外一家人的仓房里。当我们让他穿上衣服跟我们去找粮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老婆一听我们要带走人，急得从被子里钻出来，她赤身裸体的朝我们扑来，原来北大荒男女睡觉多是一丝不挂。这场景惊呆了大家，推她不是，躲她也不是，房子小，人又挤得都没有侧身的余地，正在为难之时，不知哪个聪明的知青顺手摘下墙上挂着的高粮杆编的大盖帘，用盖帘当盾牌就势把她推回炕里。因为粮食在另一处人家，时间紧，我们教训那个满脸横肉的恶少后，便招呼撤出。临出门我觉得不解气，把灶旁的大菜礮顺手扔进锅里，随着哗拉一声水

声，那口大铁锅被打破了。

等我们撤出村时，另一小组人也凯旋归来了，这时村里的狗叫声响成一片，但他们摸不清我们来了多少人，没有人敢追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夺回粮食，却狠狠地教训了长期在我们那一带农村作案的恶少。这事后来惊动了公社和旗革委会，但发现我们教训的确实是几个累累犯案的坏蛋，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考虑到地方同农场的关系，他们对那几个坏人也没去追究。至此农场和我们大队在后来几年中相安无事。

第三次打架是在阿荣旗，那次我们几十名北京知青在阿荣旗修沥青马路，大家住在离旗(县)不远的章塔儿村的小学校里。那天白天上工时，我们为了平整章塔尔桥南侧公路上的地基，埋好炸药，并为了安全，在两侧500米之外设了卡，派人守护，以防万一。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我们点燃了埋下大量炸药的导火索。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南侧朝阿荣旗方向开来一辆装满了乘客的大客车，路过我们设在南面马路上的哨卡处。汽车不但无视举着小红旗的知青阻拦，反而加速险些将三名知青撞到路边大沟里，大客车毫不减速撞倒哨卡的木栏杆，径直向冒着蓝色火苗的埋炸药包处开去。我们几十个人看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大客车在离炸药引爆地几米处突然把车停了下来换驾驶员，眼看一场车毁人大爆炸即将发生，很多人转过头闭上眼，不忍看这一惨剧。但过了一会却没有动静，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根突突燃烧的导火索在接近雷管不长一段距离时突然熄灭了，事后才知道那段导火索严重受潮，一场眼看无法避免的灾难避免了，修路的知青狂怒的向大客车冲去。

大客车上的许多人都发现了眼前要发生的惨剧，惊恐之余纷纷指责肇事的司机。那个司机是个大个子的中年人，车停时满脸蛮横的他已经换到副驾驶的位子上，他对满车乘客的指责和我们的质问，满不在乎，嘴里骂骂咧咧，摆出一副骄横不可一世的样子，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他喝多了酒。换他开车的司机见情况不好，一踩油门，大客车绕开埋炸药的地方，灰溜溜地开走了。

我们为没出大事庆幸，若不是那发了潮的半节导火索阻燃，那一车人早就被炸上天了。我们更为那蛮横的肇事司机愤怒。在事后几天里，我们连续多次向旗政府、旗交通局反映那位司机的问题，但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要知道在那个小小的县城里，在那个年月里，司机往往也是一个很牛的职业，握方向盘的人和县里掌权者们往往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谁愿意为一群知青去得罪权贵们呢？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十几个年轻人翻高墙，跳进旗长途汽车客运站的大院里，当着一群正在打麻将的司机们的面，狠狠的教训了那个置几十名乘客生命于不顾的恶司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和给他撑腰的人，应该知道是谁教训了他，但自知理亏的他们也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不好再声张，但愿他们从那以后能学会做人。

用打架来解决问题在法制社会和文明社会自然是不可取的，然而在法制被践踏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谁又能为知青们想出更好“替天行道”的办法来呢？

乡村婚宴乐手

插队时，正是青春惆怅的岁月。知道这一去，会有许多的寂寞与单调。便带了许多书，还有一把二胡，一架手风琴。二胡乡亲们大都见过，但都没见过手风琴。正是冬闲时候，便常有一些老老少少到我们知青屋里来，抽烟、聊天、吃我们从城里带来的糖果，或吃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炒米，炒蚕豆。然后就会有人会说，胡哥，拉个琴子我们听。他们一开头就将手风琴唤作琴子，并一直这么叫了下去。我便背起手风琴拉起来。不论拉什么，他们都津津有味地听着。拉了他们熟悉的歌，如语录歌，电影插曲或天沔民歌，他们便都笑起来。

下乡的头几天，因为手风琴，我和那些农家子弟们便很快熟起来。他们有时会回家取了土铳，邀我去打斑鸠，象是回礼。

下乡后的第十天，我们湾子那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良缘一早来找我。说，胡哥，跟我一起去吃“长伙”（酒席），我的一个亲戚今天接姑娘娃子（结婚）。我说要出工呢。良缘说，我跟队长说了，放你一天假。良缘比我小一两岁，因为是民兵排长，在队里也算个干部，和队长说得上话的。那时乡下很苦，别说吃酒席，就是煮白菜萝卜，也不敢多放油。我说那就去吧。良缘说，把你的琴子背上，我来背。

他那亲戚家很远，有十多里路。良缘背着那架沉沉的手风琴，和我走在收割后荒凉的田野里，一路说着话。一路兴致勃勃。

到新郎家，已近中午。一座很老旧的土砖农舍前，用油布撑起了一个大棚，放了几张大方桌，许多妇女正里里外外忙碌着饭菜。大棚外站了一溜乡村吹鼓手，热闹地吹打着，细一看，其实只有两只唢呐，再就是锣、鼓、钹。我们被请进堂屋，良缘给我介绍了新郎的父母亲友。新郎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稚气未脱的农村青年，一点也不象要做新郎的样子。听良缘说我还会拉二胡，立即进屋去拿来一把二胡，说他正在学拉二胡。那是一把很粗糙的二胡，音色也很差。听我试了几试，新郎便拉我们离开人多声杂的堂屋，进到了他的新房。新房没什么结婚的气象，光线很暗，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条桌是新打的，涂了红通通的油漆。见新郎又是敬烟又是倒茶，一副极虔诚极激动的样子，我只好将就用这把二胡拉了几段曲子。新郎又央求我拉拉“琴子”给他听，我又拉了几段手风琴。这一下便召来了外面许多忙碌着的人们，把个本原就不大的新房挤得满满当当。后来有人提醒该去接“姑娘娃子”了，新

郎才悻悻地回到自己办喜事的情景之中。

我也被邀去接“姑娘娃子”，手风琴也依然由良缘背上。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开拔了。

新娘在几里路外的一个湾子。一路上吹鼓手们呜哩哇啦很尽职地吹打着，引来四周田间劳作者的注视，一些孩子兴高采烈地跟在队伍后面。队伍的前面有几面红旗，我一看，是早已散掉了的数年前一些农村群众组织的队旗。旗帜上印着“红联指”“农战队”一类的字样。

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来到新娘家前，放了一挂鞭，几位新郎的族亲拥着新郎前去见他的亲爷亲娘（岳父岳母）。但亲爷亲娘神色生硬，在大门前一站，拦住新郎一行。新郎忙递烟，递茶礼。亲爷亲娘依然生硬。双方交涉一番，新郎掏出一些钱，亲爷亲娘收下，但还是不让新郎进门。事情僵了下来。新郎狼狈地站到一边，他的几位族亲上前说情，对方却毫无所动，死死拦在门口。那帮吹鼓手们依然远远地站一排，面无表情但尽职尽责地吹打。这期间，良缘几次要我拉拉“琴子”。我极为难，这种情景，哪有拉琴的兴致。刚刚离开完全政治化革命化了的城市，一下见到农村中这最真实的一面，有如透过舞台的帷幕，瞧见后台的杂乱破败一般，让人很是惶惑。这算是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课。见我不愿意，良缘也不再勉强。找个土堆让我坐下，说，乡下结婚就是这样的。亲爷亲娘在接姑娘时要尽量向新郎要钱要物，但最后迟早是要把人放走的。

就这样，双方都极有耐性地厮磨着。那帮乡村吹鼓手们也极有耐性地吹打着。一早出门，我早已饿得不行，还不知这场接新娘的拉锯战得拖多久。

又交涉了几个小时，据说新郎又给了一点钱，亲爷亲娘这才放了姑娘出来。姑娘一出门，和亲娘拥在一起又哭唱了许久。哭唱的词有板有眼，还押韵。近乎一种民间戏文。娘唱的主要是抚养女儿的一些往事，女儿则唱这一去后对爹娘的牵挂对弟妹的不舍……新郎和他的族人们便耐心地站在一旁看她们哭唱。眼看天已不早，才最终将新娘迎到了手。更浩荡的一行人呜哩哇啦得胜回朝。

回到新郎家，新娘便被一群女宾拥进新房，不再出来。吃酒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有的也饿了一整天，有的拖家带口，从很远的地方来，准备在这里过夜的。于终年没有什么社交文化生活的乡亲们来说，一次婚宴也算一个重大的节日了。等饭吃的时候，良缘便让我给大家拉“琴子”。后来，新郎拿着二胡来了，耳语说要我教他拉二胡，便带我走出他家后门，钻进一片摘完了棉花的棉梗地里，坐在一条垄沟边，听我拉曲子，又问我一些基本的技法。我为这个置终身大事于不顾，真心诚意热爱音乐的乡村青年所感动，便耐心地给他讲解，示范一些技法。他也腼腆地一样一样地学着，试着，一副极投入的样子，竟看不出一点洞房花烛夜的幸福与激动，似乎那么多人忙忙碌碌是为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

天快黑了，终于有人循声找到了棉花地里，火烧火燎地说吃喜酒的人早坐好了，却到处找不到新郎。新郎这才很不情愿地起身回去。

我被安排在上席上坐，与新郎家的前辈们一桌。老人们吃饭极讲礼性，小小吃一口，便放下筷子，说一些家常往事。等主人发话“吃吃吃”，便又小小地吃一口，又放下筷子。主人点哪样菜，便动哪样菜。有几个菜上的盖碗，久久地扣着，似乎不准备揭开了。而那些后生们婆婆媳妇们的几桌，则早已抢得昏天黑地。菜不算少，但大多都很普通，一碗米粉，几块年糕，都当一碗菜的。有点油荤的，大概就是几碗粉蒸肉，腌咸鱼之类。我这一桌没揭盖子的，恰恰就是这么几碗能解馋的。

早上出发时，知青组的伙伴曾要我带点喜糖回去。但在整个婚礼上我似乎没见到糖，心里着急回去如何交差。后来，桌上的几个盖碗终于揭开了，老人们的酒饭也差不多吃完了。快散席时，我快快地掏出一张垫坐的报纸，将剩下的小半碗咸鱼倒上包了起来，揣进棉衣口袋。

酒席后，新郎家里人让我在堂屋里为来宾们又拉了一些曲子。乡亲们对这个如风箱一样，拉拉扯扯又能发出好听音乐的东西极喜欢，一边听一边发表各种酒后的评论。只是新娘始终没有露面。

告别时，新郎说要拜我为师，以后要到我队上来找我学艺。后来他果真来过一次，但往后再也没来了，不知为什么。

回队的路上，良缘知道了我拿咸鱼的事，拼命地笑。他说，这“长伙”要吃好几天的，主人有意要省下一些，给下一餐吃的。

回到我的知青屋，同学们都还未睡。我拿出报纸包的咸鱼，说这就是喜糖。十个人，一人一块还不够。记不清是如何分配的，但那香鲜的味道，我想大家一定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吃到一点荤腥。

那天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我二十岁的生日。

1995年冬下乡27周年纪于武昌大东门

插队九年的知青岁月

1968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两年了，他的发动者似乎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的收场比开场还要难。

我与上千万城市学生的命运一样被卷到上山下乡的巨流中。9月7日，我们一千多名北京知青乘火车到内蒙(后划为黑龙江)的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告别了北京、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弟弟、妹妹，谁知道这一去竟是九年。

呼伦贝尔盟在内蒙的最东部，以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为界与苏联有漫长的边境线。呼伦贝尔盟有中国最好的草原——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林区。呼伦贝尔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十二、十三世纪，蒙古族逐渐兴起强大，成吉思汗依靠富饶的呼伦贝尔做为根据地，统一蒙古继而建立了跨越欧亚大陆的帝国。我们插队的阿荣旗是呼盟的农区，背靠连绵的大兴安岭，嫩江在它的面前蜿蜒流过。这里与黑龙江三江平原相连接，老乡们管这片黑土地都叫做北大荒。

师院附中的学生被分配在图布新公社的两个生产大队里，共五个青年点。我们青年点有二十多个人，男生多，女生少，住在一起分在一个屯的两个生产队劳动。我们那个屯叫兴旺屯。我们到阿荣旗的季节恰逢深秋，各种树叶变化出不同的颜色，斑斓多彩，山坡上成片的柞树林如同北京香山枫叶，红彤彤层林尽染，再加上与之呼应的蓝天白云美不胜收。更让人心动的是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和分布在田间的农舍村落，这就是迷人的北大荒。

生产队临时把三间紧挨着马圈、歪歪斜斜的队部腾出来，清扫后给我们当青年点宿舍，中间的一间是灶房，垒着四个烧柴的大灶，灶上安放了几口大铁锅，灶间还放着水缸、碗橱。一东一西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每间宿舍都是对面炕，我们十几个男生挤在两铺炕上实在挤不下，同来的傅中高风亮节睡到了两个破炕桌拼起的床上，睡在了地下。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几年后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后方才结束。

这里的农民大都是从山东、辽宁闯关东老乡投奔老乡，落脚在这块北大荒的土地上。东北农村的农民大都豪爽、热情、大方，我们很快就彼此熟悉了。兴旺屯是图布新公社兴旺大队一、四队所在地，有百十户人家，村子建在小山坡上，村后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屯前面有一个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大甸子，往西翻过一道山梁是通往旗政府(县政府)所在地的公路。村里的地大都在附近的山坡上。我们插队的图布新是死亡率很高的克山病(地方性心脏病)和大骨节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知青下乡都远离这里，而我们却责无旁贷的这里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漫长劳动生活。

这里的劳动量很大，地多人少，地里的垅五、六里地长。秋收是很艰苦的活，我们刚到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单

薄，又不懂得干活儿的要领，所以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力气，收割时被落得老远，干着急也追不上。青年点的伙食开始也很差，插队前几年，天天吃的都是玉米、小米，年节时能有少量的白面。最早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后来很快换成我们同学之间轮流做饭，手艺好点的还凑合，手艺差点的大家就惨了。另外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青年点吃的就是一天三顿的玉米渣子和小米饭，菜是土豆、白菜，又缺少油水，做来做去也做不出什么花样。刚下乡的两年很少能见肉腥，过年时杀口猪很快就吃完了。记得有一次青年点用肉末炒了点咸菜，那天早上我起得早怕惊动别人，放轻脚步走到厨房，一看我们青年点的副排长冯洁正趴在放咸菜盆旁挑肉吃，她眼神不好，高度近视，要想从咸菜里挑肉末，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见状在她背后大喊一声吓了她一跳，很快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笑料。她现在在美国定居，不知道她是否还爱吃炒咸菜肉末。

艰辛、枯燥的生活使有的同学精神越来越压抑，我的同班同学陈韶山原来在学校是位好学生。他在市委工作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后又常郁郁寡欢。下乡后第二年的春天便出了事，一天夜晚老乡井边打水，摇辘轳时发现冻成窄窟窿的十几米的井下有人抓着铁索链悬在那里，忙呼喊人来援救。早春的北大荒零下二十来度，井台上到处都结满了厚厚的冰，他的手已和井链冻在一起，那种情况真有些惨不忍睹。将他抢救上来后，我们千方百计费了很大劲，在大队公社帮助下，说服旗知青办把他送回了北京，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回北京的知青。过后得知，他是自己跳的井，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中最严重的一种。

阿荣旗虽然是边远的山乡，政治运动也没有放过它，当呼盟行政区划归内蒙时，这里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整“内人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说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粉碎四人帮后担任过国家副主席)是“内人党”，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一夜之间内蒙的共产党全成了“内人党”，共产党的家属全成了“内人党”的家属。从内蒙广大的牧区到农区，从城市到乡村冤狱四起，逼供的手段令人发指，许多干部、党员被批斗，被关押，被整死。经历过北京运动的知青们，再没有红卫兵时的狂热，大都冷冷而无奈的注视着这场人间悲剧。

当呼盟划归黑龙江省后，这里又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从哈尔滨的各机关抽出干部向这里派出了工作组，在那个特别严寒的冬天，白天劳作一天的农民晚上还要开会。有趣的是一次忆苦会，我们村里有一位好出风头，用东北人讲话又有点虎的赵老二，自告奋勇从炕上跳到地上发言，看他要发言了，原来睡觉的人也伸长脖听他讲些什么。赵老二清了清嗓子带着哭腔开始了控诉，他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让我们到大草甸里夜战挖大沟，让我们白干活，剥削我们不给我们工钱，家里没粮食，大人小孩饿得像大眼灯一样，还不如我在满洲国时给老财扛活，那时候还有大白馒头可劲造”。赵老二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人越听越奇怪，这是控诉旧社会吗？工作组组长也开始听明白了，他气急败坏地打断了赵老二的发言，恨恨的说：“住口，你控诉谁呢？”赵老二摸着脑袋不解的看着工作组组长，委屈地说，“我没说错，不信你问他们。”但赵老二几代贫农，工作组拿这位大老粗又怎么办呢？原来赵老二在说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的事，顷刻满屋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忆苦思甜会草草收场。

青年点分配上一开始我们自己搞“小共产主义”，大家挣工分年底队里分的钱都由青年点统一管理。粮食、衣服

青年点统一买，出工多少，工分挣多少都一样，实行三年多便实行不下去了，小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流产了。青年点大部分成员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同命相怜，在漫长的插队岁月里，大家彼此关心，互相照顾，共同度过我们最好的青年时代和最艰苦的人生岁月。

北京知青自始至终得到村里乡亲们的照顾，青年点中午做饭没有菜了，随便那个知青拿着两个脸盆到村里转一圈，没多久一盆大豆制成的黄酱，一盆白生生的鸡蛋就端回来了。有两个冬天我没有回北京，留在东北过年，乡亲们怕我孤单，一个月当中居然没有让我在青年点做过饭，这家请完那家请，在好心的东北乡亲们的炕头上，他们轮流用北大荒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小鸡炖蘑菇，鸡蛋炒木耳，还有东北特有的炖菜，烫好的烧酒，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

我从1968年9月去插队，1977年7月返回北京。整整在北大荒度过了九个年头。插队的后几年，青年点有路子的人都走了，招生、招老师、招工又走了不少人，但我因为下乡时档案中被军代表塞进去许多关于父母莫须有的黑材料，只能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我23岁时开始在兴旺一队当生产队长，指挥着百十来口人，村里的人喜出望外，发现北京知青不仅能吃苦，还有当好干部的本事，他们哪知道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也锻炼出我们的组织才干。我们青年点梁大虎在四队当生产队长，当时加上在大队当副书记的肖庆平，我们青年点在同一时期出了三个“村干部”。现在梁大虎在北京一家运输公司当党委书记，肖庆平在国内读完博士以后定居在美国洛杉矶。他的夫人王明明也是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她在农村很能干，曾被选去开柴油机磨面打米，后来招工农兵大学生时上了大学。

我们的大队书记邱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十几岁参加革命，为人耿直，对知青像自己亲人一样爱护。他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启用我们，又怎么会有我们展示指挥才干的机会。公社党委书记胡福元一班人顶住“左”的压力，相继把我们几个知青干部接纳为中共党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千万城市的中学生发送到偏远的山村，造成许多人间悲剧。我在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农村生活了九年。我能在插队九年后乘末班车返城，应当感谢两个人。一是粉碎四人帮后复出的邓小平，他们拨乱反正，为知青返城政策上亮了绿灯。再就是我的爸爸，他从五七干校返城恢复工作后，千方百计运用在北京的各种资源，为我开出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特困调动证明。

十年一觉插队梦，我记得离开兴旺返回北京的那天，队里用马车送我去阿荣旗，村里的老老少少依依不舍把我送到村口。我在北大荒度过了九年插队生涯，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呼伦贝尔盟，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黑土地。

插队九年的知青岁月

准备打仗

1971年，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显赫一时的副统帅林彪竟要谋害毛泽东，叛国出逃，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那时中苏两国各在边境陈兵百万，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爆发了珍宝岛争夺战，大战一触即发。当时对于战争的渴望和兴奋当数几百万下乡的知青了。我们是看着战争片长大的一代，也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熏陶长大的一代。加之文革极左思想影响，许多人都希望拿起枪去解放全世界。

一时间备战的动员，战争的传言都铺天盖地而来。我下乡的黑龙江开始发枪（那时呼盟划归了黑龙江），知青成为基干民兵的主力。“青年点”的墙上挂满了枪，有较新的半自动步枪，也有老掉牙国军留下的七点六二步枪，日军留下的三八大杆步枪，子弹也发了不少，拿着这些枪，拉枪栓瞄准射击感觉也真不错。

当兵穿军装是那个年月男孩子的梦想，我的父母、我的舅舅、姨全都是建国前后的军人。但在阶级斗争的年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们的父母全被打入另类，我们这些人只能在农村插队，哪有可能去当兵。若干年后与一群当兵的军旅朋友相聚，他们认为我有军人情结，问我是不是也当过兵，我自嘲地告诉他们，我这辈子只当过“官”，没当过“兵”，其实准确的说，在那备战的年月我也摸过枪，也有过拿枪的经历。

黑龙江、内蒙与苏联有几千公里的边境线，异样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尤其是人人自危的阶级斗争年月，更是险象丛生、草木皆兵。有时村后的树林里不知为什么会升起信号弹，大家端着子弹上膛的枪围上去，折腾半宿一无所获。

青年点的房子在村后，这里离村里老乡们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天晚上我们用一支养蚕打鸟的沙子枪打死了老乡的一只鸡。几个人将战利品捡回来，怕老乡发现，用被子挡住窗子遮挡灯光，几个烧水褪毛，开膛破肚收拾完了，用水煮熟了就狼吞虎咽的开吃。不想一个小子刚咬一口就吐了出来，惊叫之中连血带牙吐出，原来鸡是被铁砂枪弹击毙的，鸡身上还留下了许多铁砂，真是偷鸡不成丢了把米。至今那位知青见到炖鸡还心有余悸。

大的战争没打起来，打仗的故事却是一个又一个发生。那年我们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的加格达奇修战备路。阿荣旗算一个团，全团光北京知青就有一百多人，他们最积极又最能干。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原始森林中松涛阵阵，漫山漫坡的红松和白桦树更为大兴安岭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宿营地周围山上树林里也时有信号弹升起，大家都相信那是苏修特务所为，但那么多年却没抓到一位放信号弹的苏修特务。

知青中许多人立功心切，纷纷向团部请战要去抓苏修特务。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活的知青们却精神头大，不睡觉，围在一起打扑克、瞎侃。突然在外面的哨兵高叫，有人放信号弹，呼拉一下临近住地约一百多知青和民工手持各式武器，向发现信号弹的高地包抄过去。

虽然月明星稀，但毕竟是深夜，树林里更是忽明忽暗，不知道是实战需要还是壮胆，各路兵马呼声不断。大家争先恐后的往山上跑，我想如果有特务也早就吓跑了。

搜索的人群看到几百米外的地方有一大几小的黑影急速消失在远处的密林中。当大家顺着一种奇怪的尖叫声围住一棵高大的落叶松，看到树杈上蹲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任凭我们怎么叫喊也不理采。我们怕他手中有武器也不敢贸然爬树去抓他，有的知青说，这苏修特务可能听不懂中国话，有的主张开枪，多数人希望抓活的，有位老乡出主意说把树砍倒了不就抓住它了吗？树下的议论乱成一锅粥。

我们认为砍倒树是个好主意，大家与树保持一定的距离，密切观察着树上那个家伙的动静，由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大斧子轮流朝大树容易偏倒的一方去砍树。随着树下的口子越来越大，树开始摇动，树枝树叶也在哗哗作响，树上那个家伙也在无助的摇晃。十几个知青涌上去推树，大树嘎叭一声轰然倒下，树上的那个家伙也随之掉在地下，十几支手电筒照了上去，被我们围在中间的却是一只比一般狗大不了多少的小黑熊，小黑熊已经被摔晕了。

事后大家分析，那是一头大黑熊带着几只小熊夜里觅食与我们遭遇，这只倒霉的小熊急不择路爬上树被我们活捉，大黑熊带着其余小熊落荒而逃。从此百名知青夜擒苏修特务的故事就不脛而走。

被认作苏修特务的小黑熊被几位北京知青收养，带回养在他们的青年点里。怕它伤人给它系上一条长长的铁链子，具说这只小黑熊非常通人性，老乡进院时，它呲牙咧嘴，连扑带咬很不友好。知青来时，哪怕是外村从没来过这个院的知青来串门，它却表现得温顺友好。

但随着小黑熊日渐长大，它的狩猎本领也越来越高，它用以静制动、突然袭击的办法捕捉无意到青年点来游逛的老乡们的鸡、鸭、鹅，捕猎手段高明，有时迅雷不及掩耳，有时装睡卧地伏击，引起了青年点周围农户的义愤。

为了这个“苏修小特务”能更加自由的成长，也为了村子里的安宁，知青们给小黑熊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找了一辆带挂斗的拖拉机，十几名知青将小黑熊送到了阿荣旗西北部的森林中，为它解去了索链。就在拖拉机往回行驶时，小黑熊还在后面追赶了一阵，最后大家站在高处，目送这只已长大的小黑熊回归山林，几位女知青忍不住伤心掉下了眼泪。

准备打仗，然而战争没有来，这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幸事，也是百万知青的幸事。

记下乡第一日

题记：我很难忘怀我下乡插队的第一天——1968年10月31日。在乡下三年多的日子里，每逢10月31日，我和同伴们都要庆祝一番。那天不出工，打打牙祭，或者穿戴整齐些到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去，尽量热闹一番，我们戏之“过周年”。“过周年”是当地的乡俗：逢死者的忌日，生者做一番祭奠，祭奠之后当然要吃一顿酒饭，一般也只举行三次，“三周年”过毕就不再举行了。这同我们的三次“过周年”倒有几分巧合，意义也颇相近的。

人“老”了（当地乡俗讳“死”称“老”），入土为安，到了该去的地方，再也不为人世的艰辛心劳和身劳了，也算得是喜事。人去了不可再生，人们想起死者也不免有些哀伤。我们的“过周年”也像一种祭奠……。

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天。几乎到中午了，才有社员拉着小毛驴到千阳县革委会大院来接我们，我们是头天夜里到县里的。整个大院里几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了。我们这七个人里五男二女，都是听天由命的孤独者，即都没有自愿结合编组。同是天涯沦落人，不一会儿也熟了。社员利索地把我们的行李上了驮，我们用省城的官话和他们搭讪，多是语言不通，只得闷着头跟他们走出革委会大院，如被逐出的亚当和夏娃。

县里的街道不宽不长，“日中为集”的古俗使街道热闹拥挤。驴子大模大样地走在街道中，汽车来了也不肯让一下。来接我们的生产队长是个黑汉子，黑鞋，黑裤子，披着黑袄里露出黑褂子，腰上裹着黑腰带。似乎半条街的人都认识他，叫他老鸱，也就是乌鸦。那时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最高指示还未发表，只听他问他的那些人“接的是知识干部”，我们也没去纠正他。

出了县城，过了千河大桥就没公路了，渐渐地也听不到县城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广播声了。路旁一株株果实累累的大柿树，煞是好看。偶尔有乌鸦在树梢享受，它们也不声张，只听见翅膀的扇动声。沿着河道上行十五里就开始上山（其实是塬），路很陡，驴子都出汗了，却依然走得很快，它们知道快要到了，它们也懂得只有到家才能放下背带的重荷。我们几乎赶不上驮队，社员让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手拉着驴的尾巴上坡，说可以省劲些，我们没去做。大半是好强及对驴的同情，也可能怕驴踢。

路过大队部，大队开立一个简单的欢迎会。驴子自然先走了，它们急着得到解脱。而我们这些第一批急着自愿

下乡的，似乎亦要解脱什么。

离开大队部，就上了塬顶，远处才见一座石山，要去的村子就在那石山脚下。石山规矩得像一座金字塔，拔地而起，显得伟耸而又神秘。问老乡叫什么山，答曰：大王殿。



大王殿——三十九年后拍摄

“望山跑死马”，走到山脚着实用了不少时间，却总不见村子的影子，待我们忍不住问还有多远时，村子已在脚下了。和穴居的先民一样，村里几乎全是窑洞，没几间房，站在崖背上当然看不到脚下的村落了。

给我们安排的住处也是窑洞，以前是喂牲口的，窑洞很高很大，能停放两辆汽车。窑洞里还留有喂牲口的槽，正好放我们的行李。进窑洞门右手边有一通大炕，勉强只能睡下四个人，于是又搭个铺，让我们中间的“领袖”住下。



故居——左面的大窑是男生的窝，右面的小窑是女生的闺阁

队长早就派了队上能干的媳妇擀好了面条等着我们，面条切得又细又长，我们惊叹不已，说是像过生日的寿面。这时那个一路上没见言语的女生小声说：“刚好今天是我的生日。”“10月31日？”大家有些不信，“是10月31日。”她不像是开玩笑。于是大家祝贺一番，她也很高兴在这个日子里这么多的人为她过生日，她此时更未料到十一年后她成为我的妻子。

后半晌大家就忙着收拾自己的窝。

山里黑得早，大王殿早就遮住了夕阳。晚饭后，在忽明忽暗的小油灯下，那位自诩为当然领袖的好事者叫我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段，念了几条，看样子是早有准备。他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带我们“认门坎”，访问贫下中农。待从几户社员家里出来，天更黑了，跌了几个跟头才摸回崖背。进了窑洞，点燃那盏小油灯，顿觉得亮多了。“领袖”借口要写东西端走了那盏油灯，趴在他那张单独搭起的铺上。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要写的东西不过是想把他的女朋友调来的报告。

无灯，看不成书，也睡不着觉，我又重新踱回院里，走道崖边张望。

从喧嚣不息、灯火辉煌的都市一下子跌到这静谧的山庄，足以使许多头脑发胀的人清醒了。我望着星光衬托下的大王殿，在夜色中它更像法老的坟墓，更加神秘而肃穆，犹如郭沫若《凤凰涅槃》里的丹穴山，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就好像带着“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的凤凰……，如今这“禽中的灵长”被军宣队、工宣队和自己建立的革委会拔光了翎毛，他们像炉中的烧饼，翻来覆去地被烤，不是当过“保皇”，就是当过“小反革命”，有的脸上刻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红字，……

“凤凰落架不如鸡”，但他们毕竟不是鸡，他们带着飞倦的身体，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衔着香木，为了自焚，也为了再生。——这恐怕就是我们自愿去农村的初衷。

我又回到窑里，在那飘忽不定的油灯光下，打开雄文四卷，从中找我缺乏的食粮……

—— 记下乡第一日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阿西，我怀念你

阿西在海南死去30年了，也许我是第一个为她写追念文章的人。1969年10月，我和阿西同批下乡到海南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分在同一个连队。她是我下乡后第一个室友。西西是只快乐的小鸟，我们那低矮的茅草房里，常飘着她的歌声和笑声。

那时我们为“建设海南、保卫海南”为“结束洋胶进口的历史”大面積的开荒种橡胶，不断与当地的黎苗族老乡发生土地纠纷，为缓和“军民关系”，我们连队办起文艺宣传队到黎苗寨演出，我是跳的，西是唱的，我俩似乎很合拍，但我和她共同语言不多，我内心把她归于小市民一类。我们虽然同届，但她比我大，据说留过级。她显然不象读书的料子，文学知识几乎是零，其他学科也不感兴趣，但对缝纫很内行，穿衣打扮绝对一流。

我们那时月薪只有28元，伙食去了10元，加上买生活用品等很难存钱。西西却比我会省钱，吃的也少，光伙食费就比我少3元。她用节省的钱买刚面世的“的确凉”布，自己剪裁做了好些合身别致的衣服，很显姑娘的身段。那时根本看不到头饰，西西居然用防寒的塑料薄膜剪了“白丝带”扎辫子，还帮我扎，拿镜子我照，可以想象，青春的脸蛋，两条齐肩短辫上扎着白蝴蝶结，真的增加了女孩的妩媚。可是我不敢扎，和大多女知青那样“不爱红装爱武装”，还是红卫兵打扮，甚至把衣袖裤脚卷起来（不堪回首）。可是西西，什么都敢穿敢戴，本来就长得俊，再经打扮，男生开始对她行注目礼。

记得那是70年夏天吧，大会战白热化，我们在原始森林劈山种胶异常艰难困苦。我抡锄头技术很差，可能因为不偷懒，加上喜欢写写画画，结果荣升副班长协助班长（原农场的老工人）做些文字、思想工作之类事情。本来就被看成有点资产阶级思想的阿西却显得怕苦怕累，总说这痛那痛，还说下午发低烧无力请假不出工，医务室又检查不出什么病。一次她又喊病时，我就摸她的额，可能烧的太低度，我感觉不出什么，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她装病。我们连队坐落在五指山下一个小盆地，茅房周围是一望无边的油棕林，我们除了开荒劳动，就在这片美丽的热带林子里没完没了的开会学习。那时候时兴“一帮一、一对红”，知青们分别结成对子在油棕林谈心（有的顺理成章成了恋人）。我和阿西不同班，但同一室住，我很天真的想和她结对子帮助她一下。一天晚饭后我和西在油棕林散步，就认真的问她到底真病假病？她急急分辨说“骗谁也不会骗你！”我想她知心朋友不多绝不骗我，所以信她。那些天，男青年X老跑来我们宿舍说很多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后来西西被X约出去很晚才回来，我

知道他们恋爱了。X是66年来的老知青（我们团前身是国营农场，有大批65、66年从广州下乡的社会青年，他们叫老青年。我们68年后来的叫新青年），只有小学文化，听说原是广州街头的小混混，模样奇丑，阿西和他一起，应了那句“鲜花插到牛屎堆”的话。其实他们走到一起也不奇怪，他们都是连队宣传队独唱的，歌唱得实在好，他们唱歌唱到一起了。加上X有社会经验，西很单纯，觉得和X一起很快乐，从X那里听到很多没听过的事情，她认定X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倒霉的是新、老青年都瞧不起X，阿西和X一起就更掉价了。我对阿西和X恋爱内心是不认可的，可是看她很快乐，很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我说不出反对的理由。

不久，我被调到团部搞新闻报道工作离开了连队，离开了阿西。几乎同时，她到场部医院证实患重病被送师部医院检查，后来又送海口市的兵团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肾癌，要做大手术切除了肿瘤。我是她与团部之间的联系人，很多信件通过我转给有关领导。我为她找组织申请困难补助，却久久得不到解决，原因是她家庭历史复杂（她父亲不知何故早死了），政策有规定不能补。补助对象也要划分成分？我很不平，找团长申述，团长曾是带兵模范，很有人情味，出面解决了，还利用到海口开会机会看望西。那段时间，X逃港去了，之前，西是知道的，她在最需要钱治病时还把自己的钱给了X做盘缠，还给我信请我借钱给X有急用。我不知道X用我们的钱去逃港，看在西的份上把身上的几十元存款都给了X，事后X就不知去向了。

阿西的手术用了8个小时，我当时没时间到海口陪她，幸好她妈妈和唯一的姐姐都在身边，她们都很穷，不可能长期守着她，手术完后就走了。她姐姐在Z市工作，准备把她接到Z市治疗。阿西伤口拆了线慢慢能走路后，医院给了她一个星期外出假期。她以为好了，很乐观的回了一次农场，她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我把她接到团部和我合铺住，同室俩个女同事有点避忌，但西西这么可怜，也不好说什么。可惜那时我不会也没条件给她弄什么好吃的，只是和她一起吃饭堂的，业余时间陪她走走聊聊，她已经很感激我了。她告诉我X逃港去了。我很生气，觉得他应该在她身边，但西一点没有怨恨X，她相信他真心爱她，或许对他寄予希望，对着这么个既患病又痴情的女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西西离开我后，去了Z市的医院继续治疗，因为恶化，又送回海口兵团医院。我利用探家机会到海口看她，一进病房，她同房的病友居然认出是我，原来她枕头旁边放着一本像集，里头有我的照片（红卫兵照片，因为她到兵团不久就患病，我还来不及给她农场的近照），大家经常看她的像集也就熟悉了我。她十分虚弱，已经不能起床，我看见她落形的模样，忍不住哭了，她见我哭，也就哭成一团，我那时医学知识实在很糟糕，也没找医生问问，不知道她已经接近生命尾声了，否则不知道会怎样哭着收场。那次见面，她突然说“X借你的钱他会还你的”我想她始终相信X，这样也许没那么痛苦，所以顺着说我知道，我也没想到要他还。我特别不想她提起她爱又无望的人，就提议一起翻看她宝贝的像集，那里头有她童年、少年和红卫兵时代的照片，真的很耐看，但这么一个美人胚子，却逃不出红颜薄命的命运，我们那次见面后不久，才20出头的她终于离开了人间。按她的遗愿，她心爱的像集也和她一起火化了，那里头也有我的照片。

阿西死后不久，团部有一支逃港不成被抓送回农场的队伍，他们集体办班，出入排队。有一个是某连的团支部书记，在靠近香港的海上被鲨鱼咬了屁股一口，不知怎样没死在海里被救活了，他也在这支队伍里一拐一拐的。一

天，我在拐子后面，发现了X那张奇丑的脸，我们四目相望，什么话也没说。我只是想起了阿西那张曾经青春美丽充满生气的笑脸。20多年过去了，我在知青聚会时听一个农友说X后来还是逃港成功了，现在是一个小老板，成家立业混得可以。还说他知道阿西死后大哭了一场，曾经想到海口找阿西的骨灰要帮她造墓。在后来一次知青聚会时，X从香港赶回来，人很多，我们还是没说上话，他给了香港的电话号码我。事后不久我出访途径香港，我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始终没给X打电话。返程经过香港时候，我终于拨通他家电话，我想证实他是否爱阿西。想告诉他阿西对他的痴情。他和我都是西西生命后期的朋友，但是我们的电话中还是没提这个话题。他再三请我喝茶，我谢绝了。我想西西已经远去，证实这个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真的深爱西西，我也不想提起这段往事。

当年十万知青到海南，有的因为山洪爆发、开荒爆破、各种工伤以及毒蜂蛰、毒蛇药、疟疾、疾病等原因死在海南，广州市一个副市长的儿子就死在海南。阿西只是其中一个。她到海南不久就匆匆而去了，连我也没弄清楚她家人在那里。我曾很后悔怀疑过她装病，曾把她列入小市民……。没给她更多的照顾。我还想如果她活着，也许和X幸福结合，也许她会在时装界有所作为……。可惜没有了也许。阿西，我怀念你。

写于2001年清明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忘不了那冬好大雪

过去，北京下一场齐小腿肚子深的雪，我就会大叫：“啊！好大的雪呀！”可是自从在内蒙古乌利亚斯泰草原插过队，我就不再认为那叫下雪了。与我插队的那地方一比，这只能叫作“下霜”。我在草原生活的第三个冬天，大雪封死了所有的道路，政府派了解放军的坦克为运送救灾物资开路，却被厚厚的雪障挡住，最后只好改用飞机空投。我们大队管理员巴图乌里吉一觉醒来，把一整铝壶茶喝光天还不见亮，直到出去撒尿的时候才发现整个房子被大雪埋在了下边，惊恐之余，只好打碎玻璃，用铁锹象旱獭子一样挖了一条隧道钻出地面。上述情节如有半点夸张，我是小狗！

我和弟弟在同一大队插队。我放马的冬牧场在大队最南端，而弟弟放羊的冬牧场却在最北头，中间相隔七十多里路。如果在夏天，这顶多是快马“一蹦子”的距离。可是在冬天，除了饿狼，几乎没有谁敢穿过它。

春节到了，我揪心扯肺地思念我那七十里外傻乎乎的弟弟，他现在脚上穿的是什么？有狐狸皮帽子戴吗？我也喝不下娜尔吉大嫂（当时我住在她家中）为我煮好的纯香的奶茶，不顾达布海大哥心急火燎的劝阻，执意要穿过浩瀚的雪原去和弟弟一起过春节。达布海长叹一声，撒开了我的马僵绳说：“兄弟好比筷子，分开就成了傻棍子。”娜尔吉为我匝紧了皮德勒的腰带，达布海又为我牵来他自己那匹最强壮的黄骠马。“马群离不开人，哥我不能送你去了。把这马也牵上，两匹马有个替换。一路沿着山梁走，山梁上的积雪薄；马到平川别撒欢，杵到旱獭子洞里你就人仰马翻；渴了不能吃雪，那东西越吃越渴；见了人家别进去，进去你就到不了弟弟那儿了。”原来，草原上有个风俗，春节期间大家都会骑着马挨着蒙古包去拜年。每当你走进一户人家，女主人便会尖起嗓子唱起劝酒歌，直到你接连喝下三杯浓烈的草原牌白酒才会放你出门。用达布海的话说，我是个闻闻酒就脸红，舔舔酒就坠鞍的人，万一喝了酒再上马，小命可就悬啦！

我确实是按达布海叮咛作的，一路绕着人家走，尽管我的鼻头都快冻掉，也没敢走进一座蒙古包。前半程总算顺利，除了有一次连人带马陷落在十几米深的雪窝里费了半个小时才爬出来外，没再遇上什么危险。可是就在夕阳斜照的时候，出事了！

当时我已经跨过了最后一道雪沟，几乎可以遥望到羊群的冬营盘了。兴奋使我忘记了达布海的第二项嘱咐，纵马飞奔了起来。倒是也没被旱獭子洞搞得我马失前蹄，可忽然在距我马头很近的德勒苏草窠里蹿出了一只肥大的野兔子。我骑着的雪青马和牵着的黄骠马都受了惊，一下子朝左右炸开，猝不及防的我被重重地拉坠于两马之间，仓

惶之中撒手了马缰，两匹马一溜烟地跑出了我的视野，可怜的我被孤零零地抛弃在茫茫的雪原上，就在这时候，暮色却悄悄地向我围拢过来……我一下子想起了去年冬天死在我们大队山沟里的那个外乡人，他就是因坐骑跑了而无非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活活冻死的。而且我也知道，现在在我的前方不再有人家了，我必需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走完剩下的二十里路程，然而身穿几十斤重的皮袍皮裤和毡疙瘩，要在没膝深的雪里跨越这段路程真叫人不敢想。

那段路是怎么走过去的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后的那几百米是手脚并用地爬过去的。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看见了弟弟蒙古包门窗发出的亮光。我挣扎着站起来，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弟弟和他另外几个知青跑了出来，他们把我背回蒙古包。在用雪搓我冻僵的双手的时候，傻弟弟只会哭着说：“哥，你疯啦！啊？你疯啦！”我也哭了，可我说：“新年好……”

没想到事情还没有完。

我的两匹马自离开我以后，在天快黑的时候跑回了家。这时，达布海大哥正在家中接待着附近来拜年的邻居。他的酒量从来就不象他吹嘘的那么好，这时早有了几分醉意。他听见动静摇摇晃晃出门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我的坐骑戴着马笼头，却不见了马鞍，更可怕的是它的腿上都是冻成冰溜的鲜血，事情过后他才知道那是马在挣脱倒挂在马肚下的马鞍时踢出的血，可当时他却被吓得酒也醒了几分，立刻上马，顺我走过的马蹄印追了上去。半路，他到路过的蒙古包打探是否有我落脚，却被热情的主人一次次地唱歌劝酒，最终，他醉倒在最后的那户人家。他不顾人家的劝阻，哭着闹着上马找我，但还没骑出多远就从马上翻了下来，被人家用牛皮条捆着硬搬回了蒙古包中。次日，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酒竟然还没有醒过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喝斥我：“早就跟你说了路上不能进人家吧？你就是不听嘛！怎么样？喝醉了吧？”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美丽的呼伦贝尔，神奇的大兴安岭

在北大荒插队的九年中，我曾五次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神奇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当民工修国防公路在加格达奇、在牙克石、在博克图、在黑山头，在莫尔道嘎都留下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足迹。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莫尔道嘎那一次，莫尔道嘎在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左旗，位于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大兴安岭山势浑圆，森林密布，山上长满了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树和各种乔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出没着东北虎、黑熊、狍子、野猪和各处马鹿、麋鹿、犴等动物。树枝上跳跃着松鼠、草丛里奔跑着野兔、天空中盘旋着苍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神奇的大兴安岭迷人而又安静。

那年五月我去莫尔道嘎修国防公路，因生产队的事耽搁了十几天，没有赶上和大队伍同行，在阿荣旗我独自一人带着行李搭上了一辆去莫尔道嘎修路的卡车。次日夕阳西下时才沿着颠簸的森林防火公路赶到莫尔道嘎的国防公路指挥部。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从这到图布新公社的修路连队还有将近二十里的林间小路，他们劝我在指挥部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到连队去。我赶路心切，再加上连队里有二十多位北京知青都是我平日熟悉的朋友，便匆匆忙忙告别了指挥部，按着他们指给我的方向，背着行李向连队方向赶去。

从指挥部到连队的路是在原始森林中由拖拉机和推土机从茂密的松树和白桦林中间推出的一条路，路上有拖拉机新翻起的土，有推土机连根推起的成排成排的松树和白桦树，这里是日后这条国防公路的路基线路。

路两旁长满了挺拔笔直、森严壁垒的小松树，茂密却多姿多彩的白桦树，在成排的幼树后面是参天蔽日的高大的樟子松，雄伟苍劲的红松，坡下是一条时隐时现的小河，流水湍急，河道弯曲。我原以为走走就到了，没想到天色越来越黑，连个人影都撞不到。幸好天边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一轮明月，使眼前的一切依稀可见。这时刮来阵阵夜风，松涛声、水声响成一片，我深一脚浅一脚扛着行李独自走在深山老林之中，心里越来越发毛，万一我们的连队的宿营地不在道边，我岂不是要糊里糊涂走一晚上，各种胡思乱想袭上心头。

大兴安岭里的动物霸王当属黑熊了，它有几百斤重，皮毛上蹭着松树渗出的松油，听说步枪子弹都很难击倒它，据说连东北虎都得让这傻大个黑熊几分。听旗里人讲，阿荣旗曾经有一位森林警察中队长，他是一位身材魁梧、性格彪悍的蒙古族汉子，骑马、打枪、格斗堪称高手。他多次打伤过黑熊，因此可能与黑熊结下了宿怨，一次他和几个战友去巡山，把战友丢在公路上，单人单骑下到河边查看，当他翻身下马，把马拴在河边树上，端枪巡视时，忽听身后一阵响动，待他回身时一头气势汹汹的大黑熊正在怒视着，两条后腿直立站在了他面前。他想端枪射击时，黑熊一巴掌打掉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另一巴掌将他重重击倒。远在公路上的森警们见状，纵马奔来救援时，森警队长的头已血肉模糊，惨死在他的战马旁，而那头黑熊却早已无影无踪。

我走在这条原始森林的弯曲小道上，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月亮像和我捉迷藏似的，忽而皓月当空，忽而躲到了云层中，眼前是黑压压的森林，沉沉的夜色和奔腾的水声，松涛声。我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在这个没有人的原始森林里喂了熊，或者碰上了那更让人恐怖的狼群，那不是太冤了吗？我也顾不上什么行李，把背包朝路边一扔，抄起路边一处工地沙坑里民工存放的铁锹，凭借这把铁锹壮着胆，深一脚浅一脚朝前摸去。在一个山坡转弯处，我忽然在风声中闻到一股乡村熟悉的烧柴飘出的炊烟味道，峰回路转我看到远处有灯光。经过了我独自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终于走到了连队，知青伙伴和一个大队的民工们兴高采烈的接待着我，有的人提着油灯、打着手电筒去路基上帮我找回行李，更有热心肠的人帮我去煮汤面，安排住宿，那一晚我感到有人群的地方真好。

筑路的生活十分艰辛，百十来号人住在用松木杆和苇席搭成的大工棚里，工棚里用木桩和木杆搭成两个通铺，铺上铺的是厚厚的干草，再放上苇席，席上铺着各自的行李。那时山里太凉，下雨时铺下面就花花地淌着水。为了怕腰受寒，我们还特意铺了豹子皮，豹子皮无论天多么寒冷，睡在它的皮毛上都是热呼呼的。大工棚里用废油桶当炉子生着火，松木杆子在火中燃烧散发着松脂的香味。我们每天的劳动是挖土方，用竹筐挑土，用独轮车推土。我那时干活十分玩命，又是大队委派的负责人，让别人干就得自己多干点。打眼放炮是修路时常干的活，点炮时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点十几个炮捻，那震天动地的炮声，那腾空而起山石落地时的场景似乎还在耳边、在眼前。我们这些知青修国防公路吃苦耐劳，能打硬仗在盟里和省里都出了名。那年我在莫尔道嘎修国防公路，被评为旗(县)里的先进，又被评为呼盟(专区)先进，当黑龙江省筑路指挥部让盟里总结我们的先进事迹时，一次突发性的知青同当地农民的打架，为我的先进成长匆匆忙忙划上了句号。

在莫尔道嘎修路时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就是在额尔古纳河游泳。美丽的额尔古纳河是中苏边境的界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公路基本建好，大部队撤走，留下我们少数人维修保养等待验收时，留守的人大都是一帮北京知

青，也许是领导觉得我们平常太辛苦，留下我们调养慰劳一下。

大家闲来无事，搭乘指挥部一辆卡车沿着我们新修的公路到额尔古纳右旗的黑山头镇去玩，汽车在新修好的平坦的沙石路上飞奔，路两边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乔木、灌木和各种野花争奇斗妍，时而在车上还能看到远处山坡上悠闲的鹿群和走起路来慢慢腾腾的黑熊。此时的大自然风光都是那么悠闲、恬静，望着亲手修的公路，一种劳动收获的快乐油然而升。

黑山头镇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北部，汽车驶出大森林在平坦的草原上奔驰。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肥草美，八月初的草原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成百上千的羊群牛群在草原上慢慢地游动。呼伦贝尔特有的蓝天像大海一样碧空万里，朵朵白云飘在草原上空千姿百态，层层叠叠，如诗如画，牧人在马背上挥动着套马杆，时而驱马追逐着我们的汽车，友好的朝着我们不停地招手。相隔很远才有的蒙古包和我们在大兴安岭林区看到的少数民族的木头房子都让人感到古朴而亲切。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多情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连同那块美丽的土地，让人心旷神怡。

黑山头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边境小镇，紧靠额尔古纳河。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也洗劫着这里，许多几代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躲回了苏联。黑山头还剩下不少中俄联姻家庭的后裔，当地人管俄罗斯人叫“老毛子”，“老毛子”同中国人结婚的后代们大都吸取了白种人、黄种人两个种族外貌的优点，他们的后代中，姑娘往往长得尤其漂亮。我们顺道走访了几家农户，看到房屋布置、习俗，许多是在昔日苏联电影中能够见到的。

那一次我们去黑山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看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又被我们指责为修正主义头目的苏联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额尔古纳河虽然宽阔，但对岸的苏联还是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对岸不高的小山，地形地貌、绿色的植被与我们脚下的中国没有什么两样，连对岸哨卡飘扬的红旗和游动的哨兵，行走的汽车都看得清清楚楚。按历史记载一、二百年前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对面大片国土都曾是中国领土，望着这一江东去的大河实在让人感慨。

感慨之余，下河游泳是我们此行的又一个目标，同行的十来个知青到奔流的河水旁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穿了个裤衩跳进了额尔古纳河。好久没游泳了，大兴安岭深山里的小河冰冷刺骨，洗澡都要十分咬牙，更不要说游泳了。那天额尔古纳河上又是一个喜庆的艳阳天，我在温暖的河水里忽而自游泳，忽而蛙泳，游着游着竟忘了时间和离岸的距离，等我从水里抬头一看时，坏了，我快游到对岸了，对岸的俄式木屋和四轮车都清晰可见。

在那个年月，苏联是修正主义，是敌人，登上对岸就是投敌叛国，那还了得。我来不及想赶紧往回游，但是往回游要比游向对岸时水的阻力大得多。原来额尔古纳河的主航道、即水的主流在不同的地方位置是不相同的，黑山头一带河的主航道恰恰在苏联一侧，因此朝对岸游深水处随波而动比较轻松，而想脱离水深的主航道游回水浅的中国就是一件费力的事了。我拚命的游着，在岸上看河并不宽，人在水里，举头一望四周波涛滚滚，河面显得那么宽，岸的距离显得那么远，我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为了不被水冲得太远，只能顶着水游，游了半天也没有觉得游出多远。额尔古纳河那次难忘的游泳经历使我尝到人在绝望中也需要咬牙挣扎。自由泳太累了，我改成蛙泳，怕迷失方向，我不敢再把头扎在水里，终于在被河水冲出很远的地方，我又从河里爬上了祖国的土地。若干年后，我随团中央的一个青年代表团漫步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我还想起在额尔古纳河中九死一生的那段经历。

不管我年轻时在那块黑土地上走过何等艰难坎坷的里程，我还是那么由衷地爱着我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爱着我神奇的大兴安岭。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罗唆江在此调头

凡是勐腊的插队知青，几乎都不会忘记1970年夏天在县城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或者义愤填膺，或者“一身正气”，应该还有逍遥的，应该还有惭愧的。很可惜，那一年我几乎都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追求着生活的充实。71年夏天，小勐仑也办过一次学习班，我赶上了。那时候流行办学习班，因为他老人家教道我们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解决。那次学习班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被临时封了一个小官，一个小组的两个组长之一，是正是副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的搭档，另一位组长，是邻近寨子的美女知青M。她给我带来了好心情，不然我也不会把那次学习班记得那么牢。大概是两个乡的与会者都集中在城子，公家管吃、管住、管工分，大部分时间是坐在竹楼里聊天，过程没有什么轰动的，却很惬意。

傍晚，男生们会去罗唆江边洗澡。尽管那时候的江水还是混的，洪峰刚刚过去，大水尚未退净。为了洗净酷暑，大伙儿几乎都下水了。之前，我早已习惯在罗唆江中穿梭，惯常劳动回来，会去游几个来回，不过那是在植物园吊桥下，那里江面较窄，旱季的时候江水清澈，水流也不太急。城子的江面看起来比新寨那一段宽多了，也许是因为江水在此调头，冲刷江岸的缘故。对于陌生的地质水文，我还是比较谨慎地只是在江边浸湿身子。也不知是谁，有事没事地起鬃，拽拽我说，游过去，游过去否拉！热血少年，最吃激将法，我随口答道，谁陪我一起游，我就游！说时迟，那时快，未等我的话音落下，只听得扑通一声，那边已经有人往江中去了！我忙不迭扑到水里，赶过去，几十米之后，靠近了，才看出是G。那时已经逐渐接近江心，突然我觉得自己游不动了，不是手脚没有力气划，而是任凭怎样划，不但没有向目的地靠近，反而更远了。真见鬼！难道我就要这样淌到老挝去？也许我该死了？虽然想到了死，但是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你知道当时我想到了谁？我想到了普希金。虽然全世界都为他惋惜，他却就是赌一口气，从从容容地走了，真是伟大的普希金。这样一想，反而冷静了，有对策了，大不了冲过城子这道湾，到曼安地界再说。于是就不再拼命求快，一边不紧不慢地向对岸划去，一边搜寻G的身影。嘿！他居然已经站定在水里，我怎么这么傻！我也竖起身子，站住了。其实此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主河道，我脚下踩的，在旱季时是应该高于水面的滩地，雨季水大，淹掉了。尽管江水在平缓的滩地上还是比较急，却只到大腿深了！也许是G比我熟悉水情，也许G的水性本来就比我好，他站在我的上游大约一百米处。好了，没事了，回去吧！我徒步

在深过膝盖的水中，向上游走去，直到留足提前量，才再次扑进刚才几乎威胁我性命的江水。有了刚才的经验，回程可以说是“胜似闲庭信步”。只是耽误了很多时间。

那天晚上好像还要学习什么。等我赶到会场，M已经在主持讨论，她肯定已经听说刚才的故事，以惯有的爽朗的笑声来迎接我的迟到，不知是嘲讽还是安慰，反正我是当补药吃了。别人也许不会知道，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怕死，临危不乱。这种心理素质陪伴了我此后的几十年，得益匪浅。人家说，死过一次的人，什么都不怕，确实是真的。

再次见到G已经是2006年，在加拿大回来的L宴请一些插队老朋友的餐会上。我倒忘了问他，还记得咱俩在城子横度啰唆江不？

岁月留痕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无华岁月追忆之一：

1966，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1966年9月23日，我默默望着西去列车的窗口……弹指一挥，廿载！

1985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信函寄到西北我所在单位，朋友们说，这次你该返城了！我也似乎意识到，该返城了！

祖父说，他人生的前二十年在故乡，后二十年在海外……我的人生或许也是漫漫二十年为一个周期！1986年8月，我终于坐在单程的东去列车上……我的农村户口也终于轮回到曾经生活、读书的城市。

又走过了人生的漫漫二十年，弹指到了2006年。我应该为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写一点纪念的文字了。

一 1966，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那一年我正读高三。5月毕业考试结束；6月中旬，仲夏，“高考制度”废除了。

6月初，《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之风盛行，学校是重灾区之一，批斗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邵淑惠先生是我的中学校长，其夫王金鼎是市级主管教育的领导，因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丈夫的“功劳”，自然有妻子一半，校长在劫难逃。学校文革前高考成绩是不错的，校长曾经以历届高考成绩自豪，这当然又成了文革开始后的主要罪证之一。批斗会上打倒校长和她丈夫的口号声，震耳欲聋。红墨水、蓝墨水，从眼镜片上流下来，拳脚加在她单薄的身上。

批斗老师也愈演愈烈。老教师们大多是解放前大学生，很少有成分好的。数学老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小姐，沥青之类涂抹到被剃光了的头上。语文老师上课曾经涂脂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思想，需要好好改造！她被逼迫到学校楼房二三层间外墙、一砖多宽窄的地方走一遭，浑身打颤……

又有传来消息，市一所男子中学批斗老师够水平，学生们立即去取经。偌大的操场好像在吊丧，若干长长的白色魂幡在晃动，幡下也是一片白色，“牛鬼蛇神”们穿着丧服，敲着锣，转着圈，一片乌烟瘴气。真让人望而生

畏。红色恐怖，“革命”风暴，席卷天地。这样，我所在中学被认为批斗力度不够——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是不能温良恭俭让的！

红卫兵冲出学校、涌上街头，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批斗也接二连三降临到同学们父母身上。一位同学父亲是铁匠，公私合营以前有个小铁铺。是不是有一两个小伙计，我不清楚，反正是有个小门脸，楼上住家人，她兄弟姊妹10几个。小私有者在那时候等同剥削者，他们的家什，被红卫兵从楼上窗口抛了下来，堆放到十字路口正当，又被点燃，纸簿被认为是“变天帐”！大火熊熊。同学的长辈们，都被逼迫跪到箠拔作响的火堆旁，满面通红，几乎烤出油来！那一幕我刻骨铭心。

另一位同学。父亲是小资方，那时只要公私合营以后拿利息的，都是资本家，哪怕拿一盒纸烟钱的利息！同学的父亲老实巴交，红卫兵找不出他的任何罪状，就成了“反动”资本家的陪斗。批斗会很多，陪斗也很频繁，他胆战心惊，难以禁受耻辱和煎熬。在一次批斗会之前，悬梁了！那时候，自杀就是抗拒革命，灾祸又降临到同学母亲头上，母亲没有了工作，一家四口失去经济来源。不仅如此，剃头、扫街，没完没了的体力、精神折磨……当同学的母亲故去的时候，同学也因病住院，母亲病故的噩耗传来，她不顾一切从医院奔跑回家，晕倒在另一张床上，被伤心欲绝的同学们抬回医院。后来，这位同学也离我们而去了，是班里第一个离去的。她学习曾经很出色……

我所在中学校舍，曾经是民国要人曹锟在天津的府邸。气派的三楼一底西式洋楼，（在唐山大地震后不复存在了，我竟然没有留下学校全景照片。）文革开始以后，地下室就成了“黑五类”写检查的地方。我的罪状是父亲在国外，在国外的罪名一律是“投敌叛国”。检查一遍，又一遍，被认为不深刻，不彻底。怎么深刻呢，在国外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背叛祖国，投敌叛国！似乎是科学的等量替代，不知道合乎什么逻辑学。每天从早到晚，只能做一件事，写检查，写检查！学校一次次组织全校同学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没有资格；到全国各地串联，也是不可能的。我十几岁的心灵，不知道曾经承受多么大的压力！阴森森的地下室，写不完的翻过来倒过去的检查，要上纲上线！万般无奈，我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父亲在国外，不可能被揪斗了。我十分担心母亲，怕她像同学父母一样惨遭劫难。然而天佑母亲。母亲所在工厂前身，是广东人开的贸易行，招收的大部分是老广，几乎家家有海外关系。母亲又不是资方，所以，没有像我一样写检查。从科室干部下放到“要害部门”食堂劳动！

8月26日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9月18日，由市一中等16所学校在体育场召开揭发市委大会。19日传来消息，万晓塘书记自杀身亡，有花圈悼念。据说是服安眠药，死在澡盆中。（文革后的材料说万书记是因心脏病暴发猝死。）

1966年夏秋，白色恐怖达到极致。

在十二分抑郁中，同班同学告诉我，某区正在报名去兵团，她可以替我办手续；我心动了，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上山下乡，学生们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年轻人火热的心，支援边疆，“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有的主要是因为政审不过关，前一年中考、高考落第，上山下乡算是一条出路。有的是被“动员”，日以继夜，三番五

次，熬不过去，等等。我又是一种情况，在地下室写检查，无日无月，无休无止，实在忍无可忍了！

去兵团，我政审不合格，也不敢过问办的细情，总觉得自己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怯怯的、惴惴的，似乎是落荒而逃。这种担心在上车之前、上车之后，以致最初到西北的日子里一直持续着。退城市户口的时候，万般无奈的母亲，没有说什么。

即将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城市，前一天晚上，我独自来到城市的母亲河——海河边。看着倒映在水中的几点惨淡灯光，思绪随着脉脉的流水，跑得好远好远。

我怀念读了六年书的母校和高中三年所在班级。我的班级，自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的高三三班是女生重点班，全面发展，样样争先，各级奖状挂满一面墙壁，大家的心太齐了。记得学校操场不大，每次上体育课，都排队到附近的体育场去。几百米路程，不需要喊口令，后边的同学随着前面同学脚步，齐刷刷地走到体育场，曾经投来多少赞许的目光。如果高考制度不废除，又会如何呢……甚至高中毕业都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合影……（在改革开放中，母校再次振兴了！2000年，50周年校庆，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老校长来了”！“老校长来了”！随着礼堂爆满的欢呼声，白发苍苍的老校长，在学生们的搀扶下，款步走到师生们中间，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招手，学生们高举鲜花跑上前去，校庆的热烈气氛鼎沸。望着熬过劫难，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我真是百感交集。又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班中不少同学文革后又上了大学，而且不乏成绩卓著者，这都是后话。）

快乐的童年、幸福的少年，一切，一切，都好像那么遥远了。远得好像是幽暗的河水尽头，远得好像是苍穹神秘莫测的星星。面临自己的将是什么，茫然无知。生活会是很艰苦的吧，不论如何，肉体的恐怕比精神的容易熬过吧。

第二天，1966年仲秋的一天，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把自己的肉体连同灵魂一起放逐了……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无华岁月追忆之二：

涉水

江河是流动的神灵，多少城市依江河而建，多少乡村有溪流淌过。

有一条是我们涉过的河，河西走廊酒泉的TL河。它由祁连山的雪水汇成，在一望无际的鹅卵石上流淌而过。

1966年9月底，我来到酒泉边湾农场，当时河滨已经有了冰凌。在我年轻的心里，TL河有宽阔的河床，但多数是干涸的。有时，潺潺地淌着小股溪流，波光粼粼，很恬静，很温柔。我没有见过它充溢的情景。

初到西北，粮食定量不少，每月40斤。不知道是劳动强度大，还是饮用水PH值大于7，洗涮了肚肠中的油水。其实，肚肠中本来没有什么油水可言。开荒回来，两个四两的大馒头，三两口吞到肚子里，全然忘记了是什么滋味，反正总是饥肠辘辘。亲人们有时寄来全国粮票，那上边是“带油的”。故乡亲人们把粮本的口粮，换成全国通用粮票，除了单位开具证明外，还要交回供应的一定比例油票。食油，每人每月供应多少，四两～半斤？我记不清了。记得那时城市里买定量的肉，总是盼望买到肥膘的。炼点油，留着用；油渣，还可以炒菜。在副食店里卖肉，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排着拥挤的队伍，翘首企盼的一块肥肉，眼巴巴地到了别人的篮子里，椎心顿足。城里人们体重也大多小于标准。全国粮票非常珍贵，手里有五斤八斤，宝贝似的。

于是，大家想办法节约定量。办法之一，是大礼拜（不是今天的概念，而是一旬或两旬休息一天）的时候进城去。那一天，可以不动用“饭卡”，省下一斤多口粮，留待平日享用。城里有沙枣，有崩豆（炒熟的蚕豆）之类。沙枣叶银绿色，串串黄色小花，像用刀雕琢出来似的，馥郁醉人。“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你一束沙枣花！……”多么美好，多么浪漫，曾经唤起年轻人多少美妙想象。沙枣有红枣核儿一般大小，酸、甜、涩交融，一般以涩味为主的，吃在嘴里，好像铁锯拉钢材，铁锯冷涩，钢材凝绝。蚕豆，在知青们没有光顾以前，小城里是很少有人以货币交易的，听说曾经三分钱一斤。鸡蛋也是有的，一斤全国粮票三

个。到小城里，嚼一通崩豆，买两布袋沙枣，一天口粮就省下了。小城对知青们是有魅力的！

从农场到小城往返约20华里，要淌过TL河。从冬季到春季，已经往返穿行几次了，每次蹦蹦跳跳、说说笑笑地，也不觉得有多远，有时候还在河床上捡拾几块漂亮的大小鹅卵石。

第二年夏秋之交，我们几个姑娘，有后来嫁到青岛的小刘，有返回T城的小袁、小潘等。一大早，便欢快地上路了。天空湛蓝湛蓝，姑娘们天性乐观爽朗，又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心情格外舒畅。“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唱着连队刚刚教过的歌曲，穿过小路，跨越田埂，不知不觉，来到了河边。

手拎着鞋，下到河里，融化的雪水冰凉冰凉，大家叫喊着，忍受着，为买沙枣、崩豆，河水总是要淌过去的！也没在意河面变宽，更不懂得“秋水时至”了。水没膝了，还行，仍然是，喊着，叫着，淌着。水漫过臀部了，很快，水齐腰了！忽然感到，摇摇晃晃，找不到重心，站不稳了。不好！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意识，我们可能被雪水冲走，会有生命危险！大家惊呼着，心动在加速，呼吸在急促，头脑在发蒙，感觉在混乱！沙枣、蹦豆诱人的美味，烟消云散。

我是其中年龄大的，没想到“团结就是力量”什么的，只是生命本能，急中生智，拼命地喊：“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手来！”河水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我们左右相邻，前后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但是同时向一方倾斜，谁也抓不着谁！“快拉起来！”“快！”“快！”我几乎声嘶力竭了。不拉起来就要没命了，我一边惊惶着，一边和靠左边的小刘抓到了一起！这时我想去拉右边的小袁，小刘想去迎左边的小潘，我一边牢牢拉住小刘，一边撕破了嗓子呼喊，“先拉住小袁！先拉住小袁！”她当时那样纤弱，体重不足80斤！我们顺着汹涌的水流，急忙去抓摇摇晃晃，面向着我们的小袁，三个人终于拉在一起了！我们又一起趑趄趑趄，逆水流去接小潘，她正高高舞动着双手，跌跌撞撞，“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四个人，终于抓到一起了！然而，河水汤汤，波涛汹涌，随时可能把我们冲散。“拉紧！拉紧！”我们和针砭筋骨的激流抗争着，搏击者，我们互相之间，本能地紧紧抓在一起，紧紧地！只有紧紧地，才能保存性命！我们一起拖着沉重的身体，紧张地，艰难地，向对岸方向挪动，挪动……我们大脑一片空白，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如何，不知道我们能否活着淌过河去！

脚下的水似乎浅了一些，从腰部又退到臀部，身体的倾斜度也在减小，心动没有继续加速。我们拼尽全力，努力向对岸挪动着脚步，挪动着脚步，水位又回落了！惊呆，转而清醒，转而恐惧，转而发晕，转而乏力，河水终于没有能够吞噬我们？！

然而，就是在那一天，就是在那条TL河上，小沙兄弟被河水吞噬了！永远地消失了体温，永远地消逝了音容笑貌！

在回程的路上，我们碰到急急火火赶来的知青们，他们说小沙出事了！正在寻找尸体！看着他们焦急万分的样

子，我们双腿发软，几乎支撑不住身体！难道会是真的吗？去年，我们坐一列火车，一同从几千里之外的T城“支边”；一年来，我们同在一块土地上垦荒，流汗；昨天我们还同吃一口大锅里的饭菜，我们还商量过明年春节回家探望双亲，他怎么就匆匆离去了呢？难道会是真的吗？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啊！你怎生这样绝情！落得大家两泪涟涟！

小沙是在进城路上被河水吞没的。小兄弟啊，你为什么一个人进城啊？你的伙伴们呢？你也像我们一样，不懂得河水是变化莫测的吗？你也是去买沙枣、崩豆的吗？你是小伙子啊，应该比我们姑娘有力气啊！你一定没有吃早饭！

小宋是最后一个返回T城的知青，临走之前又去祭奠了小沙，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同龄人，一位同乡！小宋在知青们给他竖起的石碑前祈祷，祈祷小沙兄弟的白骨在戈壁安息，祈祷他的灵魂月夜得以归还故里。小宋写了祭文，算是对沙君坟茔最后的告慰。

那次进城令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我第一次遇到了扒手。进城带了几元钱，记不得了，2~3元吧（每月工资27元，除去饭费，生活必需品费用，所剩无几）。我们当时穿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旧军装，不分男女，普遍肥大，少女们的纤纤胴体，一股脑儿包裹在褪了色的绿色里面。脚上穿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大头鞋，一只就有斤把重吧。衣服有上口袋，我的钱放在左上口袋里，没有注意扣扣。买沙枣还在，待到买崩豆时，不见了踪影，我急得一遍遍摸口袋，没有奇迹出现！我不愿意再把这样倒霉的事情，告诉被河水惊吓、刚刚快活起来的伙伴们。只是自己心中空荡荡的，大脑一直被困扰着，什么时候，谁，偷去了我的钱？伙伴问我为什么不买崩豆，我痴痴地，摇摇头说：不想吃。大家莫名其妙，进趟城不容易啊！总应该填饱肚子，还要带回去一些才是啊。

在那样不寻常的月岁，我曾经丢过一点钱，估计一元多。我的上衣口袋被翻过了，扒手偷了些许钱，以至我没有买成崩豆！想到这些，心里总是苦涩涩的。

T L河，我唯一涉过的河流，它是大地上一条极普通的河，是留在记忆中，让我迷惘、困惑，永远不能解读的一条河。

远足

那是上山下乡后第三个月。

因为想家，有人神经错乱了，记得小李坐在旧式吉普上，眼睛痴呆呆的，嘴里不时吐着一个字：“家！”“家！”吉普着开走了，我也不知道开到哪里，和小李就这样分别了。望着翻卷尘土遮掩着越跑越远

的汽车，有的伙伴心碎了，也有的羡慕，甚至是嫉妒，他或许是佯装的吧。然而，还有谁能想出如此妙计，瞒天过海；又有谁能再装一次呢。

因为环境恶劣，女孩子们想起家来集体哭号，哭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因为缺少淡水，洗澡是奢望；甚至，两个多月，汗茧擦茧汗，也没能擦擦身。大家身上开始痒痒了，“怕是长虱子了”！有经验的聪明女孩子呼喊着的，胆大的女孩子在油灯下翻找着。胆小的便挤成一团，远远地躲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想看，不敢看，终究没敢看！（没想到坐失良机，一辈子也没机会看了！）指导员也闻讯赶来，平静地安慰大家说，那是“革命虫”！大家不论身上多么奇痒，立即得到了莫大的精神力量！

从T市坐三天四夜火车，来到河西走廊酒泉附近的边湾农场，太多太多的闻所未闻，太多太多的不寒而栗。

农场坐落在盐碱滩上。三个月来，挖渠垦荒，劳动竞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当时。谁也未曾想过，靠这样的灵魂承受力蛮干，盐碱地是不可能变成良田的。

前面开荒，后面荒凉，大家做着永无休止的修理地球的无用功。但是，只要连长按时把“开荒”亩数上报，就可以每人领到27元月薪，啃着颜色驳杂的饽饽，吃着冻白菜……农场的盐碱地之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了。

垦荒间隙，常常空虚无聊地纵目天边，一直望到地平线。似乎有一些建筑，虚虚幻幻，影影绰绰，后来知道那就是“海市蜃楼”。但是，在命运的游丝飘忽不定的年月，茫然加木然，虚幻的奇景，不能用来填充空空荡荡的心。浪漫，是需要心境，需要闲情逸致的。所以，从来没有因为海市的出现，欢呼雀跃过。何况，灰白单调的视野中，多了一些虚虚恍恍深深浅浅无生命的几何图形，现在想起来，也不能引起激情。

然而，实实在在的建筑也是有的，那就是嘉峪关市炼钢厂（酒钢）高低错落的大烟囱。隐隐约约，既然可望，就一定可即。天性单纯的姑娘们，三分浪漫七分遐想。年青人毕竟太年轻，臆想只习惯构造美妙的事情，最容易忘记忧伤和烦恼。

大家决计利用难得的“大礼拜日”，远足一次。去嘉峪关，去钢厂，玩耍一通，猎猎新奇，那里毕竟是故事书中描写过，令人神往的地方。我们策划着，背着水，带上干粮，拿着从家里带来的口琴、竹笛上路了。我们哪里会用眼睛丈量戈壁滩，大脑中也未曾闪念过，从边湾到嘉峪关是尽吾辈之体力也难以到达的地方啊！

一上路便欢天喜地的，漫无边际的戈壁像青春的心田汪洋恣肆。一群大大小小的羊由远而近，牧童拿着鞭子，反穿羊皮，一脸懵懂。羊群也是一脸懵懂，听到口琴声，驻足呆呆地望着我们，好一会儿，忽然头羊带领着继续跑了起来。有的羊毛斑驳，裸露着红白的皮，显得羸弱不堪。牧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羊群吃什么，戈壁不是草原，有的只是稀稀拉拉的芨芨草和骆驼刺啊！我们一边议论着，一边似乎在炫耀自己，洋洋得意，口琴吹得更起劲

了。后来知道，离农场不太远，有裕固族村落，以畜牧业为生，喝奶茶，烧牛粪。稀稀落落白杨树，也是有的。但是，没有伞字华盖，树形像残缺的鸡毛掸子，直立的树干，枝叶东一撮，西一撮，实在是不匀称的。那是根系在地下顽强地苦苦挣扎，显示出来的不朽生命力。这是后话。

走啊，走啊，远处的建筑并没有见大，也不明白为什么。反正是水喝完了，干粮吃光了，身体疲惫了。忽然，呼啦啦，飞起一只苍鹰，姑娘们吃了一惊。记忆中永远留下了那一幕：枯骨！在单调的日光下，在灰白的戈壁卵石之上，显出分明的白色，长长的，大大的。胫骨？股骨？不知道，没有看到头骨。记得茅盾先生写过戈壁滩驼马的枯骨，不太像。因为旁边还留下了黑糊糊的织物残片，部分白骨被遮掩着，一定还残留着少量干肉，吸引着高飞的苍鹰，我们毛骨悚然，哪敢近观！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了！是什么人，为什么抛尸戈壁，不知道，也不敢想。再走下去，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不知道。傻乎乎的姑娘们，在一阵紧张之后还是执著地往前走。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

回去，还不甘心；不回去，在苍天和大地形成的广袤世界，只有思维和体力近乎枯竭的我们几个，举步维艰。

真是天佑啊！远处一辆卡车，在自然形成搓板似的戈壁路上颠簸。汽车竟然朝我们开过来了！根本没有想到好人、歹人，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没有。如果不是老天长眼，也许我们早被卖到哪里的山沟野坳里去了（那个时代还不太兴干这种事情）。司机下来了，问明情况，温和地把我们训斥了一顿，上车吧，我拉你们去，下午再把你们接回来。汽车在铺满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搓板路行驶，尽管颠簸，尽管干渴，尽管由于车速，掀起了阵阵沙尘，大家又说笑起来，似乎疲劳顿消，乐不可支。

汽车把我们带到嘉峪关城，钢铁公司离我们下车的地方还很远，不可能去，嘉峪关市留下的印象淡淡的。多是灰白的平顶小房子，有一个百货公司，有陈旧的大城市清仓商品。那个时候，大城市商场也是萧萧条条不红火的。喝够了大碗茶，嚼了一通棕色的水果糖。干粮是不可能补充的，没有粮票。嘉峪关城楼，不在市内，不知道如何去，原先的勃勃雄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早早地呆呆地无聊地疲惫不堪沉默不语无精打采地坐在叔叔指定地方的路边，等待，等待。

令我们又兴奋起来的，是叔叔几乎是按时来接我们了！……

啊！如果那位叔叔还在人世，如果电台的真情节目肯出力，真想再见一见那位叔叔，当时三四十岁，模样记不清了，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善良的心地。

关于那次远足，极力追忆，清晰的就是这些。

写给四十年的纪念

无华岁月追忆之三：

“胃亏肉”

古代史学家说，“民以食为天”。孔老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说过：食无求饱。我想“无求饱”，是不要追求十分奢华的意思吧。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在囊中羞涩的时候，是不写文章的，要先解决果腹的问题。当下时兴的七八分饱，是肚子有了油水之后的养生之道。吃饱撑的会生病，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

那个年月全国都用肉票，大西北的知青们更是肉以稀为贵了！记忆中有鲜肉吃只是逢年过节。平日有时候死牲口，先死后杀改善伙食。死骆驼，死牛死羊什么的，有的是出意外，有的是冬春季节困乏死了，拿到食堂大锅一炖，香味也非同寻常。死肉大多没有油水，干巴巴如柴草，一人一份，不仅充饥，也算难得的美味。

记得隆冬的一天，我扛着铁锹下工，捡到了一只死猫头鹰。那时的牲口圈，一层粪盖一层土，到一定时候起圈，挖出的粪土在墙洞外堆成一个个小丘。我忽然看见粪土堆上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啊，是一只死猫头鹰，冻得硬梆梆。迟疑刹那，拿回了宿舍。正饥不可耐，又久违了动物蛋白，于是三下五除二，开膛，拔毛，放点酱油膏煮了。没有香味，也不腐臭，但毕竟是肉，于是装进了辘辘的饥肠中！因为是冻僵的，没待低等动物分赃便先轮到了我。当时也没想它是怎么死的，冻死的？不会吧。一定是先病死，后冻僵的。也许还是什么SARS之类，但我煮沸消毒了，无甚大碍。不过，今天想起来，总有些羞赧。

我吃过刺猬。那是冬天挖沙子，挖着挖着，一只正在酣眠的可怜刺猬，命落我们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拨刺猬皮，针针丛集，不知道怎么下手，怎么剥皮。没有经验，来不及研究，又迫不及待，皮上的嫩肉委实弄不干净，于是把皮连同肉星一起放到炉子里燎了一下。记得刺猬肉的颜色比其它肉浅，肉不多，没吃出什么特别，反正是尝到久违的肉鲜味了。

惊心动魄冒险吃肉，有那么两次。

胃亏肉得慌！连平时在家不喜食肉的女孩子，也坐立不安起来。听说附近老乡死了一只猪，患绦虫病，被埋葬了。消息传来，知青们涎水欲滴！磋商，预谋，行动！终于等到夜晚，月明星稀，几个胆大的男知青提着马灯，拿着铁锹出发了。老乡村落距离连队十来里路，肉使肉差，一路急行军！白天已经有人踩过点，埋死猪之处很快被发现。先是用锹，三下两下，有人忙说，别伤着肉。于是，几个人蹲下去用手扒，猪腿抓着了，连拉带扯，死猪被缴获了。连背带扛弄回连队。四盏马灯明晃晃，刮毛开膛切皮，红肉竟然镶嵌着大密度白色米粒——绦虫卵——听说随血液到眼中会失明的，大家因胆怯而失望。猪油没事的，有的说。高见！实在是高！

那时候，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两油。记得一次劳动休息，大家找到一个废弃的旧仓库方便，小M眼睛一扫，发现墙角有一口残破的油缸，缸底还有残留的封尘油状物，一闻是煤油。小M有些失望，但是还不甘心，用火柴把煤油点燃了，待一阵呛人的煤油味过后，继续冒出的油烟便有一种诱惑力了。是胡麻油，小M判断。是谁在离开仓库前搞了恶作剧，大家不得而知。总之，那次方便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头死猪的油太少了，大家在猪皮下剪的剪，割的割，绝没有解牛的庖丁利落，但也总算聚集了一小撮。烧柴炼油！……有人急忙拿来洗好的玻璃罐头瓶，匆匆倒油，叭！瓶子破裂，瓶底落地了。眼见喷香喷香的热油毫不犹豫地钻入硬邦邦的大地中，大家手忙脚乱，惊慌失措，万般无奈！“还有油没有倒完呢”！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转悲为喜，破涕为笑，围着锅台坐下来。在闪闪的油灯下，拿来饽饽，蘸的蘸，擦的擦，狼吞虎咽，打扫干净。挖猪尸畅快地过了把荤腥瘾，肠胃的润滑剂得到了些许弥补，“乌拉！”大家吃美了，兴奋得把消息灵通的兄弟举了起来！

有了那次经验，大家开始注意地下食物了。“烽火台”又传来消息，畜牧连死了一匹马，埋葬在了红柳滩。这次行动是在碧空骄阳的正午。待马尸部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看是蒙古儿马，个头不算大。还好消息及时，再加上天不算热，马尸没有腐烂。马毕竟是大牲口，抬回去太麻烦，便开始就地享用了。大家割着马腿肉，原本生性倔强猛烈的儿马，任我们摆布，百依百顺！砍来红柳枝，可惜太湿，半天沤烟不见火星，大家呛得咳嗽的咳嗽，流泪的流泪。于是又四下里寻觅，找来些枯梭梭柴，割来些干芨芨草。马肉终于被扔到熊熊烈火堆中。不一会儿带着藏刀的兄弟便给大家切割马肉了，好像现在五分熟的牛排。肉是不少，精瘦精瘦，毕竟可以充饥，一阵狂嚼猛咽，欲罢不能，直到有点恶心为止！

今天想起来赧然的是，我们差点吃了耗子。不记得是谁，又是怎么抓到了几只耗子。产粮食的地方养耗子，而且多得出奇。每年打麦子，翻到垛底，最可怕的就是耗子乱窜，女知青紧张得吱哇乱叫。一次一只大耗子钻进了大L的裤腿，钻到几层裤子之间，耗子进退维艰，她不知所措，只是大声叫喊，叫得脸变了色，声音变了调……耗子又特别大。有人闲来无事作实验玩，拿来一口大缸，把一只猫（不是21世纪的宠物猫）和两只耗子放进去，猫让两只大耗子吓得团团转。有一种“沟耗子”个头特别大，不仅地道战，而且神兵天降。

几只耗子烤熟了，几个人围着炉子，看着烤得没了皮毛黑乎乎乖乖的耗子。当然，烧烤就是为了吃。吃不吃呢，犹豫不决。如果真吃，我第一个，当仁不让。大家七嘴八舌，吃，怕万一出毛病；不吃，或许还是美味，毕竟再没有别的可以解馋的了。好半天，最后还是不主张吃的占了上风，实施吃耗子的计划，宣告流产。若干年来想起这事，并不觉得恶心；就是不明白，当初要是吃了，会如何呢？可能好吃，吃了也没什么事，还增加了猎奇的谈资；也可能，不然……

在西北听说祁连山老乡吃旱獭得鼠疫的事，当时气氛很紧张，好像叫01号病。以前只听说过水獭皮值钱，不知道有旱獭。听说那家伙几十斤重，圆滚滚，油嘟嘟，我们要是有机会吃，是不会错过的。那次鼠疫事件，是旱獭本身带鼠疫病毒呢，还是旱獭吃了有病的耗子呢？不得而知，看来野生动物传播致命病毒，是由来已久的了。

老鼠是鼠的通称，《诗经》中的硕鼠，也应从属于老鼠家族，解释为大田鼠。

那是一次秋灌前巡堤，我们在大堤阳面坡发现了一个小洞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必须堵塞、夯实。一锹下去，竟然发现了一个萨氏微型地下宫殿！地道蜿蜒，粮食满仓，真是深挖洞，广积粮！蚕豆，竟然有两麻袋之多！发黄变绿，一股霉味，我们是无缘受用了。研究结果，硕鼠所为。

我所见过的大硕鼠，体重不过半斤八两，竟然储备了两麻袋蚕豆，不能不令人叹服！后来窥探到硕鼠辛勤劳动的过程。硕鼠灵巧地爬到豆株上，咬开豆荚，一口含4、5颗蚕豆，偷偷摸摸跑回地道卸货，周而复始。从4、5颗到两麻袋，好家伙，这是多少硕鼠，多长时间的战果啊！为生计，它们也真辛劳呀。

造物主创造了子鼠一族，它们也是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吧。

硕鼠硕鼠，无食我菽！

再说说上天赏赐的佳肴吧。一次进城回来往住地走，我贪走近道，走小路要过几条沟。一个傍晚，独自一人，那时并不安全，难免紧张。正过一条沟，呼啦啦，飞起一只大鹰，我惊魂落定之后，看到沟里有一只黄褐色大野兔，腿被鹰啄伤，留着鲜血，行动不便，哈哈！我像女侠，纵身沟中。然而，不是拯救兔子，是拯救自己，天下第一可宝贵的是人，而胃又是五脏之母啊。我乘兔之危，居鹰之功，得到战利品，一掂量，总有三斤以上。沉甸甸，鲜活活。在那个年月，真比得上满汉全席！！扒皮，开膛。不可能煎炒烹炸，只有加酱油膏煮熟，香气醉人，与朋友共，大快朵颐，脍炙人口，杯盘狼籍，余味袅袅。

吃黄羊肉。那是一次放水，到了夏天总要干这种活计。祁连山雪水融化以后，从干渠到支渠，汹涌澎湃，一直流到条田间的小渠道，水量用大小闸门控制。我和另外几个知青正守在一个较大的闸口，说时迟那时快，一只被雪水冲刷下来的大黄羊，好健壮的家伙，一下子横在闸口上，守株待到了大兔子！欣喜若狂，是上天要酬劳久违动物蛋白的我们吧！“大黄羊”！附近放水的伙伴们闻讯赶来，手舞足蹈，惊喜万分。男生拿来冬天烤拖拉机油箱的喷

灯烧羊毛，女生再把燎过毛的黑乎乎羊皮，泡在水里刮干净。洗羊下水，先用碱水泡，然后慢慢刮净肚儿内的黑膜。我得到一大块肉，没有蘑菇，否则就是碧野《天山景物记》中的情景了，却也鲜嫩无比。那只可怜的黄羊，不知道被雪水呛死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它的故乡在哪里！野生动物自投罗网，这是我们光明磊落的一次解馋。

吃了“山肴”，该说几句“野蕨”了。我们不仅亏肉，什么吃的都亏。

1970年离开边湾农场的盐碱滩，到了土地不贫瘠的下河清，只要有水浇地，便可以种植瓜果蔬菜。说到吃瓜果蔬菜，我们的行为算不上光明正大。从玉米刚开始成熟起，每次收工偷偷摘一两个，藏起来；看到生长中的豆子也是如此。夜间在果园放水，第一年的葡萄，很少很小，不管酸甜，凡是拿马灯照到，通通摘了往嘴里送。给果树打药，看到青杏也吃一通。在食堂帮厨，腌萝卜干，边削边吃，大冯竟敢连皮吃！也不觉得胃里难受。在菜地收洋白菜，砍完菜，小孙几个把根挖出来啃啃吃掉。给菜地放水，有地黄瓜（不是长在架子上的那种），到水渠里好歹洗洗泥，啃得好香。生土豆、茄子、西葫芦什么的，大都吃过。

“偷瓜”，想起来忍俊不禁。那是第一年种瓜，种瓜的差不多都是男生。一天半夜，寂寂三更，我们正在熟睡。忽地，有清脆的敲门声，我们惊醒。听到悄悄的叫门声，“开门，西瓜”，听口音是在附近瓜地放水的三排小王他们，我们开了门。只见几个男生，把两麻袋西瓜，叽里咕噜往我们床底下滚，我们欣喜若狂。男生们又赶回去放水，当夜没吃。我们辗转反侧，梦中都是香甜的西瓜。第二天，知青们聚在一起，锁上门，享受“劳动果实”。剖开一个一看，哎呀，生的！再剖一个，又是白子白瓢的！……两麻袋西瓜，十有八九是生瓜蛋！大家哭笑不得。小王他们连忙解释说：“我们摸的瓜都是最大的！”生瓜，也吃一通！……要不夜半辛劳都成了无用功！

这不算是偷瓜吧，都是自家种的呀！只是没得到上级批准罢了。

又想起在探亲的火车上（四年一次探亲假），遇到新疆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说说笑笑。待到吃饭的时候，人家拿出白馒头，我们吃的是黄棕色饽饽。又听说是新疆清仓扫库的陈年玉米磨的面，小莹等几个年龄小的忍不住大哭起来。天可怜见！

哎！“吃”的话题真不轻松啊！

“民以食为天”，我们知青亏“食”啊！

无华岁月追忆之四:

婚后的知青生活

到西北所在的第一个连队，就数我们四个同学年龄最大，都是女性。兄弟们平均比我们小三四岁，没有过感情问题。四年后，到了第二个连队，异性大多年龄合适，但是，对儿已经配得差不多了，也没有过什么感情问题。这时候，同学开始在兵团外面找对象。也有人给我介绍，就谈上了。就我俩当时水平（受过传统教育，又正值文革），其实都不会谈恋爱。见几次面（请假进城不易，一半个月见一次面吧），通几封信，客观条件过得去。买点糖，喝点茶，婚礼就举行完了。婚后，丈夫在县城，我在农场。我成了“没有扎根兵团一辈子思想”的“飞鸽牌”。

婚后生活，一个字：难！

怀孕了，难！

害口，呕吐，我靠喝黄花菜汤熬过来。丈夫单位离我不近，捱摸到我想吃的东西，个把月送来一次。丈夫刚走几天，又没有想吃的东西了。干农活时，我发现水渠边开着黄花，鲜嫩嫩，黄灿灿，就摘了一些。黄花次第开，我陆续摘。下工回来，疲惫不堪，倒头就睡，待缓过劲来，用煤油炉煮锅汤喝。一直不腻黄花菜汤。（后来才知道，鲜黄花菜直接煮熟吃是有害的。）想起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我生产的儿子像小萝卜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不论如何，鲜黄花菜曾经维持过我们母子两条性命。

干农活，没帮手，难！

妊娠反应。上下工路上，扛着铁锹呕吐一阵走一阵。要完成规定的生产定额，“飞鸽牌”就更没商量。秋收割麦子，心动过速。连队卫生员是很有同情心的，只要心动每分钟达到100次，就可以休病假。我一觉得心慌，就悄悄看着手表数心动，就怕心动只有99！

一次夜班放水，我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拿着铁锹，身子不便，一脚陷进泥里。待爬起来，身上又是泥又是水。

只是委屈只是想哭。回到宿舍一头倒在铺上。舍友们看着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劝我说，今晚咱不去了，就是算旷工也不去了。大家心疼我，可是，我胆子小，从来没有旷工过。挨一顿训，滋味也不好受。我换了衣服，提着马灯，扛着铁锹，又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生产，难！

故乡只有母亲和小我七岁的妹妹。小小年龄的妹妹，怕我在兵团生孩子出意外，竟然想出妙计，给我发了一封“母病危”的电报。母亲有高血压，当时，又再没有其他便捷的通讯方法，接电报后，我完全相信了。也正是我的紧张神情，连长相信是实情，准我假了。

想起知青在兵团生孩子出意外的事情。当时团里11个连队，在我怀孕的前前后后，陆续有三个知青怀了双胞胎，本来是多么欢天喜地的事情啊！可是，两个知青的双胞胎都没待出生，就夭折了。另一个顺利生下龙凤胎，女儿却先天肢体残疾。其中一位双胞胎夭折的知青，怀孕8个多月时，我们见过面。她为将要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而骄傲，可是谁曾想到，以后会出现那样的事情呢？我们不在一个连队，后来只知道两个孩子都死了。再次见面，我回避那撕心裂肺的事情，不知道那夭折的孩子们，是男，是女？！

另一位知青，怀的是一对儿子，也八个月了，因缺氧窒息而死。孩子们在腹中停止呼吸几天以后，还是引产不下来，又拉到县城医院。她丈夫公出，还不知道噩耗，我们几个知青陪伴着她。爷爷奶奶给两个孙儿寄的衣物，早早运到了！可怜知青老人，可怜知青父母心啊！

还有一位好友，生孩子大出血，20来岁就摘除子宫，大半辈子没离开药罐。

.....

接到妹妹的电报，我连忙坐两趟长途汽车，倒两次火车往家赶。一路上往最坏处想，不知还能否见母亲一面。紧张紧张进了家门，母亲竟然安然无恙，笑容满面！弄清原委，还是从心里感激妹妹的。到了生产的日子，丈夫远在几千里之外，没有探亲假，不能回来！我情况不佳，妈妈妹妹把我送进了最好的医院。

我家到医院没有合适的公共汽车，当时也不可能有其他交通工具。记得那晚，妈妈妹妹回家给我做饭，我宫缩愈来愈紧，到了生孩子的时候，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妈妈妹妹不骑车，做饭、送饭，一次往返，最少半天。记得我生产完，大夫、护士高声喊，某某床的家属是谁？！我当时顾不上自己伤痛，只是怕家属不在，抱错了孩子！

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亲人在身边，往往是最坚毅，生命力最顽强的时候！

该回兵团了，难！

一个人，带着幼儿，没有母乳，没有卧铺，娘俩一个座位。我还好强，不愿意临座旅客看到孩子便溺厌

烦……就这样，几天几夜！

我终于带着三个月的孩子回到了连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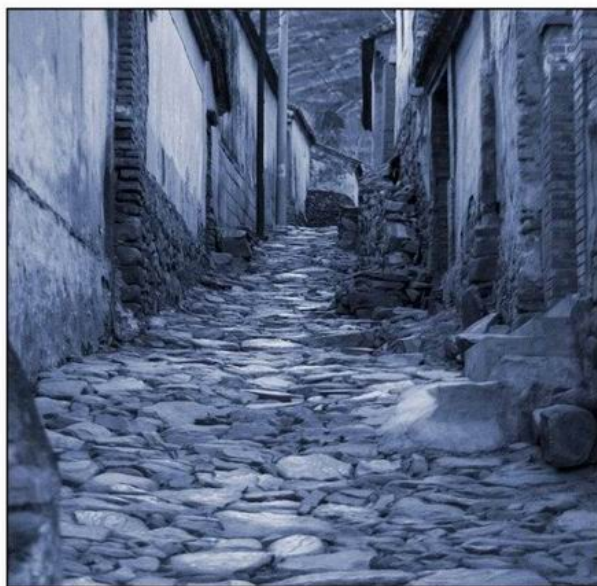
写给四十年的纪念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无华岁月追忆之五：

我的知青生活之最

我被老鼠嗑过。

成家以后，夫妻分居，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连队。

我和孩子住的屋子，挨着连队粮库，大老鼠横行。土坯房屋，老鼠洞白天堵上，到了夜里，老鼠又畅通无阻了。早晨起来，老鼠挖洞刨出的土，好大一堆！

一个冬天的夜里，大老鼠上了我的床，把我嗑了！

一阵撕撕拉拉的疼痛，疲乏的我，猛然惊醒，身子一动，“扑通”一声，意识告诉我：我被老鼠嗑了！（以前、以后，大老鼠多少次上过我的床，不得而知！）急急忙忙摸着火柴，点上煤油灯，照照床上、地下，大老鼠尝过鲜逃匿了，洞口还隐约露着一点晃动的向我示威的尾巴！我惊恐万分，又急急忙忙照照孩子，还在酣睡，安然无恙！想起刚才孩子是睡在我的臂腕里，没被老鼠嗑着，真是万幸！！再用油灯照照自己的手，右手中指骨节处被老鼠嗑破了，正留着鲜血！！我的第一反应是：老鼠是会传染鼠疫的！我浑身打颤，不知所措，只是紧紧掐着手指伤口处，在屋子里转磨磨。

窗外，一片漆黑，悄然无声，除了夜游的黄鼠狼、老鼠之类，什么都睡着。我不愿意惊动劳动了一整天的左邻右舍，自己又无计可施！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一种被深深摔入深渊的感觉！还是紧紧掐着手，转了好一阵，绝望！

就这样，惊恐着，转着；转着，惊恐着。忽然瞥见了墙洞（那是我的“食品柜”）的盐罐，盐是可以消毒的吧！山穷水尽疑无路，万般无奈中的我，想出了唯一办法，拿盐水洗涤伤口！我的左手抓了盐，弄了盐水，给右手清洗着，清洗着。边洗，边泪如泉涌。

那个老鼠嗑过的伤口果然没有恶化，大概也是我的抵抗力比较强吧。但是很长时间才痊愈。伤痕，返城好几年

才慢慢消失。

那些日子，同连队一个复员军人的小女孩子，被老鼠咬过后，伤口感染，死了。

都不是鼠疫，我们连队的老鼠都是健康的。

更令我难忘的是孩子在连队出了麻疹！

孩子在红柳条筐里度着童年。

我们去劳动，孩子放到“托儿所”，看孩子的多是当地干部家属。家属们坐在土炕上闲聊，哪个孩子哭闹得厉害，就抱一抱。孩子们大多被放到靠着两面墙一个挨一个的红柳条筐里。红柳条筐，用几根废钢筋固定在土地上，钢筋长出筐半尺左右（砸不下去，也没人掐断），孩子很容易伤着。每天上工一离开孩子，最担心的就是那根根凸起的钢筋，尤其害怕伤着孩子眼睛，都快神经质了，只有祈祷上帝保佑！

孩子们站在筐里，玩累了，就一屁股坐下。家属们也轮流把把孩子们尿尿，但弄到筐里的也不少。过一段时间，把筐拿到水渠里刷刷，筐下肥沃泥土不知道是否挖走换换。真不如现今养的宠物啊！

孩子们妈妈最害怕的还是传染病。没有预防接种，水痘、腮腺炎，甚至黄疸肝炎，无一逃脱！最恐怖的是出麻疹了。

我的孩子出麻疹了！传染我孩子的孩子已经死掉了，我紧张得脑壳要爆炸！！

那年隆冬的一天，知青小吴的母亲带着他们三岁的孩子，从z城返回连队。祖孙二人到来时，两位知青赶任务还没回来。当时通讯不便捷，小两口也不知道老人何时到来。大家关系都不错，我把一老一小接到房中，招待一下，直到小吴他们回来。没几天，那知青的孩子高烧、出了麻疹。不久，并发脑水肿、肺水肿死了，一家人茅舍无烟，抢呼欲绝。

这时，我10个多月的孩子开始发高烧，也出了麻疹！孩子从小没有母乳吃，体质本来就很弱。怎么办？当时没有办法及时告诉城里的丈夫，下一代的性命全攥在我一个人手上！在连队顺利出麻疹？不可想象！我说过那时候的居住条件，屋子里虽然有火炉，但是，只是半边有热气。粮库没人居住，那半边墙撒气漏风，怎么烧火，屋子也不热。数九寒天，那半面墙总是有冰霜。在这样的温度中出麻疹，后果恐怖得不堪设想！带着孩子离开，进城去找丈夫？冰天雪地，到长途车站好几公里，怎么办？滴水成冰的室外，正在高烧出麻疹的弱小孩子，如何禁受得了！我抱着孩子，痛苦焦虑万分，一颗母亲的心，几乎支离破碎了！不走吧，那个知青可怜的孩子，又浮现在我面前！等死！走？怎么走？！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只是想呼天喊地！天地也，拿个主意，快快帮我抉择吧！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呜呼！余之及于死也！

我终于决定带孩子走了，进城找丈夫，进城去县医院。知青们纷纷赶来。马车夫小李说，我赶马车送你们到长途车站！就这样，我把孩子裹紧上路了。知青们焦虑地目送我们的马车驶出连队。

进了城，我抱着孩子找到丈夫，我们没有回家，径直进了县城医院。已经有轻微并发症，立即输液！几天几夜，孩子难受得火烧火燎，好像有一只魔爪，不停地抓着孩子的心，撕着孩子的肝，孩子痛苦得一刻也不安稳。我和丈夫一刻也不放手，轮流抱着孩子输液，几天几夜过去，孩子终于脱离危险了！

差不多是30年前的事情了，每每回忆起来，都禁不住热泪！进城的抉择，小李的马车，救了孩子一条性命！

快周岁的时候，孩子痊愈了，纤弱的小手扶着床边，晃晃悠悠，要学走路了。

十分感激护送我的知青马车夫小李。他来自T城郊区，和我同龄，没来连队之前就结婚了，后来老婆带着好几个孩子也来到连队，生活更拮据一些。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把一些生活用品送给了他们。

孩子性命危如累卵，这是我知青生活的第二个“之最”。

那时候，家乡的亲人们不在身边，知青们年龄都不大，都是父母的孩子，真是孩子们互相救助啊！如果没有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们互相帮助，精神上，身体上，生活上更不可想象！

记得初到兵团，劳动强度大，很不适应，我一连几天食欲不振。终于一天夜里先是冷颤，后是发了高烧，头痛，浑身痛。睡在一个通铺的伙伴们，给我烧开水，端来漂着葱花的病号面汤。挨着我的小杜用凉毛巾给我敷头，又用双手给我搓头。她比我小三岁，才16，但焦急得双眉紧蹙！直到后半夜，看我出了些汗，退了些烧，才肯去休息。那一夜，永生难忘啊！

大田劳动，我向来笨拙。比我小两三岁的知青王排长经常帮助我！在完成他自己的定额后，帮我堵住水渠决口，修好大小田埂，托完盖房子的土坯……小丁任连队卫生员，应该比我小一两岁，劳动和大家干在一起。哪个女孩子到了不方便的日子，她格外照顾；谁的手被镰刀砍伤了，她立即包扎好；谁头疼脑热、肠胃不适，她端着热水，眼看着服下常用药……甚至，小张长了一头黄水疮，在她的精心护理下痊愈了！后来小张光秃秃的头，竟然生长出浓密乌黑的“秀发”！

互相帮助，情同手足，现在想起来，都是人间至情啊！没有丝毫索取的想法！自然的，普通的，平常的，编织着悠悠情谊，患难之交的诚挚，真是可歌可泣啊！

我的亲密伙伴

在河西走廊，我曾经有两个亲密伙伴，在田地里干活的铁锹，在屋子里照明的煤油灯。

西北最初四年，在盐碱荒滩度过。后面开荒前面荒，没有收获，所用农具，唯一的，就是铁锹。

拖拉机的轰鸣声唤醒了沉睡亿万年的处女地。在掀翻了的盐碱滩上，打埂、修渠、灌水、播种，落寞处女领地上的垦荒便拉开了帷幕。种子发芽，似癞疮头，稀稀拉拉，寥寥无几。有了几何图形的盐碱滩便又昏睡过去，继续它亘古不变的不毛之地。在这周而复始的打埂、修渠中，日日相伴我的，是一把木柄铁头锹。

如今令我十分惊诧并无比欣慰的是，十几位知青寻找过去的足迹，刚刚从当年的农场回来，兴奋告诉我：那里水位下降了，盐碱褪去了，时代的钟声唤醒了沉醉千古的荒滩，收获着粮食，成熟着硕果。这是后话。

锹把是白蜡树干，那上边曾经有过我的斑斑血迹。原本稚嫩的双手，在与木本的高频率摩擦中，打起串串血泡；血泡隆起了，又凹陷了，流出粘稠血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灵与肉的较量之后，终于形成了指掌间非天然的保护层——老茧。锹柄造就的老茧怜恤着我，年复一年地体贴、关爱着我，直至回城后好几年，才悄然下岗。

锹头本是迟钝金属，在与土地的反反复复切切磋磋，琢琢磨磨之后，渐渐变得锋利了，原本“心”形锹头，磨去了心尖。那锹，我行走的时候在肩头，休息的时候在地头，下工回来在门后头。西北天明比中原地区晚一个时辰，冬日之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也能摸到铁锹位置，抓住锹把，绰将起来，奔向工地。后来请朋友加工了锹把，上端变得细一些，扁一些，更顺手一些。那上边继续渲染的，是我的汗，我的油，从而变得光滑起来；又渐渐改变了本色，酷似西北高原紫外线频繁直射下我的深棕色皮肤。开始欣赏我的锹把，爱怜我的锹头。下工路上，用我被盐碱侵蚀开裂的手，抓把芨芨草，把锹头擦得锃光瓦亮。我木刻似的脸上，洋溢着笑意，以我的亲密伙伴为自豪。

四年以后，大迁徙了，开始有了收获。镰刀始终用不好，我那亲密无间的伙伴，仍然是默契的伙计——老相识的铁锹。

我的另一位亲密伙伴，是屋子里照明的煤油灯。

离开灯火通明的城市，告别爱迪生发明了一百年的白炽灯，照明的便是小小煤油灯盏了。没有当今咖啡厅烛光的神秘，也没有一分青春的浪漫。

亲密的伙伴煤油灯，伴着我品尝过苦辣酸甜。

难忘煤油灯下使我心悸的一幕。

起初的几个月，十几个女孩挤在一张通铺上。生活用水奇缺，虽说天寒地冻，与天斗与地斗，也少不了几身臭汗，告别了洗澡，脱胎换骨。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汗成茧，虱子生焉！那千奇百怪罕见的害虫，被宽慰地说成革命虫，无论如何，我只是不寒而栗！十几个人的衣服，统统聚集煤油灯下，胆大的女孩子在翻检着，寻觅着……

难忘我曾经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铁笔刻钢板，一笔笔，一划划，一行行，一版版。一版两千来字，密密麻麻，一刻4年，没葬送了我的视力，天佑！搞搞宣传，编排小报，用精力脑力，对我来说，比下大田，强煞！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然而，那煤油灯下的美差，后来还是于我无缘了。

七十年代初，到了下河清农场，煤油灯还是陪伴着我。

难忘那恐怖悚然刻骨铭心的深夜。手指一阵撕裂般疼痛，从梦中惊醒，习惯地擦着火柴，点上床头煤油灯，恢复我的视力。左手举着的煤油灯照着我的右手，判断自己被老鼠嗑了。举灯四顾，举步维艰，黢黢黑，茫茫然。终于，照到了墙洞，我那放什物的地方，照到了盐巴！煤油灯急促的火焰跳动着，我抖抖地，用盐水洗了伤口……

放水，用的是马灯，也是燃煤油，灯罩坚固一些，有了提手。夜晚放水，我一手扛铁锹，一手提马灯。在渠堤，在田埂，马灯照着我的脚，一前一后地走，形影相吊。遇到堤岸决口的险情，放下马灯，绰起铁锹。然而那次，马灯恍恍惚惚，终于没有看清脚下凹凸的路！陷到冰冷泥泞中，忍受着彻骨，忍受着寒心，拖着一条连泥带水的腿！

也难忘煤油灯带给我的温馨。下工回来，点上油灯，拨亮灯捻，小屋子便弥漫了幽暗的、然而暖色柔和的光泽。喝上两碗热疙瘩汤，也熨帖，也舒心，也惬意。如果有远方的信函、包裹，便是节日了。看信，回信，把我那伙计，煤油灯罩，擦了又擦。包裹中有酱油膏，卫生纸，肥皂粉，线手套，白砂糖，或许还有一两听罐头！捧着亲人的温暖，嗅着包裹的馨香，酣然入睡，梦乡中飞鸿又一次到来。

……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七八年上学离开农场的时候，相依相伴多年的亲密伙伴没有相随。它们失去了生气，失去了色彩，茕茕孑立，孤苦无依……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如今，它们——我的亲密伙伴——铁锹和煤油灯，飘零沦落在何方？

无华岁月之七：

夜路

城市之夜，不眠之夜。马路旁汞弧灯、霓虹灯闪烁，厅堂里荧光灯、白炽灯亮丽，汽车上方向灯、尾灯炫耀……千千万万光点、光线、光束，在聚合，在交错，在重叠。人在行，车在跑，灯在流。如今走夜路，是沐浴在灯火的海洋中，翱翔在光明的世界里。然而，记忆中总有挥之不去的，黑暗的，令我恐怖的——夜路。

到西北兵团，最初四年在秦荒陇滩凄凉地。那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月。知青们的任务是和盐碱滩斗。翻地，打埂，挖渠，灌水。然而，或许盐碱滩不喜欢陌生年轻人的摆布，或许知青们与荒滩搏斗不得法，反正是前面开荒后面荒，盐碱滩总是非常吝啬，我行我素；知青们总是收获寥寥，一筹莫展。

团部要搞刊物，写稿子，刻钢板，油墨印刷……知青中高中生不多，我踏实肯吃苦，便“以农工代干”到了团部。主要任务是了解各连队“好人好事”，写稿广播，编印小报。年轻的心，沸腾的血，原始的奴化教育，相信榜样的力量，相信精神原子弹取代物质基础，唯心取代唯物，野蛮取代文明……我也没有能够跳出愚弄和被愚弄的怪圈，似乎深埋于地下，借断裂的罅隙，苟延残喘着。

团部几乎地处全团中心，十几个连队各有领地，分布在团部周围。各连队距离团部十来华里。我常常扛着铁锹来到连队，跟大家一起劳动，一起说说笑笑，从中了解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下工饭后还常常开个座谈会（今天看来或许都是荒唐可笑的）……等到返回团部时，常常是漆黑得不见五指了。

于是我，十九岁的女孩，一个人走夜路，千般无奈，万不得已。那时候西北大部分农村没有通电，七十年代前后，陪伴我们的一直是油灯。走夜路的时候，从来没有奢望过路灯。从连队的煤油灯土坯房走出来，不久瞳孔便适应，视力便恢复，呈现在眼前的便是开阔灰白土路，单调冷清地蜿蜒着，蜿蜒着。路旁或许有寥寥、孱弱，然而抗拒盐碱的白杨、红柳，或者沙枣树。天有朗有阴，月有圆有缺，树木或清晰或模糊，或孑立或簇拥。月明星稀，乌

雀南飞，开朗的我本来可以尽情插上想象的翅膀，驰骋思绪的野马，如同今日旅游，把面前的山陵、熔岩想象出若干个美好故事，若干种有生命的实物。可是，四周悄静，只有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脚步，自己衣服的摩擦声，我时常大脑抑制，精神紧张非常。

盐碱荒滩的地貌，既不是平原，也不是丘陵。平地旁可能有数米立土，似高大的城墙，也可能有天公劈下的深涧，如断裂的地表。因为少雨，那立土，那深涧，似乎是永恒的。我在立土旁深涧上的土道匆匆赶路，四围空旷，黝黑黝黑。形影相吊，没有人，没有好人，似乎也没有坏人（后来还是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案件），我却总是觉得有什么人在追赶，一步步紧紧地追赶着我！我走得飞快，脚不点地，常常恐惧得浑身湿淋淋，汗流浹背。

因为地势低洼，沟壑深涧中，不知何年何月开始，形成一条无名小河。河水在深谷中流淌，我在立土高坡行走，河水脉脉，陪伴着我。

西北9月底就上冻了，小河两岸常常有或大或小或薄或厚的冰层，或是悬浮于水上或是与水面一体。若是白天，形状各异的冰凌，或许会引起知青们几分浪漫遐想；然而，在墨黑的夜晚，那冰层就成了我恐怖的发源地。四周悄静得只有足底和大地的磨擦声，这时不知道那块冰凌禁受不住自身重量突然断裂，短暂而意外，千奇百怪，刺激耳鼓，挑动神经、使我惊惶，使我战栗。

我一个人，匆匆地赶路，如同巴金《灯》中所说的赶夜路人。但是，我绝没有《灯》中赶夜路人那样幸运，我不可能看见灯光。因此，我不会感到安慰，感到鼓舞，感到温暖；我的心不可能安定，我的呼吸不可能顺畅，我的脚步也不可能从容。在赶夜路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曾经生活过的温馨故居，并没有想到城市夜晚令人炫目的灯火；我企盼的只是快快回到土坯小屋的油灯光亮之中。

不知道在哪一刻，因为温度，或是因为流水，或是因为自身重量，那冰层又断裂了。倏地，“咔嚓——咔嚓——”！在四周寂然无声的时候，在我全身心紧张赶夜路没有意料的时候，那声音迸发出来；我便是以为遇到什么意外，遇到什么不测，我便是毛骨悚然，我便是一身冷汗！待我清醒过来，辨析明白，并不觉得自己好笑，只不过神经得到些许松弛，心悸得到些许调整，我又匆匆地赶路了。

走夜路的时候，铁锹是扛在肩上的。冷不防听到响动，那铁锹似乎成了唯一自我防卫的家伙，下意识地从我肩滑落到我双手中，做出战士拼刺刀的架势。如果真有不测，我防卫得了吗？从来没有想过。

记忆中冰层破裂声并不常有；然而，越是偶然，我越是无法习惯——那种在暗夜，在我一个人赶夜路时，忽然发出的“咔嚓”声音。

偶尔也闻过远处传来的一两声野狼嚎，团部的小高告诉我，她曾经遇到过狼，我没有。毕竟知青们大队人马到来，搅乱了曾经肆无忌惮称霸一方野狼们的酣梦……

路灯是不可能有的，自行车是不可能有的，伙伴是不可能有的。然而，当一个人，在没有朋友陪伴，在没有强者保护的时候，勇敢和坚毅，常常能够超越躯体本身。

最初到西北的四年时间里，从团部到连队的夜路，我不知道走过多少次。直到随着“战备值班部队”的成立，我没有资格再“以农工代干”，直到我随着大队人马迁徙到另一个曾经的劳改农场。

在五颜六色彩灯辉煌的大城市之夜徜徉，脑中闪过西北走夜路的情境，不由得浑身一阵发冷；断裂冰层发出的悚然刺耳之声，似乎还隐隐回响在我的耳畔……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无华岁月追忆之五：

我的知青生活之最

我被老鼠嗑过。

成家以后，夫妻分居，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连队。

我和孩子住的屋子，挨着连队粮库，大老鼠横行。土坯房屋，老鼠洞白天堵上，到了夜里，老鼠又畅通无阻了。早晨起来，老鼠挖洞刨出的土，好大一堆！

一个冬天的夜里，大老鼠上了我的床，把我嗑了！

一阵撕撕拉拉的疼痛，疲乏的我，猛然惊醒，身子一动，“扑通”一声，意识告诉我：我被老鼠嗑了！（以前、以后，大老鼠多少次上过我的床，不得而知！）急急忙忙摸着火柴，点上煤油灯，照照床上、地下，大老鼠尝过鲜逃匿了，洞口还隐约露着一点晃动的向我示威的尾巴！我惊恐万分，又急急忙忙照照孩子，还在酣睡，安然无恙！想起刚才孩子是睡在我的臂腕里，没被老鼠嗑着，真是万幸！！再用油灯照照自己的手，右手中指骨节处被老鼠嗑破了，正留着鲜血！！我的第一反应是：老鼠是会传染鼠疫的！我浑身打颤，不知所措，只是紧紧掐着手指伤口处，在屋子里转磨磨。

窗外，一片漆黑，悄然无声，除了夜游的黄鼠狼、老鼠之类，什么都睡着。我不愿意惊动劳动了一整天的左邻右舍，自己又无计可施！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一种被深深摔入深渊的感觉！还是紧紧掐着手，转了好一阵，绝望！

就这样，惊恐着，转着；转着，惊恐着。忽然瞥见了墙洞（那是我的“食品柜”）的盐罐，盐是可以消毒的吧！山穷水尽疑无路，万般无奈中的我，想出了唯一办法，拿盐水洗涤伤口！我的左手抓了盐，弄了盐水，给右手清洗着，清洗着。边洗，边泪如泉涌。

那个老鼠嗑过的伤口果然没有恶化，大概也是我的抵抗力比较强吧。但是很长时间才痊愈。伤痕，返城好几年

才慢慢消失。

那些日子，同连队一个复员军人的小女孩子，被老鼠咬过后，伤口感染，死了。

都不是鼠疫，我们连队的老鼠都是健康的。

更令我难忘的是孩子在连队出了麻疹！

孩子在红柳条筐里度着童年。

我们去劳动，孩子放到“托儿所”，看孩子的多是当地干部家属。家属们坐在土炕上闲聊，哪个孩子哭闹得厉害，就抱一抱。孩子们大多被放到靠着两面墙一个挨一个的红柳条筐里。红柳条筐，用几根废钢筋固定在土地上，钢筋长出筐半尺左右（砸不下去，也没人掐断），孩子很容易伤着。每天上工一离开孩子，最担心的就是那根根凸起的钢筋，尤其害怕伤着孩子眼睛，都快神经质了，只有祈祷上帝保佑！

孩子们站在筐里，玩累了，就一屁股坐下。家属们也轮流把把孩子们尿尿，但弄到筐里的也不少。过一段时间，把筐拿到水渠里刷刷，筐下肥沃泥土不知道是否挖走换换。真不如现今养的宠物啊！

孩子们妈妈最害怕的还是传染病。没有预防接种，水痘、腮腺炎，甚至黄疸肝炎，无一逃脱！最恐怖的是出麻疹了。

我的孩子出麻疹了！传染我孩子的孩子已经死掉了，我紧张得脑壳要爆炸！！

那年隆冬的一天，知青小吴的母亲带着他们三岁的孩子，从z城返回连队。祖孙二人到来时，两位知青赶任务还没回来。当时通讯不便捷，小两口也不知道老人何时到来。大家关系都不错，我把一老一小接到房中，招待一下，直到小吴他们回来。没几天，那知青的孩子高烧、出了麻疹。不久，并发脑水肿、肺水肿死了，一家人茅舍无烟，抢呼欲绝。

这时，我10个多月的孩子开始发高烧，也出了麻疹！孩子从小没有母乳吃，体质本来就很弱。怎么办？当时没有办法及时告诉城里的丈夫，下一代的性命全攥在我一个人手上！在连队顺利出麻疹？不可想象！我说过那时候的居住条件，屋子里虽然有火炉，但是，只是半边有热气。粮库没人居住，那半边墙撒气漏风，怎么烧火，屋子也不热。数九寒天，那半面墙总是有冰霜。在这样的温度中出麻疹，后果恐怖得不堪设想！带着孩子离开，进城去找丈夫？冰天雪地，到长途车站好几公里，怎么办？滴水成冰的室外，正在高烧出麻疹的弱小孩子，如何禁受得了！我抱着孩子，痛苦焦虑万分，一颗母亲的心，几乎支离破碎了！不走吧，那个知青可怜的孩子，又浮现在我面前！等死！走？怎么走？！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只是想呼天喊地！天地也，拿个主意，快快帮我抉择吧！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呜呼！余之及于死也！

我终于决定带孩子走了，进城找丈夫，进城去县医院。知青们纷纷赶来。马车夫小李说，我赶马车送你们到长途车站！就这样，我把孩子裹紧上路了。知青们焦虑地目送我们的马车驶出连队。

进了城，我抱着孩子找到丈夫，我们没有回家，径直进了县城医院。已经有轻微并发症，立即输液！几天几夜，孩子难受得火烧火燎，好像有一只魔爪，不停地抓着孩子的心，撕着孩子的肝，孩子痛苦得一刻也不安稳。我和丈夫一刻也不放手，轮流抱着孩子输液，几天几夜过去，孩子终于脱离危险了！

差不多是30年前的事情了，每每回忆起来，都禁不住热泪！进城的抉择，小李的马车，救了孩子一条性命！

快周岁的时候，孩子痊愈了，纤弱的小手扶着床边，晃晃悠悠，要学走路了。

十分感激护送我的知青马车夫小李。他来自T城郊区，和我同龄，没来连队之前就结婚了，后来老婆带着好几个孩子也来到连队，生活更拮据一些。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把一些生活用品送给了他们。

孩子性命危如累卵，这是我知青生活的第二个“之最”。

那时候，家乡的亲人们不在身边，知青们年龄都不大，都是父母的孩子，真是孩子们互相救助啊！如果没有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们互相帮助，精神上，身体上，生活上更不可想象！

记得初到兵团，劳动强度大，很不适应，我一连几天食欲不振。终于一天夜里先是冷颤，后是发了高烧，头痛，浑身痛。睡在一个通铺的伙伴们，给我烧开水，端来漂着葱花的病号面汤。挨着我的小杜用凉毛巾给我敷头，又用双手给我搓头。她比我小三岁，才16，但焦急得双眉紧蹙！直到后半夜，看我出了些汗，退了些烧，才肯去休息。那一夜，永生难忘啊！

大田劳动，我向来笨拙。比我小两三岁的知青王排长经常帮助我！在完成他自己的定额后，帮我堵住水渠决口，修好大小田埂，托完盖房子的土坯……小丁任连队卫生员，应该比我小一两岁，劳动和大家干在一起。哪个女孩子到了不方便的日子，她格外照顾；谁的手被镰刀砍伤了，她立即包扎好；谁头疼脑热、肠胃不适，她端着热水，眼看着服下常用药……甚至，小张长了一头黄水疮，在她的精心护理下痊愈了！后来小张光秃秃的头，竟然生长出浓密乌黑的“秀发”！

互相帮助，情同手足，现在想起来，都是人间至情啊！没有丝毫索取的想法！自然的，普通的，平常的，编织着悠悠情谊，患难之交的诚挚，真是可歌可泣啊！

无华岁月追忆之六：

我的亲密伙伴

在河西走廊，我曾经有两个亲密伙伴，在田地里干活的铁锹，在屋子里照明的煤油灯。

西北最初四年，在盐碱荒滩度过。后面开荒前面荒，没有收获，所用农具，唯一的，就是铁锹。

拖拉机的轰鸣声唤醒了沉睡亿万年的处女地。在掀翻了的盐碱滩上，打埂、修渠、灌水、播种，落寞处女领地上的垦荒便拉开了帷幕。种子发芽，似癞疮头，稀稀拉拉，寥寥无几。有了几何图形的盐碱滩便又昏睡过去，继续它亘古不变的不毛之地。在这周而复始的打埂、修渠中，日日相伴我的，是一把木柄铁头锹。

如今令我十分惊诧并无比欣慰的是，十几位知青寻找过去的足迹，刚刚从当年的农场回来，兴奋告诉我：那里水位下降了，盐碱褪去了，时代的钟声唤醒了沉醉千古的荒滩，收获着粮食，成熟着硕果。这是后话。

锹把是白蜡树干，那上边曾经有过我的斑斑血迹。原本稚嫩的双手，在与木本的高频率摩擦中，打起串串血泡；血泡隆起了，又凹陷了，流出粘稠血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灵与肉的较量之后，终于形成了指掌间非天然的保护层——老茧。锹柄造就的老茧怜恤着我，年复一年地体贴、关爱着我，直至回城后好几年，才悄然下岗。

锹头本是迟钝金属，在与土地的反反复复切切磋磋，琢琢磨磨之后，渐渐变得锋利了，原本“心”形锹头，磨去了心尖。那锹，我行走的时候在肩头，休息的时候在地头，下工回来在门后头。西北天明比中原地区晚一个时辰，冬日之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也能摸到铁锹位置，抓住锹把，绰将起来，奔向工地。后来请朋友加工了锹把，上端变得细一些，扁一些，更顺手一些。那上边继续渲染的，是我的汗，我的油，从而变得光滑起来；又渐渐改变了本色，酷似西北高原紫外线频繁直射下我的深棕色皮肤。开始欣赏我的锹把，爱怜我的锹头。下工路上，用我被盐碱侵蚀开裂的手，抓把芨芨草，把锹头擦得锃光瓦亮。我木刻似的脸上，洋溢着笑意，以我的亲密伙伴为自豪。

四年以后，大迁徙了，开始有了收获。镰刀始终用不好，我那亲密无间的伙伴，仍然是默契的伙计——老相识的铁锹。

我的另一位亲密伙伴，是屋子里照明的煤油灯。

离开灯火通明的城市，告别爱迪生发明了一百年的白炽灯，照明的便是小小煤油灯盏了。没有当今咖啡厅烛光的神秘，也没有一分青春的浪漫。

亲密的伙伴煤油灯，伴着我品尝过苦辣酸甜。

难忘煤油灯下使我心悸的一幕。

起初的几个月，十几个女孩挤在一张通铺上。生活用水奇缺，虽说天寒地冻，与天斗与地斗，也少不了几身臭汗，告别了洗澡，脱胎换骨。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汗成茧，虱子生焉！那千奇百怪罕见的害虫，被宽慰地说成革命虫，无论如何，我只是不寒而栗！十几个人的衣服，统统聚集煤油灯下，胆大的女孩子在翻检着，寻觅着……

难忘我曾经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铁笔刻钢板，一笔笔，一划划，一行行，一版版。一版两千来字，密密麻麻，一刻4年，没葬送了我的视力，天佑！搞搞宣传，编排小报，用精力脑力，对我来说，比下大田，强煞！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然而，那煤油灯下的美差，后来还是于我无缘了。

七十年代初，到了下河清农场，煤油灯还是陪伴着我。

难忘那恐怖悚然刻骨铭心的深夜。手指一阵撕裂般疼痛，从梦中惊醒，习惯地擦着火柴，点上床头煤油灯，恢复我的视力。左手举着的煤油灯照着我的右手，判断自己被老鼠嗑了。举灯四顾，举步维艰，黢黢黑，茫茫然。终于，照到了墙洞，我那放什物的地方，照到了盐巴！煤油灯急促的火焰跳动着，我抖抖地，用盐水洗了伤口……

放水，用的是马灯，也是燃煤油，灯罩坚固一些，有了提手。夜晚放水，我一手扛铁锹，一手提马灯。在渠堤，在田埂，马灯照着我的脚，一前一后地走，形影相吊。遇到堤岸决口的险情，放下马灯，绰起铁锹。然而那次，马灯恍恍惚惚，终于没有看清脚下凹凸的路！陷到冰冷泥泞中，忍受着彻骨，忍受着寒心，拖着一条连泥带水的腿！

也难忘煤油灯带给我的温馨。下工回来，点上油灯，拨亮灯捻，小屋子便弥漫了幽暗的、然而暖色柔和的光泽。喝上两碗热疙瘩汤，也熨帖，也舒心，也惬意。如果有远方的信函、包裹，便是节日了。看信，回信，把我那伙计，煤油灯罩，擦了又擦。包裹中有酱油膏，卫生纸，肥皂粉，线手套，白砂糖，或许还有一两听罐头！捧着亲人的温暖，嗅着包裹的馨香，酣然入睡，梦乡中飞鸿又一次到来。

……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七八年上学离开农场的时候，相依相伴多年的亲密伙伴没有相随。它们失去了生气，失去了色彩，茕茕孑立，孤苦无依……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如今，它们——我的亲密伙伴——铁锹和煤油灯，飘零沦落在何方？

“揭发”

一些知青当年的无知

(1)

先得声明的是，我的揭发都是事实，而且用的都是我们大队知青的真实姓名，不信，请到东乌知青网站中查看，如果哪位朋友见到了我揭发过的知青，请告诉他们一声，西西：）?首先应该揭发的是陈明明。这家伙的爸爸是海军总政治部的头头，他总认为自己比别的知青懂得多些。所以到了草原就老是不安分。例如：刚到大队，我们就被分到了一个蒙古包里，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很累，但肚子却饿得“咕咕”叫。

“谁会做饭？”有人问。?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忘了是葛长海了还是哪一位不自信地嘀咕：“我在家是做过饭的。不过那是大米的，现在这是小米，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还是陈明明痛快，说：“做饭有什么难？我来！咱们就做蒸饭吧，蒸饭比煮饭好吃。”他将米洗净就下了锅，我们都围坐在牛粪炉旁眼巴巴地期待着金黄色的蒸饭出锅。大家填了不少火，又唱又笑，一直等了一个小时，揭开锅来看的时候那米依然是生的，邦硬！后来，外号叫老邦子的崔警钟问：“我怎么觉得应该在放米的碗里加些水呀？”可陈明明却一口咬定是不用加水的。最后结果是我们那天晚上没能吃上饭。现在我们谁知道了，干蒸生米是多么的滑稽呀。可每次聚会，旧事重提，陈明明都死不认帐，只有他儿子在旁边讪讪地瞧着他爹笑。?他还想发明风力发电装置。他从北京找到了一个老式自行车的磨电灯，千里迢迢带回了草原。然后就开始制作一个大大的风车，想用风车带动磨电灯，然后发出电来。终于，风车树起来了，可那灯却始终没能亮。如果按照原理应该是可以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成功。那天我见到已经开始谢了顶的他，提及这事儿。他竟然说：“现在我还捉摸着再试一次呢！”

(2)

第二个揭发就轮到了大付了。大付叫付建国，长得人高马大，傻大黑粗，十分憨厚。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外貌和性格，人们就总爱在他名字“大付”之前再加上个“傻”字，充作爱称。大付这人说话不爱兜圈子，直来直去。到了草原，终于经过了第一个冬天。四月，天气转暖了，覆盖了一冬的大雪渐渐化薄，嫩嫩的草牙便开始从湿湿的泥土里钻出来。近前，你几乎看不到那些草牙的存在，但如果抬眼远眺，便会发现草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这时，牧民就开始接羔子了。不要奇怪满草原的歌声，那是为拒绝当好妈妈的母羊唱的《哺羔歌》。原来，有的母羊生下了小羔却不肯为它喂奶。这时牧民就会将她捉住，对不它唱这个歌。歌没词，对山羊和绵羊分别唱“踢可……踢可……”和“敲可……敲可……”（秋实，到底对山羊唱的是哪种？）一个会唱的牧民仅用几分钟就能使暴躁的母羊安静下来，多情地舔她刚才拒绝接受的儿子。可我们大付却不信。说这纯粹是封建迷信。“如果羊能听懂歌声，对牛弹琴岂不成了真理？”他说，“我看，唱什么都是一个样！不信明天我试给你们看！”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抓住一头大羊就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结果那羊反而越来越暴躁。牧民路过，看到他的伟大作为，笑得差点儿从马上跌下来。那牧民大叔喊：“不行啦不行啦，你抓的那是只男的羊！”大付就是这样不成体统。一天，他同张忠岩一起步行到公社去。从他们的蒙古包到公社共有四十多里地，这个距离在草原上远倒不色太远，然而那是冬天，穿着厚厚的皮得勒（蒙古老羊皮袍）和毡疙瘩（毡子制成的靴子）要想走那么长的路就得用半天时间了。他们俩过于轻视了面对的困难，出发的时间晚了点儿，所以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天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太阳陡然就摔到山坡背后，黑暗霎时间便笼罩了远近敖包。一开始，他们还有说有笑地走着，满不在乎，但忽然，两人谁也不吭声了。其实这时他们已经迷路，不过谁也不敢首先承认罢了。要知道，冬季迷路便意味着死亡！那一年，有个地址队到这里来考察，四个人在夜晚迷路，就都冻死在了我们大队。当他们来到一个叉路口的时候，俩人发生了争执。张忠岩说应该走左边的一条，而大付却说应该走右边的一条。俩人争执得很厉害，谁也不肯妥协。张忠岩想：“这傻大付，平时就傻乎乎的，能不出错？不能听他的！”于是俩人决定分道扬镳。最后的结果是，大付在两个小时后来到了公社，而等了三个小时却不见张忠岩的身影。他害怕了，就通知了公社。我们大队的全体牧民都集合了，所有能上马的都上了马，草原上到处是呼唤声和手电光，还有人朝天放起了枪。然而，没有，一夜没能找到张忠岩。到了第二天，大家又寻找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大付捶着自己的脑袋，哭开了。可没有用，又过了一夜依然没有张的踪影。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他现在已经在恶狼的肚子里开始消化了！但就在第二个白天的傍晚，人们终于在距离大队80多里路的地方看到一张忠岩疲惫的身影，他竟然还能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要知道，他已经迷失了近五十个小时了！这五十个小时里他一口水，一点东西也没吃啊！当人们呼叫着他的名字纵马向他飞驰过去的时候，他站下了，象木桩子那样戳在雪地里，脸冻得邦硬，因而作不出任何表情，甚至连眼泪也流不出来。倒是他的四同户大哥脑尔吉，不等马停下便纵身窜下马背，用力地将他抱住。那大汉哭得“呜呜”的。张忠岩被找到那天，成了整个乌力亚斯泰草原的节日。牧民们纷纷怀揣着奶豆腐和羊油炸果子到知青包来看望他。尽管人们用雪为他搓了很久的脸，却也冻起了乒乓球大小的很多水泡。他挺坚强，笑着对不断道歉的大付说：“都说你傻，看来你不傻呀！”很久没见到大付了，想念他的傻样

子。

(3)

第三个要揭发的是叶坦。他现在在美国南卡大学当教授。可当年，他是我们沙麦水库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那时，我们公社除了吃牛羊肉外，吃的都是商品粮。知青觉得这样很丢人，应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但种地首先需要的就是水。于是，大家决定先在土默特山下修建一个水库。是叶坦发出号召的，他写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印在了知青小报上，现在我还记得有这样的句子：“那是谁？冬眠沉沉好似醉。呼同志，莫再睡，塞北同样春光媚。年年吃着商品粮，细细思量当惭愧。逐水游牧到何时？定居全在我这辈！”你看，我背得多清楚哇！可见当年我被它激动过。那是个一首诗就能集合起队伍的年代，人人都是切·格瓦拉！我们在土默特山下集合了。三个大队男男女女共有六七十个知青。我们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终于在我到西藏工作的第二年，水库建成了。以后我再述说修建水库的悲壮故事。现在还是要先揭发叶坦这厮！他仇恨女生的一条狗。那狗奇怪，见了女生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它都摇头摆尾一副卑贱的样子讨好人家。可见了任何男生，它都会立刻变得凶神恶煞龇牙咧嘴扑上前就咬！叶坦决定将它处决掉。然而事情不象他想象的那样容易，因为那狗根本就不会容一个男生靠近。一天，几个女生被叶坦差遣到公社买东西去了。叶坦认为时机到了，就找来女生穿的蒙古袍套在自己身上，然后再在头上匝条花围巾。只见他一步三扭地向着那狗蹒跚而去，还嗲声嗲气地捏细了嗓子叫那狗的名字：“班不勒，我的好班布勒……”果然，那狗上了当，被叶坦用绳子套住。他一声令下，藏在周围的男生蜂拥而上，将那狗吊死在牛车的车辕子上。然后就地掩埋了。

女生回来，到处呼唤着班布勒却再也没有回答。回来，当她们得知叶坦的罪行后竟然气得纷纷要离开水库。还是叶坦沉痛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才蒙混过关。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欺负女同学了。

(4)

第四要揭发的是呼日其格大队的李双丽。那天她放羊时，过来一条摇摇摆摆的狼。那狼是得了狂犬病的，故此象喝醉酒走不稳当。它吐着长长的舌头对放羊的李双丽小姐视而不见，大模大样地去咬身边的羊群。李双丽认不出那是狼，以为是条狗哩，就上前轰它走开。可那狼确实是病得不清，一点也不害怕，管自要吃头羊。李双丽很恼火，就娇声说：“讨厌！你可真讨厌！”还扬起小巴掌在那狼脑袋上一拍。却没料到那狼一扭头就在她手上咬了一

口。牧民知道了，赶紧将她送到来医院，打了针疫苗。然后就派了民兵，到处找那病狼。可谁也没想到，那狼来到了我的大队，而且又到了一个女生的蒙古包外。那女生家养了四条凶恶的大狗，它们立刻与狼搏斗了起来，最后将病狼按倒在地，咬死了。当时女生不在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家中看到地上的狼皮和血，还为自己家的狗有如此英雄壮举而自豪呢！结果呢？过没几天，那些狗的眼神就开始不对了，它们流着涎，直勾勾地看着主人。终于，向女生们扑上去。可怜那些女生惨叫着跑回家，再也不敢出来。有牧民路过，那些狗红了眼就扑。女生趁机跑出来，爬上马背。大队得知这种情况，明白是都患了狂犬病，便派了民兵来枪决它们。三只当即打死，一只却冲出了重围逃跑了。这条疯狗见什么咬什么，据说先是咬了十几头牛，接着又咬了好几匹马……没过多少日子，那些牛和马就也都疯了，见人就追就咬。于是，我们大队的所有人全吓坏了，白天妇女和儿童都不敢走出蒙古包半步。全体民兵集合了，任务就是猎杀那些疯了的牲口。经过十来天的苦战，终于把它们以及怀疑是它们的牲口都杀死了，还刨了坑，加入石灰进行掩埋。一场狂犬危机才算过去。现在想想，还挺有戏剧性的。只有草原才有这样的事情啊！

(5)

这回揭发张狗剩。张狗剩原名张静，现在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头头。她女儿好大了，可我还是当着她女儿面叫她张狗剩。女儿问这是为何？妈妈怎么会有这样难听的名字？张就急扯白脸的不让我说，可有什么用呢？过去的事情是抹不掉的呀！

那一年，张静所在的蒙古包与一个叫做南木吉拉的牧民为邻。两个包之间应该有十里或更远一点吧？但在草原上，人们说十里的感觉就好象北京人说“几步路”的感觉一样，因为大家都骑马，十里也就只是马跑“一蹦子”（草原上的说法，指放开马缰跑一回的距离）路。那天早晨，她和同包的女生刚刚起床，一出蒙古包就叫：“不好！”但见她们包的羊群已经走出很远，朝着南木吉拉家的羊群跑过去了。草原上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两群羊相混合，因为一旦混了群就需要将两群羊轰到石头棚里，然后一只一只地将它们再分开。然而这事又谈何容易？分开两群羊需整整半天时间哩！所以张静就吓坏了，来不及骑马（因为马戴了马绊子，一夜已经跑出很远），也来不及叫其他姐妹，就管自向羊群跑去。她没想到的是南家共有九条狗，而且那狗是全队最凶恶的，平日里几乎没有谁敢到他家串门喝茶，因为即便是三个人同行也招架不住那些扑上来的狗将人扯下马背。所以，牧民见到南木吉拉便会问：“你家那些狼怎么样了？”而不问“狗如何”。张静忘了，就朝那里跑。九条狗立刻向九支箭向她发射过来，当她还没有一点点反应的时候就被恶狗扑倒。只要再有一分钟，我敢保证，现在草原恋合唱团就不会再有张静，而且她女儿也不会再问她妈妈为什么叫狗剩了，因为根本就不会再有她女儿了！可恰巧的是远方出现了救

星——边防站的站长道尔吉扎布和公社干部乔鲁门。这两个人来找知青买一点羊。当他们看到情况不妙时便飞骑而至，同时向天鸣枪。狗们吓坏了，四下散开，他们俩在马上来了个步枪骑射，立刻有五只狗命归黄泉。剩下的逃回蒙古包。这时再看我们的张静同志，惨！她已经成了血葫芦，头皮被撕下来好长，眼睛也被狗的利爪挠出了血，身上的衣服成了一缕缕的，伤得就说不得了！

道站长连忙叫来边防站的汽车，将张静送到旗里部队医院抢救，而张静同志某也从此得到了永生伴随的好听的名字“张狗剩”！下次如果你有机会见面，可千万别叫她这名，因为人家现在自认为是成功的企业家和有尊严的妈妈，那名太降低威信。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那一年的那一天

那一年的那一天，是个阴霾的日子。天还没亮我就出门了，独自一个，昂头挺胸，没有一点留恋的顾盼，走了，不清楚是憧憬还是无奈。

我是六七届的，本来嘛，有一半同学可以分配去工矿。那一阵父亲月薪还有二百（再早十年可是八百哦），家里算是富裕的。我并不急着工作，反正有钱花，区区十八元太微不足道了，很心安理得地接受“待分配”。却不料这边分配方案刚刚实行，那边传来消息，父亲月薪降为四十了。于是吃饭就成了问题，得找出路啊。学校里已经开始向建设兵团送人了。黑龙江要成分好的，咱沾不上边；云南兵团名额很少，挤不进去。那就插队去吧。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能不能养活我自己。实事也证明，路是人走出来的，尤其在那个荒蛮的时代。直到最近才听见有人说，当年她们选择去农场是为了养活自己，我真的惊叹她们早熟的市井味。

我朝学校走去，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今天，那是离乡背井的出发地。晨曦随着我的脚步退去，却不见朝阳升起。学校里早已有一辆大客车默默地等着。我无牵无挂，率先上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鼻子对着窗外呼吸，似乎可以减缓压抑的情绪。

眼前煤渣地的操场，已经不再平整。当年作为校排球队的队员，我每天在此早锻炼，每周还有两次高强度对抗。那时候正赶上大松博文走红，我们也接受了“魔鬼训练”，尽管是打了折扣的。我的个子不算很高，弹跳一般，于是鱼跃滚翻成了我的强项……

这辆客车将我们一行三十来人载到虹口体育场，在那里几十辆客车排起了长队，蔚为壮观。啊，原来有那么多人同行！当局特意安排的行车路线是：四川路——海宁路——吴淞路——外白渡桥——外滩——南京东路——河南路——天目路——共和新路——彭浦车站。故意让我们再最后看一眼上海，可是我没有什么冲动的感觉。走就走吧，根本就没有想过还要回来！古人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家父十四岁离家闯荡，一辈子也没有回老家几天！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的观念在同龄人中略显异端。

客车上了天目路，街景就陌生了。那一带我很少去，彭浦根本就没到过。到了彭浦车站，感觉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那芦苇搭起来的也叫车站？加上初春乍寒，很是凄凉。然而就是这里，我们被指到了那墨绿色的列车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组奇怪的镜头——犹太人被党卫军赶往集中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是待分配身份的两位同学来为我送行了，多少可以免得我在最后时刻还有举目无亲失落感，即将远行的知识青年几乎都是在亲友簇拥之下啊。这两位为我送行的，一位割掉半个胃，留在上海，现在是街道干部；一位经不起动员，后来去了黑龙江饮龙河农场，如今也回城了。当初要是实在没人送我，我大概会觉得很没面子的。

我去插队落户是为了吃饭，按照马斯洛的说法，是为了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与绝大多数人不同，所以我没有什么悔与不悔的问题，另类么？）。至于选择云南，则是苦涩的浪漫。我读过一本书《南行记》，为艾芜的历险所折服；我看过一部电影《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惊叹其中的奇花异草和珍禽猛兽；我听过一首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优美的3/4拍时时萦绕在脑际。就这样我选中了云南。当然还有，家父参加过滇缅公路的建设，到过瑞丽，到过保山……也不知道算不算踏着父辈的脚印前进。

当列车开动前最后两分钟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整个车站上的人们像是得到了一道命令——哭，齐声嚎啕。那个声势，尤为动听，此后再也未曾亲历。在震耳欲聋的哭声中我微笑着朝二位同学挥挥手，然后掏出香烟……

列车行经杭州的时候，站台上有小孩子们为我们唱歌跳舞。好天真、好可爱哦！

天色渐晚，忧伤的人们毫无睡意。我可管不了这么多，爬到行李架上，整出个空挡，摆平了睡觉。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觉得有人在拉我的袖子，我以为有谁不服气我睡在上面，要找茬？正准备挥拳头迎战，突然瞥见全车厢的人都毕恭毕敬的站着，在山呼万岁呢。咋的？九大闭幕了！得，咱下来吧，那个万岁是一定要跟着喊的。得罪不起。

已近深夜，窗外一片漆黑。那时候大概处在金华地界。

插队记事(1)

1. 最高指示-----上山下乡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冬天，武斗的枪炮声刚有所减弱，毛泽东发出了又一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刚读初中的学生除了觉得好玩新鲜外，从来没有认真过。而这次却不一样，它把从六六届开始的初、高中毕业生全归到了知识青年这个范畴里，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别无选择的选择。这个最高指示，从此改变了上海乃至全国千百万人的命运。

我是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的，未经学校街道动员。其实，不自愿也不行，到时街道里弄、父母单位动员起来实在吃不消。有的人家本想捱一捱，看能否躲过去，没曾想单位里弄联合起来，敲锣打鼓上门动员，最后还停止父母工作办学习班，直到觉悟了为止。

一开始我报的地方是内蒙古国营农场，未批准，要我去贵州插队，我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当时对于年少的我，到哪儿去都无所谓，感觉上只以为像大串联一样，到外地游逛一些日子，然后再回到上海。于是乎我甚至有早点脱离父母管束的迫切心情。

六九年春节一过，通知便来了。一张粉红的纸上，先印着大段的毛主席语录，之后是祝贺我被批准到贵州某某地方插队的话，再后是报到出发的时间。我盼望出发的日子快快到来，而母亲却为此啼泣不已。一日，母亲对我说：“贵州是南方，那儿太热。你向来就怕热，一热就头疼。你是不是到学校说一下，换一个地方。我看到东北要比贵好。”

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话对老师说了，说完之后甚是不安，唯恐老师责备。没想老师倒挺痛快，马上从抽屉里翻出另一张通知书，把我手中到贵州的通知书换了过去。我捧起新的通知书，那是一张到东北吉林省双辽县的。从地图上看，双辽县地处吉林省西北，与内蒙古交界，属科尔沁左翼中旗。那里，地图上布满了显示沙漠地带的点状标志，一如撒哈拉大沙漠。看到自己即将前往的去处如此这般，一股“青山处处埋忠骨”之豪情油然而生。

2. 出发的日子

出发的日子定在1969年4月15日。

凭上山下乡通知书，我领到了一套黄绿色的新棉衣棉裤，外加帽子和胶皮鞋。棉衣棉裤 厚厚的，又宽又大，草绿色。还领到了一张特别供应的票券，凭券可购买棉毯、旅行袋之类 的物品。在物质匮乏的当时，这是对知青的特殊照顾。那些日子，我成了家中的重要人物，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待我格外的和气，处处由着我，似对待一个外来的客。母亲第一次到单位借了钱，两百元，那是好大一笔款子，用这两百元买的衣物、用具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不知后来家里是怎样还这笔债的，它几乎是母亲三个月的工资，家里还有七八个人要开销呢。

出发那天，全家人都早早起来了，母亲眼睛又红又肿，她整整哭了一夜。早饭，大家吃得全无滋味。饭后，我穿着一身黄衣服，俨然新兵模样，在家人的簇拥下来到上海西区当时的古北中学。

古北中学是我们这批知青的集中点，早已拥挤着许多就要出发的知青和送行的人。我全家都来了，包括只有六岁的弟弟和一些亲戚。父亲本来少言语，又体弱多病，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和母亲一样整夜未睡，显得特别憔悴。他默默地坐在长条凳上抽烟，不吱一声，或许是他怕离别的一刻难以承受，在我还未出发时，他便悄悄走了，一语未发。母亲要我与父亲道别，等我追到校门外，他已走得很远了。望着父亲远去的瘦削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悲怆涌了上来。

3. 在彭浦火车站

知青是由专车送往火车站的，送行的只能自己坐公共汽车去。好在行李已先行交付托运，那时公共汽车也不挤，几乎所有送行的人都设法赶到了火车站，我家也不例外。倒是送知青的车队因为满街的游行队伍（当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反而晚到车站。由于车队绕道，我有幸观赏到上海的南京路、外滩和黄浦江。说起来可怜，偌大一个上海， 但对我来说，宛如陌乡，这些地方平时极少能到。这次，也算了却了心愿。

彭浦火车站原是上海的一个货运专用车站，在上山下乡高潮时期，为减轻北站（当时上海最大的客运站）的压力，临时将彭浦火车站改为运送知青的专门车站。月台本没有，在原来的货场上用芦席搭了一个极大的棚算作月台，列车停在原来货运线上，踏脚离地面高高的，个子小的恐怕还上不去。当我们到达彭浦车站时，芦席棚下已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带队的领着我们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上了火车，一些家长也想上车， 但被挡住了。因为，是不是知青很好区别，凡是知青都穿着黄色的棉衣棉裤，带着黄帽子，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在送应征入伍的新兵呢。 芦席棚下，送别的人在车窗外翘首再三叮嘱，车厢里的知青俯身窗外频频点头。隐隐的 哭声开始响起。我依在窗旁望着，却没了惜别之情，只是想这群身着黄衣黄裤的学生是去干什么，他们的前程又将怎样？似乎我已置之度外。我

发现车下有一书生气质的男青年，因伤心过度几欲晕倒，嗓子已经哭哑，靠在扎芦棚的毛竹上，用手捶打着自己。车上一女生，胖胖的，早已哭红了双眼，却劝那男子不要再伤心。此情此景，谁也判断不出他们是兄妹还是恋人，而他们依恋，惜别之情倒引得周围的人一片唏嘘。

发车的预备铃响了，原来只是嘈杂的嗡嗡声，一下子变为哇哇的哭声。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终于汇成哭的海洋，如汹涌的波涛，直欲将芦棚冲破。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知青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革命行为，岂能如此悲悲切切。好在车站装有高音喇叭，为掩盖这浩大的哭声，喇叭以最大分贝播出雄壮的革命歌曲：“毛主席指引革命路，时代列车我们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铺天盖地，豪情满怀的歌曲声，终于将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别离的哭声压了下去。

发车的铃声响了。列车在铃声，哭声，歌声中，缓缓地，似乎依依不舍地开动了。送行的人们拥向列车，车上车下，无数双手在挥动，人们随列车移动着，哭着。列车越来越快，人们无奈地停下了脚步，眼巴巴望着列车离去。蓦地，眼前晃过一张熟悉的脸，脸上分明印着泪痕，我心头一热，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那是我的班主任，天山中学语文教师——黄济。

4. 火车上的时光

1969年4月15日，江南大地已是春风拂柳了，列车穿行在碧绿的小麦、油菜之间，远近闪过的竹林、农舍、小桥，实实在在是一幅幅活动着的江南农村风情画，令人心旷神怡。列车飞快地驰过苏州，无锡，常州……，轰隆隆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向北进发。

到底是十七八岁的学生，临别上海时那么伤心，这会儿已经嘻嘻哈哈说笑开了。男生很快已经互相认识，女生除个别的还在抽泣外，也都在小心翼翼地开始交往。由于是专车，整列车都是知青。其中，除了长宁区的，还有静安区及别的什么区的。各个区的知青以车厢为界分开，不得随意来往。本区的，均由一位带队的大人（也可以称干部，这儿为体现知青年龄之小，故此称呼）负责。带队的大人是由上海专门从各单位临时抽调的，目的是保证知青安全到达插队落户的地方。

负责我们车厢的是一位中年汉子，他穿戴得很整齐，人也挺和蔼，可惜如今已忘了他姓什么叫什么了。由于车上有大人带着，我感到踏实，因为文化大革命，多少有一些闲坏了的学生染上了流氓习气，他们常常欺负弱小的同学。那年我不满17岁，个头还不到1.65米，恐怕也是欺负的对象。我周围女生多，本人腼腆，所以一路大都注视窗外，沉默不语。别人可能以为我在想家，其实我一直在想到达目的地后会怎样。我读过一些描写早年广州知青在海南胶林务农生活的小说，羡慕小说中那种热火朝天，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我想象到了农村后，将有小说中那样的生活在等待着自己，心里就一阵阵激动，按捺不住干一番事业的激动心情。

火车在黑暗中驶经安徽和山东，夜幕掩盖了富庶与贫瘠的交替。知青们一觉醒来，望着窗外荒芜的黄土，低

矮的土屋及干涸的河流，恍若隔世。大多数知青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总以为全国都和上海一样，到处是马路、商店，根本就不知道当时中国许多地方是怎样的落后。我看着眼前晃过的穿着黑棉袄，蓬头垢面的孩子，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火车在大约是河北的一个什么车站临时停车。文革时期全国均处于混乱停顿状态，火车晚点已习以为常，临时停车更不为怪。知青们纷纷下车活动身子。不知什么时候，好像从哪儿冒出来的，列车两旁围上了许多穿黑棉袄，蓬头垢面的孩子，肮脏而又稚嫩的脸上显出对食物的渴求。他们是附近的农村孩子。不是叫化子，是知青们手里的香肠、烧鸡、饼干和巧克力刺激了他们。可以说，他们中间几乎无人知道香肠和巧克力是什么滋味，甚至闻所未闻。

一些好事的知青开始用手中的食物引逗孩子，使得孩子们围着他们，抢手中的饼干与糖果，就像在引逗一群小狗似的。有同情心的知青则悄悄取出食物给抢不到东西的孩子。施舍行为使知青们很受用，享受了孩子们感激的神情，又显示了自己的慷慨大方。知青们的施舍在不断升级，五香豆、牛肉干、华夫饼干，话梅……，简直是应有尽有。乡下孩子哪像城里人一般胃口，他们将吃到嘴里的话梅忙不迭地吐掉：这些人怎么吃这怪玩意儿。忙着施舍的知青，此时已忘了这些吃的怎样来之不易，也全然不知即将到来的日子是怎样艰辛，实在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火车在某某站停车之后，迟迟不见发车，不一会儿，传来消息说有阶级敌人在轨道上放了一根枕木，企图颠覆列车。全车的人闻之大惊失色，深感阶级斗争形势之复杂、尖锐。后来又有消息说这两个阶级敌人就是车上的知青，是静安区的。阶级敌人居然混进了知青的对伍，为此，带队领导召开了知青骨干紧急会议，要求大家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知青如何处置的，当时不得而知。

过三海关，火车又钻入了夜幕。半夜时分，车停靠沈阳站。整个沈阳站灯火通明。月台上一排排学生挥舞着红绸载歌载舞，欢迎我们。我的心突然激动起来。我觉得自己不再孤独，第一次对东北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知青们被从睡梦中唤醒，告知下车。虽然一个个极不情愿，但也无法，只好没精打采地进入空无一人的沈阳站候车室。有人给我们送来吃的，每人两只面包和一截红肠，嘴刁的知青嫌红肠有蒜味不好吃，随手就丢弃了，招来车站工作人员侧目。

领队的通知大家，还需换乘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大家就在候车室里休息，不得外出。其实，候车室的大门锁着，谁也出不去。从门缝中，我窥得夜色中的沈阳市，与上海的北站也无二致，不见得就有谁偏要出去逛逛不可。

就在沈阳车站，领队告诉我们原定到双辽县服先公社前进大队插队的知青，改到向阳公社合作大队插队。得知这一消息，大家都议论纷纷，我一下子也若堕入云里雾里，因为我就是到服先公社的。为什么要改，这么一改，家里要是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于是，我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等我知道向阳公社要比服先公社条件略好一些，那是后话了。

换乘的火车已不是专列，虽然特意给知青留了几节车厢，但沿途的旅客并不知道，每到一站都挤上了不少人。他们有戴着羊皮或狗皮帽子的，有穿翻毛皮大衣的，有脚上蹬着自制的、里面絮了乌拉草皮靴的，很快，车厢里就弥漫着浓烈的腥臊气味。这些来自全国最大城市的上海人怎受得了这个，来了个万众一心的“运动”，驱逐这些不速之客。免不了一番口舌，上海人叽叽喳喳地声明这车厢是为知青专门包的，别人不能进来云云。

从未见过这阵势的东北老乡，看到这么多着黄军装的年轻人乌里哇啦，指指划划，又一句听不懂，不知什么来头，只得往别的花厢挤。他们奇怪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么多说话嘀哩嘟噜的人，朝鲜人，日本人，还是蒙古人？然而，新上来的人并不知就里，仍一个劲儿朝这边挤，冲突时有发生。个别知青动手动脚，东北老乡也不吃素，几个楞头楞脑的摆出了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亏得领队及时赶来才解了围。

火车到四平站已是夜晚。从四平站，再往前有两条铁路干线，一条通往哈尔滨，一条通往齐齐哈尔。往齐齐哈尔的这条铁路有很长一段其实就是吉林省和内蒙古的分界线。到四平市附近梨树县、怀德县插队的知青在四平站就下车了，我们到双辽县插队的知青还须坐火车继续朝内蒙古方向前进。

列车约莫在晚上八时离开四平，朝齐齐哈尔方向行驶两个多小时，在一个叫茂林的小站悄悄停了下来。这儿，就是我们三天三夜火车旅程的终点。

5. 小镇——茂林

茂林车站可以说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它甚至连电都没有。一间不大的屋子充作候车室，屋中央挂了一盏嘶嘶作响的汽油灯，灯下是一只用柏油桶改制的火炉，炉内燃着煤火。四壁旁靠着些长木椅，上面横七竖八躺着一些等车的人，他们身上散发着浓浓的烟味、酒味和一种说不出的气味。

幸好，没有在车站久留，很快，接站人便带我们朝茂林镇上走去。令人不能忘怀的是，这边陲小镇半夜三更居然组织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欢迎队伍。一时间，只听得鞭炮声，锣鼓声，唢呐声震天响起，“欢迎上海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贫下中农欢迎你们”的口号此起彼伏。受此殊荣，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一时我的心情又激动起来，想起就要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心里充满了自豪。

穿过欢迎人群，我们被安顿在一个窄窄的，长长的房子里。房子内依旧无电，照明用的还是汽油灯。借助灯光，我看仔细了，房子是用土垒起来的，并未粉饰，直截了当地露出层层土坯。房子里有两排同样是土坯砌的大炕，上面铺着的是高粱秸编的席子。为欢迎上海知青，早就派人将炕烧得热乎乎的。也许这已经为知青做得够周到了，可是，知青哪习惯在这样的土屋里过夜，大多就坐在炕边，好容易熬到了天亮。

这儿天亮得比上海早，刚四点多钟，整个镇子就沐浴在阳光下了。知青们跑出大门，才发现有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马和马车。已经有人在忙碌，打水的，洗脸的，扫地的。他们都惊奇地望着这群着黄衣

黄 裤的人，兵不兵，民不民，是干什么的呢？

我特别好奇地去看那一匹匹白的、黄的、青的马儿，觉得它们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你，就像一个个虽不懂事但很乖的孩子。走出院子，来到镇上，发现这简直是一个落后得近乎原始的村落。房子是土的，街道是土的，不见商店和工厂。街上游荡着瘦瘦的狗和哼哼叽叽的猪，不时传来毛驴的叫声和公鸡的啼鸣。镇民们显然没有早起的习惯，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个卖豆腐的，赶着毛驴车在吆喝，冻得哆哆嗦嗦。但是，镇上的空气却格外地清新，我想，是因为镇子就坐落在广袤的科尔沁草原上的缘故。

早饭吃的是大馒头就粉条炖肉，一人一大碗，照例有人将里面的肉挑出来，说是肉太肥，皮太厚，一掷了之。餐后，桌子上到处扔的是肉片和咬过的馒头，一派狼藉。有人问服务员有没有蔬菜，我心笑他也不看看外面冰天雪地的，蔬菜从哪儿来？吃完饭后，来了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到向阳公社合作八队的知青连同托运来的行李一起，送往最后一站——沈家屯。

6. 沈家屯，我们来了

一路风沙，汽车在泥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停在一个有许多低矮土屋的村落旁。大家以为汽车要加水，纷纷下车活动身子，在车上蜷缩了半天，也该松一松了。随车来接我们的贫下中农代表的平静地告诉大家：到了，这儿就是向阳公社合作大队第八生产队，又叫沈家屯。

沈家屯约有六七十户人家，二三百口人。屯子呈东西走向，分成两个生产队，东面的是合作四队，西面的是合作八队，合作八队共有三十左右户一百多口人。屯子往西有一条县道，土筑的，不下雨时可以跑马车和汽车，不过，那时这儿还极少有汽车。再往西一里多路有起伏的黄沙岗，那是由风沙吹积而成的。往南两里多地也是黄沙岗。越过西和南两边的岗子，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距屯子外四周约半里，种着高高的白杨树，环绕着屯子，那是防风治沙的林带。树此时尚未发芽，只有凌杂的枝杈伸向穹苍。屯子里也种有许多柳树、榆树什么的，只是还没叶子，生生把屯子里破败的土屋完完全全裸露了出来，使人想起电影《暴风骤雨》里面还没有土改的农村镜头。

希奇的是，在一间土坯房的北墙，竟然用砖砌了一座神龛般的东西，里面放了一尊石膏做的毛泽东像，像的两旁贴着对联，上书“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之类。“神龛”前面挂了两块红布，大概是起风时可以遮挡一下风沙。这使我想起了文革前上海乡下的小庙，有一种阴森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屯子其它地方角角落落就是寻遍，也不会找到半块砖头，独此处是用砖头砌的，足见这儿的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是多么崇敬。放毛主席像的这间土坯房是全屯最大的房子，其西一半作马棚，供役马晚上吃草料；东一半为队房，是全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这儿天天开会到深夜，后来也曾一度作为男知青的宿舍。

队房前面是一片空场，空场周围是场院（即打谷场）和粮仓，另外还有队里的猪圈羊圈等等。屯子的大街正中，有一口深井，井台上架着轱辘，井旁卧着一条牲口饮水用的长长的木槽。这儿，可以说是屯子里主要社交场

所，一早一晚，井台旁热闹非凡，每日家长里短就在这里得以演义。

知青生活开始了。

7. 集体户

在沈家插队的知青有十八人，组成了一个集体户。正好九男九女，于是屯里人以为我们是配好对来的。加上当时有“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口号，更使这种说法有点根据。要在农村扎根，不配成对行吗？这多少令屯里的小伙子有点失望。其实，这纯粹是偶然。

十八名知青来自上海长宁区的七所学校，互相之间原来认识的不多，是同学的更少，大家既不熟识更不了解，家庭住址也散布在长宁区各处。因此，真要使这十八个人配成九对，在当时，它的概率为零。岂止配成对的概率为零，这十八条“好汉”在今后的岁月中，针尖对锋芒地吵吵闹闹好几年：柴没有了，饭晚了，玉米饼糊了生了要吵；对毛主席一段语录的理解不同要吵；为是否坚持“天天读”雷打不动要吵。然而，当年声色俱厉的争吵，在二十余年以后的今天，想起来多么可笑，多么幼稚。毕竟，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

8. 我，同流合污？

到达沈家的第二天，我一觉睡到大天亮，舒服极了。热热的火炕果然神奇，长时间乘坐火车产生的恍惚感已消失。精神足了，新鲜好奇劲儿上来了，跑到外面逗逗狗，撵撵鸡，引得一帮子小孩跟在后面起哄。

小孩穿的黑棉袄与途中见到的孩子一样，里面也不穿衬衣，棉袄领子和脖颈均黑得发亮。我想和他们交个朋友，拿出上海带来的糖果饼干分给大家。起先，他们有点儿难为情，推让着不肯接。后来经我一再坚持，才谨慎、不好意思地接过东西，细细咀嚼起来。混熟了，他们领我去看马群，教我甩鞭子，骑毛驴，很快就把整个屯子跑遍了。一天下来，玩得淋漓尽致。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游戏，更带上小海、小毛（均是知青）一起，不亦乐乎。

待到第四天，女户长（从知青中选拔的负责人）找我说，大多知青第二天就出工了，只有你们几个天天睡懒觉。她还说队长讲了：你和他们几个同流合污，亏你还是知青骨干呢。我这才想起，每天屯子里只见玩耍的小孩不见大人，是从未有人叫过我，能怨我吗？原来他们都出工去了。但整天价的游戏结束了。今生的自食其力从此开始。

9. 草原牧马

我努力要改变“同流合污”的形象，拼命劳动。但是，由于身小力薄，总不如其他男同学，甚至不如个子大一点的女同学。这使我很沮丧。每当垒粪（将搅拌好的牛粪或马粪用柳条筐均匀地撒在地里，以利开春种地，这在东北是一种较累的农活）时，我尽量干得和别人一样好：粪要装得多，撒得匀。铡草时，手上起了大泡，我仍旧不停地，使劲儿地按铡刀，以尽量铡得和别人一样多，一样细。我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力气，也赢来了更多的称赞：这小子肯干，能吃苦。作为对我劳动态度的肯定和奖赏，一个好差事落到了我头上——放马。

队里有羊群、牛群，自然也有马群。原来放马的半拉子（只算半个劳动力的孩子）许是长大了，可以顶个整劳力，让一个尚不能算整劳力的知青去接替，显然是合算的。于是，插队不到一个月，我便在科尔沁草原放马，成了真正的牧马人。

清晨，我骑上一匹骛马（好马队长舍不得让我骑），驱赶着马群尘土滚滚地驰过屯外的泥道，翻越西岗子，进入广袤无边，天地合一的科尔沁草原。那时，我神气活现地扬鞭催马，大声吆喝着，仿佛自己已是一个老骑手，老牧人。特别是见到其他知青睡眠惺忪地扛着锄头下地去铲那无边无际的长垄时，我便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其实，胯下坐骑瘦瘦的脊梁硌得我尾骨生疼，屁股上的皮都被磨掉了，晚上，一挨炕，便钻心地疼。即使如此，放马的时光仍是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那草原真美！没有到过草原，绝不会对草原有真正的了解，更不会有我这样永不忘怀的情感。

草原真美，尤其是夏天的草原。谁知道草原上有多少种草，谁知道草原上有多少种花，那夏天的草原，绿草无际，野芳无涯；那夏天又有谁知道草原上有多少百灵。的草原，百灵啁啾，彼落此起。这要专门用心去写，这儿且寄下，先说点别的故事吧。

10. 狼的故事

刚到沈家屯的当天晚上，队长交代说大家没有事不要出去，可什么缘由他没提。那时，我就觉得恐怕有狼患。果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有关狼的故事不绝于耳，甚至亲身经历。

有一次，屯子里一位孟姓蒙古汉子在草原上打草时，无意捉到几只刚会爬的小狼崽，甚觉可爱，就带回家养着玩。不曾想，当晚母狼就找来了，一连在他家门外嚎了三夜，差点没用爪子把门挠穿了。全家怕得不行，第四天一早，赶紧用柳条筐将狼崽送回原处，自此太平。

其实，狼还是怕人的。在草原上，狼与人相遇，远远的它就用后腿刨地，扬起尘土，警告人不要靠近，很少有狼主动向人发动进攻。在乡下，我两次与狼相遇，均有惊无险。然而，屯子里的牲畜，就不那么幸运了。下面几则故事，是作者本人亲自经历。

下乡不几天，被派去铡草。铡草时需不断 将草从草垛搬到铡刀跟前。一次，当我抱起一 大捆草时，只见草捆下面全是毛茸茸的什么东 西，细一看，竟是小猪崽的脑袋，有黑的、白 的和花的，围成一圈，就象母鸡正在抱窝的鸡蛋。原来，春季母猪生产时，疲惫且软弱，狼乘机跳进猪圈内，母猪下一个，它叼走一个，在草垛旁享用之后，将不够滋味的小猪头藏进了草垛，做得十分利落干净，不留一丝痕迹。 怪不得小猪倌心里纳闷：一夜之间，这老母猪 肚子里的崽哪儿去了？

下雪后，厚厚的积雪掩盖了一切，草原上觅食困难，狼便聚在屯子附近转悠，甚至白天都敢打羊群的主意。一天傍晚，我赶着群羊回 屯子里去。突然前面羊群一阵大乱，我忙不迭 地甩着羊鞭去“镇压”，只见闪电般窜出两只 狼，灰不溜秋的格外显眼。它们扑向离群的一只有孕的母羊，母羊惨叫着，眼看在劫难逃。这时，原本走在最前面的领头羊冲了过来，瞪着发红的眼睛，低着头，将两只坚硬的犄角直 逼那两只进攻的狼。狼被镇住了，不敢再向前。母羊飞也似地蹦回到羊群，但领头羊却被两只 狼一前一后夹在中间。领头羊左冲右突，两只 狼步步紧逼，相持不下。终于，两只狼同时发动进攻，一只咬住羊的脖 子，一只咬住羊的后 腿，肯定狼已用惯了这种战术，配合十分默契。 羊倒了，两狼撕咬起血淋淋的肉来。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手无寸铁又第一次遭遇狼的我远远望着这一幕，只是发呆，束手无策。显然，领头羊根本不敌两只饥饿凶残的狼，它之所以勇猛迎敌，是要牺牲自己来救群羊的性命。

那年，队里的白骡马下了小马驹，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它下的是一匹有名贵血统的混血小洋马。一天，放牧归来，我漫不经心地将马群赶进圈里，随手将用来挡圈门的两根木杆一横就走了，忘了将插销插上。正是这一疏忽，铸成大错。当晚，调皮的马儿将木杆蹭开，几十匹马胜利大逃亡，冲出马圈，全部钻进茫茫夜色，散落在漆黑的大草原上。第二天放亮，肚子吃得滚圆的马儿陆续回到圈里，只是不见白骡马和它的小洋马。

队长急了，派人四处去寻找。终于在十几里外的草原上找到了它们。小洋马的腹部已被狼咬穿，奄奄一息。白骡马站在一旁，浑身是伤，仍紧紧地用身子护着小马。周围几十平方米的草已被践踏殆尽，露出黑黑的泥土，这是一场恶斗的结果。平时，狼一般不敢袭击成年马，显然，白骡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小马驹，与至少两只以上的狼搏斗了一夜，最终，狼未能得逞。到晚上，小洋马还是死了，白骡马从此再也不肯吃草饮水，十天后，忽然倒下死去。白骡马母子之死，至今我都懊悔不已。

毛驴是最不济的。早上要牵驴压地，到驴圈一看，有两头毛驴倒在地上已一命呜呼，便知昨夜有狼光顾过了。队长叫来几个壮汉，把死驴拖走，剥皮割肉，每家分上二斤。驴也算庞然大物，可一见狼，并不会似“黔驴”那样炮几下蹶子，叫上几声，而是浑身哆嗦，任狼嘶咬而毫无反抗。也许是带着笼头，拴着缰绳，可是那怕叫上几声，踢它几下，也好让人知道是有狼来了。每年，队里总要咬死几匹驴。由于毛驴肯干，耐吆喝，套车、拉磨压地少不了它们，被狼咬死十分可惜。可是也实在没办法，驴的胆子太小了，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同样是牲畜，骡子和黄牛就不怕狼的袭击，只要附近有狼出现，它们便会群起而攻之，用犄角顶，用蹄踢刨，真有过狼被黄牛顶死、被骡子踢死刨死的事情。我在乡下，的确也从未见过被狼咬死的骡子和黄牛。大概，狼也知道，骡子与黄牛是覬觐不得的。

插队记事(2)

11. 队里开会——马拉松

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治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静卧偏远草原中的小村庄居然也未能免俗，搞起阶级斗争来，一招一式全有章法。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等，与城里的一模一样。早上出工，在“神龛”前请示一下并不为过，毕竟几分钟，读一两段毛主席语录而已。最折腾人的是晚上那没完没了的学习。每天晚上收工已是很晚，匆匆往嘴里填些玉米饼子就得到队房开会学习。不管你多累多困，马拉松式的会不开到半夜三更不散，真作践人。

想想当时的情景，可气又可笑。在前文已作介绍，队房是全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每天晚上的活动非此地莫属。夏日，大家就聚在队房外的空场上，坐的坐，蹲的蹲。人群中间用鲜草拢一堆火，一是让浓浓的烟驱走蚊子，二是点烟方便。是时，在青香缭绕的空场上，远近传来蛙鸣虫叫，虽说会开得乏味，夏日的夜晚倒是很惬意的。秋冬时，每晚派人先将队房里的火炕用苞米糠烧得滚烫，同时烧开一大锅水，偶而还会炒点儿葵花籽、黄豆供大家享用。队长来得早，自然先占领有利地形——炕头。社员们陆陆续续来了之后，各自找地方坐的坐，躺的躺。老实巴交的专找背光处，爱抛头露面的则往灯前凑，我最喜欢 的地方是锅台旁的柴禾堆，又软又暖和，还背光。每次尚未开会，队房里的烟雾已腾腾升起，除一些知青外，参加会议的老老少少一个个都忙着吞云吐雾，不亦乐乎。

每次，队长宣布开会，先是讲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如何如何腐朽没落，苏联修正主义怎样怎样糟糕透顶。归根到底，他要说明的是生活在中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多么的幸福，要不能吃得上玉米面儿饼子和高粱米水饭吗。接着他便讲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不抓 阶级斗争，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脑袋掉了都不知道咋回 事儿。而当前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是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问题。队长细细地把张三李四 的出工情况公布一遍，对那些躺在阴暗角落里呼呼大睡的社员，一次又一次发出警告：“说 你呢，大迷糊，……听着没有？……我说谁哪，老李家的……”。最后，队长要将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布置一下，诸如北边的地铲得太毛，要返工；南面的地要间苗补苗等等。其实，听得进的人不多，大部分社员在打着盹，劳累

一天下来，谁能抵抗得了生物钟的作用。

一开会，我的眼皮就睁不开，老是迷迷糊糊的，似听非听。关于个别知青偷鸡摸狗的事，反正轮不上我，尽管放宽心睡觉。等到散会，正睡得懵懵懂懂，便踩着别人的脚后跟回去。

知青们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常常背地里取笑队长：“不晓得这二遍苦，二茬罪是如何苦法，倒想领教领教比吃窝窝头，清水煮萝卜还苦的日子。”对这种观点，队长只有一句话：忘本，哪天有工夫要好好批判批判。可是他一直没有腾出工夫。到底是在偏远的乡下，此话 当时在城里是万万说不得的。

12. 杆儿柴——一个人的故事

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井台旁饮马，一阵马铃儿响，两挂大车风尘扑扑地驶进屯子。前面一挂上坐着许多人，都用大衣、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后一挂上装的是满满的煤和拌子、家什等。有很多瓶瓶罐罐和不计其数的书。车停下后，队长到处吆喝人来帮忙卸车，说是新来的下放户到了。我把马圈好后也去帮忙。

这一家来自长春，是好大的一家子：两位耄耋老人，两位中年夫妇和两个男孩、三个姑娘，一共九口人。在我看来，这一家人除大的那个男孩健壮一些以外，其余的都弱不禁风，特别是二姑娘简直就是林黛玉，那张脸白得森人。

这家的户主就是故事里的主人翁。大家叫他杆儿柴，说起来很是不恭。其实他是正经八百的大学教授，他那瓶底似的眼镜片足以显示出满腹的学问。他的大名叫张亮采，吉林师大教授，知识分子，全家下放改造。

张老师早年是学历史的，所以后来也教历史。他二十岁出头就读研究生，是我国最早的研究生之一。他通甲骨文，金文，对明史清史 现代史颇有研究，出过一些著作，用张老师的话讲“那些都过去了”。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他曾被调去编纂《沙俄侵华史》。“四人帮”倒台之后，仍旧回大学执教，带过研究生，这自然是后话。

在当时，被下放的人或多或少有点儿什么政治问题，如右派、四类分子等，张老师到底 有什么问题谁也不知道。我们不见他有沮丧、怨天尤人的情绪，反倒乐呵呵的，比我们这些 上海知青达观得多。

开始，他和我一起出工，后来由于视力不行，常把苗当做草给拔了，就让他负责积肥。从此他每日赶着个小毛驴车，到处铲牲畜、家禽的粪便，然后与青草伴在一起沤肥。他很认真地做这个活儿，日日乐此不疲。收工回家，一路上见到有秫秸、树枝什么的都俯身拾起，回家当烧柴。有时手里拿不下，就用胳膊一夹。日子久了，社员就给他起了一个“杆儿柴”的绰号。

张老师及其家人都对我很好，至今我还时常想起当年的情景。

有一次到草原上去打草，直到太阳将落山方收工。我和张老师坐在装着高高青草的马车上往回去。晚霞镀着我们的后背，给每个人的轮廓镶上了一道金边，草原此时蒸腾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一路任凭晚风吹拂，惬意极了。张老师许是被这大自然感染了，轻轻吟道：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被这苍劲而淳朴的诗句深深打动，我读过这首古诗，但此时此景能没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吗！自然而然张老师和我们谈起了读书。从年龄论，张老师是长辈；从资历论，他是大学教授；再从知识论，他学富五车。而我，尚是一个小学毕业，嘴上没毛的后生，根本没读过几本书，谈起读书心里一阵阵发怵。而张老师那天精神特别好，从诗词谈到古文，给我讲秦始皇、李世民，甚至给我讲了好长时间的甲骨文。他津津有味地比划着，“脚”甲骨文怎样表示，“手”是怎样表示，“身”又是怎样表示的。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像形字的演化。看他的眼神，似乎我成了他的学生，他又回到了课堂。虽然那天我听得很少，但对我以后的兴趣乃至人生道路的取向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张老师的小儿子那年大概十岁，叫小卉。他与我最好，常随我一道去草原上放马，爱听我讲上海的故事。时间一长，他的几个姐姐也和我熟了。我十分眼馋他家的那些书，便让小卉给我借几本。很快他就给我取来了一摞书，记得有《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有张恨水的《水浒新传》等。

这些书还未等我读完，就出事了，张老师发现书没了大发雷霆“谁把书借出去了？”对几个子女简直就是拷问，张老师原来爱书如命。眼看小卉在劫难逃，他二姐挺身而出，承认书是她借出去的，是打是骂由她承担。二姐就是上面提到的长得象林黛玉的那个，由于弱不禁风，张老师想要惩罚也不敢下手，只好责成她去要回。

那天，小卉来跟我要书，说了这事，我惭愧、内疚了半天。不曾想小卉告诉我，他二姐说了，书先拿回去，等她爸气消了再借给我。果然不久，这些书又回到了我的手中。我从张家陆续借了好些书，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有几本在我的书架上，作为永久的纪念了。在斯文扫地的文革时期，能读到像样的书是我的幸运，想来，张老师一家藏着这些书也担着风险呢。

张老师住的土屋前有一片空地，他用来种了一些土豆、茄子、辣椒和豆角，一个知识分子，伺弄的菜蔬倒长得格外的好，特别是他种的西红柿又大又红，叫人馋涎欲滴。当地农民或许善于放牧骑马，对菜园却缺乏耐心，常年吃小葱蘸大酱，见到张老师的这些东西很是希奇。张老师常常送些给左右邻居，小卉自然更是经常给我捧点儿黄瓜、西红柿什么的。有时张老师高兴了也会邀我去小酌一番。出乎我意料的是，做学问的张老师对吃颇有研究。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很少能吃上肉，但他都能设法弄上几个精致的小菜，如凉拌黄瓜、油氽青豆（不知何处来的）、土豆泥丸子等等。用张老师的话讲，吃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文化，是根本的文化，民以食为天嘛。他认为一个人在吃的上面适当花一些工夫是值得的，不讲究吃的人是不会生活的人。现今人们常把“吃”美称为“食文化”，成了时尚，想当初张老师的观念，可谓先见之明。

张老师是在八十年代初去世的，那之前不久我还到长春见过他。当时他中风初愈，对我说开学以后还要带研究生，他的敬业精神我十分佩服。不料没多久，张老溘然谢世了。至今他的音容相貌在我脑中仍十分清晰。记得他回东北师大以后，我曾到他家不下七八次，他先是住在校园里，后搬至自由大路。每次，张老师和师母鲍姨（我

们知青对张师母的称呼)及全家对我都十分热情，设酒款待。我则以故旧自居，一头扑进张老师的书房，此时的张老对我已不“设防”。

有一次，我漫无目标地浏览张老师的藏书，见有一套保管得极好的《汉书》线装本，便提出能否借回一阅。张老师闻后沉吟少许，对我说：“想读《汉书》，固然是好事，但是现在最好先看《资治通鉴》，内容虽不尽相同，大致还是一样的，只是更容易读一些。”张老师的一席话当时我尚未完全听懂，后来渐渐体会，方知十分中肯。再后来当我吃力地啃着王力教授的《古代汉语》时，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当初多么轻狂。

13. 老钟家的

东北乡下风俗，对某某的媳妇不直呼其名，而是称“某某家的”，“老钟家的”便是生产队钟队长的媳妇。那时生产队有好几个队长，有管政治的政治队长，管农业生产的农业队长，管畜牧业的畜牧队长，管治安的治安队长，钟队长是管农业的生产队长老钟家的是个出名的能干娘们，我们知青进沈家的第一天就认识她了。

为欢迎知青的到来，给知青接风，队里特意熬了白面和豆油，又想法子搞来了土豆和牛肉，专门指派能干的女人为知青做第一顿饭，这个能干女人就是老钟家的。我记得她那时约莫三十多岁，长头发拢在后勺，上面插着一柄发卡，这在当时是乡下的时髦。她高高地挽着袖子，忙里忙外的，精神抖擞，给人印象很深。

吃饭时，这帮在上海长大未曾尝过艰辛的知青，并不觉得这白面饼和土豆烧牛肉怎么好吃，牛肉一股膻味，白面饼咬上去全是沙子。大家吃吃扔扔，糟践了不少，桌上地上都是。老钟家的默默地把它们收拾起来，放在一个盆里，我们想她是拿去喂猪吧。后来我们才知道，老钟家的是把它们拿回去给她的孩子们打牙祭呢。在乡下，这些白面饼和土豆烧牛肉只有过年才有可能吃得到。

老钟家的有一手好针线活儿，知青们常去求她做这做那，她也从不回绝。我请她补过衣服，作为回报，送一些上海带来的线团、火石、毛巾之类的东西给她，她十分高兴。一来二往，全屯就数老钟家的与知青关系最密切，尽管也有人嫉妒，可谁又能比老钟家的手更巧呢？但是，半年之后知青竟成了老钟家的仇人，这是任何人始料未及的。

老钟家的生过六个孩子，大女儿几乎跟我们知青一般年龄，而小儿子尚不会走路。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子里做媳妇不是那么容易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年年有几个月要断粮。男人当队长，没工夫顾家，老钟家的便撑起全家的天。她爱面子，孩子多，个个要整整齐齐(当然，那时的条件再整齐也好不到哪儿)，缺粮，她暗中想方设法，绝不让人瞧不起。

可这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使老钟家的再也抬不头的事情。而我，与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粮食上场之后，剥玉米叶是一项重要的活计，就是将玉米外裹着的那层东西剥去，这活儿虽然枯燥无味，但很适合女人干。平时太阳好的日子，妇女们老老少少坐在场院里一边剥玉米，一边说说笑笑，很是热闹。一俟刮风下雪，天冷得嘎嘣嘎

喘的时候，队长赶着撵着谁也不肯去场院。唯有老钟家的天天将手抄在羊毛暖袋里，顶风冒雪去剥玉米。厚厚的积雪盖在玉米堆上，要将玉米从雪堆里抠出来才能剥，其辛苦可想而知。原来只知老钟家的是队干部家属，以身作则理所应当，做梦也未曾想到这里面的名堂。

那年我负责看管场院。一天，队里的一把手杨队长将我叫去，嘱咐我要负起责任来，千万不要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眼下最要紧的是防范偷盗集体粮食的人，能逮住一个两个的更好，以惩一儆百。受了那么多年阶级斗争教育的我，自然一下子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了，顿时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第二天，我就设下了埋伏。万万没想到撞进网里的竟是她。

那是一个雪天，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洒着，屯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息，人们多猫在家里取暖。我匍伏在场院角落的一个草垛旁，紧紧盯着场院中央的那一大片玉米堆。羊剪绒皮帽上，棉袄上已落满了雪花，两条腿也快冻僵了。远处玉米堆旁只有一个人在剥着玉米。她，就是老钟家的。我清清楚楚看准了她将玉米一穗一穗放进暖手袋里，然后，装作解手送回家去。真有偷的，我怒不可遏，那时每个人的阶级觉悟足以大义灭亲，在她运送第二次的时候，我等在了场院门口。后来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不仅钟队长在全队大会上作检查，并且以一穗玉米罚十五穗作了处理。自此，钟队长人蔫了，话少了。几天后，传来老钟家的疯了的消息，说她在家披头散发指名道姓要找我，把事情说说清楚，吓得一些女同学直劝我多躲着她点。事后，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儿做过了头。

过了许多年，虽然我也早已离开沈家，我还是特意到她家去看过他们，没见到钟队长夫妇，只见到他们的几个孩子，送他们一些糖果，算是表达我的歉意吧。

14. 知青的夹生饭

我们的饭并不是通常吃的的米饭，而是玉米面做的大饼子。这是与窝窝头类似的东西，只不过窝窝头是放在笼屉上蒸出来的，而大饼子是将和好的玉米面做成饼状贴在大铁锅四周，锅底放些水再蒸熟的。一开始，知青们吃不惯大饼子，觉得难以下咽，然而，当后来干了大半天累活，饥肠辘辘的时候，吃起来还是很香的，特别是在玉米面里掺些黄豆粉，做出大饼子带有甜味。还有那一层锅巴，当时觉得比饼干还好吃。当然只有农民家才做得出这样的大饼子，知青做的则完全两码事。吃惯大米的上海知青，插队之前从未见过玉米面、高粱米之类的粗粮，更未做过。如今，不仅是主食，而且要会做，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人做饭在乡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队长分工：女知青轮流做饭。于是，九个人定下规矩，一人烧一个星期的饭。女知青烧的第一顿饭就告失败——饭烧焦了，黄的大饼子成了黑的。以后相当一段日子，我们的饭不是焦的就是生的，偶尔碰巧做得一锅好大饼子，大家你抢我夺的，捷足先登的早把一只只锅巴揭掉，剩下难咽的没锅巴的大饼子。有时，连着几天大雨，知青的柴禾被浇透，无法生火做饭，十八个人只好由队长硬派到社员家搭伙。

知青不懂得翻晒粮食，经常成袋成袋地发霉(土话说“捂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啃发了霉的面做的大饼

子，实在不能吃了，统统拿去喂猪。青玉米下来了，经队长同意缺粮少柴的知青可以吃青玉米，这是特殊待遇，叫“啃青”。因为知青吃了很长时间霉玉米了，再吃下去要坏身子，而社员绝对不可“啃青”。一穗玉米到秋能打四两粮，青玉米充其量能算二两，“啃青”太糟践了。玉米秀穗后，队里有专职护青员，抓住偷青的要狠罚。乍吃青玉米时，觉得又鲜又嫩，十分可口，时间长了，都消化不良，拉出来的尽是一粒粒整个儿玉米，后来，见到青玉米就反胃。这样的生活大约半年以后才逐渐好转。

15. 知青W的故事

小W的出身据说是上海过去的望族，解放后虽已不再有权势，但由于家境殷实，又是三房合一子，也养尊处优十几年。八旗子弟多不济，小W生就一身懒肉，生活尚且不能自理，不用说参加农业劳动。偏偏让他赶上这个年代——插队落户，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使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玉米尺把高的时候茎又脆又嫩，铲地最忌伤苗，只要被锄头划破一个小口子，风儿一吹苗就会折断，此时再补苗为时已晚，所以这个时候铲地要比平常小心的多。小W本来动作迟钝，眼睛又近视，铲地的速度还没有半拉子的一半快。队长也不要求他有什么速度，只要他能出工，就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一日铲地，远远落在后面的他灵机一动，先是大刀阔斧地将草连苗一起锄下，然后回过头来将无根的玉米苗一棵一棵插进土里。这样，就不必细细地区分草和苗了，一时速度大增。队长不知就里，还当众表扬了他。但太阳一晒，无根的玉米苗没精打采都蔫了，这时大家才明白他创造的是什么样的“快速铲地法”。个个哭笑不得，队长气得火冒三丈，操起锄把就扑了过去，众人慌忙拽住。小W见势不妙，一连半个月称病不敢出工。

下乡时，小W带了许多食品罐头，有午餐肉、栗子鸡、红烧牛肉和各种果酱等，一直藏在箱子里，即使大饼子再难吃，他也没去碰它们。原因很简单，他无法打开。有一天他跟我商量：如果能给他开一听罐头，他就送一听给我。这等好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岂能不答应，不过为避敲竹杠之嫌，我建议打开罐头后分享即可。小W闻后十分愿意，嘱我此事不值与旁人道，当即分享了一听午餐肉和一听什景果酱。后来一连几天，我享受着过去从未吃过的美味，乐不可支。但好景不常，不知是谁得到消息，参与分享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多星期，罐头便全部消灭。

小W不会洗衣服，也实在不愿意洗。衣服脏得没办法，就老大一堆泡在水里，倒上点洗衣粉，浸它个把星期，拎起来一晾，就算是洗过了。他更懒得洗脸洗脚，即使偶尔洗一回，洗脸水洗脚水放上半个月也不会去倒掉。

那年冬天，知青们获准回上海过年，一个个逃也似的回去了，小W自然更是迫不及待。他把平时穿的用的衣服、鞋袜、毛巾、脸盆等一古脑儿塞进大皮箱，加上锁，匆匆打道回府。过完年知青们陆续回到沈家屯，唯有小W在上海优哉游哉。春暖花开，大地解冻，小W的皮箱滴滴嗒嗒不断往下滴水，地上湿了一大片。大家直纳闷，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待小W回来后这个谜才解开，原来他走时慌张，将洗脚盆连同里面满满的结成冰砣的洗脚水一起藏

进了皮箱，这样，不化出水才叫怪呢。

16. 独到有趣的见解

初到乡下，有人问上海有多大。我告诉他大概有多少多少方圆，有多少多少人口，比划半天其仍不得要领，便问：“上海一天杀十头猪够吃不？”见多识广的李会计一旁摇着身子晃着脑袋道：“照你这么说那能叫上海吗？少说一天也得二三十头。”绝了，一个地方的大小可以用消费多少头猪来估算！上海人一天到底要吃掉多少只猪，谁能说得清。就拿当时每人每天平均消费半两肉来估算（按凭票供应计算），上海每天杀的猪用火车来装，也要几十节车皮。这个想法当时我可没敢说，一怕他们不相信，二怕吓着他们。

在屯子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屯子里里外外的小水沟里都有鱼，即使当年盖房子取土新挖出的水沟，只要一场雨后积满水，里面照样有大大小小的鱼。小不赢寸，大不过巴掌，老乡们捞起晒干后生吃，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煮鱼。在这草原上，既无养鱼的池塘也无养鱼的习惯，方圆几十里没有河流，水沟里的鱼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十分希奇，问老乡，答道：草籽变的。回答得那么自信，乃亘古不变真理似的，任我一旁惊愕不已。

一天，在地里干活，有个老乡问我，外国人那么笨，为什么还欺负我们中国人。他此话一出口，我便有点肃然起敬。要知道，平时干活时，老乡们除了打情骂俏开些粗俗的玩笑外，再无别的节目。今番他能问这个，当然我要刮目相看。只是弄不懂他何以见得外国人就笨呢？我只得请教了，而他的一番话简直没把我乐死。他说：听别人讲外国人一直在研究我们中国的元宵（南方叫汤团），可就是不知道这馅儿是怎么放进去的，难道这还不笨吗？他把相声当真了！

17. 乡间的美味

春头上，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玉米面，什么吃的也没有；又值种地，活儿很累，日子过得最为艰苦。老乡们往往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四处捡些干牛粪，拢上火，待牛粪烧旺之后，将播种用的黄豆或玉米撒几把里面，然后把明火压灭，再用小树棍拨拉几下，只听火里面劈里啪拉作响，不一会儿便闻到香味了，一颗颗开了花的黄豆或玉米就会从牛粪里蹦出来。四周围的人忙不迭捡起扔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不怕烫嘴，更不怕脏。

起初知青们对此不屑一顾：牛粪里的东西，谁敢吃？后来馋得熬不住，男同学率先开戒，加入刨牛粪的队伍，直嚼得满嘴发黑。逐渐有大胆的女同学加盟，只是她们吃相不像男同学那样毫无顾忌，嘴唇略微有些发黑罢了。现在讲究回归自然，时尚野炊、烧烤，是一种上档次的享受，而比起我们那时的吃法，这种享受恐怕还“回归”得不够。

青纱帐起来的时候，也是我们日子最好过的时候。菜蔬瓜果开始上桌，虽然知青们不是天天吃得到，但毕竟不再上顿下顿吃清水煮咸萝卜了。最为高兴的是我，因为放马，常在屯外的荒野草原，与别屯的几个小马倌将马群合在一起，派一个人看着，腾出工夫可以随心所欲地找些东西吃，如青苞米、甜高粱、沙拌鸡的蛋等等。当然，我们马倌吃青苞米不会只是放在水里煮一煮，而是有更高明的吃法。

首先，我们会侦察哪块地的苞米不老也不嫩，只要合适，不管是哪个屯的，尽管取来，那时小马倌们挑剔得很，老一点嫩一点的都不要。再派一人去割草，反正草原上多的是。草被捆成一大堆，判明风向，把迎风那头用火点上，风一吹，火旺旺的，这时，将青苞米一穗穗靠在火上，不时去翻转一下，一支烟的工夫，香喷喷的苞米就烤好了。这种吃法，乡下叫做烧苞米，十分好吃，我至今忘不了那股焦脆香甜的味儿。

甜高粱，在我们江南称作甜芦秫，小时候常吃。春天种高粱时，有人将甜高粱籽偷偷种在高粱地里，记住哪块地哪条垄，待长成之后，按记号找到那儿，可大嚼一顿。这种行为当然要背着队长，否则会因破坏生产论处。小马倌真神，他们知道哪个屯，哪块地，哪条垄有甜高粱，往往不等种甜高粱的来享用，早已捷足先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只好“同流合污”，照吃不误。有时一天下来，直嚼得腮帮生疼。

如果我们在草原上捡着鸟蛋、沙拌鸡蛋和野鸡蛋，就用马口铁罐头盒装上，放点水，架在火上煮，熟了便分而食之。草原上有的各种野果野菜可以解馋，如野姑娘（学名酸浆，茄科）、天天（学名龙葵，茄科）、甘草以及野韭菜、野葱野蒜等，随手摘了就吃。有一种野草叫“黄瓜香”，阳春时节就遍布草原，把它的叶子用手揉一揉，然后放到鼻子前，就会闻到黄瓜的清香味，这在真正的黄瓜刚刚下种的季节，着实是一种享受。闲来无事，我们常会闻它，特别是口渴躁热时，闻之则会觉得清凉镇静。

18. 接受再教育

初来乍到时，本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情，见到老乡十分恭敬。时间一长，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贫下中农有他纯朴、善良、勤劳的一面，也有保守、自私、狭隘的一面，况且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队里有帮派，分成三四伙，总是有人想把知青拉到自己这伙来。为争取知青，老乡们很愿意为知青出力，出主意。但由于张三李四意见常常相左，知青也弄不懂到底应该听谁的，照谁的办好。

集体户（那儿对知青户的叫法）开春要抓一只小猪，问老乡，这个说知青没有饲养经验，还是抓只半大的克郎易养，（当地语，克郎即已经半大但尚未育肥的苗猪）。那个听说，便气忿忿地道：“谁的馊主意，知青有的是吃不完的糠，留着干什么，抓只小猪喂喂不好？”结果我们抓了一只光吃食不长膘的僵猪，喂了一年才六七十斤重。

有一次我为集体户搭鸡窝，辛辛苦苦干了一上午，一个老乡过来说，这么搭不对，应该怎样怎样搭地说了一

通，于是我推倒重来。傍晚，老乡们都下工回来了，有一个见了我搭的鸡窝评价说：这简直是没长手干的活儿，哪个师傅教的。我解释是某某教的，不听则罢，一听他便骂上了：真混，知青不懂他还不懂吗？纯粹是糊弄人。随即又让我再推倒重来。就这么费了一天的工夫，鸡窝硬是没搭起来。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无关原则，而另外一些则不然。

马圈门缺一根栏杆，我向一个老乡打听何处可以找到，他告诉我可以到屯子外的树林里去砍，并笑我傻，说东北有的是木头，去砍就是了。第二天一早我拿把斧子就到了树林里，选了一棵比碗口还粗的白杨树，吭哧吭哧砍了大半天才放倒。我正在修掉树枝，一群中学生放学经过这里，见我在伐树，吃惊地问是谁批准的，他们还说未经批准伐树就算破坏防风林，罪名很大，要专政的。之后几人嘀嘀咕咕地商议了一阵，问我是不是上海知青，我说是，他们叫我快把树拖走，说以后千万不能再砍了。从他们的严肃劲儿就知道这事不对劲儿，我上当了。回到屯子里，又去问那个老乡，他居然反问我：“你真的去砍树了？”后来，队长问我是否真有其事，我如实承认，他认真嘱咐说以后对谁也别再提此事了。从此之后，对贫下中农的话我就三思而行了。

知青的衣物时丢失，有知青们自己搞丢的，但更多的被老乡顺手牵羊取走了。找不见的痰盂罐被老乡放在窗台上种花；丢失已久的钢笔会在老乡小孩的书包里；晾在外面的衣服有时会成为老乡的棉袄里子。

凡此种种，使得贫下中农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有了折扣。说来还是自己幼稚，贫下中农本来是普通的农民，也有七情六欲，就文化知识来说尚需接受教育，怎能把他们作为完人来要求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口号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政治意义已大大超过实际意义，无限夸大、拔高的抽象的贫下中农形象，使广大知青敬畏。下乡使得知青走近贫下中农，了解贫下中农，随即而来的是，由于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完美的贫下中农而大失所望。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19. 到国营农场偷草去

六十年代末，文革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国家失去了一切规矩和章程。本来防风治沙已取得极大成效的科尔沁草原，由于人们数年忙于“革命”，疏于治理，风沙复至，草原沙化严重。加之人们不再受轮牧规定的约束，任意放牧，草场土壤板结，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青草越长越瘦，越长越矮，已不再有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草场夏天放牧还可以应付，而牲畜在漫长的冬天所需的草料无处可觅。众多牲畜的生死存亡，作为严峻的问题摆到了队长们的面前。到种羊场去偷草，这是队长们达成的共识。

种羊场是国营农场，专门繁育有名的东北细毛绵羊，场部距沈家屯约有四十多里地，最近处只有十七八里地，坐上大车不一会儿就到。那儿土地肥沃，青草茂盛，由于近年种羊繁育工作几乎停止，已不需要那么多的草料，一年年白白有许多肥美的青草任其枯荣，甚是可惜。近旁的屯子就组织人力去偷打。

开始，种羊场并不当回事，偷打草的人多了，他们发现事情严重才派人护草。护草人员常常与偷草的人发生冲突，甚至导致流血，种羊场便成立了一支强悍的护草队，配备了快马，步枪等，一时偷草之风有所收敛。但毕竟鞭长莫及，我们屯子每年要去偷几回草，一次也没有被发现过。

偷草的决定作出后，队长们确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接下来便是动员了。过去由于怕出意外，女人们老是拖男人的后腿，不让参加偷草。今年队里来了知青，偷草的力量大增，不用动员，就那新奇劲儿足以吸引他们。几乎男知青全都要求参加，队长挑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又指派了若干年轻社员，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偷草突击队”，我作为报名态度坚决者，也吸收为队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们分乘三辆马车悄悄出发了。

三挂马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急驶，马儿都被摘去了铃铛，马蹄上裹着麻袋布。人们手里紧紧握着钐刀（一种把儿很长的大镰刀），一声不敢响。黑夜中，只听得碎碎的、发闷的马蹄声。远远的有一对对幽绿幽绿的亮点，那是夜晚在草原上游荡的野狼。马蹄不时惊醒栖息在草丛中的飞禽，劈里啪啦一阵乱扑腾，有的甚至撞到身上。

离种羊场越近人们心里越紧张，毕竟是偷草，总有点心虚。突然，打头的队长坐的马车在一声“吁”中停住了，随后两挂马车也站住了脚，队长轻轻叫大家不要动。远处传来马蹄声和吆喝声，并有手电筒的光柱在四下晃悠，碰到护草队了！大家屏声息气，心都悬到了嗓子眼……慢慢地，手电筒的光渐渐远去，众人才松了一口气。队长当机立断，就地打草。人们赶紧跳下车，拉开阵势，挥动钐刀，唰唰地使劲打起草来。

这儿的草又肥又厚，一刀下去倒了一大片，真过瘾。队长在黑暗中猫腰走过来，叮嘱大家 千万小心不要砍了别人的腿，如果差不多了就 赶紧装车。约莫也就半个多小时，这一片的草 就全打光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开始装车。 这时出现了问题，有的人在黑暗中再也找不到 自己刚才打下的草，急得团团转；还有的人只顾装车，钐刀不见了，四处寻找。如此，这群偷草的队伍里就时断时续地发出了响声，本来已远去的手电光又朝向了这个方向，护草队发现了。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是急促的马蹄声和叫喊声。

“偷草突击队”顿时乱了套，队 长一声令下，草不要了，赶快上车撤。各车只装了一半的草，人们纷纷爬上去， 赶车的抹过马头，狠加一鞭，马车飞也似地跑了起来，慌不择路，漫无目标地在草原上奔驰，颠得我们都坐不住，东倒西歪的。车上的草哪 儿还留得住，一路颠撒而去，待护草队的踪影消失时，车上的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狼狈不堪的“偷草突击队”终于在天快放亮的时候陆续回到屯子，检点队伍，丢失钐刀两把，跑掉球鞋一只，人马无伤，万幸！

20. 乡土文化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桃花源里的人“不知有汉”，意喻与现世隔绝之深。我觉得，沈家屯里的人们除了受到文革有限的一点影响，搞一些天天读、大批判外，文化上与外界相距甚远。整个屯子没有一台收音机，手表或自行车，更谈不上电话。有一次县道上开过一辆公共汽车，人们都登上房顶，那兴奋劲儿就甭提了，不停地喊“大捷克、大捷克”，似乎见到了U F O。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说沈家屯就没有文化，它有它的文化，这么多年来，人们也没觉得文化不够用。

沈家屯的人们有说不完的“俏皮嗑”，也叫俏皮话，文雅一点，俏皮嗑当属幽默一类。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人，只要说话，就有俏皮 嗑。屯里有特别喜爱并且擅长俏皮嗑的，人们 称之为能“哨”，当两个能“哨”的碰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要发生一场舌战。那时，他们各自抖擞精神，摇动不烂之舌，千方百计要战胜对方。舌战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一般都是一 边干活一边进行，所以并不碍事。胜者自是得意万分，以后一般人是不会与之对阵的。俏皮嗑以歇后语为多，利用谐音造成误解而产生幽默、风趣的效果。因限于生活环境、文化程度，就其内容而言常常粗俗不堪，几乎离不开一性字，有时简直就是赤裸裸，丝毫不加掩饰，他们把这叫做“荤”的。初涉人世的上海知青，尤其是女同学，根本无法卒听，只好逃之夭夭。 也有“哨”起来不开荤的，那只是个别读过高 小或初中，稍有文化的人。还有一种文化，层次要高于俏皮嗑，就是流行于东北各地，源远流长的“四大××”。“四大××”系三句为一组，押韵而又非诗，有长有短的语句，由于朗朗上口，老老少少能说上几句。其就形式来讲，接近于不受格律严格约束的白话诗，它常常有一个题目，诸如“四大黑”、“四大红”、“四大快”等等。也许最初是边民借以抒发粗犷豪放胸怀之用，而今却成了农牧民口中猥亵的小调，其内容依旧是“荤”得可以。它往往以前两句起兴， 第三句开荤。

如：

四大窄

睡扁担，盖鞭稍，

长长的头发细眉毛。

再如：

四大红

杀猪的盆， 庙上的门，

秋天的辣椒火烧云。

上面前两句均竭力夸张“窄”与“红”，第三句开始，本来可以顺势用更夸张的东西来表现“窄”和“红”，然而在这儿却转成“荤”的了，而且绝大部分与女人有关（以上例子均已作净化处理）。

另外，老乡们还喜欢把一些身边人身边事。编成顺口溜，听起来既滑稽又形象还亲切，叫人忍俊不禁。记得有这么一首：

李大蘑菇蒋老广，曹老秧子牛大晃，

严大胖子王胖子，庄瞎驴子陆瞎撞。

这首顺口溜提到了八个人，前四个是老乡，后四个是我们知青。里面基本概括了这八个人的性格和特征：李大蘑菇是政治队长，动作特慢，故有蘑菇之雅号；蒋老广谓此人出去闯过，见多识广；曹某与牛某则一高一矮，“秧子”即长不大的意思。诸如此类，一首顺口溜活脱脱画出了八个人，可谓精练有趣。

21. 婚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贫困的农村竟那么沉重。小Y二十有几，按风俗早该成家立业，但谈起此事，他总是一脸苦笑，说：“谁肯跟我？”小L是个相当俊的小伙，找了好几个对象都不成功，依旧光棍一条，原因是给不起彩礼。屯子里有姑娘嫁出去，却不见有新娘娶进来。唯一的办法：亲上加亲，屯子里的小伙娶屯子里的姑娘。因此就出现了不少五服之内和错辈的婚配，昨天还喊“叔叔”，今天却要称“当家的”；平时一口一声“姨”的，这回成了“屋里的”；从小一起泥里水里滚大的男孩女孩，一下子变成了夫妻。怪不得我们见屯子里家家户户都能连上亲，缘由即在于此。

使小伙子抱有希望的是，集体户里那么多上海姑娘，假如能够……，屯子里的小伙或多或少对此有着美好的憧憬。家有儿子的大娘特别留心女知青，千方百计与之拉关系，送鸡蛋、送粘豆包（用大黄米做的一种食品，类

似糯米团子）、帮助烧开水、做被子等。在现有的条件下，离乡背井数千里，一旦有人体贴、关心，便十分感激。加之上海男知青不适应东北农村的生活，自顾不暇，一个个蓬头垢面的，并不比土生土长的小伙子强多少，此时若作一次民意测验的话，上海女知青多半愿意嫁给当地小伙，事实上其他大队、公社已经有上海女知青嫁在当地了。娶上海知青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索彩礼。因此，瞄准上海女知青的人家越来越多，个别不轨者甚至使用暴力强迫知青就范。不久，中央发出了有关知青的二十六号文件，意为严厉打击侵害知青利益的犯罪行为。接着知青开始上调，几年内大批知青被抽调到城市。由此，屯子里的小伙子渐渐断了对知青的念头。尽管贫困，还是有宁愿债台高筑也要凑足彩礼的人家，老刘就硬是东挪西借凑了八百块钱，给大儿子刘金财从乌兰（地属科尔沁左翼中旗）说了一个媳妇。这可是沈家屯的一件大事，整个屯子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直盼娶亲的日子快到，好瞧瞧新媳妇到底啥模样。终于到了成亲的这一天，老刘邀全屯的姑娘媳妇、老少爷们去参加婚宴，全体知青也在邀请之列。婚礼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一拜高堂，二谈恋爱经过，新娘红着脸一言未发，只好匆匆送入洞房。接下来开饭，大家就盼着这一刻呢。大碗大碗的高粱米饭端上来了，大盆大盆的豆腐炖萝卜也端上来了。高粱米饭通红通红，豆腐萝卜雪白雪白，人们大口刨饭，大块吃豆腐，十分酣畅。老刘一个劲儿劝“大家多吃，大家多吃”。要知道那时候乡下吃豆腐比城里吃肉还难，尽管东北盛产大豆，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把所有的豆腐坊都给割掉了。看到现在的青年人结婚那个排场，我真替老刘的儿子喊不平，同样是人，同样是结婚，为什么一个天一个地？

22. 一年只刮两次风？

老乡们好谈谐，刚到时有对我们说：“这儿风不多，一年只刮两次”，卖一阵关子然后说：“一次春天刮到秋天，另一次秋天刮到春天”。好哇，一年刮到头。知青到这儿后第一个下马威就是风沙。

在上海，大家都知台风的厉害，殊不知这儿的风沙更厉害。台风虽强但无沙，这儿的风不但强于台风，而且夹裹着细沙，一刮就是昏天黑地的好几天，未曾亲身经历的人很难体会那风沙厉害的程度。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播下的种子已变成小苗，嫩嫩的绿草齐刷刷地钻出了土壤，远近的柳树、榆树也挂满了鲜嫩的叶子，一派春日融融的景象。然而风沙一起，三天之后再看，苗呀草呀全被黄沙掩埋，树叶全被风沙打光，整个大地重又一派萧杀。

集体户初到缺柴烧，我们常到西岗子刨楂子（楂子是苞米或高粱收割以后剩下的根，可作柴禾用），累了就往垄沟里一躺，既是休息又是避风。有一次我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整个下半身已被沙子埋住，鼻子、耳朵里全是沙，差点儿活埋了。

队里经常有猪羊不小心掉进屯子周围干涸的水沟，爬不上来而被风沙活埋的。风沙大的时候，就象江南雾天里一样，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即使近在咫尺，说话得大声喊，连声音都被刮跑了。老乡们在风沙中练就了一手绝

活，那就是点烟的技巧，无论风沙有多大，老乡都能用火柴把烟点着，这实实在在令知青中烟民们敬佩，当然，不久他们便学会了这一手，也许这阵还在受用呢。

这儿谚语道：风三，风三，意即风只要刮起来，至少要三天，有时甚至要半个月。风是一年四季都刮的，只是夏天带的沙少些，冬天如果雪大，沙子也不会太多。春秋两季的风沙最为可恶，喝的是泥浆水，因为井里全是沙；吃的是牙碜饭，因为锅盖也挡不住沙。身上有沙，铺盖上有沙，上下牙齿一咬，咯吱咯吱还是沙。知青对风沙真是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但风后，仔细观察那沙子，发现这沙子细得那么匀，简直比最细的绵白糖还细，里面大都是晶莹透亮的石英沙，在放大镜下，十分美丽。我曾带过一包沙子到上海，亲朋们说真难相信这沙子是天然的，这么可爱。如果没有尝过风沙的苦楚，我也会这么想。

石英沙是生产玻璃的原料，双辽县后来建起了大型的平板玻璃厂，成为我国重要的玻璃产地，还主要得益于这石英沙呢。

23. 茫茫的大草原

记得有一首歌开头唱道：“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那雄浑、低沉的旋律给人以不尽的遐想。草原究竟什么样？在上海的时候，不管我怎么去想象，无非是比中山公园里的草坪还大一些的草坪罢了。当来到科尔沁草原，驱马在草原上放牧，整天只见牛羊而不见人影的时候，对草原的概念才真正有所了解。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是我对草原产生的第一个印象。早晨，我驱赶着马群来到草原，将坐骑束拌好之后，就可以随意活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春天，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绚丽的野花，红一片黄一片。放牧归来带上一束，就如带回了春天，女同学们常常要去插在杯子里欣赏。草原上有数不清的蘑菇，可寻常看不到，一旦你碰到了蘑菇圈，运气就来了。草原上的蘑菇有个有趣的生长习性，要么一颗蘑菇也不生，要么周围一大圈都是蘑菇。只要你发现一颗蘑菇，就能在附近找到很多很多。老乡们将采来的鲜蘑菇晒干，留着过年过节或来客人吃。蘑菇炖鸡是这儿过年吃的最好的菜肴。

草丛中，隐藏着许多鸟窝，里面有斑斓的鸟蛋，有刚出壳的小鸟。只要人走近，亲鸟就会在你头顶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还会装出受伤的样子在地上扑楞，引诱人去追赶。我喜欢蹲在鸟窝旁观察雏鸟，用手引逗雏鸟张开黄黄的喙乞食，任凭一旁亲鸟急得不可开交，甚是有趣。但我从不去动它们，因为在此刻，这茫茫大草原上的所有生灵都是我的伙伴。

草原上的草有无数的种类，我曾采集草的标本，试图弄清到底有多少种，此事最后虎头蛇尾，没有结果。但当时的确给我带来了许多消遣。草原上常常是整天碰不见一个人，只见绿草、马儿、云彩。可以听鸟儿啁啾，可以

吟哦自赏；可以大喊大叫而无所顾忌，可以枕臂仰天看白云变幻无穷。渴了，灌几口水壶里的凉水；饿了，啃半个带着的大饼子。初时，笑苏武北海牧羊那般哀怨凄苦，全没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精神。时间一长，孤独无聊袭来，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草原并非总是美丽的，在草原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时候，你会感到天那么低，低得简直在朝你压过来，黑色的云伸手可揽。环顾四周，除了马还在低头吃草，再无二人，你会觉得整个世界只有你一人在与自然抗争，而面对漫无边际朝你压过来的黑云，面对茫茫的 在风中剧烈摇动着，任凭大自然摆布的野草，你又会觉得人的力量多么单薄，多么渺小。

24. 捡鸟蛋

屯子西去，穿过草原约二十多里，有一片水泡子，水泡子在东北是湖的意思。水泡子方圆有十几里，遍长芦苇，周围没有人家，是水鸟理想的栖息之处。听老乡说，那儿的水鸟蛋多得须用筐挎，还有一种叫大鸨的鸟，立着身高约三、四尺，一只要重八、九斤甚至十来斤，就一只蛋也要三两重。关于水泡子的传说，对我有十分的吸引力，总想去看一看，特别是那高三、四尺的大鸨鸟。

端午节，当地俗称“五月节”，照规矩队里放假一天。我喜出望外地和屯里的一些半拉子约好，放假到西泡子去捡鸟蛋。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带上大饼子和咸菜，每人还挎了一个元宝形的柳条筐，那是用来放鸟蛋的。摸着黑，我们就出发了。

翻过西沙岗，走到西甸子时，红日刚从身后升起，晨曦中，草原苏醒了。草原上，百灵啁啾，在晨风中格外清脆，远处传来马嘶羊叫，慢慢地马群羊群从阳光中溶出，星星点点散落在开满野花的绿草地上。这时节，野花开得正旺，偌大的草原此时宛如一匹七彩锦缎，任缤纷的野芳争奇斗艳。平时不起眼的蒿草、野菜，竟也能开出这么艳丽的花朵，而且如火如荼，遍布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我们行进在草原上，不时惊起不知名的鸟儿和啮齿动物，半拉子们很高兴，“哦哦……”地欢叫着，起劲地撵那些可怜的生灵，其实他们并不认真捕捉这些动物，只是当做一种游戏而已。一路上，半拉子曹小一个劲儿跟我说，上回去水泡子捡了好多好多鸟蛋，回来全腌了，上学带着吃。还说这回如能逮着一只大鸨就好了，全家能吃上几天。因此我也希望能多捡些蛋回去，最好也能抓一只大鸨，让同学们改善一下生活，也显显我的本事。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半拉子们总说快到了，没几里了，待你再走上半天，他们还是这句话。望山跑死马，何况这水泡子根本就望不见，我走得两脚生疼，双腿僵直，可脚下的草原依然遥无尽头。直到天上开始出现盘旋的体态硕大 鸨和雁时，水泡子才真正临近了。由于水泡子全被青青的芦苇覆盖，而芦苇并不比蒿草高出多少，难怪我们直到跟前未识“庐山真貌”。

站在水泡子旁，我估摸不出它有多大，只觉得青青的芦苇无边无际，它是绿的聚集，它是碧的世界。曹小对我

说，鸟蛋就在这芦苇里，鹤和大雁把芦苇结在一起，在上筑巢孵蛋，要捡蛋，就得下水。还告诫我：一定要拣有苇子的地方走，那儿水浅，若见没有苇子了，万万去不得，会淹死人的。我们将长裤脱了，挎着柳条筐下到水泡子里。水泡子的水刚没到腰，水底没有黏黏的淤泥，而是硬硬的，踩上去很是舒服的土地。我们个个举着双手，行走起来并不费力，只是密密的苇叶十分碍事，弄不好还会划破手臂。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半拉子们后边，尽量不被拉下，唯恐在荒无人烟的芦苇丛中出什么意外。不时有惊起的飞禽，拉拉地飞向天空，吓人一跳。偶尔发现一两只鸟巢，巢中并无蛋，是空的。我看见一只死了的不知是鹤还是鲩的大鸟，漂浮在水中。我走近细看，好象是中了砂枪弹死的，它长着美丽的羽毛，细细的长腿，如果活着，一定非常漂亮。我想它大概是一只迁徙途中飞经此地的候鸟，本想在水泡子中觅点食物，以补充一下体力，未曾想却死于非命。想到此，我觉得这些飞禽很不容易，行程千万里的迁徙，处处杀机，稍不小心就魂断枪口。

我随着大家，起初，还跟得上，渐渐地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大家眼睛都忙着搜索鸟窝，无暇顾及旁边的人，当我蓦地发现身旁连曹小都没有踪影的时候，心里慌了起来。我大声呼喊，没人应答；四处张望，不见人影。慌乱的我此时已不辨方向，凭感觉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往前趟，就是走不出芦苇丛。忽然我发现前面豁亮起来，仔细看，看没了芦苇，心想总算走出来了，可到那一看，仍然是水泊，水是如镜子般地清澈，映着天上的白云，只是没了苇子。我想起曹小的告诫，不敢再往前行，前面一定是水泡子的深处，危险！既然如此，转身往后走，必能走出芦苇丛。我毫不迟疑地返身折回，用双手使劲地拨开芦苇，全不顾手扎得生疼。柳条筐不知何时已丢了，只听得苇叶哗哗，我奋力行进，须知日头已经西垂，如果在天黑之前还出不了水泡子，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正当我埋头与芦苇“作战”，传来了一声声的呼喊，那是在找我呢。我一阵欣喜，一边大声应答，一边用力朝前扑腾，待我出得芦苇丛，已是筋疲力尽，动弹不得了。

半拉子们，有的捡一筐蛋，有的捡半筐蛋，多少都有收获。唯我，连蛋壳都未见到一个，还差点儿出不来。曹小见我两手空空，就从筐里拿了两只送我，说：“给，就算你捡的。”我小心仔细地观看这两只蛋，它们大如鸭蛋，上有许多褐色和淡绿色的斑点，煞是可爱。这两只鸟蛋后来我带回上海，作为珍贵礼物给了弟弟。现在回想起来，半拉子们捡的成筐的鸟蛋，是多少珍禽的后代呵，里面一定有鹤，有鹳，有鲩，说不定还有更稀罕的禽类呢。幸好我一只都未捡到，否则也成了毁灭珍禽的作俑者。

那天，我们回到屯子，已是半夜。

25. 有辱使命

打草的季节快到了，集体户还没有钐刀队长派我到公社去买几把钐刀杆，顺便再买点其它东西，如油漆、玻璃等。领命之后，我到队房牵出队里最好的大青马，套上车，径直朝公社奔去。

公社所在地是一个大屯子，也一样是土屋土墙，只是住户多一点。公社有一个商店，有好几间房大，里面既卖食品、文具，又卖杂货、农具，还有一个柜台专卖书籍。我按队长的意思将东西买齐，然后到书籍柜台，看看有什么书，我很想买点儿值得一看的书回去。

“文化革命”革了文化的命，那时的中国可说是文化的沙漠，下乡时，作为“知识青年”的我，除带了一本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别无他书。我们一有空只好打扑克，如此下去，岂不成了文盲。

别看其它柜台大都空空如也，书籍柜台上倒放了不少厚薄不一的书。有常见的《毛泽东著作》和“革命样板戏”剧本，有文痞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如《评〈海瑞罢官〉》之类，还有几期《战地新歌》。我挑样板戏剧本和《战地新歌》买了几本，回去唱唱也好消遣。出了商店，再无处可逛，抹过马头，赶车回家。

东北的夏天，到了傍晚十分凉爽，我坐在大车上，很是惬意。路旁是高高的青纱帐，随风摇曳的是正在灌浆的高粱穗儿和谷穗儿，玉米棒子则鼓鼓囊囊地被青绿的叶子裹着，只露出红红的缨子。青纱帐过后便是开阔的草原，我轻车熟路，扬起鞭子，催马快行。此刻，晚霞染红了整个草原，肥美的青草和开满鲜花的野蒿在霞光中频频点头，天空掠过晚归的百灵，“啾啾”地叫个不停。到底是出校门不久的“知识青年”，我被草原美丽的景色激动，放开喉咙，把学校里教会的，收音机里听会的歌都拿出来使劲唱，反正没人听到。我唱“敖包相会”、“草原之夜”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也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等等，直唱到自己尽兴。

我一路唱歌，大青马自顾赶路，老马识途，也不必我再吆喝，直到大车拐进屯子，我才从兴奋中醒了过来。回头看看今日买的东西，我吓了一跳，车上空荡荡的，哪还有钐刀杆、油漆什么的，全在我唱歌时被车颠丢了。想再赶车回去寻找，路已溶在茫茫的夜色中，只好怅怅地作罢。

第二天，队长听说，半晌不作声，最后嘴里吐出两个字——废物。废物就废物吧，我岂敢再说什么。

26. “脱坯打墙，活见阎王”

挂锄以后，最值得一写的活儿是脱坯和打墙，当地有个俗语，叫“脱坯打墙，活见阎王”极言这些活儿吃力的程度。脱坯和打墙，全是力气活，有力气就出活，来不得一点儿偷巧。

夏末农闲，正是盖房子的季节。这儿盖房子有两种方法，一是“干打垒”，直接用土打成墙，即在两块木板之间夹上泥土，用木榔头捶打结实，一层层打上去直至一定的高度，然后架梁上椽，铺上秫秸，用拌有碎草的湿泥一抹，房子就算盖成了。另一是先取泥拌上碎草，用水和匀闷透之后，上去几个人用脚反复踩至“熟”，再放入坯模里做成坯，在太阳底下暴晒几日，坯干透了，便可用来与砖一样砌墙。虽然土坯不如砖那么结实，但与“干打垒”相比，土坯房要上一个档次了，它比“干打垒”结实、干爽。盖房，单凭一家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由队长统一安排人力。本来知青不过去打打下手，撮撮泥呀，递个家什呀，可时间一长便觉手痒，也常常上去

比划几下。

打木榔头是最累的活，开始只觉得有趣，两个人结成对子，左一下，右一下，榔头上下翻飞很有节奏。然而半天下来，两只胳膊酸得抬都抬不起来，手腕连饭都端不住。可盖房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起码要十天左右，一般有三间房的墙要打，有大的院墙要打，再有厕所、猪圈等也要打。老乡们打起墙来劲头很足，小伙子们立在墙头上较劲，即比赛谁打的次数多，特别是有姑娘们做下手的时候，小伙子们更是撒欢地干，这时候打墙进度最快。知青也有好强的，跳上墙头与之比试，短时间知青还能占上风，时间一长，知青耐力不行，经常败下阵来。

脱坯是属众人一起干的活。和泥的，踩泥的，运泥的，脱坯的要同时一条龙进行，哪个环节跟不上，就要影响脱坯的速度。我们知青仍旧负责最简单的活——运泥。运泥的工具是一根扁担，一块用柳条编的笆子，往笆子里装上和好的泥，两个人抬到脱坯的边上一倒就算了事。可脱坯的人多，运泥的人少，一付担子要供几个脱坯的人，这就忙坏累坏了泥的。湿泥是死沉死沉的，一笆子泥好大的分量，我们一天干下来，变成泥人不算，肩膀都磨破了。即使如此，第二天还要接着干，还要两人抬着笆子一路小跑，不管你浑身上下全是泥浆，不管你的肩头磨破了多少血泡。其滋味的确是“活见阎王”！

27. “小狐狸”的由来

在知青住房还没有盖好的时候，我和另外三个知青住在贫下中农给我们指派的户长家里，户长姓丰那年二十八岁，但是看上去四十八，保证有人信。户长有个妈，五十多岁，满脸皱纹，大嗓门，一副厉害的样子。当面我们称她大娘，背后叫“疯老太婆”，缘由“丰”是“疯”的谐音。户长还有个妹妹，年方十八九岁，长得挺白净，丹凤眼，瓜子脸，叫什么名字如今记不得了，只是她的绰号仍记得很清楚，叫“小厉害”，干活时，社员们常开玩笑说她是嫁不出去的“小厉害”。

记得第一天住进她家，我们几个忙着铺开纸写家信，她却凑在一旁看，大家便用身子挡住她，她转个身子仍旧要看，嘴里还嘟囔说“俺不识字，你们怕啥”。大家认为她真的不识字，就不再躲她。时间一长方知道上她的当了，她非但识字，而且上过初中，是屯子里真正的“知识青年”，我们信中那点儿秘密全被她晓了。气得小毛直骂她是狡猾的狐狸，“小厉害”由此成了“小狐狸”。

“小狐狸”在屯子里的姑娘当中，是属小伙子眼光扫描较为集中的一个，按当地风俗，她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但慑于“疯老太婆”的威风，无人敢去求婚。丰大娘也真象一个护雏的老母鸡，护卫着女儿，不让屯子里的小伙子接近她。丰大娘不是不想让女儿出嫁，而是待价而沽，有丰厚彩礼她还是愿意嫁女的，只是沈家屯里无人出得起这个聘礼。偶尔丰大娘听说女儿与哪个小伙多说了几句话，或者与哪个小伙在一起多待了一会儿，她老人家便走到大门口，扯开嗓门就大声嚷嚷，意思说她家的女儿早有好人家了，少打她的主意；再说她的女儿又不是狐狸精，干么要围着她转。她不嚷嚷倒没什么，一嚷嚷把我们知青给逗乐了，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给她的女儿起

了“小狐狸”的绰号。

“小狐狸”其实并不如她妈厉害，我觉得她倒是挺通情达理的，平时我们缺个什么，朝她要，也没拒绝过。知青日子艰苦，做的饭不是生就是糊，不象“小狐狸”她妈在玉米面里掺进黄豆粉什么的，蒸出的大饼子又甜又香。我们时常跟她讨着吃，“小狐狸”就背着她妈给我们塞过来几个，嘴里却说：“上海人真馋”。若是让“疯老太婆”知道了可不得了，准得嚷嚷个半天。有一次小毛馋嘴在她家鸡窝里摸了一个鸡蛋，被“疯老太婆”告到了队长那儿。

“小狐狸”还是嫁了出去，嫁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她的男人是个比她大好几岁的农民据说丰大娘很满意，那家出的彩礼够厚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小狐狸”。

（最近听说其婚后不久死于难产）

28. “不愿做妇女的人们”

杨队长习惯把能干活的女人通称妇女，每日派工时，口口声声妇女们干什么什么，集体户的妇女们干什么什么。当地妇女习以为常，妇女就是妇女嘛，可上海女性知青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称呼。从小听惯的只有叫“女同学”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妇女？她们觉得“妇女”这个称呼专指已婚女性，和自己不粘边，所以这样不加区别地乱叫是不能容忍的。

起先，女同学公举女户长去与队长交涉，队长答应可以对女知青称“女同学”而不称“妇女”，可早就习惯了他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妇女二字依旧时常挂在口上。其他社员更是“妇女，妇女”地叫，气得女同学们对凡是叫她们妇女的一律不予理睬，同仇敌忾，共同抵制“妇女”，大有“起来，不愿做妇女的人们”之架势。队长想改口又改不了，索性反守为攻，在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上，他把女知青的这种做法批评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本来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贫下中农叫女知青“妇女”有什么不对，难道想要叫“小姐”吗？那年头什么都可以不怕，只要一上纲上线，没有不害怕的。女同学再也不计较称不称“妇女”了，时间一长，习惯了也就觉得没什么不顺耳的，倒是杨队长渐渐地习惯称女知青为“女同学”了，有时“妇女”一词刚出口，马上纠正说：“不对不对，是女同学”。

29. 小毛其人

小毛其实可以不用插队落户的，因为他不是应届毕业生，是社会青年，再说又是独生子，按政策可以留在上海。可他早就过厌了由父母包办一切的优越生活，好玩似的挤入了插队落户的大军，来到了科尔沁草原。在上海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毛，绝对是想出来散散心的，怎么可能干如此累的农活，吃如此粗砺的饭食呢。所以，他日日游荡，闯祸肇事，气得队里有人发起要揪斗他，吓得他屁滚尿流逃到四平市躲了好些天。

说起小毛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好吃懒做是小毛的一大特点。人说猴子不藏隔夜食，小毛在这一点上不逊于猴子，到乡下后，第一个吃光上海带来食物的就是他。只要还有好吃的，他一口也不尝大饼子，知青们出工去了，他在屋里翻箱倒柜，搜出他们的饼干、糖果、香肠等均窃为己有。特别是女同学的东西，他翻得最多，男同学的东西他一般不敢轻易拿走，怕挨揍。只有知青W的东西他无所顾忌，照拿不误，因为W怕他三分。

一次大家下工回来，个个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抓起大饼子就啃，却发现所有的大饼子都没了锅底——唯一好吃的部分，追究下来，是小毛趁无人时将大饼子的锅底一只只揭下来吃掉了。此时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简直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齐声谴责小毛的卑鄙行为，在众怒难犯的声势之下，他承认自己做得不对，为了表现一下认识的深刻，他把吃剩藏在箱子里的一些大饼子的锅底交了出来。

小毛在弄吃的方面有不少高招，比如一条毛巾可以换来十几只鸡蛋，一双袜子可以变成一斤“赤膊糖”（知青称当地产的，外面无糖纸包裹的硬糖块）。最为神通的是他可以用毛泽东纪念章交换任何东西，小毛用它换过母鸡和咸鸡蛋，用它乘过汽车住过旅馆，用它在饭店吃煎饼喝甩袖汤（类似羹一样的汤，加有鸡蛋花，北方人喜欢喝），上回到四平他分文未带，照样过得挺快乐，回来还给我带了一大包四平产的蛋糕——也是纪念章换的。如果小毛拿自己的东西去换吃的也就罢了，可恶的是他经常拿别人的东西去交换。大串联时，包头的一个红卫兵在北京送我一枚纪念章，作为纪念，我十分珍惜，却被小毛偷偷拿走了。我发现纪念章丢了，拿他是问，他嬉皮笑脸地到门外不知何处拎出一挂猪下水，说我那枚纪念章派大用处了，就只给了这一枚像章，公社宰猪的那个人说以后要吃下水尽管去拿。无奈之下，当晚求“疯老太婆”将下水煮了，弄了一斤白酒，几个人醉到天亮。

小毛之懒又甚过W，W至少象征性地也洗洗衣裳，擦擦脸，小毛则不然，这一切基本的卫生动作他均十分痛恨，一律全免。下乡不久，他的脖颈，手腕，脚腕都镀上了一层油亮、墨黑的泥垢，头发赛过乱草，若不是他常年裹着那件发的黄大衣，谁也不认为他是上海知青。初时，有的女同学看不下去，洗衣服时捎带也把他的衣服洗了，时间一长，大家躲他唯恐不及，更无人会帮他洗衣服了。

小毛就这样游手好闲地过着混沌的日子，无聊时搞些恶作剧，今天东家门前摸几个鸡蛋，明天西家房后摘两根黄瓜。老乡们无人敢沾他的边，怕他到家里一坐就是半天，吃饭时也不肯挪窝。小毛只好成天和一帮小嘎子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胡吹一通。在集体户里，他玩起了小孩子的把戏。他曾趁大家出工，把门前的地挖出一个陷阱，铺上秫秸和土作伪装，使一个女同学踏了个空，摔碎一只热水瓶。他还把女同学的来信抢先拆开，将里面的内容当众朗读，常常气哭女同学。有一次，他在屋里用柴禾薰蚊子，屡点不着，就把一瓶煤油倒了上去，“轰”地一下火上了房顶，吓得“疯老太婆”大叫“不好啦，小毛放火啦，快来人救火呀！”诸如此类，闹得到处不太平。大家开始怀疑小毛是否有病，一种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病。

有时小毛又天真得可爱。一次，他望着天上飞过的飞机，对我说，如果能乘一回飞机就好了，飞啊飞啊，一

直飞到阿尔巴尼亚，在地拉那上空往下跳，正好落在一家棉纺厂的棉花堆上，皮毛一丝不伤。然后，阿尔巴尼亚同志热情款待他，为他举行宴会，安排参观全国，最后，派专机将他送回中国。这天方夜谈的故事亏他想得如此周全，飞机上跳下时居然没有被大风刮到意大利去，他也怕被抓个“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辫子。

乡下没有男女厕所之分，时有“撞车”之尴尬，小毛便主动为我承担了探路的任务。每每如厕，他拿起一块土坷垃朝厕所里一扔，双手作端枪状，嘴里“哒哒哒”叫着，对厕所一阵“扫射”，见里面无反应，便高兴地对我说：“太君，里面八路的没有，你的请进。”他对自己的“杰作”很欣赏，一直乐此不疲。终于，从上海来东北的慰问团了解了小毛的情况，送他去作身体检查，结果认定他是属于可以病退的对象，将他送回了上海。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插队记事（4）

30. 家书抵万金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乡下的时光，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上海家里和同学、朋友的来信，因而连见到邮递员都感到亲切，而邮递员十天半月才能来一趟。记得给我们送信的邮递员姓杨，三十多岁，瘦瘦的很精神。每当“叮铃铃”声传来，就见老杨骑着绿色的飞鸽自行车一脸灰尘地驶进屯子，手里举着一大迭信件，几乎全是知青们的。知青便一拥而上，收到信的同学喜滋滋地拆开就读，没有来信的同学失望地站在一旁，眼巴巴的看别人读信。一些同学寄予希望地问老杨下一次送信能否早一点儿，老杨总是安慰大家，只要有信，他一天也不耽搁。其实，县邮局要好几天才往下面公社转一次信，老杨又是公社唯一的邮递员，不可能及时将信送到知青的手里。社员们对知青有那么多信甚是奇怪，你在读信也好，写信也好，他们喜欢凑在一旁看。不识字的会说“读给俺们也听听，行吗？”由于许多农民一生都未读过或写过信，他们对信始终抱有好奇心，所以，藏匿、私拆知青信件的事情屡有发生。有一天晚上，我到队长家里喝茶，无意掀动炕席，见下面压着一封信，取出一看，信封上面竟写着我的名字，原来这封信是我姐姐在四个月之前写来的，队长代收后竟忘了给我。见状队长并不动色，平静地说：“哦，信我看了，家里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似乎他对我很关心。还有一次，我收到家里一封信，是老乡转交给我的，也已拆了封口。信中提到为让我多写家信，特附邮票多少多少枚，可我里外搜了几遍，邮票毫无踪迹。为藏匿、私拆信件事，知青以保护通讯自由，信件受法律保护为由，向大队、公社领导和上海慰问团多次反映，在上述有关领导的干预下，藏匿、私拆信件的现象逐渐有所减少。对我来说，藏匿信件不全是坏事。如一个女同学的姐姐给她写信，说东北太艰苦，要帮她调到安徽去插队，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问她意下如何。此信一直没有收到，掉转一事自然没有下落。这个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如果当初调走的话，就不会有我们的姻缘了。结婚后谈起此事，妻说若收到这封信，知道姐姐要她调到安徽去的话，她肯定早就调走了。

31. 打牙祭

那年月农民很苦，主食是用苞米面做的大饼子，副食是白菜、咸萝卜，偶尔做点鸡蛋炸酱那是待客的菜。只有

过年时，各家各户才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饺子，饺子在当地认为是最好吃的饭食，有句话道“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大人苦点倒没什么，可怜的是小孩，饿了，手里捧一只冷大饼子，攥两根大葱，边吃边玩；馋了，卷一支“蛤蟆头”抽着（蛤蟆头，农民自产的一种烈性烟草），屯子里，连三岁小孩都会自己卷烟抽。夏天日子好过些，小孩们手里时常有只把茄子、辣椒和黄瓜等，一律生吃。每到有重体力农活时，如拔麦子，脱坯等，队里就会宰些牛啊羊的犒劳大家，打一顿牙祭，好有力气干活。记得一次宰了几只羊，老钟家的和几个妇女忙了一上午，煮了两大锅酥烂酥烂的羊肉。社员们下工回来，闻着羊肉味就都扑了过去，一人一大碗，吃完还可以添，“唏里哗啦”一阵过后，锅锅见底。知青几乎一个也没吃，因为没有调料，羊又未处理干净，强烈的膻味早就将知青们的食欲撵得无影无踪。杀牛时好些，牛出肉多，往往各家都能分到几斤，这样小孩也可以一起尝尝荤。不过牛是不敢轻易宰杀的，若不是老牛、伤牛宰杀后被大队或公社知道了，队长要“吃不了兜着走”。春上缺草料，牲畜时有冻饿而死的，队长便派人剥皮割肉，肉分给大家，皮留着硝鞭子。我们馋时，巴不得能多死几头，这种思想若是被队长知道了，真要把他给气昏头。牲畜除有冻饿而死的，还有病死的。按规定，病死的牲畜一律不得食用，要作焚烧或深埋处理，但往往有偷吃病家畜的事发生。那年队里病死一匹马，队长派人用大车运到屯子外埋了。第二天，人们下地干活路过，见埋的死马被狼刨了出来，并吃掉好大一块。有个社员拔出刀割下一块马肉，放在鼻子前闻闻说：“挺好的马肉，狼吃了多可惜，回去也炖它一锅吃”。其他社员见状纷纷上去，你一块我一块，不一会儿，只剩下马的一副骨架了。

还是看场院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值完上半夜就睡觉了。朦胧中听得有人“呼拉呼拉”在吃什么，还吃得挺香。我披上棉袄下地一看，五六个人围在烧猪食的大锅旁，用筷子从锅里捞东西吃，再看锅里，全是肉。这些人有队里会计、更信和打头的（“打头的”即生产组长的俗称，可以说是仅次于队长的“中层干部”），有人递给我一双筷子，说：“才炖烂，就想叫醒你呢”。我高兴极了，伸筷挑出一大块肉就往嘴里送。突然，我想他们是从哪儿弄来肉的呢，还是问清为好。他们见我迟疑，笑道：“没事儿，俺们总吃这肉，从来也没得过病”。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白天死了一口猪，是阉后没有消毒好，得破伤风死的，队长再三嘱咐不得偷吃这死猪肉，他们还是弄来偷着煮了。弄清猪肉的来历，我一阵恶心，食欲也早到“爪哇国”去了。由于长期不吃肉，馋得要命，实在没有肉吃，大家便想把那只狗给勒了。

那是只无主的狗，常常悄悄溜进知青外屋的灶台上偷东西吃，吃东西不要紧，它还经常半夜跑进来，“吧嗒吧嗒”啃锅里的东西，知青起夜上厕所常常被吓得半死，还以为是狼进来呢。勒了它，一是免得再受惊吓，二是打打牙祭。说干就干，小毛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准备好绳子，只等那只倒霉的狗到来。一天中午，那只狗在知青的屋外转来转去，小毛手里拿只大饼子，掰一点扔给它，它一口就吞了下去，渐渐它和小毛近乎起来，小毛一边喂它，一边将绳子套上了它的脖子。狗被牵到了一棵树下，小毛把绳子扔过一枝大树杈，使劲一拽，那狗嗷地一声悬在了空中，只见它四个爪子乱蹬一气，拼命地挣扎。小毛怕一人拽不住，急得直喊“快来帮帮我，快来呀”，

我们几个赶紧过去想伸手，只听“啪”地一声，绳子断了，那狗摔在地上，打了个滚飞也似地逃跑了。原来小毛用来套狗的绳子是本不结实的草绳。都说“狗改不了吃屎”，那只大难不死的狗后来还是中了小毛的圈套，终于被煮得烂烂的端上了我们的餐桌，全体知青痛痛快快地嚼一顿，总算对肚皮有了一个交代。

32. 另一帮上海人

放马时间长了，尽管草原还是那么美，鸟儿叫的还是那么好听，可是孤独实在令人难熬。多么希望远处有村庄，有人家啊！一日风大，马儿喜欢顺风吃草，一边吃一边往前走，我也不经意地随着马儿走啊走啊，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陌生地方。远远望去北方隐隐约约有个屯子，在天与草原之间似虚幻的海市蜃楼一般。我喜出望外地驱赶着马群朝那个方向走去。话说“望山跑死马”，那个屯子离得也不近，赶着马群我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方走近屯子。

我把马儿安顿好，进得屯子。屯子里静悄悄的，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我找到这个屯的队房，喝了一通水，再往前走，见到一座院子，院墙门旁的牌子上写着“种畜站”，听得里面好象有动静便走了进去。第一眼就见到一匹高头大马，足有我一个半人高，此马膘肥体壮，枣栗色的鬃毛闪亮闪亮的无一点儿杂色。它简直棒极了，比起我的“坐骑”不知要威风多少倍。正当我细细观赏的时候，身后有人说话了：“干啥的，打哪儿来？”，回头只见一个三十出头的汉子笑吟吟地看着我，看得出来，他对我欣赏他的马很是高兴。我回答他说是沈家的，放马的。他一听更高兴了，说他也是沈家的，姓阎，是种畜站的农技员。还告诉我这个屯叫洪福村，属向阳公社另一个大队。他听出我是上海人，告诉说这个屯也有不少上海知青，等一会儿收工了他领我到集体户去。中午收工了，我来到上海知青集体户。他们正忙着摆桌子要吃饭，听老阎说来客人了，都惊异地看着我，似乎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历有所不解。当他们知道我是沈家的上海知青后，马上表现得非常热情，马上邀我一起吃饭，说早听说沈家屯有上海知青，一直想走动走动，没想到你们先来了。接下来互相介绍自己是上海哪个区哪个学校的，认识对方学校的某某、某某等等，说来大家还是一列火车送来的呢，更觉亲热了。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用大黄米（糜子轧的米称大黄米，性黏）做的黏米饭，虽然没有下饭的菜，但他们特意在我黄澄澄的饭里拌了好多上海带来的白糖，十分好吃。放马这么多天，我天天啃大饼子，嚼咸萝卜条，吃得直烧心，没想到能吃到这般好东西，留下的印象之深，至今不忘。

我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打量这个知青的窝，只能说是窝，因为它乱得一塌糊涂。炕上的被子、衣服胡乱地堆着，地下的脚盆里浸着昨天的洗脚毛巾，锅台上的饭盆里尽是吃剩的大饼子，已经放了好些天了也不倒，箱子盖上还有酒瓶、罐头盒之类。再看看这些知青们，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一个个吃饱之后，往炕上一躺，叼起香烟，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说下午不出工了，太累太累云云。交谈是杂乱无章的，牢骚不少，有一点我颇有同感，即出发之前，来接我们的双辽县代表——那个衣冠楚楚的中年干部讲的那番话。他在所谓的骨干分子座谈会上，把双

辽说得怎么怎么好：吃有大米，住有楼房，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想到现实与他吹的反差如此之大，大家一致痛骂他是骗子，也许他吃的是大米，他住的是楼房。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模样如此正经的人，撒起谎来那样的从容，心不慌，脸不红。谈起前途，大家不免心内凄惶，有人唱起了忧郁的俄罗斯歌曲“三套车”。在这凄凉的歌声中，我告别了这群同样生活在草原上的另一帮上海人，继续放我的马去了。

33. 看瓜，又是一个好活儿

东北的夏天，虽不象上海那么暑气蒸人，但在骄阳底下干活的确是够受的，在地里一天晒下来犹如脱层皮。也许是放马有功，队长没让我下地，派我一个人羡慕的好活——看瓜。

瓜地里有西瓜、香瓜、黄瓜以及西红柿等等，由于东北春天开化的晚，所以这些瓜果种的也晚，当上海瓜果已快落市的时候，这儿刚刚开始成熟，尚未成熟的瓜地是不用看的，没有人会去偷，而快要熟的时候没人看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别的，就各屯的马倌牛倌、猪倌羊倌的能量，足以将瓜果啃光、搬光。和我一起看瓜的是老刘家二大爷，看模样约有六十岁，尖尖的下巴，留了一撮山羊胡。他的绰号叫“老刘二哨”，想必是屯子里“哨”的高手吧。第一天，他就对我说：“你年纪轻，多照应点，晚上我就不去瓜地了”。本来我们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贫下中农降此重任予我，岂敢不受。白天，老刘二与我一起在瓜地里压秧卡尖（为防止瓜秧疯长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一到晚上，天还没黑他就急急回屯去了，留下我一人孤伶伶地守在远离屯子的瓜窝棚里。

瓜地离屯子按说也不远，不到二里地，只是要经过一处废墟，那是沈家屯旧址，此时尚存破墙残垣。据说这儿闹过鬼，因此老刘二晚上不敢到瓜地去。我自诩为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鬼，可晚上经过那死一般寂静的废墟时，头发还是直往上竖，开始几天，真想随大帮下地干活儿，不看这瓜了。后来习惯了也就罢了。瓜窝棚是用茅草搭的，倒也严实，不透风不透雨，只是门太呆板，关不紧。白天，待在窝棚里很舒服，凉凉快快的，想睡就睡上一觉，无聊了出去转上一圈，欣赏地里翠绿翠绿的瓜蔓儿和远处墙一般高的青纱帐，（高杆庄稼长成以后，俗称青纱帐）那里苞米已经吐缨，高粱也在灌浆，一派丰收景象。此时我的心情可以说好得不能再好了，似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有了正确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那时我写给上海家人的信上就是这么说的。那段日子我很快活，简直就是在养尊处优，这是在大田里干活的人想都不敢想的。黄瓜长成了，一根根鲜嫩鲜嫩地在蔓儿上垂了下来；西红柿也一个个红了半边脸，象上了一层釉采；香瓜、西瓜虽然未熟，但已长足了个儿，圆圆鼓鼓的躺了一地。来瓜地的人开始多了，剜野菜，割羊草的，转来转去在瓜地旁蹭，说不准什么时候摘一个就走。屯子里的半拉子们更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你搭讪，地那头早有人下手了，用上海话讲他们是连档模子。常常发现留种的瓜果不知不觉就失踪了，一些老刘二自己看好，想等太阳再晒上几天后享用的瓜果也不知悄悄饱了谁的口福。时

常有一些小嘎（男孩）和小丫头们到瓜地来，围着我左一声“哥”右一声“哥”地要瓜吃，弄的我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知青小毛更是棋高一着，借给我送饭之机，也不管我答不答应摘了就嚼，临走还要揣上两根黄瓜。起初，我是一只瓜也不敢吃的，即使再渴再馋。一是怕辜负队长的信任，二是怕给吃光了，你想呀，如果熟一只吃一只，那瓜还能剩下吗？一次我斗胆摘了一根黄瓜吃了，以后就一直担心老刘二到那棵瓜秧那儿去，我觉得摘去一根黄瓜后，那地方空出一大块空间，十分扎眼，老刘二准会问：“那根黄瓜刚才还在，怎么转眼就没了”。终于，老刘二亲口对我讲了看瓜的吃瓜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的，不吃白不吃的一番话，使我心里的石头掉了下来。从此，我每日随意享用一些香瓜、西瓜、黄瓜和西红柿。有一种叫灰鼠子的香瓜，又甜又香，而且水份特别足，我最爱吃，一顿大啖数只，痛快之极，甚至连饭都可以不吃。那些日子，连拉出来的都是尚未消化的瓜籽和西红柿皮。

分瓜或分西红柿的时候，瓜地最为热闹 各家的人带着盆呀篮呀陆续来取自家的那份。瓜果是一早就已摘好了的，只要按各家的劳力数分配就是，钱并不用收，记下帐秋后扣工分。我紧张地过称、记帐，每每忙得满头大汗，但心里很痛快。似乎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分瓜的时候大家可以在瓜地随便吃。于是乎，取瓜果的无论男女老少，都把肚子撑得鼓鼓的，端着捧着自家的那份回去了。全分完之后，窝棚前的那块空场上，一片狼藉，到处是西瓜皮、西瓜籽，还有砸开后没吃的生瓜。我要把它们全部打扫干净，还要仔细留下饱满的西瓜籽，好明年再种。就这样，我一直在瓜地看到下霜，等最后一批西红柿分完之后，便随大帮收割庄稼去了。

34. 秋收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东北秋高气爽之际，正是“高粱红，大豆香”之时。那田野上随风摇曳起伏的是火红的高粱，黄灿灿的谷子，更有那望不到尽头的大豆、玉米。队里家家户户都已磨快了镰刀，只等队长一声令下——开镰。丰收给人们带来喜悦，一年的辛劳得到了回报，然而割地是个十分累人的活儿，它的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吃力的是必须弯腰。割地还是个技术活，好手往往割得又快又干净，耍手则手忙脚乱，扑腾一地。知青一般只能割谷子、大豆及荞麦，这些作物的杆茎较细，易割，不象高粱苞米那么粗，一刀难以斫断。东北的秋天，早上已有重重的霜冻了，放眼望去，庄稼象披了一层银色的铠甲，手抓上去冰凉冰凉。大豆和荞麦成熟之后，一个极易裂荚，一个极易落籽，必须乘一早霜重时收割，等到太阳晒干了再割的话，手一碰大豆和荞麦，就会落在地里。第一年，我们没经验，手被豆荚扎得生疼，甚至还扎出血来。一天下来，地没割多少，腰都快累断了，队长却笑我们熊包、饭桶。渐渐地熟练了，个别知青甚至敢和老乡较量。我却觉得自己不行，头一天割地，一镰刀下去，就砍到了脚上，鞋子、袜子都砍破了，幸好没伤着皮肉。大豆和荞麦割下后可以散放在地里，而谷子却不然，它必须

捆成小捆，捆谷子绝对是技术活。先是割一把谷子，一头略微拧一下打个结，这个结既非死结又非活结，只能说是个特殊的结，然后将另一头一分为二，这就算做成了一个“要子”，用于捆扎。上述这些动作都是一瞬间连贯完成的，割地的快慢就在于“打要”的速度如何了。十来天的秋收，高粱苞米割了，大豆荞麦割了，谷子糜子割了，庄稼被一马车一马车拉回了屯子，这叫做拉地。拉地最轻松，大家在地里把马车装得高高的，然后坐在上面摇摇晃晃往屯子里去。一路上，知青们就唱着歌：“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哎，一挂大车下了岗哎……”，“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唱得十分起劲。年青人就是活泼，此时已忘了一天劳动的疲惫，也不在乎一身的灰尘、草屑和汗泥。庄稼全拉回去后，堆放在场院里，打场就要开始了。

35. 冬日的场院

秋粮上场之后，农活便不多了，主要是积肥和打粮，场院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此时的活计有脱粒、场扬、晒谷、装包等等，只要天好，场院里就聚满了人。人聚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说笑，有打情骂俏的，有起“哨”斗嘴的，有吆喝牲口的，有较力起哄的，整个场院人声鼎沸。我们知青也喜欢这个时候，活儿不是很累，收工又早，说说笑笑一天很轻松。场院是队里最重要的地方，里面堆放着大家一年的劳动果实，队里规定，除进去干活外，一律不准随意入内，不怕别的，就怕失火。因此，夜幕降临之后，场院就一片死寂，无有一点声息。参差的谷堆伫立在黑暗中，像座座巨大的金刚，很是吓人。然而大雪之后，场院又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场院被雪覆盖，只见起伏的轮廓，月光下，静静的场院就象酣睡的少女，洁白纯净，妩媚动人。庄稼收割完之后，队长又派我一个好活：看场院——一个轻松而又孤独的活儿。

白天，我百般无聊地看社员们忙活，只要管住小孩和鸡鸭猪狗，不让进场院即可。高兴时伸把手，扬扬谷子扫扫地。到晚间，我和老李会计睡在队房里，每夜轮流到场院里转几圈，或他上半夜，或我上半夜。有时我值上半夜，等到换班的时候，这老李会计打着雷一般的呼噜，怎么喊也喊不醒，我只好替他值班。白天场院里充满生气，过得好快，夜晚死气沉沉，加上东北的夜特别长，实在难熬。上半夜还可以，先是队里有会，东拉西扯开到九、十点钟之后队干部、会计等留下，或炒点儿葵花籽，或煮点儿土豆，吃吃谈谈拖到半夜。当时，这就是队干部的特权了，我自然跟着借光。到了下半夜，人又困又乏，怎么盼天就是不亮。黑古隆洞的，谷堆里就是藏多少人也看不出来。月黑天进场院巡查，没有胆子不行，里面一次半夜里，我拿着手电筒，攥着钢叉，进里面巡查，一切悄无声息。再往深处走，忽然听到有“哼哼”声，仿佛。在呻吟，我顿时紧张起来，把手电灭了，攥紧钢叉慢慢走过去。“哼哼”声是西北角传来的，我贴着草垛，一步一步轻轻地挪，生怕惊动了什么。突然，身旁“哗”一声，随即两个草垛之间一阵劈里啪啦，再接着只见“嗷嗷”声中窜出条黑影，左冲右突，朝院墙狂奔。我冷汗都吓出来了，急急打开手电照去，原来劈里啪啦的是惊飞的麻雀，我打搅了它们的美梦，“嗷嗷”叫的是队里的大公猪，是它一边偷吃玉米一边“哼哼”的。大公猪在前面拼命地逃，我在后面紧紧地撵，眼看到了墙跟，看它还能往哪

儿跑，我要惩罚这只偷嘴的畜生：它差点儿吓死我。出人意料的是这只大公猪在墙跟下一跃而起，越过院墙没影了。我目瞪口呆，猪能有这等身手，好生了得，我也算长了一次见识。

36. 送公粮

粮食打下以后，按规定要卖给国家。那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出的收购价低得可怜，但生产队必须按上级定的指标将粮食送缴国家粮库，而不能考虑口粮是否留足。如果口粮不足，到时再由国家返销给生产队，即吃“返销粮”。当时，吃返销粮是体现政府关心农民的一个具体政策，也是农业生产未搞好的标志，因此，哪个生产队吃返销粮，队长是很没有面子的。而公粮缴得多的生产队，则会树为“学大寨”的模范，队长有可能作为典型四处“讲用”，很是风光。在“以粮为纲”的彼时，农业未见起色，却形式主义盛行，缴公粮讲究人欢马叫，轰轰烈烈。县里将缴粮时间规定在短短几天，迫使各公社、大队、小队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将粮食送到粮库，造成一个浩浩荡荡，踊跃缴粮的气氛。我们屯的指定缴粮点是茂林粮库，顺利的话马车一天可打个来回。知青们见县道上送粮车队一挂接一挂，赶车的，押车的威风凛凛地坐在车上急驰而去，好不神气，羡慕的不得了，纷纷要求去押车，认为押车既不费气力，又可到茂林散散心。队长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知青的要求，说道：“晚上装车，明儿个一早出发，别起晚了。”那天早上四点不到，车老板已套好了车，黑暗中，四挂大车，十二匹马，八个人，整装待发。打头的鞭子一甩，马儿打着响鼻，抖擞精神，奋力拉直绳套，四挂大车载着沉重的玉米，碾着厚厚的积雪，朝茂林进发。我坐在第二辆马车柔软的粮袋上，头顶狐狸皮帽子（为押车特意向老乡借的），嘴上戴个大口罩（那时各地城市极为流行），身裹上海穿来的黄棉袄黄棉裤，脚蹬黑胶皮鞋，（这些可是我力所能及的“全副武装”），很是舒服。天刚放亮，车队已经行进在县道上了。清晨，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将草原上的雪照得耀眼，哗哗的马铃伴着踢踏的马蹄声，随车有节律地摇曳。眼前是一片似涂了银的世界，我不禁心荡漾，放开喉咙唱起来：“大鞭子一呀甩嘎嘎地响哎，七挂大车下了岗哎，今年咱送公粮排了那个头一行哎……”

东北的冬天，不比江南，尽管日头再好，气温还是在零下二三十度，土筑的县道冻得绷硬绷硬，赛过水泥。拉车的马蒸腾出的汗水凝结在鬃毛上，使无论青马、棕马都成了白马。我和车老板的眉毛和胡子上也结了霜，成了白眉毛白胡子的老人。原先舒舒服服的感觉早已消失，棉衣、皮帽穿戴在身上犹如纸做的一般，严寒穿透我的“武装”，直刺肌肤。我在车上缩成一团，车老板见状对我说：“怎么，想冻成冰棍？还不下车跑跑。”说着，“吁”一声将车停下，我想下车，两条腿却不听话，毫无知觉，竟冻麻木了。好大一会儿，在车老板的扶持下，我才下得地上，一瘸一瘸随车慢慢行进。待得腿能自如了，随车跑上一小会儿，身上渐渐有了热乎气。车老板说：“这冷天不能老坐在车上，要冻死人的，你得跑一会儿，坐一会儿，”到茂林有四十五公里，其中一半路我是跑着去的。回头想想队长如此痛快答应让我们押车，原来这活儿并不轻松。车到茂林，粮库已是进不去了，长长的马车队伍排了满街，我们的四挂车只好跟着排队。什么时候能把粮食缴上那是没准儿的，打头的让我们先去吃饭，约好吃完饭在粮库门口等。我们四个知青便去寻觅饭店，想找到饭店后好吃一顿，喝点水解解乏。茂林镇本来

不大，好没有几家饭店，送粮大军汇集在这儿，使吃饭成了难题，镇上所有的四个饭店我们都看了，个个挤得要命。我们来到镇中的一个饭店，见买票的地方要排长长的队，端饭端菜的地方也要排长长的队，如果喝酒，还要排长长的队。饭店大都是低矮的平房，由于天冷，门窗都堵得严严实实，里面的酒味、蒜味、烟味加上蒸汽搅浑在一起，直扑你的鼻子，呛得直想呕吐。只见买票处的人挤成一堆，一个个将手伸得老长老长，都快碰到女服务员的鼻子了。女服务员板着脸，把抽屉一关，柳眉倒竖，训道：“干啥，想抢啊！不卖了，都给我出去。”手伸得长长的人们只好乖乖地将手缩回来。端饭端菜处更是热闹非凡，一个小小的窗口用于往外发饭发菜，顾客手里举着各种小票，有大米饭高粱米饭的，有斤饼水饺的，有冷盘炒菜的。发货的服务员骂骂咧咧，吃饭的顾客唯唯诺诺，七八只粗手从狭窄的窗口抢一般夺出菜呀饭的，在人丛中磕磕碰碰，汤汤水水洒得到处都是。

饭店服务员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他们掌握着打菜量多量少、先打后打的大权，熟人可以多打而且不用排队；不顺眼的少打不算还要挨叱。还因为提倡“自我服务”，顾客必须自己动手端菜端饭，否则有“贪图资产阶级享受思想”之嫌，所以，饭店服务员大都有点儿架子，动辄训人，我们排了约一个小时队，才将吃的弄出来。也不过洋葱炒肉片、干豆腐炒肉片和海带炒土豆丝。由于那时农副业都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所以物质匮乏，副食品特别是肉的供应十分紧张，所谓炒肉片不过是在素菜里加几片不足蚕豆大的肉皮，肥膘而已。我们四人就着几个炒菜，喝了六两烈性的地瓜烧，连菜带饭将肚子填了个饱。一旁有“折掣”的（东北称捡人家残羹剩饭吃为“折掣”），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希望碗碟里能给他剩点儿什么。反正已酒饱饭足，我站起来招招手，让他过来接班，打扫战场。我们四人涨红着脸钻出饭店，我觉得脚就象踩在棉花上，显然是不胜酒力。经外面的新鲜空气一吹，想起应该赶快到粮库去，此时已下午两点多了。远远地就见粮库墙跟儿蹲着几个人，正是打头的和三个车老板，每人一手抓斤饼，一手握大葱，吃得正欢。见我们回来，打头问：“上哪儿下馆子啦？你们上海人有钱也不请请我们。”我们正不好意思，他又说：“反正今天是缴不上了，晚上再请吧，你们去找个店，今晚在茂林打尖（“打尖”系赶车人的行话，意即住宿、过夜）。”一打听，说是粮库满了，运粮的车皮又跟不上，只好等明天有了车皮再收。我们四个听令便去找店。我们去得早，大车店还空着呢，赶紧登记好八个人的铺位，每人每宿付两角五分钱，有热水，还免费照看马车，但草料自带。

办完事，我们几个就到街上遛哒，自从上次经茂林后还没有来过呢。街上有几家商店，也是低矮的平房，小得可怜，都没有陈列商品的橱窗，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帘。掀开帘子进到里面，先闻到一股煤烟味，定睛之后便见一铁炉子置于店中央，长长的铁烟囱拐几拐从窗子伸了出去，这炉子是必备之物，否则屋里也要结冰。一个营业员守着炉子在烤火，有人进来连头也不抬。但见数只柜台一字排开，里面商品寥寥无几，有的柜台索性空空如也。无怪乎营业员如此懒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商店已无逛头，见一土屋门外挂着“茂林镇卫生院”牌子，就想进去看看。踏进外屋，中央照例是取暖的铁炉子，炉子旁有一办公桌，一个穿白褂的中年女医生坐在那儿写什么，见我们进来，便问：“瞧病吗？”“不瞧病，随便看看”我们答道。女医生疑惑地看着我们几个，突然说：“噢，你们是

上海人，里面有个医生也是上海人，就在里面呢。”她指了指通往里屋的门。见有老乡在这儿当医生，我们似发现了新大陆，自然要会一会。到了里屋，见一个高个的男医生正在为病人作检查，他大约在二十七八岁上下。白大褂里面露出绒线衫高高的翻领，这在当时的上海比较流行。稍候，他检查结束写毕病例，便邀我们坐下。我们很好奇地问他怎么会到这如此偏远的小镇当医生，问他住什么样的房子，问他来这儿几年了，习惯不习惯，等等。他笑不作答，只是问我们是上海哪个区的，哪个学校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又问我们插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这个上海医生似大哥哥般地和我们交谈，很是亲切，说以后如果谁有病可以来找他，但对我们的疑问一概回避。当时我们觉得有点儿怪，以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架子，有点儿高不可攀。分手时我们客客气气地告别，也没有问他的名字，以后再也未见到这个服务于艰苦草原的上海医生。

晚上该请客了，我们领着打头的几个，从镇头到镇尾，没找到一家卖酒的，甚至连卖细粮的都没有。原来，饭店的酒和细粮食品都有一定的计划，卖完再不增加，中午生意好，晚上自然无货供应。于是，我们买了两瓶北京出的啤酒和两瓶色酒（当地称果酒类为色酒），一大包白煮马肝，外加几斤油炸果子（东北的一种食品，用高粱米面加上佐料，做成汤团大小放入油锅里炸成，外观似肉圆），兴冲冲赶回大车店。此时的大车店，已是人声鼎沸，院子里，过夜的马车停得满满的，卸却绳套的马匹有的在地上打着滚，舒展筋骨，有的在饮水吃料，满意地喷着响鼻。屋内一铺大炕，足可睡四五十人，先到的人已经光着膀子，坐在热炕上捉虱子。炕头被几个蒙古汉子占据，他们盘着腿摆出架式，兴致十足地在喝高粱酒，炕上铺了几张油纸，上面放着羊头猪爪马肝之类。他们边吃边大声交谈，用的是蒙语，半天我们一句也未听懂。在他们下首，我们也摆开了“酒席”，虽简单了点儿，却也管饱。打头说啤酒是“马尿”，喝着没劲，色酒甜得腻人，扫兴，让我问问店里有没有白酒。幸好，店里新到散装白酒，我用自带的军用水壶灌了满满一下子，才一块多钱。打头的和几个车老板喝白酒，我们几个喝啤酒和色酒，各得其所。正喝着，那几个蒙古汉子朝我们直招手，嘴里还哇哇叫，从手势看，是要我们过去一起喝。草原上的人喝酒喜欢热闹，只要有酒，人越多越好。打头见状说：“堆儿也好，他们菜多。”说着，将酒菜一挪，就合在一块儿了。我挨着一个蒙古汉子，直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冲鼻的气味，熏得我近乎窒息，此时即使有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再见其他三个，和我一样，摒吸蹙眉在作痛苦状。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起身说吃好了，想就此避一避这气味，但蒙古汉子不允，起身拦住我们，面有愠色。打头的赶紧起来说：“他们的……上海的……，不会……不会的……。”话语间还夹了些不正宗的蒙语。蒙古汉子似乎明白了，笑道：“上海的，可以可以……。”打头的觉得有点儿不过意，让我们每人喝了一口蒙古人喝的酒，那酒进肚，犹如吞进一股火，顺着嗓子眼就烧了下去，烧得我们一个个呲牙咧嘴，他们见到这般，哈哈大笑。

第二天早起，漫天大雪。粮食总算缴上，四挂马车轻载而归，只是更苦了我们，坐在车上冻得慌，下车跑又跟不上飞快的马车，踩着厚厚的积雪如何跑得动。车老板见我们的狼狈相，揶揄道：“慢慢走吧，明几个怎么也到家了。”说着一扬鞭，马车飞也似地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等我们气喘吁吁，边走边骂地走上半天，却见马车停在

路旁，四个老板围着火，正看着我们乐呢。打头的喊：“快来烤烤火，吃点儿东西。”随即将已烤热乎的大饼子塞给我们。那大饼子真香，等肚子吃饱，歇过来乏，我们的气也消了。老乡有老乡们的幽默方法。

37. 蹩脚的骑手

我许是天生喜爱马，特别愿意与马打交道，见到队里的一些小伙子策马飞驰，做出百般惊险动作，羡慕不已，恨不能也象他们一样骑上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这些小伙子骑的都是光背马，即不备马鞍、脚蹬的马，这种骑法没有一定功夫可不敢照量。再说马有好劣之分，如果碰到“缩膛马”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所谓“缩膛马”就是一种胆子极小的马，它常常在急驰中，因疑心前方有危险突然站住，而惯性会将骑手摔出好远，轻则受伤，重则丧命。

队里的役马较为温顺，轻易不会发脾气，但役马耕田拉车很是辛苦，队里舍不得让人骑。一次打头的让我把一匹大青马牵到地里拉犁，那块地距屯子足有八里路，我想牵着走多慢啊，学学骑马，还省得走路，岂不一举两得。那时乍到乡下，不知就里，我翻身就上了马，谁知这匹马够老实的，叫走就走，叫跑就跑，我好不得意。到地头，知青们见我骑着高头大马来了，十分羡慕，特别是女同学们指指点点更使我有点飘飘然。万万没料到打头的一——那个粗壮的蒙古汉子，他黑着脸，操起一杆大鞭朝我就是一鞭，只听“啪”一声脆响，那鞭梢贴着我鼻尖上的汗毛就过去了，吓得我闭上眼睛一动不敢动。他骂道：“犊子玩意儿，你是想吃马肉怎么的？”这打头的是队里第一暴躁脾气，鞭子甩得又好，指哪打哪准极了。今天他是心疼马冲我发脾气，并不是真要打我，若要真想打我，我的鼻子早就被鞭子劈成两瓣了。

由于放马，我骑马的机会比其他知青多，但因骑术不高，从马上栽下来的次数也比别人多，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次。一天放牧归来，遇到队里打草的几个小伙子，他们取笑我骑了一匹又老又瘦的弩马，说我骑的是“耙犁架子”，意即这马只剩骨头了。被他们一笑，我顿时觉得自己成了唐吉珂德。下得马来，我指着马群说：“随便挑一匹，我骑给你们看”。一个小伙子指着一匹枣红马说：“就是它，你骑”。这匹三岁牙口的儿马子我早就想试试，今天就骑给他们瞧瞧。我贴到马的身子旁，用手给它梳梳鬃毛，挠挠痒，它也温顺地掉过头，想用脑袋蹭蹭我。没问题，它很友好。我拽着长长的鬃毛一跃就上了马，它并没有像电影里拍的那样乱蹦乱跳，而是站着没什么表示，我挺直了身子，对那几个小伙子说：“怎么样？”由于没有缰绳，我就拽着鬃毛，两腿一夹，喝声“驾”，想让它奔跑。但就这一夹一喝，那马猛地往前一蹿，撒开四蹄跑了起来，它一边奔跑、跳跃，一边扭动身子并甩鬃毛，我在马上颠得五脏六腑都快出来了。马又无缰绳、嚼子（约束马的一种马具），我无抓无挠的，被马一个鬃毛颠到空中，然后四肢张开，脸朝下眼见得绿绿的青草迎着我，摔了一个“狗吃屎”。这是我第一从马上摔下来，摔得实在，摔得应该。因为还没有驯服的马，人称生马，就连当地牧民都不敢骑，我挨摔岂不是自找的吗。

第二次坠马是在屯子里。那天中午，我托邻屯的小马倌照管我的马群，我则骑他的“坐骑”回屯里吃饭。借的那匹马是当地出名的“走马”，极善于奔跑，个头不高，却四腿细长，跑起来又快又稳。吃饭时，我怕马圈里的马嫌生咬它，就把它拴在队房外的马桩上，吃完饭，解开缰绳我骑上就要走，知青们过来央我让他们过过瘾，我就牵着缰绳，让他们一个一个骑上去，转上一圈。见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很好笑，嘴里说“没什么，不要怕”，心里想“真笨”。等他们过完瘾，我飞跃上马，抖抖缰绳，双腿一夹，马踏起碎步。我先在队房前转了几圈，想想他们刚才那个样子，觉得自己着实威风，索性腿上用力，马便象上膛的子弹飞奔起来。到得屯子中央，我要回到草原去，应该拽左缰使马往西走，为平衡离心力，我的身子也向左偏去。突然，马头一犟，它强行向右——它的老家方向拐了过去，往下栽，幸好腿还夹得紧，我就双手搂着马的失去重心的我——一头便脖子，尽量不使自己掉下去。马本没鞍子，光溜溜的马背滑得很，重心已偏的下半身不久就挂了下来，这样，我双手搂着马脖子，下身拖在地上被奔跑的马拉着急驰。只要我松手，就会被马的铁蹄踩死，当时我只听到同学们的惊呼声，脑子一片空白。危急之中，那马突然一跃腾空而起，我手一滑，掉了下去，我下意识地用一只胳膊护着头，只见巨大的马腹从我身上跃过，一只后蹄碰到了我的胳膊肘。蹄声“嗒嗒”，马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我摔在一洼水塘里，浑身尽湿。爬起来看看自己上下，除胳膊肘碰破有点儿出血，一切完好无损。许是水塘救了我，也许是马不想伤我。等我抬起头，只见井台旁那么多男男女女在看着我，包括我的知青同学们。

我最后一次坠马是与马一起倒下的，应该说是人仰马翻，是最危险的一次。那年冬天，茫茫白雪遮盖住大地，地也冻得如同石头一般。一天，队里的小羊倌放丢了几只羊，队长命我骑马去寻。天已将黑，我骑上一匹黄骠马急急往屯子北方向寻去。大约走了有二里地，平时极老实的黄骠马驻足不肯往前走了。我用腿夹它，用手拍它，大声吆喝它均无济于事，它似钉住了一样。我正骑在马上一筹莫展，黄骠马却转过身子朝来的方向跑了起来，我勒紧缰绳，硬是掉过马头，它却就地绕一个圈，又朝着屯子飞奔。黄骠马疯也似地跑着，前面就是屯子了，我知道一进屯的拐弯处有一口水井，井台四周结了厚厚的冰，形同日本的富士山，井口犹如火山口，那里人行尚须小心翼翼，这马蹄下面钉着铁掌，没有不摔的。我心里琢磨无论如何也得让马停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不等我想完，马已到了井旁。黄骠马若是人的话，到了井旁的拐弯处，就会放慢脚步，拣没有冰的地方落脚，可它哪儿会这么想，依旧雄纠纠气昂昂地大踏步地跨上了“富士山”，只听“哗……扑通”一声，马带着我滑倒了。我朝着井口方向，黄骠马略偏一点，我们一起滑了几丈远才停住。马支起前腿想站起来，但蹄子不停地打着滑，直到刨出个冰坑才站了起来，我则急忙爬起检查它是否摔坏了哪儿。在农村，马若是受伤，特别是骨头受伤，就等于废了，只能宰杀。今天如果废了黄骠马，明天队里不开会斗争我才怪呢。幸好，人马无恙，我看着深不见底的水井，一阵阵后怕，摔倒后，即便马没压着我，滑到井里怎么办？我滑下去以后，马再滑下去卡在井口怎么办？我就是不淹死，也会被马踢刨死。念此，我有了一种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快感，那黄骠马大概也觉得刚才丢人现眼，耷拉着脑袋，蔫蔫地随我回到了队房。之后，我对谁也未提起过这件事。

插队记事（5）

38. 感情问题

知青到乡下，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与贫下中农能否建立起真正的感情，是对知青的一个严重考验。而当知青们扭扭捏捏“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与老乡之间若即若离的时候，老乡们却早已“屈尊下就”了。他们大度地到知青集体户的炕上一坐半天，并不计较知青们怕他们有虱子的恐慌气氛；有的人自动打开知青的糖罐用手掬白糖吃而无须假斯文；还有的拿起女同学的文胸左右翻看，问穿这小衣服有什么用。总之，贫下中农并没有瞧不起知青，能否与贫下中农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全看知青的阶级觉悟如何了。

知青由于当时的觉悟，确实真诚地想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除已经住同样的房，吃同样的饭，干同样的活以外，还要从思想深处找出与贫下中农之间的差距。以至于一些女知青常找老乡要求给她们提意见，但听得顺耳，高高兴兴；听得不如意，回到屋里蒙头大哭。更有的男知青为了贫下中农化，头发长了不剪，脖子脏了不洗，学着老乡讲土语，说粗话，灌白干，抽“蛤蟆头”，一如老农的模样。还写信给家人说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要“一辈子扎根农村”，急得家里劝也不是，赞同也不是，那可是革命行动啊，敢不支持！三十年过去，回首当年，已近天命之年的我们不禁为那时的幼稚哑然失笑。

队里有帮有派，队长之间的分工是帮派权利的平衡，打头的“职务”更是各派轮流，今年这派的，明年那派的，甚至一年内就换好几次，相互拆台时有发生。这派掌权那派便出工不出力；那派掌权这派就说身体不好要看病。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知青成了生产的主力军，自然也成了他们团结、争夺的对象。

如此一来，感情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你与这派的某某来往多些，便有人说三道四，什么“不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搞分裂主义”等等。你与那派某某来往多些，又会有人议论你，说你“思想立场不坚定”，“分不清好人坏人”等，往往弄得知青进退两难。在乡下，我始终保持中立，宁愿被人称为“立场不坚定的老好人”，只是在抓住偷苞米的“老钟家的”以后，才被一些人明确归入杨队长一派。

其实，在乡下的岁月里，除个别老乡外，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不好，长期的交往中，我与许多人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离开沈家屯的时候，他们有些甚至特意包了饺子为我饯行，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农民是淳朴的，勤劳的，但保守自私的劣根性不能说在部分农民身上一点儿没有，就如城市小市民身上的自私和狭隘一样，特别是缺少文化导致的愚昧。但不能因为农民的保守与自私，我们就与之保持距离，不予交往。在我看来，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有千差万别的性格、爱好以及对善恶的不同看法，他们大多是可以作为朋友的。

39. 下雨天的苦乐

下雨天不出工，是乡下的规矩，知青最为盼望的莫过于下雨了。一来下雨天绝无风沙，可以干净清爽地过一天。二来下雨可以定定心心给家人、朋友写信。最使人向往的是，只要愿意，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天扑克。所以，每当乌云密布，大雨欲来，我们就开玩笑地大声喊：“下吧，下吧，我要开花，下吧，下吧，我要回家……”。逢下雨，我们象过节一样，总想弄点好吃的。于是，有贡献挂面的，有出香肠的，有变戏法似的翻出牛肉干的。总之，从上海带来一直压在箱底的“宝贝”这时都会拿出来共享。

在草原上放牧时，即使下雨也不能赶着马群回屯子，马须不停地吃才能长膘。雨季里放马一般都要带雨衣，下雨时就将雨衣穿上。但我一直害怕穿雨衣，因为穿上雨衣后，雨点打在雨衣上使耳旁只有“哗哗”的响声，其它什么声音一概听不见。在这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你无法听到和辨别出其它声音，风雨大作时，似有脚步声，似有狼嗥声，一个人难道能不害怕吗？所以，即使雨下得再大，我也不把雨衣的帽子翻上，任凭头发湿透，我要保持最好的听觉和视野。

有时在草原上遇到大雨而又没带雨衣，远远的看见大雨似一堵巨大的墙朝自己逼了过来，赶紧就近找一个已晒干但牧民还未来得及装回去的草垛，在草垛底部扒一个洞，人钻进洞里，用扒出的草把洞口堵上，这样，外面下多大的雨都安然无恙。人躲在草垛里面，嗅着青草的清香，既暖和又舒适，有一次我竟在里面睡着了。如果未带雨衣而附近又无草垛可以避雨，那可真惨了，唯一可行的，只有找准风向，躲到马腹下面偏下风处，时间不能长，雨下得时间长了，还是淋个落汤鸡。不过雨季往往是最热的季节，有“二八月勒马等道干”之说，只要雨停下，风儿一吹，太阳一晒，头发和衣服很快就会干的。

我们住的房子屋顶都是泥抹的，是特意从很远的草原深处拉来的碱土，据说在种碱土板结，不容易渗水。但每年春天必须重抹一层泥，否则就不能保证不漏雨，因此，屋顶是越抹越厚，有的甚至达半米。第一年我住的是“疯老太婆”家的西屋，大概是几年没有抹屋顶了，一下雨就漏。白天漏雨尚可以想想办法，晚上漏雨可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成了问题。有一次，因白天干活太累，晚上一挨枕头就睡着了。梦中，觉得自己不是被埋在土里，就是被憋在水里，一宿恶梦不断。早晨醒来，一摸被子绷硬绷硬的，全湿透了。再看本来是白色的被里和褥单，也

全被碱水染成红色的了。如果一连数日大雨，我们只能把箱子搬到漏不到雨的地方，铺上褥子、被子，苟且几天。

下雨天不仅仅对我们的住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吃饭问题。在前文提到，接连多天下雨之后，知青的柴禾垛就会浇透，就会没有柴禾做饭，这时我们知青就只得分散到老乡家去搭伙。搭伙当然不是坏事，吃的要比集体户好，但时间长了，总觉得有点儿寄人篱下的感觉，人家饭做得不好或不做好的，你不能抱怨说不爱吃；人家老给你炸鸡蛋酱，你又会过意不去。吃饭时，不想吃的不敢少吃，想吃的又不敢多吃，就怕东家脸色不好看。其实，搭伙给老乡家添了不少麻烦和负担，不给知青做点儿好吃的，他们觉得对不起似的。下雨天，我们既快乐，又不快乐。

40. 有个叫老宋的地主

沈家屯论成份，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贫农，而且是赤贫。后来，也许是为了批斗的需要，从北京“引进”了一个活靶子，就是地主——老宋。其实老宋是被北京红卫兵驱逐的阶级异己分子，因其祖籍在双辽而遣返到此。珍宝岛打仗了，上面便有通知，说不能让阶级敌人乱说乱动，队长派人与老宋说“今天别下地了，喂羊去吧”；林彪摔死了，上面要求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队长又派人嘱老宋说“今天别喂羊了，去晒粮吧”。如果上面还有什么指示，队长还会派人对老宋说“别去晒粮了，去铡草吧……”，反正对阶级敌人总得采取点儿行动，否则队长向上面不好交代。我就是铡草时认识老宋的，那年他不到五十岁，可能在北京吃了苦头，看上去要五十出头，但气色不错，特别是情绪上，一点儿也没有城里“四类分子”那种萎靡不振的样子。他干活时和我聊天的神气简直“忘了自己的身份”，什么“你们小青年还不懂”，“你们跑这么老远真不容易”等，他居然敢说他父亲是地主而他本人不是，是红卫兵搞错了。有时给我介绍起北京城来，只见他眉飞色舞，哪儿还有一点被改造，被专政的样子。偶尔队里也开会批斗他，不过是“天桥把式——光说不练”，不打不骂，无怪乎老宋在此乐不思蜀，要在北京，不剥层皮才怪呢。

对于队长的这种“绥靖”政策，知青中颇有人不满，认为队长不是在搞“阶级调和”就是政治上的糊涂，若要深挖，很有可能会扣上“与地主分子穿一条裤子”的帽子。这些知青到底来自“一月革命的策源地”，样板戏看得又多，政治觉悟以及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和警惕性就是强。在生产队的一次会上，有同学给杨队长提意见，认为让地主分子给地里干活的社员、知青送饭，是革命警惕性不强的表现，阶级敌人在饭里下毒怎么办，强烈要求不能让老宋再送饭了！说得也是，就算老宋天天把各家各户的饭那菜呀收齐，用褥子、被子捂着怕凉了，然后再小心地装上毛驴车，七八里路慢慢赶，唯恐颠洒了汤汤水水，使社员和我们知青能吃上一口热的，但他毕竟是地主分子，这不是将我们的身家性命交给阶级敌人了吗。队长微微一笑道：“你们放心，量他老宋也不敢，他要下毒，屯里的几口水井又没有盖子。我说他不敢，除非他不想活了。话还得说回来，共产党连死都不怕，还怕他下毒

吗？谁怕，就自己带饭。”杨队长是党员，那年只有二十三、四岁，却生就一张利嘴，他的一番话，知青们无言以对。

老宋继续赶毛驴车给大伙儿送饭，知青们的革命警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淡化。

41. 物尽其用

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革命浪潮”一阵高过一阵，政治口号一个连着一个。“抓革命，促生产”成了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的空话。全国经济下滑，物资匮乏，连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都难以满足对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偏远的农村更是要什么没什么。我们大队和公社的代销店里，货架空空如也，只有煤油和毛主席著作敞开供应。过年节时，店里会供应一些如石头般的月饼和江米条（又叫油枣，南方叫枇杷梗），我们常常几个知青一起，走上数里路买它一大包，边往回走边吃，等到了屯边的树林时，也吃得差不多了，找个地方擦擦手，心满意足回到屯子里。那时觉得十分过瘾，感到硬梆梆的月饼或江米条味美无比，因为我们太缺油水，太馋了。

老乡没钱，不可能似知青一样去享受月饼和江米条，他们便使劲抽烟。好在烟是自个儿家种的，无需花钱，他们可以一支接一支抽。卖的现成的卷烟他们是既抽不起也不爱抽，说：“没劲儿”，老乡们抽的是“蛤蟆头”烟。前面介绍过，“蛤蟆头”是他们用纸自卷的烟，这种卷烟方法几乎大人小孩都会，但他们缺少的是卷烟纸，家里有限的纸张——孩子们的课本、作业本等，其归宿都是与烟草一起化为灰烬。知青的到来，解决了老乡们的“纸荒”之忧，知青们有抽不完的信纸，白信纸可以抽，用过的信纸更可以抽，还有知青带来的画报、杂志、毛选、语录……等等。在地头小憩，你常会看到社员从怀里掏出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翻开封面，“嘶啦”扯下一页，再“嘶啦”一分为二，递一张给另一个社员说：“抽着，抽着”，接着各自取出烟荷包，捏上一撮碎烟叶放在“……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革命的……”上面，细心卷成喇叭状，用舌头舔湿一边，再一卷，湿的边沾上之后，把粗的那头掐去一截，整个过程就算结束。用火点着，“呸”一声吐掉一口唾沫，便悠然自得地开始吞云吐雾。有时你发现几天前刚郑重其事送给某某老乡的语录本，已变得面目全非，再过些日子，更是徒有其表了。

纸张的另一个大用处是糊墙。队里绝大多数人家不糊墙，不是不想糊，而是糊不起。但结婚用的新房怎么也得糊一糊啊。那时又不能象城里一样，用大大的报纸一糊一大片，既方便又好看，因为队里根本就没有报纸。此时，三十二开的毛选派到了大用场。做新房时，细心地将毛主席著作中间的装订线拆开，这样便有了十六开的大纸，然后一张一张地糊到墙上，糊完之后，整个屋子就亮堂起来了。社员们参观新房时，用手摸着糊完的墙壁啧啧称赞“太漂亮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在土屋土炕上过来的，从未享受过糊墙的“奢侈”。

竟然用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抽烟、糊墙，简直是对“最最最敬爱的领袖、英明导师、伟大的舵手”的大不敬，

是反革命行为，有知青要求队长立即制止这种行为并紧急追查后台背景。又是杨队长出来说话了，他说：“怎么能随便说是反革命行为呢，把毛主席语录吸到肚子里，不是溶化到血液里了吗，把毛主席的话溶化到血液里不对？”他又解释：“把毛主席著作糊在墙上，是为了睡觉时学习起来方便，这是革命行为，再说也是物尽其用吗。”杨队长确实比我们要高明的多。

42. 干部、营业员

夏日，骄阳似火，我们正唇焦口干，又累又乏时，经常看到公社或大队的干部们，骑着自行车沿着县道一溜烟过来。到了树荫下坐定，擦把汗，边摇动折扇边发话：地是否全铲一遍了，化肥是否都点过了，屯里还有几户吃返销粮……等等。歇够了，又骑上自行车一溜烟走了，敞怀的绸衫被风兜得鼓鼓的，象旗子一般飘动着，我觉得他们好潇洒。当干部多好！

我十分羡慕那些干部，至少他们不象我们在夏日里，每天从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下地，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回来，要辛勤劳作十多个小时。队里的干部不论大小，没有脱产的，只有抽到大队特别是公社去的才有脱产的可能。那时有两种机会能抽上去，一是搞“中心”，即写批判稿啦，大字报和大标语啦，这是需要一点文化的才能去，保管老李的二儿子初中刚毕业就到了公社。有时老二回家看他爹妈，梳着小分头，雪白的衬衫束在皮带里，裤线笔挺，手插在裤袋里往门口一站，气质就是不一样。二是“群专”队的队员，“群专”就是所谓群众专政，公社把各大队，各屯的“专政对象”集中起来，又从下面抽调力量管理和监督他们。起初“专政对象”仅仅是四类分子，后来逐渐扩展到有调戏妇女，偷鸡摸狗行为的人。一度“群专”队的规模相当大，队员大都是复原军人，当然也有公社干部的三亲六故。搞“中心”的也好，搞“群专”的也好，都不是公社在编干部，在公社里面，他们必须谨慎做人，事事留心，否则说下就会下去，但在我们目中他们都是幸运者。

还有一些令我羡慕的人是邮递员和供销社的营业员。邮递员虽然风里雨里的也辛苦，但毕竟不用天天晒毒日头，知青来了之后信多了一些，过去十天半月才够跑一次的，在我看来邮递员是幸运者。营业员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差事，谁家有亲戚在城里当营业员的，就可以象现在家里有人在当局长一样骄傲。许多东西营业员能优先买到，在什么都要计划，什么都要排队的当时，营业员这个职务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供销社营业员当然不能和城里的营业员相比，但供销社安安静静，轻轻松松，晒不着淋不着，尽管一天做不了几桩生意，天天工分可不比别人少。不过，营业员不是谁都能当的，方圆几十里，整个公社十几个供销社里的营业员，哪一个不是有根有底的。

43. 知青慰问团

那年，关于知青的二十六号文件发出之后，上海派出一批干部到全国各地，了解知青插队情况并对知青进行慰问，我们把他们称作慰问团。在我们公社的慰问团成员大都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中有著名播音员陈醇，另外还有一个姓马的女播音员。慰问团“大本营”在公社，他们经常分散到各大队及各屯的知青点上去，住上十天半月的了解知青的情况。知青们都把慰问团当做亲人，往往抢着要慰问团住到自己的集体户来，陈醇就在我们集体户住过好几次。

陈醇那年顶多四十岁，高高的个子，经常穿一身洗旧的黄军装，操一口普通话。但我感觉他好象故意将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夹杂着点儿吴语。上海知青几乎都从小就收听他讲的长篇小说，如《烈火金刚》、《欧阳海之歌》等，他的声音是再熟悉不过的，不但普通话纯正，他的声音也象他的名字，醇厚而富有特色和吸引力。不知他为什么在乡下不讲标准的普通话。陈醇在我们集体户里，与知青同睡一铺炕，同吃一锅饭，还一起下地干活，但我觉得他一直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田间小憩，大家请他象电台播音那样说上一段，他拒绝了，拒绝得十分坚决，说：“过去是放毒，我不能再讲那些东西”。难道他是我从小就崇拜的陈醇？我很失望。

那时我们尚未谙事，不懂世事凶险，文革期间，文化的命被革尽，哪还有可以看的书，可以听的故事。陈醇作为知青慰问团的成员，向知青传播已被打倒的“封资修”的东西，岂不罪莫大焉！平时陈醇不大讲话，但讲起话来很响且有份量，公社里一些调皮捣蛋的知青对他有几分畏惧，知青小毛见到陈醇在，便会老实一阵，后来是陈醇通过努力将小毛送回上海的。七十年代中期，知青们陆续离开了农村，但只要碰到一起常常会谈起陈醇，打听他是否回电台了，是否还继续播音或主持节目。

记得常与慰问团一起管理知青的还有一个姓贾的干部，他虽不是上海慰问团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慰问团的一员。老贾是长春市下放的干部，是吉林省粮食局还是长春市粮食局的，我记不得了。他也是高个子，人很和蔼，说话总是带着笑容，他风趣，健谈，与陈醇不同。一次我们到草原上捡牛粪，他与我们同去兼作带队。一路上他谈笑风声，讲牛粪的用处，讲草原上的故事，甚至讲他自己念书和工作时的经历。与老贾在一起，知青们觉得亲近和踏实，有依靠，大家愿意向他讲碰到的烦恼，希望通过他能得到解决。我们曾向慰问团要求让老贾留在我们队里，当然这不可能，老贾不属于慰问团。其实，就老贾当时下放干部的身份，他也解决不了多少知青的事情，但出于对知青的关心和爱护，他还是常常为知青的事情奔走。

我离开农村的时候慰问团还没有撤走，大概是后来在省市县各级成立了“知青办公室”，专门处理知青事务之后，慰问团才陆续撤回上海。我最后一次见到陈醇是在四平市的地委招待所，那时他们的总部好象已迁到四平地委大楼。不过，我调到苏州工作之后，经常在电台里听到他熟悉的声音，依旧那么醇，那么有感染力。

成语道“入乡随俗”，知青到乡下后，许多风俗习惯不久就适应了，但还有许多习惯一直难以相随。如洗脸，老乡们习惯用手捧水往脸上泼着洗，洗完用干毛巾一擦了事。而这毛巾从来也不放入脸盆里搓洗，往往一条白毛巾成了黑毛巾仍然挂在哪儿全家用。最令知青瞠目的是那发黑的毛巾不仅仅用来擦脸，家里来客人了，特别是讲究的客人，主人在沏茶之前会用这条毛巾将茶盅横擦竖擦，以示恭敬。知青们觉得不擦倒罢，一擦则不敢沾唇了。

大葱蘸大酱是老乡们最爱吃的，他们抓过一根大葱，将根掐掉，黄叶摘去，再用手捋两把叶子算是已处理干净，接着蘸上大酱就咬，那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知青虽然也敢吃大葱蘸大酱（非得学会吃不可，一年四季主要吃的菜）但一定得洗完之后才吃。派饭时，大爷大娘好心好意特地把葱叶捋了又捋，知青推三推四百般借口不吃，常常弄得十分尴尬。

老乡们也有看不上知青卫生习惯的。其中最让老乡传为笑谈是知青居然用脸盆和面，那真是太不讲卫生了。乡下，再穷也要把脸盆和面盆分开，哪怕面盆再脏再破。最初老乡看到知青用脸盆和面时，他们惊讶极了，连说“这不行，瞎胡闹嘛”。他们的面盆是真正的面盆，和面用的，上海人的“面盆”实际上是脸盆。因生活条件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造成的卫生观念上的差异，知青和老乡们一时都难以互相适应。

除卫生观念之外，在语言上知青也常常和老乡闹别扭。在上海若问别人年龄无论老少都可以说“你几岁了？”而在这乡下绝对不行，初时不知此忌讳，我们常常脱口便问“大爷，您几岁了？大娘，您几岁了？”大爷大娘们一瞪眼睛怒道：“这孩子，没大没小的”，我们被骂得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原来只有对小孩才能问“几岁了？”，大人则应问“多大了？”再有在还人家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谢谢”因为“谢”与“卸”同音。每天收工回来，驭手要把马身上的笼头、绳套卸掉，叫卸牲口，那么“谢谢”就等于把对方当作牲口卸了。每当我们谢字一出口，对方忙不迭地说：“甭谢了，带套包（防止磨破牲口皮肉的马具，系玉米叶编成）走吧”，意即我不卸你身上的笼头，绳套，带着一起走吧，隐含了你是牲口的意思。当然，这里主要是调侃而并非恶意。

而有一些话语你是绝对不能随便说的。如你不能问老乡会不会下雨，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王八才会知道，若谁回答了还是不下，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王八。而老乡们视为最大侮辱的就是被人称为王八，这往往是斗殴的根缘，因为若被称为王八，即意味着该人的老婆不贞。由此派生的“背上出汗”，“会发水”等也不能随便说了。“兔子”一词也属骂人，那么，就说象“跳得高，跑得快，长耳朵，红眼睛”等话就要掂量掂量，辨清对象、时候再讲。

老乡们文化虽然不高，但他们说话却不乏风趣和幽默，最让人佩服的是歇后语特别丰富，上口就来，无论老少。知青常和老乡们开玩笑，打嘴仗，老乡一套路的歇后语一个接一个地扔了过来，知青唯有招架，无力还击，只好用老乡听不懂的上海话来骂他们。起初，老乡瞪着眼，半天才憋出一句：“你说人话不行吗？”其实，老

乡悟性很高，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下乡不到一年，很多人已听得懂甚至能说几句上海话了。

知青会讲普通话，但说得标准的不多，因此，常闹些笑话。屯里有个老吕头，知青们这个“吕”字发不准，总是发成“驴”音，老吕头便成了老驴头。为此，老吕头多次找队长反映，要求队长能治治这帮“上海犊子”（骂人话）。老吕头有所不知，这完全是个误会，知青们还觉得这个音发得挺准的呢。知青发错音的字实在还不少，脚说成“厥”，西北风说成“西扒风”，特别老是把黄瓜说成“王瓜”，老曹叫做老赵，使老乡们忍俊不禁。

45. 烟和茶

屯里，家家门前房后都种有烟叶，这种作物乍看象甜菜，叶子又大又肥，油旺旺的，煞是招人喜爱。老乡们将叶从根部开始，隔三差五地掐下几片，老大一堆抱到院子里，或晾在栅栏上，或穿在铁丝上，风吹日晒，不几天叶子便由绿变黄，干得一碰就碎。不必切丝，无须加料，老乡们把干烟叶放在筐箩里轻轻一揉，将叶梗抽出来扔在一旁，剩下的就是烟叶。烟叶或装在烟袋里，或装在筐箩里，随手可以取来抽。

种烟叶既不要多少本钱，又不费多大气力，由于来得容易，屯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瘾君子。忙时，说抽着能解乏；闲了，说抽着能解闷；冷时，又说抽着能暖和。来客了，主人先递上烟筐箩以示热情。小孩闹了，大人就点支烟塞过去道：“一边去抽”。所以，见到三四岁的孩子或十八岁的姑娘在那儿吞云吐雾，你一点也不必惊奇，关东不是有三大怪嘛，“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就是其中一怪。

知青吴本来就有烟瘾，到得乡下更是如鱼得水，卷烟抽得乏味，索性抽起浓烈的“蛤蟆头”。一个雨天，吴实在闲得无聊，用一张十六开的信纸，在上面厚厚的铺上一层碎烟叶，然后卷成一个大大的喇叭状，点上火，美滋滋地抽了起来。他为自己的创举颇为得意，在屋里走来走去，让大家欣赏他的“杰作”。过了不一会儿，吴的“大喇叭”尚未抽完，只见他晃晃悠悠，站立不稳，再见他面色发白，目光呆滞，大家情知不好，夺下“大喇叭”，将他扶到炕上，他也连叫头昏得厉害，之后便昏沉沉睡去。待他第二天醒来，说“这烟凶得不得居然把我抽醉了，以后可不敢再这么抽。”其实，他是尼古丁中毒，十分危险。

喝茶，是农民的另一嗜好。北方不产茶，都由南边运来，这一带的农牧民喜好喝红茶，所以，代销店也只售红茶，绿茶无处可买。那年头，农民很穷，无钱买象样的茶叶，只好喝茶叶末，这是一种由碎红茶碾成的粉末，一角钱一包，是用马粪纸包的三角包。吃罢晚饭，收拾好桌子，那边就将茶沏上，几个积有厚厚茶垢的瓷盅往炕桌上一摆，就开始喝茶。茶是在炉子上沏的，实际上是煮茶，浓浓的犹如酱汁。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此刻松弛了他们的筋骨，盘腿坐在炕上，一边滋溜滋溜地喝茶，一边东拉西扯，谈天说地，直到茶色全无。

知青原本不喝茶，与老乡接触多了，渐渐也学会了喝茶，尤其那些与老乡来往密切的同学。在老乡家，劝茶如劝酒一般，那股热情由不得你不喝。我是在看场院的时候喝上茶的，那时，熬夜犯困，李保管就煮上一壶浓茶，我们一盅一盅地消磨时间，初喝茶的人喝了这浓茶甚是兴奋，熬上半夜不成问题，时间一长，我就喝上了瘾。一有空闲，就想沏上杯茶水，否则老觉得缺点儿什么。知青上了茶瘾之后，代销店的茶叶销路看好，老乡多半赊账，知青一般都给现钱。红茶未喝惯了，多高档的绿茶、花茶入口都没了味儿，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喝红茶的习惯，不过喝的是“立顿”红茶（是冒牌货也未可知）。

46. 马莲和屎克螂

一句老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千年的老道碾成河”。科尔沁草原上，许多纵横的古道，深深地犹如历史的印迹，刻下了远古时代，强悍的少数民族逐鹿莽原时的辙印。想当年“车辘辘，马嘣嘣”，是匈奴还是女贞？一定壮观无比。然而，风雨岁月，历经沧桑，只有马铃声不绝于耳。绿野茫原之中，车辙静静地如一条黄练飘向遥远的天边，使人升起无尽的遐想。

车辙中间生长着马莲，那是在马蹄旁，车轮间顽强生活着的植物。马莲，学名叫马蔺，又叫马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叶子如宽厚的韭菜，有的长得很高，约一尺半长。人们常将马莲叶割下晒干，以备捆扎之用，非常坚韧。它的根晒干后十分韧且硬，可以制刷，东北刷锅洗碗多用它，卖杂货的摊头上经常可以看到。

我喜欢马莲，喜欢它的顽强。车辙因为常年马踏车滚，坚硬异常，寻常野草都无法在此生长，唯有马莲生机盎然。早春万物未萌，马莲先顶出嫩芽，报知春天将临。待到秋寒一派萧杀时，它才迟迟褪去绿色，宣告严冬的到来。人来车往，旅途困顿，百般无聊之时，那一簇簇蓬勃的马莲，那朵朵盛开的马莲花，随着车辙，一路陪伴着你，直到旅程的尽头。马莲叶子是绿的，绿得近如蓝；马莲花是蓝的，蓝得那样浓，在草原上特别醒目，风儿一吹，频频点头，似在向人致意：说欢迎，还是再见？

旅途中，另一个伴侣就是屎克螂，当地叫“巴巴螂子”。夏天，是屎克螂最为活跃的季节，车辙里有时黑压压的挪动着成群的屎克螂。因为那里有马排泄的粪便，这些粪便是它们最理想的食物。屎克螂们费尽它们的力气和智慧，将马粪搓成滚圆的如乒乓球大小的马粪蛋，一个推，一个拉，运回它们的巢穴去。天赋的本领，这些马粪蛋大小均匀，并且出奇的圆，似精密测量过一样。屎克螂会飞，但反应迟钝，每当它们在饕餮大餐时，纷杂的铁蹄和滚滚的车轮会毫不犹豫地踏上，碾过，屎克螂们并不象苍蝇一样“轰”地飞开，而是任凭马蹄践踏，车轮碾，在所不惜，似乎它们群体庞大得足以藐视死亡。因此，夏日的车辙里又到处可见屎克螂残缺不全的“尸体”。

屎克螂是丑陋的，当地有句俗语：巴巴螂子戴花——臭美。但对于草原来讲，屎克螂是一种有益的昆虫，一方

面它们使牲畜的粪便得以及时的处理，保持了草原的清洁。另一方面它们还是鸟类和啮齿类动物的食物，构成生物链的一个环节。

47. 苣荬菜和婆婆丁

春荒时，苣荬菜是农家吃的最多的野菜，家家户户每顿都少不了它。苣荬菜学名曰小蓟，又叫刺蓟或刺儿菜，属菊科。我们吃的是它的嫩叶和嫩茎，折断茎叶可看见渗出的白浆。苣荬菜味苦，初吃时难以下咽，吃惯之后，其苦味如喝茶、咖啡时一样，苦得有味，不苦则食之不甘。苣荬菜到处生长，田间地头尤为旺盛，你怎么铲，怎么剝，照样一茬一茬从地里往上拱。嫩时，是人家桌上的菜；壮时，是喂猪的青饲料；老时则成了庄稼地里的害草，所以，庄稼地里的苣荬菜一律予以锄之。但是，它的地下部分属匍匐根茎，每一处随时都能萌发出新的植株，一遍地铲得干干净净的，三天之后再看，地里又是一片。

苣荬菜须蘸酱吃，老乡们自家做的黄豆大酱味道很不错的。抓一把苣荬菜，捏紧放入酱中一蘸，头一仰塞入口中，很有吃西餐的做派。起初，知青不敢尝这玩意儿的，苦叽叽的，能吃吗？但春天没有蔬菜，体内极缺维生素，口鼻常因疮疡而溃疡，大家十分想念南方的鸡毛菜，同学们常说，若是能喝上一碗青菜汤多好。后来在老乡家搭伙时，见他们苣荬菜吃得那样香，渐渐抵挡不住诱惑，也吃了起来。正是吃了这苣荬菜，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青的身体健康。知青们大概认为苣荬菜就是苦菜，所以在吃它的时候经常会“苦菜呀，花开呀，遍呀么遍山岗呀……”地唱着玩。

婆婆丁就是蒲公英，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它的踪迹，但把它作为菜蔬端上桌的却不一定多。在乡下，我们常剝婆婆丁吃。它的吃法与苣荬菜大致一样，蘸大酱吃，只是它没有苣荬菜那样的苦味，女同学比较爱吃。婆婆丁还有一个好处是苣荬菜所不具的，即可炒着吃，如果条件好的话，锅里多放些油，炒出来的婆婆丁比炒青菜心还好吃。待婆婆丁长到开花结籽时，它便张开把把小伞，将它的种子送往四面八方，这时的婆婆丁便与苣荬菜一样，只能铲除，因为它们的生命力实在往旺盛，是庄稼粪肥、阳光的竞争者。

有了插队的经历，我现在吃什么都觉得香，所以吃什么也都不在乎，不似有些人那么矫情，这不吃那不吃，挑挑拣拣的。我吃豆芽、韭菜、荠菜、小青菜等，不象别人要花很多时间去拣呀摘呀，我先把它们放在水里浸上个把小时，泡去农药和沾染上的化肥，然后洗净或炒或煮，省时省力，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有点儿黄叶，杂草怕什么，多些纤维素更好。即使有个把虫子，也是高蛋白，鱼虾不过如此，只是吃的时候最好别看见。

48. “锄禾日当午”

庄稼要靠人伺候，撇开老天的作用不提，收成好坏全看人的勤劳与否。苞米、高粱等作物寸把长的时候就要开锄铲地了，若是铲晚了，等杂草压过禾苗再铲，间苗十分困难，容易伤苗。俗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草与苗在竞长之时，一天也耽误不得。每逢开锄之前，队里就早早派人从老远的孤家子购来上好的锄板，两块大大的磨锄头用的磨石也早已搬到井台旁。开锄前夜照例开会进行动员，队长在念完“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之后，便具体分工，这拨人东头去铲苞米，那拨人西面去锄高粱；安排好接送社员的马车，送饭送水的毛驴车。最后还要再三强调，早晨出工时一定要把锄头磨快了，重复着那句老话：磨刀不误打柴工。

铲地的日子，早上三四点钟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整个一天十五、六个小时都在地里，除晚饭回屯子吃外，早、中两餐均在田头。天天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个个晒得黝黑黝黑，几天地铲下来，再分不出哪个是上海知青，哪个是当地社员了。

东北的庄稼地不同于南方，东一小块西一小畦的。而是若种高粱，则一望无际全是高粱，一直延绵到天地相接；若种大豆，则遍野的大豆，望不到尽头，很有气势。但铲起地来可要命，往往一条垄半天甚至一天工夫也铲不到头，如果落在后面，前面的人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地平线唯你孑立其上，环顾四周，茫茫黑土地，孤独的感觉倏然而至。垄短时，同学或社员会从彼端帮你铲一段，这称作“接”，垄长时，大家自顾不暇，无人接你，这样便会越拉越远。待到大家歇憩时，你须得不停地继续铲，等到总算把一条垄铲到头也想歇一会儿时，大家却起来干上了，你只得连歇都不歇随大家一起铲，否则又得拉下。

每次铲地总有人拉下，一般也都有人去接，谁接谁，这里大有文章。平时，知青之间常互相接来接去，但男同学接男同学，女同学接女同学为多。时间长了互相熟悉之后，接起来不分男女。社员中，兄弟姐妹自然会相互接，才父子叔侄之间更会接，而无亲缘关系或亲缘关系较远的异性青年之间，如果经常互相接来接去，若非已定亲的姑娘小伙，这就是在传递爱慕的信息，“接”的行为往往成为沟通爱情的方式。当一个小小伙子一本正经地去接一个姑娘时，大家看得出，他下了多大的决心和鼓足了多大的勇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长得标致一些的姑娘，接得人也多，当然，主要是小伙子。

铲地也有幸运的时候。有时你在一条垄上铲着铲着，别人还没到头，而你却到头了，因为你铲的那条垄是“抹斜”。“抹斜”是耕地时犁手没有把准方正，将地给犁斜造成了偏垄；或者是地本来就斜造成的偏垄，偏垄往往只有正常垄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甚至更短。为了矫正偏垄现象，犁手常常再犁出一两条半垄来修正，这些半条垄都叫“抹斜”。到底是否这两个字，我不能肯定，因为从未见到文字记录。谁轮到一个“抹斜”垄，无论社员还是知青，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轮上谁运气，就算你这条垄已经铲到头了，在其他还未重新铲另一条垄之前，你可以休息，或者干别的。表现好或心地善的，便主动去接拉在后面的人。动作本来就慢的，会先去铲下一轮自己的垄，这叫笨鸟先飞也未尝不可。最叫队长生气的是有些人遇到“抹斜”后，二话不说，找一个草厚的地方，倒头便睡。队长也只能当着大伙骂两句“这货，完蛋玩意儿……”了事。

队里有社员聪明过人，事先探得明日可能铲哪块地，暗里把那块地的“抹斜”查明，在垄头做上记号，第二天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攫了这条垄的“铲权”。若队长和打头的偏心或想特意照顾谁，他们会不露声色地将“抹斜”分给这个人，因为队长和打头的对每块地里的“抹斜”都了如指掌。

地一般须铲三遍，头遍地既除草又要间苗，苗只有寸把高，时值夏初，不冷不热，除了腰酸些，倒不怎么累；二遍地主要是锄草，兼有松土的作用，此时的苗有一尺来长，由于已到盛夏，草的长势极旺，草茎粗得一锄两锄砍不下来，累人得很，加之日头又毒，一天地铲下来，浑身疼痛；三遍地又叫“打兔子”，是因为苗已长得约一人高，完全压倒了草的长势，地里的草已不是很多，东一簇西一簇的，象一只只躲着的兔子。铲第三遍地并不累，速度也快，一条垄里没多少草好铲，有时索性扛着锄头往前走就是了。但此时蚊子和小咬（一种小如跳蚤，会飞的噬血昆虫，叮人狠且疼）很多，由于青纱帐里密不透风，又闷又热，人们都穿着短袖衣服或背心干活，胳膊上被苞米、高粱的叶子划出一道道口子，渗出血痕，噬血的飞虫闻腥而至，围在人的头顶上“轰轰”作响。你既要干活，又要驱赶这些可恶的蚊子和小咬，时不时地被它们叮上两口，真是苦不堪言。

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连推广农业科技也用运动的方式，印象最深的是推广用小把锄铲地。所谓小把锄，是一种不带木柄的小锄头，其形状与大锄头一样，只是规格尺寸小得多。据说使用小把锄铲地质量好，不伤苗，因而能提高产量。大锄头铲地人可以站着，略为弯点腰就可以了，而用小把锄铲地时人必须蹲着，十分累人，大家都不愿意用它。但上面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发动，级级动员，要求各大队，各公社乃至全县都淘汰大锄头。并定好期限，派干部蹲点督察，甚至连小把锄都是公社统一订购发放的。

由于小把锄铲地的进度实在不能与大锄头相比，队长无奈之下想了个高招，要大家下地时，两把锄头都带着，上面来人检查或有公社、大队干部路过时，藏起大锄头，用小把锄铲地。“警报”解除后，一律再改用大锄头。好在旷野之中，几里地外来人一目了然，要发现这个秘密不是很容易的。有时，即使被个别干部看见了，他们也装聋作哑，只当没看见。其实，社员们有娴熟的铲地技术，根本就不必推广什么小把锄。

时间一长，各家的小把锄都生了锈，推广小把锄的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插队记事（6）

49. 准备打仗

六九年前后，正是我国与“苏修”关系极为紧张之时，珍宝岛冲突爆发，全国更是全民皆兵，到处“深挖洞、广积粮”，就连这个草原上偏僻的屯子也紧急动员起来。起初，公社要求各屯挑选两匹好马，配上由公社统一置备的马鞍，作为战备专用马，不得再耕田拉车。晚上，要马不卸鞍，随时准备出动。后来公社又给基干民兵发了步枪，尽管是二战淘汰的三八大盖，又不配子弹，但队里的小伙子背起枪来依然神气十足，刚领到枪时，下地干活再远也要背去，到地头几枝枪架在一起，宛如战争年代武工队在帮老百姓抢收抢种。一到歇憩，他们便忙不迭地用老母鸡熬的油吭哧吭哧擦枪。我们知青从未见过这个阵势，都被这战争气氛所激动，恨“苏修”怎么还不打过来，若打过来，我们也好保家卫国，也有象电影里八路军打鬼子那样的壮举。

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人们也越来越紧张，谣言开始流传。有人说新疆那边已干上了，有人说“苏修”派来的特务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天天晚上给苏联发信号弹。果然，每到天黑，我们总能看到远远的有红色的或绿色的信号弹冉冉升起，鉴于此，我们更感到战争已迫在眉睫。终于，一天半夜里，我们被急促的哨声惊醒，队长挨家挨户地喊：“民兵集合了！民兵集合了！”。我们知青虽不是基干民兵，但属普通民兵，当然要也要集合了。我们懵懵懂懂地撞出屋子，见屯子里已人声鼎沸，一个着军装的军官全副武装站在队房前，后来知道他是公社派来的军代表。他指挥大家站队报数，批评了一些动作迟缓的民兵，而后，说：“上面有命令，一个苏修特务就潜伏在南岗子上，大家马上出发去搜捕，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决不能让特务跑了”。一声“出发”，我便跟着大伙朝南岗子进发。

时已深秋，天凉得很，不知是冻的还是紧张的，我一直不停地打哆嗦。岗子上种有大萝卜，犹如一个个拌脚石，加上黑暗中纵横不辨的田垄，我摔倒了爬起，爬起来又摔倒，鞋子里灌满了沙子。我停下来摸索着将鞋子里的沙子倒光，再往前走时已不辨方向，四周一下子变得死一般静寂，同学们都已走远。我想喊“有人吗？”怕惊动

了特务；不喊，我又不知朝哪儿走，再说还怕碰到狼。我一个人在岗子上，黑暗中不知转了多少个圈，直到天放亮，才找准屯子的方向，狼狈不堪地回到屯子里。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次演习。

“要准备打仗”的气氛持续了好长时间，厩里的战备马养得肥肥的，恐怕打起仗来也跑不动，可“老毛子”始终不见打过来（东北一带对俄国人的蔑称）。我也终于明白，那红的绿的信号弹，不是公社干部们过枪瘾，就是为大家提高警惕而采取的“高招”。

基于民兵们的热情逐渐冷却，也不背枪擦枪了，再说本没子弹，用他们的话说：“这玩意儿，没子弹还不如烧火棍”。上面见枪在民兵手里大都已生锈，再者感到这么多武器散在民间总不是安定因素，于是一纸令下全部收缴入库。

50. 一条大河

屯子往东北方向，很远很远有一条河，河不宽，河床很深，但水不过膝，河流蜿蜒在草原上，犹如一条白练，与绿色的原野一起，伸向遥远遥远。至今，我都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也不知道它的源头和流经的地方。

那年夏天，一日我与四队的马倌一反往日放马规矩，我们将马合群之后，两人一左一右，驱马群直往北去，那边的草原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据四队马倌董小说，一直往东北走，那儿有一条大河。真难以相信，这遍地不是沙漠就是草原，还会有河。所以，我特意要到东北边去放马，看看这条“大河”。

我们两个赶着马群，不紧不慢地走着，快了不行，马儿是要吃草的。不知走了多少路，就是不见什么“大河”，董小一个劲儿地说“快到了，快到了”，我真怕走太远了晚上赶不回去。约莫中午时分，终于到了河边。这哪是什么大河，河床虽深，但宽不过两丈，浅浅的水，都没不过膝盖。我原以为这“大河”不比黄浦江，至少象苏州河一般，没曾想还不如江南的小溪。时正值盛夏，又走了那么些路，身上燥热得很，见到清清的河水仍是欣喜万分。我脱掉衣服，和董小跳入河中，尽情嬉水，十分惬意，下乡至今未洗过澡，这回可是要痛痛快快地洗一洗了。遗憾的是无法游泳，脚一蹬就碰着了底。我们正在水中享受，岸上下来一大群羊，“咩咩”地叫着。我以为它们饮水而已，不想它们饮完水后，一只只跳下水来，朝对岸涉去。顿时，河里白花花全是羊，有的几乎将腿蹬到我们身上。我和董小慌忙从水中爬出，在羊群中左冲右突，逃到岸上，再看那河水，被羊搅得浑浊不堪。

待羊走尽，上游的清水冲走了浊水，我俩重又下河，将身子洗净，顺带将衣裤一并洗了，往草原上一晾，我们也赤着身子躺在草原上，沐浴着夏日的阳光，算是日光浴吧。

之后，我再未到东北边放过马，那条河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虽然我并不知道它叫什么河。

51. 知青小刘死了

那是一个阴霾的雪夜，雪，轻轻飘洒着，悄无声息。人们都已早早睡了，整个屯子也睡了，没有一丝动静。轮到值上半夜的班，我独自一人守在队房的炉子旁，就着昏昏的煤油灯百般无聊地嗑着葵花籽，以打发这日复一日极其无味的冬夜。突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吱嘎，吱嘎”的踏雪声打破了沉寂的夜晚。只见车老板牛江一头闯了进来（当地将赶车的称为车老板），翻毛大氅和貉皮帽子上挂满雪花。他进门从墙上摘下大鞭就去厩里拽牲口，看样子是要套车。一般情况下这大雪天又是夜晚很少有出车的，我吃惊地问：“牛老板，这么晚了还套车？”他只顾低头忙乎，嘴里含糊糊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又问，他吼道：“你们户里的小刘要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以为他开玩笑，也开玩笑说：“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牛江把脸一沉，眼一瞪，说：“你他妈还有心开玩笑，去看看吧”，随即一扬鞭子，轻喝一声“驾”，马车碾着厚厚的积雪，“吱咯，吱咯”地往集体户方向疾驶而去。

牛江是队里有名的直性子，平时很少吭声，但说出话来很有分量，由于他为人正直，给我们知青的印象很好。他不象有些社员，要么与知青好的要命，要么与知青似冤家一般，他很少与知青说说笑笑，但在关键的时候，常常能帮知青一把。知青有什么困难找他，从未见他说过“不”字。牛江是驭马的好把式，再难调弄的烈马，到他手里不几天便服服贴贴。他驾驭的那几匹马全是别人不敢碰的，只有在他的手里，这些马才变得温顺，干起活来，一匹赛过一匹，别提多肯使劲了。所以，在沈家屯，牛江的威信高，说话算话。经他那么一吼，我知道真的出事了，赶紧踩着辙印朝户里跑。

待我跑到集体户门口，同学们都已起来了，正七手八脚地将小刘往外抬。这时的他已经昏迷，口里泛着白沫，头不由自主地耷拉着，由于天太冷，大概将近零下三十度吧，小刘裹在厚厚的棉被里，抬起来很费力，直往下滑我急忙上前搭一把手，用双手托住，这时，我感到他浑身软软的，似无骨头支撑一样，我心头一颤，袭来一种不祥的感觉。我们把毫无反应的小刘放在马车上，户长和几个同学也跳了上去，牛江便驱车直奔公社卫生院。等车完全消失在雪原中之后，同学们告诉我，小刘今天一早就称头疼，跟队长请假，队长没有同意，认为头疼脑热没什么大不了的，待到下午，头疼加剧，队长才同意他休息。小刘下午躺下前，还抱秫秸烧了炕，大家见状便也没把他的病当回事。等吃晚饭时，他说头疼得受不了，爸呀妈呀的直喊，并且开始上吐下泻，同学这才发现情况不妙。有人慌忙报告队长，队长一看不好，赶紧叫牛江套车，往公社送。我看场院，平时白天黑夜不大回去，竟一点儿也不知此事。

等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队房，三更已过。这一夜，我无法平静，尽管队房里炉火烧得通红，我还是全身发冷，冷得上下牙齿直颤，发出“咯咯”的声响。队干部和同学们也是一宿没睡，不时有人到队房来打听，他们急切地等待小刘的消息。小刘名叫刘建国，比我大一岁，看起来却比我小，我们自从来到乡下，小刘就和我睡同

一铺炕，而且紧挨着。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吵过闹过，但毕竟日日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昨天尚活蹦乱跳，好好的小刘，今天就突然病了，而且现在生死未卜，他得的什么病，竟至于严重到如此地步？我们这些才十七八岁，未领世面的知青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一时都没了主张。天快亮时，从公社传来消息：小刘死了，在送往公社的半路他就已经咽气了。死亡原因：脑溢血。

在那个夜晚，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在通往公社的黄土路上，一个上海知青的灵魂永远留在了这儿。闻讯，知青们都不愿相信，从大家呆滞的表情可看出，同学们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现实。

第二天，小刘回来了。还是那挂马车，他静静地在上面躺着，身上裹的还是那床被子，失血的脸犹如蜡做的一样，苍白苍白的。两个社员一个捧头，一个捧脚，轻轻将他从车上抬下，失去生命的躯体早已冻得绷硬绷硬，两个人抬着他，就象抬着一段木头。尸体放置在队房旁一个废弃的破屋子里，只等上海亲属来了以后落葬。知青们提议晚上要派人看守，以防狼来啃咬，队长便令人晚上在停尸房里点一盏油灯，还派两个基干民兵轮换看守。

一个星期之后，上海亲属来了，来的是小刘的舅舅，另外还有两个他母亲单位的同事。他母亲未能来，因为接到噩耗后，他母亲当场昏了过去。后事的处理极为简单，用知青盖房子的木头打了一具棺材，在孟家坟烧化一块冻土，将棺材埋了下去。由于土层化得浅，棺材一半露在地面，用刨下的冻土再覆盖在上面，透过土块的缝隙，仍可见腥红的棺材。

小刘死后，知青的情绪沮丧到极点，再听不到欢笑和争吵。天也如人的心情，一直阴沉沉的，半月不见日头，一到夜间，窗外呼呼的风声听来是那么可怖。小刘的突然死去，使大家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归宿，难道也化为孟家坟的一抔黄土？知青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了。

52. 殃及池鱼

上海知青离乡背井好几千里来到草原，按理互相之间应该十分亲近友好，大多数上海知青的确如此，但并不尽然，知青之间打架斗殴、以强凌弱的事时有发生。其实我们这些知青并非真正的知识青年，没读过多少书。由于文革的影响，一九六六年的暑假之后，上海的学校大多没有开学上课，大家都在社会上游逛，许多学生沾染上流氓习气并把它带到了乡下。知青中，高中生多的集体户里调皮捣蛋的人少，气氛较为融洽。如向阳八队的上海知青大多是高中生，一到乡下，他们这个集体户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户。我曾去过一次，那是从县城体检回来途中遇到大雨，赶不回沈家屯，便在向阳八队过了一夜。晚上吃饭时，他们不抢不夺，由一人统一将饭打好，放在长条桌上，几个菜用大盆盛上，放在中央。说一声“开饭了”，大家坐到桌旁一起用餐，说说笑笑，气氛别提多融洽了。他们吃的豆角、土豆和西葫芦，都是自己种的，我吃得亦乐乎。我们集体户咸一顿淡一顿的，少有像样的饭食。这个队的上海知青是县里的典型，常常有人到县里介绍经验和讲用，当时谈起向阳八队全县知青无人不知。

初中生多，特别是全部初中生的集体户里调皮捣蛋的人多，常有吵闹发生。我们户清一色的初中生，年龄相差不多，天天吃的是一锅里的饭，难免磕磕碰碰，吵架是常事。由于没有一个可以慑服大家的有威信的“主心骨”，十几个人抱不成团。集体户里的活儿派谁也不肯干，因为出队里的工计工分，干户里的活儿不计工分。因此，菜园子里种的菜不浇水不施肥，菜不长，草却长疯了；猪食槽里的精饲料肥了别人家的猪，自己的猪饱一顿饿一顿怎么也长不大；房子有窗户棧儿没窗户纸，风雨畅行无阻；院子有墙没门儿，队里的毛驴不请自来，把烧火用的谷草秫秸叨得到处都是。为此，大家吵啊闹啊，直到陆续离开。但是，吵归吵，闹归闹，事情还是一点儿一点儿在解决，在好转。逐渐菜园有人管了，猪有人喂了，窗子装上了玻璃，院门有了挡牲口的横杠。真正吵到动手打架的事毕竟极少发生。

同一个户里的知青再吵再闹，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担心的是外来的流里流气的知青。

一日，相邻大队的几个男知青来到沈家屯，他们满嘴脏话，先是对我们知青卖力参加劳动嗤之以鼻，接着津津有味地介绍他们是怎样作弄老乡的，吃饭时，想要女同学陪他们喝酒。户里的女同学群起而攻之，在队长的支持下，这几个流里流气的知青终于被灰溜溜地撵走了。自此，外面知青中有了“合作八队女知青厉害”的说法。

那时，我身高不到一米六五，属个子矮小的，回家探亲或外出办事，在途中最怕碰到流里流气的上海知青。你躲着他们，他们却要来惹你，向你索要钱物及吃喝。我第一次回沪在四平站换车时，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那天，四平站候车室里人满为患，根本就无法找到可坐的地方，我只得坐在候车室门外的台阶上。一个和我一样披着黄棉袄的大高个走了过来，用上海话和我打招呼：“哎，认得我伐？我就是××区的黄毛。”他的口气就如梁山好汉在自报家门：识得俺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么！不等我回答，他又问：“依是双辽县的吧？你们县的阿三，长腿，洋铅桶认得吗？都是我的朋友。”对此我好费思量，说认识，委实又不认识，只听说过；说不认识，不是有眼不识泰山吗。他大概不耐烦我的吞吞吐吐，干脆一伸手：“借一点钞票给兄弟，以后会还你的。”我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他接过去又说：“再弄几斤粮票，要全国粮票。”我又给了他两斤全国粮票。说实话，我并不怕他把我怎么样，倒是出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一个堂堂的“黄毛”（至于属哪一级别山头的草莽英雄权当别论）竟至于落到了讨钱讨粮的地步，我就当接济绿林好汉了。这位“黄毛”的表现倒也颇义气，尽管从我这儿所获甚微，他还是拍拍我的肩膀说：“以后有人欺负你找我，我黄毛在怀德县插队，到那边一问就晓得。”随后扬长而去。几年之后，我打听到怀德县果然有这么个黄毛，据说早已犯科被判了重刑。

在乡下，个别知青技痒，打起老乡家养的鸡鸭、猪狗的主意。偷鸡摸狗不算，他们甚至敢把老乡的整只猪给偷宰了吃。由于知青骚扰老乡的事情逐渐增多，老乡们开始防范，见到有不认识的知青进屯，就似当年老百姓见到鬼子进庄一样。一次我与两个知青到另一大队看望同学，我们顶着风沙走了一上午，好不容易进了屯子，突然四面围上来一群人，几枝枪对着我们，大喝：“不许动！”一个同学吓得要跑，拿枪的吓唬道：“想跑？跑我就崩了

你！”他们把我们三个押到一间房子里，只见炕上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人，一脸的严肃。他把桌子一拍：“说，干什么来了？”我说来找同学，他又盘问哪个同学，找他有什么事情等等。同来的一个同学对莫名其妙地被拘押和盘问十分恼火，只说了句“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屁股上便挨了一脚。就这样，三个人足足被盘问了近两个小时才获得自由。他们“忠告”说：“赶快回去，没你们的事，否则押到公社去”。我们只得原路返回，等大家垂头丧气回到集体户，已是下午四点。从早到此时，三人滴水未进。

53、艰苦的探亲之旅

第一年冬天，同学们都想回上海过年，而公社则要求知识青年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队长说：“一个别走，茂林车站有人堵着，你们知青谁也休想上得了火车。”女同学为此曾抱头大哭，最后下定决心一起走。在茂林站，火车未来之前，她们躲躲闪闪，唯恐有人认出而不让她们上车。火车一到，她们才匆忙奔向月台。那时乘车无秩序可言，闹哄哄一阵乱挤。发车铃打过之后，仍有不少人尚未上车，急得直哭。终于，她们或从门口挤上去，或从窗子里爬进去，总算全部上了火车，回家了。

女同学的成功对我们来讲是个鼓励，半个月后，我决定也回上海过年。

家里给我寄来四十块钱作盘缠。因为我一年挣的工分仅值四十五块钱，钱还未到手，保管老李一脸的虔诚就全借走了，分文没给我留下。临行前夜，我到老李处称了三十斤苞米，十五斤黑豆，那是到上海喂我的鸽子的（下乡之后，我的鸽子一直由弟弟代养），还称了十五斤黄豆算是带回家的东北特产。这些农产品都可以从明年的工分中扣，无须交现款。另外老李偷偷送给我十斤又脏又臊的羊毛，说是让我打一件毛衣穿。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放亮，我就搭上送公粮的大车，冒着严寒来到茂林，开始了我艰苦的探亲之旅。

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快车我不能坐，盘缠有限；慢车虽须在沈阳、南京换两次车，但票价便宜，而且可以在此两处游玩一番，一举两得。我一向神往祖国的名山大川，此番虽不能到得，沈阳的故宫、南京的中山陵还是一睹丰采的。

我在沈阳站下了车，带着重重的两个包裹。来到物品寄存处，欲寄下东西可去游玩，寄存处却道包裹里有粮食，按规定不能寄存。无奈，我只得驮着沉重的苞米和豆子，乘车前往故宫。总算在故宫外的一个小店里寄下东西，我才一身轻松地观瞻了我国最北的故宫，这个古代强悍民族的皇宫，领略了一代英雄努尔哈赤建功立业的伟大。等我回到车站，要想签票启程，才知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先是排长长的队签票，不断有人“夹楔”（上海话曰插挡）和熟人来开后门，排了一个半小时才签上。签完票取来一看，下半夜的车，赶紧找个座位休息休息吧，整个车站横七竖八到处是人，连过道都躺满了，上哪儿还能找着座位。胡乱找个地方往苞米袋子上坐，取出在街上

买的馒头就啃。想起课文中读过的梁生宝买稻种吃的那份苦，我此刻还不如他，连一口热汤都喝不上。

半夜里上车又是挤，我的那袋羊毛被人挤得差点儿把我也带下车去。车上自是早已满座，且连座位底下都是人，我横竖找不着立足之地，打算找个地方如法炮制车站里的做法也不行，想挪一挪这个的腿，人家在睡梦中又伸了过来；想动一动那个的包裹，人家却又醒过神来：“干啥，干啥，你动我包干啥？”似乎包里有金子，我触摸到的感觉也不过是黄豆、葵花籽之类。索性站着，这一站就从沈阳一直站到蚌埠，站得腿僵了，脚也肿了。最尴尬的是上厕所，好容易从一个个人身上爬到厕所旁，一大堆人在排着呢，进去的从从容容地方便，外面的憋得直敲门。由于无人打扫，周围臭气熏天。待得方便完了，还要从人堆里挤回去，出一身大汗。如厕这般艰难，我尽管吃的是又冷又硬的干馒头，就是不敢喝水，嘴唇因此烧出了泡。我唯一想的是快到南京，下车就解脱了。

车到南京，我已没了游玩的兴致和力气，径直到签票处把票签了，想早点儿回去算了。可取票一看距开车时间还有三四个小时，又动了看看长江大桥的念头。包裹还是不让寄，背着走吧，我乘车来到桥下，肩负着苞米和黄豆一步一步朝桥上走去。走完引桥，欣赏了桥头群雕之后，我继续朝前走，打算到桥的中央再折回。迎面来了几个军人，胳膊上套着红箍，上面可能是“纠察队”几个字。他们围上我问包里是什么东西，并伸手在包外捏来捏去，一个军官模样的把包打开，细细检查了一遍，说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长江大桥上不允许带包，要我别往前走了。事已如此，无须再争，我背着沉重的包裹惺惺挪下桥来。

南京上车比较顺当，车上并不很挤，我居然一下子找到了座位。给我挪出位子的也是一位上海知青，据介绍他插在东北的黑龙江，已经出来一个多星期，几经倒车，这回总算快要到家了。这位知青中等个子，清瘦的脸白白的，一副书生气，但很健谈，一路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讲黑龙江知青的情况，我谈吉林知青的境遇。他说他们那要回上海必须办通行证，否则不允许离开。他想回家过年，就偷偷跑了出来，队里还不知道。的确，我发现他并无行李，像是匆匆跑出来的。我还发现他身上似乎没带钱，因为我买水果面包时给他带了一份，他并不与我推推搡搡争着付钱，只表示感谢。列车开过苏州，我觉得他有些坐立不安，老是四处张望，一反原先的持矜，我十分奇怪。

列车驶入南翔车站，车身底下吱吱作响，经验使我知道这是在减速，大概因为南翔站的道岔多，为安全起见列车减速行驶。此时，这位上车认识的黑龙江知青——白面书生站起来对我说：“我是逃票上车的，等进了上海出站就难了，就此告别，再见了。”只见他抬起车窗，飞快地探出身子，然后用两手扒着窗沿，往下一跃，消失了。他一连贯的动作十分熟练，可见他是一路逃票练就的。当时火车虽已减速但仍比汽车快吧。我探出身子想看看他不会摔倒，已变得很小的他远远地朝我挥着手：一点问题也没有。

车到上海北站天尚未亮，为不过早惊动家人，我在站外吃了一碗久违的豆腐浆和大饼油条，慢慢地细细地品尝着这浓郁的乡韵。看着来来往往匆忙的行人并逐渐热闹起来的街市，觉得上海还是离别前的上海，那么熟悉，那么可亲。隆冬腊月，上海人还是一手拎包，一手往嘴里填东西，匆匆去上班。北方人曾多次问及是否真有此事，即边

吃边走的问题，我甚觉他们问得怪，如今阔别之后再回上海，见到如此众多的行人这般边吃边走，不觉有点儿好笑了。

上班高峰时期的交通，即使那年代也是十分拥挤的，我把两只包裹一前一后搭在肩上，硬是挤上了连门都关不起来的十三路公共汽车。我把东西放下，为的是避免碰着前前后后的乘客，而这一举动，反而遭到一阵抱怨。“格个北佬真讨厌，带价许多么子”“喂喂喂，把依格东西拿开好不好？”当然，这应怨我，谁叫我带了这么多东西妨碍大家呢。可我又听到一些话使我忍不住勃然大怒，一个男子对另一个人说：“依看伊头发价长，当心老白虱。”而另一个则说：“格帮瘪三回来做啥？”我回来做啥？这就是离别上海一年后，刚刚踏入她的怀抱便受到的“礼遇”！我怒视着这两个人，想骂甚至想揍他们，难道我们知青在外面吃苦受累他们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同情？难道不知道我们多么思念家乡，在外面哪怕碰到一个说吴语的江浙人也亲热得不得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有人买不起车票，冒着生命危险扒车也要回上海？然而激动使我语塞，憋红了脸，我说了一句：“想必你们是没有下过乡。”至今我都后悔怎么说了这么一句不咸不淡的话，而没有用拳头在他的脸上来那么一下。

在上海我住了两个半月，又回到满天风沙的科尔沁。

54、命运的转折

从上海回来不久，传来了知青可能上调的消息，并且很快消息就成了现实，我们所在的集体户有两个上调指标。知青们得到这个确切的指标额后，都很兴奋，谁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呢？艰苦可以不算，精神上的枯燥无味早已使大家厌倦。换一个生活环境，成了每一个知青的愿望。两个指标，十七个人，让谁去？要是在城里或是现在，问题可能十分复杂，而彼时，只要贫下中农开一个会，一推荐，事情就解决了。被推荐的是两个女同学，其中一个知青户长，她们两个春节没有回上海，响应了公社提出的“在乡下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号召，理所当然，这两个指标应该归她们。她们要走了，大家十分羡慕，尽管她们所去之处是一个尚无人烟的荒漠，条件比这儿更苦（当时，这批上调知青全部抽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沼泽里建设一个新的油田，即七〇油田。创业时，条件极为艰苦。现在彼处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石油城市——松原市）。送她们的马车出发时，两个人在车上哭成了个泪人。虽然，离开这儿完全是出于自愿，毕竟，她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一年半，摸爬滚打，风霜雨雪，对人，对这个电子不能说没有感情，她们的泪水确实确实流自内心。

她们两个是第一批离开沈家屯的上海知青。

当年夏天，正是苞米、高粱拔节时（此时由于气温、雨水合适，庄稼生长极快，秫秸如拔出一般快），公社又

给了我们两个指标：一个是上大学，到吉林师大；一个是当工人，到双辽县制糖厂。

上大学的指标又给了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表现好，出身好，特别是出身，在当时极为重要，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指标自然非她莫属，无可争议。走了三个女同学，剩下的当工人的指标怎么说也该轮到男同学了，况且这个指标对家庭出身无苛刻要求，大部分男同学都符合条件。听说糖厂的活儿又脏又累，一般人都不愿干。一天收工后，队长在场院里召开大会，由全队的贫下中农进行表决，决定到底让谁去当这个工人。那天晚上，更信（专职夜间喂牲口的人）在场院里燃着了一堆青草，升起的浓浓烟雾驱逐了四周的蚊虫，整个场院弥漫着蒿草散发的醉人的清香味儿。社员们吃完饭后带着凳子陆续来到场院，找个地方把凳子一放，先掏出烟袋把烟点着，美滋滋地抽着，只等开会。队长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宣布开会，这回他没有讲太多的大道理，直截了当请大家推荐一个知青到糖厂当工人。杨队长说完，场上久久地沉默，只有吱吧吱吧的抽烟声。知青们一个个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只等命运的宣判。

“我提两个”，一个烟酒嗓子发话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了过去。发话的是队里干活的头牌好手，打头的柳生生。

自从我得罪于老钟家的之后，社员中有不少人对我另眼相看，特别是打头的柳生生，三天两头找我的茬儿，他认为我是杨队长那派的，而他与杨队长一直闹着别扭。我铡草，他会抓起一把说：“这不是胡弄吗，是人干的活儿吗？这么粗的草，让牲口咋吃？”我铲地，他前前后后检查来检查去，对大家嚷道：“这是谁没长眼睛干的活儿？返工返工！”还跑到我面前大声喊：“何，说你呢，听见没有？”常常臊得我满面通红。对于他的百般刁难，我无可奈何。说起来他人并不坏，干起活来又快又好，我很敬重他，除我之外，他对其他知青还是不错的。可他视我却如眼中钉一般。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决不会提我。

果然，他提出了一个，两个，三个……，最后除了小毛、小W，几乎所有知青都提到了，就是没我。他在讲这些同学的优点时，不住地用眼角瞅我，他那时正害眼疾，两个眼睛红红的，好象要吃掉我。接他之后，社员们陆续提了好几个人，也没我。本来信心不足的我，此时愈加灰心。出乎意料的是有一个平时与我没有多少来往的人发言推举了我，正是他，改变了会场上的气氛，也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个人是队里的老党员，也姓柳，叫柳子玉。他在朝鲜打过仗，负过伤，队里重的农活干不了，平时打打杂，一年得不了多少工分，因此是全屯最困难的一户。但是，他是队里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说话有一定的分量。他提了我，并且说了我许多好处。接下来发言的几乎一边倒，都提我。他们与柳子玉一样，说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真心实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最后，全体举手表决，我竟然得票最多，杨队长当场将招工登记表给了我。

这天，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我是那年秋天离开沈家屯的，到了县城郑家屯一报到，方知我们这批知青并不是到县糖厂工作，而是到四平市。当时，作为地级市四平在我们眼里大得很，因此大家都分外高兴。

以后，我在四平工作了十多年，直至调到南方。

很长时间内，我一直在想，我与柳子玉接触并不多，他为什么会提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渐渐明白一定是杨队长暗里做的工作。好个杨队长，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将我照顾了，否则，我以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因为我走后不久，钟队长“擢升”为合作八队队长，系一把手。他会不会报复，看他的肚量了，而我，心理上决不会没有压力。

55、最后几句话

斗转星移，三十年快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如今不少已抱上了孙子孙女。回首往日，是苦是甜？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留在记忆中的，往往是美好的。确实，插队期间尝受的苦涩已逐渐淡忘，而那在人生旅途中应属短暂的一瞬，却给我留下了不尽的美好的回忆：人情，风俗，绿野，奔马，多少年来一直魂牵梦绕，以至我对电台里播放的“二人转”都感到格外亲切。

有过插队的经历，我似乎已不再在乎后来的坎坷，插队的经验，是我的资本与财富，我常常对别人说：“我插过队……”与其说是寻求理解，不如说是一种自豪。

我还想对不懂得什么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青年说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想来思去，觉得还是什么也别说，该知道的他们会知道的。

往事回忆（一）

他们的故事

1968年-1969年是中国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所以不管是08年还是09年，纪念知青下乡都叫40周年，这很有意思，混乱的年代让数字也跟着混乱。我实际上在农村仅仅呆了三年，大概还差三个月，如果加上回家看父母的时间，充其量有一千天。但是我在那里的县城工作的时间却有十年，短短的一千天加上漫长的十年，让我终生难忘。四十年过去了，我虽然痛恨那场强迫我离开父母，到很艰苦的农村去劳动的运动，但是每每回想起我插队工作的中条山区，心中却总是被牵动着一丝乡愁。

我插队的小山村共有102口人，22户人家比较集中地居住在中条山脚下的一条浅浅的沟壑里。村里有村村通，就是县广播站在每家院子里拉的铁线小喇叭，一天广播三次，先是新闻，然后是文艺节目，大多是当地的蒲剧样板戏和眉户戏。再然后就是大队主任讲话，一般是讲生产形势和任务。开头往往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有时是“要把牛喂好”，有时是“要把棉花种好”——这要看需要。

村里没有电。全村没有一个收音机，只有生产队有一只手电筒，被赵本山戏称的家用电器。家家住的是土窑洞，外观简陋、破旧，里面很黑暗。

队长是个很英俊的庄稼汉，在我们眼里有50多岁，后来一问，才知道只有36岁，他儿子比我小一岁，17岁，刚刚读完初中，也回村参加劳动。妇女队长是个16岁的女孩，长的人高马大，像30多岁，我们不知道，管她喊大嫂，她就笑。

村东头有一口井，是全村人都饮用水源。井口用石板盘着，紧靠井北边是一个很古老的轱辘，上面缠着大拇指粗的牛皮绳，长长的绕着两层，约有40多米长。水不多，但够吃。望着井底，深深的，可以看见自己的脸。

村里与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一共有6个。有存在我们去的第二年结了婚，还有一个贫协组长巷娃，正热恋着大队妇女主任的妹妹——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妹。贫协组长一米八二，身体强壮，大眼睛双眼皮，很漂亮，按现在

的话说，绝对是个帅哥，性格温柔，一说话就脸红。但因为太穷，他只好在本村找，可是与他年龄相当的只有这一个了。

另外四个：有志和志友已经说下了媳妇，而铁锁和喜发是铁定的光棍了。铁锁是放羊娃，一穷二白，一群羊属于他的只有两只。喜发上头有两个哥哥，下头一个弟弟，只有老大娶了媳妇，老二患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是个残疾，走路跛，已经注定是光棍了。家里又一贫如洗。所以对他的婚姻问题，一家人都死了心。

山西的买卖婚姻十分严重，娶个媳妇要花一两千块，最少也要千八百。那时一个劳动日分一两毛钱，玉米收购价八分五，小麦一毛三分九。一千块是个什么概念？恐怕要吓死人。农民没有钱，养几只鸡，下了蛋必须卖给供销社，五毛九一斤，供销社卖六毛五，赚五分钱。农民最多养十几只鸡，鸡蛋换点煤油和盐巴，显然，如果从鸡屁股下抠出个媳妇来，就等于做梦娶媳妇。

那时农村娃的唯一出路是当兵。到了部队，即使提不了干，复原后县里也给安排工作，一下子变成了城市户口，每月一个小秋收。但当兵除了政治条件身体条件以外要有一定的人事关系。我村里有三个当兵的，一个在湖北，提了干。一个复原后在垣曲铜矿工作。最后一个晚，赶上哪来哪去，完璧归赵了。

我参加工作很早。县城里虽比不得大城市，但比起农村来像进入了天堂。我先在工厂学徒，国营，铸造工，一个月19块。学两年，很累。好在那时工厂管理混乱，累也累不了哪去。后来进了文化系统，不累了，知道的事也多了。

我们县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县革委会主任下乡时看上了，想给自己的独生儿子找个媳妇，女孩家里觉得能和县里的领导做亲家，一定是祖坟上冒了青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女孩很小，想着自己能离开农村到县城参加工作，每个月可以给穷苦的爸爸妈妈补贴一点钱，也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很顺利，女孩到某单位当上了打字员。从交易规则上讲，这事还算公平。

因为女孩不够晚婚年龄，两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那女孩虽然很俊俏，但永远是紧锁双眉，难得一笑。我和她打过几次交道，只见过她一次笑脸。可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据说是革委会主任那娃有点智力问题，女孩终于不干了。很快传来主任病倒的消息，又很快，女孩被调到距县城50公里之外的一个公社里去了。

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后来和县城附近村的一个女孩结婚了，这女孩被安排到我单位图书馆，为主任生了一个孙子，保住了他家的香火。接着，改革开放的烈火像文革的烈火一样在偏僻的小县城燃起。已经成为图书馆正式员工的女孩果断地提出离婚，并顺利办理了手续。此时的革委会主任早已无权无势，力不从心了。但是，主任儿子的承受力显然已经大大加强，他也很快完成了第三次婚姻，可见他的智力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革委会主任如果还在，应该80多了。他女儿和我爱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个很漂亮很聪明很开朗的女孩。他

的儿子我见过一次，看不出有什么瑕疵。我觉得作为领导，他还是挺大度的，并没有斩尽杀绝。而那第二个离了婚的儿媳妇后来还当上了图书馆的馆长，算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了。我倒是常常想起那个被贬到公社去的打字员女孩，不知这曲折的人生之路对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她现在还好吗？

全喜的故事

村里最能干的应该算是张全喜了。我们去时，他36，7岁，瘦瘦的，满脸皱纹，也像50多岁。张全喜哥俩，他哥哥张喜来放羊，高个子，喜欢发表议论。张全喜不，很少吭气。但是农活里的十八般手艺，他什么都会。据说农活里最叫板的手艺是摇耩，种麦子时，把式们一边吆喝真牲口，一边抖动着手里的耩，使麦种均匀地漏下去，播种到地里。而只有麦子从地里长出来时，才能看出摇耩技术的高低。好把式播种过的麦地，长出来的麦子一垄一垄的宽窄差不多，而把式孬的则是一疙瘩一块的，有地方多，有地方没有，像癞子头。

不光农活，张全喜还会木匠、泥瓦匠。村里所有的门窗，桌椅几乎都出自于他的手，不过不是很细致，但是能用。农具的修理也是他的事，他甚至会打棺材。他还是泥瓦匠，村里打窑洞，抹墙，封门口，他都是一把好手。他干活肯动脑子，不紧不慢，会使巧劲。他从不甩开膀子大干，从不气喘吁吁，从不伤痕累累，同样的活儿，往往是他先干完，而别人还在出大力流大汗。

哥哥张喜来七八个孩子，一排一溜儿，都、来、米、发、索、拉、西，数不过来。张全喜老婆不生育，他收养了一个男孩，还养着他的80多岁的老母亲。他不停地干，是村里挣工分最多的劳力。可是他分不到钱，因为欠款户太多，那些孩子多的，分口粮多，占用了村里的粮食款，而他们却无力偿还，他哥就是欠款户里的老大。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积累下去，张全喜的账上有几百元的存款，却一分钱也取不出来。

张全喜的自留地里长着全村最好的庄稼，一来他家人口少，自留地少，二来他勤劳，把块地整的像块绣花布。我们私下谈起来时，他说他希望搞包产到户，要不，他再能干也是受穷。但他仍是全村最富裕的户，过八月十五时，可以郑重其事地摆上一桌，虽然胡萝卜丝，白萝卜丝各算一盘菜，但也能凑起八个菜。70年中秋节，他请我们几个男知青吃饭，八个菜中央还有一个砂火锅，里面有粉条豆腐，炸鸡蛋切成的丝，还有十几片带皮的五花肉，炭火很旺，烧得火锅咕嘟咕嘟滚，冒着热气，满窑洞里喷香，让我们垂涎欲滴。

大概是74年吧，他母亲去世，八十五、六岁，称得上是高寿了，又过了一年，他媳妇害病，先是公社医院，又是县医院，治不好，后来到了三门峡医院也没看好，癌症。折腾了不到一年，走了。算是心疼他，没把他的积蓄花完。那时他也找生产队借了不少钱，彻底沦为贫下中农，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欠款户。

我04年、08年两次回村都见了张全喜，他后续了老伴，儿子也成家了，并且有了孙子。第一次他不在家，他儿

子骑摩托车把他从地里接回来，满身灰尘。第二次他正在晒山楂，我对他说，如果早些分地，他可能早就成了财主。他笑了，说啥呢，现在不是老了吗！不过，土里刨食终究靠不住，一个病人，就能把你拖累死。如今他盖了新房子，不住窑洞了，但是没有什么家具。我说：你不是木匠吗？他说，木头太贵了，我这木匠早就荒了。他笑了笑，说，凑乎吧，跟你们城里人没法比，就是落一个自由，穷自由。

来娃的故事

村里还有一个喜来，姓吴。为了区别张全喜的哥哥张喜来，大家喊吴喜来叫“来娃”。来娃大我三岁，属猪，是我村学历最高的人，读完了初中，他也应该是我村最有才的人。来娃长得很精神，大眼睛，双眼皮，鼻直口方，站直了也有一米八左右，可惜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就再没站直过。他就是我在本系列（一）中提到的喜发的二哥。

本来吴家这一辈，家谱规定中间的字是个“玉”字，老大就叫“玉生”，轮到来娃叫玉来，可是稀里糊涂竟叫成了喜来。据说，来娃生下来特别好看，他妈特别喜欢，就叫成了喜来，但人再穷，家谱是不能乱的，所以，上学时还叫玉来。后来他患病，妈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本来家里就穷，这一来，娃这一辈更完了。村里没有哪个娃读过初中，但来娃妈非让他读初中，说，娃惜嚯（方言：可怜），叫娃多读两年书，少干些活路。花点钱心安些，妈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来娃总是留着一个分头，见人很有礼貌，笑得很得体，虽然跛，却给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感觉。他口才很好，说点什么很有条理，而且滔滔不绝。来娃会拉板胡，还会唱曲。友存结婚时，他自拉自唱。板胡拉得有滋有味，他摇头晃脑，如醉如痴；唱的时候慷慨激昂，特有激情。村里人又是鼓掌，又是喊叫；我听不懂，觉得不是很好听。但板胡听着还不错。

听说，来娃参加过县里的残疾人曲艺队，曾经跟着他们在各个公社各个村演出，混碗饭吃。不久他不干了，说剩不下钱，翻山越岭的，有点吃不消。来娃和知青比较密切，他比我们学历还高，因为我们初中没有毕业。村里人一般人不会下象棋，因为认不全那几个字。来娃下象棋，居然下得还不错，敢跟知青俩干，偶尔还能赢。老实说，我们队六个男知青，没一个长过来娃。虽然我们自己未来是什么命运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来娃肯定要打一辈子光棍，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论证了。老天真是不公平-----我们都这么认为。

凭良心说，不管谁当队长对来娃还是很照顾的，当然工分不高，8分5，跟妇女队长一样，比较公平。他本来也是经常跟着妇女干的，外号叫妇女二队长。哥哥经常要出去搞副业，或者去石膏窑挖石膏，或者上煤矿挖煤，或者下山到盐池担硝，总之是凭气力换些钱回来。来娃的嫂子是从山里嫁过来的，年轻，还没有孩子。一天到晚也跟着

大家干活儿，穿得花枝招展，爱说爱笑爱热闹。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几个妇女只要有来娃领着干活，就拿他说笑，结过婚的女人在一块啥话都敢胡球说，来娃有时也顺势骂俏，占点小便宜，不过动真格的还没有，毕竟腿脚不利索。来娃哥哥常不在家，嫂子是女流之辈，有些事免不了让来娃帮忙。当然来娃是有求必应，自己嫂子的事不就是自己的事嘛？久而久之，那杆妇女就拿这叔嫂说笑，越说越不象话。不过这在农村是常有的事。

后来越说越玄，或是来娃半夜钻嫂子窑里去了，或是嫂子钻来娃窑里去了。甚至连来娃妈都听到了风言风语。此时的来娃妈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她什么也不说，她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哥哥回来当然是听不到这些了，没有哪个人无聊到这份儿上。

事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到我离开，什么都没有发生。来娃果然打了一辈子光棍。

我08年十月回村，见到了来娃嫂子，70多岁的人，穿戴还是很干净，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叽叽喳喳，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地说起来没完，真是秉性难移。

后来我找到来娃，印象中的小分头变成了短短的平头，灰头土脸，61岁，不显老。虽然不显老，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活泼，木讷得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住在别人家里，给人家看家。那人在外面做生意，估计是要给他一点报酬的。屋里满地都是玉米，大概是刚刚剥完皮，正准备晾晒。他让我坐，我看看没有坐的地方，就谢绝了。

过去我俩之间的接触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见了他有点激动，我以为他也会激动。可是没有，我们握了握手，他很快就松开了，脸上的表情比我想象的要平静的多。望着那熟悉的面孔，我想起那时候村里的流言蜚语，此时竟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也许那事真的有过吧？我真的希望它确实曾经发生过。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往事回忆（二）

随年的故事

村西头给知青下了一个院，打了六孔窑洞。但是窑洞打成后是不能住人的，有的要放三年，坐北朝南向阳的，最起码也要放上一年，因为太潮湿。为了让知青早日住上新窑洞，队里决定让饲养员都集中在这里。牲口热量大，暖上一年半载，兴许就能住人了。随年老汉就在西头第一孔窑。随年老汉多大年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我们喊他“大爷”。他喂牲口，六条牛加一匹骡子。村里二十多条牛，只有两匹骡子，他喂着一匹，可见村里很信任他。

说老实话，文化大革命对于中条山的一个小山村来说影响不大，虽然喇叭里一天到晚喊着斗来斗去，但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当真，他们沉默地活着，每天把日头从东扛到西，晚上蹲在黑乎乎的窑洞里，守着那豆粒大的煤油灯光吸溜吸溜地，喝上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中老年人不吃晚饭，他们说吃了不舒服，而且早上起来还饿；而晚饭不吃，早上肚子却是鼓胀鼓胀的，没有饿意。这是个什么道理，我至今没有搞清楚。

随年老汉不爱说话，就是迎头碰上我们，也装做没看见，自顾自走自己的路。你要是喊他，他看都不看你，就“啊”一声，再没了下文，继续走他的路。

那几年学大寨，一年一个新道道。秋后一天，公社下来通知，让我们大队的四个自然村，七个生产队每个队派一个饲养员，代表生产队到大队赛牛。以往赛牛，是几个评委评比，类似于现在的歌手大赛。这次不同，牛要上秤称，以体重为依据，比评委评分科学，防止作弊。比赛前三名有奖，第一名奖励二百斤苞谷，很诱人。随年老汉的牛大，队里决定让他去，不过谁去估计也得不了奖，比起别的队，我们队不占先。

村西头路南有个水坑，很大，锅底状。村子东高西低，每逢夏秋下雨时，东边流来的水全部流进水坑，形成一个水池，村里人叫“坡池”。池里的水黄黄的，羊屎蛋蛋飘一层，不能饮用。但妇女们在里面洗衣服和被子，也有些孩子在天热的时候，跳下去游“狗刨”。犁地的老汉收工时，干了一晌活的牛们总是下坡池美美地喝上一顿。这已经成了习惯。

秋后正是坡池水多的时候。因为赛牛，队长吩咐随年老汉，牛不出工了，净等着后晌去比赛。在家里多吃点，肚子里东西多总能增加点分量。吃罢晌午饭，随年老汉吆喝着牛，向大队走去。

走到坡池边，六条牛条件反射，呼啦啦下了水，闷头喝起来，随年老汉吆喝半天，不管用，只得任它们喝。喝得滚瓜溜圆，来到大队。牛差不多到齐了，有些称完了已经回去，还有许多看热闹的社员。那时没什么娱乐，大队有点事，看的人特别多。

轮到随年老汉，牛被吆到一块大木板上，开始过磅。没想到随年老汉的牛最重，称了五条，平均分量都暂居第一。因为比别人的牛重许多，估计随年老汉把二百斤苞谷挣到手了。最后一条牛比较犟，死活不肯上那块木板。随年老汉就拉着绳子喊：“喔，喔，”他拉，牛就往后坐。一个娃从后面给了牛一鞭子，拉锯式的进退了几次，忽然牛猛地站住了，哗啦啦，尿像瀑布一样流下来，顿时地就湿了一大片，周围的人就笑着往后躲。随年老汉和在场的干部都愣了，紧接着，称过的那五条牛像受了传染，也都哗哗地尿起来。大队部门前尿流成了河。

自然，随年老汉的成绩宣布无效，冠军还是让别的队拿走了。队长什么也没说，他知道这冠军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谁知随年老汉却认了真，很长时间竟然不出门。后来，听说赛牛取消了，他才出门。打这以后，谁要是喊他，他干脆装没听见，连“啊”一声都省了。

去年我回村，和巷娃一起看我们共同住过的窑洞，路过那坡池——不过里面已经没有水了——我想起随年老汉，随口问了一句，“随年还在不在？”巷娃说，“早不在了，死了大概有十多年了”。我说，“坡池没水了，牛也没喝的了。”他笑了。一会儿，又说：“你说，这年头掺水的事还少么？”

绒草的故事

前村的绒草大婶是烈属，一个儿子在太原上班，家里就她自己。儿子接她去太原，她去了一次，嫌乱，待了三天就跑回来了。她男人小麦1951年当兵走再没有回来，后来县民政局送来一块“光荣烈属”的匾和一些抚恤金，她才知道娃他爸死在朝鲜战场上。

绒草大婶没改嫁，多少人提亲都被她推了。就这样一熬十几年，娃后来也继承他爸的遗志，当兵去了雁北，复员后组织上照顾烈属，在太原给安排了工作。

绒草大婶还是坚持参加劳动，她也不指望挣那两个不值钱的工分，主要是跟婆娘们在一起热闹，日子过得快。因为是烈属，绒草大婶没受挣，即使在大饥荒，吃食堂的年月，别人挨饿，她娘俩也没受委屈。县民政局年年都要慰问，多少都有表示。村里人说，小麦一条命换绒草一辈子不愁吃喝，值！

绒草生性善良，说话总是细声细气。有一次知青的馍馍让猫叼了，两个知青追着打猫。绒草看见，就拦住了，非常认真地，低声说：“可不敢打，那是×主席！”两个知青笑得坐在地上。她没上过学，分不出毛和猫有什么区别，但眼睛里分明闪耀着真诚善良的光芒。

大概是1991年秋，一天，前村来了几辆小汽车，径直奔绒草家的崖上。有一个很富态的男人，穿着很高档的西服在几个干部的陪同下，走到绒草家门前。那男人在“光荣烈属”的牌子前看了一会，露出一丝苦笑。这男人就是绒草的男人——小麦。

小麦在朝鲜战场上没死，而是被俘了。阴差阳错地被说成了阵亡，上报为烈士。当了战俘之后，他被遣送到台湾。后来，经商发了财。在台湾，他无时不刻地梦想回到中条山，回到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但是那时不要说打电话，连封信都发不出来。他看到回来无望，便娶妻生子，建立了新的家庭。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有了转机。蒋经国先生首开台湾老兵返大陆省亲之先河，大批台胞闻风而动，赴大陆寻找，探望久别的亲人。小麦算晚的，就是因为他的战俘身份的问题，他不知道回来会不会把他抓起来。很幸运，上头好像有个精神，凡是回大陆探亲的台胞一律热烈欢迎，历史问题一概不究。

小麦回来了，绒草六十多岁了，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亲人相拥在了一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台湾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两女一男，都围绕着绒草寒暄不止，一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的儿子闻讯后，第二天也从太原赶回家中。

小麦感谢乡亲们多年来对绒草的关心照顾，在村里大摆宴席，凡是能动弹的都赶来赴宴，大鱼大肉卯足劲吃，酒卯足劲喝，一醉方休。有人说，摆了四十多桌，历来村里没有谁家结婚有这么排场。还有人说：小麦给绒草和儿子留下很大一笔钱，说是美国的人民币，可以拿到美国花的，还给了绒草很多金首饰，说那套在脖子上的金链子有小拇指那么粗，可值钱呢！

县里的干部对小麦也是毕恭毕敬，待若上宾。他们和小麦商量，希望他能回来投资，造福家乡，小麦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小麦为投资的事还专程回来过一趟，是一个人回来的。但是投资的事还没有落实，就传来噩耗，1993年底，小麦因肺癌死于香港。

绒草恢复了以往那种啥都不想，平平淡淡，无忧无虑的日子。只是门前那“光荣烈属”的牌子摘去了。村里给她换了一块牌，上面写着：“台胞”。

这个故事还是要声明一下：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二掌柜的故事

小队会计行二，官称“二掌柜”。和队长、全喜他们差不多大，是一伙人。他是我村里真正的知识分子，打一手好算盘。听说他初中毕业后就在县政府工作，搞统计。这人较真，爱抬杠，大小事非要争出个我高你低来。59年质疑亩产十多万斤，在会议上和领导寸步不让，结果打了个右倾，开除公职，卷铺盖回家。

也有不少人劝他，说：管他十万斤百万斤，关你个毬事？把个恁好的差事丢了，忒不值估。可他不听，反过来说劝他的人心口不一，对党不诚实。那些人本来无恶意，一见他较真，只好回避。

他似乎对回农村无所谓，他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村人，农活又不是没干过，回去干活照样是把好手。所以让他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他很有点大义凛然。村里人说他“毒气大”，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还是“度气大”？反正就是“有股子狠劲”那个意思。他也确实能干，基本农活没有落在什么人后头，连全喜都服气他。

其实他身体并不是很好。一次，不知害了什么病，好长时间猫在家里不出来。偶然一次看见他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一脸的菜色，憔悴极了。本来秋高气爽，暑意未退，他却穿着一件棉袄，两只手还吞在袖里。

知青插队后，开始是他老婆给我们做饭，所以有时他也来坐坐。毕竟都是念过书的人，沟通比较容易些。但他也经常跟我们抬杠，而且他必须赢，否则他追着你辩论。比如“究竟是盐香还是油香？”我们坚持油香，我们一年分一斤半油，对油的渴望与对肉的渴望并列第一。但他很执着地认为盐是最香的，没有盐就没有咸味，没有咸味就没有了味道。他认为这很哲学。

二掌柜对我们并不是非常友好，比如，评工分。他10分工，他就拿他和我们比。他认为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开会时，力主给我们低工分。尤其像我，体力很弱，虽然后来锻炼得一般农活都可以和其他社员差不多，但割麦子不行，我才定了个7分8，比妇女队长还低0.7分，听说就是他的提议。由于我从来不过问这些，所以也没有人给我涨，第三年我才和妇女队长平齐，给了个8分5。10分工才三毛钱，我还打个八五折。

二掌柜还有两个绝活，会做酱油，还懂修路架桥。我们村每年秋后要做两锅酱油，除了社员分一些外，其余的公社供销社全拉走，一直卖到县城。这也算是我村的副业吧，当然队里也不会委屈二掌柜，我经常看见他掏出纸烟来抽，虽说不是特别好的牌子。

至于修路架桥就更牛了，每年汛期之前，途径我县的209国道上的“八政桥”就要进行一次大修，这时，县交通局就来通知请二掌柜。此时，二掌柜就整理行装，专门等晌午社员刚吃罢饭，即将出工之前，在村里招摇一番。恰好他家在村东头，从村西头去公社，每走一步都不糟蹋，都能碰到村里人，他向乡亲们频频招手示意，微笑着，得意洋洋的样子。1971年209国道铺油，有的路段需要重新规划，二掌柜居然是副总指挥，而那正指挥是交通局

长。显然就是二掌柜指挥了。

然而，就这么一个能人，县里始终是用时就招来，不用了就踢回去，没有一个人说，给他落实一下政策，恢复他的公职。没有。我后来在县城遇到县政府的人就打听他，恰好原来的教育局长跟他一起工作过。对他的评价是：人是个能人，可以说什么工作都认真去做，一丝不苟，漂漂亮亮地完成。就是嘴不好，口冷，骄傲，目无领导，说话领导不爱听。爱提意见，那意见一般还都提得很对。可是，哪个领导愿意身边放一个爱提意见的人？

我说，他走了，不影响工作吗？局长说，唉，工作啥影响不影响？干是那样，不干，也是那样。你汇报时多说好就是了，多拣领导爱听的说，没影响。

2004年我回村也见到了二掌柜，他正挑着一担“稀茅”（掺水的人粪便）往自己的地里送，居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的，根本想象不出是70岁的人！过了一会，他从地里回来，我去了他家，见到了给我们做饭的大队妇女主任——他的老伴。

闲谈中，二掌柜拿出一沓黑乎乎的纸，神秘兮兮地说，你看我这里有好东西，是去年翻腾出来的。我拿过来一看，是油印的1969年我们小队的分红报表。我掏出老花镜，在密密麻麻的人名中找我的名字，一看，哈哈，狗日的，我刚去时，给我的分不是7分8，是7分3！我一皱眉头，对他说，二掌柜，你们太不够意思了，6个男知青，怎么我分最低？谁知，他竟然说，你干活最不发肆，你想要多少？我笑了。接着，他也笑了。

瞧，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他还是那个样子。

大海的故事

我村有个大力士，叫赵大海。和二掌柜是 본家，年龄相仿。我村东边是大山，南边是黄河，北边是盐池，距大海至少有一千公里，而我村的人坐过火车的只有一两个，最远到过太原，我保证我们村的人百分百没有见过大海。我很奇怪，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我问过赵大海，他傻呵呵地笑，什么也不说。

记得我们在公社开完欢迎知青大会，就是赵大海驾驶一辆大胶皮车拉我们回村的。那是元月二号，天气特别冷，中条山刚刚下过雪，东方远远地有一座大山，连绵起伏，高低不平，白雪皑皑，煞是好看。我们知青中叫建国的是个话痨，一个劲地问，“大叔，还有多远？”“到了没有？”那大海穿着一件很大的羊皮袄，鞭子甩得山响，憨笑着，“啊”，“啊”地应付他，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建国在说什么。

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大海是几年前从山里迁下来的，身体强壮，二百斤的口袋自己搬起来就走，进山打柴总是小二百斤，是全村最有力气的人。因为是外来户，见人就笑，很少说话。当初来的时候，队长稀罕他虎背熊腰

的身子，一把好力气，二话没说，就同意迁户口。

大海现在住的是别人家的弃窑，他自己打的窑洞在村边沟旁，还没有正式启用。那新窑一共两孔，据说是大海自己一个人用了三年时间打成的，而这三年他每年最少出工三百天。也就是说，他用的几乎完全是业余时间。从下院到两孔窑打成，所有的土，填沟垫院，至少有一千方，全靠一辆小推车和一条扁担两个厝（河北叫筐）——他的厝好像是特制的，特别大。别人家的厝一担土八十斤，他的厝一担土得有一百六十斤。你看厉害不厉害？

1970年，我脚上长了一个鸡眼，就是两个知青按住我，请他拿刀子剝掉的，出手利索，眼睛眨都不眨。被我誉为“最心狠手毒的贫下中农”。不过，那鸡眼再没有长出来。

他媳妇叫“中看”，长得也算还行，只是名字起的有些不谦虚，而且过于直白。我只见过她几次，大海从来不让她劳动，他随便干点啥都能养活她；也不让她出门，好像生怕让别人看了去。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孩。大海很疼爱他的媳妇和女儿，张店一年四个“会”，每个会都必须带她们去。中看穿得花枝招展，孩子也是一身新衣服，骑在大海的脖子上，一家三口逛会，一趔一趔的，兴致勃勃。在会上，全家人总要吃两碗“羊肉泡馍”，扯上一块花布什么的。

大海每年要到山下盐池担上一个月的硝，是计件的活路，非常苦累，但很挣钱，人家说大海一趟回来能挣二百多块。每当他去担硝的时候，中看就把大门一锁，很自觉地把自已关起来，绝不出门，直到大海带着钞票回来。两口子恩爱得很苛刻。

前队有几个知青原来在天津上学时练过摔跤。有个叫金洪亮的，是他们里最棒的。金洪亮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也不胖，看上去很普通。得知大海是大力士，金洪亮没事就找大海，大海一看这学生娃比自己矮将近一个脑袋，哪里把他看在眼里？

一天，两人商量好在场上比一回。聚了一大帮社员，中看也抱着孩子在一边看。若是平时，那大海早把中看赶回家里去，这一次大概想让中看高兴，就没有吭气。两个人打个抱拳，很像那么回事，然后就纠缠在一起。大海块头大，力气大，那金洪亮个子小，就像个老鹰抓小鸡。终于，金洪亮被抓住了，大海就抓着他转，想把他摔着地上，但是金洪亮也抓着他，甩不掉。转了几圈，大海只得把金洪亮放下来。谁知，就在放下的一刹那，金洪亮一伸腿，使了个巧劲，把个人高马大的赵大海放倒在地。

“这狗日的，会武功……”大海嘟囔着，拍拍身上的土，爬起来，赶忙拉着中看回家了。社员们一阵哄笑。从那起，大海不参加类似活动，金洪亮他们再勾搭他，他也不上当。“这杆学生娃会武功，狗日的……”他老是叨唠着这句话，好像明白了：光有力气，不中！

2008年我回村见他了，样子没怎么变，感觉矮小了许多，还是憨憨地笑。我问他，我是谁，他摇头说，“想不

起。”我说，“你怎么变小了？”他说，“老了么。七十岁了。”我说，“你还记得摔跤么？”他看了看我，竟然说：“哦，你是金洪亮？”一句话让我笑弯了腰。这家伙，接受了知青的一次再教育，竟然刻骨铭心，四十年了还记着。我说：“不是，我是XX。”他又笑了：“啊，你不是金洪亮啊，那狗日的，会武功……”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往事回忆（三）

（八）玉成的故事

知青到农村，最高兴的是中小学生。村里有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火车。知青的到来无疑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而正处在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们就是一个扒着窗口觊觎渴望的群体。

有三四个学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讲，讲什么都行，讲什么都爱听。一到麦收，我的付出就得到回报。我村地处山脚下，最大的一块地四十亩，其余都在二十亩以下，最小块的只有几分。大部分是坡地，也是一层层的梯田，只不过坡度比较缓，就没有像龙脊梯田那样壮观。每到麦子熟了，一层层麦浪翻滚，金光闪闪，也有点诗情画意。

按说这样的地割麦子是不算累的，因为还没来得及腰疼，就已经到头了。就这样我也不中，开始割还行，割着就被别人甩在后面，越着急越赶不上，有时弄不好还割了手。一般就在这个时候，几个学生就赶到了，他们割到地头，返回来接我，你一把，他一把，三下五除二，就割完了。老实说，有这些学生，我少受了许多苦。

学生里和我最好的是玉成。他不仅在劳动上是我的坚强后盾，而且在生活中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曾经拿家里的鸡蛋煮给我吃；那时我学会了吸烟，又没有钱买，他就拿他爸的烟叶装满一个小布口袋给我拿来，抽完了，再装；还有一次，我腹泻，他把我带到他家，让他妈妈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伴了许多大蒜和熟油，他们自己是从来不舍得这样吃的。

一天，玉成给我拿来几串像葡萄一样的紫褐色小果子让我吃，我一尝，有点甜，有点酸，有点麻，还有点辣，他说这就是五味子。是一种药材，可以补肾安神。我问他从哪里得到的，他说在山里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野果，山杏，土梨，野葡萄，八月炸……他说找机会带我进山，他家有亲戚在山里。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我1971年9月离开村子到县城工作，虽说只有50里地，但是不自由了，只回去了一次看他们，心里一直很歉疚。1973年，我到了电影放映队，借放电影之机回去呆了一天，但是没见到玉成，听说他当了队长，去公社办事

了。后来，因为我一直下乡到处去放电影，也失去很多见面的机会。

1975年，我调到文化馆。冬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玉成来了。他已经是大队支部委员了。他跟我说：他当队长以后，做了几个大动作：1、扔了百十亩烂地，社员谁愿意要谁要，种了收了归自己；2、让二掌柜当酱油厂厂长，专门做酱油卖，3、有些活儿包工分包时间，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节约时间归自己。按说这在当时都是犯忌的事，我说，你这样干，公社大队让吗？他说，我没告诉他们，但是我今年麦子分了二百三十斤，预计分红能达到四毛五六，这次开会，我是模范队长，全县表彰。他脸上不无得意，我也为他高兴。他来还给我带来一桶酱油和一麻袋土豆。

大概是79年，玉成到县城看病来了，住在我那里十几天。我问他什么病，他说不清楚。就是睡不着觉，脑袋疼。我问他怎么搞的，他也不说。我看了看医生给他开的药，有“安定”，“谷维素”“维生素B1”等药片，我说管事不？不行看看中医，调理一下。那时县医院有个北医大毕业的何医生，跟我们很熟，就找她看了一下。何医生说，没大事，操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后来我看何医生开的药里，就有“五味子”。我说，这是让你安神呢，队里的事不行就别管了。他说我已经辞了，今年分红掉下来了，一个工合四毛一。我说可以啊，不少了。他说，我定的是五毛，没达到，有一千人弄我呢。我说，你听我话，不干是对的，管他四毛五毛，挣来钱大伙分，挣不来，你自己挨骂。何苦呢！

他走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何医生跟我说，他有些抑郁症和精神官能症，可能受了什么刺激。我调回河北之前，碰上大队书记来县城，我向他了解玉成的情况。书记说：这娃太刚。农村的事像个臭皮囊，不能认真，就是你来我往地对付。他搞那一套我都知道，我不管他，有人嫉妒，也有人受不了，就弄他。娃又实心眼，想不开，现在送洛阳看病去了。我说，我马上就调走了，你告诉我洛阳什么医院？书记摆摆手，说，“你不去了，”他压低了声音，“神经病院。”

2004年，我回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一打听他不在我村里住了，迁到后村二队了。我见了他，他认不出我了，也许我太沧桑了。我告诉他以后，他拉住我的手，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东家西家的转。他说，从洛阳回来之后，他就迁到这里，大队推选他当了副支书，没球事，是个闲差，他也不操心。现在种些果树，烟叶，胡球弄着些，也可以。

我想玉成这人也太实在了，别人当队长，即使捞不着什么好处，起码落一个轻闲自在不干活，可他却……。我说，记得咱们当年还要进山去弄五味子吗？他笑了。叹了一口气，老了，别说你，我都很多年没有进山了。不过，五味子可没少吃，哪副药里都有。

唉，五味子，五味子，人生就是五味子，酸甜苦辣咸要体验一辈子。

（九）玉玺的故事

1970年春，因为队长不借巷锁家粮食，我跟队长干了一场，虽然后来算是赢了，心里也很烦闷，就经常不去上工，猫在窑洞里画画。这个时候，认识了玉玺。玉玺是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在我县的曹河钢铁厂。那年夏天，他到我公社招工，从公社秘书那里知道了我，就找上门来。

我这人是很不懂接人待物的，现在想来，就是不太懂事。那时，我正在画一张李铁梅的剧照，“仇恨入心要发芽”那张。玉玺进门的时候，我知道进来人了，但是既没有招呼人家，也没有给人家让座，连看都没看，还在不停地画。玉玺见我沒有停下来，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

过了一会儿，我画够了，一回头，才发现不认识。这个人文文静静，长得很秀气，个子不高，脸色白里透红，像个姑娘。我很歉意的请他坐。他做了自我介绍和来意，吓了我一跳。原来是大救星来了！那时，我真是在村里干够了，甚至在公社，看见拖拉机站里满身油污的工人我都羡慕不已，心想：我要是能在这里上班该多好啊！常常站在那大门口发上半天呆。

我俩就很快聊起来，他就是玉玺，一个很高贵的名字。不过人极为和善，说话和风细雨，真的像个姑娘。记得我俩就那张画聊起了样板戏，我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他喜欢旦角，唱了一段“爹爹留下无价宝”。唱完了又唱别的，足足过了一把戏瘾，非常高兴的一个下午，正事没说。

第二天，他又来了，说，你跟我走吧，到钢铁厂当工人去。真的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他非常肯定，这事我就说了算。我喜不自禁，天啊，我终于离开这个穷山沟啦！他说，你现在跟我去公社，我要看一下你的档案。我俩就一路春风跑到公社，找到梁秘书取出我的档案。

那年月，档案这东西，领导可以看，招工的可以看，你自己不能看。我就老老实实躲在一边，看着玉玺撕开那牛皮纸袋的封口，从里面掏出几张表。谁知，玉玺拿着一张纸，看着看着，眉头就皱起来了。一会儿，他把几张表装回去，交给梁秘书，拉着我来到院里。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玉玺脸色很难看，沉重地说，你去不成了。我说，怎么了？“你档案里有一个海外关系，政审是通不过的。”我一下子懵了，仿佛从天上突然掉进深渊，那时的脸色有多难看是可以想象的。

好一阵脑子空白。我极力回忆着那东西是怎样进来我的档案，我想不出来。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叔叔在台湾，但是我没见过他，也不会在任何表格里填写，我还没有傻到这种地步——尽管我自认为对党和毛主席很忠诚。我俩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阵，他说，回吧，好在这事谁也不知道，你们大队，小队都不知道，你回去就像往常一样，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以后再找机会。见我沒有说话，他又说，你跟我回家玩几天吧，我家在黄河边，可美了。我木然地点了点头。他家在县西边长乐公社，我跟他坐车到了县城，买了一些糕点，又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还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他家。

他家真的很美，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村人，爸爸是生产队长，他有个弟弟，和我同年生的，比我大几个月。我还见到他的未婚妻，在公社当妇联主任。他们全家都对我十分热情。他家院子里有许多花草，还有很大一个竹子搭的架子，上面缠绕着很多藤藤蔓蔓，长长的结了许多瓜，还有豆角。他领着我在村里转，村子里很多房子，很多树，枝繁叶茂的，还有许多竹林，感觉很像江南。往南走不多远就是黄河，因为是库区，这里的水不黄，而是清亮清亮的，水面很大，碧波荡漾。玉玺指着对面的黄土坡，说，那里就是三门峡，我们这里是渡口，有摆渡可以过河的。站在宽阔的黄河边上，望着远方的水天一色，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我在玉玺家住了五天，最后我从他们村的渡口去了三门峡，在三门峡玩了一圈又从茅津渡口过河经县城回到生产队。从那以后，我和玉玺就一直通信，后来，他每个月给我寄五块钱，说是买邮票信纸信封的，一共寄了四个月，来信说，他马上要结婚，不再给我寄钱了。遗憾的是，他家太远了，我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1971年9月，我到县农机厂上班，他也从钢铁厂调到工业局，后又去了化肥厂。那时我们就经常见面了，我要还他钱，他坚决不要，他说我是给你的，不是借。1981年，我调回河北，他专程送我到运城。我到河北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化肥厂的效益不太好，他准备停薪留职搞长途贩运去。从那再没了消息。

2004年春节后，我回县里看他，他已经退休回了长乐老家。因为是冬天，当我开车到了他村里时，感觉很是冷清，树叶已经落光，枝条光秃秃的，天气阴沉，村里见不到人。我好不容易问到他家，我在路口锁车，爱人去敲门。敲了半天，才出来胖胖的一个妇女，一会儿，搀出一个瘦瘦的人，只见他一个劲摆手，我爱人喊：“他说不认识你！”我远远看去，就是他，玉玺，我思念多年的朋友。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就是，就是……”

跑到门口，那妇女一眼便认出了我，“你就是那年到这里玩的知识青年吧？”我说，“是啊，我是从河北来专门看望玉玺的啊！”这妇女就是玉玺的老伴，我的大嫂，当年的妇联主任。玉玺痴痴地望着我，嘴角流着口水。我一惊，他是怎么了？大嫂说：“唉，他脑溢血，险些没死，现在好多了，还能动了。”

进了屋，我拉着玉玺的手，问，“你真的不认得我了？我是XX啊！”他看着我，好像在想。大嫂说，“你忘了那一年，你带着他到咱家来玩，他后来去了文化馆，你俩唱戏，唱样板戏，你不是老说吗？”忽然，他想起来了，一下子抱住我，趴在我身上：“哇，哇——”地放声大哭，我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万万没想到当年英姿勃发的玉玺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两个都没想到。

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点钱，他们坚决推辞。大嫂说，不缺钱，三个娃都上班，他还有退休金。我说留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离着远，下一回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见。

回到县城宾馆，见了县里的几个好朋友，当他们得知我去长乐看玉玺的时候，都责怪我，“你怎么不早说？早说，咱们一起去啊！”然后大家就说起玉玺。有人感叹：这个人啊……对人好，对人实在，乐于助人，没有一点点坏心眼，钱也赚了，但是没有染上一点坏毛病，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有人插嘴，别说嫖，谁见过他跟哪个妇女嬉皮笑脸过？谁见过她跟哪个妇女开过玩笑？没有，没有。又有人说起当年一起倒腾苹果，车过广东的时候，遭遇强买强卖，只有玉玺跟那些人讲理，因为这货都是订了合同的，不能卖给他们。但是其他所有人都屈服了，那些人不讲理，把玉玺打了……同去的四个人都很惭愧，因为他们中间玉玺是最文静，个子最小的……

记得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玉玺就是这样的人：是正人君子，也是大丈夫。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朋友感到幸运。祝他早日康复！

（十）裴老师的故事

我在乡下放电影时，认识了部关公社中学的裴老师。裴老师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子，很清瘦，待人十分和善。一般到了公社，放电影经常在学校操场，所以我们就吃住在学校，那里有教师食堂，有接待客房，比较干净，也比较方便。晚上，放完电影，还可以和老师聊聊天。

那天晚上，裴老师、我师傅和我三人聊天，裴老师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那是68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公社门口的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打倒X主席”，用白粉笔写的，大概写了五六条。这一下不得了，公社武装部立刻报告县里，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县公安局都来人，把个小小的公社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还有许多人看热闹。

记得，那是刚过春节不久，刚开学，我是班主任，正在收同学们的寒假作业。第二天中午，我刚打饭进办公室，饭还没吃，有人通知我，到校长办公室。我把饭放在办公桌上，来到校长办公的房间。一进门，看见有两个穿蓝衣服的民警在和校长说什么。校长见我进来，脸色很严肃，招手说，你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我走到校长的办公桌前，才看见桌子上有五张照片，就是拍的那反动标语。我定睛一看，天啊，那不是我写的字吗？五条标语都是我的板书笔体，惟妙惟肖，难辨真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当时我的脸色非常难看，非常尴尬，脑子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直到两个警察上来，把冰冷的手铐铐在我手腕上的时候，我才大叫了一声，“这不是我写的！你们搞错了！”

我害怕极了。我家里成分比较高。土改时定的上中农，谁知后来搞了一个“民主补课”，我家又补了一个富农。家里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我在学校里说话都不敢大声，文革时虽然没有被抄家，我老父亲也开了好几次会，站在前头挨训。本来我中师毕业后，因为成绩好，县中学要我的，就因为成分，被分到公社中学。而且我的工资应该一年后上调一级，也因为这，没有动。我连问都不敢问。

在县看守所，我冷静下来，仔细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一定是有人模仿了我的笔体！可那是谁呢？我没得罪任何人啊，甚至对每一个学生，我都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我这个样子，哪里有什么脾气啊！我想不起谁和我过不去。我哭了。我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谁这样害我啊！

但是，审问时，我坚决不承认。在任何笔录上我都不签字，我无罪，我是被陷害的，是有人在害我。可是，人家说，是省里的专家鉴定的啊，百分之百就是你的笔迹，你不承认不行啊。你说有人陷害你，你说是谁？谁和你有仇？——我却真的说不出来是谁。

很快就结案了，我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刻的阶级仇恨，妄想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的富农子弟。我欲哭无泪。学校里，老师校长学生，没有一个人相信那标语是我写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替我说一句话。

那时，写反动标语最重是要判死刑的，但是要省里批。县里就一层层往上报，我就在看守所里等，那日子难熬啊。生活上就不要说了，死硬的玉米面窝窝头，一顿饭两个，几片咸菜，稀粥几乎就是蒸锅水，那时拉的屎，一点臭味没有，一点粘性没有，干了，风一吹就飞了，地上都没有痕迹。

我始终没有承认，虽然没有拷打我，但是，推推搡搡，体罚，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你说怪不怪，真让我睡，我睡不着；审我熬我，逼我，我又晒得不行。唉，可是受挣了。但是不承认，也定罪，证据确凿啊，我又百口莫辩。

就在省里批下来的当天，看守就透给我了，说，裴老师，阴曹地府又多了一个冤死鬼。我知道，我死期到了，原来听戏唱《窦娥冤》，现在我成了窦娥。我跟审我的领导说过，你们判我死刑吧，我不想活了，但是我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们要给我平反。那时我结婚两年多，还有个女孩。妻子来看我几次，哭得像个泪人，可是束手无策，她家里也是富农成分。

我劝她也劝自己，黄泉路上屈死鬼多了。反正人总得死，不就是早死几天吗？想开了，我反而能睡着觉了。等了几夭，我都等急了，不知怎么竟没了消息。谁知过了半个多月，竟然把我放了，说是逮住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公安局领导跟我宣布这个决定时，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晕倒在地上，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县医院的病房里，打着吊针。媳妇和孩子守着我，还有学校里一个老师。他们跟我说，就在准备枪毙我的时候，在李家沟水库工地上又出现了反动标语，字迹跟我的一模一样。公安局一个领导决定暂时停止对我的行刑，抓紧时间破案。很快速住了写反标的人，原来是我的一个学生，叫杨幸福。

我极力回忆着杨幸福的样子，终于想起来了，前年毕业的，太普通的一个学生了。从来不说话，个子矮矮的，一说话就脸红。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他为什么要害我呢？我实在想不通。

开公审大会那天，我挤到舞台前，想仔细看看杨幸福。我看见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剃一个光头，特别瘦，他看见我，露出一丝笑容。他轻轻地说：“裴老师，对不起。”声音特别小，我没听见，我是根据口型推测出来的。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知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自己。

我们都没有说话，屋子里静悄悄的。裴老师停止了讲述，静静地看着地面，此时的空气仿佛凝结了。半天，我师傅说，那娃枪毙了？裴老师说：枪毙了。我说，多大？十八岁。我师傅掐着手指算，过了一会儿，对我说，跟你一般的。如果活着，今年二十四。

关于往事回忆的十个故事

从2004年到2008年，我连续四年回到我插队的地方，见了许多当年的朋友。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交谈，我发现，他们生存的环境虽然比四十年前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们仍然贫困，特别是，他们的思想，至今还被控制在一种无形的桎梏之下。

四十年，应该是一个从出生到成熟，从创业到成功，开始走向辉煌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人生的完整过程。但是这四十年的变化几乎让人感觉时光停滞，或者极其缓慢的移动，与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比，近乎一潭死水。甚至与我生活在的渤海湾的小城市相比，也有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

十个故事，除了“绒草的故事”是我听来的，其余九个都是我的亲历，而且有好几个人是我最近几年回去接触过的。他们的精神面貌依旧，思想变化不大，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

我和另外一个同样是富农成分，同样当过老师的马老师到裴老师家坐，谈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的荒唐，谈起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他们对我的言谈感到十分惊讶，马老师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而裴老师居然不敢说话，而且不时地向门外张望，似乎觉得在家里说话都没有安全感，可见当年的红色恐怖对他们的伤害之深，而这两位老师都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他们还很健康，但是七十岁的老人毕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蓦然回

首，你却发现，恐惧伴随了他们的一生，作为不得“乱说乱动”的后代，两位老人一生都没有做过一点对不住人的事，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大声说话过。难道他们就没有与生俱来的人的基本权利吗？

两位老师的后代都很争气，考上了很好的大学，现在混得都不错。这多少在精神上给了他们一点点补偿。当然，这一切都过去了，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希望历史不会重演，但它的前提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才能让我们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尊重，每个人都能大声地表达，每个人都不再恐惧，每个人都不再木然，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由衷的笑容……

《往事回忆》暂告一段落，但是，为了“不忘记”，为了“新环境”，我希望大家一起写下去。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插队故事(一)

下乡的路

知青的圈里话把知青分为散插、集装两类。其中散插又有跟单位走和投亲靠友或自己联系几种，集装有农场、建设兵团、军马场等。

我是名副其实的散插知青，是属于自己联系地方插队。

其实父亲、母亲单位可以集体插队，但父母考虑到自己当时正在受审查的状况，认为我如果跟单位走决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我联系了当时知青都害怕去的“甘、阿、凉”之一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由之一是那里的知青很少，以后抽调、读书的竞争小；理由之二是那里地理偏僻，民风质朴，相信老乡会善待纤弱瘦小的我。后来事实证明父母的这一决策非常正确。

就我自己而言，其实我并不害怕下乡，更不害怕散插。内心深处甚至还对插队有着一种渴望、一种希冀。从66年到74年，从一个孩子长成少女，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充满的是灰色记忆，那样的年月，我迫切的希望能走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希望能关掉身后的门开始新的生活。

我不愿多想等待我的将是什么，8年的独立生活让我对生活的艰难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只有一个信念：我长大了，我要远走，我想飞翔！

下乡的路上，一辆空空的大卡车，驾驶室里坐着母亲，敞棚车厢里是我、弟弟、邻居弟弟和一只很旧的棕色皮箱、一个铺盖卷。

我们的车在坑坑包包的泥石路上扬着土尘，穿过美丽的川西平原，沿着岷江驶进了大山之间的古溪沟。

没人欢送，也没人欢迎。

我们的车就这样带着我走进了生命的雨季。

在这之前，父亲专门请假亲自去踏看了一番，对这里老乡的质朴和两位比我高两届的散插女知青的热情很有好感，特地嘱咐我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弟弟和邻居弟弟是来看看为将来做预演的，两年后我弟弟也成了末班车知青。

母亲请假送我来陪我住了一星期，熟悉了四周和各位社队干部、与一些老乡联络感情，拜托他们照料我，这才满怀心事不得不离去。

奇怪的是，这里实际是个散插的知青点，院子里应该有4、5个知青，可是刚来这段就老没见那几个老知青，后来才知道，我来的时候也是知青抽调推荐的时候，他们中有希望的都在活动，没希望的干脆就到处玩去了，果然我来后3个月那两位女知青都走了。

这里最让我觉得惊喜的是居然有电灯！原来我们这里靠近岷江的最大的一个发电站，在省内最早实现全县电气化。

散插的知青都有同感，最大痛苦不是苦不是累，而是那种难以形容的孤独。那是看前景渺茫的孤独，那是渴望亲情渴望爱又不敢言亲不敢言爱的孤独，那是常常让人害怕、让人绝望的孤独。

这种孤独很快就让我感觉到了。

母亲是在我出去干活时走的。

晚上一身疲惫酸疼，走进空空小屋门的我，心里一片茫然。但很快便毅然提起一只空水桶到小溪提水，开始生火做饭。

在一阵浓烟之中，我的火燃了熄，熄了燃，泪水和着黑烟灰弄了一脸，但我的心开始飞扬，至少我离开那让我窒息的天空没有阳光的城市，一周的劳动虽然很苦，但在乡亲的眼里我不是一个黑帮狗崽子，而是一个有文化的城里学生。

灶堂里的火开始亮堂了，逐渐映红我苍白的小脸，孤独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这年，我18岁。

生火做饭

我的灶是赶着我来之前刚盘好的，泥还是湿的。一口大缸大得来藏个我完全没问题，一口大锅在人家老乡家是做一家人饭煮一圈猪食用的。

做饭做菜本身在我不是难事，从小独立生活，这些早都会了，不会做的学起来也很快，怕的就是烧火。

我母亲很理论的告诉我，火要膛中空，那是她自己下乡多次总结的经验。

但就这湿灶她自己也不太把握得好，她一走我自己简直是一塌糊涂。因为除了湿灶而外，这灶里还没有撑柴的炉条，要像搭篝火一样用柴禾自己把灶膛架空。

最初一段时间每天的烧火做饭都要费我很大劲，不是点不燃火就是好不容易成功的做了一个空心，炉火旺起来，突然呼啦一下全塌了，幸得有根吹火筒很有效地用于不断挽救灶火的过程之中。

最让我没面子的是，这天正烟熏得来眼泪鼻涕满脸花时，一位早我一年来的，不知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男知青突然敲门进来，笑嘻嘻地打量着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你是新来的知青？我万分狼狈的点点头，避开他的眼神说了声：你坐吧！立即一边低头继续烧我那倒霉的柴火一边不顾卫生地用衣袖擦我的眼泪和花脸。

这人居然笑嘻嘻的说：让我来帮你点燃。待我让开后他三下两下的就弄燃了。然后还有一句没一句的问这问那。我心里特别没好气，说：谢谢你了，我自己会了。

就站那做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不再说话，那人只好讪讪走了。

后来时间长了，那男知青也比较熟了，但直到他一年后招工走了，我们始终没成为很好的朋友，其原因可能是他后来向老乡形容新来的女知青是个丑女子有关，哈哈！

不过后来我烧火做饭是非常熟练，每晚用不了一小时连第二天早上中午的都做好。特别还学会了用玉米面做锅边馍馍，金裹银饭等，最拿手的是切土豆丝，那个快，那个细啊！

做活路

这是8月底，正是收玉米的时候。

开始一个月我在生产队干农活，连着出了几次洋相。

本来开始几天用锄头翻地，这是刚收完玉米的地。我干的真不错，几乎跟上了大家的趟，尽管每天回家连走路都东歪西倒，至少得到了一片赞扬声：“这小女子还老实嘛！做起活路腔都不开。”

老天，我气都喘不过来那还有力气开腔哟！

“这个小女子可以，做活路还做得！”

那当然，做不得也要做嘛！

没想到就真遇到做不得的活路。

这天下工队长说明天你带上背篋，跟秀华她们一起上山背玉米杆杆。

这里是山区，背篋是主要载物工具，学会背背篋是最必要的劳动。

第二天我背上空背篋迎着早上明媚的阳光高高兴兴的上了山，当比人高的玉米杆紧紧地塞在背篋里后，我的感觉是完了！

先看这些女老乡，个个长得是矮矮墩墩的，身长腿短，那高高的玉米杆背上背，比例重心很合适，人家爬坡下山的路走得是稳稳当当，噔噔地一路小跑。

再看我吧，长得来瘦瘦长长，长腿高腰鸡脚杆，背上那远远高过头顶玉米杆杆，重心都在腰上边。我在老乡的帮助下，颤颤巍巍直起身来，咬紧牙关，心里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摇摇晃晃望山下走，没走几步重心一偏就仰面倒在坡上。哈哈哈哈！周围一片笑声。

再咬牙，再在老乡的帮助下站起来，继续摇摇晃晃迈步，继续在心里喊着“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了吸取刚才仰面倒地的教训，我努力弯腿弯腰，身体前倾。这次更惨，一个倒栽，我尽力支撑住自己，你猜怎么了？我两腿撑地，弯腰，头朝下，玉米杆子撑着另一头，整个倒U字造型不能动弹。

哈哈哈哈……后边在地里装玉米杆的老乡笑翻了。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解救出来，我是满脸通红，眼泪在眼睛里打着圈，几乎就要哭出来。大家说：算了，算了，你就在这里帮忙装吧，别背了。第二天我便被派到场坝和一堆老弱病残一起，抹（ma）玉米粒去了。

还有一个做不好的活路就是担粪。倒不是担不动，而是起不来。

因为这里担粪走陡削山路，必须把桶担得很高，以免前边（上山）或后边（下山）的桶触地。结果是我首先必须低低地蹲地上钻到扁担下，但这样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把满满的粪担子撑起来，所以每次都要有人帮我抬着我才能站起来。起来后我倒是可以担着走了，因为重心太高，自己总是桩子不稳，弄不小心就晃荡得一身是大粪。这时我最抱怨的是自己干吗长这么高啊？又浪费布，又没用，还不省力，最希望的是自己也长个矮矮墩墩的多好啊！

一个月以后，队长说：经大队领导研究决定你还是到改土队去干活，那里年轻人多活路也单纯些，你容易习惯点。

这样我被照顾到了改土队。

战地新歌。一声对不起

刚到改土队时那天，看到的都是好奇的眼光。

这里主要是全大队抽来的强劳力。当时正在是修河堤，是向河滩要良田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伟大事业。

象我这样瘦弱的女子，这里根本见不到。所以我一去就被分配和两个半大小子和一个半大丫头一起刨碎石，用来填缝用；刨活土，就是长草的石头缝里的土，用来改河滩造地时铺地用。这里强劳力是每天10个工分，我给评了个7分半。凭着我的咬牙苦干，一年后离开改土队时我的工分已经达到9分半！那是后话。

改土队40多人，大都是20上下的小伙子和小女子，因为年轻，又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所以大家都特别爱开玩笑，休息时更是打打闹闹。

我刚去，又腼腆，大家和我比较生疏。没想到开始让我和他们熟悉起来的竟然是我回家买来的两集《战地新歌》。这里的人从小就隔着山喊话，天生一副好嗓子，可是唱歌好的不多，跑调，但都爱唱。我们改土队恰恰就集中了几个大队唱得最好的小伙子，自从有一天我把《战地新歌》带到工地，大家就在每天休息的时候唱了起来，我的五音不全混在里边也滥竽充数了。歌声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后来在此基础上大队还成立了以改土队员为主的文艺宣传队，我和改土队的哥们姐们在歌声中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改土队都是年轻人，脾气都不小，平常打打闹闹开开心心不说，真的吵架打架也是家常便饭。

在改土队发生的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

在改土时，因为没有什么安全教育、安全措施，磕磕碰碰的事常常发生，每个人手上腿上常有伤口。有个脾气很暴躁的小伙子叫阿武的就常因为这些磕磕碰碰而跟人吵架打架，大家都惧他几分。

我有个毛病就是干活时有些毛手毛脚，有一次没注意就恰好把一个装土的撮箕扔在阿武的脚上，撮箕口的蔑片正插上了他脚上一个伤口，他立即疼得大声嚎叫！随即做出一副要找人拼命的样子大声喊：哪个丢哩？哪个丢哩？

我吓坏了不由自主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阿武！对不起！阿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奇怪的是阿武居然不说话了，看了我一眼，涨红脸埋头干起活来。周围的人都楞了一下，突然几个小女子大声笑起来开始取笑阿武：阿武怕知青女子！阿武怕知青女子！

小伙子们也笑了；阿武今天咋个老实了啊？往次哪个惹了你都要毛了！

女子们又叫：我们惹你你就毛，知青惹到你你咋腔都不开啊？

笑声中，阿武突然抬头脸红筋涨的大声说：人家给我说了对不起！

一时间大家无言，都老实干活去了。

我却感到一种震撼：人家给我说了对不起！

就这一声对不起，暴躁的阿武居然就能平静下来，不对我“毛”！就这一声对不起大家都老实无言。

这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文明语言，就让阿武感受到了被尊重和懂得了应该给人以尊重。

后来阿武成了我的铁哥们里的一个，处处照顾我，就因为他第一次从我口中听到了一声：阿武，对不起！

——古溪沟记事

—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插队故事(二)

比鬼还胆大

刚下乡时，让人害怕的东西真的很多。

首先是跳蚤，不知那来那样多的跳蚤，我在乡下时一年四季全身上下就没有过一块好肉，布满大大小小的红疙瘩，抓得伤痕累累。夜里痒得不行就擦酒精，这一下又火辣辣地疼，不过比痒还是好过些。当时自己看了都害怕，因为我皮肤一向很好，连青春豆也没长过。还好，回城后都好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尽管有些伤痕或许是刻在了心里。

再有就是蜜蜂，到开菜花的季节，我们的院子就成了赶花人的养蜂场。一不小心就会被蜂扎，让我紧张得要命。那天一下被蜂蛰了，一边脸立即肿得老高，一位大嫂二话没说撩起衣衫，捏着乳房把奶喷了我一脸，本来痛得烫呼呼的脸立即就觉得清凉了。

还有老鼠、蛇、毛虫。。。。。。这些东西都令我感到恐怖。

然而最让我害怕的不是这些，而是人。我为自己买了一把很大的水果刀作护身用，常常磨得又快又尖故意用钥匙链吊皮带扣上，走路时一甩一甩的，常做出一副谁敢惹我我就敢拼命的样子；夜里睡觉，枕边也放上一把磨得飞快的砍柴用的弯刀。其实谁也知道我是虚张声势，但时间久了连我自己也相信我敢拼命。

不过真让我吓得半死的一次不是人，而是“鬼”。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从队里开会回来，好象是关于分配问题。回来的路上我和众多老乡一样手里横拿着一个酥麻杆做的火把，一路下来人都陆续到家，最后就剩我一个人要绕过一大片乱石堆到大马路上再走一节才到我们知青点。

刚走到乱石堆，我的火把就烧到头了，眼前一片漆黑。依稀中突然发现平时只有一条路的乱石堆居然冒出几条路来，我小心挑了一条自以为正确的路，刚走几步突然一巨大的石头挡在面前，吓出我一身冷汗！立即掏出刀来，打开，紧握手。再绕开那石头朝一边走，猛的又一块巨大的石头挡在面前，再走，又是这样！我的心开始砰砰乱

跳，冷汗不停地冒，脑子也开始乱了，就这样接二连三的瞎撞，好象碰到鬼了，怎么也走不出去。

我让自己停下来，告诉自己：没有鬼！我什么也不怕！我是人，我比鬼胆大！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是什么也不怕！！

这时好象真的不怕了，我冷静下来，仔细辨认，突然想到有一块最大的象房子一样的大石头应该就在路边，这时眼睛也开始适应黑暗了，我前后左右仔细看看，断定现在我面前的应该就是那块最大的巨石，我摸着它开始绕过去，这时一条灰白的、我觉得最最宽阔的大马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脚踏上马路突然一阵没命的狂奔奔向我的院子我的小屋，不知怎样打开的门又怎样关上门拉开灯，一把抓住我的弯刀，用棉被裹住自己，一夜几乎没敢合眼！

早上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第一次感到太阳是这样的可爱，这样明亮。

回忆昨夜，我对着太阳对着山野大声说：鬼有什么可怕的？我比鬼还胆子大！

苦恼的神枪手

这里的老乡确实很善待我，我一个城里的黑帮狗崽子居然当上了持枪民兵！

在第二年的6月，我们大队持枪民兵排开始脱产训练，准备迎接公社、区继而县里的备战大比武。

这可是知青们最高兴的事了，打枪可比干活好玩多了，再说，那个年代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兵了，当不了解放军，民兵也行啊。

首先要学的是打枪，广大贫下中农民兵真的是刻苦训练，许多人练瞄准把胳膊肘都磨破了皮。

而我等知青们却乘机偷懒，枪不太够，我们常常发扬风格把枪让给贫下中农练。我们的民兵排长很忧虑，尤其对很多重活都干不好的我说：要抓紧练啊，不要给我们大队丢脸啊！

这次我是很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排长你就放心吧，没问题！

到实弹射击考核那一天，那些农村兄弟姐妹们个个战战惊惊，不是这个闭不上左眼，就是那个一紧张就打飞了，打得好的没几人。

轮到我了，我很自信的上好子弹，三点一线瞄好轻轻一扳扳机“砰！”一枪，再来“砰！”两枪，“砰！”三枪！大家都很紧张的报靶员：“9环！10环！10环！优秀！”哇！啪啪啪~~~~~一片掌声传来。

考核完毕，我的成绩最好！在现场主考的公社武装部长专门过来和我握手，说：“好好！打得好！”可是我自

己很不满意，因为这枪不熟悉，要不我肯定3个10环。

这下老乡们可觉得惊奇了，到处传说，那个知青女子才聪明哦，练都不练，一开枪就是10环，神了！

其实他们不知，我这可是童子功哦！

我有个老三届的小表叔，他有一只气枪，打鸟那是一打一个准，我10岁起就老和一批小孩子做他的跟屁虫，后来他父母文革被整死家里房子被收掉，他当工人住集体宿舍把枪就寄藏我家，我和弟弟练气枪练弹弓，在我家的三楼窗户上瞄树叶、瞄小鸟，瞄学校围墙外山坡上农田里的各种东西，练到弹弓用石头子可以打穿树叶，别说枪弹了。后来我弟弟当三年兵是连续三年的军区神枪手。

再说武装部长一高兴就决定调我到机枪班，别看机枪班的民兵们平常抗枪神气，到实弹时那些家伙个个都抓瞎，为什么？因为机枪实弹考核是连发，具体是“砰！”一发，“砰砰！”两发，“砰砰砰”三发。

很多人通常是连发地一发“砰”上靶，后边连发的就飞了，所以我们的机枪班几乎每次实弹考核都没人及格，这次就看我的了。

考核时我先仔细观察别人，发现那些家伙由于过于紧张，把枪端得死死的，靠得紧紧的，机枪后坐力比步枪打，一出去枪口就被后坐反弹一边去了，所以瞄准全靠头一发，后两发则要靠把枪稳住。

轮到我打，我仔细调整了握枪和枪托靠肩窝的松紧程度，瞄准，打！“砰”“砰砰”“砰砰砰”！

六枪全在8、9、10环上，全场沸腾，掌声不息！

领导们纷纷和我握手：小女子不简单不简单！战友们围着我狂喊。

武装部长又发话了，去参加区里的比赛吧！不过区里比赛是三项全能，步枪、机枪、手榴弹，回去好好准备吧！

这下不光是我们排长发了愁，我自己也发了愁，因为我的手榴弹最远扔不到15米，别说比赛，离及格还差得远呢。

为了帮助我练习，排里特地派手榴弹扔最好的小伙子来教我。他始终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教的，“拿起一甩就出去了嘛！”

无论他怎么示范，我就是投不远，后来他和围观的民兵们一致认为：“就她那根麻杆一样细的手杆子，咋个甩得远嘛！”

后来部长来检查我的训练结果，说：“你只有把自己炸死算了！”

而后也同意我的“麻杆一样细的手杆子”短时间练不出来，只好忍痛割爱改由我去辅导别人打枪。

洗澡

古溪沟的名字来源于这里的一条美丽的古老的小溪。溪水哗哗流个不停，无穷无尽；小溪水流清晰见底，一边流着一边碰在一河大大小小的石头上翻起一簇簇带着浅浅碧绿的白花花的浪。和沟里人一样，我的吃用水都来自这里。可是这里的女人都羞于洗澡，即使要洗也是把自己关在黑呼呼的屋里悄悄洗，一年也洗不了几次。

我下乡时正是8月底，干起活来一身臭汗，每天回去在屋里用水擦澡感觉很不清爽。看着这一条小溪的好水时时刻刻都在眼前白白流走，很不甘心。偷偷试探地问比我早来的女知青能不能想法夜里到这溪水里洗澡？回答是：决不能！这里忌讳女人在溪水里洗澡，认为会脏了一条溪水。

其实平常干活休息时也可以发现即使是洗手，男人们都往上水走，女人们自觉在下水。但我仍然不甘心，在几个傍晚假借洗衣担水之机在附近溪边细细查看，终于发现有一个水凼边有三块有一个半人高的巨大的石头靠一起，中间形成一个洞，朝沟里一方有一条可以溜进一个人的缝，朝外两缝都堵得严严的，溪水从下边穿流过去。我先走到附近坡上从各个方向观察发现都看不见洞里情形，然后等到某天天黑后直接穿着衬衣长裤溜进洞里，发现水刚好齐腰深，便斗胆在里边宽衣洗了个澡。记得那天好像月黑星灿，那水凉幽幽的缓缓渗过石缝划过肌肤，带走了疲劳带走了尘埃也带走了烦恼，人渐渐似融化在了水中，一时间除了蛙鸣蝉鸣溪水潺潺四周一片静谧，一瞬间自然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奇妙境界。以后这里便成了我夏天秘密的洗澡天堂，想来奇怪的是竟然持续了两个夏天也没人发现。

洪水

也是在古溪沟，插队才半个月。那天傍晚我和平常一样到溪里挑水准备做晚饭，刚从浅浅亮亮的溪水里提起一桶水，就突然听见四面八方一阵敲锣声和凄厉恐怖的吼叫声还有好像有火车开进似的轰隆声，在近处还有人叫着我的名字叫“快跑呀！”，抬头寻声望去只见上游有三四层楼高的黑黄色的水流如万马奔腾般朝我呼啸着压顶而来！我本能的反映是提着手上那只桶转身往高处猛跑，直到有人处方停步转过身来，只见我原来放岸边的另一只空桶已经被洪水卷走正噼里啪啦粉身碎骨立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目瞪口呆大口喘气，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条奔腾咆哮黑黄浑浊连马路也侵占了的大河就是几分钟前那清丽温柔我的古溪！

这时耳边响起公社大喇叭的激动人心的召唤：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考验大家的时刻到了！公社附近的堤

坝开始漏水！请立即到公社集合参加护堤战斗！。。。。。。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考验大家的时刻到了！公社附近的堤坝开始漏水！。。。。。。

我条件反射般地扔下手中幸存的那只水桶和大家一起拔腿涉水赶往堤边，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战洪抢险”。

第二年8月的一天上午，风和日丽，我们改土队在古溪沟和岷江交口处修建围江造田的堤坝，沟里人叫做：砌堡坎。

上午10点时记工员喊：放哨了！（工间休息的意思）。

大家一堆一群的在清凉的溪水边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突然间那恐怖的声音和场面又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大家一窝蜂的边叫边往高处跑。待站定时，突然有人凄厉的叫唤：哑巴！哑巴！快跑啊~~~~~！转身一看，只见那高凶猛黑的水兽正呼啸着把楞在江边的大小伙子哑巴给吞噬进去，我亲眼看见哑巴奋力把手高高伸出水面三次便永远地消逝了，坡上响起一片悲声。

很快，人们顾不得悲伤立即又投入与洪水的周旋。这年我经历了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洪抢险。

许多年后的一个春节，当我再去古溪沟，我们当年战天斗地修的堤坝造的田地已经被每年的洪水冲刷得只剩下些许残破的石堆，而美丽的古溪也被人们糟蹋得在平时只剩下一滩石头，雨季却成了一河洪兽。

我站在枯干的溪边想：自然规律真是不可抗拒啊，人为什么不能与水为什么就相依相辅友好共存呢？

我们的前辈李冰父子多么的伟大，他们在那个时代就懂得了顺势导水，水为我用的道理！

窜队.盼望世界大战.

第二年春节后，我们知青点开始热闹，先是两个老知青回来干活了，希望这年有机会调走。5月又来了个和我同届同龄的镇上的女知青，8月又下了一位和我同城市的女知青。这样我的孤独之旅总算有了同路人。

其实最诱人的还是那公社禁了又禁的窜队，所谓窜队就是到其他知青点去聚会，因为窜队我认识了最好的朋友小凡和最敬佩的朋友江岷，可惜江岷在28岁的英年早逝了。

说起来，那时18、9岁的我们正值青春期，正是敏感、好奇、生长、躁动的生命旺盛期。可是我们的花季没有鲜花，雨季没有爱情。

我们总是在劳作的繁重和对前途的无望中挣扎，朋友和歌声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快乐。可是就这一点属于我们的小小愿望也得不到许可，公社领导一再下禁令不许知青来往，更不许凑一起讲“反动”故事唱“不健

康”的歌曲。当然这些东西是禁不掉的，知青也是人，而且还是一群生机勃勃的青年人。

我们开始肆无忌惮的窜队，我们这里和小凡他们那里就成了聚会的据点。没想到的是居然就有人打了小报告，就有一天我窜队回来公社书记正黑着脸等在那里，居然我这从来不会吵架从来低调的小黑帮狗崽子就大着嗓子大着胆子和公社书记论理。虽然倒霉的是我，但是那一次我发现我没有必要低头缩尾的做老实人，大胆地说话，大胆地论理，大胆地做人，这真是痛快！

窜队仍然在继续，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听到不少故事，也学会不少歌曲，我们的生活有了些许色彩。可是我们大都遵守着一个原则，男女生保持距离，因为我们害怕在这里呆一辈子。

我们最盼望的事可能是我们的长辈最想不到，那就是盼望打仗！

记得插队第二年的洪水淹到了我们的床角。

半夜，在我的屋子里，我们刚刚参加抗洪归来几个知青疲惫的坐在床上、桌上还在漫无边际的瞎聊。因为大队领导指示让我们坚持别睡觉等到雨停，如果雨继续大、水继续涨我们必须收拾东西往山上书记家转移。

窗外雨声哗哗、水流声轰轰隆隆甚是壮听，我们这一群一身泥水、赤着脚、衣冠不整的家伙好象也很悲壮的等待命运的判决。

没有人收拾行李，大家一致认为逃命时轻装最好，另外听说如果洪水冲垮了我们的房子，政府要发补贴，正好想穿新衣服！

有人问了，这洪水咋还不快点淹啦？咱连肌肉都紧张半天了。

大家就一起哄笑，想象着如果房子被冲垮了我们该如何逃命。

这时又有人说：洪水还真没意思，我们太被动了，拿它没法。还是打仗好，打仗至少可以去拼TMD的一下！

这下大家就开始热烈地聊起打仗来，对此有研究者就开始大谈如果世界大战打响，世界局势会如何变化，世界政治、军事、经济结构将如何变化；最让人关心的是国内局势一定会变化，至少需要人去打仗，老人家不是说要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引进来，关起门来打狗吗？老人家还说：中国有7亿人口，可以拿一两亿人去打鬼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参军了！可以打仗了！就是牺牲了，还能混个烈士当当！

“就是！如果被洪水淹死在这里，太不值了啊！”有人惊喊道。

这才想起低头一看，脚下的水不但没涨高好象还底了，外边好象没了哗哗声只有轰隆声。大家呼啦一下往外涌，站在屋檐下一望，经管一片白茫茫浑浊的大水还在轰隆隆地奔流，但雨已经停了，天边已经出现鱼肚白，白里灰里透着淡淡的紫，天就要晴了。

下乡回忆之一：

初到农村

看到许多知青在回忆当年上山下乡时说，动身时是多么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我那时可没有此类感觉，我下乡完全不是自愿的。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的偶像是我的舅舅——一位青年时即以科研成果闻名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初中毕业时，我当然选择了继续上高中，目标就是考大学。可是高一还没上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12月22日，那是老三届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老人家一句话，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弟弟从学校回家，走的妈妈单位门口，一条大标语映入眼中，妈妈的名字赫然在上，还被打上了红叉：“把女特务XXX揪出来！”。我们都惊呆了，妈妈解放前大学毕业，在工作中一直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业务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和领导、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何以被冠如此罪名？晚上，一伙工纠队员闯进家，翻了个底朝天……

城里呆不下去了，那就走吧，我第一批就报了名，得知我们的目的地是远在中缅边境的偏僻小县——盈江。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后，轻轻走到妈妈的卧室门边。妈妈没有起来，斜靠在床头。我说了句“妈妈我走了”，便赶紧扭过脸去，生怕眼泪会夺眶而出。这一分别，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弟弟帮我行李送到了学校，操场上已经停满了带拖斗的大卡车。我们把箱子装进拖斗，行李卷则放到车厢里，白天当座位，晚上取下铺盖。

汽车开动了，路边那飘扬的红旗、送别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我都好象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车队离开了城市，缓缓爬上西郊的碧鸡关。大家都站起来，向后望去。别了，我可爱的春城，别了，我的父母兄弟。

盘山的道路是那样漫长，天渐渐黑下来了，汽车还在喘着粗气，象老牛一样爬行。有两个男生抽起了烟，谁都不说话，默默地想着心事。

好不容易，车队开进了一所学校，我们草草吃了饭，把行李卸下来，铺到拼起的课桌上，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夜晚。

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六天。第六天中午，当汽车转过一个山包，云遮雾绕的盈江坝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欢呼起来，终于到了！

我们在县民族中学卸下了行李，县上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县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位叫潘金生的解放军连长，对我们挺严厉。据说他对知青说过：“你们知青，骨头都要烂在盈江！”

我们六男四女十个同学被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合作社，那时，边疆还没有实现公社化，到“九大”后才成立的公社。

由于县上经济十分落后，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属于农场和糖厂的。我们就只有把行李交马车运送，所有的知青都只背个小挎包，步行去目的地。

寨子里的老会计到区上来接我们，他大概四十岁不到，个子不高，很精干，可惜就是瘸了一条腿，据他说是小时候放马，被马踩的。

我们跟着老会计走了约两公里路，来到位于江边的寨子。正是日落时分，竹林中的寨子炊烟缭绕，江水缓缓地向西流去，风景真是美极了。

社上把我们安顿到社管会住下，这是一栋两层的瓦房。楼下堆放着稻种和一些杂物，还有两口棺材。楼上是一大一小两间屋，女生当然住里边的小屋，有简陋的床，男生就只有在外屋地板上搭个大通铺。

到寨子后，就赶上了春节，我们都被分到各家去过。我去的那家男主人叫波保留，又矮又瘦，却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女儿。大概是水土的原因，这里的人生女孩比男孩多。我们寨子十五户人家，有十几岁的小卜哨（姑娘）二十多个，而小卜冒（小伙子）只有三个，这个区名叫“弄璋”，大约就是想要儿子而取的吧。

节后，我们就正式参加了农业劳动。因为寨子里缺男劳力，几个男知青都被分去犁田。我们先是跟在农民大哥后面，看他们如何掌犁，如何转弯，然后再自己操作。知青老H胆子最大，也是最先独立掌犁的。可他在转头时多打了牛两下，那牛发起疯来，甩脱了他的控制，拖着犁向另一丘田冲去，犁头卡在田埂上，只听“啪”的一声，木梁

断做两截。一位穿西装的老头大叫起来“三孟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三块五”的意思。

我是最后“放单飞”的，分给我的是一头小母牛，脾气温顺，当然力气也小，犁得最慢，自然，我的工分也最低。

另一项劳动是往区上的糖厂送甘蔗，这活儿倒简单，推着小推车一天跑几趟就行，只是多出几身汗。我们寨子在江边，甘蔗含糖量低，一公斤只卖二分六厘，真比内地的稻草还便宜。

天气一天天变热，劳动一天天加重，烦恼也一天天增加。

一是吃的问题。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人有一百八十元的安家费。粮食由粮管所定量供应，每月好象是三十五斤，油二两。我们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粮当然不够吃。于是，我们先是虚报为回族，每月的油就加到三两五，又在粮本上打起了主意，把粮本裁开，重复购买。后来这招被发现了，粮管所把粮本每页都编了号，便只好到乡上打证明买碎米吃。吃菜也是问题，弄璋街五天才赶一次街，平时根本没有菜卖，我们的钱又紧，经常弄得吃盐水泡饭，有时找大妈要点酸菜，或掐点地里的豌豆苗。后来分到了一块菜地，才算基本解决了菜的问题，我们还盖了个厕所，把另一个难题也解决了。

少数民族的饮食开头也让我们不习惯。有一次，我们和农民一起捉了不少鱼，因为没有油，就煮了一大锅鱼汤。正当我们馋涎欲滴时，一位农民从家中拿来一盆酸笋，哗地倒进锅里。闻到那股酸臭味，我们顿时食欲全无。不过可能是气候的影响，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酸的食物，现在要闻到那味，还觉得挺亲切的。

二是住的问题。社管会只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农忙一来，社上要用那屋开会、放东西，就把我们男生赶到寨子中一所废弃的牛圈里居住，这里只三面有墙，另一面是些稀疏的栏杆，用来拦牛的。这还好办，砍点竹篱笆来挡一下就行了，要命的是到了雨季，上面漏雨，下面出水。尽管垫了不少土，下起雨来地面还是冒水珠，连我带来的一块自制万用表都锈死了。每天劳动回来，躺在湿漉漉的被子里，那滋味真是难过。这局面一直持续到秋收后，社里给我们盖了一排小草房，才算好转。

三是疾病和蚊虫的困扰。边疆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蚊子不仅多，还会传染疟疾，边疆是疟疾高发区，到了七、八月，往往全家甚至全村病倒。我们寨的知青小L首先被疟原虫击中，等他病好点，原来就瘦的人又瘦了一圈，加上他父母在干校挨整，心情极坏。有一天，他告诉大家，要出去散散心，便独自离开了寨子。后来，又有几个同学生病。我吃了解放军以来队送来的抗疟药，当时没有病，但却埋下了病根。在招工回城后一个月，我就因感冒引发了疟疾，饱尝了那种“热时节热得蒸笼里坐，冷时节冷得冰凌上卧，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痛时节痛得天灵破”的难受滋味。

农村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尽管也搞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但只能对付点小毛病。我有一次腰上不知被

什么东西叮了一片疱，又痒又痛，走几公里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给开了些金霉素，价钱不低，花了我五块多钱，疗效却不好，反而引起副作用，几天吃不下饭。多亏解放军医疗队进村来，才把病治好。我们大队的知青小S，在农忙时突发肠梗阻，就因抢救不及时丢了性命，死时还不到十八岁……。

蚂蝗也是讨厌的东西，我们以前在市郊劳动时虽然见过，但这里的蚂蝗特别大，能围着小腿绕一圈。傣族妇女喜嚼一种槟榔、草烟、石灰的混合物，遇到蚂蝗用这种混合物一抹，蚂蝗就掉了。我们知青就只会硬抠下来，然后就流血、溃烂…。更可怕的是旱蚂蝗，又叫草蚂蝗，这家伙只有火柴棍那么大，黑色，两头着地，一拱一拱地爬行，头上好象有类似红外探测器的器官，只要人往草地上一站，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叮上人时没有感觉，等发现，它早吃饱跑掉了。有一次我参加种花生劳动，看天气不热，便把草帽摘下来放在地边，等劳动完没细看就戴上了。谁知里面藏了一只草蚂蝗，把我的额头叮得鲜血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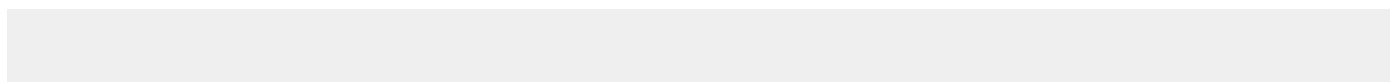
四是想家。弟弟在我下乡后几天，也到盈江来了，和他的同学在一起，离我这儿几十公里。妈妈进了干校，爸爸在工地劳动，一家四口人分在四个地方，经常几个月不通音信。即使是家还在昆明的知青，想回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山高路远，缺少路费外，那几条纵贯南北的大江是最大的障碍，过任一座桥都必须有县人保组的证明！知青要想拿到这证明，要经过大队、公社、县知青办的层层审批，哪个环节卡一下，你就别想回家。不象内地的知青，不批假就偷偷跑，大不了回来斗一顿。知青们为了回家，真是想尽了办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游泳过江淹死的，有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冻死的，据说还有为躲避过桥盘查，藏进油罐车被闷死的…。我有几个同学算是幸运，他们买通了运大米的驾驶员，躲到卡车车厢中大米包的空隙里，成功地过了桥。至于再回农村倒很容易，只要到原学校开个证明就行了。

自我介绍：

我1949年9月出生，1956年在北京上小学，1958年转到昆明，1968年高中毕业，1969年2月6日动身到云南省盈江县插队，1971年8月调到昆明某厂工作，任行车司机、电工、仪表工、技术员，1991年到省局技术推广站，任工程师，1994年机关面临改制，跳槽到一家计算机公司做硬件工作至今。

在小院里读书 

寨子里的小竹桥 



下乡回忆之二：

外五县大串联

所谓“外五县”，是指云南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五个县。文革中，德宏州被撤消，这五个县被并入保山地区，为与原来保山地区所属的保山、腾冲、施甸、龙陵、昌宁五个县区别，被称为“外五县”。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我们隐隐听到隆隆的声音，大家以为是打雷，没有理会，都去睡觉了。第二天刚起床，老社长就跑来告诉我们：“山边发大水了！”我们冒着雨跑到现场一看，都呆了：原先山清水秀的田园村庄，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砂石滩，这是一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由于连日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席卷着泥土石头奔腾而下，大树被连根拔起，最大的石块竟然有房子那么大！有四个村庄被淹没，近百人遇难。所幸的是：村子里的知青都逃出来了。

县知青办的潘连长也在这次灾害到来时殉职。他听说了洪灾的消息后，连夜骑着摩托往灾区赶，由于天黑路滑，撞到一辆拖拉机上。后来知青们用《流浪者》插曲的调子为他编了首歌：“正当洪水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连长潘金生，骑着摩托，一不小心，撞在拖拉机上…，他的头撞破了，受了重伤，送到了小平原（县城）抢救了一整天，没有效，没有效…。啊，潘金生，潘连长，你可听见我一声声呼唤…。”潘连长的遗体被埋葬在县城旁的一座小山上，实现了他“骨头也要烂在盈江”的誓言。

那几天，全大队都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死难者的遗体被掩埋了，幸存者的生活又成了问题。我们寨子的稻田也被淹没了一部分，秋后的收成将受到影响。

没过几天，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我们寨子的知青小L跑去参加了缅共！他姐姐哭得死去活来，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一核计：干脆一起去位于潞西县曼海的缅共接待站，把他拉回来！

为了出门的方便，几个女生设法弄来了探亲证明。我们收拾好东西，一行人便出发了，坐班车经梁河县来到腾冲。

谁知刚到腾冲县城，就遇到了难题：由于连日阴雨，公路不好走，从腾冲到潞西的班车停运了！才出门就回头吗？不行！我们决定，走路也要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了。蒙蒙细雨还在下，我们披着雨衣，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仿佛又回到当年步行长征时。

忽然，后面传来了马达声，有汽车来了。男生们急走几步，转到山包后面，女生则转身准备堵车，因为那时流传一句话：“女生的辫子比刹车还灵”。

算我们运气好，来的是一辆解放军的嘎斯51空货车，带车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二话没说就让我们全上了车，经过龙陵县，下午我们就到了潞西县城，过了一夜，又赶到遮放，找有同学的寨子住下了。我们托人带信给小L，让他赶到接待站见面，挑了一个不下雨的日子，向曼海出发了。

从遮放到曼海有四十八公里路，极少有汽车来往，为省时间，我们抄小路走。大概是去当缅共的知青太多，小路都踩成了大路，根本不会迷路。路旁有参天的大树，密密的灌木，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中午，我们走到了一个部队驻地，每人花两毛钱吃了顿客餐，那酸黄瓜可真是美味无比啊！解放军战士以为我们都是去当缅共的，不免又劝说一番。

天快黑时，我们终于到了接待站，其实就是边境线中国一侧的一排茅草房，小L还没来，我们只好先住下。来接待站的人非常多，大通铺上一个挨一个。夜里，我被挤得睡不着，爬起来坐着吧，又被蚊子叮得受不了。熬了三天，才算把小L 等来了。

可是一交谈，我们就发现想把他拉回来的努力是徒劳的。的确，我们继续待在寨子里到底有什么前途，谁也说不上来。与其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待一辈子，不如到战场上大干一番。我们不但没有能说服小L，反而被他搅得心乱如麻，有的甚至也盘算是否跟他走了。最后达成协议，他陪我们去遮放，再从畹町出境，路上再接着谈。

归途中，我们搭了一段拖拉机，回到遮放，又见到一辆装载筒盐的大货车陷在泥坑里。我们帮司机把货物卸下，将车从坑里推出来，再把货装上，得到的回报是坐车到畹町。路上我们仍然没能说服小L。到了畹町，大家在照相馆里合了一张影，目送着他，再次离开了我们。

接下来，我们步行到了瑞丽。和其他边疆县不同，这里是坝区（平原）与缅甸接壤，尽管是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边民来往仍很频繁，市场比盈江县热闹多了，还可以用解放鞋换五星牌打火机呢。我们在瑞丽逗留了三天，就

踏上了回盈江的路。我要到陇川县看望一个老同学，就与大家分手了。

在陇川住了几天，同学帮我找了回盈江的伴儿-三男一女，都是盈江知青。我们顺着县城后面的山路来到了户撒，这里是阿昌族的聚居地，出产的户撒刀远近闻名。那三个男生要买匕首，耽误了不少时间，最后决定不走了。我和那个女生坚决要回去，于是只有我俩结伴而行。

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是很拘束的。我背着挎包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相距一两米。因为怕迷路，我们只敢顺着公路走。太阳渐渐西沉了，公路又靠近国境，我们埋头只顾走，也不说话。天黑下来了，那夜一点儿月光都没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白色的砂石公路，路上静极了，只听见我们沙沙的脚步声。因为黑，连山下第一个有知青的寨子都错过了，直到将近十点，才看见另一个寨子的灯光，找到知青点，住了下来。

这次出游，历时一个多月，经过梁河、腾冲、龙陵、潞西、瑞丽、陇川六个县，又回到插队的盈江。

除了外县，我们当然也没放过在县内游玩的机会。盈江风景优美，最出名的景点是虎跳石和落水洞。大盈江在坝子里水流平缓，最宽处差不多有三百米，可是流到坝尾后，由于山体影响，江面变窄，水势变急，最窄处从两块相距七、八米的巨石间流过，这就是著名的虎跳石，水流之急可想而知，那水声很远就能听到。更奇妙的是江水过了虎跳石后，转了一个弯，钻到一块更大的石头下面去，从另一边流出来，这就是落水洞。附近有支流上的瀑布，景色也很壮观。还有一座小铁桥，据说是二十世纪初英国人修的，是当时通往缅甸的交通要道。

那时在外五县，知青出外游玩成风，住在公路附近的知青点“客流”不断，口粮都不够吃了，只好也锁起门外出。这一段经历后来被称为“外五县大串联”。



通向边境的铁桥

大盈江边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下乡回忆之三：

艰苦的劳动

从外五县回来后不久，秋收就开始了。

首先是割稻子，这活儿我们以前上学时下乡支农也干过，可在这里干又不一样。这里的镰刀比内地的小，刀口呈锯齿状，不需要磨，越用越快。不过要是被这刀割了手指，那就糟糕了，伤口参差不齐，很不容易封口，愈合后也会有疤痕，我们寨子的女知青小F就深受其害。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这里的稻子长得很高大，如果不倒伏，差不多有一米四、五高。割稻时不需弯多少腰，剩下的稻茬都有膝盖高，然后再放牛去吃。

挑谷是秋收中最累的活，负担重、路途远，而且因为稻捆是穗朝下的，路上不可能休息。最难过的一关是要挑着稻捆爬谷堆，谷堆矮时还好，等堆到几米高后，竹梯又陡又滑（所以干这活不能穿鞋），肩上是沉重的挑子，一不小心就会出危险。好容易熬到田里的稻捆快挑完了，一天下午，我从谷堆上下来，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蹲到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起插队的知青把我送回宿舍，帮我洗了脚，扶我到床上，可是我不能平躺，只好靠在床上。女同学为我煮了面条，但我一口也吃不下。待到第二天，同学们送我到公社卫生院，那医生查了半天也说不出名堂，最后诊断为“肋间神经痛”，打了一针封闭了事。

休息了几天，我又参加了打谷劳动。这里打谷的方式很奇特，不用打谷机，也没有撮盆，而是把稻子堆到场上，赶着牛转着圈儿踩。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脱了粒的稻草用叉子挑开，待谷粒堆到一定程度时，用铲子铲到另一边扬场。这活儿倒不累，只是当老牛站下不动，撅起屁股时，就得赶快捧一把稻草，接住牛粪扔到一边。

秋收后，大队要建立甘蔗基地，从各生产队抽人，我和知青老H被选中了。这基地就在我们大队的山边，离上次发洪水的地方不远。因为晚上回不了家，当地的农民都不愿去，各生产队送的差不多都是知青，大家在一起，好不热闹，仿佛又回到了上学时下乡支农劳动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山坡上挥锄开荒，初冬的早晨，草地上露水很大，解放鞋一会儿就被湿透了，看看天不冷，大家就都光着脚干。知青小Z挖到一丛灌木旁，突然窜出一条蛇，朝他脚上咬了一口。小Z大叫一声坐到地上，旁边的同伴把蛇打死了，我们围过去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条剧毒的竹叶青！有人找来了带子，扎住小Z的脚腕，几个知青轮流背起他往卫生院跑，经过一个知青点时，又找来季德胜蛇药片让他服下，由于抢救及时，小Z总算没把命丢在农村。以后，谁也不敢光脚干活了，我们在基地一直呆到计划的荒地开完。

年底，寨子里又来了一位新伙伴-小W。他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小时候因小腿上长骨瘤，截去了一小段骨头。他本来可以不下乡的，但就是因为“出身问题”，留城的申请得不到批准。工纠队、红小兵天天跑来家里“做工作”，最后连口粮也被停了。无奈，只有来投奔我们。小W很有文才，上初一时我们到学校图书馆帮忙，就因一手好字博得高中同学的喝彩。可是到了农村，他和我一样，就算弱劳力了。小W后来办病退回了城，靠做木工为生，77年以优良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我们的母校，现在是教研室主任，专带高中毕业班。

下乡的第二年到了，我们又开始重复上一年的劳动。干活时，我常常望着寨子通往外边的小路，真盼望有人来吧我们接出农村。

没想到机会还真让我盼到了。公社的广播员（当地人）不听新来的军代表陈主任的指挥，陈主任一怒之下把他撤了职，赶回家种田。不知是谁向陈主任推荐了我，说我在学校搞过广播，可以胜任这工作。陈主任是南京人，非常同情我们这帮远离家乡的知青，当即拍板把我调到了广播站。我的待遇是工分加补贴，一切关系仍在生产队上。

我在农村不是个好劳力，到广播站倒是得心应手。除了每天三次转播电台节目和自播节目外，我还把前任留下的一大堆坏广播器材修好了，陈主任乐得合不拢嘴。当时正逢搞“政治边防”运动，我还常帮公社机关写标语、刻蜡纸、印点材料什么的，拿了近一年的“政治工分”。



开拖拉机



我们的菜地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qz.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

下乡回忆之四：

招工

71年夏天，一个消息在县里的昆明知青中传开来：上面要来人在知青中招工了！要采取自己报名，贫下中农推荐和上级批准的方式。一时间，回家探亲的知青赶忙回到了生产队，常外出乱串门的同学也乖乖地出工了。

一个滂沱大雨的日子，招工人员真的来了。到我们公社招工的是广播局、铁路局、冶金局和建工局的一些单位。

我当时正被抽到公社广播站，看到“广播局”几个字，不由得心中一动。我玩无线电差不多有十年了，又能说一口还算不错的普通话，在学校、农村都干过广播。即使进不了电台，去搞搞修理总可以吧！我急忙找到新来的公社赵主任，请求他让我回城。赵主任看我坚决要走，便同意找人替我。接着，广播局招工的干部就来找我，递过来一张表，说：“我们广播局是重要单位，你一定要认真填写，不许隐瞒”。我赶紧填好表交到他手里，他看着看着，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因为我的表上有这么一条：“父亲解放前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我的几个同学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后来这干部对我说：“有特长的家庭都有问题，家庭没问题的都没有特长。”那个年代，当然是政治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

接着来找我的是铁路局的军代表，他走进广播室，东看看，西看看，又提了好多问题，最后点点头说：“就来我们这儿搞广播吧！”只要能回城，在铁路局也行啊，我一边准备办交接手续，一边等着填表走人。

谁知等我拿到招工的表格一看，却是建工局所属的一家工厂的，我才知道，铁路局广播站的那个名额又被别人顶了，不过工厂招工的干部说，进厂也让我去广播站。

不管怎么样，回城就好。71年8月26日，我和近百名知青一起，登上了厂里来接我们的大卡车。走的虽还是来时路，心情可大不一样了，一路上大家唱啊，闹啊，憧憬着新的生活。

五天后，车队开进了位于郊区的工厂。经过几天劳动，开始分配工作了。这时我得到消息：工厂广播员的位置已经被区武装部长的小姨子捷足先登了。不过厂里对我还不错，没有让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去当煤气司炉或搬运工，而是当了一名天车司机。

我们寨子第一批就走了三个知青，算是比较多的（因为我没占大队的名额）。参加工作第一个月我拿到工资十五元后，就寄给了留在寨子里的同学，希望能帮他们一点，也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家。他们收到钱后很感动，还托人给我带了一大块腌肉。以后的一两年中，他们通过招工、办病退照顾和上学等方式，先后离开了农村。最惨的是小L，他在和我们一同下乡后半年不到，就跑去当了缅共，经历了多次战斗，差点丢了性命，还入了党，当了连级干部。几年后，他看到缅共实在没前途，便又回到寨子，那时全县的知青已经所剩不多了。大概是下乡后的第七年吧，上级来了文件，插队知青“一锅端”全部招工，他们才得以回城。可是进厂后，年近三十，许多都已为人父母的知青们还得从学徒工干起。于是便流传着一首歌谣：“娃儿娃儿你莫哭，你爹还在当学徒，每月工资十五块，刚刚够你订牛奶”。



进厂后开行车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